



人·民·文·库

人文科学·译著

伯恩施坦文选

[德] 爱德华·伯恩施坦 著 殷叙彝 编



人民出版社



*Voice Of Marxism-Leninism
Group Of EBOOK*

制作



人·民·文·库
人·文·科·学·译·著

《人民文库》编委会

顾 问 (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连儒 王善迈 止 庵 田士章 叶秀山
庄浦明 庄福龄 张立文 张世英 张作耀
张惠卿 张静如 吴道弘 陶文钊 顾锦屏
蔡美彪 薛德震

主 任 黄书元

副主任 陈有和 张小平 任 超

委 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方国根 李春生 乔还田 刘丽华
张文勇 张振明 张耀铭 陈亚明
陈鹏鸣 郇中建 喻 阳



人·民·文·库

人文科学·译著

伯恩施坦文选

[德] 爱德华·伯恩施坦 著 殷叙彝 编

《人民文库》出版前言

人民出版社是党的第一家出版机构，始创于1921年9月，重建于1950年12月，伴随着党的历史、新中国的发展、改革开放的巨变一路走来，成为新中国出版业的见证和缩影！

“指示新潮底趋向，测定潮势底迟速”，这十四个大字就赫然写在人民出版社创设通告上，成为办社宗旨。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出版宗旨的表述也许有所不同，但宗旨的精髓却始终未变！无论是在传播马列、宣传真理方面，还是在繁荣学术、探索未来方面，人民版图书都秉承这一宗旨。几十年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大批为世人所公认的精品力作。有的图书眼光犀利，独具卓识；有的图书取材宏富，考索赅博；有的图书大题小做，简明精悍。它们引领着当时的思想、理论、学术潮流，一版再版，不仅在当时享誉图书界，即使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影响。

为挖掘人民出版社蕴藏的丰富出版资源，在广泛征求相关专家学者和老一辈出版家意见的基础上，我社决定从历年出版的2万多种作品中（包括我社副牌东方出版社和曾作为我社副牌的三联书店出版的图书），披沙拣金，精选出一批在当时产生过历史作用，在当下仍具思想性、原创性、学术性以及珍贵史料价值的优秀作品，汇聚成《人民文库》，以满足广大读者的阅读收藏需求，积累传承优秀文化。

《人民文库》第一批以20世纪80年代末以前出版的图书为主，

分为以下类别：(1) 马克思主义理论，(2) 中共党史及党史资料，(3) 人文科学（包括撰著、译著），(4) 人物，(5) 文化。首批出版 100 余种，准备用两年时间出齐。此后，我们还将根据读者需求，精选出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优秀作品陆续出版。

由于文库入选作品出版于不同年代，一方面为满足当代读者特别是年轻读者的阅读需要，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我们将原来的繁体字、竖排本改为简体字、横排本；另一方面，为尽可能保留原书风貌，对于有些人选文库作品的版式、编排，姑仍其旧。这样做，也许有“偷懒”之嫌，但却是我们让读者在不影响阅读的情况下，体味优秀作品恒久价值的一片用心。

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今天，作为公益性出版单位，我们深知人民出版社在坚持社会主义文化前进方向，为人民多出书、出好书所担当的社会责任。我们将从新的历史起点出发，再创人民出版社的辉煌。

《人民文库》编委会

目 录

出版说明	1
编者说明	1
社会民主党在议会中的地位	1
空想主义和折衷主义	15
第二共和国是怎样崩溃的	22
崩溃论和殖民政策	55
社会主义中的现实因素和空论因素	71
给奥古斯特·倍倍尔的信（1898年10月20日）	92
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	100
第一版序	100
第一万册版序	107
第一万三千册版序	118
新版说明	120
法译本序——对我的社会主义的批评家们的回答	121
英译本序	136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	137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成分	137
第二节 唯物主义历史观和历史必然性	141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论和资本发展论	150
第二章 马克思主义和黑格尔的辩证法	156
第一节 黑格尔主义辩证法的陷阱	156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和布朗基主义	164
第三章 现代社会的经济发展	175
第一节 略论马克思价值理论的意义	175
第二节 现代社会中的收入变动	184
第三节 生产中的经营等级和社会财富的扩散	194
第四节 危机和现代经济的适应能力	207
第四章 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和能力	225
第一节 社会主义的政治和经济先决条件	225
第二节 经济合作社的效能	237
第三节 民主和社会主义	262
一、民主和国民经济	262
二、民主制的联邦制原则	277
第四节 社会民主党的当前任务	285
一、国防问题，对外政策和殖民地问题	285
二、农业问题	298
三、合作社政策	303
四、地方自治政策	306
末章 最终目的和运动	314
跋	336
辩证法和发展	351
科学社会主义怎样才是可能的	375
关于政治性的群众罢工的十二项原则	406
社会民主党内的修正主义	409
前言	409
一、修正主义的名称的由来	410
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	413
三、修正主义和马克思的发展学说	417
四、马克思主义和大工业的发展	421
五、马克思主义和社会结构	426

六、崩溃论	433
七、修正主义和社会主义实践	436
附录 社会民主党纲领理论部分的提纲	439
当务之急	445
什么是社会主义	449
前言	449
一、社会主义概念的起源和变化	449
二、自由主义是社会主义的初步	456
三、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的思想体系	459
四、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上的困难	466
五、为什么要实现和怎样实现社会主义	469
历史和传说	474
一个社会主义者的发展过程	478
童年和学生时代	478
精神激励和青年时期的政治印象	480
加入社会民主党	485
银行职员和鼓动员	487
在杜林和马克思之间	491
马克思主义者	494
修正主义者	502
世界大战以前	516
世界大战期间	522
在德意志共和国	526

出版说明

这里奉献给读者的是十九世纪后期到二十世纪上半期的欧洲社会主义思想史上的活动家和思想家的主要著作文本或其片断，这些文本能够“客观地”反映他们关于社会主义的基本观点，应该说是他们的思想的要旨之所在。

社会主义作为一个社会运动过程，其实就是一部实践和思想相互作用的人类现代社会史的主流之一。在其中，思想对于实践的认识、理解、总结，以及对其可能的发展路向的预测、从而对运动的战略和策略的制定，是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枢机。

所以，研究各个历史时期的社会主义思想，既是理解当时的社会主义运动“所以然”的深层理由，也是理解当今社会主义运动的“由来”的思想根据的基础方法。

我们当前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无疑是世界社会主义史上最具有震撼力的、伟大的当代创新。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满怀信心地说，我们的事业在当今正引领着人类社会历史的大方向。然而也正因为如此，我们的事业也就包含着宏大的艰巨性和深刻的复杂性：在蓬勃前进的同时确实也面临着许许多多具体的困难和问题。

在这个时候，我们应该还记得古人的几句话：“温故而知新”、“前车之辙，后车之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依据这些宝贵的方法论，在以积极的实践态度大力推进当前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同时，我们还应该以积极的理论态度，放开眼界，扩大胸怀，重温世界社会主义的历史，激活历史上诸多思想家留给我们的思想资源，这些资源肯定

会对我们思考当前的迫切问题有所启迪。而从理论研究的高层次来说，盛世治史，在新的历史意识的视域中，重新反思、解读和总结世界社会主义史的诸多重要文献，实乃推进当代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理论创新之必需，实乃推动当代科学社会主义运动实践之必需。

当然，这里还要特别说明两点，提请读者注意：

我们选择的社会主义思想家和活动家的著作文本，都是我们认为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的。影响有两个方面，积极的和消极的。我们相信读者会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对他们作出正确的、从而也是科学的和客观的理解和评价；我们提倡对具体思想根据具体时代条件和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进行具体的分析。

由于我们学术水平有限，所选人物和其文献的文本是否得当，敬请尊敬的读者提出宝贵意见，以便我们把选编工作做得更好。

2008年4月

编者说明

爱德华·伯恩斯坦（1850—1932）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的著名活动家，修正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1872年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1878年德国颁布反社会党人法后，在瑞士参与筹办党的机关刊物《社会民主党人报》，从1881年起担任该报主编，1888年迁到英国伦敦继续编辑和出版该报，1890年9月停刊。他在编辑该报期间，积极揭露和批判俾斯麦政府的反动政策和党内的机会主义思想，因此得到恩格斯的赞赏和信任，被指定为遗嘱执行人之一。1896—1898年，他在党的理论刊物《新时代》上以《社会主义问题》为总标题发表6篇文章，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观点提出质疑；1899年3月又发表《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策略进行全面修正。1903年党的德累斯顿代表大会通过了谴责修正主义的决议，但伯恩斯坦仍继续坚持自己的观点。1901年他从英国回到德国，担任过几届国会议员。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初期支持德国政府参战，后转向主张尽快实现和平。他对俄国十月革命和布尔什维克持敌视态度。1918年德国十一月革命后曾短期在社会民主党领导的政府中任职，并在德国社会民主党1921年格尔里茨纲领的起草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后，伯恩斯坦逐渐脱离政治活动。

本卷收集了伯恩斯坦的主要著作，按发表时间顺序排列。第一篇文章《社会民主党在议会中的地位》是伯恩斯坦把1890年发表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的三篇文章合并而成的，反映了他的早期修正主义思想。《空想主义和折衷主义》（1896年）、《崩溃论和殖民政策》（1898年）、《社会主义中的现实因素和空论因素》（1898年）这三篇文章选自

《社会主义问题》；此外还选了《第二共和国是怎样崩溃的》(1897年)，这是他为路易·埃里梯尔的《1848年法国革命和第二共和国历史的通俗描述》一书的德译本写的后记的第一章。在党内受到批评后，伯恩斯坦于1898年10月20日给德国社会民主党主席奥古斯特·倍倍尔写了一封长信，为自己辩解并且叙述了自己的思想发展过程。这封信也选用了。本卷所收《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的中译本是根据1920年修订第2版译出的，译者将其与第1版作了核对，补译了第2版删去的部分并作了说明，还收入了伯恩斯坦分别为该书的1900年法文译本(书名改为《理论的社会主义和实践的社会民主党》)和1909年英文节译本(书名改为《进化的社会主义》)所写的两篇序言。伯恩斯坦曾写过不少文章反驳党内对该书的批评。本卷限于篇幅，只选用《辩证法和发展》一篇。伯恩斯坦回德国后，几十年间不断从事写作，并发表过多次演讲，阐述自己的修正主义思想，但观点基本上未超出《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的范围。本卷选用了他的三篇有代表性的演讲：《科学社会主义怎样才是可能的》(1901年)、《社会民主党内的修正主义》(1909年)和《什么是社会主义》(1918年)。还选用了1905年作为《政治性群众罢工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政治状况》一书的附录发表的《关于政治性群众罢工的十二项原则》以及1915年6月19日他与考茨基、哈泽联名发表的要求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争取停战的呼吁书《当务之急》。伯恩斯坦不赞成德国十一月革命，认为这次革命的失败是重复1848年法国革命的教训，因此1922年他把《第二共和国是怎样崩溃的》重新印成小册子发表，书名改为《一次革命是怎样失败的》，本卷选用了他为小册子写的题为《历史和传说》的前言。本卷所收最后一篇著作《一个社会主义者的发展过程》是伯恩斯坦的自传，最初发表于1924年，在他去世前两年印成小册子出版。

本卷所收译文绝大部分是已经发表过的，编者在编辑本卷时，对原来的译文除修改个别错字或作一些技术处理外，未作改动；在每一篇著作后面，都对译者和原出版单位作了说明。《科学社会主义怎样才是可

能的》过去曾摘译一部分收入《德国社会民主党关于伯恩斯坦问题的争论》，此次殷叙彝补译了其余部分，全文收入本卷。《第二帝国是怎样崩溃的》和《历史和传说》是殷叙彝专为本卷翻译的。原书中引自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引文均根据近几年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编译的新版本作了校改，这一工作是费新录同志做的。

殷叙彝

2004年10月

社会民主党在议会中的地位^{*}

前 言

在 1890 年 2 月 20 日帝国议会选举中，社会民主党获得惊人的选举结果，增强了它在德国帝国议会中的地位；选举之后不久，关于庆祝五一节的正当方式的争执也解决了。这样便重新引起关于社会民主党在帝国议会中的地位及其任务的性质的辩论。本文作者认为自己有责任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参加讨论，于是继 1890 年 3 月 7 日的《萨克逊工人报》所发表的一篇文章之后加入了这场讨论。那篇文章里写道：

即使我们获得了比现在多一倍的席位，这个议会党团的职责范围也不会扩大很多。既然议会代表着按资产阶级方式组织起来的社会；那么议会党团当然决不能超出资产阶级社会；它必须永远留在现存制度的圈子里。因而，它所能做到的就是，制止反动派从我们手里夺走政治统治工具，阻止他们挖工人的腰包来给容克地主送礼而对工人尽可能地利用社会欺骗。只要想一想我们党的本

^{*} 本文是伯恩斯坦根据他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发表的以下三篇文章编成的：《暗礁（二）》（1890 年第 18 期，5 月 3 日）；《暗礁（三）》（1890 年第 21 期，5 月 24 日）；《略谈策略问题》（1890 年第 25 期，6 月 21 日）。——编者注

来目标，便知道以上这些事当然并不算多；不过，这总比毫无作为要好一些。同时还必须考虑到，在现行制度下无法为工人做出更多的事情了。

4月5日的《社会民主党人报》指出，这番话就给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派定了一项纯粹防御性的工作；可是150万德国工人的代表们本来有责任同时以挑战和进攻的姿态对待统治阶级，尽管提出的要求当然不能是那种以不同于现存社会制度的另一种社会制度为前提的要求。“社会民主党决不要求现今的国家去做那种党无法证明国家不破坏社会机体的职能也能做成的事情。”不过，社会民主党在议会中仍有比上述引话所划定的范围广阔得多的活动范围；充分利用这个活动范围是党的权利和义务，无视这种义务，会受到严厉惩罚。这个问题是党目前必须考虑的最重大的问题。

在这期间，《维也纳工人报》（当时还是周刊）也讨论过这个问题，并从另一种角度回答了这个问题。相反地，这家报纸除了别的还主张在议会辩论中要更加强调党的最终目标。这促使《社会民主党人报》发表了三篇标题为《暗礁》的文章，然而其中第一篇只是考察党在各个社会阶级中的成长。另外两篇文章及随后发表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谈的是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在帝国议会开会时提出的一个工人保护法草案）都讨论了上列标题所指的问题，其内容如下：

* * *

—

确实，甚至很难见到一个社会民主党人会一味幻想我们党在2月20日获得的那将近150万张选票全部是来自那些深信我们的抱负的支持者们。如果我们的敌人摆出一副仿佛他们刚刚发现了美洲似的神气，来显示他们的伟大智慧，认为社会民主党的选票急剧增加仅仅是

满和对立情绪的表现，投票支持社会民主党人的选民决不因此就保证赞同社会民主党的“空想的未来国家”，那么我们总是付之一笑。在一定限度内，这种说法是完全正确的，我们从来也没有否认过；但是我们的敌人因此赢得了什么，大概他们自己也讲不出来。比上述自我安慰更愚昧的安慰，可说是根本不可想象的。投票活动永远只就一部分选民来说才算是对一种十分明确的政治理论或社会理论的确认，而在多数选民方面，这种活动纯粹是各人当时心绪的表现，主要是表现对某个党派或其代表的信任。对于一切党派都可以毫不例外地这样讲。不过那种衷心拥护者与我们所称之为自由追随者的比数，在任何党派中都不像在社会民主党中那么有利，尽管在各秩序党中自由追随者常常是很不自由的。

我们的敌人宣称，社会民主党的选民并不都是生产资料社会化、国家组织劳动、乱搞男女关系以及他们不管有理无理硬栽到我们头上的其他不法行为的拥护者，可是他们这样说究竟获得了什么东西呢？什么也没有。所有资产阶级政党惊人一致地在这许多选民面前把社会民主党的秘密计划描绘成一切可恶事情中最可恶的，一切疯狂事情中最疯狂的，然而他们还是投这个党的票；这件事并不会由于资产阶级政党的描绘就失去丝毫对它们的粉碎性打击力量。这件事表明，越来越多的人民群众对它们丧失了信任，而把这种信任转移到社会民主党方面。如果说这 150 万张社会主义的选票还不算对整个资产阶级社会的坚决不信任投票，那毕竟是对所有资产阶级政党的绝对不信任投票，而且是对进行社会“颠覆”的党的信任投票。

虽然在我们队伍里没有人不承认这件事，但是仍存在着一种低估它对党的策略所具有的意义的危险。

只要党在议会里不过是个微小的少数派，上述危险还关系不大。无论社会民主党的议员们是不是情愿，他们除采取一种大体上消极的、抗议的态度而外，基本上就没有很多事可做了。当然，他们从来不是那么死守教条，只限于提提抗议，而是在适当时机提出积极要求参与立

法。这种积极行动同我们党对今天的国家所采取的抗议态度倒完全不矛盾，可是它必然缺乏系统性。

顺便说到，不可把社会民主党的抗议态度同譬如什么被非法合并的省区的代表们的抗议、或遭受损害的朝廷利益的代表们的抗议等混为一谈。这些代表们可以把任务限于否认现存制度有正式权利，而我们呢，我们不是为恢复过去的状况而斗争，而是为了现存制度朝着一个确定方向继续发展，这就是说，我们的抗议不是倒退的，而完全是革命的，如果我们完全放弃积极方面的要求，那么不仅不会加强甚至倒会削弱我们的抗议的作用。

然而，积极和积极也不一样。对现今社会的代表来说，所谓积极地行动就是尽可能地设法确保现今社会的存在，即一方面加强国家权力，另一方面使人民群众安于现存制度。当然不能按这种意义来谈社会民主党的积极行动。我们对现存制度不满的党；有人说我们是靠激起群众的不满过日子的，这种说法虽然好笑，但是我们确实是处处要依靠这种不满才能得到为更好的社会制度而斗争的战士；不过我们并不需要先来制造这种不满，因为这种不满固然常常处于潜在状态，却是客观存在的。我们的积极行动目的不在于加强国家权力，而在于加强人民权力，在于使负有进行这种斗争的使命的阶级，即劳动人民，也能够坚定有力地进行这种斗争。因而在今天的社会里，我们的建设性的纲领是围绕着以下两个主要原则的：在现存条件许可的范围内，扩大人民的权利和提高劳动阶级的物质生活。

一向如此，今后仍应当是这样。不论我们党在帝国议会里有 10 个或 20 个或 100 个代表，不论有 10 万、50 万或是 200 万选民作党的后盾，我们党的态度在原则上是丝毫也不能改变的。但是，我们认为，贯彻党所主张的原则的方式，完全可以而且必须适应党的发展而加以改变。

有的党只代表极小一部分居民、因而更像是一个宗派，尽管它并不准备搞宗派活动。这样的党只要时时大体上阐明自己的不同见解就够

了；它用不着做更多的事，人家也不允许它做更多的事。但是，随着拥护者的数目增加，它的权利也在增加，随着权利的增加，它的义务也在增加。只进行一般的批评已经不够了，现在凡是涉及它所代表的阶级的利益的地方，它处处都应当插手。它有权提出议案，提出质问，推举代表参加各个委员会，同时我们认为，它必须最充分地利用这种权利。固然，我们并不讳言，这样也会产生种种危险，首先是过高估计议会事务的危险，即受到议会痲病毒的传染，但是这种危险正是我们必须克服的。人们不是通过回避带有危险的活动来证明自己的力量，而是通过敢于冒这种危险、并克服这种危险来证明自己的力量。我们以前曾经说过，这里重说一遍：谁要是向议会传染病屈服，那他迟早也会向议会外生活中出现的五花八门的腐化影响屈服。

因此，我们认为，社会民主党议员人数增多的自然后果，是他们更多地参与议会的讨论。在有可能实行分工的情况下，这样给各个议员还不会造成更大的工作负担，所以也应该按照分工的原则来办事。我们并不是站在荒谬的均等论的立场上，要每个人都能做每件事；但是，应该使每个新生力量都有一个用武之地，使他在那里能够怀着善良意愿大显身手。千方百计不辜负 150 万选民对党的信任，这应该就是党的抱负了。Toujours en vedette！（时刻守在岗位上！）是我们的口号。凡是需要保卫人民权利的地方，时刻守在岗位上；凡是需要惩治不公正行为的地方，时刻守在岗位上；凡是需要保护弱者的地方，时刻守在岗位上；凡是需要反抗强暴的地方，时刻守在岗位上。

德国的政治形势是这样：帝国议会德国人民命运的影响预料将大大加强。这样，作为一切被剥削者和被压迫者的天然辩护士的党在帝国议会中的任务也就加重了。如果由于我们根本反对现存的国家制度及社会制度而无视或低估这种任务，我们认为这是一块必须避开的最致命的暗礁。

因此，我们来更加详细地探讨一下这种任务。

二

关于必须要求制定劳动保护法，在这里要再多费唇舌，那就是对读者的侮辱。不但在社会民主党人中间，而且一般说来在一切有思维能力的人中间，今天在这点上呼声是一致的。至多有一小撮顽固地拥护剥削者绝对自由的人和陷入小资产阶级辩证法迷宫中的无政府主义者，还“在原则上”抵制这一点。此外，今天大家所争论的只是必要保护的范 围，这种保护要扩展到哪些工业部门，而且在每一点上它应该做到什么程度。只要这种争论是在企业主的代表为一方和工人阶级的代表为另一方之间进行的，它对目前的问题讨论就无足轻重。但是，在工人或各工人党中间的劳动保护支持者的行列里，在这方面也还存在着种种意见分歧；特别是如果意见分歧的基本问题在于大家对应该从什么观点出发来要求劳动保护有不同看法，那是很值得讨论的。

如果问题几乎完全在于一般地宣传这种要求，人们通常是不加考察地采纳随便由哪一方面提出的各种论据，并且在宣传鼓动中加以利用。这种做法是否正确，是可以讨论的；但是反正现在我们已越过这个阶段，因此更加有责任对各种论据本身进行一番检查，只承认那些按照我们对资产阶级社会的整个看法、按照我们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质的认识来说站得住的论据。

例如，普遍缩短工作日不仅对工人有利，而且也能防止资本家们在彼此竞争当中所遭到的一些祸害，这样说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如果资产阶级的博爱主义者和社会改革家进而断言，法定的标准工作日会根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切有害影响，从而会巩固和保存这种生产方式本身，那么他们简直就误入迷途了。希望通过逐步缩短工作日来保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是一种空想。经济竞争斗争的规律不会因为割除一个肿瘤就被取消，毋宁说适得其反，这种规律的作用会更加增强。工作日的缩短不但不会阻止资产阶级生产制度的崩溃，反而会使

这种制度必然让位于更高级生产方式的那一时刻提前到来。工作日的缩短同时便于向一种更高级的、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过渡，并使这种过渡的实现比在无限制的剥削经济的情况下少受痉挛痛苦，这就表明工作日的缩短对社会的一切成员都是有益的。

资产阶级中间拥护劳动保护的人是不是抱有上述空想，对我们来说毕竟是无所谓的。我们甚至多多祝贺他们抱这种空想。因为这总还是一种比无限制剥削的辩护士的空想较为明智的空想。但是，这种空想是否在工人队伍中、即使在一部分工人中得到承认，是否引起似乎有了劳动保护立法就会较长期为工人创造生存的幸福与安全这种想法，这对我们来说就不能是无所谓的了。因为这种看法将必然导致如下结果：人们十分片面地醉心于获得劳动保护法，而为了获得劳动保护法，竟把对于工人阶级说来同样重要的种种要求放在一边或者忽略了。今天这种倾向的苗头已经显露了。正如在以往的年代为了国家社会主义一样，现在为了劳动保护立法在这里或那里也把对工人阶级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活动自由的考虑干脆置之脑后了。

这是一个大错误，对此我们必须尽量保持警惕。劳动保护立法的目的首先是：提高工人阶级的独立性和行动能力，使它不论在政治斗争中或在经济斗争中都能坚强而持久地维护自己的利益。例如，那种要侵害工人的集会结社自由才能得到的劳动保护，这就是说，要以这种侵害为条件的劳动保护，绝对是不合要求的，因而必须加以拒绝。同样，一切间接地归结于损害工人在捍卫自身利益时的独立行动的改革，也必须加以拒绝。

所以我们毕竟只能祝贺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在它的劳动保护法草案中已十分有力地表示维护工人的集会结社权。人民党的《民主通讯》针对草案中的有关条款所发表的意见简直是荒唐可笑：因为反动派想要在这方面更加恶化现行的工商业条例，所以工人代表们就应当放弃改善这种条例的要求，“对现行规程的抨击应当加倍小心”，换句话说，对付资本主义辩护士的袭击，应当限于纯粹的防御。这是一个只会使

工人失败、使敌人胜利的美妙策略。不行，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坦率而明确地阐述已由实践证明为确保工人的集会结社自由而绝对必需的东西。假若劳动保护法草案一般是按这种精神拟定的，那么在我们看来它就是完善的——只要大家能够适当地使用“完善”一词。在别的地方，我们仍然觉得它对善良人的敌人所作的让步未免太多了。

然而，我们还是继续来谈我们的基本意见。

保护工人的措施尽管重要，它毕竟只是我们在今天的社会里所要求的一部分。我们的要求应当说包括适于提高工人阶级的物质状况、精神发展以及政治影响和社会影响的各方面的改革。我们强调这一点，当然是没有说出丝毫新的东西，而只是重复了我们纲领中的一个已成为老生常谈的原则。但是，我们也根本没有打算提出新的原理，而只是从被认为正确的东西中找出当前的任务来。

今天，党能比以往更多地维护工人阶级的利益及其他种种利益，它也应该这样做。应该不失时机地争取扩大人民权利，击退对现有人民权利的任何进攻。如果这件事在实践中首先加强了议会的影响，这不会使我们心感不安。走向完全政治自由的道路是通过议会制度，而不是绕过议会制度。议会制度尽管有种种缺点，在今天德国的所有国家机构中毕竟是最现代化的，任何教条的理由都不能使我们忽视这一点。我们的确还得完成很大一部分原来要由各进步的资产阶级政党去做的、但已被它放弃的事情。例如，进行反对军国主义、世袭特权的原则的斗争，还有铲除腐朽的法律机构——这一切目前都意味着国会即帝国议会的权力范围的扩大。

党在这个方向上进行活动，丝毫也没有放弃它的彻底的革命性。它只是摆脱了貌似革命的反议会空谈。假若这种空谈还吃得开，它对党来说将成为危险的礁石。它的结果将是：党使它的选民们大失所望，迟早会严重地损伤选民们对社会民主党的信任。但是，这是不应当发生、而且也不会发生的事情。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不会低估它在议会中的任务，而是像它已经开始做的那样，今后也将时刻准备不失时机地

捍卫劳动人民的利益，争取扩大他们的权利。它将通过不倦的活动，不管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迫使居统治地位的势力和党派向工人阶级作尽可能的让步，并且通过实践向群众表明，什么是他们不能指望从现今的议会制度得到的东西。

如果本文的开头所引的《维也纳工人报》的文章认为，我们在帝国议会中的议员现在就应当提出不折不扣的真正的社会主义的要求，那么我们就不得不表示反对。在这方面的政治的和经济的先决条件还不具备，倒不如说必须先创造这些条件。然而，假若那篇文章认为，在批评现状和今天掌权者的行为时，应当更强烈地表现社会主义的观点，那么它只是表达了一种——就我们所能判断的限度而论——在党内得势的思想。如果它主张现在的帝国议会代表开展较过去所能开展的更加多方面的活动，它同样也只是说出了新形势的后果。我们重说一遍，在其他方面社会民主党的议会活动的原则却是依然如故。

三

美国一家党的机关报《圣路易日报》最近评论了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在德国帝国议会中所提出的劳动保护法草案，在评论中一再提出不同的意见。草案的起草人决不自认为那份草案已做到十全十美；完全撇开这点不谈，来自一家在任何场合都表明同情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报纸的批评，不仅有资格要求得到充分考虑，我们甚至还欢迎这种批评。必须让不同的意见坦率地讲出来，以便对它进行反驳或思考。对有些人说来，发牢骚是一种需要，所以他们不坦率地讲，而是诚心诚意地保持他们的疑虑。跟这些人进行讨论也是有益的，因为可以设想，抱有这种疑虑的不光是他们。事先声明，实际上《圣路易日报》的指责所依据的观点，我们在社会主义者中间也是常常遇到的，因而我们觉得讨论这种观点有双重必要。

《圣路易日报》对德国劳动保护法草案的指责主要有两点。首先是

对实行法定 8 小时工作日制期的期限规定。

该报写道：“把法定 8 小时工作日制推迟到 1898 年，而把法定 9 小时工作日制推迟到 1894 年，我们认为这是一种策略上的错误。”

且来听听这家报纸是怎样论述这种见解的：

我们的德国的同志们不愿意使工业“受惊”，给它一个进行准备的宽限。但是这个期限非常不恰当，长得骇人听闻，因而，期望并不能增强工人的生活勇气，而等待却一定会使他们厌倦。

我们最好还是直说吧：

这项法律的条文扼杀了社会主义精神，因为它要求工人们经受严重的忍耐力考验，为 8 小时工作日制付出 8 年的劳动。

在这里理想和现实彼此相隔的距离简直有十万八千里；革命的意志和臣仆的柔顺形成了近乎滑稽的对立。

我们昨天想起了，鲍德雷这位会计员式的审慎的典型，曾建议在 3 年到 4 年之间走完从 10 小时工作日制到 8 小时工作日制这段行程。他打算要人们逐年度过一个短的阶段；首先指令推行 9 小时的普遍工作日，然后 8 小时半的，最后 8 小时的。

劳工联合会认为普遍地均一缩短工作日目前是行不通的，于是选择了一个行业一个行业地争取到 8 小时工作日制的办法，因此普遍采取 8 小时工作日制同样也需要几年时间。

我们喜欢后一种办法，而不喜欢鲍德雷的办法，因为后者比较有效。

工人中的一些行业部门所提供的实例，即 8 小时工作日制在各方面起着有益的作用，具有无法估量的价值；它驳倒了企业主的这种借口：“我们不能这样干，这样干我们会遭到毁灭。”

当然应该适当考虑到德国情况与美国情况的差别；德国的体系式的思想方式是严禁任何“急躁”的。

我们的德国同志在立法道路上不得不分阶段前进，无法从 11 小时或 12 小时直接跳到 8 小时，这倒是理所当然。但是，为什么

认为从10小时缩短到9小时、从9小时缩短到8小时，各需要4年的准备，对这点我们在美国是缺乏了解的。

从法律上限制每天的剥削时间，不管所要求缩短的劳动时间或长或短，在资本家看来无论如何都是一种无耻的要求。因此，在德国社会党人提出最适度、最温和的要求——先开始实行10小时工作日制——的情况下，不管他们答应给10小时工作日制的缓期是4年、2年或1年，为克服资本家及其机关——报刊和议会多数派——的抵抗而作的努力都是一样的。

如果在比8年短得多的时间内实行8小时工作日制，那么会在精神上鼓舞工人，给予他们希望和勇气；并且将会大大促进传播关于解放人类的社会主义学说的坚定精神。

但是，“8年”——我们再说一遍——就等于懈怠。

在8年中，可以把法律撤销8次；在8年中，资本家可以想出无数的方法手段，来破坏工人的成就。

用8年的时间等待8小时工作日制，这甚至比雅各为了拉结而服侍人的时间还要多一年。^①

连这个老奸巨猾的族长^②也受了骗，他仍须再服侍人7年，因为已经把利亚硬塞给他了。

《圣路易日报》就是这样讲的。

我们决不会抱有它的那种怀疑。

在美国，是依靠组织和联合会自身的力量争取到8小时工作日制，但是在德国，则是通过国家的法律来实行8小时工作日制，因此跟美国的8小时工作制运动作对比是不恰当的。这个法律应当是具有普遍

① 《旧约》创世记第29章中记载，雅各为娶拉班的二女儿拉结，服侍拉班7年。满7年后，拉班却把长女利亚给雅各为妻。于是雅各又服侍拉班7年，才娶得拉结。——编者注

② 指雅各。——编者注

性，包括一切工业企业，而工会斗争只包含多少总算广阔的先进工业和企业界。而且，连鲍德雷的计划也讲分阶段地把 10 小时的工作日缩减到 9 小时，然后再缩减到 8 小时，从而把 10 小时的工作日当作目前的正常状态。这对美国说来可能是符合一般情况的。然而在德国，我们还必须考虑到 11 小时的、12 小时的、甚至 14 小时的工作日。固然，有许许多多工人工作 10 小时，甚至 9 小时半，而且某些行业的工人只工作 9 小时；就这些行业来说，10 小时工作制表面上似乎是没什么价值，然而只是表面上如此，因为实际上这个法律同样也会改善它们的地位。然而，就那些现今工作 12 小时和 14 小时的企业来说，要想立刻跳到 8 小时的工作日而不致引起会殃及工人的重大骚乱，在现有情况下是做不到的。因而，必须注意逐步地前进。

既然承认了这一点，而且《圣路易日报》也讲在立法道路上必须“分阶段地”前进是“理所当然”，那么在我们看来结论只是，为进一步缩短法定工作日规定相当的期限，好根本排除一切以需要保持技术效率和企业稳定性为依据的反对意见。在这方面只有以下两条道路：

或者是：提出一个相对的最终目标——就这个问题来说即法定的 8 小时工作制——作为要求，而任凭我们的对立一方按照事态觉得必须答应多少便答应多少。

或者是：适当调整这种要求，使它马上可以实现。那么，即便不让最终目标完全退居次要地位，也必须依据实际情况来确定达到最终目标的道路。

只要一个运动还年轻、不够强大，一般是选择前一条道路，因为以后涉及的问题完全是宣传的问题；一旦运动强大起来，成了人民运动，便选择后一条道路。

连美国的工会会员也不采取别的行动。美国的建筑木工一向劳动 10 小时，他们对 9 小时的工作日已经感到满足了，而在每一个参加斗争的新行业，都将相应地有所变通。虽然他们是在比我们德国同志有利的境况下进行斗争的，但是美国人如果按照他们的作战计划到 1898

年作到真正普遍地实行 8 小时工作制，他们也会高兴的。我们对他们的行动十分同情，然而在这方面我们还是非常怀疑。

鲍德雷先生本人把逐步实行 8 小时工作制的最终期限规定在 1894 年，这当然是他的计划的最小错误。假使这个计划一向是可以实行的，我们绝对宁愿采用它而不采用工会联合会的计划。但是可惜，这个计划的毛病在于它完全是悬空的，是非驴非马的东西。在理论上，它比劳动联合会的计划要好，因为它包括了工人总体；在实践上，它却远远落在联合会的计划后面，因为它不考虑唯一能保证工人总体缩短工时的手段——立法。

以立法为出发点的德国草案，在这种情况下必然会注意工会在联合斗争中所注重的的问题。这个草案如果不打算离开今天可实行的事情这个基础，它必须规定一个有充分时间进行一切技术变革等的期限，这种变革是由于缩短作业时间而必然进行的。而且，从来还没有任何国家在缩短工时方面进行得比德国草案中所作的规定更快。这个草案非但不像《圣路易日报》所担心的那样，会夺去工人的希望，会使他们“懈怠”，它只会使他们受到鼓舞。8 年或 7 年，对于个人来说的确是一段长时间；同我们在理论上领会并完成一个思想的速度比起来，那就是一段永无穷尽的时间。但是我们今天已经脱出了朦胧的梦乡，我们的工人们懂得：要完成他们的彻底解放，只能是整代整代人劳动的结果，那么在这条道路上，到 1898 年达到一个如此重要的阶段，如 8 小时工作制，这种想法为什么会使他们受惊，甚至会“扼杀社会主义精神”呢？对这一点我们绝对无法理解。社会主义精神并不是取决于空想的愿望，而是取决于对社会机体的本质与规律的认识以及相应的行动。谁有这种认识和行动的意志，谁就比那种沉迷在幻想里的人，比那种今天自以为能够冲破天、可是明天随便遇到哪堵墙就撞了头的人，十倍地不易于懈怠。还要再过 7 年，8 小时工作制才成为普遍的法律，这当然不符合我们的愿望。但是我们的理智告诉我们，在目前情况下，要想更快达到这个目标是办不到的；理智又告诉我们，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的

提案——1891年实行10小时的工时，1894年实行9小时的工时，1898年实行8小时的工时——如果成为法律，这就意味着德国工人阶级在肉体上的再生，而且对于他们进一步的政治、社会解放斗争具有极其重大的价值。如果原则先得到承认，那么只要不把期限推到荒唐的遥远未来，期限问题倒是比较次要的。

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所选择的期限完全符合实际情况，《圣路易日报》的我们那位同仁如果重新把问题冷静地思考一下，他自己满可以理解这一点。我们对此深信无疑，因而我们怀着这种信任请期限回到旧约中去。

* * *

第二点异议涉及企业主和工人在草案里所提出的劳资会议中有平等代表权这种要求。关于这点，我也觉得资方和劳方在同一个组织里代表着各自的利益是困难的，在这种意义上我同意《圣路易日报》的批评。但按照分派给各组织的任务来说，在今天我还是同意这一点。

可是谈到《圣路易日报》对1890年社会党人的草案中规定的缩短工作日的期限所提出的反对意见，这些意见和我的答复一样，是对关于社会政策规划的原则与方法的讨论的独特贡献。现在是1900年。不仅没有普遍实行8小时的最高限工作日，连9小时或10小时的最高限工作日也没有普遍实行。这条道路比《圣路易日报》和它的评论员所想象的要长得多。然而在这个期间工人运动丝毫没有松懈。

选自马元德、严隽旭、彭金安、蔡升译《社会主义的历史和理论》东方出版社1989年版，第3—17页

空想主义和折衷主义

近几年来，社会民主运动几乎在一切文明国家里都取得了显著的进步。这种进步即使还没有像在德国那样反映为社会民主党所得选票数目的如此巨大的增加，但毕竟是明确无误的。著名的费边派社会主义者萧伯纳在一篇不无错误和夸张、但仍然很值得一读的关于伦敦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的文章——发表在《世界主义者》9月号上——里指出：虽然在英国，社会民主党还未能完全凭自己的力量获得国会里的代表席位，还未能给自己的候选人收集10万张选票，但是在立法方面已经表现出来日益增长的社会主义倾向。这件事是无可争辩的，只不过萧伯纳从中得出的结论至少说也是很片面的。事情很简单，英国和德国比起来，社会主义的经济前提和其他社会前提总的讲较为进步，各资产阶级党派对符合时代的社会主义要求也不那么冷淡歧视。在英国，旧的党派更有发展能力，因而对于同它们对立的社会主义党也比较有抵抗能力，所以社会主义宣传的影响暂时表现得比较间接，但并不因此就作用较小。在法国和瑞士，也各按照不同性质的情况，有类似的现象。甚至在比较落后的国家，例如奥地利和意大利，社会民主党宣传的影响也有了颇显著的增长；各大邻邦的榜样起着传染作用。总之，整个看来社会民主党在一切国家都正在明显地前进。

如果打算从这一事实推断出我们已处在社会主义最终胜利的前夕，虽然是未免过于轻率，但是根据社会主义思想的广泛传播以及在生

产、贸易、交通、职业生活和工人运动中与此相应的现象得出如下结论，却是可以容许的：我们已在大踏步地接近社会民主党必须修改它今天仍然采取的主要是批评的立场的时代，修改的精神是：它必须突破关于工资、劳动保护之类的要求的范围，而提出积极的改良建议。我们在最先进的国家里，已处在虽然不是“专政”的前夕，但毕竟也是工人阶级或代表工人阶级的政党获得重大影响的前夕，正因为如此，检查一下我们用来迎接这个时代的精神武器可能不是多余的。

现代社会民主党引为自豪的是，它在理论上已克服了社会主义的空想主义，而如果仅就未来国家的模型这一方面看来，这种自豪无疑也是有道理的。任何一个有健全头脑的社会主义者今天都不会画出这样一幅关于未来的图画，即他想通过这幅图画向人类说明，如果要使地球充满完美的幸福，那只能是这个样子，而不容许有别的样子，这是为达到所期望的目的的最快最可靠的方案。社会主义者方面今天还在发表的关于未来的幻想，或者是试图描绘通向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可能的发展过程的一般轮廓，或者是以某种程度的天才设计出一些只能自称为幻想画的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状况的图画。即使是这种情况，也还可能混入一些空想主义思想，但是真正的空想，也就是自命为“替未来的餐馆开的菜单”的那种空想，可以看做是已经绝迹了。

但是还有另一种空想主义，可惜它还没有绝迹。它是同旧的空想主义相反的另一极端。人们胆怯地逃避一切对未来社会组织的深入研究，而假定从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有一个飞跃。在资本主义社会发生的事，一切都不过是缝补伎俩和姑息手段，是“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社会将带来解决的办法，即使不是在旦夕之间，毕竟也是在很短的时期内。人们不相信奇迹，却要假定有奇迹。他们画了一条界线：这边是资本主义社会，那边是社会主义社会。根本不谈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的有系统的工作，人们得过且过，任凭事态驱策。他们认为，援引设想得很片面的阶级斗争和经济发展就一定会帮助他们克服一切理论上的困难。

尽管对这两个历史推动力的基本重要性不应加以否认，但是显而

易见，如果单独地和无条件地援引它们，那就会留下许多事情没有说清楚，而这些事情正是社会主义——如果它在其他方面真正是科学——必须说明或者发现的。对社会发展的推动力和迄今的进程的考察，如果连同它的结论恰好在需要开始自觉地和有计划地行动的时候就中断，将具有很有限的价值。

把一切解决办法都推到流行的说法，所谓的“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的那一天，这并不因为有人用取自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武库的口号来装饰它而摆脱空想主义的性质。即使是最科学的理论，如果对它的结论作出教条主义的解释，也会导致空想主义。例如我们拿常常被人引用的《资本论》第1卷的“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这一节来说吧。标题中的趋势一词已经警告人们不要把在那里写下的句子从上下文割裂开来，按照字面加以解释。虽然如此，仍旧会一再使人有如下想法：似乎“剥夺剥夺者”指的是必然随着灾变开始而且在全线同时发生的行动。但是这完全是空想主义地想出来的。因为虽然社会灾变毫无疑问能够并且多半将要大大加速发展的过程，它毕竟不能在一夜之间就创造出条件的同样性，而这种同样性是经营方式的同时变革所必需而目前无论如何还不存在的。但是在这期间世界并不是静止不动的。某些生产部门或企业部门已成熟到这样的程度，这时还听任它们被私人用来进行剥削，即使不至于危害普遍的社会需要，也是不适合的了。此外，工人阶级和代表他们的政治组织的影响在增长着，虽然还谈不到无产阶级专政。按照上述观点本应是灾变以后才发生的问题，将不可避免地提到日程上来。关于这点，谈论社会的长入社会主义，并不是错误的，只不过这句话有些过分使人想象一种机械的生长。但是如果说能够突然用像“国家资本主义”和“市政资本主义”这样的毫无意义的口号来代替这句话，把它用于灾变以前产生的一切由国家和地方经营的经济企业，那么人们对此应当怎么说呢？这叫做加劲冲回空想主义。对于那些由国家和地方经营的、或者只是为了筹划金钱、或者出于同国家和地方的经济政策任务本身毫不相干的原因而摆脱了私人剥削的企业

来说,使用国库主义 (Fiskalismus) 或国库企业 (fiskalischer Betrieb) 这一旧名词已经足够了。特别在该共同体是由有特权的少数人为自己的利益而官僚式地统治和管理的时候,这样说是恰当的。但是这种状况在逐渐消失之中。如我们已经讲过的,现代的生根于工人阶级的民主在日益增长地对国家和地方发生直接和间接的影响。这种影响越强大,企业领导的原则就越会按照民主的精神加以修改。有特权的少数人的利益将日益服从公共利益。把经济政策的任务放在首位、其次才注意到国库利益的企业在增加。在原有的、起初只是为了财政目的而加以垄断的国家等等的企业里,经济政策的一面也同样日益占了首位。要用像国家资本主义、市政资本主义这些词来称呼这种完全显而易见的正在实现着的发展,就是用强力来阻碍对它的历史意义的理解。因为它是坚决反资本主义的,是反对由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和剩余产品的,而这种占有正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特有的和基本的方面。只能根据生产利润或企业利润今天的分配形式来运用资本主义这个名词;但是如果把分配形式看成决定性的标准,那么这决不是科学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恰恰是以把生产方式和生产条件看成决定性标准的这种认识为基础的。在国家资本主义这个说法背后隐藏着一种完全空想主义的思维过程,这个思维过程不从社会发展的规律出发,而是从任意一个设想好的、具有自己的分配形式的未来国家出发。同样糟的是把存在着极不相同的国家这一事实置之不顾,把一些国家的国营企业(在这里国家是凌驾社会之上的、几乎独立地同社会对立的机关)同另一些国家的国营企业(在这里国家是从属于社会的,而社会本身是高度民主化的)等量齐观。因而,如前所述,这一毫无意义的名词重新从社会民主党的词典里消失得越早越好。

所有这种与次要因素连在一起的口号的弊害是,它抹煞了一切合理的区别,违反对事物的一切系统的理解和处理。它如果不归结于纯粹不可能主义,就反而导致完全靠不住的折衷主义。英国的费边主义者把国家社会主义和市政社会主义标在他们的旗帜上,如果他们是折

衷主义者，那么他们便是有意识作折衷主义者的，而且他们有他们的现实主义的准则，^①基于这些准则，他们在经济政策问题上往往和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之上的科学社会主义得出同样的结果。但是，如果人们衡量经济制度时，不是按照它在实际进行着的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意义来衡量，而是按照一种想象的社会状况来衡量，那么必然的结果就是一种惯例，依这种惯例，在某个场合应在什么地方加上社会改革的杠杆，成为任意估计和心情的问题，而为了——这本来是社会民主党作为政党的使命——缩短并缓和社会变革过程的阵痛，社会改革的杠杆是否加在正确的地方，这也成为纯粹偶然的问题。

迄今为止，除了关于阶级斗争的话而外，对科学社会主义的信奉者行列中的费边主义者一向没有丝毫反对意见，这一点本来应该能够促使他们放弃对事物的折衷主义处理方式才对。但是，阶级斗争首先是社会进化中一个无规则的推动力，它好像不以人类为转移的自然界中的自然律一样发挥作用，在自然界，时间、劳动和物质有无限的浪费。这就是充满经验主义精神的英国工人运动所呈现的景象。这种景象是不圆满的，这一点没有人会否认。空谈的革命主义对这件事没有多大改变，它朝向另一个方面恰恰导致这样的浪费。无原则和侈谈原则，或者换一种说法，即粗俗的经验主义和空想的教条主义，在这方面几乎起着同样的作用。

前面我已经详细讲过，费边主义者是对 80 年代初英国的社会主义狂热信徒所宣扬的那种宗派性空谈革命主义的反动。任何反动，不管它多么有益处，总要有过火的地方，费边主义者的反动也是如此。被抛弃的不只是纯粹的空谈废话。社会主义被化成一些社会政策上的措施，丧失了任何表现基本思想和行动的统一性的结合因素。费边主义者在个别研究中作为机会社会主义者有一些卓越成就，但是他们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把持了社会主义运动的罗盘，而他们坚持要社会主义

^① 可参看悉尼·韦伯所写的小册子《社会主义：真的和假的》。

运动只做试探性的漫游。

这是在许多方面都感觉得到的，然而除了在人身攻击和不大有说服力的老生常谈中以外，这种不满一向没有得到发泄。反对费边主义的全部论战迄今一直是围着外表形式打转，大家拿一些从马克思主义武库中借来的口号对费边主义，却不去努力地把马克思理论超出这位伟大思想家所遗留之点继续向前发展。人们甚至无视马克思和恩格斯自己对于他们的前期著作所做的更正。国家资本主义这一口号在英国比在其他任何地方更没有意义，而它却甚至在英国也找到了乐意的买主，这是一个奇迹吗？

* * *

[在原稿上,这里下面是发表在《进步评论》上的一篇关于工业中集体主义的论文的一个节录,这篇论文试图找出一个原则性的标准,根据这个标准,可以衡量哪些工业适于公共的集体经营,哪些工业最好委之于私人经营,或者在其他工业之后才过渡到公共经营。这篇匿名发表的文章的作者——大概是社会学家约翰·A.霍布森——追随亚当·斯密,认为那些主要照定规经营的工业首先需要归集体经营,而艺术性的——个体化的——劳动起突出作用的那些工业,比较不适于集体经营。在这方面他没有忽视:随着事态的发展,后一类企业不断地变成主要是定规性质的企业,但是他又认为,为了适当消费的新企业也将不断地形成,来代替那些企业。一方面大量消费品的生产发展得越厉害,越将为个体化的、符合个别人的艺术性需要的消费品创造更多得多的发展余地,因而生产完全归公共集体经营,这件事在不太远的未来既不见得会实现,也不可取。

对于这篇论文的节录,本书作者有一些评语。以下是评语的主要部分:]

* * *

更重要的是,消费者在这里只是以最后的或“非生产的”消费者的身份而出现,在这类研究中大多如此;然而实际上生产的消费者在今天的经济机构里占十分重要的地位,忽视这种消费者,就等于为极危险的

错误结论敞开大门。在一件产品成为最后消费者的使用品以前，它往往已经全部或在其组成部分上成了生产的消费者的使用物品，这种消费者当然不提出个人的艺术性要求，而只注意材料的好坏等。由此可以认识到，“定规工业”的范围比根据一种只从最后消费者方面来考察生产的观念必然认为的范围要大得多。原料和半成品工业几乎一律是定规工业，或者力求成为这种工业。在使用物品最后加工时，个人的、艺术性因素才发挥作用。

此外，这条准则：“定规或艺术性生产”，在上文所阐述的较广的讲法中显然是一条对于所研究的问题非常有效果的准则。特别就历史展望来说是如此。各类企业在具体场合下始终未被这条准则触及，如果这条准则一般说来同资本里现存的各类企业的准则一致，就这点而论它便是后者的一种宝贵的补充，它对于精确地估计预见中的进一步发展的过程提供了一种手段，防止我们就集体主义的企业形式即将独霸这件事下轻率的结论。因为不论人们怎样想象定规工业和（上述意义的）艺术性工业的数量比例，根据以上的话总可以明了，这种比例多半永远不会成为那么压倒性的，以致后者和前者对比之下完全“消灭”。恰恰是集体主义的企业的不断增多和扩展本身又给新的个体主义生产活动创造出基地，这种企业本身就产生出妨害它过分发达的条件，这倒完全符合辩证法的规律。我们今天从许多实例已经完全看清这一点，而如果人类正走向一个只有一种运动形式的未来时代，这确实也是一个可悲的远景。

所以，虽然我们在许多细节上不能同意作者的论调，我们却认为这种论调的基本思想是无可反驳的。无论如何，我们在未来一个长时期内必须除掉这种想象：仿佛我们正走向一个圆满的集体主义社会状态。我们必须习惯于部分集体经济的想法。

发表于 1896 年 10 月 28 日。选自马元德、严隽旭、彭金安、蔡升译《社会主义的历史和理论》东方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141—148 页

第二共和国是怎样崩溃的^{*}

一、二月革命的历史意义

1848年的法国革命是以这种形式发生的：在一次突飞猛进之后出现了一系列的反动。这次革命的历史是起初欣喜若狂、然后接二连三的痛苦失望的历史。二月革命所唤醒的非常急切的期望与它所留下的显然比较微薄的积极成果之间的矛盾，三天的英勇街垒战斗所取得的辉煌胜利与三年内逐步发生的不光彩的失败之间的矛盾，使法兰西第二共和国的历史带上了悲喜剧的性质。而且针对它的讽刺挖苦也确实不少。在陶陶醉意中诞生，由于醉后的长期不适而死去，从表面看来这就是它的简历。

但是尽管如此，它仍是一段重要的历史，对它的研究在今天，而且也许恰恰在今天，仍旧是具有很高价值的。1871年巴黎公社对现代工人运动的推动固然很大，但是就直接影响、冲击力和多面性而言，它是

* 这是伯恩施坦为瑞士社会主义者路易·埃里梯尔的《1848年法国革命和第二共和国历史的通俗描述》一书的德文译本写的后记的第一章。此书起初由埃希霍夫翻译，埃希霍夫死后由伯恩施坦译完。伯恩施坦在这个德译本中加了一些注释和评注，并且写了一篇题为《从第二共和国到第三共和国》的后记。在评注和后记的这个第一章中，伯恩施坦提出了一些与马克思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针锋相对的观点。我们也把最重要的两条评注译出，附在本文后面。——编者注

无法与 1848 年二月革命对欧洲的震动相比的。巴黎公社之所以具有历史意义，是因为它是近代第一次由工人阶级打上自己烙印的革命起义。巴黎的工人阶级在起义中承担领导作用并且一直把这一作用保持到最后。就这一点而言，公社始终是一个永远值得纪念的事件。但是除此之外，如果探讨一下它的直接影响范围，那么无论从地理角度还是就思想色彩来说它都是一个局部现象。作为一次起义，它基本上局限于巴黎，巴黎为它作为首都应有的权利或要求而进行的斗争在起义的过程中占主要地位。所有其他表现它的生命力的事物，甚至它的工作委员会的法令都只起次要作用。这里首先涉及的不是某些普遍的思想，而是巴黎的权利，即它坚决地使它的认识和它的幻想对法国其余部分产生影响的权利。在 1871 年的巴黎的思想中，除了第一次法国革命残留下的一些已经成为多余的东西以外，还包含现代工人运动的意图，这不如说是偶然的。如果根据公社起义的主要推动力来判断，只能把它看成 19 世纪历史中的一个插曲。

1848 年二月革命却是另外一个样子。尽管这次革命也是在巴黎的街垒上决定胜负的，它毕竟从一开始就具有全国性运动的性质，并且成了欧洲绝大部分的相似的人民运动的推动力。在巴黎人取得胜利 4 个星期以后，整个欧洲的面貌改变了：各民族的春天似乎来临。尽管很快出现了反动，尽管似乎已被打倒在地的各种势力立刻重新恢复，但是它们只能恢复 2 月和 3 月时被废除的东西的一部分，只能废除在那两个月内实现的东西的一部分。二月革命留下的不仅是思想上的印象，它将中欧的全部公共生活放到一个新的基础之上；它摧毁了一些王位，这些王位后来再也未能复辟；它促使一些政治原则取得支配地位，这些原则再也没有从议事日程上消失。在普鲁士和奥地利永远取消了一批封建权利，奠定了立宪制政府的基础；在法国则宣布了普选权，而正如拉萨尔所说的，随着普选权的实行，一个新的历史时代的曙光出现了。1848 年 2 月 24 日实际上鸣钟宣布了欧洲民主主义时代的开始。

天空在摧毁七月王朝的火焰映照下一片紫红。虽然共和国也只是

由巴黎居民的激进部分争得的，但是毕竟有一小部分人欢欣鼓舞地承认它，而这一小部分和巴黎居民的激进部分相比是大得不知多少的。人们厌倦了凭财产获得资格的选民的统治，他们相信，随着人民登上政治舞台，在资产者王国公共生活一切领域扎根的腐化就会告终。政治特权的墙基被挖掉了，现在应当不是由 30 万凭财产获得资格的选民，而是由 900 万成年的法国人，由全体人民不管财产和生活状况的区别来决定立法的方向和性质了。整个民族以及潜伏在他们身上的全部力量被唤醒了，他们要登上公共舞台，通过自己的行动，通过坚决贯彻自己的愿望和意图，为社会的发展开辟新的道路，努力促使一个新社会诞生。获得胜利的二月革命的第一批法令根本不需要夹带劳动的权利以便赋予自己以社会革命的性质。随着出版和集会自由的给予和普选权的宣布，已经在原则上宣告了无产阶级的社会解放。至于原则上已经得到肯定的事情将在多大程度上以及在什么时候实现，现在只取决于无产阶级本身恰当地运用已经给予他们的手段的能力了。

1871 年的巴黎公社必须反对一个外部敌人，保卫自己，这个外部敌人已经把自己的军队集合在巴黎的城门外，打算在最短期内消灭公社。一个侧翼是作为潜在敌人的普鲁士人，另一个侧翼是作为实际敌人的凡尔赛人，因此公社首先必须考虑的是军事防御。一切其他的措施都必须服从这一目的，因此谈不到公社的合乎自然的内在发展了。这是一种处于紧身上衣束缚之下的发展，而我们愈深入研究公社的历史，就愈看出情况是这样的。另一方面，在它的社会主义措施中，没有任何一项曾必须经受考验。因此从巴黎公社历史可以吸取的教训也只能适用于类似的情况，而这种情况在紧接着到来的发展中恰恰是很不可能出现的。二月革命却不一样。它得到整个民族的承认，而由于法国的邻国都以全副精力忙于处理本身的事务，因此它更加能合乎自然地完成自己的发展过程。几乎不能设想还会有比它所获得的更加有利的外部条件了。没有来自东西各大国的进攻，不必担心庇特式的联盟，没有不许对外达成和解的禁令，不会由于必须考虑到外国而影响

自己自由作出决定。就这一限度而言，二月革命的进程是完全合乎自然的，它是能够在自由中进行的。

正是这一情况使二月革命的历史具有如此丰富的教益。如果说将来还会出现爆炸性的革命起义的话，那么根据今天欧洲的社会发展水平，人们可以假定两件事是确有把握的：首先这种起义至少将在以下限度内是国际性的，即任何一个政府都不会认为，如果它在并未出现十分笨拙的挑拨行为的情况下进行有利于反革命势力的干涉，这种干涉是可以与它本身的安全相调和的。因此一次胜利的人民起义会获得足够的活动余地，它可以在给定的可能性所允许的范围内充分利用自己的胜利，或者会由于频繁犯错误而甚至使政权落到本国的反革命势力的手里，这就要看情况而定了。

法国的二月革命是否完成了它根据客观形势有可能完成的任务呢？我们在承认发展具有某种规律性的条件下所作的历史考察促使我们对这一问题作出肯定的回答。人们只愿意把微不足道的琐事归入不是必然要发生的事情之列。但是即使认为主观意志——不管是个人的还是党派的——要受社会条件制约的说法是正确的，主观意志发挥作用的范围却毕竟比人们通常所假定的要大得多。是克伦威尔还是埃塞克斯勋爵^①在指挥他们的军队，会使革命的结局有很大差别。革命的巴黎人民的领袖是夸夸其谈的幻想家还是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会使六月战斗成为不可避免的或者使它不致发生。谁也不会坚持说1848年的六月战斗是一次历史的必然性，同样也不能坚持说，革命的社会主义有可能在1848年取得胜利。人们的政治行动是在他们不能干脆置之不理的条件下发生的，但是无论如何，正如马克思所说的，他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么所有的历史研究除了按时间顺序记事之外就没有任何价值，所有的社会学说也都是多余的消遣了。

^① 罗伯特·德弗罗·埃塞克斯勋爵（1591—1646），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议会军总司令。——编者注

1848年，革命的社会主义是不可能法国取得胜利的。那些不愿意理解这一点的人必然要遭到失败，正像宪章派在比法国先进得很多的英国必然要遭到失败一样。但是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失败即它被路易·波拿巴扼杀，却不是那么绝对必然的。对于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垮台，特别是对于它垮台的方式，一些人的错误和另一些人的老练的阴谋是起了很大作用的。

卡尔·马克思在两篇论文中卓越地分析了二月革命的发展过程，因此再一次来为社会主义者论述这一题目，似乎是十分多余的了。但是尽管《1848—1851年法兰西阶级斗争》和《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给人们以如此深刻的启发和如此重要的指导，它们毕竟没有使写一部详尽的二月革命史成为多余的事。这两篇著作都是即兴之作，是为经历过它们所论述的时代的、部分地亲自参与过它们所论述的事件的人们写的，对于这些人来说，这两部书所评论的事实还记忆犹新。它们概述了事实，但是它们没有叙述这些事实；它们是这些事实的评论，却不是这些事实的客观表述；是这些事实的分析性评论，却不是这些事实的形象化的描绘。尽管马克思远远超过平凡的有党派偏见的著作家，但是他毕竟是完全从战斗的党派成员的立场来写出他的批判的，而且是从这样一个斗士的立场出发，他所批判的事件在这个斗士心中引起的愤怒仍旧存在而且丝毫没有减轻；这个斗士曾经把马克思所涉及的那些人物当作敌人而与之对抗，而在流亡中仍旧以战斗的态度与之对抗。在这种情况下，要求马克思具有不带个人偏见的历史学家的客观性，要求他把代表他自己立场的人和反对他自己立场的人看成具有同等价值的人物，这意味着对他提出一项他不能也不愿满足的要求。他必须描述的人物和党派有可能在明天再一次发挥作用，因此他需要向他们出示他们的罪行记录，揭露他们对于革命失败所负的罪责。如果人们具体设想到这一点，那么他们只会因此更加懂得重视这两部著作，也就不会在有人声称需要对它们作出补充时把这看成针对它们的责备了。

但是还有另外一点使这两部著作中的批判在今天显得不够充分。

二、二月革命和革命的社会主义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他为《法兰西阶级斗争》所写的序言中坦率地宣称，马克思和他在1848年大大过分地高估了社会发展已经达到的程度和发展过程的速度；他们当时认为，下一次危机将带来一场新的革命，在革命过程中，在与资产阶级对抗的各阶级之间发生一系列不可避免的斗争之后，无产阶级将承担起决定性因素的角色，但这一观点是对经济形势的错误判断为根据的；他们没有弄明白，“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的程度”^①。换句话说，马克思和他虽然并不是完全像广大法国社会主义者那样乐观地考虑问题，但是他们的想法和能被经济发展状况证明为正确的观点相比，毕竟要更加乐观得多。现在已经看清楚，对于人们的主观措施的判断也必然要随着对客观可能性及由此决定的各社会阶级的力量对比的洞察而作出。如果作出判断的是一个像马克思这样严格进行合乎逻辑的理论思考的人，情况就更是如此。由于他相信资本主义社会的崩溃已相当临近，因此他谴责一些事物，但是如果他知道在1848年时还有许多工作有待资本主义生产去完成，他就肯定不会那么激烈地拒绝这些事物了。无论如何，今天的社会主义历史著作尽管应当非常感谢马克思对二月革命的各种推动力所作的杰出分析，但是对于他所得出的结论，只有在这些结论没有受到马克思的假定中的计算错误影响的限度内才不折不扣地加以接受。

谁也没有比马克思更加中肯地突出说明了二月革命爆发时法国各阶级的力量对比，谁也没有比他更加清楚地就这一力量对比对年轻的共和国的构成的影响作出结论。反对资产阶级王国的革命不是无产阶级群众反对资产阶级的起义，而是前者与资产阶级本身中的广大群众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12页。

联合起来反对上层资产阶级的起义，是各工业阶级反对金融贵族统治的暴动。无产阶级在这些起来反对金融统治的阶级中远远不是最强大的；撇开首都不说，它是这些阶级中人数最少的阶级，“几乎完全消失在占压倒多数的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中间”。在 1848 年的法国，雇佣工人反对工业资本家的斗争是“局部现象”，因此也“不能成为革命的全国性内容”。社会主义工人关于资产阶级统治会随着二月共和国的建立而被排除的想法是建立在“把金融贵族和一般资产阶级混为一谈”的基础之上的。^①

到此为止，必须认为马克思的叙述是无懈可击的。他的结论，即在革命进程中，由于上述混淆而产生的幻想必然一个接一个地破灭，同样是无懈可击的。但是这些幻想并不仅仅是无产者的幻想。除了另一些过高估计二月革命影响的非无产阶级分子外，来自所有的阶级的社会革命家们也抱有这种幻想，他们在二月以前组织成秘密社团，在二月以后在革命俱乐部里占支配地位。马克思几乎完全没有探讨这些俱乐部的作用，只是在评论 5 月 15 日时毫不犹豫地把布朗基和他的朋友们称为无产阶级党的真正领袖。

我们已经在对埃里梯尔的著作正文所加的一条注中提到，我们是否可以布朗基及其追随者说成是 1848 年法国无产阶级的真正代表抱怀疑态度。“中央共和社”肯定在巴黎的工人居民中有很大影响并且拥有许多工人社员。但是这一情况以及下述事实，即这个社心目中浮现着通过建立社会主义共和国来解放无产阶级这一目的，对许多其他俱乐部也是适用的，因此单凭这一点还不能证明它有资格被称为无产阶级的真正代表。也不能根据在所有较大的俱乐部中布朗基分子的这个社是最迫切要求行动的事实来论证它的这一称号。如果根据这个社所采取的措施的直接目标来判断，不如说我们必须认为它仅仅在政治上激进的，不过在它那里，正如在 1848 年许多别的俱乐部那里一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386—387 页。

样，目标和行动是很不相称的。这个社的特殊之处不在于它的目标和成分，而是它的组织和它的领导人的品格。人们可以把它称为 1848 年无产阶级政党的一个影响最大的派别，但很难称它为无产阶级政党本身。

各个社会革命俱乐部以及它们的由所有社会阶层的思想家和冒险家组成的军官司令部之所以能够对巴黎工人阶级产生如此大的影响，恰恰只是由于还不存在一个真正的工人政党，这样的党还有待发展起来。此后的历史表明，布朗基派没有能力把自己组成为一个这样的工人党。广大布朗基派只是有节制地为特殊的工人利益操心，他们对工人运动的经济方面懂得很少，他们对于在萌芽状态中跃跃欲试的工会运动和合作社运动不如说是采取敌对态度的。从一开始，在支持卢森堡宫^①的工人和随着俱乐部合唱的工人之间就存在着对立，这一对立从那时起一直以各种深浅不同的色调贯穿法国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的全部历史。在我们看来，1848 年法国工人运动的中心、无产阶级政党的核心应当是“卢森堡宫”，也就是路易·勃朗及其追随者，而不是布朗基派。在卢森堡宫，严重的学理主义占据着地盘，那里的人们空谈理论和想入非非，而在俱乐部里则对日常政策评头论足，但这一情况丝毫不能改变上述事实。想入非非是与巴黎工人的经济地位相适应的，他们绝大多数始终还属于小工业。马克思是承认这一点的，他写道：“可是，巴黎无产阶级的要求既然超出了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范围，那也只能在卢森堡宫的朦胧状态中得到表现”。^②但是卢森堡宫除了形形色色的“朦胧的”计划外还制定了一系列完全切实可行的提高工人经济地位的建议，而他们的空想主义绝对不比俱乐部的空想主义更严重。在俱乐部里，人们设想通过突然袭击不仅能够推翻一个政府，而且能够立即推翻整个社会制度。卢森堡宫的代言人是向前看的，阿尔伯、维达尔、贝魁

① 指临时政府成立的负责处理劳动问题的卢森堡委员会，因设在卢森堡宫而得名，主席是路易·勃朗。——编者注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384 页。

尔、勃朗、孔西得朗^①和站在他们一边的工人研究了现实关系，以便在这些关系的基础上进一步建设。在俱乐部里却相反，人们向后看，从过去吸取灵感，特别是力求模仿法国大革命中的人物。卢森堡宫的社会主义者和那一时代广大的著名法国社会主义者——除上面提到的以外还有卡贝、勒鲁、蒲鲁东等——一样，普遍说来都力图避免资产阶级和工人之间的任何暴力冲突，因为他们明智地认为，根据客观情况，这样的冲突对工人不会有好处，而对年轻的共和国却只能是有害的。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连布朗基本人也害怕使对立极端尖锐化。但是在俱乐部里，革命词句的力量超过了他。5月15日的灾难性示威游行是违反他的愿望和意志而准备的，这一示威起初使刚刚集合在一起的议员感受到死亡的恐怖，然后立即向他们暴露了社会革命家们的要求是多么空虚。蒲鲁东几天前曾在《人民报》上向他们呼吁：“不要像头脑发热的俱乐部分子那样行动”；布朗基提出了条件：“示威必须是非武装的，必须远离国民议会”。但是他们没有这样做，而是用暴力冲进议会，威吓议员，宣布成立新的临时政府，最后宣称国民议会已被解散，在完成了所有这些光辉行动以后就像搞了一次学生恶作剧的男孩们一样作鸟兽散了。

在一张由警察总监在1848年7月14日公布的、因5月15日示威被捕者的名单上，除了45名“巴尔贝斯的党”^②（那时这是对各俱乐部的社会革命者的总称）成员外，还开列了36名正统派分子和58名波拿巴主义者。如果把这个比例搬到全部参加示威的人身上，那就会是再错误也不过的。参加示威的广大群众毫无疑问是心怀不满的共和主义者；尽管如此，不少反革命团体支持者参加了示威，这仍旧是值得注

① 阿尔伯（原名亚历山大·马丁，1815—1895），法国工人、社会主义者，1848年临时政府成员；弗朗斯瓦·维达尔（1814—1872），法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1848年卢森堡委员会书记；康斯坦丁·贝魁尔（1801—1887），法国经济学家，空想社会主义者；维克多·孔西得朗（1808—1893），法国政论家，空想社会主义者。——编者注

② 阿尔芒·巴尔贝斯（1809—1870），法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家，1848年革命的积极活动家，制宪议会议员。——编者注

意的。45位“巴尔贝斯的党”成员的名单表明，其中有30余人的生活地位是资产阶级的（作家、医生、商人、官吏），7人的职业不详；只有5个或6个工人！当然，在这里，这一比例也并不符合参加示威的广大俱乐部社会革命家的职业比例；但是被捕的非无产者与被捕的无产者之间的比例却能典型地表明二者在俱乐部革命家的委员会中所占的比例。由此可见，尽管巴黎工人阶级有很大一部分参加了示威——这一示威是作为一次支持波兰人的和平示威而正式宣布的——但人们是否能把它说成是一次巴黎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国民议会的革命示威，是大可怀疑的。不过那时形形色色的人物只要是以革命的姿态行动，确实都是毫不犹豫地把自己装扮成无产阶级的。这样就造成了使六月战斗成为不可避免的那种含糊不清的形势。由于差别消失了，因此来自外省的、刚刚半心半意支持共和国的议员们反过来把工人运动与俱乐部运动等同起来，并且产生愈来愈激动的反对巴黎工人阶级的情绪。于是，在5月15日以后，人们对路易·勃朗大肆侮辱并且猛烈攻击卢森堡宫的一派，而它在所有的进步团体中本来是最愿意进行调停的。

三、临时政府的困境

1848年的居民成分结构和工业发展的水平只允许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但是对于这一共和国来说，任何一种临时措施都是难以忍受的。商业和工业不景气——危机已发生了几个月——破产一次接一次而来，公共的和私人的信贷都遭到损害。路易·菲力普政府留给共和国一大笔亏空，而对于临时政府的成员来说，通过宣布国家破产来摆脱它的前任所欠下的全部或一部分债务的大胆做法是太危险了，因此他们不愿意采用。这种手段是否会改善政府的财政地位，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但无论如何人们无法预见到，尽管未采取上述手段并且作出了一项决定——通过提早偿付到期国债券来安抚资本家世界的情绪——

国债券的行情后来仍旧很快降到这样的水平，即使共和国延期支付利息或者暂时降低利息，行情也不会降得比这更低。巴黎交易所的行情是：

法兰西银行每张股票		五厘国债%	三厘国债%
1848年2月23日	3180法郎	116.40	73.80
1848年3月7日	2400法郎	89.00	56.00
1848年3月15日	1300法郎	65—69	48.45
1848年4月5日	1080法郎	50.00	33.00

这些数字表明了临时政府的全部痛苦、它的处境的巨大困难。不管它采取什么行动来安抚商业界，结果几乎统统适得其反。它上任时库存有19200万法郎，支出预算是每月12500万法郎。它放弃了一系列收入来源（盐税、报纸印花税、酒税），承担了一大批新的开支。接受自愿贷款的尝试失败了，相反，银行储户蜂拥到银行，储金会会员蜂拥到储金会办事处去提回存款。临时政府的成员看到它们不得不停止支付的日子日益临近。在这一困难处境下，财政部长加尔涅—帕热斯（在过分害怕的古德肖辞职后）^①想出一个主意，除了现行的4种直接税之外再征收一种附加税来增加收入。

人们对这一措施的攻击太过分了。路易·勃朗和勒得鲁—罗兰提出一项建议，要求免除低级纳税等级的附加税负担，杜邦·德·累尔^②对此加以支持，但政府没有让步，这毫无疑问是一个政治错误。但是要说政府通过这项税收牺牲农民而讨好资产阶级，那就是极度的夸大。凡是在这项税收侵犯了贫苦小农的地方，都是违背它的倡议人的意图和特意为征收此税规定的原则的。征税本应是针对财产的，而且整个说来

^① 路·安·加尔涅—帕热斯（1803—1878）和米歇尔·古德肖（1797—1862）都是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先后任临时政府财政部长。——编者注

^② 雅克—沙尔·杜邦·德·累尔（1767—1855），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派，1848年临时政府主席。——编者注

也是这样做的。但是我们今天知道，大地主和中等地主多么善于在他们需要摆脱一种税时把自己装扮成缺吃少穿的农民。而当政府把这样征收来的钱的一部分用来在各省的省会开办应为窘迫的商业界提供帮助的信贷局时，它就给反动的大地主提供了一个在广大农民（不管曾否纳税）中最容易引起共鸣的口号：“他们牺牲农村，供养城市”。通过这样的对比，农村的任何一个有产者都成了乡下佬——“好人雅克”——，哪怕他每年能收 10 万法郎的地租。

临时政府在农村找不到任何一个其利益与 2 月宣告成立的那一“社会共和国”的胜利密切相关的阶级。政府不像 1789 年的共和国那样有土地可以卖给农民，相反，25% 的农村土地所有主已经是富裕的农民，他们的反集体主义情绪是无以复加的。政府通过取消盐税而扔给雇农和短工一点面包屑，但是由于客观形势和农业人口的分散状态，要利用他们来反对中农和大农是不可能的。在城市居民中，临时政府也不能找到任何为它充当坚强后盾的阶级。对于资产阶级来说，它是过分社会主义的，对于社会主义的工人来说，它又是过分资产阶级的，而如果说社会主义的工人有一部分足够明智，不会给政府制造任何严重障碍的话，那么在他们和工人阶级的容易激动的那一部分之间恰恰隔着革命俱乐部。但是正如连对革命者绝对抱有善意的伊波利特·卡斯蒂^①也认为的那样，在那些俱乐部里是愚蠢女神“以议会方式”统治着。他补充说，“在不多几周时间内，这些人胡说八道，废话连篇，其程度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最恶劣形式的充满乌烟瘴气的演说毒化了气氛”。俱乐部的行为举止就像它们是法国的真正主人一样，而它们恰恰在开始时，在共和国最重要的时期，确实发挥了重大的影响——它们使巴黎的舆论恐怖化了。

在有些俱乐部里，教条主义的社会主义者（埃蒂安·卡贝，法朗吉主义者等）维护他们的理论，这些俱乐部至少是不会玷污共和国的，但除

^① 沙尔-伊波利特·卡斯蒂（1820—1886），法国作家，波拿巴主义者。——编者注

了它们之外，民主主义一共和主义的俱乐部都是各个政府成员和候补成员的代理人的竞技场。这些俱乐部的中央机构即经常被提到的“俱乐部之俱乐部”尤其可以说是这样的。临时政府的各个成员曾经用他们所能支配的秘密基金给这个中央联合会提供津贴——据说它一共获得 16 万法郎以上——但这些钱与其说是被用来推动共和国为人民所做的事业，不如说是被用来使它出乖露丑。俱乐部派往各省的特使喜欢吹牛，令人可笑，这只会把人们吓跑，他们在巴黎甚至用对 1793 年的回忆来使人们神魂颠倒。“俱乐部之俱乐部”每天下午聚会，它的成员晚上分成小组到其他各个俱乐部去，把在那里拾来的牙慧再向人传播。卡斯蒂写道：“但是俱乐部之俱乐部的阴暗之处只有通过 1793 年的回忆的反光才能照亮。不过人们是不能凭回忆来实行统治的。这些组织如果掌握在一些优秀的人们手中，本来可以成为一个效率很高的行动工具，但是由于人们用荒谬的和幼稚的方式来领导它们，它们纯粹成了只能进一步加重形势所造成的那些混乱的手段。”丹尼尔·斯特恩^①的评价也与此相似。蒲鲁东在 4 月 29 日的《人民报》上向工人发出呼吁，劝他们一定不要在俱乐部中让人弄得神魂颠倒。“议会热已普遍流行。我们不是只有一个讲坛，而是有了一万个，而且这些是什么样的讲坛啊！从来没有看到过这种由演说才能造成的混乱。所有的人都像狄摩西尼^②一样讲话；不过他们却像拉帕列斯^③一样争辩……工人们，为了财产的战斗是不应当在俱乐部里进行的；必须在你们的车间，在市场上进行。我们很快就要和你们一同研究这一新的战略。把政治和雄辩留给资产阶级吧。俱乐部的演讲艺术什么也不能教会你们。”

蒲鲁东在这里和他一向的做法一样，有一点丧失分寸，但是他确实

① 丹尼尔·斯特恩（真名为弗拉维尼·德·玛丽，达古伯爵夫人 1805—1876），法国女作家和政论家。——编者注

② 狄摩西尼（公元前 384—前 332），古希腊大演说家。——编者注

③ 原文为 Lapalisse，是法国阿利埃省的地名。疑为 La Palice 之误。La Palice（名为约克·德·沙尔邦，1470—1525）是法国元帅，曾在法王查理八世、路易十四和弗朗索瓦一世时参加意大利战争。——编者注

打中了要害。如果说他的“战略”——他的信贷和交换银行计划——对工人阶级同样也不恰当的话，那么人们仍旧必须承认这一战略至少就意向来说是符合时代需要的。它打算使流通活跃起来并且从而给生产以有效的推动。相反，在俱乐部里却尽一切可能做了使商业界气馁的事，从而使危机无止境地加剧。他们幻想可以用这种方式推动革命向前发展，但他们实际上却只能更加迅速地把革命推上反革命的航道。人们即使是向前推进，也一定不能贸然从事，否则效果会适得其反。俱乐部只是在言语上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实际上它们是革命的唐·吉珂德精神的孵化场。那里的人们对现实的判断多么错误，可以从这一点看出来：他们十分认真地沉醉于这一幻想，认为如果根据普选权选出来的下议院不符合巴黎“人民”的愿望，人们可以随意再将它解散。

由此可见，尽管马克思如此中肯地从法国经济关系的不发达——生产发展的落后——推论出 1848 年法国无产阶级的不发达，但是他却把俱乐部看成无产阶级的代表，这是一个矛盾。这一矛盾尽管可以从恩格斯如实承认的错误中得到解答，但是今天人们仍旧不能避开这一矛盾而不置一词。俱乐部的激进主义绝对不符合工人阶级既定的利益，俱乐部的政策是不能根据这些利益，而是要根据大部分根本不属于无产阶级的俱乐部大人物的幻想和野心来加以解释的。

马克思在《法兰西阶级斗争》中写道：“社会信用和私人信用是表明革命强度的经济温度计。”这无可争辩地是正确的。但是马克思接着写道：“这种信用降低到什么程度，革命的热度和革命的创造力就增长到什么程度。”^①这句话是否正确，在很大程度上就要取决于情况，取决于经济混乱是否能成为创造有生命力的新形态的有利先决条件了。恰恰在现代社会，它的各种关系十分错综复杂，各种生产领域之间相互依赖的程度加强了，很难允许有上述设想的余地。工人在一定时候有可能对于使“所有的轮子”在一段时期内停止转动发生兴趣，但他们永远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388 页。

不会对使所有的轮子生锈发生兴趣。

四、各阶级彼此对待的错误立场

1789年的革命从立宪制资产阶级的统治开始，他们由一个比一个更加激进的集团取代，直到1794年发生突变。1848年的革命是从曾是法国大革命的最高点的地方开始的，而从国家全部居民的构成来看，这在今天也只能是权力分配的最高点：由各个最进步的资产阶级政党的代表和工人阶级的代表组成的政府。温和的社会主义者认识到或者至少感觉到这一点并且相应地要求他们的追随者支持临时政府，而革命的唐·吉珂德们和杜尔卡马腊^①们却在俱乐部里喋喋不休地谈论重复大革命的过程并且用他们关于1793年的永恒的回忆来使巴黎工人神魂颠倒。现在反动的是后者而不是前者。本来就已由于危机持续存在而激动不安的资产阶级被俱乐部大人物煽风点火的演说和煽风点火的文章弄得完全神经质了，把所有社会主义者看成一丘之貉而痛恨他们。流血冲突成为不可避免的了。但是在这里必须明确指出，使革命成为不可避免的并不是无产阶级的真正利益所在。卡尔·马克思非常中肯地写道：“既不是直接的、公开承认的要求驱使无产阶级想用武力推翻资产阶级；也不是无产阶级已经到了有能力解决这个任务的地步。”^②巴黎的无产阶级是被资产阶级强迫去举行六月起义的，这一情况也就包含了对起义必遭失败的判断。但是这一“强制”有它自己的特殊情况。

安排并且执行国民工场的解散的方式毫无疑问是举措不当的样板，这在紧张的形势下只能起挑战的作用。但这并不是一声晴天霹雳，而是整整一系列挑衅和反挑衅行为中的一个环节，在这些行为中，个人阴谋、标新立异的虚荣心和冒险家的密谋所起的作用几乎与真正的阶级对立一样重要。除了阶级利益和阶级偏见之外，个人利益和小集团

① 杜尔卡马腊，意大利民间假面喜剧中的人物，潜头和骗子的典型。——编者注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88页。

利益也在互相激荡并且使冲突尖锐化。如果说巴黎工人“必须受到火枪子弹的教训才能认识真实情况”，而且这已成了不可避免的事实，那么他们固然已认识到“无产阶级专政”在长期内还是不可能的，却并没有懂得“这样一条真理：它要在资产阶级共和国范围内稍微改善一下自己的处境只是一种空想”（马克思语）^①。在这一点上不如说马克思自己还必须认清那些日子的社会革命家的教条的错误，而这一点他后来在英国也确实做到了。

俱乐部的喧嚣躁动使营业危机达到极其尖锐的程度。所有的企业都停止活动，商业界的信用完全遭到破坏。愈来愈多的人拥向“国民工场”。这些工场除了是真正失业者的避难所之外，还成了首都的流氓无产阶级的一个集合地点和罢工工人的舒适的寄宿处。像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有些工人当老板不愿意提高他们的工资时就干脆放下工作，暂时依靠国家出钱在国民工场中维持生活，这样的事例多得不可胜数，而在国民工场中，人们不知道怎样同这些由技术熟练程度差别极大、思想情况也极其多种多样的军团打交道。

这是一个甚至在平静时期全部政治经济学都有在它身上栽跟斗危险的问题，而由于以上情况，这个问题就具有了可怕的性质。即使没有其他理由，单是由于考虑到任何一次即将爆发的革命都会是与这同一个问题——甚至很可能在更加扩大的规模上——有关的，社会主义历史著作就已有足够的理由在论述国民工场问题时对那一时代的带伤感色彩的和鼓动性的口号完全置之不理，而是尽可能精确地深入探究事实。使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类的一般化术语是无济于事的，这首先是因为在资产阶级阵营中也好，无产阶级阵营中也好，都有多种多样的派别，也有差别悬殊的推动力在对人们的思想起作用。事实是，国民工场最终反而加剧了它们本来应当克服的弊病，因此它们的继续存在对于工人的利益和对于资产阶级的利益都造成同样严重的威胁。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00页。

由于客观情况还没有成熟到能使资产阶级社会被取代的程度，任何对这一社会的经济基础的深入触犯都必然要涉及所有的社会阶级。相反，在取消国民工场以后随之而来的是营业大大好转，同时它们对于很大一部分从前被安置在那里的工人来说实际上已成为多余的了。当然，商业界的信任的恢复与其说是由于（国民工场开始转变成的那种）罢工保险机构的消失，不如说是由于（国民工场最终已表现出的那种）革命策源地的消失造成的，但是在当时给定的情况下，这两者中的任何一个都已不再能与另一个分离。国民工场的继续存在会是意味着汇聚在那里的工人的专政，而由于他们的代言人没有认识到这一专政是不可能的，斗争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

五、共和国与共和党

我们在前面说过，二月革命的不幸在于，它是从当时可能存在的政府格局中最极端的那一种开始的，而这种格局本来应当是它逐步升级的发展的顶峰。比2月24日宣布的政府更加激进的政府是绝对不可能出现的，在法国当时的社会结构下纯粹由社会主义者组成的政府无论如何是绝对不行的。甚至像临时政府这样的资产阶级共和派、小资产阶级激进派和社会主义者的混合结构至多也只是与一些大城市的而不是全国的居民的社会构成相适应。尽管如此，如果在它之前已经有保守派政府和温和共和派政府由于治理不当而相继垮台的话，那么全国很可能还会容忍它。这样一种发展在给定的情况下是否有可能，当然还必须暂时搁置不论，但是如果我们坚持说这会是一种对于巩固共和国最有利的发展，那么我们会遇到多大的反对意见。在1871年，如果曾出现一个甘必大—弗洛凯—克勒孟梭政府，也许就不会产生公社——尽管要完全避免与弗路朗斯和里果^①之流的社会革命家发生冲

^① 古斯塔夫·弗路朗斯（1838—1871）和拉乌尔·里果（1846—1871）都是布朗基主义者，巴黎公社委员，公社失败后被杀害。——编者注

突是很困难的——，但是在这一政府以后，君主主义的复辟毫无疑问要比另一种发展所能允许的情况容易得多，而这种发展是以凡尔赛的“乡绅会议”开始的，只有当它和它的变种把力量耗尽以后，共和国的坚决拥护者才能取得统治。一次革命如果开始时就使极端激进的党越过所有其他政党而上台执政，那它就像一场从最后一幕开始的戏：它只能朝逐步降级的方向移动。

1848年的激进共和派尽了一切力量来使这一逐步降级运动加速，把全部不是坚决相信他们的教条的居民推向了反革命。

当时犯下的以及今天仍旧有人屡次在犯的一个十分致命的错误在于，不加区分地把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的对立运用到这两个阶级或它们的一些部分处于对立状态的各种各样的组合情况中。一会儿把资产阶级理解成整个非无产阶级界，一会儿只把它理解成大资本家阶级；一会儿把无产阶级理解成只是工业雇佣工人阶级，一会儿又把它理解成几乎整个非资产阶级社会。这种不明确的表述方式显然必然会成为极其严重的误解和失误的原因。1848年在这方面还要加上对共和国一词作出各种解释的可能性。

2月24日以后，共和国的绝大多数居民已经接受了“共和国”，尽管对这一概念的理解差别很大。但是只有一个很小的少数从一开始就在共和主义的幌子掩盖下维护王朝利益。王朝派在最初时期只抱很小的希望，因此即使他们最热心的党徒也认为采取等待态度是恰当的。聪明的巴黎激进共和派为了尽可能破坏他们的这种优势，想出了著名的对昨天的共和派分子与今天的共和派分子区别开来的做法。只有前者才是货真价实的，后者整个说来是“可疑的”。但是由于“昨天的共和派分子”，即在路易·菲力普统治下表示拥护共和国的人只占居民中很小的少数，因此上述做法在实践中意味着宣称共和国是居民中少数人的事。人们和钻营之徒一起（如果采用另一种方式，人们本来是能够防范这些人的）推开了一些仅仅犯了一个错误即认为政府没有重要意义的人：这样就把或多或少愿意接受共和国的人变成了只把共和国当作

两恶之中较轻者而加以忍受的人，把晚生的儿女变成了新的敌对者。当赖得律-洛兰^①在他发布的人所共知的对共和国特派员的指示中采用 1793 年国民公会成员的语调，要求特派员们注意做到“新的议会只包含昨天的人，而不是在革命的次日的人”时，他就是向后一种人发出一项指示，要他们从一开始就采取反对他和他在临时政府中的同事的立场，要他们对政府的措施尽可能作出贬低的批评。如果他允许乔治·桑^②在由他的官办公司出版的共和国公报中宣称：“如果刚刚举行的选举的结果不符合人民的意愿，后者将第二次表明他们的意志，并且将一个伪造的国民代表机构的决议排除在议事日程之外”，他这样就是敦促外省，要它们从一开始就反对巴黎人的骄横，进行自卫。但是由于“昨天的共和派分子”在巴黎是占支配地位的，因此他这样做就已经是对外省发出指示，要它们把尽可能多的“今天的共和派分子”送进议会，而这些人同样只是有条件地接受共和国的。

但是，“昨天的共和派分子”这一说法不仅使资本家世界产生疑心。

处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中间的阶级不仅包括小资产者和农民，而且也包括广大公务员。他们特别在法国构成一支非常拥护国家的大军，而他们所处的地位和所受的教育使他们能够纵观全局，因此恰恰在农村他们能对居民施加很大的影响。公务员当然大多数是“今天的”共和派分子，因为在路易·菲力普统治下他们作为公开宣布的共和派分子是不会受到雇用的。在这一情况下，赖得律-洛兰的通告信，他发给共和国特派员的指示以及这些老爷中的若干人的行为举止恰恰必然会在公务员界引起很大的烦恼。但是官僚阶层尽管是一个根基稳固的政府的卑躬屈膝的工具，却会使一个变化无常的政府十分难堪。公务员界是不能在一夜之间摆脱掉的，而当人们像 1848 年的临时政府那样既不

① 亚历山大·奥古斯特·赖得律-洛兰（1807—1874），法国政治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领袖之一。——编者注

② 乔治·桑（1804—1876），著名法国女作家，浪漫主义民主派代表人物。——编者注

愿意也不能够触动现存的财产权时，尤其摆脱不了他们。公务员不用人们费多大力气就被驱使去与资产阶级同舟共济。在平常时期，公务员并不认为自己与剥削阶级有密切联系，因此他们并不怕针对剥削阶级发表自己的意见；但是当他们看到资产阶级秩序的存在真正发生问题的时候，他们十有九次会站到维护这一秩序的政党方面。对于若干阶级和职业门类也可以这样说，他们并不是直接依靠被剥削的劳动的剩余产品生活，另一方面也不属于被剥削者，例如医生、教员、神职人员、工程师、店员等就是这样。所有这些人偶尔喜欢被纳入劳动阶级项下；但是如果雇佣工人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发展到极点时，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会站到保障他们生存的人们方面，也就是站到代表秩序和正规营业的资产阶级及最受它欢迎的政府方面。

激进派或者像他们在 1848 年自称的民主派丝毫看不到这一切。他们把 1793 年的框框用于已经完全改变的条件，因此只看到“人民”与“特权者”的对立。另一些人谈到“无产阶级”，并且认为这样说是更加精确的。但是这个词和另一个词都是像在演戏时一样使用，是当作修辞格来使用的，它们与其说是揭示问题，不如说是把问题弄模糊了。1850 年 9 月卡尔·马克思在共产主义同盟分裂时向他的反对者大声喊道：“正像民主党人把人民一词变成神圣的事物一样，你们也这样对待无产阶级一词”。^①这句话也适用于 1848 年整个民主主义的革命运动。对于这一运动来说，人民和无产阶级这两个概念是具有超自然力量的偶像。实际上不可否认，这种偶像崇拜在既定时刻曾经给他们以似乎能战胜一切的力量。但是它的魔力不能持久。革命后的人民是和革命前的人民不同的人民，而且是愈来愈不同的。在一个仅仅具有否定意义的口号下集合起来的群众在一旦需要赋予这一口号以肯定性内容时

^① 参看《1850 年 9 月 15 日的中央委员会会议》，载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1 版第 7 卷第 616—622 页。马克思在这次会议上的发言中是这样说的：“正像民主党人使用‘人民’这个词是一句空话一样，他们现在使用的‘无产阶级’这个词也是一句空话”（见 618 页）。——编者注

总是会分裂的，而甚至共和国作为共和国起初也只是一次否定，是对路易·菲力普和七月王国的否定。错误地把人民这一偶像当成现实，是1848年民主主义的、革命的党的灾难。

六、对政变的历史判决

在判断1851年12月2日的政变时经常犯这样的错误，即人们把举行政变的方式与居然敢于举行政变这一事实混为一谈。但是这种看法是对于激进主义偏见的一个完全多余的让步。

马克思在《雾月十八日》一书中出色地描绘了民主党人（因为他们相信自己是代表人民利益的）^①是怎样坚定地相信自己“逃出最可耻的失败时总是洁白无瑕的，正像他们进入这种失败时是纯洁无辜的一样”。^②这一情况已经包含了民主党人对奇迹的迷信所起的另一个作用。只能通过叛卖和卑鄙行为来战胜民主党人；战胜他们不止是一个政治上的污点，而是一个道德上的污点。人们必须从这一观点来评价民主党人历史著作中对1851年12月2日政变及其罪魁祸首所作的许多咒骂。

本文作者决不打算为路易·波拿巴起草一篇辩护词。但是拿破仑第三今天已是历史上的人物，他有权要求得到公正的评价。社会主义的历史著述绝对没有理由对这个人和他的事业作出不符合事实真相的评价。社会主义的历史著述对于反对他和捍卫他都不感兴趣，它是以完全不偏不倚的态度对待他的。

谁也不能否认，12月2日政变是受到在它之前发生的许多事情的挑战而发生的。马克思对路易·波拿巴是决不容情的，但是他非常恰当地指出，不应当把这一政变看成对法兰西民族的一次突然袭击，它早在

① 伯恩斯坦1921年重新发表此文时把这句话改成这样：“……描绘了激进党人，他按照当时的习惯还把他们称为民主党人，因为他们相信自己是代表人民利益的”。——编者注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17页。

12月2日以前就已预先投下了它的影子，成为当时的中心话题。令人吃惊的只是政变发生的时刻和方式，而不是这件事本身。

事实上1848年12月10日的选举已经宣告了这次政变。关于这次选举，人们不能说它不是自由的人民意志的表现，——这是就人民意志在一次选举中一般说来能够得到表现的程度而言。那时执政的不是波拿巴，而是他的敌人，他们尽可能利用政府的影响使他们的候选人卡芬雅克当选。尽管如此，法国人民投给卡芬雅克^①的票还不到150万张，而投给拿破仑称号继承人的票却是550万张。这次投票所表明的不止是宁愿要某甲而不要某乙或者不要一批某乙，它是人民作出的支持一个个人政府的决定，这是连信仰坚定的共和派也不隐讳的。但是共和派没有能力挡住正在作为必然要发生的灾难而迫近的帝国的去路。恰恰相反，共和派方面为了削弱集中在路易·波拿巴手中的权力而采取的一切措施，包括在大街上造反的尝试和议会中的阴谋，都只起了加速事态发展的作用。伊·卡斯蒂写道：“使普选权成为共和国机构的基础，但在这之后立即通过怀疑它的结果而使它失效；诽谤国民议会，破坏它不受侵犯的权利，打断它的讨论，即使不是在事实上但毕竟从意向来讲要解散议会，后来又以议会的捍卫者自居；在宪法处于萌芽状态时就批判它，一点一点地撕毁它，然后在第二天又在它的掩护下筑起路障，就像它是一个坚强堡垒似的。这就是从1848年4月选举到政变为止时期共和党的全部政策。”他的话击中了要害，表明共和国为什么非垮台不可。共和国缺乏共和派，因为那些自称共和派的人大部分是什么都有，唯独缺乏真正的共和主义思想。帝国不是一个阶级的反动的产物，而是一个民族的反动的产物。路易·波拿巴在他的没有耐心的亲信们的逼迫下使用了暴力，而他本来是不必使用其中很大一部分就可以完成政变的。第二共和国在1851年秋天已像1848年初的资产阶级王国一样腐朽。只要轻轻摇一下，果实就会像成熟的梨子一样落地。

^① 路易·欧仁·卡芬雅克（1802—1857），法国将军，资产阶级共和党人，当时为陆军部长，曾残酷镇压六月起义。——编者注

大部分法国人恰好也不是共和派，他们固然在二月的日子以后容忍了共和政体，后来却愈来愈不喜欢它了。在 750 万法国人中有 550 万人在 1848 年 12 月 10 日投票选举路易·波拿巴当总统；750 万人在 1851 年 12 月 20 日和 21 日赞成政变，65 万人反对；780 万人在 1852 年 11 月 7 日要求拿破仑恢复帝国，25 万人反对。关于这第二次投票，人们可以说它是在政变以后很快就举行的，不允许这个民族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再投票，但是从政变到第三次投票相隔 11 个月，在这整个时间内，在所有的饭馆酒店，在所有的家庭圈子里都在不断地谈论帝国问题。这位太子—总统走到哪里，都听到这样的呼声：“皇帝万岁！”带头喊的确实是雇来的捧场的人，但是每一次毕竟都有大批群众插进来。1852 年 11 月 7 日的投票表明了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即广大的法国人民批准了帝国。在最红色的省份，在曾经把坚定的社会主义者和革命者送进议会的选区，绝大多数人投票赞成帝国。甚至在革命的首都巴黎，政变得到有选举权居民的绝对多数（396096 人中的 196539 人）和实际投票居民的 2/3 多数的赞成（196539 人赞成，96479 人反对）。各个不同的阶级和个人在告别共和国时是怎么想的，这是一回事，但他们的实际行动无非是在事后追认 1851 年 12 月 2 日的“违背誓言”是合法的。他们以此同时宣布，12 月 2 日的罪行不是在于对一个不乐意顺从的民族空前地横施暴力，而是在于打破议会的大门，放进一个乐于顺从的情人。政变作为违宪行为和 2 月 24 日宣布共和国是同一回事。

如果民主党人想站住脚，他们必须学会毫不容情地认识自己犯过的错误。1848 年提供了证据，表明 19 世纪的任务不能用 18 世纪的公式来解决。1793 年的传说破产了，路易·波拿巴承担了清算它的任务。

附 录

第 387—390 页补充评注

制宪国民议会的多数成员不是符合布朗基和各革命俱乐部要求的

那种彻头彻尾的共和主义者，这样说是不错的，但即使如此，这当然也并不一定意味着当时在议会中起决定作用的人统统从一开始就是伪装起来的君主主义者。他们中的多数人曾经毫无保留地承认共和政体，当然他们并不因此忘记自己特殊的阶级利益。选举是在对共和派最有利的情况下完成的；全国的舆论都还受对七月王国的腐败深恶痛绝的情绪支配；候选人的政见声明就是再好不过的证明。选举在复活节星期日进行，任何工人都可以不受阻碍地投票，尽管各个政党在竞选斗争中不惜采用任何制造流言蜚语和甚至毁谤的手段，但毕竟还谈不到在选举时使用经济压力。革命派高声责骂这一议会只是一个假的人民代表机构——顺便说一句，这与保皇派报刊的说法毫无二致——但他们只是在这一点上说对了：这个议会不是革命传说中的那种人民代表机构。

马克思在《法兰西阶级斗争》中这样说：“普选权并不具备旧派共和党人所寄托于它的那种魔力。旧派共和党人把全体法国人，或至少是把大多数法国人看作具有同一利益和同一观点等等的公民。这就是他们那种人民崇拜。但是，选举所表明的并不是他们意想中的人民，而是真实的人民，即分裂成各个不同阶级的代表。”^①

他在该书第 43 页上又说：“甚至那些革命的法国著作家，也由于对共和主义传统怀着某种敬畏而抱着错误见解，以为在制宪国民议会中是保皇党人占统治地位。恰恰相反，在六月事变以后，制宪国民议会仍然完全是资产阶级共和主义的代表者，而且，三色旗共和派在议会外的影响越是坚决地摆出这副面孔。在需要捍卫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形式时，制宪议会就拥有民主主义共和派的支持票；在需要捍卫这个共和国的内容时，制宪议会甚至连讲话的方式也与资产阶级保皇集团如出一辙了，因为构成资产阶级共和国内容的正是资产阶级的利益，正是它的阶级统治和阶级剥削的物质条件。由此可见，这个制宪议会生命和活动不是体现了保皇主义，而是体现了资产阶级的共和主义。”^②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395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403 页。

总之，布朗基在这一点上是说得对的：议会中共和党人（他们对待工人阶级的态度就像国民公会中山岳党对待资产阶级一样）不占多数，社会民主主义者也不占多数。但除此之外，国民议会倾向共和制的程度并不比法国“人民”——即真正的人民——更少，不如说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人比人民更加倾向共和制。生活在传奇式观点中的社会革命派是看不到这一点的。他们抱怨受到欺骗，却不愿意承认他们首先有理由去想一想世界上也存在着自我欺骗这种情况。大量的事实迫使他们看到既定的阶级划分、时代的社会需要对他们所追求的共和制是不利的，但是这一认识也仅仅导致他们去寻找与社会需要无关的、用暴力来造成他们所期望的社会革命的手段——在任何情况下，这种开始都只能以反动告终。

拉马丁^①这个人当时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思想的无可争辩的经典式体现，而他不下于十次当选议员这一事实证明上面的论述是正确的。在革命的首都巴黎，他在所有候选人中是得票最多的，即 259800 票。临时政府多数派的其余成员所得票数仅次于他。在政府的激进少数派中，弗洛孔^②得 121000 票，赖得律-洛兰得 132000 票，阿尔伯得 133000 票，路易·勃朗得 120000 票。但那些仅仅列名于卢森堡宫（工人工场）候选人名单上的人一败涂地。连巴尔贝斯和彼埃尔·勒鲁尽管得到工会的支持，在全巴黎也仅仅各得 64065 和 47284 票。在外省的工业中心，情况也不更好。我们看到里摩日和卢昂的工人失败了。在里昂这个曾经多次发生工人起义的城市，革命派中央委员会做到了使两名共产主义者当选，但当选者多数是温和派共和主义者。丹尼尔·斯特恩写道：“无产阶级作为阶级在这次选举斗争中被打败了”。但是由于无产阶级本身只在居民中占少数，因此他们在这次选举斗争中结果也只能

① 阿尔丰斯·拉马丁（1790—1869），法国诗人、历史学家和政治活动家，1848 年临时政府的外交部长，是政府的实际首脑。——编者注

② 斐迪南·弗洛孔（1800—1866），法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政治活动家，1848 年为临时政府成员。——编者注

作为少数派出现。

蒲鲁东关于“普选权神秘化”的想入非非的论述只起一种作用：使革命派队伍中的混乱达到极点。他在5月3日写道：“普选权欺骗了人民”。但是他在这以前所写的却更加接近真实：“1848年的革命作为经济革命是可能发生的革命中最市民化的。它是工场，办事处，家政，出纳处——世界上最不会为革命热情和豪言壮语提供材料的、最枯燥无味的事物。好也罢，坏也罢，我们必须委曲求全，去做纯粹的市侩”（1848年4月28日《人民代表》）。

第 527—535 页补充译注

本书作者怀着十分强烈的感情描绘了永远值得纪念的六月战斗，而所有在那些日子里在起义者的街垒后面战斗的人或者全心全意站在这些战士一边的人是必然会受这种热情支配的。作者用同时代的参与战斗的人的眼光来看这一殊死斗争和在这一斗争中活跃的人，这就使他的描述富于热情和生动逼真。我们如果以某种方式损害了这一特点，就会使我们觉得这是对作者和读者不公正的。因此我们凡是在他的描写已足够的地方就仅限于加一些解释性的注，我们希望这些注释不会使他的描绘减色。

当然也请容许我们在事后对六月悲剧发表几句批判性考察的言论。这一斗争毫无问题是一场悲剧，是诗人能凭想象力构思出来的最撼动人心的悲剧。我们在这样说时所想到的不仅是为数众多的惨遭杀害和流放的人，我们也想到这一斗争给它在各处的最优秀战士造成的精神上的巨大痛苦。因为如果把这一斗争说成是由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激化而发展成的流血战斗，那还不足以完全说明问题。它并不是一次纯粹的阶级斗争。这决不是因为，在街垒前面也有工人战斗，在街垒后面也有资产阶级战斗。阶级之间的区分从来不是这样绝对的，因此在有些行动时刻，任何一个阶级政党都会在自己的队伍里拥有来自其他阶级的分子。但是在1848年6月反对无产阶级革

命党的人中间，有些人在这以前的经历和以后的行为证明，他们的全部感情和思想与工人阶级共同之处远比与特权者共同之处为多，这些人在其他情况下是会坚决站在工人方面的。另一方面，有些人物虽然没有伴同工人来到街垒，却煽动工人到街垒去，但对这些人来说，如果工人取得真正的、而不仅是暂时的胜利，那将会是世界上最讨厌的事。这是一次由各种刺激的协同作用引发的阶级斗争，这些刺激的根源大部分不是阶级对立，或者至少不是六月战斗所表现的并且在历史上也将永远被视为其表现的那些阶级对立。资产阶级作为阶级的切身利益并不要求立即解散国民工场，无产阶级的切身利益也并不要求按既定的形式维持国民工场。

工场已不再听命于它们的创立者。人们本来打算在工场中为资产阶级共和国创立一支后备军，它们却成了革命社会主义和波拿巴主义招募新兵的阵地。在别的情况下，人们会尽可能不引人注意地、一步一步地使它朝那一方转变，转变中出现的矛盾会导致示威游行，却不会引起如此绝望的起义。与此相反，在一次革命中，党派和党派中的大人物任何一天都可能丧失自己的地位，因此他们认为最快的解决办法是最好的解决办法。对于那种认为采纳“这种情况必须结束”的口号的人们真正设想一场大屠杀的说法，是有理由提出怀疑的。他们也许考虑到会出现进行暴力抵抗的尝试，但他们几乎很难预料到这一抵抗的规模有多大。5月15日突然袭击的结局使人们可以指望轻易地制服一场可能发生的起义。那一天未曾需要流一滴血，革命的巴黎要用暴力驱散国民议会的威胁是一个肥皂泡，它自动破裂了。

对那些日子里有党派立场的人的报告不要过分严格地按字面去理解，这无论如何是合适的。在人们的情绪非常激动的时候，是不可能客观地观察事物的。法国人生性容易激动，轻信和不信任在他们身上奇特地结合在一起，因此他们不能看到事物的真相。事件、激情和偏见逐步驱使一些人做出一些事，而他们的敌人却认为这是他们从一开始就计划好的行动。世界似乎住满了马基雅弗利们。极不可能发生的事被

信以为真，合情合理的解释却被当作谬见而受到嘲笑。

像卡芬雅克这样的一个人在1848年的民主主义者和革命者看来是怀着卑劣的利己打算的、残忍的人，他冷酷无情地拿几千人的生命作赌注，只是为了实现他的个人野心。这个“六月屠夫”确实是这个样子吗？即使人们不相信他的同伙巴斯希德声称曾经在胜利的第二天看到他在自己房间里哭泣的说法，仍旧有许多事实反驳了上述假设。如果承认镇压起义的必要性——对于资产阶级共和国来说这确实是必要的——那么对卡芬雅克的军事措施也就只能从军事观点来评判了。摆脱如下的感伤剧式设想是有点好处的：把从街垒打出的每一枪都看成英雄行为，把朝街垒打出的每一枪都看成谋杀行动。如果把占领街垒以后发生的事同直到攻克街垒为止发生的事分开，那么斗争造成的牺牲者人数在进攻者和防御者方面差不多是相等的。塞纳省省长狄古斯写的标有1848年10月8日的一份报告把在斗争中被杀死或因伤死亡的人数确定为1460人，其中2/3属于军队和国民卫队方面。这个数字也许比真正的人数少，也没有考虑到胜利者复仇欲望的许多牺牲者，但无论如何，像当时的英国报纸那样把战死的六月斗士人数说成有好几万就是过分夸大了。根据1848年7月3日卡芬雅克所作的一次声明，内行人士对起义者总人数的估计从来没有超过5万人。至于攻克街垒后犯下的屠杀和残暴行为，那么只有极少数情况是应由指挥官负责的。相反，可以断定在指挥官方面曾经尽一切力量来挽救囚犯的生命。如果没有高级军官的干预，死于士兵的仇恨的人数恐怕还要比现在多得多。不仅如此，根据普遍的见证，大多数对街垒战士施加的暴行应当算在那些或多或少是临时征集的部队（别动队和国民卫队）的账上。顺便说一句，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受过军事训练的士兵本来就是熟读作战条例的，^①他们不像突然被号召拿起武器的市民或者当时的别动队之类的半瓶醋军人那样感到这场斗争是与个人有关的斗争。

^① 这句话中“受过军事训练的”一词是伯恩施坦1921年新发表此文时加上去的。——编者注

别动队这些“巴黎人民的子弟”的行为狠狠地冲击了浪漫主义的观点。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把人民和贵族、人民和资产阶级对立起来，就可以把现代社会中的阶级区别彻底说清楚了。他们企图用“人民的子弟”被资产阶级收买和灌醉的说法来安慰自己。但是为什么两万多“人民的子弟”会让自己被收买和灌醉呢？如果他们的醉酒状态并没有妨碍他们在战斗中尽自己的职责，那么难道他们会醉得这样厉害，竟看不出自己是在对谁作战吗？人们只要提出这一问题，就可以认识到对事物的浪漫主义的一感伤剧式观点会把人引到什么样的死胡同去。那种指出别动队大部分是从流氓无产阶级招募来的观点更有价值。但是在这样说时必须小心，不要过分按字面理解这个词的第一部分。流氓无产者不一定就是流氓，他们只不过是在特别显而易见会使人堕落的条件下生活的人，是已退出正规的资产阶级的就业关系或者已退出有职业的雇佣工人阶级的人，他们依靠资产阶级饭桌上的残羹剩肴，以某种方式勉强糊口。所有的别动队员，不管他们在这以前是干什么的，现在都处于这种状态，只不过他们可以定期领到报酬而已。别动队是寄生在社会肌体上的赘疣，他们反对六月战士是完全合乎逻辑的行动。在那些日子里，事情发展到如此极端，而区分阵营的与其说是财产关系，远远不如说是就业关系，也就是取得收入的方式。简言之，六月战斗表明，不仅民族和民族之间在外表和举止上能有很大差别，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也是这样。但是这一战斗还说明了另外一点。

有一句很受欢迎，在今天几乎已成了教条的套话：资产阶级天生就是胆怯的，无产阶级天生就是勇于斗争的。一般说来，生活在安逸舒适的条件中的人也确实是不愿拿自己的人身去冒险的，而经常缺吃少穿，习惯于沉重的体力劳动的人却能在斗争中不必多加考虑就经受住考验。但是如果涉及资产阶级作为阶级生存的基本条件时，这一差别就会消失，而且甚至会颠倒过来。

国民卫队的资产阶级在六月的日子里曾经以很大的勇气经受住许多考验，再也没有比闭口不谈这一事实更能令人产生错误看法了。同

由坚固的街垒掩护的起义者作战并不是件小事，战死的军官数目之多^①是对此最好的证明。6位将军在暴动中牺牲，还有6位将军不同程度地负了重伤。正如几个月以前在伦敦当宪章派表示要冒险与有产阶级进行一场武装战斗时的情况所表明的，有产阶级在必要时能够提供的“一小撮”斗士是一支决不能轻视的力量。

报纸和讲坛上的那些煽动工人去进行街垒战的蛊惑家们却不是这样说的。按照他们的说法，需加反对的始终只是一个剥削者和阴谋家的小集团，“人民”会轻而易举地对付他们。但是当斗争发生时，事情却是另一个样子。如果卡芬雅克对六月战士人数的估计与实际情况不是差得太远的话——有一点不能忽视，这就是，胜利者有什么理由要在胜利后的第二天贬低这一胜利的意义？——那么在街垒后面战斗的人才勉强达到被解散的国民工场人员的半数，而单是国民卫队就能在紧急时提供10万到15万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武装力量，军队和别动队还根本不算在内。

那么巴黎工人的大多数在哪里？为什么他们的街垒战士只有5万人，后备队只有大约1万人？

人们不得不假定，很大一部分工人从一开始就认为起义是没有希望的，他们凭本能感到，起义的胜利并不能改善局面。1848年7月11日蒲鲁东在《人民代表》中写道：“我不能肯定，在胜利后必然随之而来的混乱中，起义者所希望得到的善不会被还要更大的恶抵消”。他为自己不参加起义的理由所作的这一说明比他一年以后在《一个革命者的自白》中就此所说的要更加可信得多。他在后一著作中过分慷慨激昂地说，他的十四天的议会政治活动要为他他在6月25日以前“什么也没有预见到，什么也不知道，什么预感也没有”的情况负责，他在起义的日子里是一个“傻瓜”，竟会上弗洛孔的“来自部里的谣言”的当，相信这一运动是“由政治派别领导并且由外国出钱支持的”。首先，这个“谣言”

^① 这里的黑体字是伯恩施坦1921年重新发表此文时才采用的。——编者注

只不过是好心的弗洛孔自己显然相信的、对实际过程的夸大的说法；其次，还有一大批社会主义者没有参加起义，他们并没有陷在“议员的水坑”里，并不是因为戴上了议会眼镜而看不到人民中间发生的事。相反，关于其中的许多人可以这样说：他们之所以不参加，是因为他们看到发生了什么事。正是在昨天的社会主义者和今天的群众领袖之间存在一种强烈的矛盾。前者的眼光尽管也会因为爱好教条而变得模糊不清，但整个说来更能洞察事物的全面关系，眼界更加宽广，而风云一时的鼓动家却只知道一个主旋律：立竿见影的效果。这次正是后者把陷于绝望的群众推向起义，唆使形形色色的冒险家出来支持起义，而社会主义者和他们的追随者当然对这一情况并不是不了解的，这就引起他们的不信任。那么多社会主义者之所以没有一同登上街垒，这恐怕是最合乎自然的说明。除此之外，起义缺乏一个确定的直接目标。“我们要面包，否则就要子弹！”是绝望的呼声，却不是行动口号；谁也不敢认真地要求恢复国民工场；解散刚刚选出来的国民议会是不行的——总之，人们固然知道为什么起义者要斗争，却几乎不知道他们为争取什么^①而斗争。当战斗发生时，正统派和波拿巴派的间谍收起了他们的旗帜。为了用一个人民皇帝来取代国民议会而斗争还会有点意义，为了用社会主义共和国来取代资产阶级共和国而斗争，这在普选权刚刚表明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时刻还远远没有到来的时候是没有意义的。蒲鲁东说，六月斗士的胜利不会给工人带来任何他们还没有的东西（《白白》第10章）。情况并不完全是像他所说的这样，但是就它所涉及的那一时刻来说，这句话是对的。无产阶级解放的纯政治障碍已经消除，经济障碍是不能通过街垒排除掉的。正如马克思在《法兰西阶级斗争》中所说的，“既不是直接的、公开承认的要求驱使无产阶级想用武力推翻资产阶级；也不是无产阶级已经到了有能力解决这个任务的地步”。^②所有深思熟虑的社会主义者都或多或少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许多工

① 这里的黑体是伯恩斯坦1921年重新发表此文时才采用的。——编者注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00页。

人也是这样。

但是蛊惑家的报纸的言论蒙住了另一些人的眼睛。报刊自由的原则应受到尊重，但这并不能成为否认它们有干坏事的能力的理由。报刊也需要时间才能发展起来。但是在 1848 年 6 月，刚刚获得自由的政治出版物领域还处于躁动状态，最轻浮的、最坏的货色冒出头来了。“实证主义哲学的创始人奥古斯特·孔德先生才勉强集合起 200 名信徒来听他讲课，而《巴黎郊区人》、《杜申老爹》和《真正的共和国》却领导着全国”。蒲鲁东这声短促的叹息首先适用于巴黎。那里所有的人都在努力搅乱居民的头脑。还不敢公然露出自己真正意图的保王派蛊惑报刊在这一高尚的努力方面与无数把蛊惑宣传当作纯粹做生意的报纸竞赛。所有写二月革命历史的人都一致认为，进行政治毁谤的报刊曾暂时迫使拥护某种政治信念的机关报，不管它们是资产阶级的还是社会主义的，几乎毫无例外地退居次要地位。在比较严肃的报纸中，《人民代表》，用它的主要撰稿人蒲鲁东的话来说，取得了一般的成就，而这也只是因为蒲鲁东不加区分地攻击所有的党派，他的文章能以令人目瞪口呆的悖论保持人们的好奇心。但是人们必须把蒲鲁东的文章与它们所涉及的情况联系起来阅读和研究，才能了解它们的政治内容，而对于当时的读者来说，它们只是消极性质的尖刻批评，炫人眼目的焰火，它们所起的作用与其说是有助于使人们看清问题，不如说是把他们的头脑完全搞乱了。

“临时登台的人，没有知识和经验的人，既不作任何准备，又未经过思考，就凭运气来讨论最困难的公法问题，把这些问题统统追溯到‘人民永无谬误’的学说上去，这种学说使个人理性所作的努力成为不必要的。人民这个词在他们嘴里只有狭窄的含义，仅仅指工业无产阶级。当人民应当行使自己的公民权利并且确认自己的法定主权的时刻到来时，他们在事先动摇了对国民代表机构的尊重并且散布那种使民主制国家永远不可能建立的破坏性观点，认为选举的结果不符合巴黎人民的爱好，巴黎人民有权对之采取断然措施，用任何一种合适的方式摆脱

掉根据普选权当选的，代表法兰西的人们。”

丹尼尔·施特恩-达古就是这样描述在俱乐部里发表的那些演说的。她补充说：“一批直到名称都只是（1793年的）报纸粗糙模仿品的报纸十分有效地支持各俱乐部的这种鼓动。为了吸引过路人来听和打动极其庸俗的好奇心，在大街上兜售和叫卖的报纸彼此之间在厚颜无耻和专横残暴方面展开了竞赛。——品位较高的报纸本来有可能冲淡这些粗俗愚蠢的大叫大嚷的影响，但是它们完全丧失了信誉。被人民看成半正式政府报纸的《国民报》以及甚至《改革报》（它的主编现在正在当权）再也引不起任何兴趣。卡贝的《人民报》只有伊加利亚分子才关心。《工场报》与《国民报》关系密切，也和它一样不受欢迎。”如此等等，直到老拉孟耐的《立宪人民报》都是如此，它的稳重的风格和思想丰富的论证是无法与《杜申老爹》及与它类似的报纸的粗俗谩骂和人身诽谤相竞争的。这些报纸中的文痞挑拨煽动巴黎人民，把他们搞得晕头转向，他们对六月日子里流的血至少应当与议会里愤怒的资产阶级负同样一份责任。即使这些造谣勾当是由他们自己负责而不是受某一个反动党派购买的，也不能减轻他们的罪责。

这是六月暴动的阴暗的一面，这样的描述与我们仅仅考虑战斗时的描述相比当然具有稍微不同的性质。但是，如果历史应当成为我们的教师，那么我们必须了解对我们所观察的事件具有影响的一切事实，我们必须力求使诗人的那种能把人和斗争栩栩如生地再现的塑造力与自然科学家的一丝不苟的严谨态度结合起来，后者的放大镜是连最小的细节也不会放过而不加探究的。

译自《1848年法国革命和第二共和国历史的通俗描述》
斯图加特 1898年德文版第 695—717 页、第 387—390 页、
第 527—535 页。殷叙彝译

崩溃论和殖民政策*

导 言

这篇文章也有它的历史，而且有它的前史和后史。它是对于 E. 贝尔福特·巴克斯^①先生针对我和卡尔·考茨基而写的一篇论战性文章《殖民政策与沙文主义》^②的第二篇答复。巴克斯先生在该文中攻击我，是因为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谈过较高的文明对较低的文明的权利（当然没把这种权利说成是无限的和无约束的），而且他主张了这样一种观点：社会民主党必须用它所掌握的一切手段去抵制文明的传播和殖民企图，因为这两件事情有推迟本来预料即将发生的资本主义经济崩溃的危险。我用总标题为《社会民主党的斗争和社会中的革命》的两篇文章答复了巴克斯。第一篇文章《论争》绝大部分是说明巴克斯的立场的，因此在这里可以略而不谈。只有导言我认为应该算是例外，因为它既属于第一篇文章，同样也属于第二篇文章，而且说明了一种总的见

* 此文为《社会民主党的斗争和社会革命》的第二节，在《新时代》上发表时本来不属于《社会主义问题》之列，但伯恩斯坦在编辑自己的文集《社会主义的历史和理论》时，从《社会主义问题》中抽掉了两篇文章，代之以另外两篇，本文是其中之一。——编者注

① E. 贝尔福特·巴克斯（1854—1926），英国社会主义者。——编者注

② 《新时代》，1897—1898 年卷第 1 册，自第 420 页起。

解，两篇文章都是按这种见解写成的。现在我把这个导言当作具有上列标题的第二篇文章的导言。这篇文章和什么论战连在一起，是众所周知的。这一论战再继续下去，促使我给斯图加特党代表大会写去了一封信，并引起与此相关的进一步的争论和发表文章。

我从对社会主义者们向我提出的批评的第一篇答辩中，摘出主要部分，作为这篇文章的补充，附在后面。它是以《批评的插曲》为标题发表的。^①

如前所述，巴克斯的文章也是针对着 K. 考茨基的。考茨基把进行答复委托给我，不过他在给我的信中以最轻蔑的态度对巴克斯的议论表示了意见，并且向我表明他完全同意我对这些议论的批评。在这里我必须声明这一点，因为考茨基后来加入了我的敌派的一方，在一篇专门为了把我一笔抹煞的文章《伯恩斯坦和社会民主党纲领》里指责我在本文中提出了错误的和走极端的主张。^②据说崩溃论一词是我的一个杜撰，如果他——考茨基——“没有弄错”（！），巴克斯有时（！）也主张过类似的意见，但是在德国的党内这种看法却没有表现出来。我对此要切实答辩的话，在其他地方已经讲过了。这里我只愿意再说一句：当我的文章发表了并且受到了猛烈的攻击时，有一位在德国生活的、见闻广博的党作家给我写信说，他在反复细心地读过这篇文章之后，确信这篇文章中不包含丝毫不可能正当而有理地讲的东西。

这位作家的名字就是卡尔·考茨基。

* * *

在社会党获得了重要政治意义的所有国家中，我们看到同样的现象：党内发生着一种内部变化。从前的那种连篇累牍的空话、无尽无休的议论被抛弃了，对通则的狂热减退了，人们不再冥想在彻底总崩溃之后分配熊皮，大家对这一有趣的事件根本不过多地考虑，而是去探讨当前问题的细节，去寻求在当前问题的基础上推动社会沿社会主义方向

① 《新时代》，1897—1898年卷第1册，自第740页起。

② 在那篇文章的第42页上。

朝前发展的杠杆和着力点。

这个变化过程并不总是一个在各方面都自觉的、有意的过程，尤其难得是一个统一的过程。由于各种传统，由于政治和经济发展上的差异，这一过程在不同的国家中发生得或快或慢，或自相矛盾或前后一贯；由于气质上或认识上的差别，它在不同的人身上发生的情况也是这样。但是，无论谈到的是德国的还是法国的社会民主党、斯堪的纳维亚的还是意大利的社会民主党，这一过程的主要特征到处都是一样的。

这个变化在形式上显得像是背弃了原则的纯洁性。果然没有一个地方没有慷慨激昂地反对它的人。例如 90 年代之初德国社会民主党就有过它的“青年派”，不过他们死守一些迄今在党内一部分已经获得几乎是教条式的力量、一部分至少已经广为流行的、陈旧的词句和口号，就这点而论，他们实际上是些老头子。人们事后将不得不承认，“青年派”中的这些人所关心的是对当时党的策略的一些理论上的意见分歧。在党的文献中有过不少为他们反对派辩护的东西。这里只提一下 1850 年 3 月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的通告信，一个当时跟反对派同道的党报的编辑部援引了它。该编辑部忽略了那份通告信的作者当起草它的时候还决没有达到他的社会政治认识的顶峰，而且这一信件所根据的那些前提在这段期间内已经大大地改变了；不过人们通常也是喜欢忽略这一点的。

决定策略问题时依据的前提分两种性质。首先当然要考虑这些纯粹实际情况的外部影响：有关国家的经济制度，它的社会结构和政治形势，它的各党派的性质关系和力量对比。第二种因素是属于知识性的：对社会状况的认识的程度，对社会体及其成员的性质和发展规律的洞察所达到的阶段。这两种因素都在变化着，在讨论策略问题时对于这两方面的变化都要考虑。这话听来像是老生常谈，而且也多半是老生常谈，但是实际上我们发觉人们常常无视这一规则，尤其是那些指望通过较大的总崩溃来彻底实现社会主义、把这种总崩溃看成社会主义最终胜利的基本先决条件的人，认为他们可以把它置之不理。

教条的革命主义在骨子里恰好同反动的极端派的教条主义一样保守，这并非奇谈怪论，而是一件经常见到的事实。两者都同样抵死不肯承认违反它们的“原理”的那些发展。如果事实的呼声太响亮，无法直截了当地加以反驳，它们就把这些事实归因于各种各样的偶然情况，唯独不归于它的真实的、适当的原因。这是很自然的。因为，在空论成了癖好的地方——有迷恋合法性的唐·吉珂德，同样也有迷恋革命的唐·吉珂德——它的信徒就永远不敢承认在它的前提上有任何重大的改变。他会从各个角落给他认为不合适的事实搜寻理由，但是他将胆战心惊地回避一件事：实事求是地去探究这些事实的真正原因和连带关系。

在 1896 年的伦敦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上，关于经济任务的决议中通过了以下一条：

“经济发展现在已经达到这样的地步，可能不久就会发生危机。因此，大会要求各国工人学会管理生产，以便作为有阶级觉悟的工人能够为公共福利而接管生产。”

很明白，这里所说的“危机”指的不是现代社会已经屡次遭遇的普通的营业危机，而是真正的、巨大的世界历史性危机；不是指哪几家资本主义企业的破产，而是整个资本主义经济全盘崩溃。这一点在英文本的措辞中表现得更加清楚，英文本的措辞无疑是条款的原文，而德文本显然带有翻译的痕迹，而且是仓促进行翻译的痕迹。在英文本的措辞中说到“极其迅速的经济的发展”，它使无产阶级作为“有阶级觉悟的公民”去研究行政管理成了“刻不容缓的必要”。^①

这个条款同其他许多条款一样，在大会上“一股脑儿”被通过了，并没有对它进行讨论。但是可以设想，它即使在不那么匆促的讨论下也会通过的。它所推荐的事情，和粗燕麦粉一样，无论如何总是有用的，它所断定的，至少在原则上同目前在社会民主党内占优势的对现代社

^① 以下是英文原文：“经济和工业的发展正在如此迅速地进行，在相当短的时期内可能就会出现危机。因此，大会坚决向各国无产阶级指出他们作为有阶级觉悟的公民而学习如何为公共福利管理各自国家的事务的迫切必要。”

会发展过程的想法是一致的。

按照这种看法，迟早将有一场来势猛烈、规模巨大的营业危机通过它所造成的贫困激起人们猛烈反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感情，促使人民群众深信在这种制度统治下不可能为了公共福利来管理现存的生产力，因而针对着这个制度的运动就获得了不可抗拒的力量，在它的压力之下，这种制度本身将不可收拾地崩溃。换句话说，这个不可避免的巨大经济危机将扩展成一个囊括一切的社会危机，结果将是无产阶级作为当时唯一自觉的革命阶级而掌握政治统治，在这个阶级统治之下将按社会主义方向实现社会的全面改造。

构成这种看法的基础的思路是大家都知道的。它所依据的是：在我们眼前发生的企业的逐步集中；为工资而劳动的各阶级的增长；这些阶级和各资本家阶级之间的对立以及资本家阶级内部的对立；竞争的强制性规律；经济变动对各党派的政治面貌和一般地对整个社会生活的政治面貌的影响。这一切都是凭经验可以证明的事实，从这些事实似乎势必得出以下结论：最终将有一次巨大的经济危机带来决定性的激变。因此在社会民主党内有一种信念生下了根：这条发展道路是不可避免的自然法则，巨大的、囊括一切的经济危机是通往社会主义社会的必经之路。此外它还显得是最稳妥的、最短的道路，而且人们一旦习惯于几乎只根据对这个看法有利的事实来研究各种经济过程和结论，而且主要是注意这些事实，他们不久就也会有进一步的想法，即认为这个巨大的救世危机不可能是在遥远的未来，如果不发生意外的事件来给予资本主义世界一个新的缓刑期的话。

这一巨大危机的前景实际上是怎样的呢？许多党报在几星期以前研究了1895年普鲁士的工商业调查结果，对现存社会的寿命得出了极端悲观的结论。调查结果毫无疑问地指出，工商业的大企业有非常显著的增加，如果只注意这一点，而不对它作任何广泛的利用，那么像“工业极迅速的集中”或“大企业的传播的不可抗拒的力量”一类的词句也就完全可以认为是正当的了。可是，如果应用于社会主义读者十分接

近的问题，即这种增加对于向社会主义发展的意义问题，像“极迅速的集中”一类的词句非常适于引起不符合实际事态的观念。因此我们愿意暂时浏览一下有关的数字。

在真正的工业里，企业的集中最显著。我们看到只由单独个人管理的企业比 1882 年减少了 12%，小型企业（1 名至 5 名职工）减少了 3% 到 4%，而相反中型企业却增加了 60%，大型企业增加了 83%。这些比例数字似乎可以证明上述最大胆的结论。企业的单纯数字说明的情况却完全不同。我们看到：

	1882 年		1895 年	
	企业数目	企业百分比	企业数目	企业百分比
独营企业	755,176	61.8	674,042	57.5
小型企业 (1—5 名职工)	412,424	33.7	409,332	34.9
中型企业 (6—50 名职工)	49,010	4.0	78,627	6.7
大型企业 (至少 51 名职工)	5,529	0.5	10,139	0.9
	1,222,139	100.0	1,172,140	100.0

在这里，变化显得简直不显著。微型企业和小型企业总起来仍占一切工业企业的 90%。这些数字当然也给人以错误印象，偏于和上述情况相反的一面。它们使得大型企业与小企业的比例显得比实际比例要小得多。各类企业中的从业人数表最接近于真实情况。这种表指出了以下的发展：

	1882 年	百分比	1895 年	百分比
独营企业	755,176	22.3	674,042	14.78
小型企业	1,031,141	30.4	1,078,396	23.66
中型企业	641,594	18.9	1,070,427	23.48
大型企业	962,382	28.4	1,734,884	38.06
	3,390,293	100.0	4,557,749	100.00

从而在工业里所完成的工作当中，大型工业所占的部分表明比单纯企业数字所表示的部分要大得无可比拟。不过仍要指出，这里已经把所有 50 人以上的企业都算成大型企业。如果我们把 51 人到 200 人的企业和至少雇用 201 人的企业分开，则上表中最末一列数字分开如下：

	1892 年 ^①	百分比	1895 年	百分比
中等大型企业 (51—200 人)	403,049	11.9	757,357	16.62
非常大的企业 (至少 201 人)	559,333	16.5	977,527	21.44
	962,382	28.4	1,734,884	38.06

非常大的企业的比例及其增长在这里显得较不显著。这种企业中雇用的人员，在 1895 年才略多于工业中雇用的人员总数的 1/5，然而中型企业和中等大型企业一共还占总人数的 2/5。如果我们就较小的企业的数字了解一下详细情况，就会知道恰恰是其中最大的（3 人到 5 人的企业）表现出绝对的和相对的增长。这种企业所雇用的人员在 1882 年为 564652 人，在 1895 年则为 665607 人，增加了 17.88%。只有非常小的企业和微型企业（至多两名职工）一部分说来是绝对地减少了，一部分说来是相对地减少了。

因而，较大的小型企业和中型企业还不大表现出要消灭的倾向。它们只是在和大型工业的比例上逐步地后退了，或者逐步地被大型工业超过了；不妨说被它以“巨人的步伐”超过了。如果我们继续深究，并且按照 L. 金茨海默博士在他讨论工厂式大企业的发展^②的书中所举的实例，把各类企业所占的产品量作一个比较，那么对于大型企业会得出更加有利的数字，达到总产量的 60%。但是 25 万较大的小型企业和中型企业及其将近 200 万的工人仍然是一个现实。而且也不可忽视有很

① 当系 1882 年之误。——编者注

② 参照《新时代》，1897—1898 年卷第 1 册，自 305 页起。

大一部分大型企业只限于生产粗制品和半成品，因而生产量的单纯比例同样也只应当具有有限的意义。还有（撇开机器生产不谈）中等工业的较精细的产品的量也包括在内，这类产品不是在减少，而是在增加。按照纯粹数字比例来说，大型企业吞并的非常小的企业远比中型企业要多，而中型企业按照上列各表来说却显得是几乎不可动摇的方阵。

当然这种不可动摇性也只是外表的一面，实际上在这个阵营里决不是稳定性占优势。因为在这里各种一向属于小规模经营的企业被大型工业吞并了或者被它消灭了，在那里又根据新的技术或根据大工业所造成的那种新情况，形成新的中型企业。到处是不断的运动，旧的营业部门死亡了，新的营业部门兴起了，而且在各个职业门类内部经常发生着变革。但是这件事虽然对现代手工业和小型制造业的生理学来说非常重要，对我们的考察来说却是次要的。这里涉及的不是个人而是整个部门。分子的集合状态在这里发生了变化，但是分子的质量并没有减少，它的分解尚未确定。^①

众所周知，在商业和交通以及农业里，中型企业和大型企业的比例比工业中更大得多。在商业和交通部门，雇用人员的分配如下：

	1882 年	1895 年
至多有 2 名职工的企业	411,509	467,656
有 3—5 名职工的企业	176,867	342,112
有 6—50 名职工的企业	157,328	303,078
至少有 51 名职工的企业	25,619	62,056
	<hr/>	<hr/>
	771,323	1,174,902

在农业中的统计如下：

	1882 年数目	1895 年数目	1895 年公顷数
小块土地经营	3,061,831	3,235,169	1,807,870

^① 为了不致引起任何误解，这里却要指出，工业中的现代中型企业往往在很大程度上是资本主义企业。

小型农场	981,407	1,016,239	3,285,720
中型农场	926,605	998,701	9,720,935
较大农场	281,510	281,736	9,868,367
大企业	24,991	25,057	7,829,007

和 1882 年的数字比较起来，在商业和交通部门里中型企业及中等的小型农场有了最显著的增长，在农业中，从外表上看来，和 1882 年相对比中型农场的情况比其他任何一类企业都要好。中型农场的占地从 9158398 公顷增加到 9720935 公顷。按照省、县和经营的性质进行比较精密的、深入细节的研究时这种情况要有什么改变，在这里可以不加讨论。对我们的目的说来，上面所举的粗略数字已经够了。

这些数字表明，无论我们去注意哪一个经济生活部门，我们在什么地方也发现不到中型企业的数目有重大改变，或者甚至有所减少。无论这种企业的许多所有主的境况多么窘迫，特别是在商业里无论各类企业的队伍中随时有多少“蜉蝣”，它们的死灭对全局说来是无足轻重的，总的情况并不因此而有所改变。

然而，大企业和巨型企业的不断向上增长也不是无稽之谈。工业、商业和交通业的统计表以无可争辩的说服力证实了这一点——尤其是我们考虑到，在商业中凡是有 10 个到 15 个人的企业就必须算是大型企业了。这些统计表完全不表明大型企业的增加意味着中型企业的减少，而是给这种观念留有余地：仿佛这里只谈得到一种共存，而谈不到彼此间的生存竞争。

毫无疑问，这种观念在极多场合是与实际情况相矛盾的。许多工业的历史告诉我们，不同经营种类彼此之间有激烈的生存竞争，小型经营和中型经营遭到大型经营几乎绝对的排挤，甚至遭到完全扼杀。仅就各个营业部门来考察，中型企业和大型企业同时增长总是一种例外。如果工业、商业和交通的总面貌是这样的，那么这倒可以由以下两点来说明：第一，现代社会中营业种类不断地在增加；第二，今天的工业界的适应能力和活动性正在增长。

在我们的社会主义文献中，很少去注意这些极重要的因素。偶尔也注意一下，譬如说当需要反对行会主义者或其他反动派的时候，我们就不齿于向经济自由主义的武库中抓一把，来论述现代工业生活的特殊的多样性和变化性。此外，在刻画经济的发展规律时和在论证工资规律时，我们也这样做。我们假定工业关系中有一种僵化性和拘束性，这种关系能够适应手工制造业时代或机器时代初期——当时工业界还没有脱掉传统经济状态的蛋壳，但是它与现代实业界的典型特性是极端矛盾的。我们常常那样发议论：仿佛现代的、非常完全而流行的信用制度，以及交通一天天在扩展和便利起来，都是我们毫不了解的事，或者至少对于我们也是十分次要的事，然而事实上它们对社会生活与社会发展说来，却和我们有正当理由极其注意的生产技术是一样具有根本意义的经济因素。

在《共产党宣言》以及同一时期内出现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完全没有忽视这些因素，反而断然地强调了这些因素。但是在那些文献中虽然关于这些因素的作用作了很多预言，人们在1848年时当然不可能预见全部发展。因此，一个为科学的社会主义这一名称而辩护的纪念性作品应当同样地从事研究事态的实际发展同《共产党宣言》及附属于《宣言》的文献中的假定相去多远，这种发展所证实的预言的确证如何。然而，依科学方式证明科学的社会主义的严肃尝试，现在还只有极个别的实例。

马克思和恩格斯自己从来没有为偏袒理论而闭眼不看实际事件，他们总是给予实际事件最充分的注意。所以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编辑《资本论》第3卷时就毫不犹豫地把他和马克思所主张的十年生产周期的思想当成过了时的。他把“交通工具的惊人发展”——远洋轮船、铁路、电报、苏伊士运河——以及“欧洲的过剩资本，在世界各地开辟了无限广阔和多种多样的投资领域”^①这一情况称为使“大部分旧的

^① 《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54页注；并参照德文本第3卷第1编第395页和第2编第145页。——编者注

危机根源和造成危机的机会消除了或减弱了”的因素。恩格斯推测周期或许只在时间方面有了延长，他更认为抵制旧危机重演的因素，如卡特尔、保护关税、托拉斯，每一种都包含着“未来的更剧烈得多的危机的萌芽”。

至少就卡特尔和托拉斯而论，我觉得有不多情况是与后一假设接触的。存在着十分多样的形式和适应能力，所以至少并没有令人信服的理由把这种作用当成是唯一多半要发生的作用。此外，还需要等等看，在市场不断扩大、市场情况报道迅速和生产部门继续增多的情况下，我们是否在最近期间根本不会遭遇像以前的那种普遍危机，或者是否会首先发生只限于一定工业部门的国际危机来代替普遍危机。最近纺织工业的重大呆滞几乎完全没有波及其他工业的集团，这一事实也许本身还不足以证明上述结论，因为例如金属工业的同时繁荣大部分是由于军国主义和海军扩张主义的异常紧迫的需要；然而仍可以断定，在不大受军国主义和海军扩张主义影响的工业里也很少发现纺织业危机的反应。各种工业及其市场的范围在今天似乎已经大得不可能在所有地点同时遇上同样严重的危机，除非发生极为非常的事变使各国商业界一致陷入恐慌，到处都同样地使信用瘫痪。

我并不是说事情就是这样的，而只是表示了一种揣测。Vestigia terrent〔足迹使我心惊〕——我对于在这种事情上作预言抱有一种异教徒式的敬畏。但是，在资本财富大幅度增长下的现代信用制度的灵活性、交通机构的各个部门——邮政和电报、客运和货运——的完善化，商业统计和情报机构的改进、工业家组织的扩展，这些都是事实，完全不能设想它们对于生产活动与市场状况的关系没有重大影响。

因此非常有可能，随着经济发展的迈进，一般说来我们将根本不再遇到一向的那种营业危机，并且必须抛弃一切把它当成巨大社会变革的前导的那种冥想。

尽管那些死抓住以前曾一度“经过考验”的口号的人对这件事可能

惋惜，^①社会主义思想界却绝不会因此丧失丝毫说服力。因为仔细看来，我们以上所列举的消除或限制旧危机的一切因素到底是什么呢？一切都同时也是生产和交换的社会化的前提，一部分甚至是它的发端。这些因素的形成不让危机受到影响，这一点和社会主义学说是完全一致的。如果不是这样，那就正好表示这学说本身有严重错误。

但是，即使我们假定危机的情况还是和从前一样，社会民主党就真的有理由希望大崩溃很快发生吗？

让我们看一看上文中就德意志各邦中最大的和最发达的一个邦——普鲁士所举的数字。很明显，由这些数字所得出的工业、商业和农业中的经营的分散情况，将使社会民主党——从它所经历的发展看来，它在德国是唯一还可能通过一次群众起义而掌握政权的政党——面临一项无法解决的任务。它不能用命令废除资本主义，甚至根本缺少不了资本主义；另一方面它又不能给资本主义提供为发挥其职能所必需的那种保证。在这种矛盾之下，社会民主党会弄得疲于奔命，不可收拾，结果只能是一个惨重的失败。^②今年正是法国二月革命的50周年，我们非常希望大家不要因为追忆那些光荣的人民的日子和反动势力的可耻行为而忽略了那一年的实际教训，要考察从2月24日的欢庆到6月24日的不带戏剧性的戏剧这一段过程。如果一旦有一次普遍的营业危机使社会民主党掌握政权，而那时社会的构成还同上面的表格中所表示的一样，那么1848年的临时政府的困难不管有多大，同社会民主党的困难比起来就是微不足道的了。

可能有人回答说，我们说到当前社会的崩溃时，所指的不止是一次普遍的并且比以前更加猛烈的营业危机，也就是说是指资本主义制度

① 有一家党报上非难我喜欢“对社会民主党的久经考验的理论和要求吹毛求疵”。但是每一件理论工作都是对一向承认的原理“吹毛求疵”。再说，哪个错误不是在某个时期曾经是“久经考验”的真理！

② 如果社会民主党对于在必要的时候把归属于它的权力和资产阶级民主党派分享这一思想习以为常，而且在决定性的关头采取相应的措施，那么上述情况就会相应地有所改变。

由于它本身的矛盾而引起的全面崩溃。但是这个观念是彻头彻尾模糊不清的观念，而且它完全忽略了各种工业的性质和发展过程上的重大差别以及它们在采取公共服务形态方面极为不同的能力。目前的生产制度几乎在同时完全崩溃，这件事随着社会的向前发展，不是可能性更大了，而是可能性更小了，因为社会发展一方面提高了工业的适应能力，另一方面（或者与此同时）加深了工业的分化。如果援引如下的说法，即随着这样一次崩溃而发生的人民起义大概会以温室的速度使事情发展到最高程度，那也无济于事。这两种从法国大革命的历史推演出来的假设，是以完全不了解封建制度和自由制度之间、封建经营的地产和现代工业之间的重大区别为基础的。可以取消大部分封建权利而只使居民中比较小的一部分受到损害，用激烈手段侵犯资产阶级的财产权却会触及一个更加广大得不知多少的利益阶层，又不能叫这些人全部移居国外。封建庄园可以分割开来，分片出卖，对现代工厂却不能这样处理。按照公社的公式加以剥夺的工厂愈多，要想在起义中间使它们继续开工就愈困难。事态的纯粹外表的尖锐化，绝对不会相应地加速工业的内部发展过程，相反，对这个发展过程往往会起抑制作用。

人们会提出这个问题：这样说来，是不是要把社会主义的实现延期到世界末日——借用巴克斯先生的话来说就是，“直到希腊人的朔日”^①——或者推迟到许许多多代以后呢？如果人们把社会主义的实现理解为建立一个在一切方面都严格执行共产主义规则的社会，那么我一定要毫不犹豫地声明，我觉得这种社会还相当遥远。相反，我倒有一个坚定的信念，即现在这一代人已经会看到许多的社会主义得到实现，即使不是按照专利的形式，但是在实质上毕竟是实现了的。社会义务的范围的不断扩大，即个人对社会的义务和相应的权利以及社会对个人的责任的不断扩大，组织成民族或国家的社会对经济生活的监督

^① 古罗马历称每月的第一天为“朔日”（die Kalende），希腊历中设有这个名称。罗马人通常在朔日付租税和债务，所谓“延期到希腊人的朔日”实际上就是拒绝偿付的意思。——编者注

权的扩展，市镇、县和省内的民主自治的建立以及这些团体的职能的扩大——这一切在我看来都是向社会主义的发展，或者如果人们愿意这样说的话，是社会主义的一部分一部分的实现。伴随着这一发展，经济企业自然会从私人管理转入公共管理，但是这种转移只能逐渐地进行。而且确实有充足而恰当的理由迫使我们在这一方面实行节制。为了建立和保证企业的良好民主管理——伦敦郡议会的企业局的内部历史对这个问题的困难提供了一个实例——首先是需要时间的。这样的事情是不容即兴凑合的。但是，只要社会一充分行使它的监督经济关系的权利，那么经济企业向公共经营的实际转移就不像一般所认为的那样具有根本的重要性了。一部好的工厂法可以比一整批工厂的国有化包含更多的社会主义。

我坦白说，我对于人们通常所理解的“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非常缺乏爱好和兴趣。这个目的无论是什么，对我来说都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所谓运动，我所指的既是社会的总运动，即社会进步，也是为促成这一进步而进行的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宣传和组织工作。

照这样说来，社会民主党既不要期待、也不必盼望现存经济制度的即刻崩溃（如果把它想象成一次营业危机浩劫的产物的话）。社会民主党所应当做的，而且是今后长时期所应当做的，是在政治上把工人阶级组织起来和训练他们运用民主，为国内的一切适于提高工人阶级和在民主的方向上改造国家制度的改革而斗争。就殖民政策和夺取新市场的问题而论，社会民主党出于对自己的原则的珍视，将反对一切殖民沙文主义以及一般地反对一切沙文主义，同时不让自己被推到相反的极端，即把任何对民族权利的主张和珍视、任何民族意识都不加区别地当成沙文主义而加以摈斥。社会民主党将反对对未开化民族或野蛮民族施加暴行和进行欺骗性的掠夺，但是社会民主党也将放弃对于把这些民族纳入文明化制度范围的任何反抗，认为这是不合宜的，同样也将放弃对扩大市场的任何原则性的反对，认为这是空想的。市场和国际贸易关系的扩展一向是社会进步的最有力的杠杆之一。它在非常大的程

度上促进了生产关系的发展，并表明是增加民族财富的一个因素。但是只要结社权、有效的保护法和政治选举权使工人能够确保自己在财富的增加上获得的份额增长，从那一刻起工人同财富的增加也就有了利害关系。社会愈富足，社会主义的实现^①就愈容易而且愈有把握。

尽管如此，不同国家的社会主义者对待殖民政策的态度一定仍旧是极不相同的。因为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要推行这种政策的那个国家的制度和形势，取决于计划中的殖民地的性质以及该国进行殖民和治理殖民地的方式。因为在大多数国家，治理殖民地完全是特权阶级的事，单凭这一点就已经使社会民主党以采取批评的态度为宜了。但是，如果认为通过反对所有的和一切的殖民政策就能加速本国的革命，这种想法是彻头彻尾站不住脚的，还不说这件事本身就是空想的。人们在想到这类事情之前，必须把轮船和铁路从地球上消灭掉。这种思想在社会主义运动的幼年期曾经给人心以最强烈的满足，单凭这一点就可见它是多么空想的了。我们如果查一查本世纪30年代的社会主义文献，就会发现那里面已经主张过这样的思想：必须反对殖民政策，因为它推迟了人民事业的胜利。1831年2月15日的《贫民卫报》写道：“任何一个青年人，在他亲眼见到本国的新生以前，不应当允许他出国”，这家报纸并且痛斥把人们引诱到“加拿大的沼泽”和“新南威尔士的荒野”去的殖民政策和移民政策。人们读了这些东西，再具体想象一下加拿大和新南威尔士已成了什么样子，那么他就必然会慎重对待这种口号了。《贫民卫报》确实是有许多道理的。首先，这个运动还正在初期，其次，当时在英国正直接面临着一次革命，当然这次革命的结果和这家报纸的勇敢的编辑所追求的不同。但是我们现在在二代多以后应该超出今日的社会民主党在萌芽期的天真想法之上了。谁如果在今天为麦塔比里人^②所受的不公正待遇而照顾他们，这人是出于一种高

① “实现”一词原文中用的是复数即“Verwirklichungen”，表明伯恩斯坦认为社会主义不是一次实现的，而是一部分一部分实现的，与上文中的意思一样。——编者注

② 1837年被荷兰殖民者从南非的德兰士瓦赶走的苏鲁人。——编者注

尚的动机，我们对他只能尊敬，虽然认为这件事本身是徒劳的。但是，谁要把麦塔比里人的事当成自己的事，以便藉此来阻止文明的传播和世界市场的扩大，加速大崩溃的到来，首先他就犯了一个天大的时代错误，他在本当写 1831 年的地方，写上了 1898 年。这中间 70 年的经验，对他来说是不存在的。

发表于 1898 年 1 月选自马元德、严隽旭、彭金安、蔡升译《社会主义的历史和理论》
东方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181—197 页

社会主义中的现实因素和空论因素

为第一次发表而写的前言

本文所谈的这个题目，近年来朋友和敌人已经从另一些观点反复讨论过了。关于这方面，我还特别要指出安东尼奥·拉布里奥拉的一些思考圆熟、内容充实的文章，这些文章是以《唯物主义历史观论集》的标题在巴黎由日阿尔-波里也尔书店出版的；此外，要指出《社会发展》上转载的若·索列尔、贝·柯罗齐及其他一些人写的若干篇论文；最后，我要指出数年前在佩耳纳史托费尔的《德国言论》^①上发表的 Ch. 史特洛夫斯基博士的文章《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和批判》。

在上列最后一篇论文中，作者还写道，他认为“把认识论应用到历史哲学上”，以便“按照我们的历史哲学认识的范围来提出问题”的时机“成熟”了。巴克斯先生在写他那篇载于《维也纳时代》上的引起了跟考茨基论争的著名文章时，是否见到了史特洛夫斯基的这篇文章，这点我不清楚；无论如何，巴克斯-考茨基的论战，尤其是考茨基的文章《唯物主义历史观能够而且应当有什么成果？》，可以看成对上述这种特殊研究的贡献。相反，本文却不打算写成这一类文章。本文只想探讨题目

^① 1898年，第4期和第7—8期。

中所指的问题，即现代社会主义在哪方面是现实的，在哪方面是空论。我对于“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所发表的意见引起了几种党报的批评，这促使我写了这篇文章。这篇文章倒也涉及了认识论的领域，那是出于纯粹实际上的需要，需要确定“空论”这个概念，却不是试图回答史特洛夫斯基所提出的问题，而且当时我连知道也不知道那个问题。其实，他的那篇发人深思的论文在本文接近脱稿的时候才到我手里。在认识论方面我是门外汉，所以我不自称我对这一问题的贡献能够超出一个门外汉的想法。相反，我感谢《前进报》学术副刊上康拉德·施米特的一篇论康德的文章对我的直接启发。在我看来，“回到康德去！”这句话在一定程度上对社会主义理论也是适用的。

我这篇文章不时要讲一些啰唆话，甚至老生常谈，这是我想从一开始就尽可能排除一切误解的愿望迫使我这样做的。此外，我在重新着手研究社会主义问题时是意识到这一点的：马萨里克教授在《维也纳时代》上的《当前马克思主义内部的科学危机和哲学危机》一文中说得对：“这一危机对于社会主义可能成为一个巨大的力量。社会主义同一切社会改良的党派一样，它的活源泉也存在于现今社会制度的明显的缺陷当中。只要这个源泉还流着，社会主义的战斗的党即社会民主党就不怕对自己的理论的任何自我批评。”

—

巴尔扎克的出版人维尔代讲过巴尔扎克的一件事。有一天作家儒勒·桑索同他谈论他的一个姊妹，巴尔扎克最后打断了他的话说：“完全对，我的朋友；但是，我们要不要还是回到现实中来，让我们来谈欧也妮·葛朗台吧。”（欧也妮·葛朗台是巴尔扎克的一本小说的女主人公。）对这位《人间喜剧》的作者、现实主义者中的现实主义者、现代自然主义和写实主义之父来说，他的小说人物全是些活人。他在一切可能的场合都把这些人物当成活人来讲，他的幻想产物对他说来就是“现实”。

这样违反常理的对待事物的态度，我们是经常遇到的，固然其中的矛盾并不是到处都如此彰明较著。要说明这种态度和矛盾，也不需要什么深奥的心理学；哲学家们和心理学家们已经对构成这种态度和矛盾的基础的情绪，按一切可能的观点进行了分析。凡是人精神贯注地从事的事物，即便它只是想象的事物，而且他自己也知道是想象的，这种事物对他说来仍旧日益获得现实的性质，直到最后，他的感觉对这种只在想象中是真实的东西和在他身外的现实东西之间的区别混淆起来，或者甚至后者对于他部分上成为“概念”，而前者对于他的感觉和思想却获得了现实的一切属性。这是一种就像歌德用以下的话所描述的精神状态：“我所现有的东西，我看它好像暧昧不定，而消逝了的东西，对我说成为现实。”然而，决不只是诗人、小说家、艺术家，总而言之，在有丰富的空想生活的人们身上我们都可以见到一种癖性：把想象的事物当作真的一般看待。这种癖性是谁也不能完全摆脱的，而且自以为最能超脱它的人往往最不能摆脱它。不管我们相信自己是多么坚强的现实主义者或唯物主义者，我们在严格的自我检查时仍旧会一再发现，只要一离开平淡的日常琐事而转向生活中较深刻的问题，我们就立刻像随便哪一个“唯心主义者”一样地发议论了。那时我们就经常碰上一些论点，涉及的不再是感官可以觉察到、可以加以证实的一些事实，而只是我们的理智的推论，即“理念”，在它的背后我们固然可以揣想到有一个实在，盖然性还相当大，但是却无法加以证明。所以，一切唯物主义毕竟不过是有条件的，承认这一点的人并不是更加接近唯心的思想方式，否认这一点的人却是更加接近它。因为后一种人正是以这一否认表明，对他们来说，推论、想象、虚构就是客观事实。先验的唯心主义者康德，事实上是一个比许多信仰所谓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者的人还要严格得多的实在论者。他为感官经验的世界要求充分的权利，而且他并没有提出超越我们的认识能力以外的“物自体”这一概念——在他之前很久，已经有人用另一些词提出了这一概念——，反而是限制了这一概念，他所划定的界限就在今天从原则上讲也还是未被驳倒的。因为

迄今针对这个界限而发的一切批评只击中了旁枝末节或对这一理论的错误解释。连康德时代以来化学和物理学所取得的重大进展，也只是转移了物质问题，而把问题的解决本身放到实践经验范围以外。物理学家和化学家在今天对“原子”有更多的知识，但是他们并不主张他们目前称作原子的那种东西实际上也是 $\alpha\tau\omicron\mu\omicron\upsilon$ ^① = 不可分的。人们之所以假定它有不可分性，正如假定它的有形性一样，是因为这一性质提供了对已知的物理过程和化学过程的最满意的说明；但是，也有可能作另一种解释，一些有名的自然科学家所主张的动力学理论就是明证，这种理论把原子看成不过是各组相互作用的力在空间上分离的各作用点的力中心。把大多数元素的原子分解成少数几种元素的原子，或者只分解成最轻的元素——氢的原子，乃至最后分解成所谓以太的原子，也没有任何理由不允许我们假定这件事有可能。关于以太，人们知道得确实太少了，它的存在是物理学家觉得因果律促使他们不得作的一个假定。因果律是个逻辑学的定律，它的客观确实性正如同空间和时间的客观确实性一样，是无法证明的，但是也和它一样是不能够否认的，并且是对事物的科学考察所不可缺少的前提，可说是实践理性的一个命令。

总而言之，纯粹的或绝对的唯物主义跟纯粹的或绝对的唯心主义是同样唯心的东西。两者都直截了当地假定思维和存在是同一的，尽管是从不同的方面来假定的。它们的差别说到底不过是措辞而已。相反，近来的唯物主义者原则上也像现代大多数较大的自然科学家一样坚定地采取了康德的立场。^②后一种人大多都避免自称唯物主义者，

① 希腊文，意为不可分，“原子”一词就是由此派生的。——编者注

② 关于前一种人，特别可参照 W. 施特莱克：《宇宙和智慧》，第 14 页及第 15 页，那里表面上固然是对康德辩驳，但实际上完全囿于康德的意见，并且宣称：“我们相信有原子。”在自然科学家当中可以举出《宇宙》的著名的多年老编辑动物学家 Benj. 费特的名字。他在他写的《现代世界观和人》这一著作第 32 页和第 146 页上，坦直地作出一副康德主义者的神气。“力、物质、空间和时间、无限可分性、运动从一个物体传递到另一个物体等等，这一切都是……有几分任意的、或我们的感觉和思维的特性强加给我们的符号和字眼，我们用它们进行计算，借助这些符号和字眼我们也得以和同类至少说有很好的了解，然而却没有把握住它们的原意，而且从来也不能把握住。”（第 32 页）

就某些人来说，这可能仅仅是对流行的偏见的让步；就另一些人来说，我们就不得不认为阻止他们采取唯物主义者这一名称的是或者过去是真正科学上的考虑，因为不管是否有道理，这个名称事实上就是和无条件物质崇拜的观念连在一起的。力这一概念没有连带着同样的偏见，近代物理学家却仍旧认为它有缺陷，抛弃了它而代之以“能”的概念。随着概念区分得更为精细，势必要有新的名称；企图给老名称加上一个新意义，从而使它永存下去，这是最危险不过的事，再也没有比这更能引起误解的了。最后，许多人死抱住“唯物主义”一词不放，究竟也无非是出于把他们和启示宗教的对立尽量表示得鲜明的愿望。另一方面，自从赫胥黎以来就在英国沿用的“不可知论”一词，所表示的与其说是某种确定的理论信念，不如说是一个普遍的思想方式。每一个科学研究者本身就是不可知论者，就是说，他假定事物的终极理由是未被认识的。在近代首先由（如果我没有弄错）赫克尔使用的“一元论”这个名词，既没有这种暧昧性，同样也没有“唯物主义”一词所带有的误解的解释，而且特别就以下一点而论，胜过“唯物主义”和“不可知论”这两个词：无论我们把宇宙的最后本体叫做物质也好，或者别的什么也好，一切合乎逻辑的思考都迫使我们不得不承认它就广延性和生命（“灵魂”）来说是具有单一性的，而且凭经验获得的任何认识与此也不违背。^①离开这个假定，意识的发生恐怕只有借助超自然的作用才可以想象了。

我们且回过来谈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学说原来是纯粹的空想，这是谁也不否认的。这就是说，无论是什么外部的动力促使个人提出社会主义图景或学说，促使群众努力争取社会主义改造，论据却总是纯粹空想上的东西：人们为了这种变更而诉之于基督教精神、正义、平等或者随便哪一个其他的“观念”。

那么我们所说的现代社会主义学说体系（在这里应当指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提出的、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的学说）使这方面有了什么改

^① 参照施特恩的论文《经济唯物主义和自然哲学唯物主义》，载《新时代》，1896—1897年卷第2册，第301页起。

变呢？这一学说把社会主义中的空想结束了吗？有许多人会倾向于对这一问题作肯定回答，而且他们不会因为要提出证据而为难的。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的引论中写道：“据此”，——指据发现，“全部以往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种阶级斗争以各时代的经济状况为根源，“每一时代的社会经济结构，形成真正的基础，而全部上层建筑即法律制度和政治制度，以及宗教的、哲学的和其他的观点，归根到底都应当由这个基础来说明”，有了这个发现，“唯心主义从它的最后的避难所即历史观中被驱逐出去了，一种唯物主义的历史观被提出来了，用人们的存在说明他们的意识，而不是像以往那样用人们的意识说明他们的存在这样一条道路已经找到了。”^①如果说人们还可以把这句话解释成只与对历史等方面的事件的说明有关，那么无论马克思或恩格斯的著作中都不缺乏一些话，这些话是针对上文所阐述的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的各种观念而发的，即针对一切从法权观点或道德观点推论出社会主义的要求的做法、一切承认永恒的道德根本原则的做法而发的。除了《共产党宣言》里的许多话以外，这里还可以从马克思关于《哥达纲领》草案的书信里特别举出下一句话：“我较为详细地一方面谈到‘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另一方面谈到‘平等的权利’和‘公平的分配’，是为了指出这些人犯了多么大的罪，他们……用民主主义者和法国社会主义者所惯用的、凭空想象的关于权利等等的废话，来歪曲那些花费了很大力量才灌输给党而现在已在党内扎了根的现实主义观点。”^②

对空想的排斥看样子无法更严峻了。问题仅仅在于马克思主义是否把这里显然要求的事情在实际上也做到了，而且有办法做到。

首先，有一点很显然，而且马克思对这一点比谁都知道得更清楚，那就是，撇开纯粹本能的反射活动不谈，人不做任何以前在他的头脑里没有想过的事。他在《资本论》里写道，最低劣的建筑师和最优秀的蜜

^①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65页，黑体是伯恩斯坦用的。——编者注

^②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6页。——编者注

蜂的区别就是前者在开始建造房子以前，在他的头脑里已经现成有一幢房子。这里所说的有关建筑师的话（关于蜜蜂的话也许还能加以反驳），对一切为了较近或较远的未来而打算的人类行为都是绝对适用的。这些行为是计划、目的或观念的实现，各依情况而定。不必说，观念可以建筑在非常不同的基础上，可以出于很低级的冲动，或者很高尚的、与私利毫不相干的动机，可以以虚构的或实在的关系为基础——凡是出于头脑而决定我们行动的，永远是一个观念或一系列观念。“（旧唯物主义的）不一贯并不在于承认观念的推动力，而在于没有从这种动力进一步追溯到它的发动原因。”恩格斯在论费尔巴哈的著作中是这样写的。在同一篇论文的另一个地方，恩格斯继续论述。他写道：“外部世界对人的影响表现在人的头脑中，反映在人的头脑中，成为感觉、思想、动机、意志，总之，成为‘理想的意图’，并且以这种形态变成‘理想的力量’。如果一个人只是由于他追求‘理想的意图’并承认‘理想的力量’对他的影响，就成了唯心主义者，那么任何一个发育稍稍正常的人都是天生的唯心主义者了，怎么还会有唯物主义者呢？”^①

这里不是详细讨论结尾的这一问题的地方。我们不如只牢牢抓住一件事实，即在这段话里把承认“观念力量”对他的行为具有一种影响称作完全正常的事。区别观念之流的影响是可以还是不可以容许时所依据的判断标准还要更深远一些，在于这个观念之流本身。

被历史唯物主义承认为社会主义运动的正当原动力的“观念力量”是什么东西呢？

首先，显然是利益。把利益说成是观念因素，乍一看确实可能显得像是一种概念游戏。但是，第一，利益要作为参加某个运动的刺激，必须是一种被认识了的利益，个人必须有一个关于他的利益的“观念”，才能决定采取符合这一利益的行动；第二，我们所指的确实也已经是一种经过中介的、不是直截了当地和个人的自我连在一起的利益。那是一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2页。——编者注

种甚至超乎职业部门利益之上的利益，它是阶级的利益，为确保这种利益，在许多方面需要至少暂时牺牲个人的利益。^①所以马克思社会主义所假定的利益，从一开始就具有了一种社会的或伦理的因素，在相当程度上不但是理智上的利益，而且是道德上的利益，因而它也固有一种道德意义的观念性。

社会主义所依赖的第二种“观念力量”在上文中已经提到了；那就是认识。认识是“观念性的”，认识怎么会是“观念性的”，这都是显而易见的；但是问题涉及的也不仅是单纯的一般认识能力，而且一种完全确定的认识，即接受关于国家、社会、经济、历史的一定的“观念”。我们按照这种意义来谈“无产阶级的”观念，在我们的文献中时时把事情说成这样：似乎这种观念不仅为文明国家中一大部分工人所接受，而且似乎它们根本就是现代工人阶级的智慧的固有产物。但是这种说法充其量也不过是一种比喻，是实际事件在观念中的改写。从巴贝夫到马克思和拉萨尔，在社会主义学说史上仅仅出现了两个属于工人阶级的具有较大的创造天赋的人：蒲鲁东和魏特林。前者在《共产党宣言》里被列为“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后者在今天只不过是个历史古董。圣西门、傅立叶、欧文被恩格斯称为由他和马克思制定的那一学说的社会主义先驱者，他们和马克思与恩格斯两人本人一样，都不是从工人阶级出身的。尽管这件事本身是非常次要的，但是因为上述的比喻性说法同“科学”一词在现代社会主义方面的一个惹起很大误解的应用大体上是相符合的，所以这一点必须强调。人们是以这种方式来谈到“科学的社会主义”的：仿佛在这方面所说的科学是某种已经十分圆满的、完成了的东西。但是实际上这个用语所包含的除了限制以外还有一个要求，或

① “到耕农作为阶级出现，有着自己的要求，而且有足够的力量贯彻这些要求时，他们的绝大多数人必定不再感觉自己是个‘个人’甚或‘唯一的人’，是‘单独的自我’了。——唯一性骑士或独特性骑士……在一定的时刻以政治上的或经济上的骗子的姿态出现。”（《无政府主义的社会学说》，史提尔纳的文章，《新时代》1891—1892年卷，第1册，第427—428页）

者说还连带着一个要求。每一门科学作为科学，必然是“不可知论的”；只要一门科学不是像语言学的某些分支那样只涉及界限明确的材料，那么这门科学就决不能把它的结果看成最后的。所以恩格斯在他的著作《社会主义的发展……》第二节的末尾，毕竟把社会主义描述成“一门科学，现在首先要做的是对这门科学的一切细节和联系作进一步的探讨。”^①

这一点时常被人忽视。而且还忽视了一切科学作为科学都要求高度的大公无私精神。我所以特地讲“高度的”，是因为绝对的大公无私是不可能有的事，而社会科学又是最不能抛开一切信念来研究的。但是社会科学要求不带先入为主的判断来考察事实，马克思在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序言里强调了这一点，他说，在科学的大门口必须提出以下要求：

“Qui si convien lasciare ogni sospetto

Ogni vilt à convien che qui sia morta.”^②

但是，能不能说至少“无产阶级的观念”本身，即关于国家、社会、经济、历史的社会主义的见解，是完全不带空想的呢？根本不是。这些观念在倾向上是现实主义的，那就是说，第一先注意人类社会发展中的物质因素，但是它们同时也是思想反射，是建立在对已经查明的事实的思想

①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40页。——编者注

② 译文：

“这里必须抛弃一切疑惧，
这里要埋葬掉各种卑鄙。”

（但丁：《神曲》）

社会主义这种科学和社会民主党这个战斗政党的使命是不同的。社会民主党作为一定利益的保护者，在某个限度以内可以是教条的，甚至是不容异己的。它的有关行动的决议，在它自己没有取消或更改这决议以前，是被认为有约束力的。它的纲领中确定党的性质和意图的那些条款也是一样。但是不言而喻，它只能为它的科学假定要求得到有条件的承认，因为科学研究应当力争作为开路先锋走在党的前面，而不应当在他的后卫里跟着前进。说这是不言而喻，并不是为专门从事研究工作的人要求特殊地位。按这里所阐明的意义，每一个对运动的理论基础进行研究的人都是研究者。

想概括之上的推论，因此势必要带空想的色彩。如果说关于历史唯物主义 的辩论弄清了一件事，那就是下一事实：正像考茨基在他的《唯物主义历史观要作出什么成果，能作出什么成果》一文中所确认的那样，有待说明的现象复杂万端，使一个人简直不可能认识它的一切方面。任何人都不能设想一个外部世界的完全精确的图像。所以也没有任何一种社会学说能把社会生活的全部细节都照顾到；尽管作了种种概括，必然要剩下一部分未加考虑。人们研究什么因素最后决定社会生活，却并不隐讳，在这个“最后”的深处还可以潜藏着许多变更。确实，人们往往把这个“最后”看得太容易了。

不过，我们且往下看。马克思的理论把现代工业中的工人看成社会主义的实际的担当者、可能的担当者。在工厂里，机器消除了旧式手工工业的差别，使工人们日益处在同一水平上；工人的经济状况、工人在工厂中的地位，可说必然地使他产生一种思想和意图，这种思想和意图概括起来便是社会主义。从一般历史的广义上讲，这一点的正确也是无可争辩的。这方面的征象、在这个方向上的趋势，到处都可以追寻。然而，现实和按照这种推理来说现实应表现的景象是多么不同啊！几乎在所有国家，长时期构成社会主义运动的坚强骨干和积极分子的，并不是最先进的工业中的工人，而是比较落后的或辅助工业及中间工业里的工人。雪茄工人、木匠、鞋匠、裁缝、纺织工业的小工匠和家庭工人、装订工人等等，几十年来在德国构成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基干。人们把这种情况的原因时而归于工厂工人的精神水平低下，时而归于他们的窘迫的处境。但是，在今天的英国，工厂工人在政治上决不处于从属地位，而从物质条件上讲，情况也完全不比中小型工业里的工人差，然而在英国也几乎普遍是由中小型工业里的工人提供社会主义的核心部队。还有其他一些乍看来不能明了的情况即所谓的“不可衡量的影响”，对工人的精神素质也起着作用。所以“同等水平化”决不是已经以原来所预测的那种规模在现代工厂中发生了。相反，正是在最先进的工厂工业里，经常见到工人分化成整个一个等级组织，因之在不同的工

人集团之间也只有一种有限的团结感。

二

然而，工人的生活并不是只限于在工厂中或在工作场所，越不是只限于在这两种地方，工厂外的生活状况对他的思想方式起的影响越大。英国的较短的工作日加上在英国非常普及的小屋住宅制的改良，大大妨害了集体主义感，这样讲并不过分，而且完全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思想。我跟英国工人所进行的谈话给我提供了许多这方面的例证。在对英国工人的党的事业和社会思想方式起反作用的许多“不可衡量的”、然而并不因此就没有作用的情况当中，有一项情况即在英国体育运动极为流行，而且民主化了。在别的国家，参加赛马运动的基本上是限定的一些国民阶级，而在英国，赛马在各阶级的国民中都有广大观众。不过，饲养竞赛用的马却是有产者的特权。撇开那些由于职业或其他方面业务上的关系而关心赛马的人不谈，在多数情况，赖以对赛马保持兴趣的是赌赛的欲望，也就是说赌博的欲望，因此把“民主”一词跟赛马联系起来，可能显得是一种误用。但是对板球比赛，却可以毫不犹豫地使用这个词，而对足球比赛，可以更进一步这样讲。这两项运动带有一种完全民族的和民主的性质，在它们的表现上常常使党派矛盾和阶级矛盾泯没下去。各阶层的人像整个民族大移动似地会合在这两种运动的每年一度的大竞赛会上，或许在任何地方也不比在英国中部的各工业郡区人们参加得更普遍了，那些郡区的竞赛大会从普遍参加这一点来讲，已经屡屡可以和奥林匹克大会相比了。^①

^① 如所周知，除了板球和足球以外，最近还加上了自行车比赛，和前二者起了同样的作用。但是，自行车已是国际流行了，它似乎还保留着一种特殊的社会政策上的影响。自行车使乡村和城市有了多大程度的联络，社会主义宣传鼓动的义勇军是讲得出来的。在英国，平地的人口一向在不可遏止地减少着，现在乡间到处兴起了旅馆及其他为骑自行车人而开设的商店，繁荣发达、日益增多，因而在乡间提供了种种新的谋生手段。预计自行车将普及化和廉价化，这还会更加促进这种发展。

甚至牛津和剑桥这两所古老的公立大学所带有的依然很重的贵族性质，也丝毫不妨碍每年春季半个英国都去注意这两个大学参加游艇竞赛的学生选手每天练习的消息，并且渴望知道究竟是浅蓝队还是深蓝队^①取得了胜利。有多少德国工人会对譬如说莱比锡大学 11 个学生和柏林大学 11 个学生之间的划船比赛感兴趣呢？除了当地人以外，至多只有那些自己致力于划船比赛的人。在英国这种限制消除了。有一家流传范围很广的体育报可以证明大家对体育运动有共同兴趣，这种兴趣往往使其他各方面的矛盾丧失其尖锐性。

正如英国人对体育运动的训练有素的趣味是一种在历史上一代一代传下来的特质，同样还有许多历史影响，调和了或者说“篡改”了生产关系对工人的思想和行动的影响。属于这种历史影响的，特别是该国的政治发展史，该国的党派的性质和历史，在很大程度上还有它的宗教团体的性质和历史。

因此，真正的工人总是需要在一定时间内有一种抽象能力，直到他完全习惯于理论所假定的那种无产者的思想方式，因为这种思想方式把他难免受到其影响的所有那些地域的或民族的特异性以及历史影响都抽除了。真正的工人比其他社会阶级的人要容易接受这种思想方式，因为这种思想方式正和他的阶级地位是相应的，但是这种思想方式并不单纯就是他的生活境况的产物，而是由现代各个文明国家的工人所共有的生活境况特征的概括中，也只是由那种概括中派生出来的。因此，以这种思想方式为基础推出的关于国家、社会、党派等的观念，必然还常常和未受到理论影响的工人对这些事物所抱的观念不同。所以，我们所谓的“无产阶级观点”对无产阶级本身说来首先是一种空论。

现在选一个具体实例讲一讲。为工资而劳动的工人受着企业主的剥削，这一点在今天我们觉得是当然的无产阶级观点。但是事实上需要经过相当长的一段发展，工人自己才会有这样的看法。起初工业劳

① 依传统惯例，牛津队穿深蓝色运动衣，剑桥队穿浅蓝色运动衣。——编者注

劳动者只在以平常的工资要求他做超过平常的工作、或者让他做平均的工作量而付给他异常低的工资时，他才觉得受到剥削。如果他得到的工资足以使他能够按照本阶级的传统的生活要求过一个适可的生活，这个工资和他的劳动产品的价格成什么比例，他倒不大在意，他的雇主的财富日益增长在他看来完全是合法的。^①即使他觉得财产的不平均分配是不公道的，他的正义感也觉得这没有什么可指责的地方。贫富之间的一般矛盾比雇佣主人与雇佣劳动者之间的特殊矛盾对他的感情的影响要强。

这一点向我们指出了第三种对社会主义来说是重要的空想因素，即道德意识或法权观念。这样我们就接触到了真正的论争点，因为利益作为原动力、认识作为主导力量的重要性在原则上是谁也不否认的，然而关于道德意识在社会民主党的斗争中的重要性，现代社会主义的文献中表现出一些彼此非常矛盾的说法。

《共产党宣言》以及属于起草它的时期中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看起来对这个问题抱完全否定的态度，几乎可以说，和施提尔纳抱同样否定的态度，只不过是用“无产阶级或无产者的党”代替了施提尔纳的“我”。不必歪曲逻辑，人们也可以从《共产党宣言》、《哲学的贫困》等的不同段落里推出类似的实际结论，就像后来巴枯宁所得出的结论一样。但是，甚至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后期的著作中也直截了当地避免了直接诉诸道德动机。结果，魏尔纳·桑巴特教授就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反伦理的倾向”称作是它的特异的标记，我们认为“反伦理的倾向”是一个选择得不太恰当的说法（因为“反伦理的”一词首先引起人的这种观念：好像应该把伦理一概取消似的），但是这个说法按桑巴特

^① 在英国，工人阶级简直不带抽象思想的倾向，在他们之间，“A fair day's wage for a fair day's work”〔一天的公平劳动，得一天的公平工资〕这一口号，毕竟比“充分劳动所得的权利”的思想要根深蒂固得多。工业区里的一个以“fair employer”〔公平的雇主〕闻名的资本主义企业主仍然是一个在工人中得人心的议员候选人——就像最近巴恩斯莱（约克郡）的选举所表现的情况——尽管跟他对峙的是一个工会代表。

所指的意义来讲，即把它当作反对从伦理原则推出社会主义这种作法的名称，实际上是完全正确的。在马克思的理论中，没有一个地方是倚仗（作为基础力量的）伦理的。

恰恰相反。三番五次地提及伦理，其目的只是为了去证明它的不足。在《资本论》里，把商品劳动力的买卖（在这种买卖中，工人“像在市场上出卖了自己的皮一样”^①）称作是这样一种行为：在那里“占统治地位的只是自由、平等、所有权和边沁^②”，并且关于在这种买卖上劳动力能够生产多于其（买者所花的）维持费这一点，说过这“对买者是一种特别的幸运，对卖者也决不是不公平”。^③马克思在关于《哥达纲领》草案的信中，针对“公平分配劳动所得”的要求说，今天的劳动所得的分配“难道它事实上不是在现今的生产方式基础上唯一‘公平的’分配吗？”^④恩格斯在《哲学的贫困》德文版的序言中宣称，由工人从工资中没有得到他付出的劳动的等值这一事实推出共产主义的要求，就经济形式说，这种应用是错误的，因为它不过是将道义运用于经济而已^⑤。类似的以及更为激烈的地方，在《反杜林论》和关于住宅问题的论文中都见得到。

可是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跟这种理论上的否定态度有着显然不可调和的矛盾。谁也无法否认，《资本论》中充满以道德判断为基础的用语。把雇佣关系称作一种剥削关系，就假定了道德判断，因为若谈到刻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剥削这个概念总是包含着不正当的侵占的污点、榨取

① 见《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05页。——编者注

② 在这里“边沁”指英国的法哲学家边沁所主张的意见，即按明智方式行使的私自利是公共福利、公共利益最有效的杠杆。正如斯图亚特·密尔所说的，边沁把他的利己主义哲学跟一种异常强的道德感情和儿童心理联结起来。这和罗伯特·欧文关于他和边沁的会见所讲的话是一致的。

③ 同前书第226页，黑体是伯恩施坦用的。——编者注

④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1版，第18页。——编者注

⑤ 《哲学的贫困》，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5页，黑体是伯恩施坦用的。——编者注

的污点。但是在公认的通俗化作品中，顺手就给剩余价值打上欺诈、盗窃或掠夺的烙印。资本主义的企业主即使是一个公道的（“fair”）雇主，也显得是他不应分的剩余价值的侵占者，工人哪怕他属于他的阶级中工资最多的阶层，也显得被扣除了一部分他所应得的东西。偶尔的确还要再补充一点：前者个人不应当为这种侵占而受到非难，他只是在做并非他所造成的势态下他有权做的事。但是恰恰在这个原谅中就包含着一种想法：侵占剩余价值根本是一件不正当的事。剩余价值学说的经济客观性毕竟只是对抽象研究才存在的。这个学说只要一付诸应用，它反倒立刻就显出是一个伦理问题，而群众也始终是从道德上去理解它的。^①关于这一点，恩格斯在上面所引的《哲学的贫困》序言中的那句话之后说道：“如果群众的道德感宣布某一经济事实为不公平，如当年对于奴隶制或农奴制那样，这就证明这个事实本身已经过时，而另一些经济事实已经出现了，由于这种情况，那原来的事实已经变成不能忍受和不能维持的了。”^②这句话承认群众的道德判断关于经济事实的历史理由有一种证明力，许多主张唯心主义理论的人对这种证明力是会表示满意的，然而这也不过是授予群众的道德判断一种本身没有原动力的指示器的职能而已。^③

① 后半句话也适用于全部劳动价值说。效用（边际效用）价值说的信奉者对劳动价值说所提出的批评，捍卫劳动价值说的许多社会主义者完全是从道德上去对待它的，这就是说，靠一种别无动机的大发道德激愤的方式来反驳它的。他们看效用价值说只有一个企图，即企图模糊剩余价值在道德上是成问题的。反之，劳动价值说只因为它揭露剩余价值，所以才遭到现存社会制度的许多保卫者的反对。这一点特别表现在：劳动价值说大多在理论的真正弱点上被不经心地忽略过去，而沉溺在关于工人与资本家的职能及其效用的考察中。

② 《哲学的贫困》，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5页。——编者注

③ 《资本论》第1卷里下列的话对判断这里所讨论的问题是非常重要的，同时对判断马克思的价值说也有极大的意义：“价值表现的秘密，即一切劳动由于而且只是由于都是一般人类劳动而具有的等同性和同等意义，只有在人类平等概念已经成为国民的牢固的成见的时候，才能揭示出来。”《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75页。黑体是伯恩施坦用的。——编者注

马克思在以上所引的段落里继续论述：而这只有在这样的社会里才有可能，在那

但是，如果我们更详细地来看，给我们自己提出如下问题：为什么今天有这么多人把剩余价值被资本家所侵占这个经济事实说成是不正当的，那么我们就发现对唯心主义或空想的其他让步。

群众原来并不知道剩余价值的事实，它被资本主义经济的机构隐蔽住，使群众看不见它。工场手工业时期或更早的时代的社会主义著述家能够提出导致剩余价值学说的原理，是因为他们那个时代的经济机构简单而明了的缘故。在近代，首先是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理论家们，随着对测定商品价值的研究，也接触到“商品”劳动力的价值问题，于是为这样一种见解开辟了道路：工人的工资跟工作量的价值有些出入，永远比后者要少。反之，剩余劳动的事实工人向来是知道的。如果说他在原则上没有反抗过它，在实践上也常常进行了充分的有条件反抗，这就是说，他没有反抗剩余劳动的事实，而只是反抗了剩余劳动的程度。剩余劳动这件事本身还不存在有追求改变生产方式的刺激。剩余价值的情况就不同了。如果工人知道了他们从工资中决得不到他的工作量的价值，随之就会直接激起他的天生的正义感，因为在价值概念中包含着一种道德因素，一种平等的观念和公平的观念。在情绪上对侵占剩余价值的反抗，其最切近真实的说明就在这里。这种反抗无疑可以同时是雇佣劳动制衰朽的表现或是其产物。但是它并不必须是这样。这种制度是衰朽的，这一点在六十年前仅是一个假定，或者也不妨说是一个预料，然而在英国工人当中废除它的要求还是非常强的。在群众的道德意识中，依情况不同存在着或多或少仿佛是一种经济发展的征

里，商品形式成为劳动产品的一般形式，从而人们彼此作为商品占有者的关系成为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关系。亚里士多德在商品的价值表现中发现了等同关系，正是在这里闪耀出他的天才的光辉。只是他所处的社会的历史限制，使他不能发现这个等同关系“实际上”是什么。（参看同书第75页。——编者注）和这种主张相反的有亚里士多德的如下一段话，这段话被马克思忽略了：“建筑师的劳动和技术超过鞋匠多少倍，就必须为一所房子酬报多少双鞋。没有这种事情，就不可能有交易，因而也不可能有社会结合。”（《尼寇马可斯伦理学》，A. 封·文克施特恩《马克思》一书第148页所引用）。在这里就是一个实例，说明意识形态对当时的经济形态的依存关系是多么容易被渲染夸大。

兆。道德概念比这种发展要持久，而在一定程度上——正因为道德概念较为保守——也与这种发展无关。这一点特别也适用于正义概念，比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它的承认更甚一层。^①

要知道正义就在今天也还是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一个极强大的动力，的确如果没有道义上的动力就根本不会出现任何持久的群众行动。有一个常常被确认的事实，即社会主义运动中最活跃的分子到处都是由工人阶级的或其他居民阶级的这样一些阶层中来的，借用一句流行的熟语来说，这些阶层是“最不缺什么的”。按照大家知道的计算法，这些人在对现有的社会收入进行平均分配的情况下首先恐怕还要遭受损失。把他们吸引到社会主义这里来的是争取一个更可取的、更公正的社会制度的意图；我们如果仔细地加以研究，十回有九回要发现，更公

^① 针对马克思所说的现今对产品的分配是“在现今的生产方式基础上唯一‘公平的’分配”这句话，Ph. 洛特玛尔在他写的论公平的极有益的论文中表示，马克思讲的“公平的”指的只是“合法的”或“按照法律的”。洛特玛尔接受亚里士多德关于“公平”的见解，即公平就是按比例地平等；从这种见解的立场出发，此种分配仍可能是不公平的。贝尼狄托·柯罗齐在他的《对马克思主义的若干概念的说明和批评》（《社会发展》，1898年2月及3月号）一文中宣称，马克思主义对道德发展的条件所作的一般说明尽管非常正确，而关于道德问题的专门论述有不少地方却有争论余地。他写道，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来都不是道德哲学家，而他们的伟大智力花费在这一问题上的也不多。……事实上，按照马克思的见解来写认识论是完全可能的，按照马克思的见解来写伦理学的原则，依我看总是一件绝对没有希望的事。”（《社会发展》，第246—247页）人们对此满可以同意。马克思和恩格斯向来总是在对敌派观点的批判中只以辩论方式来谈道德问题的，所以关于道德方面，他们的消极说法占主要地位——关于不是道德的事物的讨论。在对主题的这种纯辩论性的处理中，不可避免有时候会做得过火。尽管如此，最后恩格斯在《反社林论》中还是承认了，迄今的社会发展给我们带来了道德的进步——在那句话里包含着一个让步，即存在着一个与历史情况无关的道德标准供我们考察——而马克思在国际章程中采用了如下一个条款：国际的成员们彼此之间和对他们的同类，遵守“真理、法律和道德”。

因为我谈到了柯罗齐的文章，这里我不得不再提到另一些出色的论述，在那些论述中柯罗齐和安东尼奥·拉布里奥拉一致，攻击那种以科学这一概念结合着社会主义所进行的捣乱。拉布里奥拉建议，为了制止这种捣乱，不要讲“科学的社会主义”而讲“批判的共产主义”。在我收到柯罗齐的文章的末尾部分以前，我在本文第一部分中关于这一点的论述已经印出来了。否则，我是会仅限于照录他的有关论述的。

正的社会制度在这一方面占据首位。我们根本不必把这个动力理想化，因为连嫉妒也常常是要求正义的一个根源，但是不管动力是出于高尚的还是卑鄙的动机，它总不失为一个空想的因素。

人们当然遵守明白的纲领：由作为阶级组织起来的无产者夺取政权，剥夺资本家，生产资料和生产的社会化，于是人们就认为这一来一切空想都排除了。这些确实都是非常具体、现实的事情。但是实践表明，无论人们把这事想象得如何现实，它仍旧并不因此就不带相当大分量的空想。

我们就拿“作为阶级组织起来的无产者”来说吧，需要先有多少空想，工人才感觉自己是无产者啊！有多少工人到今天还远远做不到这一点，而且并不是由于无知。恰恰在最先进的国家中，这种人的数目非常大。精确地规定“无产阶级”这一概念，根本不是那么容易的事。为工资而劳动的人这一部类，在收入状况和生活状况方面呈现出异常大的差别。固然可以为各种等级的工人找出某些共同的要求和利益，可是仍旧不能由此做到使维护这些要求和利益的热望以同样的强度和力量表现出来。无产阶级作为雇佣工人的整体是一个现实，无产阶级作为按一致看法而行动的阶级，甚至在德国在很大程度上还是虚构。

生产资料的社会化应当主要是由这种无产阶级来实行的。谁要是不像法国歌谣里所说的那么天真地想象这件事：

“工人们，夺取机器吧，
农民们，夺取土地吧——”

他满会对自己说，这种社会化必然是一个比较长的过程，因为涉及的各种工业对于社会化来说，成熟和适宜的程度是大不相同的。假定譬如说突然之间剥夺了所有的资本家，这也就等于假定，在同一瞬间所有的工人不再是理论意义上的无产者，并且面临着丧失那种道义上的推动力的危险，这一推动力是使那同资本主义的特有对立在他们中间成熟起来的。这不但不会使生产社会化的问题简单化，反而使它无限地复杂化了。但是实践决不会让事情落到这步田地。社会民主党今天所进

行的那种斗争对这一点也留意到了。

人类的历史早已不再按这种简单方式进行了，即把一切发展趋势在实际上都推到最后极端。这可以用一个实例来说明：工业中的童工问题。

在两代以前，对童工几乎没有限制。工厂中雇用的童工的数目增长得异常迅速，又因为妇女的工业劳动增长得也并不较慢，所以看起来好像在工业界到处要把全家都收进工厂劳动里面。如果这一发展大体上无阻碍地向前进行，必然的结果一定是完全取消旧的、而形成一种新的家庭形式以及两性的共同生活。马克思和恩格斯按照罗伯特·欧文的榜样这样来推测。还在论《哥达纲领》草案的信里，马克思就结合早招收儿童参加生产的革命意义声明反对普遍禁止工业中的童工的要求。不过，各社会主义党派本身却和资产阶级的博爱主义者、教育赞助者一致，也不断地促进了提高儿童从事工业劳动的年龄限制，在大多数国家也已经实行工厂不招收 13 岁到 14 岁以下的儿童的措施，今天努力的目标是把年龄限制提高到满 15 周岁或 16 周岁。那么显然，这一来儿童重新又属于旧意义的，而且暂时这种家庭本身也得救了。^①各地方的工人在议会内外所争取的缩短劳动时间，首先也在这个方向上起着作用。总之，虽然资本主义的“自然”趋势是走向家庭革命化的，而革命的工人政党本身则迫于当前的需要，为争取对抗这种革命的措施而斗争。因此，不管在这方面未来的事态局面如何——其他因素确实仍然对削弱旧式家庭生活起着影响——反正没有发生当时从理论上所预见的和假定的那种事情的极端化。

这只是一个实例，但是人们只需要睁大眼睛正面观察社会生活事实，还会碰上许多以同样方式与理论上的假定背道而驰的现象，然而却并不因此就表明理论的基本思想是错误的。理论并不能预见一切事情，它只能断定趋势。但是实践决不容许趋势以十分纯粹的形式贯彻

^① 英国今天在重要的工业里——例如在棉纺工业中——女工和男工比较起来还是落后的，那就是说，女工即使在绝对数字上超过男工，但是比男工增长得缓慢。

坦和唯物主义》一文^①中指责我一般地对哲学严重无知，而特别地对恩格斯的哲学严重无知。该文中的一切主张都是与我的论题不相干的，不相干的程度只有他的毫无根据的傲慢自负胜得过它，而作者却以这种主张来反对我和康拉德·施米特。这位激怒的批评者并不仔细考察我的研究的真正主题，他的攻击针对的是我在文中插入的一两处哲学方面的提示，特别是我说“回到康德去！”这一口号在一定程度上对社会主义理论也有资格讲。由于一些在这里讨论起来将会牵涉得太远的理由，我把对普列汉诺夫发泄的论调的答复交付给康拉德·施米特去作，因为他究竟也以正当而又中肯的方式注意了这些论调。在我这方面我只能说，如果还需要有一个具体证据使我坚信上文所阐述的意见，那么普列汉诺夫在该文及其后续文章中就提供了这种证据。

发表于1898年6月15日。选自马元德、严隽旭、彭金安、蔡升译《社会主义的历史和理论》，东方出版社1989年版，第224—246页

① 《新时代》，1897—1898年卷，第2册，第545页。

给奥古斯特·倍倍尔的信

(1898年10月20日)

请原谅写得太长，不过这信是给你们大家的。

1898年10月20日于伦敦东
南区路易镇绿荫巷146号

亲爱的奥古斯特：

今天收到你的来信^①，非常感谢。信写得诚恳、明确。虽然没有用粗暴的话，但的确是十分坦率地使我明白你们真心实意地认为，由于我现在的观点，我不能再当党员了。出于爱护，你们也许能容忍我，但是你们宁可要我或是回心转意，或是根据我的思想变化自己作出决定。

我决不会认为你们这样做是对我有什么恶意，这难道还需要对你说吗？你们是遵照你们的真诚信念办事的，而且尽管这样一种分手很不好受，但是这可还不是我们之间可能发生的最坏的事。口是心非的态度以及随之而来的不可避免的摩擦和误解，要比这坏得多。现在已经是，不管我写什么东西，你们都要误解。我的那篇谈英国关于选举策

① 指1898年10月16日倍倍尔给伯恩斯坦的信。见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室编《德国社会民主党关于伯恩斯坦问题的争论》1981年三联书店版第59—63页。——编者注

略的辩论的文章根本没有倾向性，纯粹是客观的评论。你却从其中看出我在推荐某种策略——我不知道是哪一种——并且声言那种策略是错误的。我没有想到要在我论述夺取政权问题的文章里攻击德国党，有关奥地利的说法是针对累德堡及其同伙的方针的。事实上，德国党是相当经常地、或者不如说是一贯地实行机会主义的，而且它的政策不管怎样总是比口头上说的要正确得多。因此我也一点不想去改变党的实际政策（次要之点不算，在这些方面我们之间确是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不同意见），我所努力追求的，而且——用一次你们加在我身上的词——我作为理论家也必须努力追求的，是理论和实际、言语和行动的一致。二元论在平常时期是可以强词夺理的手段（我使用这个词并无恶意，我自己也常常强词夺理，而且有些时候不强词夺理就无法了结）来对付过去的，但是在任何一种紧张的形势下，二元论都将是危险的。

你责备我的“变化”。我一开始就不得不说，你对我的评论实在是很错误的。首先，我在柏林时不是杜林分子。我个人偏袒过杜林这个社会主义者，但是我从来没有同意过杜林体系。不过我根本不认为我没有这样做是我的光荣，相反，我认为这件事证明了我那时候的理论见解是多么贫乏，我的思想方法是多么肤浅。很自然，像我们当中的大多数人一样，我曾经是个折衷主义者，是个有社会主义倾向的激进民主主义者。

我和赫希柏格^①在一起时也没有变成赫希柏格分子。远非如此，我在洛加诺的时候就已经是马克思主义者了。我只是偶然地参加了赫希柏格—施拉姆^②文章的写作，这篇文章是施拉姆—赫希柏格和库尔

① 卡尔·赫希柏格——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改良主义者和伦理社会主义者。——编者注

② 卡尔·奥古斯特·施拉姆——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改良主义者，《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回顾》一文的作者之一，该文曾受到马克思恩格斯的严厉批判。——编者注

蒂^①讨论的，当赫希柏格问我是否也觉得过去的鼓动方式有可以指责的地方时，那篇文章已经写成了。我说，我讨厌哈赛尔曼对工人阿谀奉承（我现在仍旧讨厌它，有一些文人太善于模仿这种作风了），于是在赫希柏格的催促下，我写了二十多行。这就是我对这篇文章的全部贡献。

你会记起来，那时我对恩格斯针对这篇文章的通告信的答复是和施拉姆—赫希柏格以及福尔马尔完全不同的。而且早在通告信发出以前很久，我就逼着赫希柏格到伦敦去求得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谅解。1880年7月赫希柏格的伦敦之行是我的成绩，幸好我还有一封赫希柏格的信来证明这件事。这次访问没有成功，一方面是因为恩格斯对赫希柏格大发脾气，另一方面是由于赫希柏格和恩格斯的理解方式根本上是对立的。

可见，我并不是在伦敦、或者说从1880年那一次到伦敦起才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同样，我也并不是在伦敦或是在恩格斯逝世以后才改变我的观点的。我请你读一下我发表在最后几年的《社会民主党人报》上的文章，特别是连载于1890年第15、18和21期上的那篇《暗礁》^②、25期上那篇《略谈策略问题》以及36期上给一篇丹麦来稿写的后记，还有同期的《社会民主党人报》社论，你将会发现，我绝不像你们所认为的那样是突然发生变化的。这次脱毛^③是很长时期发展的结果，或者不如说，经过很长时期我才充分地认识到，这次脱毛不仅涉及个别问题，而且涉及马克思主义的基础。直到两年前，我还是竭力通过“拉长”马克思的学说来使它与实践一致起来。当我一年半以前在费边社作题为“马克思究竟教导了什么”的演讲时，我才完全明白那种

① 特奥多尔·库尔蒂——《苏黎世邮报》主编之一。——编者注

② 参看本书第一篇《社会民主党在议会中的地位》。——编者注

③ “脱毛”一词是用鸟类脱去旧羽毛而代之以新生羽毛的过程来比喻科学家迅速赶上新的观点。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借用了这一比喻。19世纪末，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常用这一词来形容观点上的重大变化。——编者注

设想是不可能的。这件事是很说明问题的，而且也是可以理解的。我还存着演讲的底稿，那是一次可以引以为戒的、善意的“援助尝试”。我想帮助马克思，想说明，他所说过的一切都已经发生了，而一切没有发生的，也是他曾经说过不会发生的。但是，当我完成这个作品去作演讲的时候，我的头脑里闪过一个念头：你歪曲了马克思，你所讲的不是马克思。机智的费边社社员休伯特·布兰德^①在演讲结束后向我提了几个善意的问题，我仍然照老一套回答了，但是这几个问题给了我很大刺激。我悄悄地对自己说：这样下去不行。想调和不能调和的东西是徒劳的。需要做的毋宁说是弄清楚，哪些方面马克思仍然是正确的和哪些方面他是不正确的。要为纪念马克思做点事，最好是丢掉他的不正确的东西，而不要把他的理论拉长到可以证明一切，因为这样一来它就什么也不能证明了。而我以前采取了后一种做法，还有许多人今天仍旧在这样做。我一定还要公开发表这一观点，因此在这里就不谈了。

不管怎么说，上面讲的已经证明，我的思想发展并不像你们想象的那样。照你们的说法，我肯定是可怜巴巴地毫无主见，奴隶般地顺从我的环境，但我根本不是这样。应当说正好倒过来。我不管在形式上怎样迁就，思想上是一贯反抗环境的压力的。这是顺便说说。

说实在的，这件事真是滑稽，你们大家现在都责备我说：你透过英国的眼镜来评论德国。可是英国的眼镜却是我所“背叛”的党的官方教义的基础。教义是以英国为根据的，直到今天它还从英国援引证据，如果你们夺去了它的这一基础，你们必须给它一个新的基础。

你不能说你们不是这个意思，你们不过是说我用英国目前的情况作为判断德国形势的标准，并且忽略了英国和德国发展之间的巨大差别。对于这点，我的回答是：你们想把我看成什么都请便，但是休想把我当成白痴。我确实还没有英国化到看不出今天的德国和今天的英国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别的地步，我曾对自己说，由于这种差别，发展不可

① 休伯特·布兰德（1856—1914）——英国费边社创始人之一。——编者注

能是平行的。我并不是根据英国的统计，而是根据德国的统计得出我反对崩溃论的论据的。我还将向你们提供证据，证明有产者的数目不仅是在英国，而且是在所有现代国家中都不断地增长。只要把马克思在他的研究过程中附带提到的某些原理继续发展下去，也可以从马克思那里推引出这一证明。不要忘记，《资本论》尽管科学性很强，但归根结底是一部倾向性著作，而且是没有完成的。我认为没有完成的原因在于，科学性和倾向性之间的矛盾使这一任务对于马克思来说变得愈来愈困难了。从这方面来说，这部伟大著作的命运几乎是象征性的，并且无论如何是应当引以为戒的。

如果不久的将来某种事件使社会民主党掌握了政权，那时我们的理论假设和实际生活之间的巨大差别便将充分显露，而隐藏在“由社会占有生产资料”这个原理背后的严重错误就将暴露：由于把法国革命的手段这样搬到现代社会而产生了观点上的混乱，今天把仆役头儿和放牛娃、簿记员和仆人、技工和小工混为一谈，把他们一概算作统一的一群“无产阶级”，这是对这一群人的真正性质的错误认识，不过我宁愿说，这是忘记了这群人的真正性质。正如过去不存在一个统一的民族或是一个统一的第三等级一样，现在不存在一个统一的无产阶级。他们只是统一在一定的对立之中和一定的压力之下。压力愈减轻，他们在行动上的差别就愈大，因此最荒谬莫过于设想，在一次革命中会有1500万被帕尔乌斯算成“无产阶级”的人统一行动。另一方面，在一次革命中也确实不可能有选择和有步骤地进行剥夺。那时一切都是原始力量在推动，谈不上对生产的无政府状态进行有意识、有计划的干预。那时的情况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违背“从必然到自由的飞跃”的。

由此可见，要是有一批文人今天用过头话在工人中唤起或培养仿佛我们面临这么一种灾变的观念，并且把他们没有估计在内的一切事情都看成小资产阶级的微不足道的事，这样他们自己就承担上重大的责任了。在英国，关于大革命即将来临的空谈只不过是可笑的，而在德国，局势本来已经紧张，这种空谈干脆就是犯罪。无论如何这是不明智

的。

我已经说过，德国社会民主党作为政党实际上从来没有由于自己理论上的错误而发生严重的动摇。它避免了这一情况，一半是由于它的领袖具有人的健全理智，一半是由于环境的力量。何况这种错误对于青年时期的党还不是很危险的。但是随着党的力量的增长，责任也加重了，愈来愈必须十分清楚地知道自己处在什么地位。因此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必须对理论进行检验。你们已经在农业问题上看到，这种理论给你们留下了多少不能解开的难题；如果你们企图抛掉仅有的劳工保护法的基础，那你们在工业上也会遇到相似的情况。在合作社问题上不得不求救于一个借口，说这些合作社现在是“资本主义企业”，而当事物的进程愈来愈清楚地揭露出立为正统的理论的严重缺陷时，这个借口只不过表明我们今天在理论上已经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是的，不是我在攻击理论，是现实本身证明了它的不足之处。不是我的目光阴暗，而是你们的目光模糊。

我这样说，不是狂妄自大，而是证实我们的不同处境。你们处于政治斗争之中，我离得很远，处于政治斗争之外。也许考茨基是对的，他说，如果我在德国，我可能和你们的想法完全一样。但是事实上是否我更正确一些，那就是另一回事了。我也可以只是为了给“久经考验”的理论挑选证明而去翻阅统计材料，如果统计像上次那样表明小农减少了一千户，我也可以把这解释为小农的土地占有即将消失的可靠证据。上帝呀！这是完全合乎人之常情的。政党总是很不愿意它们的口号受到威胁的，而且政党愈是激进，它们在这方面就愈是保守。谁对50年前就宣布了的伟大的剥夺表示不相信，谁就不是“无产阶级革命者”，最近《莱比锡人民报》就是这样推论的，只不过说法稍微不同罢了。哪怕只有在党的各个主要机关刊物里呆着的一批能干的文人固执地按这个意思写作，他们也能在一定时期内造成一种舆论，也就是某种形式的思想恐怖主义，所有的人都比较自愿地、或者不太自愿地、或者不是自愿地去服从这一情况，或者反正要考虑到这一情况。我已经经历过这种

事。我自己就曾经是“这样的一个人”。因此你信上说党内99%都反对我，是骗不了我的。反对我的人中大多数是因为他们不了解我，是因为他们受到错误的指引，从我的文章里读出了和原来意义大为出入的东西；是因为响亮的空话和迷网般的诡辩使他们晕头转向了。但是这是不会持久的、也是不可能持久的。

党已经经过很多次变化。它没有一个即将临近的“最终目的”的幻景也成长起来了。党的第一个纲领慎重得多，却也鼓舞了我们。也用不着担心社会民主党会由于放弃某些假设而失去它的正当理由。丢掉的只是一些幻想，会有新的理想代替那些过时的理想去点燃人们的心灵之火。在这一方面，你们的信心比我薄弱得多。我的道路走起来缓慢一些，但是它伸向前方；你们的路引向深渊，你们却看到深渊的彼岸是天国乐土。

我估计，你在写信的结尾的那几句话时，你已经知道那样说只不过是个形式。我不可能改变我的信念。如果你们认为我的信念使我不能留在党内，你们就坦率地告诉我，我会作出决定。同时我将不会忘记，你们和我一样，是在忠实地遵循良心上的义务，而且你们中的多数人是对我满怀最友好的情谊的。我只想还求你们做一件事。把目光越过德国的疆界，看一看这些政治上走在前面的国家：比利时、荷兰、丹麦、瑞士、挪威，对，甚至还有法国。那些地方的社会主义者或者会像王德威尔得那样公开对你们说，他们不相信崩溃，或者会用他们的行动来表示不相信，正如你们对私人生活的一些安排表明你们也不相信一样。在德国，由于特有的情况，党所取得的政治上的权力地位同政治上其他方面的发展是矛盾的。因此党处境困难。不断敲击革命的铜鼓肯定不会减轻困难，要减轻它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清醒地判断一下，什么是能做的，什么是不能做的。

谈的够了。我请你在党执行委员会里宣读此信或者让别人宣读。我要写一本专门著作来详细阐明我的观点。但是这本著作还得一两个月后才能出版，而我愿意早一点得到你们的宣判。

衷心问候你和所有的朋友们。

你的 爱德

选自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室编译《德国社会民主党关于伯恩施坦问题的争论》，三联书店1981年版，第63—70页。周懋庸译

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

第一版序

本书的写作，基本上是为了论证作者在写给 1898 年 10 月 3 日至 8 日在斯图加特召开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的一封信中所发表的观点。这封信的内容是这样的：

“我在《社会主义问题》这一组论文中所表述的见解，近来在社会党的报刊和集会上引起了争论，并且有人要求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代表大会对这些见解表示态度。既然发生了这种情况，如果党代表大会同意这一要求，我认为有必要作如下的声明。

一个会议不管有多么崇高的地位，它的裁决总不能使我对于自己的通过考察社会现象而获得的见解产生疑惑，这是不言而喻的。我在《新时代》上所写的东西是我的信念的表现，我不认为我有必要放弃这一信念的任何主要方面。

但是，党代表大会的裁决对于我来说决不是毫无所谓的事情，这也是不言而喻的。因此可以理解，为什么我感到首先必须保卫自己，不让别人曲解我的论述和从它得出错误的结论。由于不能亲自出席大会，我采取了书面报告的方式。

某一方面的人断定，从我的论文得出的实践上的结论是，放弃由在

政治上和经济上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夺取政权。

这是一个十分武断的结论，我坚决否认它的正确性。

我反对这样的见解：我们面临着指日可待的资产阶级社会的崩溃，社会民主党应当根据对这种即将到来的巨大社会灾变的指望来确定自己的策略或使自己的策略以它为转移。我不折不扣地坚持我的意见。

灾变论的信徒基本上是以《共产党宣言》的论述为根据的。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他们都没有道理。

《共产党宣言》对于现代社会发展所下的预断，如果只就它对于这一发展的一般趋势的描绘来说，是正确的。但是它的许多具体结论，首先是它对于发展所需时间的估计，则是错误的。《宣言》的作者之一、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已经在《法兰西阶级斗争》的序言中毫无保留地承认了此一错误。但是很明显的是，既然经济发展所需时间远比原来假定的要长得多，那么，发展所采取的形式和它将达到的形态，也必然是《共产党宣言》所没有预见而且也不可能预见到的。

社会关系的尖锐化并没有按《宣言》所描绘的那样实现。想掩饰这一点，不仅没有用处，而且愚不可及。有产者的数目没有减少，而是增加了。伴随着社会财富的巨大增殖的，不是资本家巨头的数目愈来愈缩小，而是各种等级的资本家的数目不断增加。中等阶层的性质改变了，但是他们并没有从社会阶梯中消失。

工业中生产积聚的劲头和速度目前也还不是到处都一样的。在很多生产部门中，生产的积聚固然证实了社会主义批评的全部预言，但是在另一些部门中，积聚目前还没有达到预言所说的那种程度。农业的积聚过程进行得还要慢。工业统计表明，企业分成非常多的等级，任何一级都没有消失的趋势。企业内部结构和企业之间的相互关系上的意义重大的变化不能瞒过这一事实。

就政治上说，我们看到一切先进国家的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的特权一步一步地向各种民主制度让步。在这些制度的影响下，并且在日益活跃有力的工人运动的推动下，开始出现一种反对资本的剥削倾向的

社会反作用，它在目前固然还是十分小心谨慎地摸索前进，但毕竟已经存在，而且将愈来愈使更多的经济生活领域受到它的影响。工厂立法，地方行政机构的民主化及其工作范围的扩大，工会和合作社摆脱了一切法律上的障碍，在一切由国家机关分派的劳动中都考虑到工人组织——这些都是这一发展阶段的标志。至于说德国还有人会想到压制工会，那么这并不说明它的政治发展水平高，而是说明它的政治落后。

但是，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制度愈是民主化，巨大政治灾变的必然性和机会就愈减少。谁只要坚持灾变论，他一定会像这一理论的彻底拥护者以前也做过的那样，尽可能反对上述的那种发展并且试图加以阻止。但是难道所谓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就只能是通过政治灾变夺取政权吗？难道这就等于说，由无产阶级独自占有国家权力并运用它来反对整个非无产界吗？

对于凡是赞成这种说法的人，我在这里要提醒他两件事。1872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新版的序言中宣称，特别是巴黎公社已经证明：‘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1895年，恩格斯在《法兰西阶级斗争》的导言中详细地说明，政治性突然袭击的时代，‘由自觉的少数人带领着不自觉的群众实现革命’^①的时代现在已经过去了，和军队发生大规模的冲突是会暂时阻止社会民主党的不断发展或甚至使它倒退一个时期的手段——总之，社会民主党‘用合法手段却比用不合法手段和用颠覆的办法获得的成就要多得多’。^②他并且据此指出党的迫切任务是，‘使自己的选票继续不断地增加’^③——或者是‘议会活动的缓慢宣传’^④。

由恩格斯所举出的数字可以看出，他不管怎样总还是要把发展过

①②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21、524页。——编者注

③ 恩格斯的原话为“它的（选票的）增长过程是自发的，经常不断的”，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23页。——编者注

④ 恩格斯的原话为“耐心的宣传工作和议会活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22页。——编者注

程的速度估计得过高一些的，但是连他也讲了上面这些话。难道因为他不愿意看到由合法宣传加以保证的社会民主党的不断发展被一场政治灾变打断，我们就要议论他，说他不要工人阶级夺取政权了吗？

如果不是这样，如果同意他的论述，那么在听到如下的说法时也就理所当然地不会大发雷霆了：社会民主党还必须长期从事的，不是痴心妄想大崩溃，而是‘在政治上把工人阶级组织起来，训练他们运用民主，为国内的一切适于提高工人阶级和按民主精神改造国家制度的改革而斗争。’^①

这就是我在我那篇受到非难的文章中所说的话，我现在仍旧不折不扣地坚持这种说法。就我们目前所谈的问题来说，我的说法和恩格斯的下一原理是殊途同归的：在任何时候，工人阶级就其智力成熟程度和一般经济发展水平来说有多大能力实行自己的统治，民主就在多大程度上是工人阶级的统治。此外，恩格斯在上引文章中还明确地援引说，《共产党宣言》已经‘宣布，争取民主，是战斗的无产阶级的首要任务之一’。^②

总之，恩格斯深信，以灾变为顶点的策略已经过时，因此他认为即使在拉丁语系各国（那里的传统比德国更有利于这一策略得多）也有必要对这种策略作出修正。他写道：‘如果说国家间战争的条件已经变化，那么阶级斗争的条件也有了同样大的变化’。^③大家难道已经忘记了吗？

没有人对工人阶级争取民主的必要性提出疑问。引起争论的是崩溃论和这一问题：就德国的现有经济发展和城乡工人阶级的成熟程度来说，发生突然的灾变对于社会民主党是否适宜？我对这一问题作了

① 《崩溃论和殖民政策》，《新时代》第16卷（1897—1898年）第1册，第556页。——编者注

②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16页。——编者注

③ 参看同上书，第521页。——编者注

否定的回答，现在仍旧要作否定的回答，因为在我看来，不断地前进比一场灾变所提供的可能性更能保证持久的成功。

因为我坚决相信，各民族的发展中的重大时代是不能跳过的，所以我极为重视社会民主党的当前任务即为工人阶级政治权利的斗争、工人阶级在城市和村镇中为本阶级的利益而进行的政治活动以及工人经济组织的活动。我当时就是在这一意义上写下这句话的：对我来说运动就是一切，人们通常所说的社会主义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在这一意义上我今天仍旧承认它。即使‘通常’一词还没有能指出这句话只能有条件地加以解释，但是明摆着的是，它不可能是表示对社会主义原则的最终实现漠不关心，而只是对事情将采取‘什么样’的最后形态漠不关心，或者也许不如说不加操心。对于将来，我所感兴趣的从来没有超出一般原则的范围，我也不能读完任何描绘将来的东西。我所关心的和努力以赴的是现在和最近将来的任务，超出这一范围之外的远景，只有当它们能成为我在这一方面的有效行动的准绳时，才能引起我的注意。

工人阶级夺取政权，对于资本家的剥夺，这些事本身并不是最终目的，而只是实现一定的目的和意图的手段。它们作为这种手段列入社会民主党纲领的要求之中，没有遭到任何人的反对。关于它们实现时的情况，那是丝毫不能预言的，我们只能为它们的实现而斗争。但是为了夺取政权，需要有政治权利，而我认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必须及时解决的最重要的策略问题，是关于扩大德国工人的政治权利和职业权利的最好途径的问题。如果没有为这一问题找到令人满意的答案，却去强调别的问题，那么到头来这不过是一片大话而已。”

这一声明引起了我和卡尔·考茨基之间的一场短短的论战，维克多·阿德勒也在《维也纳工人报》上参加了这一论战。这就促使我发表第二个声明，它刊登在1898年10月23日的《前进报》上，这里不妨从其中摘录几段如下：

“考茨基和阿德勒在他们发表在《前进报》上的对于我的《夺取政

权》一文的答复中，表示希望我把我在《社会主义问题》中阐述过的立场用书籍的形式作一总括的说明，这个意思从前他们已经写信告诉过我。到目前为止，我一直拒绝听从这些朋友的劝告，因为我有这样的意见（现在仍旧是这样）：这些文章的倾向完全没有脱离社会民主党的总的发展路线。但是既然他们现在公开地重复这一意见，而且许多别的朋友也表示了同样的愿望，因此我决心遵从这些敦促，在一本著作中系统地阐述我关于社会民主党的目的和任务的见解……

阿德勒和另外一些人对于我预期民主制度的发展会使阶级斗争趋于缓和的看法表示不满，他们说，这是因为纯粹通过英国的眼镜来看事情。但他们的说法完全不合事实。即使假定，关于‘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①这一原理近来已经失效，并且对大陆同英国的发展之间的一切差别（这我也并不是一点不知道的）充分加以考虑，情况也是一样。我的看法是以大陆上的现象为根据的，人们尽管会在斗争的热潮中暂时忽略这些现象，却不能长久忽视它们。我们在先进的国家中到处可以看到阶级斗争采取了比较缓和的形式，如果不是这样，前途就很难说是颇有希望了。不言而喻，一般的发展过程并不排除周期性的倒退，但是只要具体设想一下，例如即使在德国，市民大众的愈来愈多的部分今天对于罢工抱什么态度，现在那里处理许多罢工的方式和不过十年或二十年以前比起来，已经完全不同，已经更为明智，那么的确不能反对在这里可以描绘出一种进步。即使这并不说明——用马克思的话来说——‘明天就会出现奇迹’^②，但是按照我的看法，它给社会主义运动指出的道路毕竟比灾变论所指出的更有希望，而且不致伤害社会主义战士的热情和干劲。这一点阿德勒是一定不会反驳我的。

有过一个时候，我所发表的见解在党内似乎没有遇到任何反对。如果说它现在遭到了反对，那么我只把它看成对于某些日常现象的一

① 《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8页。——编者注

② 同上书，第10页。——编者注

个可以理解的反作用，它将和这些日常现象一同消失，代之而起的将是对于这一点的重新认识：随着民主制度的增加，在我们其他方面的社会生活中缓慢地但是坚定地开辟了道路的那种更为人道的看法，在意义更为重大的阶级斗争面前也将不仅不却步不前，而且同样要为阶级斗争创造出更为缓和的解决方式。在一百年以前需要进行流血革命才能实现的改革，我们今天只要通过投票、示威游行和类似的威迫手段就可以实现了。

1898年10月20日于伦敦。”

下面这本书就是按照这些论述的精神写成的。

我完全知道，本书在许多要点上违背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所主张的见解。这两个人的著作曾经对于我的社会主义思想起过极大的影响，他们之一，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不仅到去世为止一直惠我以私人友谊，而且在他的遗嘱中还表明了生后仍旧对我非常信任的证据。这一看法上的背离当然不是最近才发生的，它是长年以来的内心斗争的产物，我手头有证据可以证明它对于恩格斯来说并不是秘密，而且我必须坚决地为恩格斯辩护，反对人们把他说成似乎很狭隘，竟会要求他的朋友们无条件地支持他的见解。无论如何，从上面所说的可以理解，为什么我过去一直尽可能避免把我的背离的观点以对马克思恩格斯学说的批评的形式表述出来。况且就所涉及的实际问题来说，马克思和恩格斯自己随着时间的推移已经显著地改变了自己的见解，因此过去要避免这样做也就更加容易了。

现在的情况不同了。今后我必须同那些像我一样出身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学派的社会主义者进行论战。如果我要捍卫我的见解，我就必须对他们指出，我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在哪些点上大体是错误的或者自相矛盾的。

我没有逃避这一任务，但是由于上述个人方面的原因，这一任务对我来说不是轻易的。我公开承认这一点，为的是使读者不致把开头几章所采取的犹豫不决的、晦涩的形式当作在实质问题上的动摇。对于我所

写的东西，我是十分坚决地信守的。但是我并不总是能成功地做到选择最为贴切地表达我的思想的形式和论据。就这一点来说，我的著作同其他方面的人就同一题目发表的著作比起来远为逊色。最初几节中的若干遗漏之处，我在最后一章中补上了。此外，由于本书的出版稍有拖延，我对于合作社一章作了一些补充，其中不能完全避免重复的地方。

其他问题可以让本书自己来说明。我不会天真到这种程度，指望它会使反对我以前文章的那些人立刻回心转意，也不会愚蠢到如此地步，乞求原则上同我站在同一立场上的那些人赞同我在书中所说的一切。事实上本书的最可担心的地方是它包罗太广了。当我着手论述当前任务时，如果我不愿意沉迷在泛泛而谈里，我就必须涉及种种的个别问题，对于这些问题，甚至在其他方面想法一致的人之间也不免有意见分歧。然而为了节省篇幅，我在这里也不得限于强调某些主要之点，与其说是作了论证，不如说是略提一下。不过别人是否在一切个别问题上都赞同我，我也是不在乎的。我所关心的事情，也就是本书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克服社会主义理论中的空想主义思想方法的残余，使社会主义运动中的现实的和理想的因素同样程度地得到加强。

爱德华·伯恩斯坦

1899年1月于伦敦

第一万册版序

本书初版印行了五千册，随着时间的消逝，曾经不得不重印几版。这次印刷使发行数达到了一万册。

前几次重印时，对原文未作任何改动，这一次基本上也遵守同样的原则，只有不多几处是例外。例如第一章第二节开头一段（第33页^①）

① 这里注的是原书页码。下同。——编者注

的措辞对于唯物主义世界观同其他世界观的区别所下的定义就比原来的写法要精确，而针对原来的写法本来是能够提出有根据的反驳的。第 104 页上的关于荷兰土地经营的发展的表中有一个错误的数字，现在这个错误和与它有关的一个说明都得到了纠正，第 254 页上的关于缩短劳动日的一句话的措辞，我在当时很快就承认它太生硬，现在也取得了比较切合实际的形式。此外还有两三处作了改动，不过这只是对那里阐述的思想给以比较正确的形式。如果不算这一些并未触动本书基本思想的改动，那么读者所得到的本书同最初的样子是完全相同的。

我在别的地方已经详细地说过，我之所以不对原文作彻底的修订，是遵从许多方面向我提出的一个建议。由于在报刊上、书籍中和集会上的有关本书的争论，本书已经具有了文件的性质，改写就会损害这一性质了。购买这本书的人都希望掌握那些争论的对象，因此尽可能不加改动是恰当的。我曾把改写的计划通知本书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他们都表示了这样的意见，我略加考虑以后，听从了他们的劝告。

我很乐于这样做，尤其是因为我所计划的改动并不涉及本书中阐述的主题，对于这一主题，我是宁可在一切要点上都坚持不变的。但是本书的技术和（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建筑术还可以大为改进，一些重复的地方可以大为压缩，同时我很愿意充实论证中的某些漏洞，补充证明材料，并且把认为本书没有充分地从正面论述社会主义的那些社会主义批评家的意见考虑在内。固然我不能承认本书缺乏从正面为社会主义辩护的论述，不过无论如何可以对我的批评者承认，这些论述同本书的批判部分比起来，往往是过于格言式的。这是下一情况的结果：我在写作本书时，只是同社会主义者进行争论，或者说，只是在社会主义者之间进行争论。在这种场合，人们对于意见一致的事情，一部分根本不必提起，一部分只是轻轻带过。以更为广大的读者为对象的书当然是不同的。但是我并没有打算把这本书写成这个样子。

作者本人描述的目的后来被忽视了，在我看来，这一情况说明了为

什么对于书中的原理产生了一系列错误的解释。试举出一件来说。例如，只有这样才可以理解，为什么我对于有产者或资本家阶级的增长的证明竟能被当作对现存社会制度的辩护而受到一些人的欢迎和另一些人的反对。事实上这个问题同这一制度的合理性或不合理性是毫不相干的。那些在社会政策的辩论中专门被描述为有产者的人，在全部人口中只占很小的百分比，因此我们所见到的增加绝对不能为当前的财产分配辩护。关于这一点，我在我的著作中没有留下丝毫怀疑的余地。在第 89 页上明明白白地说：“社会剩余产品是被一万人垄断地积蓄起来，还是在 50 万人中间按不同等级的量进行分配，这对于在这场交易中吃亏的 900 万或 1000 万的一家之主来说，原则上是无关紧要的。”接着又说：“维持几千个特权者的穷奢极欲生活，比维持 50 多万人的非分的富裕生活，也许要耗费较少的剩余劳动。”恐怕再也不能更加清楚地说明，我认为这一事实对于社会主义的论证只有很小的意义。

事实上社会主义只是就次要方面说才是分配问题。它的首要方面不如说是一个生产制度和生产扩展的问题。这两个问题之间存在着密切的相互关系，也就是说，不合理的分配在一定情况下能成为生产扩展的障碍，分配领域中的变革能成为生产扩展的有利因素，但是这种关系不会使任何有经济头脑的人产生错觉，从而忽视最高生产率即社会总劳动的最高出产率的问题是社会的社会主义发展的决定性要素这一事实。因为任何社会形态的合乎理性的最终目的即最大可能程度的普遍幸福是否能达到，最后取决于生产率问题，而各该时期的组织制度和分配制度则是从属于这一最终目的的。但是不难提出证明，在今天的生产条件下，有产者数目的值得一提的增加同它的相对减少比起来，意味着生产力的更大的麻痹，总财富和普遍福利的更大的损失。

但是资本家数目增加的事实，在这一期间连原来就这一点驳斥我的那些人也承认了。人们只要比较仔细地研究了有关材料，又怎么可能不承认这一点呢？刚刚不久以前，社会民主党议员荷赫能够又一次在德国帝国议会（1902 年 1 月 20 日的会议）中断言，在 1896 年到

1900 年之间，普鲁士和萨克森的每年按 10 万马克以上的收入纳税的人数增加如下：

	1896 年	1900 年
普鲁士	2,830	3,277
萨克森	394	583

荷赫补充说，这一增长远远超过了同一时期人口的增长。同时这些人的平均收入在普鲁士已从每年 25.7 万马克增加到 30.6 万马克，在萨克森已从每年 21.84 万马克增加到 23.6 万马克。但是其余的较高收入集团的阶级或阶层也有了相应程度的增长。我们仍旧拿本书中举出的一个数字来看，在 1897/98 年到 1901 年的这一短短时期中，普鲁士的按 3000 马克以上的收入纳税的人已从 34.7328 万人增加到 43.5696 万人，即使拿同一时期内食品价格的提高同它对比，这一增长也还应当算是相当高的。

本书关于工业企业各种规模等级的发展的叙述，情况也同它关于收入变动的立论相似。在这一方面，同样没有任何观点需要撤回或者加以限制。为了节省篇幅，同时受到著书时间的限制，我没有能对现有的材料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因此那一整节只是非常粗枝大叶地考察了有关的各种关系，也只得容许得出极有限的结论。但是它也并不自命给予了比这更多的东西，它所包含的论点，没有一个是经不起比较精确的 checks 的。

说到这一节对于德国的职业和行业调查^①的结果所作的探讨，那么把它的表述同一位统计学专家、布拉格的亨利希·劳赫贝尔格教授在他最近出版的著作《一八九五年六月十四日德意志帝国的职业和行业调查》（柏林卡尔·海依曼出版社 1901 年版）中所达到的结论比较一下，

① 当时德国的职业和行业调查的范围包括工、商、交通、文化、卫生、城市园艺等行业。——编者注

会是很有意思的。劳赫贝尔格在他的书的结尾用单独的一章《德国国民经济的发展趋势》概括了他对德国行业调查进行十分细心的研究的成果，让我们从这一章中引用几句话，它们所涉及的同本书有关一节所探讨的是同样的问题。

关于小企业和中等企业同数量和规模日益增长的大企业并肩继续存在这一问题，该书是这样说的：

“如果说到了现代工业中的积聚趋势，那么这决不因此意味着小企业被大企业吸收。不如说小企业照样维持，并不减少；它甚至已经取得了进展，虽说只是有限的。但是这种积聚趋势意味着朝着大企业方向的迅速的继续发展，或者是通过从前的较小企业的扩大，或者是通过新的大企业的创立：这一来生产的重点和大多数工人都转移到规模愈来愈大的企业中了。但是与此同时，那一积聚也表现为形式上独立的小企业同大企业之间的较密切的联系，这种联系或者采取生产分支的形式，或者采取销售组织的形式”。（第 393 页）

“……总而言之，向大企业前进的发展既没有使手工小企业、也没有使家庭工业的生存条件遭到损害。就算工厂式的大企业在技术上较高，从社会角度说来有较好的前途，但它仍旧远远没有上升到独霸的地步。因为德国的国民经济并不是在一切部门中都同等程度地发达。各个地区，东部和西部，城市和乡村，甚至各个工业部门所处的发展阶段往往相差很大；‘工业发展的一切中间阶段，从原始手工业起到现代巨型企业止，今天仍旧并肩存在。现代的技术进步和社会进步无论在生产中还是在销售组织中都有利于大企业的产生和发展，而我们从另一方面却看到一批又一批的人群脱离过去或多或少闭塞的家庭经济，转移到国民经济的活动中来。……产生手工企业和家庭工业企业的前提不断重新被创造出来，另一方面，这些企业从较晚的发展阶段出发，已经就要转变为较高的企业形态和组织形态了。”（第 395 页）

只要拿本书第 100—101 页上的论述和这比较一下，就会发现，劳赫贝尔格的结论和那两页上的阐述是完全吻合的。

社会学研究所所长瓦克斯淮尔勒^①教授在《社会实践》杂志第 19 卷第 11 期（1901 年 12 月）上著文论述 1896 年 10 月的比利时行业调查的结果，他在断定比利时是“一个大工业的国家”而且“在受到没落的惩罚时”必将保持不变以后说，“值得注意的是，比利时的统计数字证实了伯恩施坦对马克思主义的积聚规律（应当说是：对从积聚规律得出的夸大的推论。——爱·伯按）进行批判时……所用的基本数据……一般说来大工业同小工业和中等工业并肩发展；而且在最近 50 年中出现了为数很多的新的工业部门（300 多个），在这些部门中留下了一定数量的小工业”。小工业的抵抗能力“也可以从这一事实推断出来：尽管机器发展了，但是在许多被认为不成问题应当采用机械过程的工业中仍旧保持着手工制造”。劳赫贝尔格的书中曾经就与此相联系的一个题目（在本书上述地方即第 101 页上也考察了这一问题）这样说：“然而不应当忽视，正是最强有力的机器经常为一些生产目的服务，如果没有这些机器，这些目的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在这种场合，是机器首先把生产带动起来。那时它是根本不同人的劳动力竞争的。”（第 400—401 页，注）

劳赫贝尔格在研究企业的法权形态时强调集资企业和合营企业的大量增加，这些集资企业愈来愈属于经济团体和合作社所有。他写道：“在这里同企业的积聚相对立的是，更为广泛的阶层分享了所有权和收益。”（第 395 页）瓦克斯淮尔勒同样强调指出股份公司的日益扩展。据他说，在比利时的 70 个工业部门中，股份公司雇用了 3/4 以上的工人。如同瓦克斯淮尔勒也强调的，这和前面所讲的一样，也是本书第 84 页上的论述的另一个证据。通过合股公司使所有权分散化，这一事实相当早就有人指出了——几十年以来，在现存社会制度的辩护者的著作中流传着这种指证。但是它的年代并不证明它是错误的，一般说来只能怀疑从它得出的结论，对于这个事实本身，没有任何愿意被认真地当

^① 埃米尔·瓦克斯淮尔勒（1867—1916），比利时社会学家，布鲁塞尔自由大学教授。——编者注

作经济学家看待的人会加以反对。我在本书第 85—86 页上关于某些英国大企业的股东的巨大数目所提供的数字现在首先遭到了怀疑，特别是因为这些数字的出处没有写明。为了弥补这一缺陷，我可以说明，关于斯皮尔和庞德公司的股份资本分配的数字，是承这个公司自己好意在我寄给它和其他公司的调查表上向我提供的，关于缝线托拉斯和古茨纺织公司的股东人数的数字是从英国报纸的商业栏中摘录来的，这些数字在当时是当作珍闻报道的，没有涉及任何社会政治的结论和倾向。这种报道方式排除了认为它是在这里制造舆论的任何嫌疑。此外，在这一期间，我还知道了一些诸如此类的统计数字，说明一些工业企业的股份分配完全与此相似。其一见于郎特里和舍威尔的经典性著作《禁酒问题和社会改良。伦敦版》一书中。作者在该书中（普及版第 31 页）描绘了大酿酒厂和酒精厂的巨额股金的广泛分布的情况，认为这是阻止反对酗酒的严厉立法的巨大障碍之一。他们用如下的关于五家非常出名的英国酿酒公司的股份持有者的表格具体说明了这种分布情况：

酿 酒 厂	股 东 数	
	普通股	优先股
阿图尔·几内斯父子公司	5, 450	3, 768
巴斯、拉特克利夫和格勒腾	17	1, 368
施勒尔伐尔	577	872
康布公司	10	1, 040
赛缪尔·阿尔索普公司	1, 313	2, 189
合计	7, 367	9, 237

普通股资本和优先股资本一共 19400 万马克（971 万镑），股东共有 16604 个。但是这五个公司此外还有 12000 万马克（610 万镑）的债务资本，现在没有关于这笔资本的持有者的表格。假定这笔资本按照普通股和优先股同样的比例分布（这种假定是有很多理由的），那么上述五

个酿酒公司的财产就分布在 27052 个人的手中！但是 1898 年在伦敦交易所登记的有不下 119 家酿酒公司和酒精公司的股票等等，仅仅这些公司的纳税资本就达到 14 亿马克，此外这些公司中有 67 家的普通股资本在“私人手中”（大多数是在原来的所有主及其家族成员手中）。这些酿酒公司和酒精公司，只有一部分是百万富翁的财产，一部分却在每一个公司后面都有着几营或者甚至几团股东，这一事实是英国的禁酒改革家特别在选举时很不愉快地感到的。

在其他场合，也和在这一场合一样，正是从改革家的立场看来，工业企业所有权的分散化有它的巨大的阴暗面，而在社会主义者眼中，一般说来这一分散化是列入现代发展的阴暗面的。但是本书所研究的并不是这个问题。它所注意的是这个纯粹经济的问题：工业企业的日益增加的积聚所产生的后果是资本家阶级的缩小还是增长？只是因为人们忽视了这一点，而且如同前面已经说明的那样，赋予这种意义或那种意义的回答以它们根本没有的那种对于社会主义的重要性，关于这一问题的辩论才具有了如此不愉快的性质——其所以不愉快，首先是因为所争的是琐碎小节，而提出的疑问中所包含的真正问题，即使没有根本不放在眼里，也是完全被忽视了。关于这一问题，即如果资本家阶级是在缩小而不是在增长，那么在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的情况下社会剩余产品留在哪里的问题，我已在第 89 至 93 页上尽可能清楚地分析了，而讨论并没有按照我在那里提出问题时的精神继续进行下去，对此我只能感到遗憾。

我自己还曾在—组关于工资规律问题的论文的增补一章中又一次涉及这一问题，这一组论文起初发表在《新时代》上，最近我把它们重新刊印在一部旧作和新作论文的集子里（《关于社会主义的历史和理论》，柏林和伯尔尼版，1901 年）。我在那里（第 107 页）也认为，“富人及其财富的数量的增长”是现代的特征。这是我还在英国时写的，关于德国，我在那里只能掌握几个枯燥的数字。回到德国后，我就有机会使自己相信，这里的情况本身也令人注目地表现了这一事实。在大城市的日

益扩展的上流住宅区里，有产者的增多和他们的日益增长的财富几乎是以刺激人的压力表现出来。特别是柏林西区的发展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危机问题是同剩余产品积压的问题密切联系着的。在我写这篇序言的时刻，德国和其他地方的一些巨大的工业部门正经历着营业不景气，一部分是很严重的。这件事实曾经屡次被提出来，当作对本书关于危机问题所作论述的恰当的反驳。但是谁只要读一下有关的章节（第三章第四节），就会深信，上述危机迄今的过程还远远不能反驳那里的阐述，反而不如说是完全证实了它。德国的危机就一部分说来是一个货币危机。如果撇开国际货币市场上的事件（中国的和特朗士瓦尔的战争，特朗士瓦尔金矿的关闭，印度的歉收）不谈，它是由抵押机构的毫无限制的投机倒把引起的。这一危机实际上部分地也是由生产过剩而且特别是由机器设备之类的生产过剩引起的危机。在最近几年的繁荣时期里，在德国曾经以工厂设备的形态投下了一笔巨大的资本，它远远超过了需要。工厂主争着按照最新的式样重新装备自己的工厂，这还不够，而且新的设备大多是在扩大的基础上进行的。这样一来，就像英国人所说的，德国工业在嘴里塞得太多，没法嚼了。他们现在患了咽下困难症——通常这大部分是以工人为牺牲品的——，而英国工业虽然根本没有这样急于更新设备并且因此已经被宣告灭亡，它受到不景气的影响却比德国工业小得多。一个熟知两国情况的德国血统的英国工厂主、伦敦的亚历山大·西门子先生不久以前曾在一家专业报纸上十分激烈地强调了这一点。不过无论如何，营业不景气暂时还只限于个别国家和个别工业，而且在这些国家和工业中也决没有达到上一次工业界大危机即 70 年代的危机那样大的规模和程度。因此，要想从当前的危机现象得出与本书关于危机的一章所论述的问题有关的证据确凿的结论，至少是过早了。我们目前实际见到的危机现象统统是属于本书第 117—118 页和第 124 页以下所明确指为现今经济组织的当然产物这一领域的。

在目前的时刻打算对于企业主辛迪加在危机问题方面的作用和能力下一个最后的判断，尤其是完全过早的。这种联合组织或团体大部分还是处在开始阶段，这一阶段的失败还完全不能为最后结果提供任何证据。工人的工会运动有好几十年都是失败的运动，后来它的能力无可怀疑地得到了证明，以至蔑视它的人不得不一个接一个心悦诚服地低头认输了。

由此可见，就企业主辛迪加而论，我们也还必须等一下，才有可能对它所能做的和所不能做的下一个勉强说得上是结论式的判断。在这一期间，我们最好设想一下，问题并不在于消除生产过剩（如同本书第118页上所说的那样，生产过剩不如说是现代经济生活的一个不可避免的现象），而是在于缓和和缩减、或者说是度过随着生产过剩而来的停滞时期。因此正像工会的通常情况一样，这里的检验证明同样在于消极的方面，也就是说，它的中心问题在于，在各个场合防止了什么更坏的事情。现在已经明白，虽然在本书的一些过分急躁的批评者看来当前的营业危机一定会带来辛迪加制度的破产，结果却是辛迪加制度大为巩固了。今年1月26日《前进报》的商业栏从矿业、炼钢和金属加工工业引用了一大批事实，为这一方向上的发展提供了证据。别的不说，该报曾断言，半成品联合会“现在和过去一样几乎独占地统治了钢铁工厂的生产，因此即使在钢铁工业遭遇困难的情况下，尽管用户施加压力，也不会发生像展开自由竞争时必然要发生的那种大跌价”。由此表现出来的辛迪加制度的效力有它的巨大的反面，这是很明显的，在上述《前进报》的文章中也强调了这一点，但是要知道，正是这一反面在本书中也得到了极其明确的强调，这是大家看了就会相信的。书中这样说：“资本主义防御危机的手段潜在地包含着工人阶级的新的、加强了隶属性的萌芽，也包含着生产特权的萌芽，这些特权表现为旧的行会特权的更加严重的形态。我认为，从工人的立场看来，始终把卡特尔和托拉斯的能力放在心上，比去预言它们的‘无能’更为重要得多”。（第127页）至于说到正是包含这段话的那一章所受到的批评（这里不来详

细形容这些批评了)，我可以带着一定的满意心情迎接它们说，按照同一章书一样的精神来对待资本主义辛迪加问题的人数增多了。

互相斗争的双方总是会一再遇到这样的危险，即在日常事件的影响下在心目中把他们所争的问题的重心暂时转移，或者在一个时期内一直不知道重心事实上已经转移。这样的视觉颠倒于是很容易引起争论中的不必要的气愤。一方认为必须摆脱某一个已经失去对象的斗争目标，另一方却认为这是叛卖性地放弃一个有决定意义的阵地。那时这种情况总要维持一定的时期，然后大家才同样意识到成为问题的（实践的或理论的）争论对象的真正性质是什么，这些争论对象目前含有什么样的现实意义。关于本书所讨论的问题的一部分可以这样说：关于它们的争论已经弄得相当清楚，而且已经使人达到这样的认识，即作者的论述（不管它在过去引起什么样的反对意见）并没有对任何对工人阶级的解放斗争有现实意义的、社会民主党的现实的生死攸关的问题提出怀疑。我坚定地相信，经过这一段时间，对于这里讨论的其他问题说来，情况也将是一样了。我是根据这样的认识把这一新版公之于世的。

*

*

*

《社会主义的前提》一书除了德文版以外还出了法文版和俄文版——俄文有三种版本，一种在伦敦出版，一种在莫斯科出版，一种在圣彼得堡出版。根据我们得到的消息，捷克文和西班牙文的译本正在进行之中。法文版的翻译工作是得到我的同意的，我还专门为它写了一篇序言。与此相反，三种俄文版本的进行，我都不知道。就莫斯科版和圣彼得堡版说来，这种情况是很容易解释的，译文中对于原文的某些“科学的”改写同样也是可以解释的。第三种版本即伦敦“俄国自由出版基金会”的出版社所出版版本的组织者，在进行翻译前竟没有能做到通知住在同一城市的作者并从而使他有可能对本书作某些他认为必要的校正、删节或补充，他们自己认为应作的删节也没有征得作者的同意，这一点我认为就没有什么明显的道理了。既然译者没有做到这一点，我认为有必要声明，我对于伦敦的俄文版也像对其他两种版本一样，不

能负任何责任。

爱德华·伯恩斯坦

一九〇二年一月底于柏林

第一万三千册版序 ——十年之后

本书出版到 13000 册时，距离我动手写作它的时候恰好是十年。这一情况也许为一篇新的序言提供了理由。

根据第一万册版的序言中所阐述的同样理由，本书的新版也是不加改动地问世的。我本来的确是必须对某些点加以补充，或者也许必须改用另外一些用语的，但是我没有在任一点上作原则性的改动。关于社会主义者对本书的批评，我所要反驳的已经写成了一些论文，它们现在构成了《关于社会主义的历史和理论》文集（柏林丢姆勒公司第 4 版）的第三部分。几篇刊登在《社会主义月刊》上的论文和现在已停刊的《社会主义文献》第 5 卷上的《关于价值的杂论》这一组论文对它们作了补充。

第 88 页上举出的关于普鲁士的收入变动的数字已经遭到反驳，因为没有把捐税立法方面的改革考虑在内，这些改革在这些数字所涉及的年代以前就已实行了。因此下面的数字也许会令人感兴趣：从 1892 年即实行米凯尔^①捐税改革后的第一年到 1907 年，收入在 3000 到 6000 马克之间的纳税人的数目增加了 80.3%，也就是从 204714 人增加到 369046 人，收入在 6000 马克以上的纳税人的数目从 112175 人增加到 190445 人，也就是增加了 69.8%。即使把其中的 1/3 算作愈来愈可靠的估税工作的结果，剩下的仍旧是一个远远超过同时期内的人口增

① 约翰内斯·冯·米凯尔（1828—1901）德国资产阶级政治家，1890 年至 1891 年间担任普鲁士财政部长。——编者注

加率（25.3%）的增长。

关于工业积聚问题，在写作这一序言时已经发表的1907年6月12日普鲁士工业企业统计的主要结果所提供的数字，完全证实了本书中关于社会财富生产中的企业等级一节所说的情况。根据这一统计，从1895年行业调查到1907年的12年之间，普鲁士的个人企业从951642个减少到了784197个，或者说减少了17.6%，而雇工企业和机器企业却从791694个增加到了1111300个，或者说增加了40.37%。换句话说，“只有零细企业绝对地和相对地都减少了”，小企业和中等企业却仍旧在不断增加，大企业的跳跃式的普及和扩展“只表现了当前经济发展的一个方面。”（本书第100—101页）

当然，企业的发展和公司的发展并不一致，因为一家公司往往包括许多企业。但是这种情况在大工业和中等工业中比在小工业中为多。也就是说，在较多出现这种情况的那些工业部门里，公司愈来愈成为集体财产，前面提到的较高收入等级的增加证明了这种发展。大企业就其所雇用的人数来说，占前述发展的最大比重，这是不用说的。在雇工企业和机器企业中就业的人数总共从4924441增加到7548715，或者说增加了53.29%。但是在500人以上的企业中就业的人数却增加了89.11%，也就是说几乎增加了一倍。大企业和巨型企业的工业活动中所占的地位愈来愈大了，但是并没有垄断这种活动。

此外我还要再一次强调，本书是在下一见解的命令下写作的：工人阶级伟大解放斗争的历史性权利和目的不取决于任何现成的公式，而是由这一阶级的历史的存在条件和由此产生的经济的、政治的和道德的需要决定的，工人阶级所必需实现的是理想，而不是教义。如果有人要把这种观点称为“修正主义”，那么他尽可以这样做。不过他总不应当忘记，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当时也是修正主义者，他们是社会主义的历史上所见到的最大的修正主义者。任何一种新的真理，任何一种新的认识都是修正主义。既然发展不会停顿，既然斗争的形式也要随着斗争的条件一同受变化规律的支配，那么在实践中和理论中也就

永远会出现修正主义。我不想在这个地方详细指出，自从本书写成以来，在政治、工会和合作社方面的工人斗争的实践领域内所发生的最有意义的进步，恰恰是同书中的论述十分一致的。我在别的地方已经指出过了。这里需要说明的只是，不管在社会民主党队伍中今天对于所涉及的问题的意见在细节上有多大的出入，但是在所有的讨论中的确愈来愈清楚地贯穿着一种信念，这一成了认识方面的共同财产的信念是：我们必须预计到现存社会制度有比过去所假定的更长的寿命和更强的弹性，并且按照这一预计来展开我们的斗争实践。这一思想正是本书的全部精髓所在。

关于本书的外文版本，还可以说明一下，除了已经提到过的译本外，又增加了两种瑞典文译本，还有一个英文译本^①正在进行中。

新版说明

根据第一万册版序言中所阐明的理由，本书多少年来为满足需要而必须印行的许多新版问世时，原来的文字都没有任何改动。但是这一次，在初版出版了21年之后又必须印行一次新版时，我决心至少在某几点上校改一下。不过我仍旧注意到保存本书的已经有了历史性的特色。例如虽然一再考虑到应当改写关于营业危机的一章以及实际上在许多点上已经过时的论述社会民主党当前任务的若干节，但是我毕竟还是把这一工作放下了，因为我考虑到这一情况，即本书的主要意义在于，阐述对待社会民主党的理论上和实践上的争论问题的原则，描绘经济发展的过程以及由经济发展引起的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动，而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上述章节中的已经不再切合当前情况的地方也还保存着它们的例证价值，至于说到应当把这些年中间出现的事实方面和论断方面的变化考虑在内，那么这一需要是用不着这样的改写就有可能满足的。

^① 已于1909年由独立工党出版社以《进化的社会主义》为书名出版。其他译本还有一种荷兰文的和一种捷克文的。——作者为1920年新版加的补注

对于本书正文所作的一些补充，注释部分地做到了这一点。对于正文本身，我几乎只求纠正一些修辞上粗糙的地方，并且在某些地方把正文和论争性的脚注中同已经在这期间去世的批评者进行论战的语气适当地改得缓和一些（在某种意义上这也还是属于修辞问题）。在这种论争性脚注中，个别的已经失去了对象，因此我把它们完全删去了。

我尽可能把补充注释写得简短。其中的一部分只是记述了新的统计数字，其他一些指出了似乎同正文中的论述有某些矛盾的事件，但几乎毫无例外地都同样只限于简单的确认。但是在增补的一章中也将涉及这些事件并且要探讨它们是否和书中表述的观点相抵触以及抵触到什么程度。增补的一章所讨论的是作为世界大战以及由大战引起的许多国家的革命的后果在本书论述的问题方面产生的重大变化。总而言之，我只能说，除了某些次要的估计性判断外，21年来的经验只是加强了我在这本书中阐述的观点。特别是关于马克思主义和布朗基主义的一章中有几段得到了证实，这几段所论述的问题，是先进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人政党当这些国家在最近期间发生政治革命时（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工人政党就会立刻达到统治地位）将会遇到的。这几段概括了促使我在本书以前写作《社会主义问题》这一组论文的那些思想，这些思想也给本书所有各章指出了方向，正因如此，我认为我更加应当提到这几段文章。

爱德华·伯恩斯坦

一九二〇年二月于柏林雪纳堡

法译本序——对我的社会主义的 批评家们的回答*

卡尔·马克思在他写给约·巴·冯·施威泽的论述蒲鲁东的信中说，

* 本文是伯恩斯坦为此书法文译本（书名改为《理论的社会主义和实践的社会主义》）写的序言。译自该书1900年巴黎法文版第Ⅶ—XXXⅡ页。——编者注

后者的《什么是财产》一书，在政治经济学的科学历史中几乎不值一提，但是他补充说：“这种耸人听闻的著作在科学中也像在小说文学中一样起着自己的作用”^①。

如果本书的作者能够向读者有所保证的话，那就是，他不是为了耸人听闻而写它的。在我的政治上的朋友们的要求之下，也可以说是压力之下，我才决定在一本书里阐发我在某几篇评论文章中发表过的观点，这些观点已经开始以一种完全出于意料之外的方式引起了注意。

这些文章的总标题是《社会主义问题》。我在其中讨论的问题，是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继续发展和它置于社会民主党支配之下的政治力量开始向实现提出的，我用“个人的观点和传统的观点”为副标题，这已经表示我决非自负有独特的创造性。我很了解，这些问题几乎都是别人已经讨论过的，而我所能够为这一讨论提供的少量新的东西，是从名为“马克思主义”或“科学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今天几乎在所有的国家，大多数战斗的社会主义者都已接受了这一理论）的角度来处理它们。

大家已经习惯把马克思主义看作一成不变的学说，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创立者或他们的弟子所作出的结论是同它的理论基础紧密联系不可分离的东西。因此对于这些结论的任何辩驳，哪怕是局部的，似乎都要威胁全部建筑。尤其是，某些马克思主义的权威解释者几乎有了一种习惯，以同样的敌视态度看待对于导师的学说的任何批评，不管批评是针对这一学说的基本观念，还是仅仅针对它的派生性假说，这就使上述情况更加严重。但是我的研究促使我怀疑这些假说中的某几个的效用并且表述了某些多少与之相反的假说，于是就引起了这样的叫喊：马克思主义被自己队伍中的一个人破坏了。

这也是促使我在一本书里解释我的观点的一个原因。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1版，第29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14页。——编者注

我着手写这本书，最初也不是没有沉重的顾虑的。我认为，要不再加重零散的文章所引起的印象，实际上是有困难的。批评意见的汇集必然会比个别的意见本身更多地像是针对全部理论的攻击。而我是没有任何一点意见可以撤回的。相反，在我已经发表的异端言论的单子上，我还有一些尚未发表的需要添上。

我为了避免担当人们已经开始派定给我的角色而作的一切努力都落空了。这书引起了轰动。它带来的后果是：整整一系列报纸和杂志上的文章，还有其他的书和小册子。马克思主义的敌人和信徒就这本书对于这一学说的态度的性质重新取得了一致的看法；对于他们说来，这是一本破坏性的著作。只不过前者宣称这本颠覆性批评的著作有效，后者则证实说它已经完全失败。由此产生了一方面的对名誉有损的恭维，另一方面的刻毒的攻击。尽管如此，还是得承认，在两个阵营里都有不少人保持着比较冷静的判断，他们按实际的面目对待我的书：一次修正、审查和析疑的尝试。

我敢期望，法国的评论也将按照这一精神来解释这本书。

* * *

在人们对本书所作的一切批评中，我承认有两点意见是有道理的，这两点在法国将特别被认为是很重的责备。一个意见是这本书在方法上有缺陷；另一个意见是书中的结论与其说是已解释清楚，不如说只是指出而已。在这典型的以方法见长的国家，在这对思想的精确性和明白性极高度珍视的国家，这些缺陷（就这一点说，它们是我的书所固有的）无疑将加倍地被感到。但是请允许我再说一遍，这本书与其说是没有完成，不如说是正在形成中，而作者的意图与其说是解决问题，不如说是提出问题。有人责备我没有把我的思想贯彻到底。除了别人外，威森格林博士也在一本名为《马克思主义的终结》的小册子中这样说。的确，我没有达到让人读了我的书就可以作出这一理论上的大变动的结论的效果。但就这一方面说来，完全不需要我花费精力来把这本书中包含的全部推论发挥到底。

问题不是在于用另一种学说或社会学理论来同名为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对立。问题也不在于反驳马克思主义。在这一点上，我有这样的意见：被普遍认为当代德国最有才气的社会学家之一的威·桑巴特^①教授说了一句决定性的话。他写道，社会科学的进步不在于驳倒马克思的科学著作的结论，而在于消化和发展这些结论，但是如果首先对这一理论作批判性的清算，那么这样的继承就不可能彻底。这是桑巴特在 1895 年写的，从那时以来的事件证明他是正确的。

但是哪里也没有人比大部分组成特殊的马克思主义学派的那些人更不乐意着手这一清算工作，而且不要说是着手，甚至不愿意容许这一工作。这可以用两点理由来解释。

一个理由基本上是感情上的。要一个思想家的门徒批判他的著作，这总是痛苦的。尤其是因为这一类的批判非常容易引起个人自大的嫌疑。

另一个理由是他们不仅把马克思主义这一名词理解为一种科学理论，而且还理解为一种政治学说。这样一来，那些把这二者认为绝对不可分离的人和坚决拥护这一政治学说的人，就很自然地认为，对科学理论的批判，哪怕只是局部的，就是政治性的攻击，就是对无产阶级的敌意行为，而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说是把这一阶级赞扬为支配性力量的。

不过，如果抱着这样的观点，这一理论显然会终于失去它的科学性质而变成一个宗派信条。这一信条在一定的时候能够变成对于政治学说的发展致命的东西，也就是说，能够反对政治学说适应已经改变的经济和政治条件。这同样也将达到使这一理论成为贫乏无用的地步。而必须说，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者同志用来反对我的批评中，正是这一贫乏无用的精神占了优势。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激烈地反对关于确定不变的真理的思想（例如《反杜林论》），但是这些批评家却把马克思主义理

① 威纳尔·桑巴特（1863—1941），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编者注

论的十分次要的部分甚至也看成至高至圣的教条，触动了这些教条就不可能不震动整个体系。难道是社会主义的敌人用来欢迎我的批评的那种多少有些嘈杂的赞扬把他们吵昏了吗？难道是担心我的叙述使工人垂头丧气或者惊慌失措吗？认为理论的基础本身受到威胁的那一群或者那一帮人，他们采取了一种真正的正统教会的态度。

来自这一方面的批评和攻击反映在或者集中表现在考茨基在《前进报》和《新时代》上反对我的文章里，他把这些文章收集并且补充成一本名为《伯恩施坦和社会民主党的纲领》的书（斯图加特，迪茨版）。考茨基的这本书受到一切从马克思主义方面反对我的人的欢迎，并且成为倍倍尔在汉诺威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反对我的书的六小时发言的理论基础，因此，批评这一本书，同时也就批评了几乎所有从这一方面对我指责的人。

考茨基的书的题名就已经说明了他的批评的倾向……《伯恩施坦和社会民主党的纲领》。这里所说的社会民主党纲领就是爱尔福特纲领，它大部分是由考茨基撰写的，本文的作者也得承认自己曾经多少起过助产的作用。因此我也要分担作者的责任。这一纲领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包含理论观点和党的原则与目的，另一部分包含党的当前要求。我目前被指控（我也承认）已经违背的是理论部分的开头五条或六条导言。它们构成纲领的最抽象的部分。

但是我起来加以反抗的不是抽象的形式。法国工人党最低纲领的导言比这还要抽象得多^①，但是我认为，它从各种角度看来都比爱尔福特纲领的有关段落高明。它只限于描述现代工业的一般趋势即由集体形式排除个体形式，只限于用尽可能少的几句话和非常谨慎的态度确认党的总目的和为实现这一目的所必需的经济条件。

爱尔福特纲领的理论段落太冗长了。它已经不再是对于事实或趋势的慎重表述，而是对于结局的戏剧性描写了。它的语言相当夸张，它

① 在这里要指出，这是出自马克思之手的。

是生气洋溢的控诉书，是对于感情和激情的呼吁。它是一篇优美的鼓动文章，在鼓动文章中，为了振聋发聩的必要，是允许夸张的。但是它就不再以事实为根据，它就不再是科学了。

举一个例子：

法国纲领的导言只是简单地说明，由于资本主义社会本身的发展，生产手段的个体占有形态日益被排斥，集体占有制的物质和精神因素日益形成了；爱尔福特纲领却宣称，这一发展必不可免地导致小作坊的毁灭，而这一变革的全部利益都被大资本家和大地主独占了，对于无产阶级和正在消失中的中等阶层——小资产阶级和农民——说来，这一变革意味着他们的生存的全部“不安定性”、贫困、压迫、奴役、退化和剥削的加重。

谁也不会否认这在大体上是正确的，而且当然必须承认，资本主义制度的趋势是朝着这一方向的。但是即使存在着这一趋势，当前社会的事实也并不在一切方面都同它适应。无论是小资产阶级或是农民都不是正在消失中。

也不能够说，先进国家中的贫困、奴役、退化确实是增加了。因为反对资本主义制度毁灭性趋势的社会反作用已经开始，它阻止这些趋势的极端后果的实现。可以承认这一点，同时对社会主义思想并不致丝毫有所损害。至少在我看来，社会主义的论证和实现并不取决于这些趋势的彻底实现。有其他力量——经济的力量和思想意识的力量——朝着社会主义的方向迈进。如同我在我的书中所说的，按照我的意见，社会主义的胜利并不取决于它的内在的经济必然性。我认为既没有可能，也没有必要赋予它以纯粹物质的基础。

据考茨基说，这一切都是同爱尔福特纲领的上述段落公然矛盾的，他在他的书中努力证明这一点。

他一方面指斥我对于纲领的解释不精确，另一方面指斥我对于经济事实的解释不精确。

说到第一方面的证明，法国读者对于它不可能感到多大兴趣。它

是围绕着“物质的”、“唯物主义的”、“内在必然性”等等等等概念的意义进行的。到目前为止，讨论只不过证明了一件事情：考茨基对这些概念的理解和我不同。

他在他的书的第 155 页上引用了爱尔福特纲领的一段话。在这段话里，社会主义的必然性是从工人阶级的需要推演出来的。他说：在这里可以看出，“伯恩斯坦对于社会主义的经济必然性概念的挑剔是怎么一回事”。但是如果同我的书对照一下，就会发现，我所反对的只是仅仅根据客观的历史必然性来论证社会主义的那种想法。

社会的一个特殊集团的改善地位的需要从来不是客观的事物。也许可以肯定说，在说明经济的变化时，不容许^①使用“客观的”一词，因为这些事情从来不是无需人力的媒介就能完成的。但是既然人们已经区分了客观力量和主观力量，人们就应当坚持这一区分的特征性标准。

形成这一标准的就是人的行为中的自觉的、自愿的、有目的的因素。一般的饮食需要是客观力量，但是改变饮食的愿望则是主观力量。为实现一个想法或者预期的目的所必需的超出日常生活习惯以外的事情，不是客观上必需的，不是以客观必要性为基础的。

凡是在人的意志并不指示方向的场合——例如在竞争中——当然可以谈到客观力量。但是在它形成决定性因素的场合，我们遇到的就是主观力量了。这里涉及的爱尔福特纲领的那一段话所说的工人阶级的需要，情况也是这样。

还可以这样提出问题：凡是涉及集体的预期目的时，在历史运动或社会运动中就存在着主观力量。但是凡是涉及社会的结果（这无非是个人或者甚至集体的行动的无意的产物）时，我们面临的的就是客观力量。在经济竞争中，每一个人的心目中都有预期的目的，但是总的结果同有关的个人所期望的始终不是一回事。因而“客观的”一词在这里

^① 刊载在《社会主义月刊》（1900年卷第1期）上的这篇序言的德文删节本作“一般说来不容许”。——编者注

就有道理了。^①

但是也可以看出，根据这样的区分——如果“客观的”和“主观的”这两个概念应当具有确定的意义的话，我看不出有别种区分，——就不可能为社会主义提出纯粹客观必然性的基础了。如果社会主义是客观的历史必然性，那么社会党的努力就是人们所能想象到的最多余的事情，就是真正的浪费力量。但是有谁能证明这个客观必然性呢？谁也不能！

不用说，人的意志从来不是绝对个人的或者主观的事物；它取决于许多生理的、历史的或社会的条件。环境的影响是一切有理性的人都理解的事情。环境，社会条件和自然条件，形成主观意志的客观基础。但是这一客观基础已经不是纯粹物质的东西了。伦理或法权观点，宗教信仰和科学理论在其中起重大的作用。不管它们的起源如何，不管它们同经济事实的关系如何，它们始终是从它们那一方面影响经济事实的思想意识力量，而且经常是以十分强有力的方式，经常产生相当重大的效果。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最初著作中这一思想意识力量的影响被忽视了，至少是没有得到充分明确的规定。这是恩格斯自己在1890年的一封信中承认了的。我证实这一点并且补充说，任何在今天打算应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的人应当依据恩格斯在他的一些最后的著作中所提出的成熟的和经过仔细推敲的形式。在一次论争中（这次论争与其说是以容易核实的引文为根据，不如说是以解释和推测为根

① 倍倍尔的发言中有几段话表明，这一解释不是多余的。他有好几次把“客观必然性”同“从最终目的看来的必然性”混为一谈。倍倍尔同样责备我比“资产阶级”教授桑巴特还要反动，因为桑巴特曾在布勒斯劳的一次演讲中表示反对人为地维持商业中的小企业。但是在我的书中找不到一句话是推荐这种人为的维持的。我不过是说——而这是桑巴特所证实的——，这些企业不会由于客观的经济必然性而自动消失。

另一个错误是考茨基也犯了的。这就是，倍倍尔把我所证实的社会剩余产品的实际分配情况同为总生产的产品分配的辩护混为一谈。倍倍尔的发言至少有3/4是以类似的错误为根据的。

据的，因此我更加不想在这里描述它了），考茨基在结束论述这一题目的一章时宣称，我“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的纠正是由不彻底的唯物主义构成的”！

对于这一指责，我回答说：第一，我不能发现，在我的书中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的纠正，除了恩格斯自己所作的以外还有别的；第二，我真正怀疑，在这一不完善的世界中果真会有“彻底的唯物主义”。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能发现它。

考茨基也反对我的这一说明：因为人类凭借对于他们的生存的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的认识以及相应的组织，已经达到能够支配自然和指导经济进化的程度，“历史的铁的必然性”的概念就相应地受到了限制。对他说来，这一说明是“使历史必然性同空想主义的自由相调和”的有罪的尝试。

对于我的如此苛刻的批评者来说，不幸的是，正是恩格斯本人，根据同马克思一致的意见，在他的《反杜林论》中把社会主义的实现描述为“从必然的王国到自由的王国的飞跃”。人们会承认这一评价比我的评价要绝对得多。我曾经问过考茨基，非难我的论题同维持恩格斯的论题这两件事怎样才能调和，我还在等待他的回答。

人们愈是把社会主义理解为客观必然性——也就是说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或者理解为从某些目的看来的必然性，经济积聚的诸问题就变得愈是重要。这就是为什么前一种观点的信奉者要激动不安地坚持，任何地方都只能看到积聚，而且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起草《共产党宣言》时所看到的那种形式的积聚。也是由此产生了对于我所提出的数字的激烈论战。我提出这些数字，是为了证明，在工业和商业（那里的积聚已成为不容争辩的事实）中，积聚还没有发展到理论所假定的那种程度；在农业方面，我们在许多国家甚至目击了分散化的过程；在财富的分配上，实际情况同资本不断积聚到数目愈来愈少的大资本家阶级之手的那一设想大相径庭。我的对手在这一方面对我提出的反对，全都是微不足道和矛盾百出的。他们在由于想证明这些数字不符

合事实的徒劳无功的努力而筋疲力尽以后，终于反驳我说，马克思自己已经承认资本家人数的增加。这是不错的，我自己也证实了这一点。但是问题不在于马克思在这里或那里说了些什么，而是在于以有产者人数减少的想法为根据的理论。

在现代国家中，工业的重要性同农业相比愈来愈增加，大工业所起的作用同中小工业相比愈来愈占优势——对于这些事实我自己也是经常肯定的，与此有关的反驳当然比较合理。但是在这一方面也有许多夸大。的确，如果分析一下大工业企业的生产率，就可以看出，尽管这些企业就所雇用的人数来说还只占少数，它们却代表远为巨大的产量；同样正确的是，一大批中小企业不过是大企业或者资本家公司的支店。同样正确的是——考茨基在他关于农业问题的书中所着重指出的——许多农业经营不过是工业企业的附属物。尽管如此，在这里也必须谨防夸大事情。在许多场合，工业企业是农业经营的附属物，而大工业代表了比中小工业更大的产量这一事实还没有证明后者是多余的。当倍倍尔在汉诺威大会上赞扬考茨基的议论时，他为了证明小工业的存在不过是表面上的，曾经说，现代的锁匠自己并不制造锁，而只是从工厂中买进锁来。这多少是有些夸大的，但是即使这是绝对的真理，它也还不会证明所提到的锁匠在社会上是多余的。他的职能不限于锁的制造。作为大工厂和消费者之间的中间经手人，他仍旧完全能够是不可缺少的——姑且不说“客观上必需的”。况且我自己也曾经证实，小工业的性质已经显著地改变了。

抛开对于已经实现的积聚的夸大不谈，人们还没有充分考虑到这里涉及的行政问题。这是一个不能预先解决的问题。我们只知道，国家和公社的行政领域不能一下子就扩展到生产和产品分配的社会化所要求的程度，生产合作社的情况也是如此。在这一方面，没有比英国各合作社的拥有几乎无限资本和无数顾主的巨大的批发合作社（中央购买合作社）在处理接受新的生产部门的问题时所表现的犹豫（我姑且不用更重的说法）更富有教育意义的了。

大家都知道，这一犹豫的原因大部分在于，管理和监督这么多的生产部门的困难日益增加了。虽然如此，批发合作社在全国生产中所占的份额是多么微小啊！1897年，它一共才雇用了5663名工人。

另一方面，当国家或公社将工业或公共服务社会化时，它们根本不是根据涉及的工业或服务的集中化程度而作出决定，而是根据公众利益的理由。

由于这一切原因，我不像信奉社会主义的客观必然性理论的人们那样重视工业企业的所谓自动的集中化。不错，存在着趋向这一方向的力量，而且如果没有工业集中化的这一显而易见的趋势，没有大工业中心的创立与发展，无疑是不会有真正的社会主义运动的。不可能否认社会主义运动的这一经济基础或者（如果人们愿意这样说的话）物质基础。但是一批数目愈来愈多的工人和他们的赞助者的废除资本主义统治的愿望或意志，即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精神，如果说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经济运动为基础的话，那么它决不会因此就仅仅是一个产物。它本身也是创造的力量。我们在先进民族的政治生活中每天都可以证实这一力量。例如，国民教育也是社会主义运动的重要因素，它帮助人们认识集体主义制度的好处，它鼓励他们在没有客观力量强制的推动的情况下创设这些制度。我甚至敢说，从经济必然性的观点看来，工业的社会化的实现差不多是同它们的集中化成反比例的。在多数情况下，导致它们的社会化的是非技术的原因。

考茨基认为这一观点是折衷主义思想方法的证明，对于他说来，这种思想方法^①是真正的阴森森的幽灵。凡是我拒绝只从一个方面考察问题的地方，他都证实是这一该死的折衷主义的致命后果。我承认英吉利—奥地利学派（杰文斯—柏姆）的价值理论可以同李嘉图—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并列，这也是使他感到最为愤怒的事情。承认两种互相矛盾的价值理论，同时照旧谈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确立统一性的必要，

① 这里及上半句中的“思想方法”一词在法文本中为“精神”。——编者注

这在他看来是混乱到了极点。他没有看到，我们所知道的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理论，仅仅在表面上是统一的。它以两个毫无共同之处的原则的融合为基础：生产的必要劳动时间和社会效用。马克思为了分析剩余价值的规律，对效用^①问题进行了抽象——这就是说，他假定在一定时期之内，供给和需求平均起来是相等的。但是他承认，或者说他自己在《资本论》第3卷中好几次宣布，有必要对社会效用作更为深入的分析。如果说不对供给和需求或者社会效用进行抽象就不能分析劳动价值的话，那么对于供给和需求的分析显然必须以生产费用即结晶在商品中的劳动为前提。由此产生的结果是，这些抽象^②中的一个在原则上并不比另一个更为正确或者更为错误。它们是否合理，取决于进行分析的目的。而从这一观点看来，我从来没有比现在更加认为，即使对于马克思的研究来说他的抽象是完全有道理的话，那么当问题在于把价值当作决定价格的因素来分析时，就不再容许进行这种抽象了。

难道这一断定就意味着牺牲思想的统一性吗？我不相信。我倒认为这是恢复了统一性。在这里谈不到折衷主义。科学的进步在于区分本质上不同的事物。考茨基自己也承认马克思的价值论有缺陷。他责备我打算通过输入同马克思主义理论格格不入、对它敌视并且是为了反驳马克思主义而制定的观念来补充这些缺陷。就算是这样那又怎么办呢？马克思主义不是一个确定不变的体系；它希望成为科学，而对于科学来说，问题不在于知道一种理论是在什么目的或者什么政治意图下制定的，而是在于它是否精确。劳动价值理论和效用价值理论之间的绝对矛盾，固然可能存在于为了反驳前一理论而制定后一理论的经济学家的观念中，但是并不会因此必然存在于现实中。在科学的历史中经常发生这样的情况：一种假说原来是为了反驳另一种假说而制定的，结果却被认为是它的补充。

读者们会弄清楚在我的探索社会主义问题的态度同考茨基针对我

① 德文本在“效用”二字后有“(需要)”二字。——编者注

② “抽象”二字在法文本中为“分析”。——编者注

的批评的态度之间的区别。我没有必要刻画后一种态度；我只要指出区别所在，以便使法国读者理解考茨基怎么能达到这一地步，即把我的书斥责为完全抛弃马克思主义。

至于我所说到的实际问题，我请求读者不要忽视，我只打算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当前任务略加考察。至于说到策略问题，那么读者也不会忘记，我的话是针对德国特别是普鲁士的当前政治形势而发的。

大家知道，恩格斯在去世前几个月曾经说过，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利益在于，尽可能避免它的力量同国家的武装力量之间的冲突。好吧，如果承认这一论题，那就必须也从它引申出结论来。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我表示反对使用会叫人猜想党反而愿意挑起这类冲突的那种用语，是有好处的。这些话是顺便对德国社会主义报纸的几个同事说的，却被认为是对于党的普遍批评，它给我招来的攻击也许比我在学说上所犯的全部罪过所招来的还要多。

我关于自由主义所说的话也是一样。尽管我十分明确地把一般的历史性运动同当代以“自由”命名的党派区分开来。我还是受到了严重的攻击，说我为“自由派”辩护，说我打算使社会党成为资产阶级政党的单纯附属品。我为这一误解感到遗憾，但是我不能从我在这一题目上所写的东西中撤回任何一点。如果有人在上面涉及的话中发现向无政府主义的某种让步，我的回答就是，如果说我是那种宣扬盗窃和谋杀的无政府主义的死敌的话，我同样也是那种忽视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和运用立法的重要性的无政府主义的反对者。但是我认为，而且长期以来一直认为，自由的无政府主义是对于极端国家主义的自然的和健康的反作用。四年多以前，我在《新时代》上写道，在我看来，社会民主党不可能有这样的使命，即培养一代把国家当作一切物品的大分配者的人。在我的书的第四章第三节里还可以发现一个1890年提出的论题，它是根据同样的精神考虑出来的。我坚定地相信，工人阶级在经济上的创造不仅是它的政治行动的支柱，而是具有更大的重要意义。

我再说一次，我不是把我的想法当作本质上新的东西提出来的。

另一方面，想否认任何功绩将是过分的谦虚。我认为我的功劳在于我提出这些问题的方式，我也认为我在这个或那个理论问题上说出了一些新的东西。但是我很清楚，我的话大部分不过是重复别人已经说过的东西。我倒是愿意把在我所遵循的方向上走在我前面的作者列举出来，但是我放弃了这种打算。因为名单会太长。在这名单上可以找到所有国家、所有学派的社会主义者，当代的社会主义者和前几代的社会主义者。如果把我的大部分言论当作老生常谈，我只会感到高兴。如果责难我犯了折衷主义，我只会婉言辩护。我完全认识对事实进行有条有理的研究和系统的分类的重要性，而且在我看来，马克思主义（按照它的创立人所表述的那个样子）的一个重大缺陷在于它缺乏系统的阐述。但是我也主张，现代各民族的生活十分复杂，因而——也可以这样说——不能被包括在一个单一的原则的狭窄范围内。如果说，演绎或者思辨的方法对于专门的研究能起巨大的作用，那么对于整体的精密理解说来，它是绝对不够的。

我在另一个地方曾经说过：对于我说来，统一并不是一致。即使我们能够做到用无懈可击的方法确定我们称之为世界物质的最低级的规律和最简单的形态，即使我们能在我们的实验室中把一切其他因素都分解成这一最低级的形态，那么我们也不会因此就免除为我们的实际行动而考虑这一物质的发达的形态以及它的性质的发达的形态的必要。——它们在各自的确定的领域里，对于我说来始终是不同的偶然性事物。对于我们的社会生活的诸因素来说，情况也是一样。（《新时代》，第17年卷（1898—1899），第2册，第851页）为了理解这一生活的全部多种多样的形态，必须求助于综合的或者折衷的方法。

在实践上，我们大家都是这样做的。至于在理论上，由于必须明确地强调一个原则或者一种力量的影响，这一点就往往不可能做到了。这就是为什么各种理论之间的矛盾，往往与其说是实际的，不如说是表面的。它们所根据的是同样的事实，不过从不同的观点考察这些事实，这一些理论并不比另一些理论更为错误或者更为正确。它们不是互相

排斥，而是互相补充。

但是这一点正是有教条主义思想的人从来不愿意承认的。因此有些马克思主义者为了我的缘故发出这种惊惶的喊声：他使蒲鲁东复活了！我回答他们说，使《工人阶级的政治能力》一书的作者复活的不是我，而是事物的实际情况。马克思对于蒲鲁东所作的批评并不因此失效。只不过是，这一批评并没有打中这一思想家所说的全部的话。对于其他被认为已经过时或者甚至完全忘记掉的社会主义者来说，情况也是一样。今天的伟大的社会主义运动使他们在他们的思想的局部实现之中再生了。

“在论战中打垮一个作家是很容易的。但是最多只能做到消灭他的怪癖和弱点。他所提出的具有生命力的思想，即使通过最有才华的论战也是不能被消灭的。”

这是我在五个月以前就这一问题所发表的意见。从那时以来发生的事情就性质说并没有使我怀疑这几句话的正确性。

当我在写这篇序言的时候，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代表大会正在汉诺威开会。大会为这本书花费了相当多的时间。情绪激动的人们曾经预言大会将作出毁灭性的裁决，而旨在导致这样的裁决的发言是并不缺少的。但是党的健全的理智和实际经验获得了对于教会精神的胜利，结局是一项决议，它的一部分至多不过触及作者表达自己的思想的形式，而另一部分则对这些思想的本质本身作了相当大的让步。这些让步是：容许结成选举同盟，承认合作社对于工人解放的事业有益处，放弃认为党的现行纲领必须超出宣布原则和基本要求的范围的观点。我虽然被控为反对爱尔福特纲领的开头五条导言的异端，但是我承认大会是足够明智的，因而在上述决议中没有谈到这一点。

大唱凯歌是既缺乏风度也不符合事实的。

但是人们会允许作者有权利在最后说，他没有感到他在这本书中发表的信念丝毫有所动摇。

注：法文版并不全部都是德文版的逐字译本。在一两处地方删去了某些只是专门和德国有关的段落或者只有次要意义的论战性注释；作者也考虑到对于他的书的批评，因而对自己的思想作了更为正确的表述，但是在原则方面没有作任何变动。

爱·伯

英译本序*

本书不仅有自己的历史，它也多少可以说创造了一小段历史。它是由德文版序言中所描写的那种环境引起的，一出版就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内外造成了相当大的轰动。社会主义的敌人宣称它是压倒一切的证据，证明社会主义理论和对于资本主义的批评是靠不住的。而社会主义的著述家，首先是考茨基，斥责它抛弃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和观点。德国社会民主党在这一切的影响下把这本书列入汉诺威代表大会（1899年10月）的议程，大会在讨论它时进行了三天半之久的辩论，终于通过了旨在拒绝作者所提出的观点的一项决议。

当时我不能参加辩论。由于政治性的原因，我不得不在德国领土之外。但是我在那时曾声明说，我认为我的同志们关于此书的激动是一种神经受了刺激的状态的后果，造成这种状态的是社会主义的敌人根据书中的某些句子作出的一些推论，还有对于我所反对的那些教义对社会主义的重要性的过高估计。但是我什么也不能撤回，而且虽然已经过了十年，我现在也已经对德国的政治和经济情况有了七年的极为深刻的知识，但是我在任何重大论点上都不能让步。书中提出的观点后来得到了修正主义的别名，虽然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被称为修正主义者的人中，有一些人在某几点上抱着和我不同的看法，但是整个

* 本文是伯恩斯坦为本书英文节译本（书名改为《进化的社会主义》）写的序言。译自该书1909年纽约英文版第X XI—X X III页。——编者注

说来，这本书可以看作德国社会民主党修正主义者的理论和政治倾向的说明。它在德国被广泛地阅读着；刚刚几星期以前还出了一次新版——第9版。

由于已在德文第1版序言中解释过的那些原因，本书在有些地方是相当匆促地写成的。但是我认为，它的主要目的会充分清楚地表现出来。这主要目的是，竭力强调德国所说的 *Gegenwartarbeit*^①——社会党的日常工作。这是在田沟里的工作，许多人认为它同将要来的伟大剧变比起来，只不过是暂时应付的工作，因而其中有不少项一直只是被半心半意地进行着。我根本无法相信终极目的，因此也不能相信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但是我坚决地相信社会主义运动，相信工人阶级的向前迈进，他们一定会通过把社会从商人地主寡头政治的统治领域改变成真正的民主制度（它的一切部门都是受工作和创造的人们的利益指引的）而一步一步地实现自己的解放。

爱·伯恩斯坦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成分

由于这些发现，社会主义变成了科学，现在首先要做的是对这门科学的一切细节和联系作进一步的探讨。

恩格斯：《欧根·杜林先生对科学所作的变革》^②

德国社会民主党现在承认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制定并且被他们称为

① 德文，意为：“当前工作”。——编者注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66页。——编者注

科学社会主义的那一社会学说是它的行动的理论基础。这就是说，社会民主党作为战斗的党虽然代表一定的利益和倾向，为自己确定的目的而斗争，但是它在确定这些目的时归根到底而且在决定性方面是遵循这样的认识的，这一认识有可能提供完全依靠经验和逻辑作为证明材料并且同经验和逻辑吻合的客观证据。因为无法提供这种证据的，就不再是科学，而是以主观灵感，以单纯的愿望和想象为根据的了。

在一切科学中都可以区分出纯粹的和应用的理论来。前者由一些从有关这一方面的全部经验推演出来并且被认为是普遍适用的认识原理组成。它们构成理论中的不变成分。把这些原理应用于各个现象或各个实践事例，就形成了应用科学：由这种应用而获得并被概括成定理的认识，就是应用科学的原理。它们构成学说体系中的可变成分。

不过所谓不变和可变，在这里只能有条件地理解。纯粹科学的原理也要发生变动，不过这些变动多半采取附加限制条件的形式。随着认识的前进，一些过去被赋予绝对有效性的原理就被认为是有条件的了，它们被补充以新的认识原理，这些新的原理对它们的有效性加以限制，但同时也扩大了纯粹科学的领域^①。反过来说，在应用科学中，个别的原理对于一定的情况来说是保持持久的有效性的。一个农业化学或者电工学的定理，只要是经过检验的，那么只要它所依据的前提重复出现，它就总是正确的。但是前提因素及其组合可能性的多样性使这类定理产生无穷尽的多样性，并且使它们彼此之间的价值对比经常发生变动。实践不断地创造新的认识材料，并且可以说每天都在改变总的图景，不断地使一度曾经是新的成就的那些东西移到了陈旧方法的项下。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作过把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纯粹科学从它的应用部分系统地析离出来的尝试，虽然这一方面的重要的准备工作并不缺乏。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于它的历史观的著名

^① 在这一方面，特别是自然科学提供了令人信服的例子。别的不说，我们可以回想一下原子论的命运。

表述和弗·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发展到科学》的第三部分，是应当作为最重要的表述在这里列为首位的。在上述序言中，马克思以十分简练、明确、摆脱一切同特殊现象、特殊形式的关系的句子表述了他的历史哲学或社会哲学的一般特征，在任何别的地方都没有说得这样简洁。马克思的历史哲学的主要思想在这里一点也不缺少。

恩格斯的这一著作一部分是马克思的原理的比较通俗的表述，一部分是这些原理的扩大。在这一著作中涉及了像（被马克思描述为市民社会的）现代社会这样的特殊发展现象，并且比较详细地预示了它们的进一步发展过程，因此有许多地方已经可以说是应用科学了。书中的个别地方已经可以分离出来，而不致损害基本思想。但是主要原理的表述还是很一般的，完全可以要求把它看成马克思主义的纯粹科学。马克思主义不希望仅仅成为抽象的历史理论，这一事实也使上述要求有了理由和必要。马克思主义希望既是现代社会的理论，同时又是这一社会的发展的理论。如果我们想严格区分，就已经可以把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后一部分称为应用的学说，但是这一应用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是完全本质性的，如果没有这一应用，它恐怕会几乎失去作为政治科学的任何意义。因此必须把关于现代社会的这些阐述的一般原理或主要原理仍旧算成马克思主义的纯粹理论。如果说当前的、在法律上以私有财产和自由竞争为基础的社会制度对于人类历史来说是一个特殊情况，那么它对于当前的文化时期来说毕竟同时又是普遍的和持久的情况。因此，凡是在马克思对于资产阶级社会及其发展过程的描述中无条件适用、也就是不问民族和地方特点一律适用的一切东西，都属于纯粹理论的领域，与此相反，凡是涉及一时的和地方的特殊现象和推测的一切东西、发展的一切特殊形式，都属于应用科学。

用烦琐哲学一词来毁谤对于马克思理论的比较带有分析性的钻研，已成了一个时期以来的风尚。这样的标语口号说起来是很方便的，正因如此就要求非常慎重。如果要概念不致庸俗化，推论不致僵化成纯粹的信条，那么对概念进行研究，区分偶然的事物和本质的事物，是

永远重新有必要的。烦琐哲学不仅曾经在概念上钻牛角尖，它不仅曾经担任正教的帮手，而且当它从概念上分析神学的教义时，它大大促成了教条主义的克服；它挖空了正教独断论用来抵挡自由的哲学研究的那堵墙的墙脚——在烦琐哲学开垦出来的土地上，生长起来笛卡儿和斯宾诺莎的哲学。烦琐哲学也有不同的类型：辩护的和批判的。后者从来就是被一切正统派深恶痛绝的。

在我们按上述方式分解马克思学说体系的各个成分时，我们获得了一个估计这一学说的各个原理对于整个体系的价值的主要尺度。如果把纯粹科学的任何一个原理去掉，也就随之去掉了基础的一个片断，于是整个建筑的一大部分就失去了支柱，成为摇摇欲坠的了。应用科学的原理却是另外一种情况。这些原理可以取消，却丝毫不致震动基础。的确，可以取消应用科学的一整批原理，却不致殃及其他部分。在这种情况下，只需要指出，在中间环节的构造上犯了一个错误。如果指不出这样的错误，那么当然不可避免地要得出这样的结论：基础上有一个缺陷或者漏洞。

在这里进行直到较小细节的系统的分解，却不在本书计划的范围之内，因为问题并不在于对马克思的学说作详尽无遗的叙述和批判。我的目的只是，把上述历史唯物主义的纲要，把（在这一纲要中已经包含萌芽的）关于一般的阶级斗争以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特殊的阶级斗争的学说，还有剩余价值学说连同关于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方式的学说，以及关于这一社会的以这一生产方式为基础的发展趋势的学说，当作我所认为构成马克思主义纯粹科学的建筑的那些东西的主要组成部分而加以描述。不言而喻，同应用科学的诸原理一样，纯粹科学的诸原理对于体系的价值也是各不相同的。

没有任何人会不同意，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中的最重要环节，也可以说是贯串整个体系的基本规律，是它的特殊的历史理论，这一理论被命名为唯物主义的历史观。整个体系在原则上是同它共存亡的。在这一理论受到限制时，其余的环节彼此相对的地位也相应地要随之受到影

响。因此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的任何探讨，都必须以这一理论是否有效和怎样有效这一问题为出发点。

第二节 唯物主义历史观和历史必然性

我们在反驳我们的论敌时，常常不得不强调被他们否认的主要原则，并且不是始终都有时间、地点和机会来给其他参与相互作用的因素以应有的重视。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90年的信，载于
《社会主义大学生》，1895年10月^①

关于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正确性的问题，就是关于历史必然性及其根源的问题。做一个唯物主义者，首先意味着把一切现象归因于物质的必然的运动。根据唯物主义理论，物质的运动是作为机械过程而以必然性实现的。任何过程发生时，都不会没有它的从一开始就是必然的后果，任何现象都不会没有它的物质原因。因此，决定思想和意志趋向的形态的是物质的运动，思想和意志趋向以及从而人类世界的一切现象因而也是物质上必然的。所以唯物主义者是不信神的加尔文教徒。如果说他不相信任何神定的宿命，那么他毕竟相信而且必须相信，不管从随便什么时刻起，此后的一切现象都是由已存在的物质的总和和它的各部分的力量关系预先决定的。

所以把唯物主义转用于解释历史，就意味着从根本上主张一切历史的过程和发展的必然性。对于唯物主义者说来，问题仅仅在于，必然性是以什么方式在人类历史中贯彻的，什么力量要素或者哪些力量因素在其中起决定作用，各种不同的力量因素彼此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关系，自然、经济、法律制度、思想在历史中各起什么作用。

马克思在上述地方作出的回答是，他把各个时期的物质生产力和

^① 即1890年9月21—22日恩格斯致约·布洛赫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98页。——编者注

人的生产关系称为决定性因素。“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他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法律制度和政治制度，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是和它们相适应的〕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但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因此，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①

首先要预先说明一下，结句和前一句中的“最后”一词是无法证明的，却是多少有些根据的假设。不过它对于这一理论来说也不是本质的，不如说它已经属于应用的范围，因此这里可以不去管它。

如果考察一下其余的句子，那么除了“或慢或快地”（其中含意固然很多）不算，首先引人注目的是它们的独断的措辞。例如在上面引述的第二句中，“意识”和“存在”被如此截然地对立起来，以致几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就是说把人仅仅看成历史力量的活的代理人，他几乎是违反着自己的意志而执行历史力量的任务。只通过一个句子对此作了部分的修订，这一句话在这里被当作次要的话而略去了。在这句话中强调了在社会变革时对生产条件中的物质变革同“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意识形态”加以区别的必要性。整个说来，人的意识和意愿表现为非常从属于物质运动的因素。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页。方括号中的话是伯恩施坦加进去的。——编者注

在《资本论》第一卷的序言中,我们碰到一个同样带有宿命论音调的句子。这里说的是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问题在于……**这些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①不过,在刚刚还说到规律的地方,结尾时却不是这一死板的概念,而是挤进一个比较有伸缩性的概念来代替它。这个概念是:**趋势**。而在下一页接着就出现了那个常被引用的句子,说社会能够把自然的发展阶段的生育时的痛苦“**缩短和减轻**”。^②

当马克思还在世时,恩格斯曾在反对杜林的论述历史唯物主义的论争性著作中作了同马克思一致的说明,在这一说明中,人对于生产关系的从属性显得更为有条件得多。那里是这样说的:“一切社会变动和政治变革的最后原因”不应当在人的头脑中去寻找,而是应当“在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革中”去寻找。但是“最后原因”包含其他类型的起协助作用的原因,即第二级和第三级等等的原因,显然这类原因的系列越大,最后原因的决定力在质量上和数量上所受的**限制就越大**。它们起作用的事实依旧存在,但是事物的最后形态并不是仅仅取决于它们。凡是作为几种不同力量的活动的后果的作用,只有当这一切力量都已被精确了解并且按照它们的十足的价值加以估计的时候,才能够有把握地加以计算。正如任何数学家都知道的那样,哪怕忽视一个低级的力量,也会引起大的误差。

弗·恩格斯在他的后期著作中更进一步对生产关系的决定力作了限制。尤其是1895年10月发表在《社会主义大学生》上的两封信,一封是1890年写的,另一封是1894年写的。在这些信中,“法权形式”,政治的、法律和哲学的理论,宗教观点或教义,被列举为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作用并且在许多场合“**主要地决定这些斗争的形式**”的影响。信中说:“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而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

① 《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8页。黑体是伯恩斯坦用的。——编者注

② 《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0页。——编者注

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力的产物。因为任何一个人的愿望都会受到任何另一个人的妨碍，而最后出现的结果就是谁都没有希望过的事物。”（1890年的信）^①“政治、法、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作用并对经济基础发生作用”（见1894年的一封信）。^②人们会承认，这听起来同本节开头引用的马克思的那一段话多少有些不同。

当然不应当断定，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在任何时候忽视非经济因素对历史进程发生影响这一事实。从他们的早期著作中可以引证无数的章句来反对这样的假设。但是这里的问题在于程度，不是在于是否承认思想意识的诸因素，而是在于把对于历史的多大程度的影响、什么样的重要性归于它们。在这一方面却完全不容否认，马克思和恩格斯起初承认的非经济因素在社会发展中的协助作用以及它们对生产关系的反作用，比在他们的后期著作中所承认的要小得多。这也是符合任何新理论的自然发展过程的。一种新理论经常首先以断然的、独断的表述方式出现。为了给自己树立威信，它必然证明旧的理论站不住脚，而在这种斗争中，片面性和夸大自然是适当的。在我们当作格言放在本节前面的句子中，恩格斯毫无保留地承认了这一点，他在这一句后面还接着说：“可惜人们往往以为，只要掌握了主要原理……那就算已经充分地理解了新理论并且立刻就能够应用它了。”^③今天应用唯物主义历史理论的人有义务按照成熟的形态而不是按照最初的形态应用它，这就是说，他有义务除了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和影响，还对每一时代的法权的和道德的概念、历史的和宗教的传统、对地理的影响和其他的自然影响（人本身的性质和人的精神素质的性质也属于这一范围）加

① 即1890年9月21—22日恩格斯致约·布洛赫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97页。——编者注

② 即1894年1月25日恩格斯致瓦·博尔吉乌斯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32页。——编者注

③ 1890年9月21—22日恩格斯致约·布洛赫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98页。——编者注

以充分的考虑。^①当问题不再是在于对过去的历史时代的纯粹研究，而已经是在于对未来发展的拟想的时候，当唯物主义历史观应当作为对未来的指南而起帮助作用的时候，尤其特别要注意这一点。

社会主义的批评针对把人的性质看成某种一成不变的东西的理论，正确地指出了人的性质在不同的国家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经历的一些大的变动，以及一定时代的人在被迁移到别种条件下时所表明的变化能力。实际上，如果仅就对于新的自然条件和新的社会环境的适应能力来说，人的性质是很富有伸缩性的。不过有一点一定不能忘记。当问题涉及像现代民族这样大的群体以及他们在数千年之久的发展中养成的生活习惯时，甚至不能期望较大的所有制变革能引起人的性质的迅速变化，这尤其是因为经济关系和财产关系只构成对人的性质有决定性影响的社会环境的一部分。在这里也应当考虑到多种多样的因素，除了历史唯物主义最看重的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以外，别的不说，还得加上地域的群集关系或聚集关系（territoriale Gruppierungs- oder Agglomerationsverhältnisse），也就是人口的地区分布和交通。^②这些关系固然是由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决定的，但它们一旦产生，就要发生特有的反作用。

恩格斯曾在 1890 年 10 月 27 日给康拉德·施密特的一封信中精辟地指出，社会制度怎样从经济发展的产物独立化为具有自在运动的社会权力，这些权力又能够反过来影响经济发展，根据不同的情况，或者促进它，或者阻止它，或者把它引上别的轨道。他首先举国家权力为例，在这

① 贝尔福特·巴克斯从对抗某种（当然多半只是存在于他的想象中的）对于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夸大的需要出发，想出了一种新的历史观，他称之为综合的历史观。这一来，他就用一个在这里毫无概念的词代替了一个可能错误地导致夸大的词。所谓综合的——总括的——是一个关于方法的纯粹的形式概念，但是对于指导研究的观点却丝毫没有说明。如同上面所指明的，历史唯物主义也包含对于物质的和思想意识的力量的总括。但是如果说巴克斯选择了一个毫无意义的用语来代替一个能被误解的用语，那么格·普列汉诺夫就是在另一个方面胜过了他。普列汉诺夫在他的《唯物主义史论丛》中为马克思的历史观要求“一元的”这一名称。为什么不宁可索性用“单纯的”一词呢？——第 1 版第 8 页注

② 法译本（第 15 页）作：“人口的地区分布和国际关系”。——编者注

里他用把国家的起源归因于社会分工这一很重要的观点补充了他在大多数场合使用的认为国家是阶级统治和镇压机关的定义。^①可见历史唯物主义根本不否认政治力量和思想意识力量的自在运动，它只是反对把这种自在运动绝对化，并且指出，社会生活的经济基础的发展——生产关系和阶级发展——对这些力量的运动所发生的影响是较强的。

但是无论如何，因素的多样性仍旧存在，要想精确地揭露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以便有把握地确定，在某一场合应当到哪里去寻找当时的最强大的动力，这决不总是容易的事。纯粹的经济原因首先只是创造接受某些思想的素质，但是这些思想怎样兴起和传播以及采取什么形式，取决于一整系列影响的协助作用。如果一上来就认为，坚决地强调除了纯粹经济性影响以外的其他影响和考虑到除了生产技术及其预测到的发展以外的其他经济因素，就是折衷主义，并且高傲地加以拒绝，那么，这对于历史唯物主义是害多于利的。折衷主义——从对于现象的种种不同的解释和处理方式中进行选择——往往只是对于企图从一物引出万物并且以独一无二的方法处理万物的教条主义渴望的自然的反作用。每当这种渴望发展过度，折衷精神总是要一再以强大的自发力量为自己开辟道路。这是清醒的理智对于任何教条所固有的把思想“用脚镣锁起来”的倾向的反叛。^②

① 当然在《家庭的起源》中也详细地说明了社会分工如何使国家的发生成为必要。但是恩格斯后来完全抛弃了国家起源的这一侧面，并且像在《反杜林论》中那样，最后只是把国家当作政治压迫的机关对待。

② 这样说，当然既不是否认折衷主义的庸俗化倾向，也不是否认一元地理解事物的努力的巨大理论和实践价值。没有这样的努力，就没有科学思想。但是生活比一切理论都包罗更广，因此一本正经的教条最后仍旧不得不降低身份，偷偷地向折衷主义者这个在生活的花园里老脸皮厚到处偷吃的花花公子借钱，而在全世界面前却通过如下的办法来接受这笔借款，即在事后声称，它“在基本上也总是”有这样或那样的想法的。

“洛克和笛卡儿所从没有想到的，
天才和心却完成了，
而他们也立刻就证明，
做到的可能性。”

在社会科学的历史中，合作制的理论和实践的历史为这一方面提供了一个好例。

除了纯粹的经济力量以外的其他力量对于社会生活影响的程度愈大，我们称之为历史必然性的支配作用的变化也就愈多。在现代社会中，我们可以在这一方面区分出两大潮流来。一方面表现出对于发展特别是经济发展的规律的日益深入的洞察。与这一认识携手并进，部分地作为这一认识的原因，而部分地又反过来作为它的后果的是，日益增加的指导经济发展的能力。同物理的自然力一样，经济的自然力的本质被认识到多大程度，它就在多大程度上从人的主人变成仆人。因而社会对于经济的动力的关系，在理论上比过去要更为自由，只是它的各个分子——私人利益和集团利益的力量——之间的利害冲突妨碍这一理论上的自由充分转化为实践上的自由。但是即使在这里，整体利益的力量也以日益增长的程度超过私人利益的力量。随着这种情况的发展，凡是在发生这种情况的地方，经济力量的原始支配作用就相应地消失。它们的发展被预见到了，因此就更加迅速、更加容易地得到实现。个人和整个整个的民族就这样使自己生活的愈来愈大的部分摆脱了无需他们的意志或者违反他们的意志而实现的必然性的影响。

但是因为人对于经济因素给以愈来愈大的注意，就容易产生这样的表面现象，似乎经济因素今天所起的作用比过去更大。其实情况却不是这样。所以引起这种错觉，不过是因为经济动机今天是自由地出场的，而它在以前是被各种各样的统治关系和意识形态掩盖着的。现代社会在不受经济和作为经济力量起作用的自然所制约的意识形态方面反而比以前的诸社会更为丰富。^①科学、艺术和相当大的一批社会关

① 凡是认为这是似是而非的奇谈的人，可以请他回想一下，居民中的人数最多的阶级一般是在现代社会才被算作对于上面所阐述的意义上的自由的意识形态来说有价值的。农民和工人从前是部分地为了经济的目的，部分地在反映了自然对人的支配的那些意识形态的影响下，在法律上受到束缚的。大家知道，自然对人的支配也是原始民族的意识形态（迷信）的主要特征。因此当恩斯特·贝尔福特·巴克斯在他的论文《综合的和唯物主义的历史观》（《社会主义月刊》1897年12月）中说，他承认，在文明中，经济因素几乎始终是决定性的，但是在史前时期，它对于玄虚信仰的直接影响却较少，那里起决定作用的是“人的思维和感觉的基本规律”，那么他是根据纯粹的表面差别而把事物头脚倒置了。在史前各族那里，他们周围的自然是决定性的经济力量，并且作为这种

系，今天同从前的任何时期比起来，对于经济的依赖程度要小得多。或者，为了不致留下误解的余地，可以说，经济发展今天已经达到的水平容许意识形态因素特别是伦理因素有比从前更为广阔的独立活动的余地。因此，技术和经济的发展同其他社会制度的发展之间的因果联系变得愈来愈间接了，从而前者的自然必然性对于后者的形态的决定性影响就愈来愈小了。

“历史的铁的必然性”就这样受到了一种限制，不过我要先说明，这对于社会民主党的实践来说，并不意味着社会政治任务的缩小，而是意味着它的提高和修订。

总之，我们今天所见到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形态，和它的创始人起初赋予它的形态是不同的。它在创始人自己那里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在创始人自己那里，它的独断主义的解释也受到了一些限制。如同已经指明的那样，任何理论的历史都是这样。如果从恩格斯在给康拉德·施密特的信和在《社会主义大学生》发表的信中赋予历史唯物主义的那一成熟形式向后追溯到最初的一些定义，并且以此为根据而对它作“一元论”的解释，这会极大的退步。不如说应当用那些信来补充最初的定义。理论的基本思想并不因此丧失它的统一性，但是理论本身的科学性却提高了。它有了这些补充才真正成为科学的历史考察的理论。在马克思这样的人手中，它能够以它最初的形式成为伟大历史发现的杠杆，但是连他的天才也被它错误地引导到形形色色的错误结论。^①所有的既不具备他那样的天才、又不具备他那样的知识的人就更

力量对他们的思维和感觉产生最大的影响。巴克斯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批评之所以几乎总是射不中靶的，其原因之一是，他恰恰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说明中原来被夸大得最厉害的地方，表现得极端正统。

^① 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屡次被引用的一段话中说：“事实上，通过分析找出宗教幻象的世俗核心，比反过来从当时的现实生活关系中引出它的天国形式要容易得多。后面这种方法是唯一的唯物主义的方法，因而也是唯一科学的方法。”（《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29页，黑体字是伯恩斯坦改用的。——编者注）这一对比包含着巨大的夸张。在人们还不认识已经天国化的形式时，上述演绎方式将错误地导致形形色色的任意构想。如果人们认识了这些形式，上述的演绎是科学分析的手段，但不是分析性说明的科学的对立物。

不用说了。作为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基础，唯物主义历史观在今天只有按前述的扩大才能有效。一切应用，如果没有考虑或者没有充分地考虑由这一扩大所指出的物质力量和思想力量的相互作用，那么不管它是出自理论的创始人自己还是出自别人，都应当据此相应地加以纠正。

* * *

前节写成以后，我收到了《德意志言论》的1898年10月号，其中载有沃尔夫冈·海涅^①的《保尔·巴尔特^②的历史哲学和他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反驳》一文。海涅在文章中捍卫马克思的历史观，反对著名的莱比锡大学讲师对它的指责。后者说马克思把物质的概念缩小成技术的和经济的東西，因此经济史观这一名称对它更为适合。海涅用上面引过的恩格斯在90年代写的信来反驳这一说法，并且用他自己的一些很值得注意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个别证据以及意识形态的起源、发展和影响力的考察对此作了补充。据他说，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于意识形态能作出比迄今所做的更大的让步，却不致因此丧失它在思想上的统一性，而它为了保持为科学的、给事实以恰当估价的理论，必须对意识形态作出这种让步。重要的不是在于，马克思主义著作家是否到处都不忘记传统思想的影响和新的经济事实之间不可否认的联系，或者是否对这一联系加以足够的强调，而是在于对这一联系的充分的承认是否同唯物主义历史观的体系配合得上。

原则上说，这—问题是提得绝对正确的。这里的问题同科学中任何地方最后的问题—样，是一个界限问题。卡尔·考茨基在他的论文《唯物主义历史观能有什么成就？》中也是这样提出问题的。但是必须始终意识到，原来这问题并不是在这一限度内提出的，而技术和经济因素是被认为在历史上具有几乎无限的决定力的。

海涅的意见是，争论的中心归根到底是决定性因素的量的关系，他补充说，问题的解决“在实践上的重要性比理论上的重要性更大”。

① 沃尔夫冈·海涅（1861—1944），德国社会民主党党员，修正主义者。——编者注

② 保尔·巴尔特（1858—1922），德国政论家，坚决反对马克思主义。——编者注

我想建议,不要说“比……更大”,而说“像……一样”。但是我也确信,所涉及的是一个在实践上更为重要的问题。对于以过分强调历史上技术的和经济的决定因素为基础而表述的那些原理,按照其他因素已知的量的关系加以订正,这是有巨大的实践意义的。由实践来订正理论是不够的,如果理论毕竟应当有一定的价值的话,它必须懂得承认订正的意义。

那么最后就要提出这一问题:如果继续按上述方式通过插入其他力量而扩大唯物主义历史观,那么它到什么程度为止还能有权利叫这个名字。事实上按照前引的恩格斯的说明,它并不是纯粹唯物主义的,更谈不到是纯粹经济的了。我不否认,名实并不完全相符。但是我不想通过抹煞概念,而是想通过使概念精确化来求得进步。既然在描述一种历史理论时,首先重要的是使人认识它同其他历史理论的区别何在,因此我决不想对巴尔特所用的“经济史观”这一名称感到愤怒,而是不管怎样要把它看成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最恰当的名称。

这一理论的意义在于它对于经济的重视,它对于历史科学的巨大贡献来自它对于经济事实的认识和评价,人类知识的这一部门由它得到的丰富也是来源于此。所谓经济史观并不一定是说,只承认经济力量和经济动机,而只是说,经济形成了不断起决定作用的力量,形成了历史上伟大运动的支点。在唯物主义历史观一词上一开始就附有一般同唯物主义这一概念连在一起的一切误解。哲学的或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是严格的决定论的,但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并不认为各民族生活的经济基础对各民族生活的形态具有无条件的决定性影响。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论和资本发展论

关于阶级斗争的学说是以唯物主义历史观为基础的。弗·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写道:“结果发现,以往的全部历史^①,都是阶级斗争的

^① 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的第4版中,在这里接上了一句限制性的话:“除了原始社会以外”。

历史；这些互相斗争的社会阶级在任何时候都是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产物，一句话，都是自己时代的经济关系的产物。”^①在现代社会中，是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占有者同没有资本的生产者即雇佣工人之间的阶级斗争在这一方面给社会打上了自己的烙印。马克思从法文借用了资产阶级一词来表示前一阶级，无产阶级一词来表示后一阶级，在他制定他的理论时，法国的社会主义者已经特别喜欢使用这两个词了。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之间的这一阶级斗争，是转移到人身上的今天的生产关系中的对立，即占有方式的私人性质同生产方式的社会性质之间的对立。生产资料是各个资本家的财产，他们占有生产的收益，但是生产本身却成了一种社会过程，就是说成了一种由许多人在有计划的分工和劳动组织的基础上进行的使用品的生产。这一对立包藏着第二个对立，或者说以第二个对立作为补充：生产机构（作坊，工厂，工厂联合等等）内部的有计划的分工和劳动组织同产品在市场上的无计划的出售相对立。

资本家同工人之间的阶级斗争的出发点是利害对立，这是由资本家使工人的劳动发生价值增殖这件事的性质产生的。对这一价值增殖过程的研究引出了关于价值以及关于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占有的学说。

资本主义生产和以它为基础的社会制度的特征是，人在他们的经济关系中作为买者和卖者而对立。他们在经济生活中不承认任何形式上的法律的依存关系，而是只承认事实上的、从纯粹经济关系（财产差别，雇佣关系等等）产生的依存关系。工人就一定的时间、根据一定的条件、按照一定的价格即工资、把自己的劳动力出卖给资本家。资本家把依靠工人的帮助或者说由他所雇用的全体工人制造出来的产品量按一定的价格在商品市场上出售，这一价格通常要产生超过他为了制造而花费的金额的一个余额，作为资本家继续经营的条件。那么这一余额是什么呢？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65页。——编者注

根据马克思的说法，它是工人所付出的劳动的剩余价值。商品在市场上按一定的价值被交换，价值是由体现在商品中的按时间计算的劳动决定的。资本家在生产中投放的、以原料、辅助材料、机器损耗、租金和其他杂费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过去的——我们也可以说死的——劳动，不变地在产品的价值中再现。被使用的活的劳动却是另一种情况。活劳动要资本家花费工资，它给资本家带来超过这笔工资的纯收益，即劳动价值的对等价值。劳动价值是投放在产品中的劳动量的价值，工资是使用在生产中的劳动力的买价。劳动力的价格或价值是由工人的生活费用决定的，它同工人的生活习惯相适应。劳动价值的对等价值（纯收益）同工资之间的差额是剩余价值。尽可能提高剩余价值，无论如何不使它降低，这是资本家的天然意图。

但是商品市场上的竞争经常对商品价格施加压力，要达到扩大销路的目的，只有通过一再使生产低廉化。资本家能够用三种方式达到低廉化的目的：降低工资，延长劳动时间，提高劳动生产率。因为前二者在任何时刻都有一定限度，所以他的精力总是放在最后一项上。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更好地组织劳动、加强劳动密度和改善机器是使生产低廉化的主要手段。在所有这些场合，后果都是马克思所称的资本的有机构成的改变。投放在原料、劳动手段等上面的资本份额的比例上升了，投放在工资上面的资本份额的比例下降了；由较少的工人制造出同样的产品量，由原来数目或者也是较少数目的工人制造出更多的产品量。马克思把剩余价值对于投入工资的资本份额的比率称为剩余价值率或剥削率，剩余价值对于投入生产的总资本的比率称为利润率。根据前面所述，很明显，在利润率下降的同时，剩余价值率可以上升。

随着生产部门的性质的不同，我们看到很不相同的资本有机构成。在有些企业中，在劳动手段、原料等上面支出了大得不成比例的资本份额，而为工资只支出按比例说来很小的资本份额，在另一些企业中，工资却构成投资的最重要部分。前者表示较高的资本有机构成，后者表

示较低的资本有机构成。如果获得的剩余价值同工资之间的比例关系到处都是一样的话，那么后几类生产部门中的利润率在许多场合一定要超过前几类的利润率好几倍。但情况不是这样。实际上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商品不是按它们的劳动价值，而是按它们的生产价格出售的，生产价格由投入的生产费用（工资加上支出的死劳动）和相当于社会总生产的平均利润或某些生产部门的利润率的一笔附加费构成，在这些生产部门中，资本有机构成表现了工资资本对于所使用的其余资本的平均比率。由此可见，商品的价格在不同的生产部门中决不是以同样的方式围绕它的价值而变动的。在一些生产部门中，它们经常远远低于价值，在另一些生产部门中经常高于价值，只有在中等资本有机构成的生产部门中，它们才同价值相近。价值规律完全从生产者的意识中消失了，它只是在他们的背后起作用，同时平均利润率的水平以较长的时间间隔根据价值规律而得到调整。

竞争的强制性规律和社会的日益增长的资本财富促使利润率不断下降，这一下降被起反对作用的诸力量延缓了，却没有被持久地阻止。资本的剩余生产和工人的过剩是携手并行的。在工业、商业和农业中，集中愈来愈扩大，大资本家对小资本家的剥削也愈来愈扩大。由于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和群众的消费不足并在一起而产生的周期性危机愈来愈激烈，愈来愈富有破坏性了，它们通过消灭无数小资本家而加速了集中化过程和剥夺过程。一方面，规模不断扩大的劳动过程的集体主义的——合作的——形式以愈来愈大的程度普及起来，另一方面，“随着那些掠夺和垄断这一转化过程的全部利益的资本巨头不断减少，贫困、压迫、奴役、退化和剥削的程度不断加深，而日益壮大的、由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的机制所训练、联合和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反抗也不断增长。”^①发展就是这样朝着那一点进行，到了那时，资本垄断成了与它同时繁荣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化和劳动的社会化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68—269页。并参看《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版，第874页。——编者注

变得同它们的资本主义的外壳不相容了。这一外壳到那时就被炸毁，剥夺者和篡夺者被人民群众剥夺，资本主义私有财产被废除。

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或占有方式的历史趋势。负有实现剥夺资本家阶级和将资本主义所有制转变为公共所有制的使命的那一阶级是雇佣工人阶级，即无产阶级。为了这一目的，它应当作为阶级的政党而组织起来。这一阶级在一定的時候将夺取政权并且“首先把生产资料变为国家财产。但是这样一来，它就消灭了作为无产阶级的自身，消灭了一切阶级差别和阶级对立，也消灭了作为国家的国家”。为个体生存的斗争连同它的冲突和过火行为结束了，国家不再有东西需要镇压了，因而就“消亡”下去。（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①

* * *

这是对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最重要原理的尽可能简短的概括，这一部分我们还必须把它算作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的纯正的理论。这一部分同唯物主义历史理论一样，或者不如说在比它更大的程度上，并不是一开始就以完备的形态从它的创始人的头脑中产生出来的。在这里比起在唯物主义历史理论那里还更多地证明了理论的发展，这一发展在于，在坚持主要观点的同时，对起初是独断地提出的原理加以限制。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也部分地承认了理论的这种变化。在《资本论》的序言中（1867年），在《共产党宣言》新版的序言中（1872年），在《哲学的贫困》新版的序言和一个注解中（1884年），以及在《法国革命中的阶级斗争》^②的序言中（1895年），曾经指出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见解中的种种有关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所完成的一些变化。但是在那些序言中或者在别的地方得到确认的有关理论的个别部分或个别前提的变化，在理论最后定型时并不是全部都得到充分考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54—755页。——编者注

② 应为《法兰西阶级斗争》。——编者注

虑的。我只举出一个例子。在《共产党宣言》的新版序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就这本书中阐述的革命纲领这样说过：“由于最近 25 年来大工业有了巨大发展而工人阶级的政党组织也跟着发展起来，由于首先有了二月革命的实际经验而后来尤其是有了无产阶级第一次掌握政权达两月之久的巴黎公社的实际经验，所以这个纲领现在有些地方已经过时了。特别是公社已经证明：‘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①这是 1872 年写的。但是五年以后，在反对杜林的论争性著作中，却又简单地说：“无产阶级将取得国家政权，并且首先把生产资料变为国家财产”。^②而且恩格斯于 1885 年在《揭露共产党人审判案》的新版中转载了 1848 年的一个根据旧看法而提出的革命纲领和同样按照这一看法的精神起草的共产主义者同盟执行委员会的一份通知书，关于前者他只是简短地说，从它那里“即使今天也还有一些人可以学到一些东西”，关于后者说：“其中所说的一些东西在今天也还是合适的”（第 14 页）。当然可以引述“首先”、“一些人”、“一些东西”等词并且解释说，这几句话恰好只能有条件地加以理解，但是正如我们还要看到的，这样做并不能使事情有所改善。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被他们承认的实际情况的变化和关于实际情况的更为正确的认识对于理论的表述方式和应用必然会起的反作用，只限于部分地仅仅略提一下，部分地只就个别论点作了肯定。即使在后一方面，他们也并不是没有矛盾的。他们把重新使理论获得统一性和重新建立理论同实践之间的统一性的任务，留给了他们的后继者。

但是只有在人们对理论的缺陷和矛盾进行无情的清算的时候，这一任务才能解决。换句话说，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向前发展和改进必须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49 页。黑体字是伯恩施坦用的。——编者注

②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5 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 2 版，第 409 页。——编者注

从对它的批判开始。今天^①的情况是，人们可以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证明一切。这对于辩护者和舞文弄墨的人来说是很方便的。但是只要是还保留着一点点理论感的人，只要对他来说，社会主义的科学性还不“仅仅是一件观赏品，逢到节日才从银柜中拿出来，平时却置之不理”，那么他一旦认识到这些矛盾，也就会感到清除这些矛盾的必要。导师们的学生的任务就在于此，而不是在于永远重复导师们的话。

我在下面将本着这一精神着手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些要素进行批判。我既希望这本首先以工人为对象的著作篇幅不致过多，又必须在不多几个星期内写成它，这也许可以说明，我根本没有试图对论题作详尽的讨论。同时请让我在这里一劳永逸地声明，我决不自命我的批判有任何独创性。以下的论述的大部分，即使不是全部，事实上也已经有别人阐述过，或者至少被提到过了。就这一点来说，这一著作的存在理由不在于它揭示了前所未有的东西，而在于它承认了已经发现的东西。

但这也是必要的工作。我相信，是马克思本人有一次曾就理论的命运写道：“穆尔所爱的人只能死于穆尔之手”。^②因此一种理论的错误只有当这些错误被理论的捍卫者承认为错误的时候才算是已被克服。这样的承认并不意味着理论的没落。不如说，在摒弃了被认为是错误的东西以后将会看清楚——请允许我利用拉萨尔的一句譬喻——有理由反对马克思的人，归根到底还是马克思。

第二章 马克思主义和黑格尔的辩证法

第一节 黑格尔主义辩证法的陷阱

在长时间的、往往是整夜的争论中，我使他感染了黑格尔主义，这

① 写于1899年。

② 这句话出自席勒的剧本《强盗》，是剧中的主角卡尔·穆尔说的话，“穆尔”在剧本原文中作“卡尔”。参看该书中文译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156页。——编者注

对他是非常有害的。

卡尔·马克思论蒲鲁东^①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和以此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理论的最初形态，是在1844年到1847年间制定的，那是西欧和中欧处于伟大革命动荡中的时期。可以把它们称为这一时代的最激进的产物。

德国的那一时期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发达起来的时代。同其他国家一样，这里的对现存制度进行斗争的阶级在思想上的主张也远远超过了阶级的实际需要。市民阶级——应理解为包括非封建的和不在于雇佣关系中的各阶级的这一广大阶层——反抗那仍旧是半封建的国家专制主义，而这一阶级的哲学主张为了以否定国家告终，是从否定绝对开始的。

以麦克斯·施蒂纳为代表的向这一方向发展的最激进的那个哲学流派，是黑格尔哲学的激进左派。恩格斯同马克思一样，曾经有一个时期在这一流派的魔力圈内度过，他们各在不同的时候曾在柏林同希佩尔酒馆^②的“自由派”交往。我们从恩格斯那里读到，这一派的代表人物抛弃了黑格尔的体系，却因此更加醉心于他的辩证法，直到后来部分地由于实际的反对现存宗教的斗争（那时这是政治斗争的一个重要形式），部分地由于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的影响，他们毫无保留地承认了唯物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却没有停留在费尔巴哈的基本上始终是自然科学方面的唯物主义上，而是通过运用已排除神秘性的辩证法，在法国和更为激烈地在英国发生的资产阶级同工人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的影响下，发展了自己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

恩格斯曾经以极大的热情强调辩证方法对于这一理论的产生所起

^① 即1865年1月24日马克思致约·巴·施韦泽论蒲鲁东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17页。——编者注

^② 疑是指青年黑格尔分子小组（“博士俱乐部”）经常在那里集会的一家咖啡馆。——编者注

的协助作用。他按照黑格尔的榜样，把对事物的形而上学的观察同辩证的观察区别开来，并且把前者解释为，将事物或事物的思想印象即概念孤立地当做僵硬的、一成不变的对象来对待。相反，后者却从事物或概念的联系、变化和转化中来观察它们，并且由此揭示，一个矛盾的两极即正和反，尽管有一切对立性，却是互相渗透的。但是黑格尔把辩证法看成概念的自我发展，而马克思和恩格斯却把概念的辩证法看成现实世界的辩证运动的自觉反映，从而把黑格尔的辩证法重新“从用头站立变成用脚站立”。

恩格斯在他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中就是这样说的。

但是辩证法的“用脚站立”并不是简单的事情。不管事物在现实中是什么样子，一旦我们离开了可以凭经验确认的事实土地并且超越这些事实而思考，我们就要陷入派生概念的世界，而如果我们然后遵循黑格尔所提出的那个样子的辩证法规律，那么我们会不知不觉地进了“概念的自我发展”的圈套。黑格尔的矛盾逻辑的巨大科学危险就在于此。在有些情况下，它的原理用来形象地说明实在客体的关系和发展也许是非常有用的。^①它们也可能对科学问题的表述有过很大的益处，并且推动过重大的发现。但是一旦根据这些原理来演绎地预测发展，那么任意构想的危险也就已经开始出现。其发展被论及的事物愈复杂，这种危险就愈大。如果客体相当简单，经验和逻辑的判断能力多

^① 虽然在这种场合，事物的真相也往往被这些原理弄模糊了，而不是被阐明了。例如用“由量向质的转化”的原理来说明某一事物的组成部分之间的量的比例关系的改变能改变这一事物的特性这一事实，就至少是很牵强和肤浅的。

附带要说明的是，我在沿用恩格斯关于形而上学观察方法和辩证观察方法这两个概念的定义时作了这样的保留：“形而上学的”和“辩证的”这两个性状形容词由此而得到的含义只适用于这一对比。在别的情况下，对事物的形而上学的观察同对事物孤立和固定不变地进行观察，在我看来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事情。

最后还要在这里声明，不言而喻，我并没有想到要在这里批评黑格尔本人，也不想否认这个卓越的思想家对于科学的伟大功绩。我所讨论的只是他的对于社会主义理论发生影响的辩证法。

半能防止我们不致被像“否定的否定”这样的类推原理错误地引导到有关它的各种变化可能性的超出盖然性范围之外的结论。但是一件事物愈复杂，它的要素的数目愈多，它的性质愈是多种多样，它的力量关系愈是多方面，那么这种原理就这一事物的发展所能告诉我们的就愈少，因为，在根据这种原理作出结论时，就愈丧失一切评价的尺度。

这样说并不是否认黑格尔的辩证法有任何功绩。不如说，就它对于历史著述的影响而言，弗·阿·朗格^①在他的《工人问题》一书中对它作了最中肯的判断。他写道，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及其基本思想即通过对立面及其消除（Ausgleichung）而进行的发展，“几乎可以称为人类学的发现”。但是朗格也立刻把手指“几乎”放进了伤口，因为他补充说，“在历史中也同在个体的生活中一样，通过对立的发展既不像思辨的构想所描绘的那样容易和彻底地，也不是像那样精确和有秩序地进行着”。（第3版，第248—249页）就过去来说，任何马克思主义者今天都承认这一点，只不过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对于将来而且是很近的将来而言，情况就不是这样了。《共产党宣言》在1847年宣称，德国处于资产阶级革命的前夜，这一革命由于无产阶级已经达到的发展和欧洲文明的已经进步的条件，“只可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直接序幕”。

马克思当时已经认真地研究了经济学，却犯了这一随便哪一个第一流的政治梦想家也很少会超过的历史的自我欺骗，如果不把这一自我欺骗看成黑格尔的矛盾辩证法残余的产物，那么它就不可理解了。马克思——恩格斯也一样——似乎一生都没有彻底摆脱这一残余，但它在那时，在一个普遍动乱的时期，应当说对于他变得更加致命了。我们在这里所看到的不仅是对一个政治行动的前途的过高估计（这是热情充沛的领袖可能犯的，并且在某些情况下已经帮助他们取得出人意外的成就），而是对于一种经济的和社会的成熟的程度所作的纯粹思辨的预测（这一发展几乎还没有露出最初的萌芽）。一件需要几个世

① 弗里德里希·阿尔伯特·朗格（1828—1875），德国政论家，新康德主义哲学家，他的《工人问题》（1865年）是一部社会改良主义的著作。——编者注

代才能实现的事，竟根据关于对立面的发展和关于通过对立面的发展的哲学而被看成一次政治革命的直接后果，而这一革命是首先必须为资产阶级创造发展的自由余地的。如果说在《宣言》起草后不过两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已经感到有必要《在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的时候》教训同盟中反对他们的人应当认识“德国无产阶级不够成熟”，并且对有人“把人民这个词变成圣物一样”提出抗议^①（《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那么这首先不过是一时的清醒的后果。真实的同构想出来的发展成熟程度之间的这一矛盾还会以其他的形式再现许多次。

既然这里谈的是我认为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最致命之点，因此请允许我举出一个最近发生的例子。

弗兰茨·梅林最近（1898年）同德国南部的一家社会民主党报纸论战时，在《莱比锡人民报》上重新刊登了恩格斯的《论住宅问题》一书第2版序言中的一段话。恩格斯在其中说到了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存在着某种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包括帝国国会党团内”都有它的代表。恩格斯在那里这样地描写这一流派的小资产阶级性格，说它固然承认现代社会主义的基本见解是正确的，却把它们的实现推迟到遥远的时候，从而使人“现在只需从事单纯的社会补缀工作”。恩格斯说明，这一流派在德国的存在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它对于德国工人“惊人健全的头脑”是没有危险的。^②梅林把这些阐述同这篇序言写作前不久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展开的关于轮船津贴问题的争论联系起来，他认为这次争论是“党内关于‘实践政治’和无产阶级革命策略的第一次较大的争论”，而恩格斯在上面所说的，正是无产阶级革命派（梅林把自己归入这一派）的代表“所想的和所要的”：同被这样描述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分开。

不可否认，梅林对恩格斯上述的话的解释是正确的。恩格斯那时

①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2版，第479页。——编者注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4页。——编者注

——1887年1月——是这样看情况的。在这以前15个月，他在《揭露共产党人审判案》的新版中附载了他和马克思起草的1850年3月和6月的两个通告，这两个通告宣布革命无产阶级的政策是“不间断的革命”。他在序言中说，通告中的说法有一些对即将发生的“欧洲的震动”也是适用的。他举出1870年至1871年的战争作为在这以前最后一次的这种震动，但是认为欧洲革命的兑现日期在本世纪拖了15年到18年。

这是1885年到1887年间写的。不多几年以后，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发生了同所谓“青年派”的冲突。这一冲突已经暗中进行了较长时期，它在1890年为了通过停工纪念五一的问题而变得激烈起来。“青年派”的多数人真诚地相信，当他们反对议会党团那时的“机会主义”时，他们是按照恩格斯的意图行动的，这一点今天不会有任何人提出反驳。当他们攻击议会党团的多数派是“小资产阶级的”时，他们在这一方面所依据的权威除了恩格斯还有谁呢？这一多数派正是由在轮船津贴问题中构成机会主义多数派的那些人组成的。但是当那时的《萨克森工人报》编辑部最后援引恩格斯来论证自己的见解时，所得到的答复却出人意外地与他们所引用的通告完全不同，这是梅林知道的。恩格斯宣称青年派的运动纯粹是“著作家和大学生骚动”，责备他们“把马克思主义歪曲得面目全非”，^①并且宣称，他们对党团的责难再好也不过是些微不足道的东西；《萨克森工人报》尽可以希望依靠德国工人的健全思想来克服社会民主党内贪求成功的议会派，它愿意希望多久就多久，但是他恩格斯是不抱同样的希望的，他不知道党内有这样的多数派。

除了这几段话的作者^②以外，没有别人更为清楚地知道，恩格斯在撰写这一声明时，是完全根据自己的信念的。“青年派”的运动尽管至少也是工人的运动，而且这些工人在社会党人法下曾经是党的最活跃的鼓动家，但是在恩格斯看来，这一运动是由激进化了的文人煽起的反

① 恩格斯：《给〈萨克森工人报〉编辑部的答复》，载于1890年9月13日《社会民主党人报》，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97页。——编者注

② 指伯恩斯坦自己。——编者注

叛，而他们所推荐的政策在当时是非常有害的。相形之下，党团的“小资产阶级习性”的确缩小成鸡毛蒜皮了。

1890年9月13日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发表的《回答》尽管在政治方面有很大的功绩，但是当恩格斯用这种方式摆脱青年派同自己的牵连时，他在其他方面是否也完全正确，仍旧是可疑的。如果欧洲革命像他在《揭露》的序言中所说的那样近在眼前的话——根据那里的说法，兑现期已在这一期间来到了——如果在通告中描述的策略在原则上还有效的话，那么青年派基本上是他的肉中之肉，血中之血。如果不是那样，那么错误与其说是在于青年派，不如说是在于1885年和1887年投入宣传的著作和上述附录以及可以作两种解释的补遗。这种暧昧情况同恩格斯的性格是很不相称的，但是它的根源最后在于从黑格尔继承下来的辩证法。辩证法以“是一否和否一是”代替“是一是和否一否”，它的对立面的相互渗透和从量到质的转化，以及其他的辩证法的妙语（Schönheiten），一再妨碍对已经认识的变化的影响作出充分的说明。如果这一原来是黑格尔式地构想出来的发展图式依旧能够成立，那么必须或者对现实重新加以解释，或者在测定通向所追求的目的的道路时完全不管实际的比例。由此就产生了这样的矛盾：在研究社会的经济结构时表现出非常细致的、同天才的勤奋相当的精确性，同时却令人几乎难以相信地忽视明摆着的事实；以经济对于暴力的决定性影响为出发点的理论，却归结为对暴力的创造力量的奇迹信仰；在理论上把社会主义提高到科学，这一提高却又屡次“转化”为一切科学性的要求对于倾向的从属。^①

① 正如我在本书第一版出版后不久就已经做过的那样，我在这里也要说明一下，我承认我在上面反对黑格尔和马克思、恩格斯的那一段中把自己的意见表达得有些过分尖锐。我所重视的，只是对于《共产党宣言》的作者的著作中我认为不能理解的一个矛盾从心理上加以解释。至于其他方面，读者可以判断我在当时这样写是否正确：“如果我在我的著作中对待黑格尔有些苛刻，那么这肯定不是为了贬低马克思和恩格斯”。（参看《辩证法和发展》一文，载于《新时代》1898—1899年卷第2册，已收入我的文集《关于社会主义的历史和理论》，柏林1904年第4版。）

即使不说别的，如果简单地根据一个政治家或理论家对于社会发展过程的速度见解来判断他的立场，那么这无论如何是非常不科学的。把“无产阶级的”这一概念同关于对立面^①的突然的、直接的消除的概念等同起来，结果将是对这一概念的非常庸俗的解释。照这样来解释，“无产阶级的”就成了笨拙的、粗野的和卑劣的了。如果说，对于任何时候都是指日可待的革命灾变的信仰能使人成为无产阶级的革命的社会主义者，那么首先有权利取得这一名称的将是盲动的革命家。在科学的理论中至少应当有某种理性的尺度来作为分界线，在分界线这一边的是幻想家，在那一边的是小市民。但是这一点在这里是谈不上的，评价始终是纯粹任意的东西。当人们从离得愈远的地方观察事物时，比例就显得愈小，因此在实践中通常出现这种值得注意的事实，即有些人本身属于工人阶级，同真正的无产阶级运动有着密切的接触，却具有上述意义的“极端小资产阶级的”见解，而有些属于资产阶级或者生活在资产阶级条件下的人，他们或者同工人界毫无接触，或者仅仅根据一上来就确定了一定调子的政治集会来认识工人界，他们却充溢着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情调。

恩格斯在逝世前不久为《阶级斗争》一书所写的序言中毫无保留地承认了马克思和他在估计社会发展和政治发展所需时间方面所犯的错误。他通过这篇文章（人们恐怕可以正当地把它称为他的政治遗嘱）为社会主义运动立下的功绩，是无论怎样高地评价都决不会过分的。它所包含的比它所许诺的还要多。不过这篇序言既不是从如此坦率的自白中作出一切结论的地方，人们也根本不可能指望恩格斯自己会对理论作出因此成为必要的修正。如果他作了修正，那么他即使不明白地说出来，但是实际上一定会无条件地对黑格尔辩证法进行清算了。黑格尔辩证法是马克思学说中的贩卖性因素，是妨碍对事物进行任何推理正确的考察的陷阱。恩格斯不能或者说不愿超越它。他仅仅就政治

① 在法译本（第44页）中，“对立面”作“社会对立”。——编者注

斗争的一定的方法和形式从已经得到的认识作出了结论。他在这些方面所说的话尽管是意义重大的，但是这毕竟只涉及现在提出的问题范围中的一部分。

因此显然的是，例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遗留给我们一些论述政治斗争的专著，而我们今天却必须从与他们不同的角度来观察这些斗争了。他们在论述事件的进程时醉心于自我欺骗，在这种情况下，尽管他们的观察方法是很现实的，他们对于党派和人物的判断决不可能完全中肯，他们的政策同样也不可能永远正确。正是在社会主义的历史著述中，仅就对最近时期的考察来说，传统起着非常巨大的作用，同时在其他方面也一再有人回过头来抓住这些过去的斗争当作例子；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后来追加的纠正就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了。

但是同近来的社会主义历史著作根据恩格斯的序言所必须作的纠正比起来，从同一序言产生的对有关社会民主党的斗争和任务的整个见解的纠正更是更为重要的。这一纠正首先把我们引向一个迄今很少讨论过的一点，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同布朗基主义的原来的内在联系和这一联系的断绝。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和布朗基主义

当民族的资源事先已经耗尽的时候；

当国家既没有生产，也没有商业的时候；

当由于俱乐部的政策和国民工场的停工而垂头丧气的工人为了活下去而去当兵的时候；

啊！那时你们就会知道，一场由律师煽起的、由艺术家完成的、由小说家和诗人领导的革命是怎么一回事了！

从你们的梦中醒过来吧，你们这些山岳党、斐扬派、科尔德利派、保王党、扬逊派和巴贝夫派！^①

^① 都是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中各种不同倾向的政治派别。——编者注

你们离开我向你们宣告的这些事变不到六个星期了。

蒲鲁东

见《人民的代表》，1848年4月29日

黑格尔的哲学被各式各样的著作家描述为法国大革命的反映。实际上，这一哲学连同它所说的理性的对立的进化，可以被描述为那一伟大斗争在观念上的副本，按照黑格尔的说法，在这一斗争中，“人是用头脑即用思想站着的”。在黑格尔的体系中，政治理性的进化当然以复辟时期的普鲁士开明的警察国家为顶峰。但是在黑格尔去世前一年，法国的复辟王朝让位给资产阶级王政，激进的冲击又一次席卷欧洲，它最后导致了对这一王政和由黑格尔担任旗手的阶级即资产阶级的日趋激烈的攻击。帝政和复辟现在在新事物的激进代表看来，不过是大革命的上升的发展过程的中断而已；随着资产阶级王政的出现，开始了向旧的发展方面的转变，这一发展由于已经改变的社会条件，现在不再会在自己的道路上遇到切断法国大革命进程的那一阻碍了。

法国大革命的最激进的产物是巴贝夫运动和平等派。他们的传统在法国由路易·菲力普统治下产生的秘密社团继承，后来从这些社团中产生了布朗基派。它的纲领是：由无产阶级用暴力剥夺的手段推翻资产阶级。在1848年的二月革命中，俱乐部革命家既根据那时成为他们的思想领袖的人即奥古斯特·布朗基而被称为布朗基派，同样也常常被称为“巴贝夫主义者”或“巴尔贝斯派”。

在德国，马克思和恩格斯以激进的黑格尔辩证法为基础，达到了同布朗基主义十分相似的学说。他们认为，资产者的继承人只能是它的最彻底的对立物即无产者，资产者经济的这一最地道的产物。他们从欧文、傅立叶和圣西门学派的社会主义者的社会批判著作（这些著作在今天受到了不合理的过低估价）出发，从经济和物质的角度论证了这一点，但是在唯物主义方面他们仍旧是以黑格尔的方式立论的。圣西门

派眼中的现代无产阶级的作用已经同前一世纪卢梭学派眼中的农民的作用一样，而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自己的理论中把现代无产阶级完全理想化了，这首先是就它的历史的能力而言，但同时也是就它的素质和倾向而言。这样，尽管他们有更深的哲学素养，却达到了同巴贝夫派秘密团体成员相同的政治见解。局部的革命是空想，仅仅无产阶级革命还有可能——马克思在《德法年鉴》中作了这样的推论。（参看《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这一论文）这一见解是直接通向布朗基主义的。

在德国把布朗基主义只看成秘密结社和政治暴动的理论，看成主张由小的、目的明确的、按深思熟虑过的计划行动的革命党发动革命的学说。但这是很肤浅的看法，至多只适用于布朗基主义的某些后辈。布朗基主义不止是关于一种方法的理论，不如说它的方法仅仅是它的扎根更深的理论的结果，是它的产物。而这个理论完全不过是关于革命的政治暴力及其表现即革命的剥夺的无限创造力的理论。方法则部分是视情况而定的事情。在结社和言论不自由的地方，秘密结社自然是适合的，在像 1848 年的法国那样，革命起义的政治中心事实上统治了国家的地方，只要在暴动时考虑到一定的经验，暴动也不是像德国人所认为的那样不合理的。^①因此，摈斥了暴动，还不算从布朗基主义解放出来。再也不能比对共产主义者同盟时期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的研究更清楚地指明这一点了。除了摈斥暴动以外，这些著作归根到底还是反复地散发着布朗基主义的或者巴贝夫主义的精神。在《共产党宣言》中意味深长的是，在所有的社会主义文献中，只有巴贝夫的著作没有受到批判；关于这些著作只是这样说：它们在大革命中“代表过无产阶级的革命要求”，这无论如何是一种违反时代的描述。《宣言》的革命的行动纲领是彻头彻尾布朗基主义的。在《阶级斗争》、《雾月十八日》等著作中，特别是在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几次通告中，都把布朗基派

^① 在布朗基主义的账本上也决不是只有失败的，除了失败之外，还有很重大的暂时胜利。1848 年和 1870 年宣告成立共和国，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布朗基派社会革命家的干预。反过来说，1848 年 6 月和 1871 年 5 月归根到底是布朗基主义的失败。

说成无产阶级的党，1850年6月通告^①的说法是“真正的无产阶级党”，不过这完全是根据这个党的革命精神，决不是根据它的社会构成来说的。1848年法国的无产阶级党是集合在卢森堡宫^②周围的工人。同样的考虑决定了党对于宪章派阵营中互相抗争的派别的态度。^③在《阶级斗争》和《雾月》关于法国的事变过程的叙述中，对于实际活动着的诸力量的高明的分析同已经被布朗基主义者大加精制过的传说混杂在一起。但是再也没有比1850年3月的共产主义者同盟通告^④更为尖锐、更不受限制地表达布朗基主义精神的了，这一通告详尽地指示共产主义者在即将到来的新的革命爆发中必须尽一切力量使革命成为“不断的”。对于现代经济的本质的一切理论见识，对于德国经济发展现状的一切认识（德国的确还远远地落在当时的法国后面，马克思就在这一时期曾就法国写道：在那里，“工业雇佣工人反对工业资产者的斗争……只是局部现象”^⑤），一切经济的理解，在一个纲领面前都化为乌有，而随便哪一个俱乐部革命家所提出的纲领都不会比这个更为虚妄。马克思在6个月以后所指责的维利希和沙佩尔^⑥的错误，就是他和恩格斯

① 即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1850年6月》，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2版，第430页。——编者注

② 指法国1848年革命后临时政府成立的负责处理劳动问题的卢森堡委员会，因设在卢森堡宫而得名，委员会的主席是路易·勃朗。——编者注

③ 通告以一定程度的满意心情在“英国”项下断言，宪章派的革命派和温和派之间的分裂由于“（共产主义者）同盟代表而大大提前了”。即使不发生那次分裂，宪章运动的彻底失败是否可以避免，固然是非常值得怀疑的。但是对于顺利完成的分裂表示满意，这是地道的布朗基主义。

④ 即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1850年3月》，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2版，第385—396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64—375页。——编者注

⑤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86页。——编者注

⑥ 奥古斯特·维利希（1810—1878），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50年从同盟分裂出来的冒险主义宗派集团的领袖之一；卡尔·沙佩尔（约1812—1870），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上述宗派集团的领袖之一，后来重新和马克思接近，为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编者注

自己在这篇通告中宣告的东西；他们不是把实际条件，而是“仅仅把意志看作革命的动力”。^①现代经济生活的需要完全被忽视，各阶级的力量对比和发展状况完全被置之度外。但是无产阶级的恐怖主义却被尊崇为奇妙的力量，这一力量可以把生产关系推进到被认为是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先决条件的那一发展水平。但是就德国的情况来说，这种样子的恐怖主义只能作为破坏者而出场，因而从它以上述方式被实行来反对资产阶级民主的第一天起，它必然要在政治上和经济上起反动作用。

在批评通告时如果不看到以下一点是不公平的：它是在流亡中写的，在那个时候，由于反动派的胜利而受到加倍刺激的激情正发展到最高潮。不过这种如此自然的激动固然能说明关于革命的反击即将来临的某些夸大估计（不过马克思和恩格斯很快就抛弃了这些期望）以及叙述中的某些离题的地方，但是现实同纲领之间的那个彰明较著的矛盾，却不能用它来解释。这一矛盾不是一时的情绪的产物——企图以此来为它辩解，就等于在历史上不公正地对待通告的作者——，它是一个智慧上的错误，即他们理论中的二元论的产物。

近代社会主义运动可以分为两大流派，它们在不同的时期披着不同的外衣出现，而且常常是互相对立的。一派以社会主义思想家制定的改革建议为出发点，并且在基本上以建设为目标，另一派从革命的人民起义中汲取启示，并且在本质上以破坏为目的。按照它们的以当时形势为基础的不同的可能性，一派表现为空想的、宗派的、和平进化的，另一派表现为密谋的、煽动的、恐怖的。愈接近现代，口号就喊得愈坚决，这一边是：通过经济组织取得解放，那一边是：通过政治剥夺取得解放。在前几个世纪，前一派多半只是以个别的思想家为代表，后一派则以非正规的人民运动为代表。在本世纪的上半叶，两方面都已有了进行持久活动的集团：这一边是各社会主义宗派和各式各样的工人合作

^①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2版，第479页。——编者注

社，那一边是各种革命团体。双方联合的尝试并不是没有，对立也并不总是绝对的。因此，《共产党宣言》关于法国的傅立叶主义者反对当地的改革派、英国的欧文主义者反对宪章派的文句，仅仅对于两个国家的极端派才是完全适合的。欧文主义者的多数绝对赞成政治改革——只要想一想路易·琼斯这样的人就行了——，但是他们反对激进宪章派即“物质力量派”所实行的暴力崇拜，遇到这批人占上风时，他们就退下来了。法国的傅立叶的信徒的情况也一样。

马克思的理论企图把两个流派的精髓结合起来。它从革命者那里接受了把工人的解放斗争看成一种政治的阶级斗争的见解，从社会主义者那里接受了对工人解放的经济的和社会的先决条件的探索。但是综合还不等于对立的消除，而不如说是一种妥协，就像恩格斯在《工人阶级状况》中向英国社会主义者所建议的：让特殊的社会主义要素退居政治上激进的、社会革命的要素之后。不管马克思的理论后来经历了什么样的发展，它在根本上始终保持着这一妥协的性质或者二元论的性质。马克思主义屡次在极短的期间内表现出本质上不同的面貌，对于这一点我们必须到上述性质中去寻找解释。这里说的不是那一种差异，即任何战斗的党在策略要求随着形势的变化而变化时所产生的差异，而是说的在没有强制性外部必然性的情况下自发出现的、纯粹是内部矛盾产物的那种差异。

马克思主义只是从一个方面——在方法上——克服了布朗基主义。但是在另一方面，即在过高估计革命暴力对于现代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创造力这一点上，它从来没有完全摆脱布朗基主义的见解。马克思主义对于布朗基主义所作的纠正，例如对于革命暴力严格集中的思想的纠正，仍旧与其说是涉及它的本质，不如说是涉及它的形式。

我们曾经从蒲鲁东的一篇文章中引用了几句话作为格言放在本章的开头，他在这篇文章中按照他自己的风格几乎一天一天地预言了1848年6月的战斗。蒲鲁东教训在俱乐部中并且由俱乐部培养出来的巴黎工人说，19世纪的经济革命与18世纪的根本不同，因此他们在俱

乐部里不断听到的关于 1793 年传统的说教，是完全不适合当时形势的。他解释说，1793 年的恐怖丝毫也没有威胁绝大多数居民的生存条件。但是，1848 年的恐怖统治将使两大阶级发生冲突，这二者的生存都是依靠生产品的周转和彼此之间的关系的，它们的冲突将意味着大家同归于尽。

这是蒲鲁东式的夸张说法，但是在法国那时的经济结构下，却的确是正中要害的。

法国在 1789 年到 1794 年间，生产及其交换的 9/10 以上限于地方市场。在农村经济分化不大的情况下，国内的民族市场只起十分次要的作用。因此尽管恐怖非常严酷，尽管就工业阶级来说，它毁灭了某些个人，并且有时毁灭了某些地方工业，但是国民经济生活只是非常间接地受到它的影响。从事生产和商业活动的各阶级，没有任何一个部分曾经作为阶级受到恐怖的威胁，因此国家可以相当长时期地经受恐怖，它从恐怖所受到的创伤很快就治好了。1848 年的情况相反，临时政府的构成和似乎无所不能的俱乐部的勃兴及其行为使工商界陷于不安，这种不安已经意味着日甚一日的生产经营的停滞和商业交通的瘫痪。这种情况每加重一步，每多拖一天，就意味着新的毁灭，新的失业，它以很大的损害威胁着城市的全部就业居民，并且也已经危及农村的一部分就业居民。根本谈不上在社会上政治上对于管理生产的大小资本家进行剥夺，工业既没有充分发展到这样的程度，也不存在能够接替资本家位置的机关。仍旧必须以随便另一个人或个人的集团来代替一个人，而这丝毫不会改变国家的社会结构，丝毫不会改善经济状况。取有经验的经理而代之的将是具有外行的一切弱点的生手。总之，模仿 1793 年恐怖的政策，在能够想到的政策中是最没有道理的、最不当的。因为它没有道理，所以如果披上 1793 年的衣服，重复和超过 1793 年的言语，就不仅是荒唐，而正因为是在一场政治革命中间，它就是犯罪了；为了这一罪行，很快就会有成千的工人以自己的生命，另一批成千的工人以自己的自由来抵赎。由此可见，“小市民”蒲鲁东的警告，尽

管有许多夸大其词的地方，但是在革命空话的农神节^①般的喧嚣声中，却表现了远见和道德的勇气，这使他在政治上远远超出那些披着“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外衣、渴望着新的牧月^②的文人、艺术家和其他资产阶级流浪汉之上。马克思和蒲鲁东几乎在同时——前者在《阶级斗争》中，后者在《一个革命者的自白》中——把二月革命的经过当作一种历史过程来叙述，在这一过程中，每一重要的段落都表现为革命的一次失败。但是马克思和蒲鲁东不同，他正是在反革命的产生中看到了革命的进步；他写道，主张变革的党只有通过同反革命作斗争才能成熟起来，成为真正革命的党。马克思很快就看出，他那时在时间的估计上弄错了——因为这里说的是政治意义上的“革命的”——但是他似乎从来也没有完全认识作为这一假设的基础的那一原则性错误，恩格斯在《阶级斗争》的序言中也没有揭示这一错误。

恩格斯和马克思一再以关于一次革命的假设为出发点，这一革命，不管内容有多大变化，在外表上将采取同17、18世纪的革命相似的进程。这就是说，起初应当是一个进步的、资产阶级激进党派上台执政，革命的工人阶级作为批评的和推动的力量站在它后面。在前者垮台以后，有时还有一个更为激进的资产阶级的或小资产阶级的党派上台，一直到通向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完全铺平，由无产阶级的革命党夺取统治的时刻来到为止。这一思想在1850年3月的通告中得到了表现，它同样也在《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的1887年的序言中非常明确地重新出现。在那里是这样说的：在下一次的欧洲动乱时，在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一定会无条件地首先掌握政权”。“无条件地”一词在这里与其说是客观的估计的结果，仍旧不如说是被看作社会民主党的成功

① 古代罗马人每年12月17至19日（在罗马帝国时代延长为一周）举行农神节，举国狂欢，一切秩序都被打乱，因此后来用以借喻纵情放肆的状态。——编者注

② 法国大革命共和历的第9个月，相当于公历的5月20日到6月18日。资产阶级的反革命活动和粮食的缺乏，曾在1795年春季引起两次巴黎贫民的大规模起义，历史上称为芽月（即第7个月）和牧月。——编者注

的统治所必需的那一发展过程的特征。恩格斯在口头和书面上发表的意见令人对这一点丝毫无可怀疑。而且这样的思路，只要具备前提的话，是完全合理的。

但是前提恰恰令人怀疑。一切征兆都表示，首先使资产阶级激进党派当政的政治革命，在欧洲先进国家中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现代革命的趋势是，从一开始就立刻使一切可能的政府组成中最激进的一个当权。法国 1848 年的情况已经是这样了。临时政府当时在即使仅仅是暂时可能的法国政府中是最激进的一个。布朗基也看出了这一点，因此他在 2 月 26 日非常激烈地反对他的信徒们打算立刻驱散“卖国政府”并且代之以道地的革命政府的计划。同样，在 5 月 15 日，当冲进国会的革命民众宣告成立由他和其他革命者以及社会主义者组成的政府时，他也同巴尔贝斯这个“骑士式”的幻想家不一样，没有作任何在市政厅就任的尝试，却一声不响地回家去了。他的政治卓见战胜了他的革命思想。1870 年宣布成立共和国时的情况同 1848 年相似，布朗基主义者硬要宣布共和国，但参加政府的只是资产阶级激进派。反之，当 1871 年 3 月，在布朗基派的社会革命家的影响下，巴黎发生了反对由国民议会建立的政府的起义并且宣告成立公社时，出现了另外一种现象：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激进派退却了，把战场连同政治责任一起让给了社会主义者和革命派。

一切都说明，先进国家在最近时期发生的任何起义，都将采取后一形式。那里的资产阶级已完全不再是革命的了，而工人阶级已经很强大，在一场由他们作战而取得胜利的起义之后，已不能停留在批评的反对派的地位了。尤其在德国，如果党的发展继续像过去那样进行，那么在革命的第二天，除了社会民主党的政府以外，别的政府将是不可能的事情。纯粹资产阶级的激进的政府连一天也支持不住，而由资产阶级民主派和社会主义者共同组成的妥协政府实际上将意味着，不是两三个民主派作为装饰品加入社会主义政府，就是社会民主党在资产阶级民主派面前低头让步。在革命时代，这样的联合肯定是完全不可能的。

我们完全可以假定，当恩格斯在《阶级斗争》的序言中以空前的坚决态度赞扬普选权和议会活动是工人阶级解放的手段，并且同通过革命的突袭夺取政权的思想分手的时候，上述的那种思考起了助成决定的作用。

这是对于布朗基主义的、哪怕是现代化了的布朗基主义的观点的进一步排斥。不过对于这个问题毕竟还只是就其对作为政治党派的社会民主党的重要意义作了研究。根据已经改变了的军事的、战略的条件，指出了未来的有觉悟的少数人的起义少有前途，强调了已经就社会制度有待进行的彻底变革的性质受到启发的群众的参加是实行这一变革的不可缺少的条件。不过这只涉及外部手段和意志即意识形态。社会主义革命的物质基础依然未加研究，“对生产资料和交换资料的占有”这一旧公式依然不变，并且没有一个字表示，在生产资料通过一次巨大的革命行动而转为国家所有这一变化的经济前提中，是否有了任何改变。只有获得政权的方式得到了修正，说到经济上利用政权的可能性时，仍旧坚持以 1793 年和 1796 年为出发点的旧学说。

马克思于 1850 年完全本着这一见解的精神在《阶级斗争》中写道：“社会信用和私人信用是表明革命强度的经济温度计。这种信用降低到什么程度，革命的热度和革命的创造力就上升到什么程度。”^①这是一个地道的黑格尔式的并且对一切习惯于黑格尔式饮食的头脑非常明白的原理。但是每一次革命中都有一个点，在这一点上激情就停止了创造，而只起破坏和摧残作用。只要超过了这一点，就不是继续发展，而是倒退即原来目的的反面了。在历史上，布朗基主义的策略即使开头是胜利的，但是每次都在这一点上失败了。它的最大的弱点在这里，不在于暴动理论，而恰恰在这里它从来没有从马克思主义方面受到批判。

这不是偶然的。因为在这里，对于布朗基主义的批判将变成马克

^①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388 页。——编者注

思主义的自我批判——不仅是对某些外部表现的自我批判，而是对它的学说体系的极其本质的组成部分的自我批判。如同我们在这里又一次见到的，首先是对它的辩证法的自我批判。每当我们看到把作为社会发展基础的经济当作出发点的理论向把暴力崇拜发挥到顶点的理论屈服时，我们就会碰到一个黑格尔式的原理。也许这不过是用来作类推，但这样就更加糟了。黑格尔辩证法最大的欺人之处在于，它从来不是完全错误的。它偷看真理，正像鬼火偷看亮光一样。它并不自相矛盾，因为照它说来，每一件事物都包含矛盾。把暴力放到经济还占据着位置的地方去，这是不是一个矛盾呢？哦，不是，要知道暴力本身正是“一种经济力量”。

任何有理智的人也不会对上面最后一句话的相对正确性提出异议。但是，暴力作为经济的力量，怎样和在什么时候才起着可以产生预期结果的作用呢？如果我们向自己提出这个问题，那么黑格尔辩证法就丢下我们不管了。这时，如果我们不想铸成大错的话，我们就必须考虑具体的事实和精确地——“形而上学地”——规定的概念。黑格尔主义的逻辑戏法五光十色，显得激进和才气横溢。它像鬼火一样给我们指出彼岸的前景的模糊轮廓。但是只要我们一旦本着对它的信任来选择我们的道路，我们就一定会陷入泥潭。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伟大贡献，不是借助黑格尔的辩证法而作出的，而是由于不管它才作出的。如果说另一方面，他们不加注意地放过了布朗基主义的最重要的错误，那么这首先要归咎于他们自己理论中的黑格尔的杂质^①。

① 由世界大战引起的政治革命对本章中阐述的观点是一次考验。在基本上落后的俄国，革命仍旧按照旧的图式进行，不过应当指出，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固然是以无产阶级分子为支柱的社会主义政党的胜利，但这一胜利是利用了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阶级斗争很少关系的冲动而取得的；布尔什维克之所以能比较长久地维持统治，是因为肆无忌惮地运用了刺刀的暴力，并且与此同时接二连三地放弃了原来已经着手进行的社会化，或者接二连三地对占人口 7/8 的农民的财产观念作出了让步。匈牙利的情况起初同俄国相似，只不过那里的布尔什维主义由于缺乏军事的实力手段，很快就崩溃了，随之而来的是地主军阀的反动。

第三章 现代社会的经济发展

第一节 略论马克思价值理论的意义

从这里顺便获得的教益是：工人所中意的对“全部劳动所得”的要求，有时也还不是没有问题的。

恩格斯：《欧根·杜林先生的变革》^①

我们已经看到，根据马克思的学说，剩余价值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的支点。但是要理解剩余价值，必须首先知道什么是价值。因此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本性和发展过程的叙述，是从对价值的分析开始的。

据马克思说，在现代社会中，商品的价值在于花费在商品上的按时间衡量的社会必要劳动。但是在运用这一价值尺度时需要进行一系列的抽象和还原。首先必须展示出纯粹的交流价值，就是说要把个别商品的特殊的使用价值抽象掉。其次——在形成一般的或抽象的人类劳动的概念时——必须把各个劳动种类的特性抽象掉（把高级的或复杂的劳动还原为简单的或抽象的劳动）。此后，为了得到作为劳动价值尺度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必须把个别工人在勤勉、能力和装备方面的差

相反，在工业发达的德国，正如上面所指出的，革命立刻使社会民主党掌握政权。从1918年11月9日起到国民议会召开止，由社会民主党组成的“人民代表苏维埃”组织了执政内阁，资产阶级的部长所代表的不过是一定的专业部门（“Resorts”）。但是，在这期间，由于社会民主党的分裂发展成激烈的内讧，资产阶级政党就在国民议会内取得多数，因而社会民主党的有执政能力的一派不得不同支持共和国的资产阶级政党组织联合政府。这一政府看起来与上面提到的不同，这不仅是因为它只包括社会民主党的一个派别，而且也因为革命是由战争引起的，发生革命时的形势使工人阶级的独占统治在德国成为不可能的和不值得想望的了。——补注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45—546页。——编者注

别抽象掉，此外，一当问题涉及价值转化为市场价值或价格时，还必须把各个商品单位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抽象掉。但是这样得到的劳动价值也还要求一次新的抽象。正像同样已经提到的那样，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商品不是按其个别价值，而是按其生产价格即实际成本加上按比例的平均利润率而出售的，这一利润率的水平根据社会生产总价值同在生产、交换等方面使用的劳动力的总工资的比率确定，这时必须把地租从那一总价值中扣除，必须把资本分割成工业资本、商业资本和银行资本这一事实考虑在内。

这样一来，只要所考察的是个别的商品或商品范畴，价值就失去了任何可衡量性^①，成了纯粹的思维的构想。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剩余价值”成了什么样子呢？根据马克思的学说，剩余价值是商品的劳动价值同对于生产商品时工人消耗的劳动力的付款之间的差额。因此可以明白，当劳动价值还只能作为思维的公式或科学的假说而要求得到承认的时候，剩余价值更加不过成了单纯的公式，成了一个以假说为根据的公式。

大家知道，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刊载于1895—1896年份的《新时代》上的一篇遗稿^②里提到通过历史地考察事件进程而解决问题的方法。根据这种说法，在资本主义经济以前的商品交换时期，价值规律的确是直接有效的，它的确直接支配了商品交换。根据这种说法，在生产手段还属于生产者本人时，不管是原始公社交换自己的产品余额也好，还是独立经营的农民和手工业者把自己的产品拿到市场上去也好，这些产品的价格正是围绕它们的劳动价值而波动的。但是当资本起初作为商业资本和商人的包买主资本，然后作为工场手工业资本，最后作为大工业资本而插入真正生产者和消费者的中间时，劳动价值就日益从表面上消失，生产价格就突出在首位了。前面所说的抽象，是历史上发生过的、到今天仍旧有其遗传的、并且在某些场合和以某些形式实际重

① “可衡量性”一词在第1版（第38页）中作“具体的内容”。——编者注

② 即《〈资本论〉第3卷的增补与跋文》，参看《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003—1030页。——编者注

复着的过程在思维上的再现。劳动价值即使已不再直接支配价格变动，却始终是实在物。

恩格斯企图联系《资本论》第3卷中的某一段，根据经济史来详尽地证明这一点。但是尽管他如此出色地例解了利润率的发生和发展，这篇文章在论及价值问题时，却恰恰缺乏令人信服的证明力。按照恩格斯的叙述，马克思的价值规律已经从产品作为商品而交换的开端（在巴比伦、埃及等地）起到资本主义生产的兴起为止，作为经济规律而普遍地支配了五千年到七千年。针对这一见解，帕尔乌斯^①已经在同一年份的《新时代》中援引一系列事实（封建关系，农村的未分化的经济，行会等等的垄断）而提出了一些有力的反驳，这些事实妨碍以生产者劳动时间为基础的一般交换价值的形成。只要为交换而进行的生产还是各经济单位的次要部门，还是使用劳动余额等等，并且实行交换的生产者还是在各种根本不同的条件下进行这种生产，以一种劳动价值为基础的交换就不可能成为普遍的规则，这是十分明显的。关于构成交换价值的劳动的问题以及从而关于价值和剩余价值的问题，在那些经济阶段并不比今天更为清楚。

但是**剩余劳动**这一事实在那些经济阶段中却比今天更为清楚。凡是在古代和中世纪实现了剩余劳动的地方，并不存在任何关于它的错觉，它并没有被任何价值概念弄得模糊不清。在奴隶必须为交换而生产的地方，他是纯粹的剩余劳动机器，农奴和隶农以徭役、实物租或什一税等公然的形态提供剩余劳动。行东的帮工能够容易地看出行东为他的劳动花多少钱，行东对顾客又是怎样计算这一劳动。^②工资同商品价格之间的关系的情况在资本主义时代初期也还是

① 即亚·拉·海爾方德（1869—1924），德国社会民主党党员，曾反对伯恩斯坦，后来堕落为沙文主义者。——编者注

② 在资本主义以前的营业方法在近代被保留下来的地方，剩余劳动在今天也还是不加掩饰地表现出来。在小泥水匠师傅的某一顾客处为师傅做工的帮工，完全精确地知道他的按小时工资比师傅向主顾计算的每工时价格要少多少。为顾客干活的裁缝和花匠等等也一样。

占支配地位。在那一时代的经济政治著作中，有一些今天令我们吃惊的论述剩余劳动和作为唯一的财富创造者的劳动的段落，就可以由此得到解释。一些在我们看来是对事物进行比较深刻的考察所得的成果，在那时几乎是平常的道理。那一时代的富人根本不会想到把他的财富说成是他自己的劳动成果。在工场手工业时代初期出现的关于劳动作为刚刚普及起来的（交换）价值的尺度的那一学说，固然以把劳动当作财富的唯一创造者的概念为出发点，而且它对于价值的理解仍旧十分具体，但是不久以后它就与其说是有助于使对剩余劳动的各种解释明确起来，不如说是有助于使它混乱了。后来亚当·斯密怎样根据这些解释而把利润和地租作为从劳动价值的扣除来加以说明，李嘉图怎样进一步完成这一思想以及社会主义者怎样把它掉转过来对付资产阶级经济学，这可以从马克思本人的著作中读到。

但是亚当·斯密已经把劳动价值理解为从支配的现实得出的抽象。据斯密说，它只是在资本积累和土地占有以前的“早期未开化社会状态”中以及在落后的行业中才具有充分的现实性。但是对于斯密说来，在资本主义世界中，价值的构成要素除了劳动或工资以外还有利润和地租，劳动价值只是当作为为了揭露劳动产品的分配也就是为了揭露剩余劳动这一事实的“概念”还能对斯密有用。

在马克思的体系中原则上也没有什么不同。固然马克思对于被他更为严格地、但也更为抽象地理解的劳动价值的概念比斯密更加坚持得多。但是，虽然马克思学派，其中也包括本书的作者，仍旧相信，在这一被激烈争论的问题（即劳动价值的附加语“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仅仅涉及有关商品的制造方式，还是同时也涉及这一商品的生产量同现实需求的比例）中存在着对于体系具有基本重要性的一点，不过在马克思的书桌上已经放着一个现成的解答，它使这一问题同其他问题一起也具有了完全不同的面貌，把它推移到另外一个领域，另外一条路线上去了。个别商品或商品种类的价值现在成了完全次要的东西，因为商品是按自己的生产费用——生产成本加利利润率——出售的。突出在首

位的是社会总生产的价值和这一价值超出工人阶级工资总额的余额，也就是说不是个别的，而是全部的社会剩余价值。工人全体在一定的时刻超出分给他们的份额而生产的东西，构成社会剩余价值，即社会生产的剩余价值，而各个资本家按照他们在经营上使用的资本以大致相同的比例分配这一剩余价值。但是这种剩余产品只能随着总生产符合总需要或市场容纳能力的程度而相应地得到实现。从这一观点即把生产当作整体的观点看来，每一个别商品品种的价值是通过在正常生产条件下按照市场（就是说，被当作购买者看待的全体）在各个时期能容纳的量来生产这一商品时所需要的劳动时间确定的。不过对于这里所考察的商品来说，在现实中恰恰没有任何衡量各个时期的总需要的尺度，因此按照上述的样子理解的价值也是一个纯粹思维的事实，与哥森—杰冯斯—柏姆学派的边际效用价值并无不同。二者都以现实的关系为基础，但是二者都建筑在抽象上面。^①

① 我们在列奥·冯·布赫的著作《劳动强度，商品的价值和价格》（莱比锡，敦刻尔及洪堡尔特公司，1896年）中遇到了企图赋予劳动价值以更为具体内容或者把它转变为理论上可以测定的量的有趣尝试。作者在写他的书时显然还不知道《资本论》第3卷，他构想出劳动的边际密度（“限界强度”）来作为劳动价值大小的尺度，这是从每天的劳动时间同八小时工作日的比例和实际工资同劳动产品的价值的比例（剥削率）得出的积数。劳动日愈短，剥削率愈小，劳动的密度就愈高，从而产品的劳动价值也就愈高。因此根据布赫的见解，在劳动价值的基础上不会发生任何剥削。从劳动价值同产品的市场价值的关系才会产生剥削。商品的市场价值是价格的基础，布赫称它为估价价值。他把交换价值一词抛弃了，认为在不再存在交换的今天，这一词是没有内容的。

尽管这一理论乍一看令人感到新奇，但是它毕竟有一个可取之处：布赫把劳动价值同市场价值从根本上分开来，这就使他避免任何概念上的二元论和能够远为严格地和纯粹地阐发劳动价值。成为问题的只是，那时把后一种“价值”牵涉到劳动价值的定义中去，是不是预测。布赫所打算做的事，即为同市场价值对立的劳动价值提供生理学上的论证，他也是能够做到的，如果他把实际支付的工资直接规定为衡量因素的话。但是对于在原则上排斥这里的劳动价值同工资的关系的那些人，我要请他们注意马克思的《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这一章中的一句话：“既然这种劳动力的价值较高，它也就表现为较高级的劳动，也就在同样长的时间内对象化为较多的价值。”（《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30页。——编者注）我只看到布赫的论著的第一部分，我保留在适当时机对它作更为详细的评论的权利。我认为它是相当精辟的分析的产物，对于一个还没有被充分阐明的问题，它是一个值得注意的贡献。

在考察复杂的现象时当然根本不能避免这样的抽象。它们能够被容许到多大程度，这完全取决于研究的对象和目的。本来可以容许马克思撇开商品的特征到这样的程度，使商品终于仅仅成为一定量的简单人类劳动的化身，正像可以让柏姆—杰冯斯学派自由地把除了效用以外的商品的一切属性抽象掉一样。但是前一类抽象同后一类抽象一样，仅仅对于论证的一定目的来说才可以容许，以抽象为基础而发现的原理仅仅在一定限度以内才能够生效。

不过即使不存在衡量各个时期对于某一商品种类的总需要的可靠尺度，实践毕竟表明，一切商品的需求和供给在某一时期之内是大致相等的。实践还表明，参加商品的制造和配送^①活动的人只是全体的一部分，而组成另一部分的人不是享有由同生产没有任何直接关系的服务而取得的收入，就是有着不劳而获的收入。由此可见，靠生产中所包含的全部劳动而生活的人数，比参加生产活动的人数要多得多，而收入统计向我们指明，不仅如此，不从事生产活动的阶层在总产品中所占有的份额，比他们对于从事生产活动的那一部分人的人数比例要大得多。后一部分人的剩余劳动是一件经验的、可以根据经验证明的事实，不需要任何演绎的证明。马克思的价值理论是否正确，对于剩余劳动的证明是完全无关紧要的。这一理论在这方面不是论证命题，而只是分析和例解的手段。

由此可见，如果说马克思在分析商品生产时假定各个商品按自己的价值出售，那么他是根据构想出来的个别事例来具体说明按照他的见解总生产所实际表现的那一过程。据他说，为商品全体所花费的劳动时间，在前面所述的意义上来说，就是它的社会价值。^②而即使这一

① 配送（Zuteilung）一词比会引起误解的“分配”（Verteilung）一词更恰当。

② “事实上价值规律，……因此，不仅在每个商品上只使用必要的劳动时间；而且在社会总劳动时间中，也只在必要的比例量使用在不同类的商品上。这是因为条件仍然是使用价值。……社会需要，即社会规模的使用价值，对于社会总劳动时间分别用在各个特殊生产领域的份额来说，是有决定意义的。”（《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716页。黑体字是伯恩斯坦用的。——编者注）单是这一句话就使人不可能凭几句高人一等的套话把哥森—柏姆的理论撇在一边了。

社会价值不能充分实现——因为总会发生由局部的生产过剩引起的商品价值减少——，那么这对于社会剩余价值或剩余产品的事实并没有任何原则性的影响。社会价值的量的增长有时会变化或者放慢，但是仍旧根本谈不到它的量在某一现代国家中会发生停顿，更不必说倒退了。剩余产品到处都在增加，但是它的增加对于工资资本的增加的比列，在先进各国今天是在下降中的^①。

马克思把在这里举出的总商品价值的图式转用于个别的商品，这已经表明，马克思认为剩余价值的形成完全属于生产领域，在这一领域中生产剩余价值的是工业的雇佣工人。从事现代经济生活的一切其他分子都是生产的辅助人员，举例说，他们作为商品商人、货币商人等或者作为他们的人员承担起本来属于工业企业的劳动，从而减少了企业的费用，他们就相应地间接促成了剩余价值的提高。批发商人等以及他们的雇员不过是工业家的转化和分化了的店员，他们的利润不过是工业家费用的转化和集中。这些商人的按工资关系受雇的职员固然为他们创造剩余价值，但是不创造任何社会剩余价值。因为他们的雇主的利润以及他们自己的工资是工业中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②。只不过这一部分同这里所考察的职能产生分化以前的情况或者没有这种分化时将会出现的情况相比，在比率上要少一些。这一分化才使生产的大规模发展和工业资本周转的加速成为可能。同一般的分工一样，这一分化提高了工业资本或者直接从事工业的劳动的生产率。

我们这样简要地复述《资本论》第3卷中对于商品商业资本（货币商业资本又是从它分化出来的）和商人利润的阐述，已经够了。由这些阐述可以明白，在马克思的体系中，创造剩余价值的劳动的界限是多么狭小。得到阐述的以及其他在这里未作进一步讨论的职能就其本性来

① 战争在许多国家在这一方面引起了倒退的后果，倒退的期间和结局还看不出。——编者注

② 第1版（第43页）中不说“剩余价值的一部分”，而是说“从剩余价值的扣除”，下一句中的“部分”，也作“扣除”。——编者注

说，对于近代的社会制度是不可缺少的。它们的形式能够改变并且无疑将要改变，但是只要人类不分解成小的自给自足的经济单位（那时这些职能也许将一部分被废除，一部分被压缩到最小程度），这些职能本身将依旧存在下去。不过在仍旧适用于当前社会的价值学说中，属于这些职能项下的全部支出都被简单地看成从剩余价值的扣除，一部分是作为“费用”，一部分是作为剥削率的一小部分。

在这里的对于职能的评价中存在着某种武断，所设想的不再是现存的社会，而是构想出来的一个共同经营的社会。这是价值理论的一切模糊之处的钥匙。价值理论只能根据这一图式来理解。我们已经看到，剩余价值作为可衡量的量^①，只有在假定存在着总经济的情况下才可以理解。马克思没有能做到为他的学说完成十分重要的关于阶级的一章。否则在这一章中就会极其清楚地表明，劳动价值绝对不过是一把钥匙，不过是同有灵魂的原子一样的思想印象。^②这一钥匙经马克思

① 第1版（第44页）中“可衡量的量”一词作“现实性”。——编者注

② 我们知道，我们在思考，我们也大体知道，我们以什么方式思考。但是我们永远不会知道，我们是怎样会思考的，意识是怎样由于外界的印象，由于神经刺激，或者由于我们大脑的分子的排列和相互作用方面的其他变化而产生的。人们曾经试图通过承认原子有某种程度的意识能力或者单子论意义上的灵感来加以解释。但是这是一个思维映象，是我们的推理方式和我们对于统一地理解世界的需要迫使我们作出的一个假设。

我在一篇论文中指出了这一事实，并且说，纯粹的唯物主义归根到底是唯心主义。这篇文章给了普列汉诺夫以求之不得的攻击我的机会。他在《新时代》（第16卷，1897—1898年第2册，第44期）上指责我一般地无知，特别是对于弗·恩格斯的哲学见解完全不能理解。我不来进一步详细叙述他在那里怎样任意地把我的话同我根本没有涉及的事物联系起来，我只说明一下，他的论文是以这样的声称结束的：有一天普列汉诺夫向恩格斯提出这样的问题：“那么您认为老斯宾诺莎的这句话是对的了的：‘思维和广延性不外是一个唯一的实体的两种属性’”，恩格斯回答说：“当然，老斯宾诺莎是完全正确的”。（参看普列汉诺夫：《反对哲学中的修正主义》，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3页。——编者注）

而斯宾诺莎认为具有这两个属性的那一实体就是神。然而这是与自然等同的神。正因如此，斯宾诺莎也已经很早就被斥为神的否定者，他的哲学被指责为无神论的。他的哲学形式上表现为泛神论，当然这种泛神论对于存在于自然之外的、人格的神的主张者来说也不过是改头换面的无神论。斯宾诺莎通过纯粹思辨的道路达到了关于具有上

的巨匠之手使用，就导致对资本主义经济机制的揭示和说明，而过去从来没有做过与它同样深入、同样合乎逻辑和透辟的揭示和说明。但是从某一点开始这一钥匙就失灵了，因此它成了对马克思的几乎每一个学生都是致命的东西。

劳动价值学说之所以令人迷惑，首先是由于劳动价值屡次被当成衡量资本家剥削工人的尺度，而把剩余价值率称为剥削率等等，则是引起这一错误的原因之一。即使从作为整体的社会出发并且把劳动工资的总和同其他收入的总和对比，那时剩余价值率作为这一尺度也是错误的，这从前面的叙述就已经可以明白了。价值学说不能为劳动产品分配的正当性和不正当性提供规范，正如原子学说不能为一件造型艺术品的美和丑提供规范一样。我们今天恰好是在剩余价值率很高的工业中遇到地位最好的工人，即“劳动贵族”的一部分，而在剩余价值率很低的工业中遇到被最可耻地压榨的工人。

仅仅根据雇佣工人不能获得他的劳动的全部价值这一事实，是不能为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作出科学的论证的。恩格斯在《哲学的贫困》的序言中写道：“马克思从来没有把他的共产主义要求放在这样的基础

述那些以及其他没有详细列举的属性的神这个无限实体的概念；对他来说合乎规律的思维同存在是同一的。在这一限度内他同许多唯物主义者是一致的，但是他本人只能在对唯物主义一词加以完全任意的解释的情况下被称为哲学唯物主义的代表。如果说人们毕竟应当把唯物主义理解为某种确定的东西，那么它只能是关于物质作为事物的最后的和唯一的基础的学说。但是斯宾诺莎把他的神实体明确地称为非物体的。任何人都有成为斯宾诺莎主义者的自由，但是那时他恰好不是唯物主义者。

我知道，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中给唯物主义下了与上面不同的另外两个定义。他起初简单地声称所有认为自然界是本源的人都是赞成唯物主义的，然后把唯物主义说成是“毫不怜惜地抛弃一切同事实（从事实本身的联系而不是从幻想的联系来把握的事实）不相符合的唯心主义怪想”。（参看《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2页。——编者注）这些定义对唯物主义一词作了如此广泛的解释，以致它失去了一切明确性并且把非常反唯物主义的见解也包括进来了。与其说是根据科学的理由不如说是根据政治的理由而顽固地坚持“唯物主义”名称的情况一再出现，而普列汉诺夫也不由自主地证实了这一点。（谁不宣誓效忠于思维的物质，就有政治异端的嫌疑，这就是他的文章的伦理。我将怎样熬过这种革出教门呢？）（方括号中的话在第2版中已删去。——编者注）

上，而是放在必然的、在我们眼前一天比一天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崩溃上”。^①

让我们来看一看，情况是怎样的吧。

第二节 现代社会中的收入变动

积累一方面表现为……不断增长的积聚，另一方面，表现为许多单个资本的互相排斥。

马克思：《资本论》^②

根据马克思的学说，剩余价值是资本家的宿命。资本家为了获得利润，必须生产剩余价值，但是他只能从活的劳动中抽取剩余价值。他为了对抗竞争者而确保市场，必须努力使生产低廉化，而只要他一旦做不到降低工资，他就只有通过提高劳动的生产率，也就是通过改善机器和节约人的劳动力来达到这一目的。但是当他使人的劳动力停止作用的时候，同时也就使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停止作用，这就等于他把为他生金蛋的母鸡杀掉了。结果是利润率的逐步下降。这一结果固然会由于起对抗作用的情况而暂时被阻止，但是仍旧一再重新出现。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个新的内在对立。利润率是使资本用于生产的动力，如果它下降到某一点以下，那么对于生产性企业的刺激就削弱了，当问题涉及作为积累起来的资本量的分支而进入市场的新资本时，尤其是如此。资本本身表明自己是资本主义生产的限界。生产的继续发展中断了。当一方面一切活动资本企图通过生产的激剧的紧张来保护和增加自己的利润量时，在另一方面已经开始出现生产扩大的停顿。这不过是在使用价值市场上促成由于相对的生产过剩而引起的危机的某些过程的对应物而已。商品的生产过剩同时也表现为资本的生产过

① 参看《哲学的贫困》，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5页。——编者注

② 《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721页。

剩。危机在这两方面都造成暂时的平衡。出现了资本的巨大减值和破坏，而在停滞的影响下，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必须甘心让工资压低到平均数以下，因为在劳动市场上有一支增大了的过剩劳动力的后备军供资本支配。过了一些时候，就会产生新的有利可图的投资条件，舞蹈可以重新开始了，不过是在上述内在对立的一个更高的阶段上。资本的集中更大，企业的积聚更大，剥削率提高了。

那么这一切都是正确的吗？

是正确的，又是不正确的。它首先就趋势来说是正确的。上述诸力量是存在的，并且按上述方向起着作用。但是这些过程也是从现实推断出来的：利润率的下降是事实，生产过剩和危机的发生是事实，周期性的资本破坏是事实，工业资本的积聚和集中是事实，剩余价值率的提高是事实。在这一限度内，上面的叙述在原则上是不可动摇的。如果说描写同现实不相符合，那么这不是因为说错了，而是因为说得不完整。^①对于上述诸对立起限制作用的诸因素，在马克思那里不是被完全忽视，就是虽然偶尔也得到讨论，但是后来在对被确认的事实进行概括和对比时被抛弃了，以致敌对关系的社会影响显得比它的实际情况更为强大和直接。

例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第23章，第2节）上说到通过分割等等形成资本分支（“许多单个资本的互相排斥”），同时还说，随着资本的积累，资本家的人数由于这样的分裂而“多少有所增加”。^②但是在以后的阐述中却完全把资本家数目的这种增加置之度外，甚至对于股份公司也仅仅从资本积聚和集中的角度来论述。似乎用上面的“多少有所增加”的表述就算把问题解决了。在第1卷的结尾只是说到“资本巨头的数目不断减少”，而第3卷中原则上对此也没有作什么变动。固然在论述利润率和商人资本时涉及了表明资本分散的事实，但是这对于

① 上面关于利润率下降、危机等等所说的话在多大程度上需要加以限制，在本书别的地方已经作了阐述。——补注

② 《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721页。——编者注

我们的论点没有用处。读者保留的印象是，资本持有者的数目不断减少——即使不是绝对地，那也是同工人阶级的增长相对来说减少了。因此在社会民主党内，关于财产的积聚同工业企业的积聚相平行的这一观念占有支配地位，或者说在思想中一再涌现出来。

但是情况决不是这样。股份公司的形式对于通过企业集中而实现财产集中的趋势在很显著的程度上起着对抗作用。它容许已经积聚的资本进行广泛的分裂，并且使各个巨头为了积聚工业企业的目的而占有资本成为多余的事。如果说非社会主义的经济学家利用这一事实来达到美化社会现状的目的，那么这对于社会主义者来说还不是隐瞒或者避而不谈这一事实的理由。不如说问题在于认识它的实际范围和它的重要性。

可惜关于今天占有如此广大领域的股份公司的普通股、优先股等等的实际分配仍旧完全缺乏数字上的证明，因为在大多数国家中股份是不记名的（就是说同其他纸币一样不必费事就可以更换持有者），而在英国，虽然记名股份占多数，并且任何人都可以在国家登记处翻阅并查明股东的名单，但是作出关于股份所有者的比较精确的统计是一件大事，还没有任何人敢于着手。只能根据关于个别公司的某些调查来大致估计他们的数目。不过为了指明人们在这一方面所抱的观念多么骗人，以及“托拉斯”这一最现代化和最突出的资本集中形式对于财产分配的影响如何在事实上与局外人所看到的完全不同，在这里举了一些容易核实的数字。

1898年创办的英国缝线托拉斯有不下12300的股份持有者。其中：

普通股持有者	6000人	平均资本1200马克（60镑） ^①
优先股持有者	4500人	平均资本3000马克（150镑）
债券持有者	1800人	平均资本6300马克（315镑）

① 括弧内的英镑数是译者根据英译本加上的，下同此。——编者注

细纱纺织业主托拉斯也有相当数目的股份持有者，即 5454 人。
1899 年的情况是：

普通股持有者	2904 人	平均资本 6000 马克（300 镑）
优先股持有者	1870 人	平均资本 10000 马克（500 镑）
债券持有者	680 人	平均资本 26000 马克（1300 镑）

P. & T.^①库兹棉花托拉斯的情况相似。^②曼彻斯特大运河的股东数达到 4 万左右，李普顿的大粮食公司的股东数达到 74262！近来被当作资本积聚的例子而举出的伦敦斯庇尔和庞德百货公司，总资本 2600 万马克（130 万镑），却有 4650 名股东，其中只有 550 人占有的股金超过 1 万马克（500 镑）。这是关于集中化企业的财产分配的分散情况的几个例子。不言而喻，全部股东并不都是值得一提的资本家，而同一个大资本家往往在一切可能的公司里作为小股东重新出现。但是无论如何股东的数目和他们的股金的平均额是在迅速增长之中。英国的股份持有者的数目估计总共远远超出 100 万，如果考虑到联合王国的股份公司的数目仅仅在 1896 年就达到了 21223 个，并且拥有已付资本 222.9 亿马克^③（不在英国本土交易的外国企业、国家公债等等那时还不包括在内）^④，那么这一估计看来是不过分的。

国民财富（在大部分场合也可以把这一词说成国民剩余产品）的分配在收入统计中得到了反映。

在联合王国，1893—1894 会计年度（我手头现有的最近的报告）归入 D 项和 E 项（营业利润、高级官职等方面的收入）的、被评定为有

① 英译本为 J. & P.——编者注

② 在所有这些托拉斯中，联合起来的各工厂以前的所有者必须自己接受一部分股份。在列出的表中没有把他们计算在内。也可参看本书第一万册版序言（第 20 页）中关于五家英国大酿造公司的普通股和优先股的分布情况的数字。

③ 1907 年 4 月的数目是 43038 个，有已付资本 2061010586 镑。——英译本第 45 页注

④ 估计今天投放在外国的英国资本是 430 亿马克，每年的增长平均为 1.14 亿马克！（写于 1899 年）〔1908 年，估计总数为 30 亿镑。——英译本第 45 页注〕

3000 马克（150 镑）及以上收入的人数是 727270^①。但是这还要加上根据土地收入（地租、佃租）、房租、应课税投资的收入而纳税的人。这一类所纳的税合计几乎同前述一类一样多，也就是说他们按 60 亿马克（3 亿镑）的收入纳税，前一类按 70 亿马克（3.5 亿镑）的收入纳税^②。这就会使收入 3000 马克（150 镑）以上的人数几乎增加了一倍。

在 1897 年 5 月 22 日的《英国评论》上有一些关于 1851 年到 1881 年英国的收入增加的数字。根据这些数字，英国收入 150 镑到 1000 镑的家庭（中等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最高级的工人贵族）有：1851 年约 30 万个，1881 年约 99 万个。在这 30 年中人口就比例说从 27 增加到 35，就是说增加了约 30%，而这一收入等级的人数就比例说却从 27 增加到 90，就是说增加了 $223\frac{1}{3}\%$ 。吉芬^③估计今天这一等级有 150 万纳税人。^④

其他国家所展示的图景在原则上并无不同。据莫尔哈尔^⑤说，法国共有 800 万个家庭，其中 170 万个家庭具有大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生活条件（平均收入 5200 马克），还有 600 万工人和 16 万大富翁。拉萨尔的读者知道，在普鲁士，1854 年在 1630 万人口中只有 44407 人有 1000 泰勒尔以上的收入。在 1894—1895 年度，在大约 3300 万总人口中，有 321296 人按 3000 马克以上的收入纳税。1897—1898 年度，这一数目增加到 347328。人口加了一倍，地位较好的这一阶层却增加了 7 倍以上。即使考虑到 1866 年并入的地区大都比旧普鲁士有更多的富裕户，而且在这一期间有许多生活资料的价格显著上涨，但是地位较好的人的增加同总人口的增加的比例至少远远超过 2 : 1。如果我们举

① 1907 年收入在 160 镑以上的人数为 894249。——英译本第 45 页注

② 1907 年的数字是：后一类收入为 327900650 镑，前一类为 518669541 镑。——英译本第 45 页注

③ 罗伯特·吉芬（1837—1910），英国统计学家。——编者注

④ 齐奥萨·孟涅先生估计，在 1903—1904 年，有 75 万人的收入在每年 160 镑—700 镑之间。——英译本第 46 页注

⑤ 迈克尔·莫尔哈尔（1836—1900），爱尔兰统计学家。——编者注

一个稍后的时期为例，那么我们会发现，在 1876 年到 1890 年这 14 年间，纳税人一共增加了 20.56%，而收入在 2000 到 20000 马克之间的纳税人（富裕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却从 442534 人增加到 582024 人，就是说增加了 31.52%。真正的有产者等级（收入 6000 马克及以上）在同一时期从 66319 人增加到 109095 人，就是说增加了 58.47%。这一增长的 5/6，即 38776 人中的 33226 人，属于收入在 6000 到 20000 马克之间的中等阶层。德国工业化程度最高的邦即萨克森的情况也是一样。从 1879 年到 1890 年，那里的收入在 1600 和 3300 马克之间的人数从 62140 增加到 91124，收入在 3300 和 9600 马克之间的人数从 34414 增加到 38841。^①德国的其他各邦也一样。当然取得较高收入的人并不会全部都是“有产者”，但是他们在多么大程度上是有产者可以从下面的事实看出来：在 1895—1896 年度，普鲁士有 1152332 个应课税纯财产占有在 6000 马克以上的纳税人被征收了补充税^②。其中的一半以上的人，即 598063 人，按 20000 马克以上的纯财产纳税，有 385000 人按 32000 马克以上的纯财产纳税^③。

由此可见，如果假定目前的发展表现出有产者人数相对地或甚至绝对地减少，那是完全错误的。有产者的人数不是“或多或少地”增加，而简直就是更多了，就是说绝对地而且相对地增加了。如果说社会民主党的活动和前途取决于有产者人数的减少，那么它的确可以“躺着睡

① 后一等级从 1890 年到 1892 年又增加了 2400 人，即增加到 39266 人。关于前一等级，我没有 1892 年的绝对数字，所以只能指出，在 1879 年和 1892 年之间，收入在 800 马克和 3300 马克之间（地位较好的工人和小资产阶级）的人数在萨克森从 227839 人增加到 439948 人，就是说从纳税人的 20.94% 增加到 30.48%。在这里要说明一下，有关普鲁士和萨克森的数字，一部分取自政治科学辞典，一部分取自休恩伯格的手册。

② 普鲁士从 1893 年起对财产收入增课“补充税”，按财产价值的 0.5% 左右征收。——编者注

③ 到了 1911 年，普鲁士的拥有 32000 马克以上财产的纳税人数增加到 568882。收入在 52000 马克以上的有交纳所得税义务的人数在 1912 年增加到 339388。——补注

觉”了^①。但情况是相反的。社会民主党的前途不是取决于社会财富的减少，而是取决于它的增长。近代社会主义或社会主义运动已经把不少迷信抛在后面，它也将把这一迷信抛在后面：它的未来取决于财产的积聚，或者如果愿意的话，可以说，取决于剩余价值之被一个日益缩小的超级资本家集团所吸取。^②社会剩余产品是被 1 万人垄断地积蓄起来，还是在 50 万人中间按不同的等级的量进行分配，这对于在这场交易中吃亏的 900 万或者 1000 万的一家之主来说，原则上是无关紧要的。他们对于较为公平的分配或者一个包含较为公平分配的组织的追求，却并不一定会因此而减少正当性和必要性。恰恰相反。维持几千个特权者穷奢极欲的生活，比维持 50 多万人的非分的富裕生活，也许要耗费较少的剩余劳动。

如果社会是按照社会主义学说迄今所设想的那样构成或者发展下来的，那么经济崩溃当然只能是一个很短时期内就要发生的问题了。但是正如我们所见到的，情况恰好不是这样。社会结构同从前比起来远没有简单化，不如说它无论就收入水平还是就职业活动来说，都高度地分级和分化了。而即使我们没有通过收入统计和职业统计看见这一事实在经验上得到确证，那么也可以按照纯粹演绎的途径证明它是现代经济的必然后果。

现代生产方式的最为突出的特征是劳动生产力的巨大提高。它的后果是同样巨大的生产提高——使用品的大量生产。这一财富留在哪里？或者为了立刻把问题集中到事情的核心可以说：工业的雇佣工人超出他们自己的以工资为限的消费以外所生产的剩余产品留在哪里？“资本家巨头”哪怕有着比民间笑话说他们具有的还大 10 倍的肚

① 这是卡尔·考茨基在德国社会民主党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上针对我的信中关于资本家在增加而不是在减少的这一说法所讲的话。——英译本第 48 页注

② 此外，在社会主义文献多半忽视的关于最高收入的统计中，有很大的百分比是属于法人即各种类型的法人团体（股份公司等等）的。例如 1892 年萨克森的 11138 个收入在 9600 马克以上的纳税人中有 5594 个法人，而愈往上去，法人愈占优势。在超过 30 万马克以上的收入中，有 23 个是自然人，33 个是法人。

子，并且有着比他们实际所有的还多 10 倍的仆人，但是同每年的国民生产产品的量比起来——我们不妨想一想，资本主义大生产首先是大宗生产——他们的消费仍旧像是天平上的一根羽毛。有人会说，他们把剩余输出了。不错，但是国外的买主归根到底也只是又一次用商品来支付。流通的金属货币在世界贸易中所起的作用是微乎其微的。一个国家的资本愈雄厚，它的商品进口就愈多，因为向它借钱的那些国家，大多数除了用商品形态以外根本不能用别的办法支付利息^①。那么巨头和他们的全体仆役没有消费掉的商品量留在哪里呢？如果它们的确没有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流入无产阶级手中，那么它们一定正好是被其他阶级拿去了。不是资本家的数目愈来愈相对地减少和无产阶级愈来愈富裕，就是一个人数众多的中等阶级，这是生产的不断提高容许我们作出的唯一抉择。危机和用在军队等等方面的非生产性支出吞掉了许多，但是近来它们也总是只吸收总剩余产品的一小部分。如果工人阶级打算一直等到“资本”把中等阶级从世界上排除掉，那么它们的确可以睡一个长觉。资本会以一种形式剥夺这些阶级，又以另一种形式不断再使它们重新产生出来。负有吸纳经济寄生分子的使命的，不是“资本”，而是工人阶级自己。

曼彻斯特派著作家对于目前状况的种种美化，是以现代民族国家的财富在日益增大的程度上成为流动的使用品这一事实为依据的。这在当时几乎促使所有的社会主义者陷入相反的极端，把社会财富仅仅看成“资本”项下的固定财富，这一资本逐渐人格化为一种神秘的实在。甚至最清楚的头脑，只要遇到“资本”这一概念的打扰，就立刻丧失健全的判断。马克思有一次这样说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让·巴·萨伊：他之所以竟敢对危机妄加判断，是因为他知道商品是产品。今天有许多人认为，如果他们指明了企业资本这一特殊形态，他们就已经说尽关于社会财富的一切了。

我在给斯图加特党代表大会的书信中说过，伴随着社会财富的增长

^① 英国以 20 亿马克价值的入超的形式收取未支付的利息；其中的最大部分是日用品。

而出现的，将不是数目日益缩小的资本巨头，而是数目日益增加的各种等级的资本家。针对这一句话，《纽约人民报》^①的一篇社论指责我说，至少就美国来说，这是错误的，因为美国的纳税调查证明，那里的生产受一批辛迪加（“康采恩”）支配，这些辛迪加的数目，同生产的总量相对来说，是愈来愈缩小的。这算什么反驳！我关于一般的阶级结构所作的说明，这个批评家竟认为可以依靠援引工业企业的结构来驳倒它。这就好像某一个人打算说，现代社会中无产阶级的数目愈来愈缩小了，因为在从前个别工人站立的地方，今天则是工会站的地方。

社论在这以后当然加上了这样的说明：企业的这一集中是主要的事情，股东中间是否会形成一个新的无所事事的阶级，是无关紧要的。

这在目前是一种见解，却不是反对我所强调的事实的证据。为了分析社会，这一件事实同另一件事实一样，都要很好地加以考察。从某一角度来看，它可能是较不重要的事实，但是这里的问题不在于此，而是在于它是否正确。对于企业的集中，我的确并不是完全不知道的，我自己在信中的紧接着的一句话中已经说到它。我提到两件事实，而这位批评家竟认为，当他仅仅宣称一件事实是重要的时候，就证明另一件事是错误的了。但愿我成功地做到把迷住他和别人的眼光的幻影打破。

卡尔·考茨基——还在斯图加特大会上——也已经引用了上述说法，并且反驳我说：如果真的是资本家而不是无产者增加，那么资本主义就巩固了，而我们社会主义者就根本不会达到目的。但是马克思的这句话仍旧是真实的：资本的增加^②也意味着无产阶级的增加。

这一批评是同样地牛头不对马嘴，不过是在另一方向上的，也不像前一个错得那么严重。我没有在任何地方说过无产阶级没有增加。当我强调一切等级的资本家的增加时，我说的是人而不是企业主。但是考茨基显然死死抓住“资本”这一概念并且推论说，资本家的相对增加

① 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在美国出版的日报，1878年创刊，一直出版到1932年。——编者注

② 第2版作“资本主义的增加”，现在按第1版（第53页）译成这样。——编者注

必然意味着无产阶级的相对减少，但这是同我们的学说相矛盾的。于是他就用上引的马克思的话来反驳我了。

我在前面已经接触到马克思的一句同考茨基所引用的稍有不同的话。^①考茨基的错误在于把资本同资本家或有产者等同起来。但是我还想在这里向考茨基指出另一件使他的反驳失效的事情。这就是被马克思称为有机的发展的那一工业资本的发展。如果资本构成变化的方式是，不变资本增加和可变资本减少，那么在有关企业中资本的绝对增加就意味着无产阶级的相对减少。但是按照马克思的看法，这正好是现代发展的具有特征的形式。如果把这一点转用到资本主义的整个经济上，那么事实上就是说：资本绝对增加，无产阶级相对减少。^②由于有机构成改变而成为过剩的工人，每次只有在市场上出现了可以雇佣他们的新的资本时才能在相应程度上重新找到工作。正是在考茨基把问题的锋芒指向的这一点上，我的说法是同马克思的理论一致的。要想工人的数目增加，资本必须在比例上还要增加得更快，这就是马克思的演绎的归结。我想，考茨基会毫不犹豫地承认这一点。^③

由此可见，到此为止，问题仅仅是在于，增加的资本是否仅仅是作为企业基金的资本所有，还是也作为企业股份的资本所有。

如果不是的话，那么随便哪一个雇着 6 个帮工和几个学徒来营业

① 《资本论》第 1 卷第 23 章第 721 页，那里说资本家的数目由于资本的分割和分支而“多少有所”增加，马克思后来把这一事实完全置之度外了。——英译本第 52 页注

② 这一断语和“机器扼杀劳动者”这句话（《资本论》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497 页，但原文是“劳动资料扼杀工人”。——编者注）也曾经导致过分性急的关于各阶级的一般发展的结论。事实上直到战争爆发时为止，在一切现代国家中，工业工人的数目屡次比一般人口增加得更为迅速。德国的工业工人在 1882 年到 1907 年间从 4096243 人增加到 8593125 人，也就是增加了 1 倍以上。技术职员和商业职员阶层（这是不变资本增加的生动的表现）从 307268 人增加到 1290725 人，就是说增加到了 4 倍！——补注

③ 我要遗憾地说，考茨基没有坦白地承认他的错误。他对我所举出的统计吹毛求疵，最后回答我说，懒惰的资本家的确增加了。似乎我曾经把资本家阶级描述为一个工人阶级。——英译本第 53 页注

的制锁工匠巴塞瓦尔克将是资本家，但是皮包里放着几十万马克的食利者繆勒或者他的女婿、得到了一大笔股票作为投资的工程师舒尔采（股东并不全部都是无所事事的人）倒是无产者了。这种分类法的荒谬之处是一目了然的。财产就是财产，不管是固定的还是流动的。股份不仅是资本，而且甚至是资本的最完善的形式，也可以说是最升华的形式。它是摆脱了同营业活动的鄙俗性的一切粗俗接触的证券，凭此可以分享民族经济或世界经济的剩余产品——动态的资本，如果愿意这样说的话。而即使股东们统统都只是作为无所事事的食利者而生活着，那么日益增长的股东群——今天可以说是股东营——仅仅由于自己的存在、自己的消费方式和自己的社会随从的数目，就已经是对于社会的经济生活产生强烈影响的力量。股份在社会阶梯上再现了由于企业的积聚而作为生产头领被从工业中排除出来的中间环节。

但是这一积聚也有它自己的道理。让我们比较仔细地来把它考察一下。

第三节 生产中的经营等级和社会财富的扩散

英国可算是资本主义发展最先进的欧洲国家，但它缺乏关于工业中的企业等级的全面统计数字。只有某些受工厂法支配的生产部门和个别地区才有这种统计数字。

就受工厂法支配的工厂和作坊而论，根据 1896 年的工厂视察员报告书，它们一共雇用 4398983 人。这还不到 1891 年人口调查列为从事工业的人数的一半。人口调查中的数字是 9025902 人（运输业除外）。在其余的 4626919 人中，有 1/4 到 1/3 可以算作有关的生产部门中的营业人员以及一些不受工厂法支配的中等企业和大企业的人员。还剩下大约 300 万是细小企业中的雇员和小业主。400 万受工厂法支配的工人分布在共计 160948 个工厂和作坊中，平均每一企业有 27 至 28 人。^①

^① 在报告书结束时还有 1931 个登记的工厂和 5624 个作坊的数字没有收到。这些数字将使按企业的工人比率更加减少。

如果我们把工厂和作坊分开算，结果就是，76279 个工厂共雇用 3743418 名工人，81669 个作坊共雇佣 655565 名工人，平均每一工厂有 49 名工人，每一登记的作坊有 8 名工人。每一工厂 49 名工人这样的平均数字就已经表明，而对报告中的表格的更为精确的考察也已证实，在作为工厂登记的企业中，至少有 2/3 属于 6 人到 50 人的中等企业的范畴，因此至多只剩下 20000 个到 25000 个是 50 人及 50 人以上的企业，总共代表将近 300 万工人。从事运输业的 1171990 人中，至多有 3/4 可以看作是属于大企业的。如果把他们加到前面几类里计算，那么得数是，大企业中的工人和辅助人员一共是 350 万到 400 万人，与此相比，受中小企业雇用的人员超过 550 万。由此可见，“世界工场”还远不是像人们所认为的那种程度地落入大工业之手。不如说，在不列颠帝国，工业企业也表现了极大的多样性，哪一个规模等级也没有从阶梯上消失。^①

① 移居英国的德国工人曾一再向我表示，他们对于在这一国家的木材、金属等加工工业中所见到的分散经营状况感到惊奇。今天的棉纺工业的数字表明，自从卡尔·马克思著述以来，它们的积聚程度增加有限。同马克思最后提供的数字的比较如下：

	1868 年 马克思的数字	1890 年 统计的数字	增加或减少 的百分比
工 厂	2549	2538	-0.43
动力织机	379329	615714	62
纱 锭	32000014	44504819	39
工 人	401064	528795	32
每厂工人数	156	208	33

对于一种经历如此大的技术变革的工业来说，22 年来的集中程度是不算异常高的。固然动力织机增加了 64%，但是纱锭的数目只比雇用的工人数目增加得略快一些。就工人的增加来说，从 1870 年以后，成年男工人的增加超过女工和童工的增加。（参看《资本论》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第 2 版，第 500 页。——编者注）及《联合王国 1878—1892 年统计摘要》。）纺织工业的其他部门中的积聚程度比这还小。例如毛纺和梳毛工厂在 1870 年到 1890 年间从 2459 个增加到 2546 个，雇用的工人从 224687 人增加到 297053 人，即每个工厂从 95 人增加到 117 人。同棉纺工业相反，这些工厂中的纱锭比织机增加得快得多，后者只从 112794 台增加到 119222 台，比不上雇佣工人的增加。因此只有毛纺业能称得上积聚。

1896 年的工厂视察员报告书所记载的英国全部纺织工业的工厂数目是 9891 个，分属 7900 家企业，雇用 1077687 名工人，而 1870 年的工厂数是 5968 个，有工人 718051 名——每一企业的工人密度从 120.3 提高到了 136.4。

同 1895 年德国行业统计的数字比较一下，我们就会发现，德国的统计所呈现的图景大体和英国相同。1895 年德国大工业在生产中所占的相对地位已经接近 1891 年的英国。1895 年，普鲁士有 38% 的工业工人属于大工业。在那里以及在德国的其他地区，向大工业的发展是以巨大的速度完成的。如果说许多工业部门（包括纺织工业）在这一点上还比英国落后，那么另外一些（机械和工具）平均已达到英国水平，还有一些（化学工业，玻璃工业，印刷工业的某些部门，很可能还有电机）已经超过了它。不过德国从事工业的人员大部分也仍旧属于小企业和中等企业。1895 年，1250 万从事工业的人员中，300 余万属于大企业，250 万属于中等企业（6 人到 50 人），475 万属于小企业。手工业工匠还有 125 万。在 5 个行业中，手工业工匠的数目在 1895 年左右绝对地和相对地（同人口增加比起来）都有增加，在 9 个行业中只是绝对地增加，在 11 个行业中绝对地和相对地都减少了。^①

法国的工业在数量上即规模上还比农业落后；根据 1894 年 4 月 17 日的人口调查，工业只代表 25.9% 的人口，农业所代表的人口多了将近 1 倍，即 47.3%。奥国的比例相似，人口的 55.9% 从事农业，25.8% 从事工业。法国工业有 100 万独立经营者和 330 万雇佣人员，奥国则

① 参看卡尔威尔：《手工业的发展》，载于《新时代》，第 15 年卷第 2 册，第 597 页。

在第一次和最近一次德国职业和行业普查之间的 25 年中，即从 1882 年到 1907 年，各种规模等级的企业的人员增加如下：

	1882 年	1907 年	增加的百分比
1—5 人的小企业	4335822	5383235	24.16
6—10 人的企业	500097	1104597	120.9
11—50 人的企业	891623	2584575	189.9
51—200 人的企业	742688	2418150	225.6
201—1000 人的企业	657399	1991056	202.9
1000 人以上的企业	213160	954645	347.8

在同一期间，德国总人口增加了 36.5%，因此最小企业的增加意味着相对的减退，所有其他的集团的增加则远远超过人口的增加。当然，一个企业（Betrieb）并不就是一家企业。不少家企业（Unternehmung）包含二三个或者更多的企业（Betrieb）。尽管如此，这些数字仍旧是反驳关于小企业和中等企业“消失”的概念的。——补注

有 60 万独立经营者和 225 万工人与日工。这一方面的比例也大致相同。两国都有一批高度发展的工业（纺织工业，矿业和钢铁业等），它们就企业规模说可以同先进国家媲美，但是在国民经济中只是局部现象。

瑞士有 12.7 万个独立经营者和 40 万个工业工人。美利坚合众国（根据上述《纽约人民报》撰稿人的说法，它是世界上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1890 年的人口统计虽然表明，它的工业中每一企业的平均工人数是比较高的，35.5415 万个工业企业有 350 万工人，也就是说，工人和企业的比例是 10 : 1。但这里同英国一样，恰恰缺少一切家庭企业和细小企业的数字。如果从上往下看普鲁士工业统计的数字，那么所得的平均数几乎就是美国人口调查的平均数字。如果我们更为仔细地考察一下合众国《统计摘要》中关于列入人口调查的工业的名单，就会碰到无数的制造业部门，其中平均每一企业只有 5 个或更少的工人。例如就在第一页上，在共有 3.0723 万名工人的 910 个农业机械工厂、共有 1993 名工人的 35 个军火工厂和共有 3638 名工人的 251 个人造羽毛和人造花卉工厂后面，是共有 154 名工人的 59 个义肢工厂和共有 2873 名工人的 581 个帆布和天棚工厂。

如果说，在数目日益增加的工业部门中，不断的技术进步和企业集中化已经是一个真理，它的意义今天几乎没有任何顽固的反动派能够讳言了，那么，这同样也是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在一整批工业部门中，小企业和中等企业表明自己完全有能力同大企业并存。工业中也没有出现按照一个对一切行业同样适用的格式进行的发展。完全按常规经营的企业继续保持为小工业和中等工业，而有些工艺部门虽然被认为是稳定地属于小企业，却不知道会在哪一天无可挽回地落入大工业之手。家庭工业和中间商工业的情况也差不多。苏黎世州丝织工业中的家庭纺织业，在较长时期内是缩减的，但是从 1891 年到 1897 年，家庭织工从 24708 人增加到 27800 人，而机器丝织业中的工人和雇员只从 11840 人增加到 14550 人。家庭织工的这一增加是否能当作经济上可喜的现象来加以欢迎，这是另外一个问题，这里的问题首先只是肯定事

实，不管其他。

小企业和中等企业的坚持和新起，是由一系列的情况决定的，这些情况可以分为三类。

首先，一大批工业或工业部门对于小企业和中等企业来说，差不多同对于大企业一样适合，后者对于前者的优越性并不显著，因而可以被小企业所固有的优越性所抵消。大家知道，木材、皮革和金属加工工业中的许多部门就是这样。或者说，有这样的一种分工：大工业生产半成品或 3/4 成品，由小企业制成上市成品。

其次，在许多场合，必须采取的使商品到达消费者手中的方式，有利于小企业的生产，这在面包制造业中表现得最明显。如果只考虑技术方面，那么面包制造业早已被大工业垄断了；因为许多获得高额利润的面包工厂已经证明，由大工业经营面包制造可以收到很大成效。但是尽管有面包厂和同样在逐渐夺取市场的点心工厂，但是小面包作坊和中等面包作坊由于同消费者直接交易所产生的优越性，仍旧能在它们旁边坚持。如果面包师傅们所必须对付的只是资本主义企业，那么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他们是以太平无事的。他们从 1882 年以来的增加固然跟不上人口的增加，但仍旧是值得提的（1907 年为 98249 人，而 1882 年为 74283 人）。^①

但是面包制造业只是一个极端的例子。对于一整批工业，特别是那些把生产性劳动和提供服务的劳动结合在一起的工业来说，上述情况同样适合。这里可以举出蹄铁业和车行。美国的调查表明有 28000 家蹄铁铺和车行，共有 50867 人，其中正好有一半是独立经营者；德国的职业统计表明有 62722 个铁匠和蹄铁匠。这种情况不用说将继续一个相当长的时期，直到由蒸汽或其他动力发动的机动车辆扑灭它们的生命之光为止。但是这一来，新的小型作坊却由此得到了生命，就像大

^① 在普鲁士，1895 年到 1907 年面包师傅从 52045 人增加到 62985 人，即增加了 20% 以上；而人口只增加了 19%。——英译本第 61 页注（第 1 版括号内的话是：1895 年为 77609 人，而 1882 年为 74282 人。——编者注）

家知道自行车所做的事一样。同样还有成衣业、制鞋业、鞍具业、木器业、地毯业、钟表业等，在这些行业里，为顾客工作（在不同程度上是修理工作）和零售维持着独立经营者的生活，当然其中有许多人只有无产阶级的收入，但远不是全体都这样。

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是，大企业本身哺育着小企业和中等企业，部分地通过劳动材料（辅助材料，半成品）的大量生产和相应的减价，部分地通过一方面资本的被排斥和另一方面工人的“解放”。大量或小量的新资本一再出现，在市场上寻找用途，而市场对于新商品的容纳能力不断地随着社会财富俱增。在这一方面前述的股东起了不小的作用。市场实际上是不能靠屈指可数的百万富翁维持的，哪怕这只“手”有几千个指头。但是几十万富翁和富裕户就不可忽视了。这一阶层的奢侈品起初几乎全部都是在小企业和中等企业中制造的，后来也有许多是这样，而这些企业由于加工贵重的材料和使用昂贵的机器，也可能是相当资本主义化的企业（珠宝制造，贵金属加工，美术印刷）。只是在后来，大企业（在它自己没有把有关商品的生产接受下来的情况下）才通过降低劳动材料的价格而助成了这种或那种新的奢侈的“民主化”。

这样，尽管工业的分类和企业的内部组织不断变化，目前的光景就整个来说，似乎并不是大企业经常地吸收小企业和中等企业，而不过是大企业在它们旁边发展起来。只有细小企业绝对地和相对地都减少了。但是说到小企业和中等企业，它们也有增加，例如德国的情况可由下面的数字说明。雇用帮工经营的企业的工人数目是：

	1882年	1895年	增加的百分比
小企业（1—5人）	2457950	3056318	24.3
小的中等企业（6—10人）	500097	833409	66.6
较大的中等企业（11—50人）	891623	1620848	81.8 ^①

① 雇用1—5人的企业（加上个体户）的人员在1882年到1907年间从4335322人增加到5353570人，即增加了23.5%；雇用6—50人的企业从1391740人增加到3644415人，即增加了161.14%，同时总人口的增加大约是36.5%。——补注

但是在同一时期内人口只增加了 13.5%。

由此可见，纵然在被论述的时期内大企业的工人队伍增加得更快——88.7%，这一增加也只是在个别情况下才同小店铺的被吸收意义相等。事实上在许多场合，大企业和小企业之间根本没有——或者说也可以说不再有——竞争（请考虑大的机械制造厂和架桥工业）。在我们的文献中有援引纺织工业的偏爱，但是这个例子在许多方面是骗人的。机器纺机同旧式纺锤相比所表现出来的生产率的提高，只是孤立地被反复提到。许多大企业并不是由于所使用的劳动的生产率，而不过是由于企业的规模，才胜过小企业和中等企业（造船厂），而且小企业和中等企业的营业范围完全或者大部分没有受影响。谁听说普鲁士的大企业在 1895 年所雇用的工人几乎是 1882 年的一倍，听说大企业在 1882 年只占全体从事工业的工人的 28.4%，而 1895 年就已经占 38%，那么他可能很容易设想，小企业实际上很快就将成为过去的事物，它在经济中的作用已全部完成了。上面引用的数字表明，大企业的跳跃式的普及和扩展只表现了经济发展的一个方面。

工业怎样，商业也怎样。虽然大百货商店迅速发展，但中等商店和小商店站住了脚。这里的问题当然不是要反对说商业或者所谓中间商业中有寄生因素。不过仍旧必须指出，在这一方面也夹杂着许多夸大。大生产和不断增长的世界贸易把愈来愈大量的使用品投入市场，这些使用品要求以随便什么方式被送给消费者。这也可能通过花费比目前的中间商业更少的劳动和费用来做到，有谁会否认呢？但是，只要还没有做到，中间商业也就要存在。期待大工业在可预见的时间内把小企业和中等企业吸收到只剩一点比较不足道的残余，这是幻想，而指望资本主义的百货商店相当大量地吸收中小商店，同样也是空想。它们伤害个别的商店，在这里或那里暂时使整个小商业陷入混乱。但是过了一些时候，小商业毕竟找到同大商业竞争并且利用地域关系所提供的一切优越性的途径。商店的新的专业化和新的结合形成了，商店经营的新的形式和方法形成了。资本主义百货商店暂时与其说是消灭寄生

性小商业的工具，远不如说是商品财富巨大增长的产物；它所起的作用与其说是把小商业从根铲除，不如说是把它从陈规旧套中唤醒，使它摆脱某些垄断性的习惯。商店的数目不断增长，它在英国在 1875 年到 1885 年之间从 295000 家增加到 366000 家。从事商业的人员的数目增加得更多。因为 1891 年英国的这一方面的统计是按照与 1881 年统计不同的原则制成的^①，让我们在这里采用普鲁士统计的数字。

在普鲁士的商业和交通（铁路和邮政不在内）中工作的人员如下：

企 业	1885 年	1895 年	增加率
有 2 名及以下雇员的	411,509	467,656	13.6%
在 3—5 名雇员的	176,867	342,112	93.4%
有 6—50 名雇员的	157,328	303,078	92.6%
有 51 名及更多的雇员的	25,619	62,056	142.2%
	771,323	1,174,902	52.3%

按比例说，大企业中的增加最大，但是它们只占全体的 5% 略多一些。同小企业进行最致命的竞争的并不是大企业，这件事是由小企业尽可能地相互促成的。但是按比例说，留下的尸体毕竟不多。企业阶梯的构成始终不受损害。小的中等企业增加得最多。

我们最后说到农业。就经营的规模比例来说，目前在欧洲到处以及美洲的一部分可以见到一种变动，它似乎同社会主义理论所一向假定的一切相抵触。工业和商业只不过表现了比原来假定的较为缓慢的向大企业上升的运动，但农业表现出来的不是停顿，就是经营规模的直接缩小。

首先说到德国，1895 年的经营登记同 1882 年比起来，农民的中等经营（5—20 公顷）规模这一组相对说来是增加最多的，即几乎增加了 8%，它们所占有的土地面积增加得更多，即大约 9%。紧接着它下面的农民小经营（2—5 公顷）的增加列为第二，经营数增加了 3.5%，所占

① 仅就从这一统计可以看出来的事情来说，它表明在最近 10 年增长了 50% 以上。

土地面积增加 8%。细小经营（2 公顷以下）增加了 5.8%，它们所占的土地面积增加了 12%，不过这一面积中用在农业上的部分减少了将近 1%。已经部分地资本主义化的富农经营（20—100 公顷）增加了不到 1%，而且完全是在林业方面。大农场（100 公顷以上）的增加还不到 0.33%，同样是在林业方面。

1895 年的有关数字如下：

按公顷数划分的 经营类别	经营数	用于农业 的面积	总面积
细小经营（2 公顷以下）	3236367	1808444	2415414
小农经营（2—5 公顷）	1016318	3285984	4142071
中农经营（5—20 公顷）	998804	9721875	12537660
富农经营（20—100 公顷）	281767	9869837	13157201
大农场（100 公顷及以上）	25061	7831801	11031896

经营总面积 2/3 以上属于三种类型的农民经济，约 1/4 属于大农场。普鲁士的比率更偏向农民经营的方面，它们在那里几乎占有农业土地面积的 3/4，即在 3259.1 万公顷中占 2287.5 万公顷。^①

让我们从普鲁士转向邻近的荷兰，那我们就得到：

经营规模	经营数		增 减	百分比
	1884 年	1893 年		
1—5 公顷	66842	77767	10925	16.2
5—10 公顷	31552	34199	2647	8.4
10—50 公顷	48278	51940	3662	7.6
50 公顷以上	3554	3510	-44	-1.2

① 从 1895 年到 1907 年，大农场的数目减少到 23568 个，反之，中农经营的数目从 998804 个上升到 1065539 个，细小经营也从 3236367 个增加到 3378509 个。小农经营在数目上保持不变，富农经营下降到 262191 个。上举普鲁士由农民经营使用的农业土地面积是错误的。应当是在全部 21372025 公顷中占 13709892 公顷。1907 年的比率是 14077843 公顷比 20984025 公顷，可见是大为提高了。

大农场在这里直接减少了，而小农的中等经营显著增加。^①

据王德威尔得^②说，比利时的土地所有和土地经营都经历了不断的分散过程。最近一次的普遍统计指出，地主的数目从1846年的201226户增加到1880年的293524户，佃农则从371320户增加到616872户。比利时总的农业耕地面积在1880年不到200万公顷，其中1/3以上是由所有主经营的。这种零散经营令人想起中国的土地关系来。

法国1882年的农业经营是：

	经营数	面积
1公顷以下	2167767	11366274公顷
1—10公顷	2635030	
10—40公顷	727088	14845650公顷
40—100公顷	113285	22266104公顷
100—200公顷	20644	
200—500公顷	7942	
500公顷以上	217	
	5671973	48478028公顷

约1400万公顷属于40—100公顷之间的经营，约800万公顷属于200公顷以上的经营，因此大农场整个说来占农业耕地面积的1/5—1/6。小农、中农和富农经济几乎占了法国土地的3/4。从1862年到1882年，5—10公顷的经营增加了24%，10—40公顷的增加了14.28%。1892年的农业统计表示，经营总数增加了3万户，但是上面最后举出的各种类型的经营^③减少了3.3万户，这是土地经营进一步分散的表现。

但是在英国这个典型的大地产和资本主义土地经营的国家，情况

① 参看弗里根：《荷兰社会民主党农业纲领》，载于《新时代》第17年卷第1册，第75页以下。

② 《比利时的农业社会主义》，载于《新时代》第15年卷第1册，第752页。

③ 即5—400公顷。——编者注

是怎样的呢？我们知道在报纸上不时出现用来例证英国土地占有集中化的特大地主的名单，我们也知道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有一处说，约翰·布赖特关于 150 家地主占有英格兰土地的一半、12 家地主占有苏格兰土地的一半的说法，还没有被否认^①。不过，英国的土地虽然已集中到垄断的程度，但毕竟没有到约翰·布莱特所说的那种程度。根据布劳德列克的《英国土地和英国地主》一书，土地调查册中登记的英格兰和威尔士的 3300 万英亩的土地中，在 1876 年大约有 1400 万英亩归 1704 个每户 3000 英亩（1200 公顷）及以上的地主所有。其余的 1900 万英亩分属于约 15 万个 1 英亩及以上的所有主和无数的小块土地所有主。据穆尔哈尔说，1892 年整个联合王国拥有 10 英亩以上土地的所有主（共计占全部面积的 10/11）的数目是 176520 个。这些土地是怎样经营的呢？下面是大不列颠（英格兰及威尔士和苏格兰，爱尔兰在外）1885 年和 1895 年的数字，为了便于比较，作为分类标准的经营规模已换算成公顷^②。

计有：

经 营	1885 年	1895 年	增 减
2—20 公顷	232955	235481	2526
20—40 公顷	64715	66625	1910
40—120 公顷	79573	81245	1672
120—200 公顷	13875	13568	-307
200 公顷以上	5489	5219	-270

可见这里也是大农场和极大农场减少，小农经营和中农经营增加。

但是经营数目还没有给我们说明耕种的面积。因此我们用分属各种经营等级的土地面积数来补充它。这些数字表现了一幅简直令人目瞪口呆的图画。大不列颠在 1895 年有：

① 参看《资本论》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749 页注 97。——编者注

② 按 1 英亩等于 40 公亩的比率，不十分精确，但是用作比较看来是可以容许的。数字采自《农地占有》蓝皮书。

经 营	英亩 (40 公亩) 数	占总面积的百分比
2 公顷以下 ^①	366792	1.13
2—5 公顷	1667647	5.12
5—20 公顷	2864976	8.79
20—40 公顷	4885203	15.00
40—120 公顷	13875914	42.59
120—200 公顷	5113945	15.70
200—400 公顷	3001184	9.21
400 公顷以上	801852	2.46
	32577643	100.00

由此可见，大不列颠用于农业的土地面积恰好有 27%—28% 是真正的大农场，只有 2.46% 是极大农场。反之，66% 以上属于中农和富农经营。大不列颠的比率同德国的平均情况比起来更偏向于农民经营（已经资本主义化的富农经营当然在其中占优势）。即使在英格兰本土，5—120 公顷的经营也占已耕面积的 64%，只有 13% 左右的面积属于 200 公顷以上的经营。^② 威尔士（完全不算细小经营）农业经营的 92%，苏格兰的 72% 是 2—120 公顷之间的农民经营。

在已耕面积中，有占地 460 万英亩的 61014 个经营是由所有主自耕的，19607 个经营所耕种的一部分是自有地，一部分是租地，439405 个经营全部是租地。小农或小佃农在爱尔兰完全占优势，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意大利也是一样。

这样，毫无疑问，在整个西欧，同样也在美国东部各州，农业中的小经营和中等经营到处都在发展，大农场或极大农场则在减少。中等经营往往是十分明显的资本主义经营，这是不容怀疑的。在这些地方，经营的积聚所采取的形式不是像马克思所看到的那样由个别的经营吞并

① 此外还有 579133 户是 40 英亩以下的零散地。

② 1907 年，英格兰全部占有地的 21.78% 是从 1 英亩到 5 英亩的，只有 3.95% 的占有地在 300 英亩以上。威尔士的相应数字是 16.91% 和 0.66%；苏格兰是 22.4% 和 3.66%。——英译本第 70 页注

愈来愈大的面积（参看《资本论》第1卷第4版，第643页注解^①），而不过是经营的集约化，即转向在单位面积上需要更多劳动的作物，或者转向高级畜牧业。这在很大程度上（但不是唯一地）是海外的和东欧的农业国或农业地区的农业竞争的结果，这是人所熟知的。而正因为这些国家和地区还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有能力以如此低廉的价格向欧洲市场输送谷物和一系列其他农产品，因此不能指望来自这一方面的发展因素会有重大的变动。

因此，就算先进工业国家的收入统计表部分地记录了现代经济中资本的流动性以及从而同时记录了资本的变幻无常和不稳定性，就算那里所记载的收入或财产也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实际上一阵大风就可以轻轻吹跑的有名无实的量，但这一收入序列毕竟同工业、商业、农业中的经营单位的等级次序没有任何根本的对立。收入层次和经营层次的划分表现了相当明显的平行现象，特别是只就中间部分而言。我们看不到中间部分在任何地方有所减少，相反，它们几乎到处都有相当大的扩展。在这里，它们在上面被削减了，就用来自下面的增援补充；在那里，它们的队伍中有的下降了，就从上面得到补偿。如果现代社会的崩溃取决于社会角锥^②尖端和底座之间的中间部分的消失，如果它取决于这一中等部分的被上面和下面的极端所吸收，那么它在英国、德国、法国的实现，在今天（1899年）并不比在19世纪中随便哪一个更早的时期更为接近。

但是如果一个建筑物的石头本身或者重要的几层石头已经发脆，那么尽管它表面上可以保持坚固的样子，它毕竟是要崩溃的。商店的坚实程度在危机时期才能证明。因此，我们只好研究一下现代生产制度所固有的经济危机的情况如何，在较近的将来，我们能预期危机有什

① 参看《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780页注148。——编者注

② 伯恩斯坦在《社会民主党内的修正主义》（1909年）一书中引用尤·沃尔夫的说法，把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比作一座角锥（Pyramide），参看本书第432页。——编者注

么表现和反作用。

第四节 危机和现代经济的适应能力

使实际的资产阶级最深切地感到资本主义社会充满矛盾的运动的，是现代工业所经历的周期循环的变动，而这种变动的顶点就是普遍危机。

马克思：《资本论》第二版序^①

关于现代社会机体的经济危机、它们的原因和它们的治疗的激烈论争，几乎不外乎关于人体的病理的危机或疾病状态的论争。喜欢进行比较的人容易发现，在针对这两种现象提出的种种不同的理论之间有着可以对比的相似点。例如他会把以让·巴·萨伊为起点的极端经济自由主义——这一主义把营业危机单纯看成经济机体的自疗过程——的信徒看成所谓自然疗法的信徒的最接近的思想亲属。他也会把在人类生病时从一定的观点出发推荐干预性医学活动的种种理论（对症疗法，体质疗法等等）同种种社会理论联系起来，这些理论宣称，对于经济危机的根源和表现，必须进行各种各样的国家干预。不过如果他进而更为精确地考察一下在这一方面和那一方面提出来的诸体系的代表者们，他就会发现值得注意的情况：天才的历史心理学家所说的人类思维方向的统一性的情况往往是很糟的，对于合格的医生及其医术的深厚信仰完全可以同顽固的经济上的曼彻斯特主义很好地调和起来，反过来也是一样。

在社会主义者中间最流行的关于经济危机的解释是，危机是从消费不足产生的。但是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已经屡次尖锐地反对这一见解。尤其激烈的恐怕是在《反杜林论》中的第三章第三节里，恩格斯在

^① 应为第二版的跋。参看《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3页。——编者注

那里说，群众的消费不足固然“也是危机的一个先决条件”，但是它不能说明为什么今天存在危机和此前没有出现过危机。恩格斯这时还以1877年英国棉纺织工业的情况为例，认为面对着这种情况还“用英国群众消费的不足，而不用英国棉纺织厂主的生产过剩，来解释目前棉纱和棉布的普遍滞销，^①是蛮不讲理的。而马克思自己有时也很尖锐地发表意见反对从消费不足推论出恐慌来。他在《资本论》第2卷中说：“认为危机是由与缺少……有支付能力的消费者引起的，这纯粹是同义反复。”^②马克思说，如果有人，工人阶级只能得到自己的生产的一个极小部分，只要他们得到了比较大的份额，弊害立刻就可以消除——如果人们想以此来使这一同义反复在表面上有更为深刻的论据的话，那么只要提到以下一点就行了：“危机每一次都恰好有这样一个时期做准备，在这个时期，工资会普遍提高，工人阶级实际上也会从供消费用的那部分产品中得到较大的一份。”^③由此可见，资本主义生产看起来好像“包含着各种和善意或恶意无关的条件，这些条件只不过让工人阶级暂时享受一下相对的繁荣，而这种繁荣往往只是危机风暴的预兆”。^④恩格斯在一个脚注中补充说：“供可能出现的洛贝尔图斯危机学说的信徒们参考。”^⑤

在《资本论》第3卷第二编中，有一段话同所有这几句话是相当矛盾的。马克思在那里关于危机是这样说的：“一切现实的危机的最后原因，总是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消费受到限制，而与此相对比的是，资本主义生产竭力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

① 恩格斯在这句话的注释中还说：“用消费不足来解释危机，起源于西斯蒙第，在他那里，这种解释还有一定的意义”。洛贝尔图斯从西斯蒙第那里借用了这种解释，而杜林先生又以他惯有的肤浅方式从洛贝尔图斯那里把它抄袭过来。在《哲学的贫困》的序言里，恩格斯也以同样的方式对洛贝尔图斯的危机学说进行论争。（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37页。——编者注）

②③ 《资本论》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56—457页。——编者注

④⑤ 《资本论》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57页。——编者注

力发展的界限。”^①这同洛贝尔图斯的危机论并没有显著的差别，因为洛贝尔图斯也并不是说危机是直接由群众的消费不足引起的，而是同上面所说的一样，说危机是由与劳动生产率的增加相联系的群众消费不足引起的。不过在上面所引的马克思的那段话里，群众的消费不足甚至被拿来同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各种部门的生产比例失调和引起暂时普遍停滞的价格变动——相比而强调成一切现实危机的最后原因。

这同上面的第2卷的引文所表达的见解比起来，有一个重大的区别，人们可以用这两段话的写作时期相差很大来说明这一情况。二者之间存在着一个不下于13年到14年的间隔，而且出自第3卷的那句话是更早的。它在1864年或1865年就已经写下了，而出自第2卷的那句话却无论如何是在1878年以后写下的（关于这一点可以参看恩格斯在为《资本论》第2卷写的序言中的叙述）。一般说来，第2卷所包含的是马克思的研究工作的较晚的和较成熟的成果。

也是在这第2卷的在1870年就已经写成的另一段话里，把危机的周期性——大致10年的生产循环——同固定（投放在机器等上的）资本的周转期联系起来。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有着一方面延长固定资本的价值量和生存期、另一方面通过生产资料的不断变革缩短这一生存期的倾向。因此就产生了固定资本的这一部分在其“物理生涯完毕以前”的“无形损耗”。“这种由一些互相联结的周转组成的长达若干年的周期（资本被它的固定组成部分束缚在这种周期之内），为周期性的危机造成了物质基础。在周期性的危机中，营业要依次通过松弛、中等活跃、急剧上升和危机这几个时期”。^②投放资本的时期固然是很不相同和分散的，但是危机总是大规模新投资的起点，从而——就整个社会来考察——“又或多或少地是下一个周转周期的新的物质基础”。^③在同

① 《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48页。——编者注

②③ 《资本论》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07页。黑体是伯恩斯坦用的。——编者注

一卷中讨论资本的再生产（就是说为了生产和消费的目的在社会的基礎上进行的资本不断更新的过程）时又一次采用了这一思想，在那里阐述了即使在同一规模上并且以不变的劳动生产率从事再生产时，暂时发生的固定资本生存期的差别（例如在某一年死亡的固定资本组成部分多于前一年时）怎么会一定产生危机。对外贸易固然能够解救，但是对外贸易既然不是单纯补偿各种要素（按价值说也是这样），它“就只会把矛盾推入更广的范围，为这些矛盾开辟更广阔的活动场所”。^①共产主义社会能够通过继续不断的相对生产过剩来预防这种扰乱，这种生产过剩在那时“等于社会对它本身的再生产所必需的各种物质资料的控制”；^②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内，这种生产过剩是一个无政府的要素。这一关于仅仅由固定资本的寿命差别引起的扰乱的例子是恰当的。“固定资本生产和流动资本生产的不平衡，是经济学家在说明危机时惯用的根据之一。但是，如果说这种不平衡在固定资本甚至仅仅维持原状的情况下也能够发生并且必然会发生，也就是说，在理想的正常生产的前提下、在已经执行职能的社会资本的简单再生产的情况下也能够发生并且必然会发生，那在他们看来倒是有点新奇的。”^③在关于积累和扩大的再生产的一章中，仅仅把生产过剩和危机当做同上述过程结合在一起的并发可能性的不言而喻的结果而附带提到。但是在这里又是非常有力地坚持“生产过剩”的概念。在第499页上说：“如果说，像富拉顿这样的人，不想知道普通意义上的生产过剩，而只知道资本即货币资本的生产过剩，那就再一次证明，甚至最优秀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也根本不了解他们的制度的机制（Mechanismus）。”^④而在第524页上说明，如果像甚至在资本主义的积累中也有时会发生的那样，拨给消费资料生产的那一部分资本中的不变部分比拨给生产资料生产的那一部分

① 《资本论》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25页。——编者注

② 同上书，第526页。——编者注

③ 《资本论》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26页。——编者注

④ 《资本论》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60—561页。——编者注

资本的工资资本加上剩余价值还要大，那么这就是第一部类的生产过剩，“这只有通过一次大崩溃才能恢复平衡”。^①

恩格斯在《资本论》第3卷中利用种种机会把前面阐述过的关于市场的扩大将资本主义经济的矛盾推移到更广的范围并从而使它增长的这一思想应用到较近的现象上。这一卷的第一编第97页和第二编第27页上的注释尤其值得注意。后一个注释重复和补充了前一注释中所说的话，在其中固然把自从马克思写作的时期以来交通工具的惊人发展（由于这一发展第一次真正地形成了世界市场）、不断有新的工业国家出来同英国竞争、过剩的欧洲资本投放地区的无限扩展等变化说成使“以前的危机策源地和造成危机的机会，多数已经消除或大大削弱”^②的因素，但是在把卡特尔和托拉斯描述成限制国内市场上的竞争的手段并且把保护关税（英国以外的世界用它把自己包围起来）描述成“最后的、全面的、决定世界市场霸权的工业战争的准备”^③以后，最后又说：“所以，每一个对旧危机的重演有抵消作用的要素，都包含着更猛烈得多的未来危机的萌芽。”^④恩格斯提出了这一问题：在世界贸易的幼年时期（1815年到1847年）大致5年为期，从1847年到1867年10年为期的工业循环是否又有了新的延长，我们是否“处在一个空前激烈的新的世界性的崩溃的准备时期。”^⑤但是他也没有解决这个二者择一的问题，即另一方面，周期过程的急性形态及其一向的10年一次的循环“看来让位给……比较慢性的和拖延时日的互相交替现象，这种现象在不同的工业国发生于不同的时间”^⑥。

在这一段话写作以来消逝的时间中，这一问题悬而未决。既没有能确认出空前激烈的经济性世界恐慌的征兆，也不能把在这期间出现的营业好转说成是特别短暂的。不如说提出了第三个问题，而且上面

① 《资本论》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88页。——编者注

②③④ 《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54页。黑体是伯恩施坦用的。——编者注

⑤⑥ 《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54页。——编者注

最后举出的问题已经部分地把它包含在内了。就是说，世界市场的巨大的地域扩展同消息传递和运输交通所需时间的异常缩短并在一起，是否已经使抵消各种扰乱的可能性如此增加，欧洲工业国家的大为增加的财富同现代信用制度的灵活性以及工业卡特尔的兴起并在一起，是否已经使地方性或局部性扰乱对于一般营业情况的反作用力如此减少，以致至少在较长时期内可以把像从前那种类型的普遍营业危机看成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了。

我在一篇论述社会主义的崩溃论的文章中提出了这个问题，它遭到了种种的攻击^①。除了别人之外，它促使罗莎·卢森堡博士在发表于1898年9月份的《莱比锡人民报》上的一组论文中向我讲授了关于信用制度和资本主义的适应能力的课程。因为这些还被几家其他的社会主义报刊转载的论文是错误的、但同时也以巨大的才能加以运用的辩证法的真正范本，所以我认为在这里简短地对它研究一下是适当的。^②

① 这篇论文批评了1896年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即第二国际伦敦代表大会。——编者注）的一项决议中所说的我们正处在一个巨大的灾变性危机的前夕，这一危机将引起社会情况的全面革命的这一意见。这一决议说：“经济 and 工业的发展正在如此迅速地进行，在相当短的时期内可能就会出现危机。因此，大会坚决向各国无产阶级指出他们作为有阶级觉悟的公民而学习如何为共同的利益管理各自国家的事务的迫切必要”。我乐于承认最后面的劝告是有益的，但是我大胆地驳斥前言的真实性。这引起了某些攻击，我在重刊在本书〔第一版〕序言中的那一封信里对这些攻击作了答复。——英译本第80页注

② 这些论文的标题是：《社会改良还是革命？》但是罗莎·卢森堡不是像社会民主党内一向习惯地那样提出问题，即把它当作实现社会主义的途径的二者择一问题，而是把它当作用以下方式对立的问题，即只有一种——按她的看法是革命——能够达到目的。根据她的看法，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之间的墙“靠社会改良和民主的发展是打不通的，相反，它会因此更牢固更高”。（参看《卢森堡文选》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01页。——编者注）因此社会民主党如果不想自己的工作增加困难，就必须尽可能努力去破坏社会改良和破坏各种民主制度的发展。〔这篇以这个结论告终的论文，是相应地以这样的说明开始的：由我（和康拉德·施密特博士）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的发展的原理是“外在世界的颠倒的反映”。她喊道：“这是在施杜姆·波扎多夫斯基的时代（施杜姆·波扎多夫斯基是德国的大钢铁资本家，提倡家长制关系，反对工会，19世纪末担任内政大臣，改订社会政策。在卢森堡这一著作的以后版本里，这句话改为：“是在德国的社会改良已经长眠以后”）主张通过社会改良来实行社会主义的理论，是在英

罗莎·卢森堡关于信用的主张是：它远不能抵制危机，而恰好是把危机推向绝顶的手段。只有信用才使资本主义生产的无节制的扩展、商品交换和生产过程循环的加速成为可能，而它就这样成为使生产和消费之间的矛盾尽可能频繁地趋于爆发的手段。它把对于他人资本的处分权并从而把进行最冒险的投机的手段交给了资本家。但是如果出现了停滞，信用就通过自己的紧缩而使危机尖锐化了。它的职能是把稳定性的最后残余从一切资本主义关系中驱逐出去，使一切资本主义的力量成为在最大程度上可扩张的，相对的和敏感的。

在任何对于一般的社会主义文献、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文献略知一二的人看来，这一切都不是特别新鲜的。问题仅仅在于，这种说法是否正确地表达了今天的情况，或者说这一图景是否也有另外的一面。根据罗莎·卢森堡如此喜欢玩弄的辩证法的规律，似乎情况甚至也不能不是这样的。但是即使人们不去援引辩证法，也能够说，像信用这样的能具有多种形态的事物在不同的条件下一定会起不同的作用。马克思原来也决不是仅仅从把信用当做破坏者的观点来讨论它的。他认为信用除了别的职能以外还有“转到一种新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的职能，并且就这一方面明确地强调了“信用制度固有的二重性质”。^①罗莎·卢森堡对有关的段落是很了解的，她甚至从那里转载了一句话，马克思在其中说到了信用的主要宣传者（约翰·罗，伊萨克·贝列

国机器制造工人失败之后主张由工会监督生产过程的理论，是在萨克森已经修改了宪法、国会选举权遭到扼杀之后主张社会民主党在议会中争取多数的理论！”（参看《卢森堡文选》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74页。——编者注）她似乎抱着这样的观点，即人们不应当按照在整个时代和先进各国的整个周围中所观察到的现象的总和来提出历史理论，而是应当根据随便哪一个个别国家的暂时的反动的痉挛来提出；不应当根据工人运动迄今的全部业绩的结算，而是应当从个别斗争的结局着眼来提出。有人因为接枝不能保护他不从树上摔下来而宣称接枝没有益处，这个人的辩论方法同卢森堡是没有两样的。）（方括号的话在第2版中已删去。——编者注）

补注：在这一期间，罗莎·卢森堡成了一次可耻的谋杀的牺牲者，这一事实使我考虑到把下面的全部论争删除。但是它所涉及的是同此外也有人主张的见解的讨论，因此把论争限制在纯粹实质性问题的范围之内，看来也就够了。

① 《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00页。——编者注

拉等人)的混合性质“既是骗子又是预言家”^①。但是她只用这句话来说明信用的破坏的一面，一句话也没有提到它的生产和创造的能力，而这是马克思明确地一并提到的。为什么要这样地断章取义，为什么关于这种“两面性质”会有这种值得注意的沉默？她依靠辩证法的焰火把信用制度作为适应手段的能力说成“昙花一现”，但是只要人们更加仔细地观察〔卢森堡女士如此胆怯地滑过去的〕^②另外一面，这一焰火就立刻化为烟尘了。

此外她的论证也有个别句子是经不起仔细推敲的。关于信用，她说它：“加剧了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之间的矛盾。因为它使生产变得极度紧张，却使交换稍为遇到什么情况就陷于瘫痪。”^③这样说是很巧妙的；可惜的只是，人们可以随自己的意把这句话颠来倒去，却不致使它丧失正确性。如果人们把它的第二部分的两个名词互换地位，那么这句话剩下的内容同以前正好一样多。或者如果人们说，信用扬弃了生产方式同交换方式之间的对立，因为它周期地消灭生产同交换之间的紧张程度的差别，那么这也不错。在这句话下面继续说：“信用加剧了财产关系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因为它通过强力剥夺许多小资本家的办法把巨大的生产力集中到少数人手中。”^④如果说这句话包含一个真理，那么它的直接的反面也是一样。如果我们说，信用扬弃了财产关系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因为它通过许多小资本家的结合把巨大的生产力转变为集体财产，那么我们不过是说出了一个在现实中屡次被证实了的事实。正像我们在关于收入变动的一节中已经见到的那样，在股份公司的最简单和最加强的诸形式中，这一事实是看得很清楚。如果罗莎·卢森堡打算援引马克思来反对这一点，说他在前面提到的那一段话里再一次认为信用制度日益限制剥削社会财富的少数人的

① 《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00页。——编者注

② 方括号中的话在第2版中已删去。——编者注

③ 参看《卢森堡文选》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81页。——编者注

④ 参看《卢森堡文选》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81页。——编者注

数目，那么我们就反驳说，哪里也没有给马克思这一断语提出经验性证据，而且也不可能提出。但是马克思屡次援引了同这一断语相矛盾的事实。例如他在《资本论》第3卷论述利率下降倾向的第二十二章中指出被拉姆赛确证了的英国食利者的日益增加^①。但是如果说马克思也屡次把法人和自然人混淆起来（要知道前面的假设归根到底是以这一混淆为根源的），那么这一混淆毕竟没有使他对于信用的起创造作用的能力产生错觉。在他谈到工人合作社时，这一点表现得最清楚。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合作社的具有特征的典型还是旧的生产合作社——他称之为合作工厂，因此他关于这种合作社这样说：它重新生产了并且一定会重新生产现存制度的一切缺陷。他解释说：但是它毕竟积极地扬弃存在于资本主义工厂中的对立。如果说它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上的工厂制度的一个产儿，那么它在同样程度上是建立在这一生产上的信用制度的一个产儿。马克思说，没有信用制度，生产合作社就不可能发展起来，而信用制度“按或大或小的国家规模逐渐扩大合作企业的手段”。^②我们在这里看到了把卢森堡的断语颠倒过来的最好的形式。

信用制度使投机容易进行，这是几个世纪以来的经验。当生产的形式和组织发达到足够容纳投机活动的时候，投机是不会在生产前面停下来，这也是一个很古老的经验。不过投机本身却受到可知的情况同不可知的情况之间的比例的制约。后者占的优势愈是强大，投机就愈是繁荣，后者愈受到前者的抑制，投机就愈丧失自己的基础。因此商业投机的最疯狂的滋长是同资本主义时代的破晓时期一致的，而在资本主义发展较晚的国家中，投机通常是最为狂乱放肆的。在工业领域内，投机在新的生产部门中最为盛行。一个生产部门作为现代工业的年代愈久，投机的要素就愈加停止在其中起决定性的作用——纯粹

① 《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25—427页。——编者注

② 《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99页。黑体是伯恩施坦用的。——编者注

流行商品的制造除外。市场情况和市场变动可以更加精确地加以预测和更加确实地加以计算。

但是无论如何，这一确实性始终只是相对的，因为竞争和技术发展排除了对于市场的绝对控制。在一定程度之内，生产过剩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个别工业中的生产过剩还不意味着普遍的危机。要使这一生产过剩导致普遍的危机，有关的工业就必须是这样：或者是它们作为其他工业的制造品的消费者具有如此的重要意义，以致它们的停顿使其他工业也停顿下来等等；或者是它们通过货币市场的媒介或通过使一般信用麻痹而夺去其他工业继续生产的资金。但是明摆着的是，一个国家愈富，它的信用机构愈发达——这不应当同加强了借贷经济混淆起来——，后一种作用的可能性就愈来愈小。因为在这个国家里均衡化的可能性是以日益增大的程度增加着的。马克思曾经在某一段话里（我目前找不着这一段话）说，在货币市场的中心，它的收缩比起在周边的许多地点可以更加迅速地得到克服。这句话的正确性正在由大量的证据加以证明。马克思那时心目中的货币市场，即使拿英国来说，它所受的制约也还比今天要多得多。他还说，随着市场的扩展，信用必须延长，因而投机的要素必然会愈来愈支配交易。^①但是在这期间完成的交通工具的变革绰绰有余地抵消了地域距离在这一方面的影响^②。如果说这样一来也并不能把—货币市场的危机从世界上排除，那么由于广泛的、难于驾驭的商业企业而引起的货币市场的紧缩毕竟显著地减少了，而这一点是问题的要点所在。

① 参看《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44—545页。——编者注

② 恩格斯把由于苏伊士运河、货运轮船等而造成的美国和印度更加向欧洲工业国家接近的程度测定为70%至90%，并且补充说，“1825年到1857年期间的两大危机策源地……因而失去了它们的爆发能力的一大部分。”（《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84页。——编者注）恩格斯在同一卷的第395页（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97页。——编者注）上断定，同信用欺诈相结合的某些投机营业（马克思在那里把它们描绘成货币市场危机的因素）由于有了海外电报而告结束。第3卷第二编第56页（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86页。——编者注）上恩格斯的校正性插入句，对于判断信用制度的发展也是值得注意的。

货币危机同商业和营业危机之间的关系还决不是已经得到很充分的阐明，因此对于两种危机重合的某一具体场合，人们还不能确定地说，直接引起货币危机的是商业危机或生产过剩。不过在大多数场合，使货币市场瘫痪并从而压迫全部营业的，显然不是实际的生产过剩，而是过度投机。从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中根据官方调查而叙述的关于1847年和1857年危机的细节，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点。赫克奈尔教授^①在《政治科学辞典》的商业危机史概要中关于这些和另一些危机所举出的事实证实了这一点。罗莎·卢森堡根据赫克奈尔所举出的事实推论说，迄今的危机根本还不是真正的危机，而不过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幼儿病，不是资本主义经济领域狭隘化的伴随现象，而是它的扩大化的伴随现象，我们“还没有进入资本主义完全成熟的阶段，在马克思的图式中，这一阶段是危机周期性的前提”。据她说，我们处于“这一阶段，这时危机已不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也还没有伴随着资本主义的没落”，只有当世界市场全部建立起来，并且不再能够通过任何一次突然的扩张而进一步扩大的时候，这一时期才会来到。那时生产力同交换限制的抗争一定会愈来愈激烈和凶猛。

对于这一点应当说明，危机的图式在马克思那里，或者对于马克思来说，不是未来图景，而是现在图景，只能指望这一图景在将来以日益激烈的形态，以日益巨大的尖锐程度重复出现。罗莎·卢森堡否认危机图式对于我们以前的整个时代具有马克思所赋予的那种意义，认为它是现实还没有同它相符合的推论，认为它是对于以刚刚处于萌芽状态的某些因素为基础的一个过程的预先作出的逻辑的构想；当她这样做的时候，她同时就使马克思关于未来的社会发展的预断（仅就这一预断是以危机理论为基础而说）成了问题。因为如果说这一危机理论在提出来的时候还没有经过检验，在从那时到现在的时期内又没有得到证实，那么此后人们凭什么能够认为它的图式适合于更远的将来呢？提

^① 亨利希·赫克奈尔（1863—1932），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著有《工人问题》（1908年第5版）等书。——编者注

到世界市场将全部完成的那一时期，这是在理论方面向来世逃避。

现在还完全不能预测，世界市场将在什么时候全部完成。其实罗莎·卢森堡并不是不知道，世界市场不仅有广度的扩展，而且也有深度的扩展，而后者比前者更为重要得多。

在大工业国的贸易统计中，向古老的、早就被占据的国家的出口起着极其重大的作用。英国对整个澳大利亚（全部澳洲殖民地，新西兰等等）的出口就价值说还不如对法国一国的出口多；对整个英属北美洲（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等等）的出口还不如单独对俄国的出口多；对这两个的确也已经相当古老的殖民地区的出口还不如对德国的出口多。英国同它的全部殖民地包括整个巨大的印度帝国在内的对外贸易，还不到它同世界其余部分的贸易的 1/3。至于说到最近 20 年获得的领土，那么对这些地方的出口是少得可笑的。^①世界市场的广度的扩展进行得太慢，不能保证实际的生产提高得到足够的出路，如果早就已经被卷入的各国恰好没有为这一提高提供日益增大的市场的话。同世界市场在地域上的扩展同时进行的深度的扩展的界限是不能先验地规定的。如果说普遍危机应当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规律，那么它必须在现在或者在最近的将来证明自己的真实性。否则它的不可避免性的证据就浮在抽象思辨的空中了。

我们已经看到，信用制度经受导致生产普遍瘫痪的那种收缩的情况，在今天并不比从前更多，而是更少了。因此在这一限度内来说，它作为危机形成的因素已退居次要地位了。但是，仅就信用制度作为促进生产过剩的温室式手段这一限度来说，今天在许多国家内，有些地方甚至在国际范围内，这一生产膨胀愈来愈频繁地遇到了企业主同盟的

^① 这里举一些 1895 年的数字。输出总额的 75.6% 是向外国——其中 9/10 是古老国家——的，24.4% 是向英属殖民地的。按价值额说，对各地的输出（包括过境货物在内）是：英属北美洲，6.6；俄国，10.7；澳大利亚，19.3；法国，20.3；德国，32.7（百万英镑）；全部英属西非洲的东非洲，2.4（百万英镑），也就是还不到价值 28580 万英镑的输出总额的 1%。1895 年对全部英国属地的输出比 1860 年增加了 64.8%，对其他国家的输出增加了 77.2%。（参看 1897 年《宪法年鉴》）

对抗，后者作为卡特尔、辛迪加或者托拉斯而企图调节生产。我没有对企业主同盟的最终的生命力和效力作出预言，我只是承认，它对于生产活动同市场情况的关系产生影响的能力已经达到可以减少危机危险的程度。罗莎·卢森堡对此也作了反驳。

首先她不同意说企业主同盟能成为普遍性的。她说，同盟的最终目的和作用在于，通过禁止一个部门内部的竞争来提高这一部门在世界市场上获得的总利润额中所得的份额。一个工业部门只有靠牺牲别的部门才能达到这一目的，因此这一组织不可能成为普遍性的。“如果它扩展到一切重要的工业部门，它的作用也就消失了。”^①

这一论证同早已烟消云散的关于工会无用的论证丝毫没有两样。它的依据同已经死去的工资基金论比起来不知道还要薄弱多少。认为商品市场上始终只有一个固定的利润额可供分配，这是一个未经证明的、无法证明的、或者不如说已经证明为错误的假设。除了别的以外，它假定有一种不依赖生产费变动的价格规定。但是即使存在着一个确定的价格，而且还有一个确定的生产的技术基础，一个工业部门的利润额仍旧可以提高，却不致因此使另一个部门的利润减少。也就是通过减少浪费、消灭倾销竞争、更好地组织生产以及其他类似的办法来提高。企业主同盟对此是一个有效的手段，这是显而易见的。关于利润分配的问题是妨碍企业主同盟普遍化的最不足道的一个原因。

根据罗莎·卢森堡的看法，反对说卡特尔具有制止生产无政府状态的能力的另一理由在于，它企图通过把积累起来的资本的一部分闲置起来而达到自己的目的——制止生产率的下降，因而它所做的事同危机以其他形式实行的事一样。因此治疗方法同疾病之相似就像半斤八两。经过组织而社会化了的资本的一部分回过头来转化成私人资本，各部分凭自己的本领寻找幸福，“到那时候，这些组织必然同肥皂泡一样破灭，而让位于大大加强了的自由竞争。”^②

① 参看《卢森堡文选》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82页。——编者注

② 参看《卢森堡文选》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83页。——编者注

这种说法首先认为，用外科手术截除一个被烧伤的肢体同这一肢体之被烧伤所毁坏是“半斤同八两”，因为在两种情况下都失去了这一肢体。资本是由于像危机这样的自发现象而被闲置，还是由于工业的组织起来而被闲置，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事。因为一种情况只意味着暂时的停止，另一种情况则意味着直接的破坏。但是在任何地方也没有写着，在一个生产部门中成为多余的资本只能在这同一个生产部门中使用或者必须在这同一个生产部门中寻找用途。为了变换花样，她在这里假定生产部门的数目是一个永久定下来的固定的量，而这又是同现实相矛盾的。

卢森堡同志的最后一个反驳的情况稍为好一些。根据这一反驳，卡特尔之所以不适于防止生产无政府状态，是因为参加卡特尔的企业主通常是拿在国内市场上用不上的那一部分资本，以低得多的利润率为外国生产，从而在国内市场上取得较高的利润率。结果是：在世界市场上的更大的无政府状态，即力争达到的目的的反面。

这种手段“通常”只有在卡特尔受到保护关税庇护的地方才行得通，保护关税使外国不可能用同样的办法报复它。在罗莎·卢森堡作为她的论题的例子而援引的制糖工业方面，导致上述好事情的是保护关税的强化形态，即输出奖励金。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反对这一赐福的制度的鼓动，在受惠的各国，比起在英国这个缺乏这一制度、并且砂糖生产在受到输出奖励金和糖业卡特尔好处的各国的竞争面前毫无保护地开放着的国家要激烈得多。而英国人很懂得这是为什么。毫无疑问，这一受到奖励金的竞争痛苦地伤害了英国的精制糖业主，虽然远没有达到人们所设想的那种程度，因为英国的精制糖业主在得到他们的原料即原糖时，同样也是减去输出奖励金的。因此 1864 年在英国才精制了 424000 吨的砂糖，1894 年就精制了 623000 吨，1896 年精制了 632000 吨。当然在这一期间生产曾经达到过比这更高的数字（1884 年是 824000 吨），但是这一高水平没有能够保持住，而砂糖加工工业（糖果、糖渍水果和糖煮水果）却大为繁荣，十倍地补偿了那一相对的减少。从

1881年到1891年，英国的砂糖精制业雇用的人员完全没有减少，而单是糖果工业的人员就几乎增加了1倍。^①但是此外还要加上大为扩展的果酱（糖煮水果）工业，这些东西成了人民的消费品，雇用了成千上万的工人。如果大陆的砂糖工厂主的砂糖奖励金和其他手段竟把英国的整个砂糖精制业消灭掉了（但是情况不是这样），那么大约有5000工人失去了劳动机会，而与此相比，至少却有8倍数目的工人获得了劳动机会。这里还没有把英国的浆果等的种植由于廉价的砂糖所受到的推动计算在内。的确，这种情况意味着受到奖励的甜菜糖使英属殖民地的甘蔗种植者破产了，西印度群岛种植者的叫苦声也不少。但是这一尊贵的阶级同在任何情况下算来算去都得没落的那些穷困的地主相似得要命。事实上英国今天从它的属地进口的原糖比以前多（从英国属地的原糖输入从1890年的230万担^②增加到1896年的310万担），只不过是其他殖民地超过了西印度群岛。1882年从英国属地的输出总额的整整2/3来自西印度群岛，1886年却不到一半。种植者的利润肯定受到了损失，但是只要不加上从前的过大负债，这还不意味着破产。

不过这里的问题既不在于否认今天的单纯的或加强了了的保护关税制度的有害后果，也不在于为企业主同盟辩护。我并没有想到要坚持说卡特尔等等是经济发展的最高峰并且适合于长久地排除现代经济生活的对立。不如说我确信，在现代工业国家中卡特尔和托拉斯受到保护关税支持和加强的地方，它们事实上必然要发展成有关工业的危机因素。——对于受“保护”的国家本身来说，它们即使不是一开始就也

① 人口调查中有关的数字是：

就业人员	1881年	1891年	增加
砂糖精制业：男	4285	4682	317
砂糖精制业：女	122	238	116
糖果工业：男	14305	20291	5986
糖果工业：女	15285	34788	19503

② cwt. (hundredweight)，一种英美制衡量单位，在英国等于112磅，在美国等于100磅。——编者注

是这种因素，无论如何在最后也要成为这样。因此问题仅仅在于有关各民族将容忍这种经济多久。保护关税制度不是经济的产物，而是政治权力以经济效果为目的而对经济进行的干预。单纯的卡特尔化了的工业同盟却不是这样。它——即使也受到保护关税的温室式的助长——是在经济本身的基础上成长起来的；它是一个在本质上同经济一样的、使生产适应市场变动的手段。至于它同时也是或者能够成为垄断剥削的手段，那就不用说了。但是同样不用说，就前一个属性来说它意味着一切先前的对抗生产过剩的手段的提高。它能够在市场充塞时转入暂时的限制生产，危险比私人企业要小得多。比起私人企业来，它也能更好地对付外国的倾销竞争。否认这一点，意味着否认组织对于无政府竞争的优越性。但是如果人们在原则上否认卡特尔能够起改变危机的性质和频度的作用，人们也就是否认了组织的优越性。卡特尔在多大程度上能做到这一点，暂时还是一个纯粹臆测的问题，因为还没有足够的经验可以容许我们在这一方面作出最终的判断。但是在这种情况下，要像马克思和恩格斯原来所想到的那样，把未来的普遍危机预先规定为1825年、1836年、1847年、1857年、1873年历次危机的更加严重的复发，根据就更加少了。在社会主义者这一方面，长期以来就推论说，工业循环的日益增加的缩短是资本的日益增长的集中——一种螺旋形式的发展——的自然后果，但是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1894年却认为有必要提出是否存在着循环的新的延长的问题，也就是恰好提出了从前的假设的反面。仅仅这一事实就已经警告我们，不要作出抽象的推论，说这些危机必然以旧的形式重复出现。^①

各个个别工业的历史表明，它们的危机决非总是同所谓普遍危机重合的。谁在《资本论》第1卷和第3卷里读一下马克思根据英国棉纺工业的历史所作的叙述（第1卷第十三章和第3卷第六章），就会发现

^① 当然这里说的始终只是危机的经济的基础。作为政治事件（战争或严重的战争威胁）或十分广泛的歉收（局部的歉收在这一方面已不再起什么作用）的后果的危机，不用说总是有可能发生的，在关于崩溃论的文章中也已经说明了这一点。

在那里已对此作了证实。而最近的历史愈来愈表明，这一部门和其他的大的生产部门怎样经历了营业繁荣和停滞的时期，而这些时期对其余工业的大多数却一直没有产生深刻的影响。我们已经看到，马克思认为他能够断定周期性危机的物质基础在于固定资本（生产工具等等）加速更新的必然性。^①在这里面包含着一个重大的危机要素，这是绝对正确的。但是说各种工业的这一更新期在时间上互相重合，这就是不正确或者不再正确的了。这样一来，就勾销了巨大的普遍危机的又一个要素。

因此，剩下的就只有这一点了：现代社会的生产能力比由购买能力决定的对产品的实际需求强大得多；千百万人住在拥挤的住宅中，穿得不够，吃得不够，尽管存在着丰富的物资可以为他们供给充分的住宅、营养和衣服；由于这一不平衡，在种种生产部门中一再出现这种类型的生产过剩，即或者某些物品的生产量事实上比使用量大——例如比现有的纺织厂所能加工的更多的棉纱——，或者某些物品的生产量固然并不比使用量大，但是比能够购买的量大；因此就产生工人就业的巨大不规则性，它使工人的处境变得极度不稳定，一再把他们压抑到低贱的从属地位，在这里带来过度劳动，在那里带来失业；在今天用来阻止这一灾难趋于极端尖锐化的那些手段中，资本主义企业的卡特尔是一方面同工人对立、另一方面同广大公众对立的垄断性同盟，它具有这样的倾向，即背着他们并且以他们为牺牲而同其他工业或其他国家的同类的垄断同盟进行斗争，或者通过国际的或各工业间的协定任意地使生产和价格适应自己的利润需要。资本主义防御危机的手段潜在地包含着工人阶级的新的、加强了隶属性的萌芽，也包含着生产特权的萌芽，这些特权表现为旧的行会特权的更为严重的形态。我认为，从工

^① 在该处（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07页。——编者注）使用物质一词，对于判断马克思理解这一概念的方式来说，是不无趣味的。按照今天通行的对这一概念的解释，根据消费不足来说明危机，同根据生产过程或工具的变化来论证危机是完全一样的唯物论的。

人的立场出发，始终记住卡特尔和托拉斯的能力，比去预言它们的“无能”更为重要得多。它们是否能长期实现前一个目的——防御危机，这本身对于工人阶级来说是一个次要的问题。但是只要人们把对于工人阶级解放运动的某种指望同普遍危机联系起来，这一问题就立刻成了意义十分重大的问题。因为在那时，关于卡特尔对于危机毫无办法的观念就能够成为致命的无所作为的原因。

我们在本节开头关于马克思、恩格斯对经济危机的说明所作的简短概述，同引用的有关事实加在一起，将足以使人认识到危机问题是一个不能用两三句久经考验的口号断然加以回答的问题。我们只能确定，现代经济的哪些要素起促成危机的作用，哪些要素起抵抗危机的作用。对于这些力量最终的相互对比或者这一对比的发展先验地作出判断，是不可能的。如果不是无法预见的外部事件导致一个普遍的危机——如前所述，这是任何一天都能发生的——，那就不存在任何令人信服的理由，使人可以根据纯粹经济的原因推论这样的危机会立刻到来。地区的和部分的的不景气是不可避免的，而普遍的停滞在世界市场目前的组织和扩展、特别是在食品生产的巨大扩展的情况下，并不是不可避免的。后一现象对于我们的问题具有特别的重要性。也许任何事情都没有像地租和食品的下降那种程度地对缓和营业危机或阻止它增大作出贡献。^①

* * *

补充说明。在本书出版了一年略多的时间以后，在1900年春天开始出现一个营业危机。有许多人，首先是大学教授波勒，认为这一危机是对我在这里阐述的“预言”的经典式的反驳。但是阅读上面这一章的人，要想在其中找到关于根本不再会发生危机的“预言”，将是徒劳的。我仅仅对经济学家们的旧图式所指示的那种危机的复发表示怀疑，而

^① 这是在1898年和1899年之交的冬天，在南非战争产生了货币市场上的新条件和军备的巨大增加之前写的。尽管有这些事实，1901年爆发的危机比从前的大多数危机的寿命都更短，继起的繁荣时期也比较长。——英译本第94页注

这一怀疑既没有被 1900 年的危机、也没有被七年以后——1907 年——的危机驳倒。两个危机都没有维持多久，每一次都是在两年左右之后就被克服了，随之而来的并不是像旧的图式所预见到的那种营业疲软时期，而每次都立刻是一个持续四年到五年的新的营业繁荣。现代工业的循环已经完全改变了面貌。在世界大战的可怕的反作用的影响下，危机问题将采取什么样的形态，这肯定是还不能预先规定的。同由于生产过剩而来的危机比起来，存在着许多更大的危险，它们威胁着德国的经济生活并且使生产的有计划的调节成为生命攸关的律令。

第四章 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和能力

第一节 社会主义的政治和经济先决条件

如果要求若干人，不管他们属于什么阶级或党派，以简洁的公式给社会主义下一个定义，那么他们中的大多数会感到有些困惑。凡是不随便乱说人云亦云的人，一定要首先弄明白，他需要描述的是一种状态还是一种运动，是一种认识还是一个目标。如果我们查一下社会主义的专门文献，那么我们将碰到对这一概念的措辞很不相同的解释，有的属于前述范畴的一种，有的属于另一种——或者从法权概念（平等，正义）引申出社会主义概念，或者把它总括地描述为社会学，一直到把它和现代社会的工人的阶级斗争等同起来，或者解释说，社会主义就是合作制经济。这些种种不同的解释有时是以原则上不同的见解为基础的，但是大多数只是从不同的着眼点对同一事物进行考察或说明的结果。

但是对社会主义的最精确的说明无论如何是同合作经营的思想联系在一起，因为这一来就把经济的和法权的关系同时表现出来了。不需要详细的证据就可以使人认识，对法权关系的描述在这里同对经济方式的描述是同样重要的。即使完全撇开法权是社会生活的第一性还是第二性因素以及在什么意义上是这种因素的问题不谈，各时代的

法权毕竟无可争辩地是当时社会生活特性的最集中的映象。我们描述社会形态，并不是根据他们的技术基础或经济基础，而是根据它们的法律制度的基本原则。我们固然说石器时代、青铜时代、机器时代、电气时代等等，却也说封建的、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的社会制度等等。把社会主义描述为走向合作制社会制度的运动或者合作制社会制度的状态，是与此相应的。下面就是按同社会主义一词的语源（socius = 同伙）相符合的这一意义来使用它的。

什么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先决条件呢？历史唯物主义首先在现代生产发展中看到这种条件。随着工业和农业中资本主义大企业的普遍化，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动机得到了持久的和不断发展的物质基础。在这些企业里，生产已经社会地组织起来，只不过管理是个人的，并且利润是由个人根据自己的资本份额而不是根据自己的劳动来占有的。工作的工人同他的生产工具的所有权分离开来，他处于从属的雇佣关系之中，他终身摆脱不掉这种关系。同对企业主的这种从属性联系在一起的是随着营业情况的波动（这是生产无政府状态的结果）亦步亦趋的不稳定状态，它加重了雇佣关系的压力。生产者的生存条件同生产本身一样，也在促进劳动的社会化和合作的劳动组织。一旦这种发展前进到足够的程度，社会主义的实现就成了社会继续发展的不可避免的需要。争取实现这一点，就是作为阶级的政党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的事业，无产阶级为了这一目的必需夺取政治统治。

根据上面所说，我们把一定水平的资本主义发展当作普遍实现社会主义的第一个先决条件，把由工人的阶级政党即社会民主党行使政治统治当作第二个先决条件。据马克思说，行使这一权力的形式，在过渡时期就是无产阶级专政。

关于第一个先决条件，在论述生产和分配中的企业等级的一章中已经指出，即使大企业今天在工业中事实上已占优势，但是它们包括附属于它们的企业在内，即使在像普鲁士这样先进的邦中，毕竟至多也只代表从事生产的人口的一半。如果我们选用整个德国的数字，情况也

不会两样^①，在英国这个欧洲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也没有多大差别。在其余的外国，也许比利时除外，大企业对于小企业和中等企业的比例要更加小得很多。但是在农业中我们到处看到小经营和中等经营不仅在对于大经营的比例上还占重大优势，而且也能够巩固自己的地位。商业和交通中各企业群的比例与此相似。

企业统计的总的数字所提供的图景，在更为精确地考察个别部门时会得到不少纠正，关于这一点我自己当时在论述崩溃论的文章中已经加以强调了。在这以前，在《社会主义问题》文辑的前几篇文章中我已经着重指出，一个企业雇用的人数并不是它的资本主义性质的程度的可靠标志。帕尔乌斯在《萨克森工人报》中对我在上述地方应用各企业群的总数提出指责，但他所说的在原则上没有任何东西是我自己在这以前未曾反复说明过的，因而对于这里要讨论的关于一场临近的经济崩溃的可能性问题是完全不足道的。^②在千万个小企业中是否有一

① 根据第 196 页注释中发表的 1907 年行业调查表，当时德国从事工业的人员受雇于：

10 人以下的企业的	约	6488000
11 至 50 人的企业的	约	2585000
51 至 200 人的企业的	约	2418000
200 人以上的企业的	约	2946000

——作者补注

② 关于帕尔乌斯对我的阐述所作的曲解，以及他为了试图使我关于小企业和中等企业的力量对比的引证显得可笑而作的离奇的对比（马车夫同铁路相比等等），我不再多谈了。因为它们出自一个我本来认为比较高明的人，所以它们能够使我在乍一看到时受到刺激，但是并不值得认真地加以反驳。但是根据本书中提出的理由，我也可以认为，亨利希·库诺在他的完全有效的论述崩溃论的文章中举出来反对我的那些事实，对于我的论题并不重要。如果他知道我自己曾经多年在银行中工作过并且根据经验也了解批发商业的话，他就会相信，对于他在文章中所说的关于银行和商业代理店的情况，我并不是不知道的。至于说到工业中的附属企业和分支企业，那么我自己在《社会主义问题》中的一篇较早的文章中已经写道：“一个这样的附属企业也许用很多的不变资本和很少的可变资本经营着，使用着昂贵的机器和少数工人，因此按照帝国统计的实践它被列入小工厂或者甚至手工企业，而它实际上属于工厂式的企业……我们可以认为这是肯定的：手工业和小工厂在工业统计中在数量上显得比实际上多得多”。（《新时代》，第十五卷第一册第 308 页）关于农业我写道：“面积可能相当小，但仍旧能成为彻头

批是资本主义性的，是否有另一批完全或者部分地从属于资本主义大企业，这只能使工厂企业统计所呈现的总图景发生很小的变化。企业的巨大的而且日益增长的多样性，工业的梯级式的结构，都没有因此被驳倒。如果我们把全部小企业的 1/4 或者甚至一半当作从属于中等企业或大企业而从表上划掉，那么在德国单是在工业中就还留下一百万个企业，从资本主义大企业起，以下的阶层愈来愈广大，直到几十万个手工业小企业为止，这些小企业固然自己也缓慢地服从积聚过程，但是毕竟丝毫没有因此而表现出要从画面上消失的样子。我们在第三章第二节中曾经就这一点举出一些数字，还可以根据德国建筑业统计数字，在这一行业中，从 1882 年到 1895 年，独立经营者的数目从 146175 人增加到了 177012 人，受雇者的数目从 580121 人增加到了 777705 人。按每一企业平均的受雇者固然略有增加（从 3.97 人增加到 4.37 人），但这决不意味着手工业企业的减少。^①

由此可见，如果集中化的企业形式是生产和配送的社会化的先决条件，那么社会化即使在欧洲最先进各国中也才只是一个局部的事实。因此，即使在德国，国家打算在最近时期将譬如说 20 人及以上的企业全部剥夺，以便完全归国家自营，或者部分出租，那么在商业和工业中还将留下几十万个企业，拥有 400 万以上的工人，它们将继续私营。在农业中，即使把 20 公顷以上的经营全部收归国有（但是没有人会想到这样做），还将留下 500 万以上私营性质的经营，共有将近 900 万劳动者。但是如果考虑到在接收上述企业时涉及的是工业和商业中几十万个企业以及 500 万到 600 万职工，在农业中是 30 万以上的经营以及 500 万工人，那么国家或各邦由此而担负起来的任务之大，就是可想而知的。即使仅仅为了能胜任这样的庞大机体的总的管理或经济监督，

彻尾的资本主义经营的基础。以经营的面积大小为根据的统计愈来愈不能说明它们的经济性质”。（同上书，第 380 页）在第十六卷第一册 552 页上的我的论述崩溃论的文章中，对商业和交通中的数字也作了相似的阐述。——第一版第 85 页注

① 参看施摩勒：《德国的社会民主党工会》，第二部第一册第 1 页以下。在那里也指出了建筑业中的小企业家阶层的阴暗面。

一个政府或者一个国民议会必须具有多么丰富的见识、专门知识和行政能力啊！

也许有人会在哪里提到今天的发展所产生的为数众多的知识分子，他们在过渡时期会热心地听凭驱使。我对于这一社会阶层的劲头和善意是毫不怀疑的，不如说我在将近十八年前就已经提到它了。但是这里的危险恰恰在于由于太多而产生的烦恼，而敌人的恶意所不能做到的事，一拥而上的一大群最好的朋友的善意也许很容易完成。善意甚至在平时也是靠不住的家伙。

但是让我们暂时把这个问题放在一边，我们首先只肯定这一事实：生产和配送的社会化所需要的物质先决条件即企业的高度集中化只不过部分地具备。

根据马克思的学说，第二个先决条件是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对于夺取可以有种种不同的想法：经过以利用选举权和一切其他合法手段为方法的议会斗争道路，或者经过采取革命方法的暴力道路。^①

大家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直到相当晚的时候都认为在任何地方这后一条道路都几乎是必经之路，而马克思学说的许多信徒今天仍旧认为它是不可避免的。它也往往被看成是最近的道路。^②

① 在这里和以后使用革命一词时，专指它的政治含义，和起义或非法的暴力意思相同。与此相对，将使用“社会改造”一词来表示社会制度的涉及基础的变化，这一词没有说明道路的问题。这样区分的目的是排除一切误会和含混。

② “但是谁会看不清楚，在工人的确占绝大多数的大城市里，如果他们一旦能够做到毫无限制地占有公共权力以及它的行政和立法，那么经济革命只是几个月的问题，甚至也许只是几个星期的问题。”（茹尔·盖德：《外省的〔1871年〕3月18日》，载于《未来》，1877年，第87页。）

“但是我们宣称：只要把政府权力交给我们半年，资本主义社会就会成为历史上的事情了。”（帕尔乌斯在《萨克森工人报》上的文章，1898年3月6日）后一句话是一篇文章的结尾。这篇文章除了别的以外还阐述说，即使在社会革命的政府把全部生产的管理拿到手里以后，用人为地臆想出来的交换制度来代替商品交换，也是行不通的。换句话说，认真地研究了经济学的帕尔乌斯一方面看出了“商品交换已如此深刻地进入经济生活的一切条件之中，已不可能用一种人为地臆想出来的交换制度去代替它”，但是尽管他有着这样的信念（长期以来这也是我的信念，我在论述《空间和数量的社会意义》的文

导致这种看法的首先是这样的观念：工人阶级是社会的人数最多的阶级，而且作为无财产的阶级它又是社会最活动的阶级。它一旦掌握了权力，在它用使现存制度的基础不可能恢复的那些机构代替现存制度的基础以前，它是不会停下来的。

前面已经提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立他们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时心目中是以法国革命的恐怖时期为典型例子的。恩格斯早在《反杜林论》中就已经宣称，在1802年把无财产的群众的统治理解成恐怖的统治，是圣西门的天才的发现。这固然是一个相当夸大的估价，但是不管人们把那一发现看得多么高，在圣西门看来，无产者的统治的后果不会比今天被骂为“小市民”的席勒所认为的要好多少。1793年的无产者只能替别人打仗。他们只能在恐怖持续的期间“统治”。当恐怖到头时，——它是一定要到头的，——他们的统治也就完全结束了。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看法，在现代无产阶级那里不存在这样的危险。但是谁是现代无产阶级呢？

如果把一切无财产的人，一切没有从财产或特权地位取得收入的人算成无产阶级，那么它当然是先进国家居民中的绝对多数。只不过，这样一来，这个“无产阶级”就是异常多种多样的分子的混合物，是一些阶层的混合物，这些阶层彼此之间的差别比1789年的“人民”中间的差别还要大，当目前的财产关系还存在时，它们的共同利益（或者至少是相同的利益）固然多于对立的利益，但是只要目前的有产者和统治者被剥夺了财产或者地位，他们立刻就会意识到自己的需要和利益的多种多样性。

从前有一次我曾经说过，现代雇佣工人阶级并不像《共产党宣言》

章中已经提到了它，但是将在《社会主义问题》文辑的较晚一篇的文章中比较详细地讨论它），他仍旧想象，一个社会革命政府能够在现有的经济结构的情况下“管理”全部生产，而在半年以后，从商品生产中产生出来并且同它密切结合的资本主义制度将退化到只剩下一些残余。由此可见，暴力狂甚至可以使在别的方面精通的人成为什么样子的政治幼儿。（1920年补注：在补遗章中进一步论述了这一点。）（伯恩斯坦在注文中提到的“补遗”，即书后的“跋”，以后也往往这样称呼。——编者注）

所预见的那样是同一类型的、在财产和家庭等方面同样地不受约束的群众，恰恰是在先进的工厂工业中存在着一套完整的由分化了的工人组成的等级制度，在它的各个集团中间只有不大的团结感。亨·库诺^①在论述崩溃论的一篇文章（《新时代》，第十七年卷第一册）中认为，我的这一说法证明我即使在泛泛而论的时候心目中也是专指英国的情况，在德国和欧洲大陆其余的文明国家中并不像在英国那样存在着境况较好的工人同革命运动分离的这种情况。同英国相反，收入最多的工人站在阶级斗争的前头。英国的等级精神并不是目前的社会分化的结果，而是从前的行会制度和基尔特制度以及借用这些形式的旧工会运动的残存影响。

我必须再一次回答库诺说，他在那里对我所说的，在我看来丝毫不新鲜，而且是，它的正确方面不新鲜，它的错误方面也不新鲜（就是说，即使在当时我也是不相信的）。例如，结尾说的话就是错的。把英国工会和行会联系在一起的理论是建立在很薄弱的基础之上的。它没有看到，除了伦敦以外，英国的行会已经随着宗教改革而被剥夺了，而恰恰在伦敦，工会运动从来没有打算发展成特别的力量，对于这一点，始终在那里存在着的基尔特当然是很少罪过的。如果说英国的工会运动固有着一定的行会的特征，那么与其说这是旧式行会制度（它在德国比在英国维持得长久得多）的遗产，远不如说它首先是盎格鲁萨克逊的自由的产物——是这一事实的产物，即英国工人从来没有受过警察国家的管束，即使在禁止结社的时期也是如此。在自由中，独特性的意识，或者用施蒂纳的话来说一次，独自性（Eigenheit）的意识发展起来了。这种意识并不排斥对于异己事物和共同利益的承认，但是它容易成为某种粗拙性（Eckigkeit）的原因，这种粗拙性即使仅仅在形式上是片面地出现的时候，也表现为顽固的和狭隘的。我当然不想伤害德国工人的感情，我懂得充分估计理想主义的价值，举例说，正是这种理想主义推

① 亨利希·库诺（1862—1936），德国社会民主党党员，修正主义者。——编者注

动汉堡工人在几十年之间为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总的事业作出了工人运动史上无与伦比的贡献。但是就我对于德国工人运动所知道的以及有机会探索的范围来说，上述职业分化的反作用在德国工人运动中也是有效的。政治运动占优势，工会受到人为的压制，还有一般说来工资水平和劳动时间的差别在德国普遍比在英国要小这一事实，以上这些特殊环境妨碍这一反作用以特别引人注意的方式表现出来。但是谁只要仔细地关注德国工会运动的机关报刊，就会碰到足够的事实，能证明我所说的话。我不想举出例子来了，尽管我对这些例子知道得很充分，其中还有一些是从我在德国的活动得来的。在这一方面我在这里只说如下一点。

上述那一现象并不是工会造成的，工会只是把它当作实际差别的不可避免的后果而表现出来。工作方式和收入水平的重大差别最终也造成另一种生活方式和生活要求，这是完全不可能不这样的。精密机械工人同采煤工人，熟练的室内装饰工人同搬运工人，雕刻工人或模型工人同锅炉工人，通常过着很不相同的生活，有着很不相同的需要。但是当为了维持生活的斗争没有引起他们之间的冲突的时候，他们统统都是雇佣工人这一事实却能将这种差别从他们的观念中抹掉，而关于他们进行着同样的反对资本的斗争的意识产生一种强烈的相互同情。在英国也不缺乏这种同情，贵族化的工会会员中的最贵族化的那些人也常常对处境较恶劣的工人表示同情，因为他们中间有许多人在政治上即使不是社会主义者，毕竟也是好的民主主义者^①。但是在这种政治的或者社会政治的同情和经济的团结之间还有一个巨大的差别，较强的政治和经济压迫可能使这一差别失效，但是随着这种压迫的减轻，它最终将一再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变得显著起来。如果假定英国在这一方面原则上是一个例外，那就是一个巨大的错误。同样的现象今天在

① 在英国的社会主义运动中，正和其他地方完全一样，收入较好的或者熟练的、在思想上水平较高的工人提供了核心部队。在社会主义同盟的盟员集会上只能找到很少几个所谓不熟练工人。

法国以另一种形式表现出来，在瑞士和美国也相似，正如上面所说，德国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这样的。

但是如果我们假定，在工业工人阶级中不存在这一分化，或者这一分化对工业工人的思想方式不起什么作用，那么要知道工业工人在任何地方都只占人口的少数。在德国，连同家庭工业在内，1900万就业人口中大约有700万工业工人。此外还有技术等方面的职员，商业职工，农业工人。

在这些方面，分化到处都是更为明显的，关于这一点，再没有比为了把这些职业类型组织起来形成工会利害同盟^①的运动的苦难历史更能提供明白的证据了。一般说来，以处境的某种形式上的类似为根据而推论出行动上的实际的同一性，再也没有比这更能叫人上当的了。商业职员同他的上司的相对地位在形式上和工业雇佣工人同他的雇主的相对地位是相似的，但是商业职员——较大的商店的一部分下级人员除外——的确感到自己在社会方面同上司的关系比雇佣工人同雇主的关系接近得多，尽管收入的差距在商业方面往往比工业中大得多。在农村中又是这样：较小田庄上的农民和雇工的生活方式和劳动过于一律，大多数中等田庄上的劳动分工或分化过大，人员相对来说过少，以致不容许有像城市工人斗争那种意义的阶级斗争。在雇工头、日工和牧童之间很少看到发达的团结感。至多只剩下大地产，但是正像我们已经看到的，大地产到处只占农业经营的少数，而且在大地产上也还可以遇到不同集团的人员同企业主间的劳动关系上的充分原则性差别。如果认为农业中的560万职工（德国的职业统计在减去了高级辅

^① “工会利害同盟”，在英译本作“像工联一样的工业联合”，并有如下的附注：“本书写作后十年以来，发生了明显的改进。技术方面和商业方面等等的职员和助手的组织有了惊人的进展。1907年底，除了拥有2400万会员的工资劳动者的工联以外，已经有680981个各种工种和各种地位的职员组织成48个协会，带有多少明显的工联倾向。其中有15个协会是商业企业和有关企业中的营业处、商店和仓库等方面的职员和助手的联合，共有459787名会员。另一方面，组织起来的农业工人只有两三千人，而组织起来的店员和商店助手手属于社会主义倾向的联合会的不到1/10。”——编者注

助人员——农学家等——后得出了这一数目)^①在社会意向上同工业工人阶级一样，那是完全不行的。只有对于极其微不足道的那一部分人，才能假定或者指望他们对于超出单纯改善劳动条件之上的努力存在着认真的意愿或理解。对于农业职工中的绝大多数来说，农业生产的社会化比一句空话好不了多少。他们的理想暂时还是设法自己占有土地。

但是工业工人阶级对于社会主义生产的渴望大部分也与其说是确定的事情，不如说是假定的事情。从公共选举时支持社会党的票数的增加固然也可以推论说社会主义意向的信徒在不断增加，但是任何人也不想断定，一切投给社会党人的票全都来自社会主义者。即使我们假定，投票支持社会民主党的那些非社会主义和非无产阶级选民的数目同还没有选举权的那些成年的社会主义工人的数目互相抵消，那么在德国，虽然社会民主党比在任何其他国家都更强大，工业中有450万成年工人，还要加上商业和交通中的50万成年男职工，但是支持社会党的选民才只有210万。德国工业工人阶级的半数以上目前仍旧是部分地对社会民主党不关心和不理解，部分地甚至抱敌对态度。

无论如何，支持社会党的选票首先与其说是表现了一种确定的志向，不如说是表现了一种不确定的愿望。参加为了社会主义解放的积极工作的工人只占工人全体的很小的百分比。德国的工会运动是令人高兴地向上发展的。但是它在1897年底才只包括42万左右有组织的工人，而这些职业中的工人总数达到6165735人。（参看：《德国工会总委员会通讯》1898年8月1日至8日）如果把希尔施的工会联盟^②的大约8万名会员也算进去，那么在有关的职业中仍旧不过是每11个无组

① 1907年的行业调查记载了730万受雇于农业的工人。但是其中有一百多万人在以前几次调查中是被算在“附带劳动的家属”项下的。事实上不属于农业主家庭的农业工人的数目增加得很少，而且连这一增加的数目也必须从外国招来。——补注

② 指由马克斯·希尔施（1832—1905）等人创办的改良主义的“德国工会联盟”。——编者注

织的工人才能有一个有组织的工人。^①政治上组织起来的德国工人的数目，在减去同时又是工会会员的那一部分以后，算成 20 万几乎是不为过低的。如果我们假定，仅仅由于不受他们意志支配的因素而被阻止以某种方式积极参加政治斗争或工会斗争的工人也有同样的数目，那么一共可有将近 90 万工人通过行动表示了对自己的解放有较大的、强烈的兴趣。他们占社会民主党的选民的 40%。但是在投给非社会党候选人的 550 万选票中，今天却可以把整整的 1/4 到 1/3 算成社会民主党的有意识的——有阶级意识的反对者，这一人数几乎是前一人数的两倍。^②

我完全知道像上面这样的叙述只有相对的证明力。例如，各集团的地区分布和社会政治意义这样的重要因素在这些叙述中就完全未加考虑。但是问题也只是在于获得一个用来估价一些分子的量的对比的大致可行的尺度，这些分子能够表现出来的由理论假定的社会主义意向不仅是偶然的和不明确的表示。例如，帕尔乌斯在他的第七篇文章中认为可以利用根据十分表面的标志制定的关于社会斗争力量的表格来反对我，对此人们应当怎样说呢？他在那里把无财产者对有财产者所占的巨大数量优势搬了出来，似乎这是某些人不知道的并且一般说来是一个历史的新事实。而且的确有这样的社会主义报刊，根据帕尔乌斯所计算出来的 1500 万人的“无产阶级大军”同仅仅 160 万人的“资本大军”（此外还有 300 万“被资本弄得破产”但是还没有下降为无产阶级的小农和手工工人以及 82 万相对说来不依赖资本的人）的对比而得

① 尽管如此，已经有五种职业的 1/3 以上的工人组织起来，这些职业是：印刷工人，61.8%；雕刻工人，55.5%；码头工人，38%；铸铜工人，33.6%；手套工人，31.7%。其次是石印工人，21.8%；瓷器工人，21%。

② 在本书写成和战争爆发之间经过的 15 年中，所有这些数字都有了显著的增加。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交费党员的数目已增加到 100 万左右，党的国会选民的数目已增加到 400 万以上，组织在工会中的工人的数目已增加到 300 万以上，此外还有 50 万有组织的职员和公务员，革命使这一增加更加显著地提高了。关于这一增加的评价同样也在增补章中论述。——补注

出社会革命临近的结论。帕尔乌斯在把职业统计中的 560 万从事农业的职工列入“无产阶级大军”时所表现的真正亚洲式的平心静气，只有他在发现 200 万“商业无产阶级”时所表现的大胆才能胜过。^①即使假定，所有这些分子都会以欢呼迎接一场会使社会主义者掌握政权的革命，这对于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仍旧是很少有补于事的。

由国家立刻接收生产品的全部生产和配送是完全谈不到的，关于这一点大概不至会产生争论。国家根本不能接收大多数中等企业和大企业。但是甚至作为中间环节的地方自治机构也很少有补于事。它们当然可以把本地的为本地生产或服务的事业收归地方公有，这已经够它们干的了。但是难道能够想象把一向为大市场工作的那些企业立刻这样地统统收归地方公有吗？

我们只拿一个中等的工业城市为例，譬如说是奥格斯堡、巴门、多特蒙德、哈瑙、曼海姆等等吧。恐怕不会有人傻到这样的程度，竟假定那里的公社能够在一次政治危机中或者甚至在平时把那些地方的各种各样的工厂和商店接收过来自营并且成功地管理它们。它们将或者听任这些企业留在一向的所有主手中，或者如果他们想无条件地剥夺这些所有主，他们就必须按某种租赁条件把企业转交给工人合作社。

这样，问题在所有这类场合实际上就归结为合作社的经济能力的

① 职业统计（1895 年）中商业和交通方面的数字是：

独立经营者和经理	843,556
商业人员	261,907
店员，仆役，车夫，附带劳动的家庭成员	1,233,045

共计 2,338,508

不过帕尔乌斯的表格是有它的先例的。1877 年施拉姆先生在赫希伯格的《未来》上，根据刚刚公布的 1876 年普鲁士职业统计的结果算出了普鲁士的“社会主义份额”占人口的 85%，有 460 万可能的社会主义信徒，与此相对只有 992000 阶级敌人（见《未来》，第 186 页以下）。只不过施拉姆没有像帕尔乌斯那样从这些数字中得出大胆的教训。

1920 年补注：到 1907 年为止，商业和交通中的商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已增加到 505909 人，和工人同等的辅助人员已增加到 1959525 人，这样一来当然已达到了帕尔乌斯的数字。

问题。

第二节 经济合作社的效能

在马克思主义文献中，到目前为止只是十分肤浅地论述了合作社的效能问题。如果不算 60 年代的文献和考茨基的几篇论文，那么在马克思主义的文献中，除了关于合作事业的很一般的、多半是否定的言论以外，就找不到什么东西了。

这种忽视态度的原因是无须深究就可以明白的。

首先，马克思主义的实践主要是政治性的，它以夺取政权为目的，此外就几乎仅仅只认为工会运动作为工人的阶级斗争的直接形式还有原则性的意义。但是说到合作社，马克思一开始就确信，它在小规模的情况下是没有成果的，至多只有一种实验的价值，而且非常有限。只有依靠社会全体才能做出些事情来。马克思在《雾月十八日》中就是按照这一精神论述工人合作社的。^①后来他略微修改了他对于合作社的判断，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向日内瓦代表大会和洛桑代表大会提出的关于合作事业的决议就是证据，格·埃卡留斯^②的《一个工人的反驳》中的很可能出自马克思，而无论如何得到了他的赞许的段落同样也是。在这本书中把合作社当作未来的先驱而赋予它与行会在罗马及中世纪早期所具有的同样的意义。不仅如此，前面（第 116 页）已经涉及的《资本论》第 3 卷中的一段（它和那些决议以及埃卡留斯的著作是在同一时期写的）也强调了合作社作为向社会主义生产的过渡形态的意义。但是关于哥达纲领草案的信（1875 年）又就合作社发表了比较怀疑态度的意见，从 70 年代中期以来，这种怀疑态度也支配了全部马克思主义

① “无产阶级中有一部分人醉心于教条的实验，醉心于成立交换银行和工人团体，换句话说，醉心于这样一种运动，即不去利用旧世界自身所具有的一切强大手段来推翻旧世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第 2 版，第 139 页。——编者注）

② 约翰·格奥尔格·埃卡留斯（1818—1889），德国的国际工人运动著名活动家，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编者注

的社会主义文献。

这种情况可以部分地看作巴黎公社以后开始出现的反动的影响，这一反动使整个工人运动具有了另外一种、几乎完全集中于政治的特点。但是这也可以说是人们到处从合作社所获得的悲惨经验的产物。促使英国合作社运动蓬勃发展的那些奢望并没有实现。对于 60 年代的一切社会主义者来说，生产合作社是真正的合作社，他们至多只是附带地提到消费合作社。但是认为消费合作社的普及将无条件地引起工资降低的这一意见是占优势的，连恩格斯也在他的论述住宅问题的文章中表示了这样的意见（《住宅问题》新版，第 34—35 页^①）。马克思起草的日内瓦代表大会决议说：

“我们建议工人们与其赞成消费合作社，不如赞成生产合作社。消费合作社仅仅触及现存经济制度的表面，而生产合作社则冲击它的基础。……为了防止合作社蜕化成为普通的资产阶级股份公司，合作社所雇用的全部工人，不论是否为股东，都应该取得同样的份额。可以同意给予股东小额股息作为临时措施。”

但是 60 年代创办的生产合作社恰恰是几乎到处都失败了，它们或者不得不完全解散，或者退化成小的合资商店，这些商店如果不完全像其他商店一样地以工资雇用工人，就要脆弱地衰败下去。消费合作社却已经或者看起来已经事实上“俗化”为单纯的零售商店。社会主义队伍中的人愈来愈不重视合作社运动，这是不足为奇的。在德国，拉萨尔和舒尔采—德里奇^②之间的对立本来还深入人心，因此反应最为强烈。70 年代中期，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一大部分（决不仅是拉萨尔分子）表现出对明显的国家社会主义的强烈倾向，这种倾向往往同党在政治上的激进主义形成奇特的对比，它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人们从事合作社

①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72 页。——编者注

② 弗朗茨·赫尔曼·舒尔采—德里奇（1808—1883），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想把德国工人运动引向组织生产和经济合作社。——编者注

时所得到的悲惨经验。目前在听说自助的合作社破产时仍旧令人欢欣鼓舞。哥达纲领中对于由国家资助的生产合作社的要求是以不可能主义的形式表达出来的，而且在草案中就已经是这样了。马克思在关于纲领的信中对有关一节所作的批判，在这一方面说来，与其说是针对作为它的基础的思维过程，不如说是针对表达方式。马克思不知道，他认为应对这一节负主要责任的“柏林的马拉”——哈赛尔曼^①，恰恰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布朗基主义者。正像马克思一样，哈赛尔曼也曾经把受毕舍^②保护的“工场”^③的工人说成是反动分子。

马克思没有对合作社进行深入的批判，这一事实要由两种情况来解释。第一，在他写作时，对于各种形式的合作社还没有足够的经验可以为作出判断提供根据。只有属于一个更早时期的交换市场已经被证明是完全失败了。但是第二，马克思根本没有以理论上的公平态度来对待合作社，这种公平态度曾经容许他的理论洞察力比那些满足于像工人合作社和小手工业者合作社这样的标志的平庸社会主义者看得更远。在这一方面，已经制定的关于剥夺的学说，或者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关于剥夺的公式，成了他的巨大分析力的阻碍。只有表现出反对资本主义企业的最直接对立的合作社形式才中他的意。因此向工人推荐生产合作社，要他们热心于此，因为生产合作社“从根本上冲击”现存经济制度。这完全符合辩证法的精神，在形式上同从作为社会形态最终决定性因素的生产出发的社会理论彻底吻合。它表面上也符合把已经社会化的劳动和私人占有之间的对立看成现代生产方式的迫切需要解决的基本矛盾的那种见解。生产合作社似乎是在单个企业的范围内实际解决这一对立的方法。根据这一精神，马克思就生产合作社，也就

① 威廉·哈赛尔曼（1844—？），全德工人联合会的领导人之一，无政府主义者，1880年因此被开除出德国社会民主党。——编者注

② 菲力普·约瑟夫·毕舍（1796—1865），法国1848年革命后的制宪议会的议长。——编者注

③ 指法国1848年革命后成立的“国民工场”。——编者注

是在其中“工人作为联合体是他们自己的资本家”（《资本论》，第3卷第498页）的那种合作社，发表意见说，即使它们必然要重复目前制度的一切缺点，但是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对立毕竟在其中“积极地”被扬弃了，因而它们已经提供表明资本主义的企业家是多余的证据。不过从那时以后，经验教导我们，以这种方式组成的工业生产合作社恰恰不能、而且现在也不能提供这种证据，它们是合作劳动的最不幸的形式，蒲鲁东就生产合作社问题反对路易·布朗时断言合作社“不是一种经济力量”，他在实际上是正确的。^①

社会民主党的批评迄今一直把纯粹生产合作社的经济失败的原因仅仅归之于它们的资本、信贷和销路的不足，而对于并不是在经济上失败的合作社的衰落，则用包围它们的资本主义的或个人主义的世界的腐化影响来解释。这一切在一定程度内也都是对的，但是还不能完全说明问题。就一整批财政上失败的生产合作社来说，可以肯定，它们有足够的经营资金，销路方面的困难并不比普通的企业家更大。如果上述类型的生产合作社真的具备比资本主义企业优越或者即使仅仅与同等的经济力量，那么它们至少一定会按照同以极微薄的资金开始经营的许多私人企业一样的比例维持下来，并且兴盛起来，也不会像总是一再发生的那样，可悲地向周围的资本主义世界的道德影响投降。财政上没有失败的生产合作社的历史同破产的合作社的历史比起来，几乎更为响亮地说明这种形式的“共和工厂”不行。因为这一历史表明，免于财政失败的合作社的继续发展，在任何地方都意味着排他性和特权。它们远不能冲击目前的经济制度的基础，不如说它们只是为这一制度的相对巩固性提供了证据。

相反，60年代的社会主义者那么轻视的消费合作社，随着时间的

^① 如果说蒲鲁东时而作为合作社的坚决反对者，时而作为它的辩护者出现，那么这一矛盾可以这样来解释：他在某一次心目中的合作社的形式和在另一场合时心目中的形式完全不同。他反对基本上垄断性的合作社，而承认互助性的合作社，也就是根据互惠制组织的合作社。不过他的批评是直觉多于科学，并且充满了夸大。

推移，却真正表明了自己是一种经济势力，是一个有效能的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有发展能力的机体。工人消费合作社的数字同关于纯粹生产合作社的统计所提供的可怜的数字比起来，显得像是一个世界帝国的预算同一个内地小城的预算相比一样。由消费合作社设立的并且为它们的利益而管理的作坊目前已经生产了比纯粹或近于纯粹的生产合作社所生产的货物量的 100 倍还要多的货物。^①

纯粹生产合作社的经济上和道德上破产的更为深刻的原因已经由

① 后一种类型的生产合作社的数目很难弄清楚，因为关于合作社生产的官方统计并没有把它们同为数远为更多和远为更大的为生产目的而组织的工人合股公司区别开来。根据英国商业署工人问题科的报告，1897 年和 1909 年（英译本作 1905 年。——编者注）向该署提出报告的合作社的年度生产价值（马克）是：

	1897 年	1909 年
由消费合作社在自己的工场中生产	122014600	243668400
由面粉合作社生产	25288040	22231260
由爱尔兰制奶农场合作社生产	7164940	38029820
由为生产目的的工人合作社生产	32518800	26868420

面粉合作社在 1897 年有 9 个，当时有 6373 名社员，雇用了 404 人，到 1909 年就只有 5 个，有 3342 名社员和 262 名雇用人员。独立经营的为生产目的的工人合作社的数目同样也下降了。此外，如果我们假定，在这种合作社中大约有 1/20 可以被称为受雇的工人联合起来成为他们自己的资本家的那种合作社，那么我们就估计得很高了。已经消灭的独立经营的磨坊和生产合作社大部分是被消费合作社的批购合作社或者较大的消费合作社本身吞并的。

英译本第 115 页注：（第一段与此处相同，从略。——编者注）

	1897 年	1905 年
由消费合作社在自己的作坊中生产	6100730 (镑)	12525104
由面粉合作社生产	1264402	1128328
由爱尔兰制奶农场合作社生产	353247	3683999
由为生产目的的工人合作社生产	1625940	

以下几年登记的英国合作社的情况是：

	1897 年	1905 年	1906 年
社员	1468955	2177834	2334641
资本	24087430 (镑)	33741295	39898220
销售	56632450 (镑)	89403546	98403692
利润	6402428 (镑)	10026387

贝爱特丽丝·韦伯夫人^①在她还是以未婚时的姓——波特尔——发表的论述英国合作社制度的著作中作了出色的阐述，虽然也许在有些地方也出现一些夸大。对韦伯夫人说来，也像对大多数英国合作主义者一样，属于被雇用的工人本身的合作社不是社会主义或民主主义的，而是“个人主义的”。对于使用这个词人们尽管可以抱有反感，但是这种思路是完全正确的。这种合作社实际上不是社会主义的，洛贝尔图斯也已经说明了这一点。凡是工人成为排他的所有者的地方，这种合作社恰恰在自己的体制中存在着活生生的矛盾。它假定有作坊中的平等、充分民主和共和制。但是只要它一旦达到了一定的规模，尽管相对说来可能还是十分微小的，平等立刻就失效了，因为职能的分化成为必要，从而从属也就成为必要。如果抛弃了平等，那么建筑物的基石就被扔开，其他的石头也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相继移动，就会产生瓦解，蜕化成普通的商业企业。但是如果坚持平等，那么扩展的可能性就被打消，就将始终停留在小型上。这是一切纯粹生产合作社的抉择，它们在这一冲突中全都或者崩溃，或者萎缩了。它们远非同现代大生产相适应的把资本家从企业中排除出去的形式，不如说是向资本主义前生产的一种倒退。这种情况是十分普遍的，只有手工业工厂有少数几个取得相对成功的例子，这种工厂的多数不是在大工业精神支配着工人的英国，而是在“小资产阶级”成分很重的法国。民族心理学家喜欢把英国说成这样的一个国家，那里的人民在自由中寻求平等，法国则是这样的一个国家，那里的人民在平等中寻求自由。在法国生产合作社的历史中的确有许多篇章表明，为了以动人的忠诚维持形式民主曾经作出了极大的牺牲。但是它没有说明在现代大工业中有任何一个纯粹的生产合作社，虽然现代大工业在法国无论如何是相当发达的。

^① 贝爱特丽丝·韦伯（1858—1943），费边社社员，悉尼·韦伯的妻子，曾任该社主席。——编者注

弗朗茨·奥本海默尔^①博士在他的《移民区合作社》(莱比锡敦刻尔和洪堡特公司出版)一书中立下了扩大和加深波特尔·韦伯夫人的研究的功绩。他在该书的头几章中对各种不同形式的合作社作了十分概括的分析,其中的个别部分就批评的精辟性说来几乎是无法超越的。

奥本海默尔对合作社进行分类时采用了买主合作社和卖主合作社的原则区分。在我们看来,他在个别地方有些夸大了这种区分的重要性,但是就整个来说,必须说这种区分是有很有效的,只有以它为根据才有可能对纯粹生产合作社在财政上和道德上的失败作出真正科学的解释。根据这一解释,个人的过失、资本的缺乏等等才第一次作为说明个别事例而不说明常规的偶然性事物而完全退居次要地位。只有当合作社在某种程度上基本上是卖主合作社时,它的扩展才相应地成为对它的一般目的和特殊利益来说值得想望的事。但是一个合作社越是成为卖主合作社,越是成为自己生产的工业产品的卖主合作社(对农民合作社来说情况就有所改变),它的内在矛盾就越大。它的困难随着它的发展而发展。风险愈来愈大,争取销路的斗争愈来愈困难,取得贷款和为了利润率或各人从总的利润额所得份额的斗争也同样困难。因此这种合作社屡次被迫变成排他性的。它在利润方面的利益不仅同买主的利益对立,而且也是同一切其他卖主的利益对立的。与此相反,买主合作社却基本上由于发展而得到好处,它在利润方面的利益即使同卖主的利益对立,但同一切其余的买主的利益却是一致的,因为它力求利润降低,力求生产品减价,这种努力对于一切买主本身和整个社会说来是共同的。

从这两种类型的合作社的经济性质的差别出发,产生了波特尔·韦伯夫人所阐明的管理方面的差别:一切真正的买主合作社基本上具有民主的性质,一切纯粹的卖主合作社有力求成为寡头统治的性质。在这里必须说明,只给数目有限的股东分红的消费合作社,奥本海默尔是

① 弗朗茨·奥本海默尔(1864—1943),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编者注

按照合乎逻辑的划分把它归入卖主合作社之列的。只有承认按同样的比例给一切买主分配利润的消费合作社才是真正的买主合作社。^①

把合作社区分为卖主的和买主的合作社，这对于合作事业的理论，正是就它同社会主义学说的关系看来是有价值的。不满意“买”（Kauf）和“卖”（Verkauf）这样的用语，认为它们是过于专门为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准备的人，可以用采购（Beschaffung）和销售（Veräußerung）这两个概念来代替它们，这样一来，他们只会更加清楚地认识到，前者对于社会的重要性比后者大得多。采购货物是基本的、普遍的利益。就它来说，社会的全部成员在原则上都是同伙。大家都消费，但并不是大家都生产。即使是最好的生产合作社，只要它仅仅是贩卖合作社或销售合作社，就始终处于同整体的潜在对立中，具有同整体对立的特殊利益。社会同一个为了自己的利益经营某一生产部门或某一公共服务部门的生产合作社之间的分歧点，和它同一个资本主义企业之间的分歧点一样，社会是否更加容易同生产合作社协调，这完全要看情况而定。

但是让我们回到我们离题进入合作社理论领域时的出发点吧，我们已经充分说明，认为现代工厂通过自己本身造成较大的合作劳动倾向的这一假定，应当被看成是完全错误的。随便拿出哪一段合作事业的历史，都会发现，自己管理的合作工厂是作为无法解决的问题而被提

^① 奥本海默认为，“买主合作社”和“卖主合作社”的区分比一向惯用的“生产合作社”和“分配合作社”的区分好，因为后者一般说来是以一种不正确的概念规定为出发点的。认为把一种物件送市场或者送交购买者是一项非生产性的行为，这是完全错误的，这一行为同从一种物件（原料）制造出另一种物件（制成品）一样，都是一项“Producere”（生产）。分配（Verteilung）却意味着单纯的分给，人们也使用这一词来说明上述的另一种职能（即把商品由生产者送交消费者的职能——编者注），这是最糟的概念混乱的原因。

我们的意见和上述后一点意见相同。使用不同的词来说明配送和分配这两个很不相同的职能，肯定是十分值得推荐的。但是把制造和送货这两种职能概括为同一个“生产”概念却只能引起新的混乱。在实践中，它们在有些情况下几乎无法分开或者区别，但这不能成为不把两个概念区分开来的理由。在许多情况下，在这一区分后面潜伏着只把制造劳动说成生产性劳动的倾向，这是可以用别的方式来对付的。

出来的，即使一切其他方面都过得去，它也要由于缺乏纪律而失败。这就同共和国以及现代集中制的国家的情形一样。国家愈大，共和制行政管理的问题就愈困难。同样，工场或企业的规模愈大，组织愈复杂，工场中的共和制问题就愈困难。人们为了非常的目的尽管可以自己任命自己的直接领导人，并且享有罢免的权利。但是在一个工厂企业中，必须一天又一天、一小时又一小时地作出枯燥的决定，并且永远有引起争吵的机会。为了完成这里的管理任务，要求领导由被领导者任命，使他的地位取决于被领导者的好意和坏脾气，这简直是行不通的。这种做法总是证明不能长久维持下去，从而导致合作工厂的形式改变。简言之，工厂的技术上的发展提供了集体生产的躯体，它决不会在同样程度上使灵魂更加接近合作经营。对于把企业转交合作经营从而承担相应的责任和风险的渴望，是同企业的大小成反比的。但是困难却随着企业的大小按愈来愈大的比例增长。

只要把这一问题具体地设想一下，并且随便拿一个大的现代工业企业，像一个大机械制造厂、一个发电厂、一个大化学工厂或者一个现代综合出版社来看一下。这一切和与此类似的大工业企业，固然都能很好地为合作社（全体职员甚至可能都属于合作社）而经营，但是对于职员本身的合作经营来说，这些大工业企业是绝对不适宜的。各种部门和千差万别的各种类型的职工之间的摩擦将会无尽无休。那时就会极其清楚地表明，种种不同的、在教育程度、生活方式等方面不同的职业群之间的团结心只不过是微小的（库诺反对这一说法）。人们通常所理解的合作劳动不过是十分简单的共同劳动诸形式的误解的译语，这种共同劳动是由未分化的工人的集团（Rotten Arteli^①等等）实行的，基

① Rote (-n) 源出法文，为人群之意；Artel (-i)，源出俄文，为劳动组合之意。——译者注

本上也始终只是集团计件劳动。^①

因此只有根据完全按照表面的标志来判断的那种观察方法才会认为，随着资本主义所有主或所有主们的外化（*Entfernung*），对于资本主义企业向有生命力的社会主义机构的转化来说，最重要的工作就完成了。实际上问题不是这样简单的。这些企业是很复杂的机体，中心（一切其他器官在这里会合）的外化如果不伴随着组织的彻底改造，对于这种机体来说就意味着立刻的瓦解。

正是在动荡的时期，社会乐于听任它不能通过国家或者通过地方自治机构亲自拿到手中的东西作为企业暂时安然存在。表面上比较激进的行动将很快表明是最不恰当的行动。有生命力的合作社不能用魔术变出来或者根据命令设立起来，它们必须成长起来。而在为它们平整了土地的地方，它们也是会成长起来的。

英国合作社今天已经掌握了一亿塔列耳以上的资产，甚至拉萨尔也认为这样一笔钱已经足够以国家贷款的形式使他的合作计划实现。同英国的国民资产比起来，这笔钱仍旧是一个小部分，即使把投放在国外的资本和重复计算的资本减去不算，也许它才不过占国民资本的1/400。但是英国工人的资本实力远不止这一点。而且它还是不断增长的。在1887年到1897年这个十年间，合作社资产几乎增加了一倍，它比社员数目增加得更快。社员数从851211人增加到1468955人，资产从1150万英镑增加到2040万英镑^②。合作社的生产近来增长得还要迅速。英国的合作社生产总值在1894年才一共达到9900万马克，而1897年就已经几乎增加了一倍，也就是增加到18000万马克。1909年它达到49700万马克。其中将近9/10属于购买合作社的自营生产，其

① “这事情是不容易的。像棉纺织工人这样的人不会轻易加入为了成功地经营一个合作社所必需的同质群众的行列”。（波恩莱：《自助合作社简史》，载于《英国的合作工场》第20页）

② 1909年的社员数是2469396人，投入资金3090万英镑。战争更使这些数字大为膨胀了。——补注

余的 1/10 则分属于各式各样的合作社，其中一大部分是变相的购买合作社，或者过去或现在是为这种合作社生产的。消费合作社或购买合作社的自营生产在三年中间增加了一倍以上，它的价值从 5200 万马克增加到 12200 万马克，从那时起到 1909 年增加到了 42000 万马克。

这些数目是如此惊人，以致人们读到时不禁要自问：这种增长的程度在哪里？合作制度的狂热信徒曾经算出，如果英国的合作社把利润积累起来而不去分配，那么它们在大约 20 年以后就可以把国内的全部土地连同全部房屋和工厂买下来。这当然是按照在纪元元年投资的那个著名的一便士的奇妙的复利计算方式进行的计算。这一计算忘记了还有地租这样的东西，并且它所假定的增长级数在物理上是不可能的。它没有看到，最穷的阶级几乎是参加不了消费合作社的，或者只能十分缓慢地被争取来加入。它没有看到，消费合作社在农村的活动领域不过很有限，消费合作社固然减少了中间商业的费用，却不能取消这些费用，以致私人企业主仍旧不断有可能适应改变了的环境，而从一定的时刻起，消费合作社发展的缓慢化将成为几乎是数学上的必然性。但是这一计算首先忘记的或者置之度外的是，消费合作社如果不支付红利，一般说来就要陷于停顿，而对居民的广泛阶层来说，红利这一受到合作制度空论家诅咒的罪恶的苹果，恰恰是消费合作社的主要吸引力。今天往往有人主张，消费合作社的红利不是表示它的商品的较大的低廉程度的尺度，个体商业提供的大部分商品平均起来同合作社一样便宜，因此红利只是某些商品的微小的没有引起注意的加价的总和。这虽然是很夸大的说法，但它毕竟不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工人消费合作社既是克服剥削（寄生的中间商业对于各劳动阶级来说意味着剥削^①）

① 寄生一词自然只适用于这件事，而不适用于实行这件事的人。如果想把它转用于人，那么也就必须把许多所谓“生产的”工人称为寄生者，因为他们所生产的东西对于社会来说是有害无益的。

中间商业之所以是寄生的，主要是因为中间商人的增加从一定限度起就不会引起由竞争增加而产生的廉价，而是引起涨价。

的一种手段，也是一种储蓄银行。但是既然许多人的储蓄欲根本不强烈，他们就宁可利用在最近的小贩处购买的方便，而不愿为了红利使自己遭到某种麻烦。顺便说一句，这是恰恰在英国曾经使并且现在还使消费合作社很难推广的因素之一。英国工人决不是特别爱好储蓄的。如果有人想说英国本来就是消费合作社的特别有利的地盘，那就是大错特错了。完全相反。工人阶级的习惯，城市面积的巨大扩展（它产生了一户住宅制〔Cottage system〕）完全抵消了较高的工资对这一方面的好处；英国所达到的成就，首先是坚忍的不屈不挠的组织工作的结果。

而这是一个过去和现在都值得为之出力的工作。即使消费合作社除了通过降低中间商业的利润率而逐渐挖掉自己的基础以外再也不做什么事，那它也就是完成了一件对于国民经济极其有用的工作。毋庸置疑，它是朝这一方向努力的。在这里有一个把手，工人阶级依靠它就能夺取社会财富的很大一部分（否则这部分财富就将为增加有产者阶级并从而也加强这一阶级效劳），却不必直接消灭生命，不必诉诸暴力，而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暴力决不是如此简单的事情。

这种场合涉及的金额有多大，合作社的统计可以说明。1897年英国的1483个工人消费合作社以36700万马克的总资本和80300万马克的销售总额而获得了12300万马克的总利润。^①按售出的商品计，利润率是15.25%，以使用的资本计，利润率是33.5%。面包合作社也相似，它其实本质上也不过是消费合作社^②。它们以500万马克的资本和850万马克的销售额获得了120万马克的利润，利润率按销售额计是14%，按使用的资本计是24%。面粉合作社（它同面包坊一样，也可以算是消费合作社）平均获得14%的资本利润。

不生产食品的生产合作社的平均利润率要小得多。在这一方面，

① 我们在这里没有把两个批购合作社算在内，它们按照一个很低的附加费把商品出售给各消费合作社。

② 共有230个合作社和7778个人作为股东，一共雇用1196人，由此暴露了购买合作社的特征。由普通消费合作社以自营方式管理的面包坊在这里没有计算在内。

共有 1450 万资本和 2400 万销售额的 120 个合作社，获得了 77 万马克的赢利，就是说 3.25% 的销售利润和 5% 的资本利润。

如果能认为这些数字对于工业和零售业中的利润率比例来说是典型的话，那么它们就将使说工人作为生产者而不是作为消费者受剥削的那一原理的有效性显得很有限了。而事实上这一原理也只是说出了一个有条件的真理。这从下面的事实就已经可以明白了：它所依据的那一价值理论完全不考虑中间（小）商业。此外，这一价值理论还假定，“劳动力”这一商品的交易有不受限制的自由，因此它的生产费（即工人的生活资料等等）的任何低廉化也要导致它的价格——工资——的下降，而今天对于一大部分工人来说，由于工会保护、劳动保护立法和舆论的力量，劳动力价格的这种下降已经受到了很大的限制。第三，价值理论假定，工人不能干涉企业主必须与之分享剩余价值的那些食客，首先是地主。这一点也已逐渐开始被事实推翻。例如，只要工人还是无组织的并且作为立法方面的贱民来面对企业主，那么把对地价征税这样的问题与其看成与工人有利害关系的事务，不如看成有产者彼此之间的争端，就是正确的。^①但是这一前提越消失，那么地租下降不会导致资本利润提高而只会导致实在的最低收入^②的提高这一事实的确定性就越增加。反过来说，地租的继续存在和继续发展如果不受阻碍，长久下去就会使工会、合作社等等在提高工人生活水平这一方面所能取得的好处成为泡影。

这是顺便说说的。我们可以确定不移地认为，消费合作社现在已经证明是一个重要的经济力量，如果说其他各国在这一方面还落在英国后面，那么它在德国、法国、比利时等国毕竟获得了同样强有力的地盘，并且日益广泛地扩展。我不来引用数字了，因为事实大家都知道，而老是举数字会令人厌烦。当然法律诡计能够妨碍消费合作社的推广

① 不过我只承认“与其”，因为即使在那时，这件事也并非对工人毫无物质利益的。

② “实在的最低收入”在第一版中作“最低生活”。——编者注

和它们的内在可能性的充分发展，而消费合作社的繁荣本身又取决于经济发展的一定水平；但是在这里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指出合作社究竟能有什么作为。如果说，我们今天所知道的那种合作社，既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在某一时候掌握商品的全部生产和配送，如果说国家和地方自治机构中的公共服务的日益扩展的领域从另一方面对它加以限制的话，那么整个说来毕竟还有一个如此广泛的场地留给它，以致人们有理由对它抱有很大的期望，却不会陷入上述的合作社空想中。如果说在略多于 50 年的时间内，一个以罗契得耳织工的 28 镑^①开始的运动发展成了拥有 2000 万镑资本的运动，那么的确需要有极大的勇气，才会打算预言我们距离这一增长达到限界的时刻有多近，以及运动的哪些形式还沉睡在未知的未来年代里。^②

许多社会主义者不大喜欢消费合作社，因为它太“资产阶级性”了。在消费合作社里，以薪金雇用职员，以工资雇用工人，赚取利润，支付利息，并且为红利的多少争吵。的确，如果人们坚持形式，那么例如说小学校就是比消费合作社更加社会主义得多的机构。但是公共服务的完善化是有它的限度的，而且需要时间，而在这过程中消费合作社是工人阶级最容易加入的合作社形式，这正是因为它是“资产阶级性”的。相信社会能够用两只脚跳进一个同它现在的样子正相对立的组织和存在

① 1844 年英国罗契得耳的七个织工以 28 镑的资金创办了第一个消费合作社，称为“罗契得耳公平先锋社”。——编者注

② 自从本书出版以来，工人阶级的消费合作社运动在德国的规模和力量已大为增长，不久就可同英国的运动匹敌了。1913 年有 1435 个消费合作社，社员 1946437 人，其中的 1120 个社及其 1621195 位社员属于 1903 年创立的德国工人消费合作社中央联合会，而这一进展主要应归功于中央联合会和 1894 年产生的德国消费合作社的批购合作社，两个组织都表现出巨大的活力和业务远见。加入中央联合会的各消费合作社的资产在 1913 年达到大约 22100 万马克的水平，自营生产的销售额达到大约 1 亿马克。本书可以自称是在德国指出工人消费合作社的社会政治意义和潜在力量的第一部较大的社会民主主义论著。运动本身并不需要这种激励，本书出版时它已经存在，并且（即使本书不出版）它也会依靠自己的力量开辟进一步的道路。但是它从新的世纪开始以来所取得的光辉进展，是得到一个思想流派的推动的，而本书对这一流派作了深刻的表述。——补注

方式，这是一种空想；打算从合作组织的最困难形式开始，同样也是或者曾经是空想的。

我还记得，当我的朋友、布鲁塞尔的路易·贝尔特朗德 1881 年在库尔^①的代表大会上开始就合作社问题发言时，我是抱着什么样的理论怜悯的感觉倾听他的。我想，一个平素如此明理的人怎么还能指望从这种手段得到某些东西呢！后来在 1883 年，当我知道“根特前进社”^②的时候，其中的面包坊我总还能够理解，顺便还卖一些内衣、鞋子等等，毕竟也没有什么坏处。但是当“前进社”的管理人对我谈起他们进一步的计划时，我又想道：你们这些可怜的家伙，你们会破产的。他们并没有破产，而是镇静地，眼光清楚地沿着阻力最小的路线进行了工作，并且创造了同他们本国的环境相适应的合作社形式，这种形式证明自己对于比利时的工人运动有巨大价值，它提供了一个坚实的核心，使这一运动的到那时为止一直是分散的分子能够围绕这一核心而结合起来。

要想完全弄清楚一件事的种种可能性，重要的正是在于人们如何理解这件事。

简言之，合作生产将得到实现，哪怕实现的形式很可能与合作制度最初的理论家所设想的形式不同。暂时它仍旧是实现合作社思想的最困难的形式。上面已经提到，英国的合作社拥有的资金比拉萨尔为他的合作社计划所要求的 1 亿塔列尔还多。而如果事情仅仅是财政问题，那么它们还能支配与今天完全不同的另一些资金。自由加入的互助基金会，工会，都不再知道可以在哪里安放它们收集的基金（工会现在要求政府允许它们把基金存放在储蓄银行里，使它们可以得到比政府付给资本家的更多的利息）。但是合作生产恰恰不是或者不仅是一个财政资金的问题。它也不是在一个已经塞满的市场上建立新工厂的问题。廉价购买现成的设备优良的工厂的机会并不缺少。它在很大程

① 瑞士地名。——编者注

② 比利时东佛兰德省首府根特地方的一个合作社。——编者注

度上是一个组织和管理的問題，而在这一方面还有很大的缺陷。

我们刚刚在英国合作社的中央机关刊《合作新闻》上的一篇文章中看到这一个问题：“我们所必需的首先是资本吗？”文章的作者以坚决否定的口气回答了这一问题：“正像我们看到的那样，我们目前能支配几千万镑，这些钱只等着被用在合作事业上，而毫无疑问另一个1000万镑还能迅速地筹集起来，如果我们完全能够在我们的运动中有益地使用这笔钱的话。因此我们不要隐瞒这样的事实——因为它是事实——，即甚至在目前的时刻，合作界中需要更多的智慧和能耐更甚于需要更多的钱。如果有可能遵循不买任何不是在纯粹合作的条件下制造和贩卖的东西这一理想而生活的话，我们中间将有多少人会这样做呢！我们中间有多少人没有一再尝试在不能十分满意的情况下使用合作社员制造的货物呢？”（《合作新闻》，1898年12月3日）^①

换句话说，单是资金还不能解决合作劳动的问题。撇开别的前提不谈，合作劳动需要它自己的组织和它自己的领导人，而这两者都不是能够咄咄立致的。二者都必须经过选拔和考验，因此一个像革命中间那样大家的情绪都很兴奋、大家的热情都很激动的时刻，是否能以某种方式促进这个在平常时期已经被证明为如此困难的问题的解决，这就不仅是值得怀疑的了。根据合乎人情的判断，情况必然是恰恰相反的。^②

甚至英国批购合作社的拥有充分资金和掌握足够的销售可能性的各生产工场，正像它们的全体大会的报告和辩论所表明的那样，也往往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使它们的产品敌得过私营工业产品的竞争。

不过自营生产的日益增长的数字也说明，问题是能够解决的。甚至有许多生产合作社已经懂得按自己的方式解决它。我们在上面说过的低利润率，并不适合所有的社。但是如果依次检查一下，我们就会发现，除了极少的例外，经营得最好的是那些由工会或消费合作社

① 本段引文根据英译本第126页所载英文原文译出。——编者注

② 关于这一点参看补遗章。——补注

供给资金的生产合作社，它们主要不是为职工的利润而是为一个更为广大的整体的利润而生产，职工是这一整体的成员。或者可以是这一整体的成员，如果他们愿意的话——可见这无论如何是一种更为接近社会主义思想的形式。关于这一方面有从工人股份合作社联合会 1897 年度报告中取来的一些数字。它是有关 1896 营业年度的：

合作社名称	入股者 人数	工人 人数	入股	借入	收 益	
			资本 (马克)	资本 (马克)	金额	比率
粗斜纹布(摩勒 斯金)纺织厂 (赫布登桥)	797	294	528340	129420	96580	14.7
壁炉附件工厂 (达德利)	71	70	40,800	31,360	23,100	32
制鞋厂(克特临)	651	(210?)	97800	75720	40020	23
服装厂(克特临)	487	(50?)	79160	35660	28240	24.6
制鞋厂(累斯特)	1070	-	197580	286680	49680	10.25
制锁厂(沃尔索尔)	87	190	52280	48260	22080	9.24
针织品厂(累斯特)	660	(250?)	360160	246540	56040	22

所有这些工厂不用说都支付工会规定的工资和遵守标准劳动日。克特临的制鞋厂采用 8 小时劳动日。这一工厂一直在不断发展，现在又在它的符合最现代化要求的厂房上增建了一个新翼。关于入股人数应当说明，几乎所有的工厂的入股人中都有很大数目的法人（消费合作社，工联等等）。例如赫布登桥的粗斜纹布纺织厂的社员是这样划分的：组成工厂人员的 297 名工人，出资本 147960 马克，200 个厂外个人出资本 140640 马克，300 个团体，出资本 208300 马克。借入资本大部分由社员储入的存款组成，支付 5% 的利息。分配收益时所根据的原则是相当多种多样的。某些工厂付给入股资本的利润率比付给工资总额的利润率略高，但是克特临的制鞋厂 1896 年上半年度只付给股东 7.5% 的红利，却付给工人 40%（按工资计算）的红利。顾客也按所购买的商品得到同样比

率的红利（由此可见这一个社同买主合作社相近）^①。

在累斯特的较小的合作制鞋工厂之一中的分配情况与此相似。大多数生产合作社的销路，即使不说是几乎全部，也有很大一部分是在合作界中找到的。

我不想在这里详细论述合作制的其他形式（预借和信用合作社，原料和仓库合作社，奶场合作社等等），因为它们对于雇佣工人阶级说来没有什么重大意义。不过鉴于小农（他们即使不是工资领取者，但毕竟也属于工人阶级）的问题对于社会民主党所具有的重要性，同时也鉴于手工业和小工业至少就人数来说起着极其可观的作用这一事实，因此也必须指出合作制在这些阶层中所获得的蓬勃进展。共同购进种子、共同购买机器等等、共同出售产品的好处以及取得低利贷款的可能性并不能挽救已经破产的农民，但是对于成千上万的小农来说，这是保护他们不致破产的手段。关于这一点是不能有任何怀疑的。关于还不至于成为细小农的小农经济的坚忍性和丰饶性，完全撇开经营统计给我们提供的数字不谈，今天也存在着异常丰富的材料。要像一些著作家那样说在大经营和小经营的优越性方面适用于农业的规律正好同适用于工业的相反，恐怕还嫌过早。但是像下面这样说并不为过分：差别非常大，资本雄厚、设备完善的大经营同小经营相比的优越性并不显著，因此小经营在充分利用合作制的情况下就能弥补很大一部分了。机械力的利用，信贷的获得，销路的更好保证——这一切能使农民接受合作社，而农民经济的性质使他比大农场主更容易克服偶然的损失。因为大多数农民还不仅仅是商品生产者，而是自己生产自己最必需的食品

① 为了具体了解，这里举出下列数字：这一半年度：

股东（除利息外）	得到	1164 马克
顾客	得到	8325
工人	得到	8068
管理委员会	得到	700
用于教育目的的基金	得到	525
用于补助目的的基金	得到	1050

的一个可观的部分。^①

在一切文化先进的国家中，合作制的规模和活动领域都在迅速增加。比利时、丹麦、法国、荷兰，近来还有爱尔兰，在这一方面都显示了一幅同德国的一大部分不相上下的图景。对于社会民主党来说，重要的是深入考察农村中的合作运动问题及其影响，而不要从统计中寻找先入为主的小农阶层破产理论的证据。关于强迫出卖、抵押负债等等的统计在许多方面是能迷惑人的。财产在今天无疑比过去更为流动，但是这一流动性不是仅仅朝一个方向起作用的。到目前为止，强制出卖所打开的缺口仍旧一再被填补起来。

〔这些一般的叙述在这里也许已经够了。我不需要阐述一个专门的农业纲领。但是我坚决地相信，一个这样的纲领不如说必需比迄今所做的那样更多地考虑到有关农村合作社的现存经验，而在这样做的时候重要的事情与其说是在于说明农村合作社就长远来说不能帮助小农，不如说是在于指明必须用什么办法来使农村合作社完善和扩大。在小农经济占支配地位的地方，由于一切可能的原因，农业工人的工会或其他组织是一种怪念头。只有通过合作形式的扩大，才能在那里导致农业工人摆脱雇佣关系而得到上升。〕

非常值得注意的是德勒斯登的威特费尔特博士在《社会实践》第8卷第13号上所报道的关于法国农业合作社的活动和成绩的事实。根据他的报道，目前在法国有组成10个联合会的约1700个农业（农民）合作社，共有70万以上的社员。“这些专业合作社起初作为农业饲料和肥料的购买合作社而进行活动，它们的中央总部（Cooperatives Agricoles^②）已经在这些商品的贸易中具有了一定的影响。它们进一步共同购买打谷机、刈草机等等，或者设立排水、灌溉设备等等。它们建立

① 普鲁士的3到20公顷（7.5到50英亩）的小土地占有者在1895年到1907年间从698357户增加到760315户，它们所占的土地面积也大为增加，而大土地占有的土地面积却减少了。——英译本第128页注

② 农业合作总社。——编者注

了畜牧合作社、奶场、干酪厂^①、面包坊、面粉厂、罐头工厂等等，并且已经成功地把它们的农业产品在个别部门中的销售掌握在自己手中了。”它们追求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不满足于同在法国也正在扩展着的消费合作社建立联系，而是自己创立了消费合作社。“例如在拉·罗舍尔、里昂、第戎、阿维农、陶奈尔等地就是这样。创立像屠宰场、磨坊、面包坊这样的合作社也属于这一类，它们一半是农业生产合作社，一半是消费合作社。”仅仅在下夏朗德这一个县就有 130 个这样的面包合作社。此外这些合作社也创办罐头工厂、腊肠厂、淀粉厂、通心粉厂，“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在这些工业同农业相结合的限度内力图实现工业的地方化”。多数合作社接受工人为社员，卡斯特尔瑙达尔第的合作社的 1000 名社员中有 600 个工人。此外合作社还从事设立各种各样的互惠机构：保险、仲裁法庭、人民秘书处、农业学校、谈话会。

以上是《社会实践》的报告。

同这一报告有关而提出来的第一个问题是：工人在这些合作社中的实际权利是什么？报告只是极为简单地说到职员和工人的收益分配，但是对此还能作很多种解释。无论如何，接受工人加入合作社暂时并没有使下一事实有任何改变：这些合作社作为农业合作社基本上是业主合作社。这一点由以下的事实就已经可以明白：尽管它们实行了这样多的合作性的安排，^②但是在它们那里有一件事迄今一直不具有合作性：农业本身，就是说田地和牧场的经营以及真正的畜牧业。同农业结合的、以农业为出发点的劳动是合作地或者至少是为了合作社而进行了，但是农业本身在这里和别的地方仍旧没有合作劳动。^③难道对

① 根据 1898 年 11 月 15 日的《解放报》，仅仅在法国就有 2000 个制干酪合作社，其中多数在汝拉和两个萨伏依市。——法译本第 191—192 页注

② 方括号以内的几段在第 2 版中已删去。——编者注

③ 例如在迅速兴起的爱尔兰农业合作社中也是这样。这些合作社在 1889 年从一个有 50 名社员的小合作社开始，但是到了 1898 年 3 月已经有 243 个社和 27322 名社员，其中有许多农业工人（Cottiers）。

（它们的数目和效能从那时以后又有了显著的增加。参看本书 147 页上的关于爱尔兰合作奶场生产增长的数字）

于农业来说合作劳动不如单干有利吗？还是仅仅是农民所有制在这里起妨碍作用呢？

农民的所有制，即土地在许多所有主之间的分割，形成土地的合作耕种的巨大障碍，这是已经屡次强调过的。但是它不是唯一的障碍，或者用另外一种说法：它增加土地合作耕种的实际困难，但是它并不总是这些困难的原因。劳动者在地域上的距离，以及一大部分农活的个体性质在这一方面同样也起一定的作用。农民合作社的确还是很年轻的，它们继续发展下去也有可能克服这些障碍或者——在我看来这样是最有可能的——被迫一步一步地越过它们目前的框框。但是暂时还不能指望这一点。

甚至为合作社经营的农业生产目前也还是一个未解决的问题。英国的消费合作社同任何企业所做的生意都没有同自己的农场的生意那么坏。英国劳动署第三次年度报告（1896年）断定106个生产合作社有8.4%的平均利润。其中的6个合作农场和奶场只有2.8%的平均利润。任何地方的农民从土地所得的收成都比不上苏格兰。苏格兰的小麦、燕麦等的亩产量比英格兰高得多。但是苏格兰合作社的有优良机器设备的、代表25万马克资本的农场却证明自己是一个大失败。它在1894年获得0.6%的赢余，1895年受了8.1%的损失。但是真正的农业合作社的情况怎样呢？农业工人的生产合作社是否比工业工人的生产合作社呈现更好的前景呢？

因为缺乏实践中的这一方面的充分的例子，所以这一问题就更加难于回答了。这类合作社的一个古典的例子，著名的拉拉兴合作社，存在的时期太短（1831年至1833年），而在存在过程中受到它的创办人王德勒尔和他的代理人克莱格的影响太大，因此不能成为独立的农业工人合作社生存能力的充分有效的证据^①。它只证明在一定情况和前提

^① 正像机智的欧文尼特·芬奇在1838年幽默地描写的那样，它的结构是托利主义、辉格主义和激进主义的一切长处结合，却没有它们的缺点。“它同君主制和托利主义一样具有目的上和行动上的一切力量和统一性，同辉格主义一样具有一切中庸、手腕、预防和预测措施，有比激进主义更多的自由和平等”。王德勒尔先生是“国王”，由会计主任、秘书和仓库管理员组成的管理部是“上院”，工人委员会是“人民代表机关”。

下的集体经济的巨大好处。

共产主义移民区的经验也是一样。这种移民区在事实上或道德上的隐居地里往往在想象得到的最不利的情况下也能较长期地繁荣。但是一旦它们达到较大的富裕并且同外界有了密切的交往，它们就迅速地衰败了。只有强大的宗教纽带或者其他的、在它们和周围世界之间建立起隔墙的宗派主义精神才能使这种移民区即使在富裕起来时还能团结一致。但是人类要想在这种移民区中感到幸福，就必须以某种方式变得愚钝，而这就证明，它们永远不会成为合作劳动的普遍形式。对于社会主义来说，它们同纯粹的工业生产合作社处于同一阶段。但是它们为集体经济的优越性提供了光辉的证明。

根据这一切事实和有知识的地主在分成租佃和农业工人参加收益分配等方面所取得的经验，弗·奥本海默尔在已经引述的那本书里阐述了一种农村合作社的思想，他称此为村落合作社。它应当是一种农业工人的合作社，或者作为这种合作社而开始，并且把个体经济同集体经济结合起来，或者把小经营同合作制大经营结合起来，就像今天大田庄中的情况一样。在大田庄中，按多少算是高的租金把小块的边缘零细土地出租给农业工人，他们往往以真正模范的方式耕种这些土地。奥本海默尔设想村落合作社中的分割方式与此相应，只不过压低中心经济（那些小经营围绕它而形成集团）的劳力价格这一意图当然在这里不起决定作用，而在这里仅仅是为了给每一个别的社员提供机会，使他能 在足够大的一片土地上享受自营经济的一切道德上的愉快，并且把他的为合作社中心经济所不需要的那一部分劳动力用在那种耕作上，这种耕作或者将使他取得最高收成的希望，否则就是在最大程度上投合他的个性。但是此外合作社还应当利用现代大经营的一切长处，并且应当为社员的营业等方面的需要创立一切可能的合作或互助机构。合作社应当通过既得产品的加工和允许手工业者入社而日益获得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的居留地的性质，就像欧文在他的国内移民区和其他的社会主义者在他们的共产主义计划中所想象的一样。只不过奥本

海默尔试图严格停留在自由合作原则的基础上。加入村落合作社，只应当提到经济利益，只有这种利益能保障它们不致产生工业生产合作社的排他性。同后者相反，它们不仅是卖主合作社，而是买主和卖主合作社，而这一情况形成它们的获得信贷的基础，并且保护它们不受农业中资本主义大经营今天所受到的那些震动。

这里不是更为详细地讨论奥本海默尔的建议以及它所根据的理论的适当地方。但是我认为必须说到这一程度，说明在我看来，它们并不应当受到像一些社会民主党报刊加于它们的那种轻蔑的判断。可以怀疑，事情是否能精确地按照奥本海默尔阐述的形式进行，或者将来是否能如此。但是他所阐述的基本思想是如此地建立在对经济形态的科学分析上，如此地同合作实践的一切经验相吻合，以致人们多半可以说，如果真正农业的合作经营一般说来有一天会实现的话，它所采取的形式几乎不会在基本上与奥本海默尔所阐述的有所不同。^①

在批评这类建议时多半要想到大规模的剥夺，但无论如何，这种剥夺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变出有组织的机构来，因此即使最强大的革命政府也不免要寻求一种关于农业中的合作劳动的理论。奥本海默尔为这样的理论收集了一份极其丰富的材料，并且加以精辟的、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思想作了完全公正的评价的、系统的分析，仅仅这一点就已经

① 在最近的英国合作社代表大会（彼得伯罗，1898年5月）上，一位代表，曼彻斯特的J.C. 格雷先生作了关于“合作社和农业”的报告，他在报告中根据对英国取得的一切经验的客观考察最后作出了一项同奥本海默尔的计划非常相似的建议。“土地应成为公有财产，一切必需品应当合作地购置，产品也应当合作地出售。但是在土地耕作方面，在适当考虑到不致侵犯集体利益的情况下必须对个人利益加以照顾。”（《合作和农业》，曼彻斯特1898年版，第9页）

法译本第198页注：在我写了这本书以后，我有机会在一份美国杂志《大西洋月刊》上读到一篇关于犹他州摩门教徒移民区的经济组织的很有教益的文章。摩门教徒的极其新奇的经济成就被说成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把集体制同个体制结合起来，这同前面所说的想法很是接近。

使《村落合作社》一书值得研究了。^①

关于农业合作社这个论题，这里还要说明一点。社会主义者只要是一个属于政党的人，他就只能以满意的态度欢迎今天的从乡村到城市的人口移动。这一移动使劳动大众集中化，使头脑反叛化，并且无论如何要促进政治解放。但是作为想得比眼前更远的理论家，社会主义者也必须说，这一移动长久下去可能会变得过分。众所周知，把农村居民吸引到城市里来，比使城市居民习惯于农村和农村劳动要不知容易多少。因此迁入城市和工业中心的人口流动不仅增加今天的统治者的问题。我们试举工人民主取得胜利后使社会党当政的场合为例。根据过去的一切经验，这一胜利的直接后果多半将是暂时还要大为增加进入大城市的人流，至于“农业用的工业大军”到那时是否会比1848年在法国时更乐意被送下乡，是有几分可疑的。但是撇开这一点不谈，农村人口减少的情况发展得愈厉害，创立有生命力和有效能的合作社在任何情况下都将是一个愈加困难的任务。为了可以从存在这种合作社的范例得到好处，即使以巨型城市的多少比较缓慢的膨胀为代价也不算太高。^②

① 就我所知，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作过按全部规模实现奥本海默尔的计划的尝试。在这里和那里所作的部分运用它的思想的尝试，对于作为整体的这一计划来说是没有证明力的。有趣的是，了解犹他州摩门教徒移民区的人把它的辉煌的经济成就归因于一种看来同奥本海默尔所阐述的非常相似的合作形式。——补注

② 我高兴地看到，卡尔·考茨基在他于1899年出版的关于农业问题的著作中认真地吧农村合作社的问题列入他的研究范围之内。他所说的在把农民小经营改造成经营农业的合作社时所遇到的障碍，同奥本海默尔关于这一题目的阐述完全吻合。考茨基指望从工业方面和通过无产阶级夺取政治统治来解决问题。据他说，发展在今天已使农民愈来愈依存于资本主义式经营的烧酒坊、啤酒坊、糖厂、面粉厂、奶油和干酪厂、葡萄酒厂等等，并且使他们成为其他种类的资本主义企业（像砖瓦场、矿山等等）的半时工人，细小农民今天为了弥补自己经济上的亏空，在这些企业里从事临时性的工作。随着这一切企业的社会化，农民将成为“社会的工人”，成为社会主义合作制的企业的半时工人，而另一方面，无产阶级革命必然要导致一大部分小农今天所依赖的农业大经营改变为合作经营。小农经济就这样日益失去根基，它们融合成合作经营时所遇到的困难日益减少。不动产抵押的国有化和废除军国主义还将使这一发展更加容易。

但是对于工业工人说来，合作社提供了这样的可能性：一方面对抗通过商业的剥削，另一方面带来在其他许多方面使他们的解放工作容易进行的手段。工人在窘迫的时候即工厂歇业等等的时候可能从消费合作社得到怎样的支持，这是现在人所共知的。英国各大消费合作社对于受到歇业抵制的矿工、纺工、机械制造工的支持，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除此之外，这里还要说明，生产合作社在工人为生活状况的斗争中也能对他们起很大的作用。在累斯特和克特临，合作制鞋厂使全区的标准工资率维持同它们一样的水平。沃尔索尔的合作制锁厂起了同样的作用，在那里歇业是不可能的。伯恩列的“自助”合作纺织厂在1892年到1893年各工厂歇业期间不停地开工，并且同各消费合作社联合起来，通过这一方法对迫使企业主屈服出了一臂之力。总之，正像1898年11月2日的《工联主义者》所说的：“凡是在国内存在着这种（生产）合作社的地方，人们就习惯于不仅为了利润而且也用这种方式从事制造，这种方式使工人不致在工厂门口放下自己的大丈夫气概，而是带着自由的感觉和有礼貌地行动着，这种自由感和礼貌是一个自由的、建立

所有这些话里有很多正确的东西，只不过我认为考茨基陷入了这样的错误，即对于按照他所喜欢的方向起作用的力量在很大程度上作了过高的估计，而对于朝另一方向起作用的力量同样也作了过低的估计。他所列举的工业企业，有一部分正在沿着不是成为农民经济的支配者而是成为农民合作社的附属物的道路顺利前进。就另一部分例如酿造业来说，同农民经济的联系太不密切，因而它们的变化不可能对农民经济的经营形式产生强烈的反作用。此外在我看来，考茨基过多地被他在哪里和那里所使用的激烈的词错误地引导到一些推论，如果那些词普遍适用，这些结论就是对的，但既然那些词只适用于现实的一部分，因而这些推论也就不能自命为普遍适用了。说得更清楚些就是：在考茨基看来，小农的生存是悲惨的。对于一大部分小农，这样说也是有道理的；但是就另一部分来说就是严重的夸大，正像把小农说成是近代的“野蛮人”这句话一样，今天在许多场合已经被发展推翻了。一个类似的夸张是，把小农在邻近的田庄上所提供的劳动（因为他自己的田庄并不占去他的全部力量）说成是“奴隶劳动”。由于使用了这一类用语，一些使人假定那些阶级具有某种感情和倾向的概念就被确定下来，而实际上这些阶级只是在例外的情况下才具有这些感情和倾向。

虽然我因此不能赞成考茨基关于农民经济可能有的发展的全部阐述，但是我却因此更加同意他所提出的社会民主党今天应遵循的农业政策的纲领的基本原则。不过关于这一点将在其他地方论述。

在平等权利之上的社会中的市民意识所创造出来的。”^①

到目前为止，生产合作社只是在以消费合作社为后盾的地方或者本身在组织上接近这一形式的地方才表现出生命力。这就指点我们，在最近的将来必须按照哪一方向寻求工人合作社的最有成功希望的继续发展。

第三节 民主和社会主义

1848年2月24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的最初的曙光出现了。

谁说到普选权，就是发出和解的呼声。

斐迪南·拉萨尔：《工人纲领》

一、民主和国民经济

“消费合作社对于商品贸易中的利润率的影响，和工会对于生产中的利润率的影响一样，组织成工会的工人为了提高生活费的斗争，从资本家方面看来是一场工资率反对利润率的斗争。要说工资水平和劳动时间的改变对于价格根本没有任何影响，这当然是把问题过分地一般化了。只要生产技术保持不变，那么不管工资提高还是降低，消耗在每一单位的某种商品上的劳动量当然保持不变。但是劳动量如果不以劳动的某一种价格为基础，它对于市场来说就是一个空洞的概念，因为那里的问题不在于全部生产的抽象价值，而是在于不同的商品品种彼此相比的相对价值，而工资水平对于这一价值并不是无足轻重的因素。如果某一工业的工人的工资提高了，那么有关的产品的价值同一切没有这样地提高工资的工业的产品价值比起来，也就按相应的比例提高

^① 詹金斯，英国制面包帮工联合会书记，在1898年11月的《劳工合作》杂志上说：“我曾经不止一次在工会代表大会上公开宣称，合作社一般说来是制面包帮工在这一国家所能得到的最好的朋友，而且我坚持这一声明……我和我的工会都同大消费合作社及其面包房维持着最好的关系并且希望一直如此。”

了；如果不能做到通过改善技术来抵消工资的提高，那么有关的企业主阶层就必须或者相应地提高产品的价格，或者遭受利润率方面的损失。在这一方面，不同的工业的情况是不同的。有些工业由于产品的性质，或者由于它们的垄断性组织，是相当地不依赖世界市场的，在这些工业中，工资提高多半有价格的提高伴随着，因而利润率不仅无须下降，而且甚至可以随着提高。”^①相反，在世界市场工业以及一般说来在一切存在着根据不同条件制造出来的产品互相竞争而只有比较便宜的一方才能称霸市场这种情况的工业中，工资的提高几乎总是起降低利润率的作用。当企图通过相应地减少工资来抵消由于争夺销路而被迫实行的减价这一尝试，因为遭到组织起来的工人的抵抗而失败时，也产生同样的结果。通过改进技术来抵消，这通常是意味着投放在机器和其他劳动资料上的资本更多，也就是利润率相应的降低。最后，工人的工资斗争事实上也只能是为了防止牺牲工资率来提高利润率，不管斗争者在一定的时刻在多大程度上意识到了这一点。

为了劳动时间的斗争，除了其他意义之外，也像上面所说的一样是一场为了利润率的斗争，这就用不着还在这里特别指出了。如果说较短的劳动日还没有产生直接缩小对一向的工资提供的劳动量这样的后果——众所周知，在许多场合是发生相反的情况的——，那么它毕竟间接地导致工人生活要求的提高，从而使工资的提高成为必要。

一次导致价格提高的工资提高，在某些情况下不一定是整体的损失，但是它所起的作用也往往是害多于利的。例如，无论是一门工业仅仅为了一小撮企业主的利益而强行垄断价格，还是这门工业的工人也在这种从整体榨取的赃物中分得某一份额，对于社会来说是没有有什么特殊差别的。因此垄断价格始终毕竟是和产品廉价——这只有通过把

^① 卡雷的协调论所根据的除了别的以外也有这个局部真理。某些采掘工业，建筑业等等提供了例证。

工资降低到平均最低率之下才能做到——同样值得反对。^①但是一次仅仅影响利润率的工资提高，在目前条件下一般说来只会对社会有好处。我特意说“一般说来”，因为在这方面也有出现相反情况的场合。如果某一营业部门的利润率被压低到比一般最低利润率更低的程度，那么这对于有关的国家来说就意味着失去这一工业以及这一工业回到工资低得多、劳动条件坏得多的那些国家去。从世界经济的角度出发，可以认为这是无关紧要的，因为就长远来说会以某种方式出现拉平的情况；不过对于当事人来说，这毕竟只是一种无力的安慰。这种离开本国对于当事人以及对于公众来说，在当时而且往往在相当长时期内不如说是意味着实在的损失。

不过幸而这种极端的情况是极其少见的。通常是工人完全知道他

① 上文已经写好时，我收到了《新时代》第14期上考茨基的文章，他在文章中把最近在英国中部各郡出现的同业联合会（我在以前的一篇文章中曾经对此加以描述）说成是“和资本家集团联合起来掠夺公众的”工会，是“英国工厂主腐蚀工会运动的工具”。它们所进行的不是反对资本的斗争，而是“同资本携起手来反对社会的斗争”。（《新时代》，第17年卷第1册第421页）。从我在本书中接下去讲的话和我关于合作制的阐述可以清楚地看出，对于考茨基在那里所指责的那一倾向，我决不是视而不见的。对于反对公众的联合会，不管它是资本家的还是工人的联合会，我在原则上也像考茨基一样反对。尽管如此，我还是认为他的批评是夸大的。我不能从根本上把一个像同业联合会那样的反对肮脏竞争和无限制的跌价倾销的工业组织当作为了掠夺公众而组成的联合会而加以谴责。即使在很大一部分托拉斯中到目前为止还很少能发现有这种掠夺的迹象。不如说，在利用肮脏竞争来压低价格这一点上，往往存在着一种在我看来是完全不能赞许的对于生产者的掠夺。简言之，我认为有日益扩展之势的同业联合会（目前正在玻璃工业和陶瓷业中采用它进行着讨论；德国的工资协议是同它相当的）肯定不是一种不需要担心的现象，但是它正像它的先驱（混合工资委员会，流动工资表等等）一样，应当被判定为对工业中无政府状态的对抗运动的自然产物。它们并不比长期以来由组织起来的工人行使的工会政策的一整套其他手段更加威胁整体的利益，这些手段仅仅由于这一事实，即它们在形式上——不是事实上——是针对资本的，迄今一直得到社会民主党的默认，即使没有得到它的支持。

不过如果考茨基假定英国工会今天在原则上反对流动工资，那他就弄错了。它们仅仅反对“无止境的”（“bottomless”）流动工资。对于规定一种足敷通常生活的最低工资作为“止境”、并且具有考虑到生产中的技术变革的条款的流动工资，他们是根本没有任何异议的。

们的要求能够提到什么程度。利润率也受得住相当强的压力。资本家在放弃自己的企业以前，宁可尝试一切可能的办法，通过别的方式来弥补增加了的工资支出。各不同生产领域中的利润率的巨大的实际差别表明，在理论上构想一般的平均利润率是比较快的，比它的哪怕只是近似的实现都要快。这样的例子确并不少见：甚至当新的资本怀着价值增殖的渴望进入市场时，却不到暗示有最高利润率的地方去寻求投放，而是像人们选择职业时一样受到某些考虑的支配，在这些考虑中，利润的水平是退居次要地位的。因此甚至利润率平均化的这一最有利因素也只是不规则地起着作用。但是已经投放的资本，（这在任何时候都占远为更大的比重）由于物质方面的原因已经不能跟着利润率的变动而从一个生产领域转入另一生产领域了。简言之，人的劳动价格提高的影响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所引起的后果，一部分是技术的改进和工业组织的改良，一部分是劳动收益的更为平均的分配。二者对于普遍福利来说都是同样有益的。人们可以在附加一定限制条件的情况下把德斯杜特·德·特拉西^①的名言改成这样来用于资本主义国家：低利润率表示人民群众的更高的福利。

工会或工联从它们的社会政治地位来说是工业中的民主因素。它们的倾向是摧毁资本的专制主义，使工人能够对工业的管理发生直接的影响。关于应该争取使这种影响达到多大程度的问题，存在着很大的意见分歧，这是很自然的。也许在具有某种思想方式的人看来，为工会提出比在工业中无条件的决定权更小的要求，就已经是违背原则了。另外一些人则认为，这种权利在现存情况下是空想的，正如同它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会是荒谬的一样，这一认识使他们否认工会在经济生活中能起任何持久的作用，只是暂时承认它是种种不可避免的罪恶中的较小的一个。有这样的社会主义者，工会在他们眼中只是一种示教的实物，用来在实践上证明除了

^① 德斯杜特·德·特拉西（1754—1836），法国唯心主义哲学家。他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在贫国，人民是安乐的；在富国，人民通常是贫苦的。”参看《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746页。——编者注

政治革命行动以外的任何其他行动的无用。事实上工会在目前以及在不久的将来有十分重要的工业政策方面的任务需要完成，不过这些任务决不要求工会具有全能，甚至也不能容忍它具有全能。

把工会首先理解为民主的不可缺少的机关而不仅是暂时的联合，这一功劳应当归于若干英国著作家。顺便说一句，如果考虑到工会在英国比在任何其他地方更早获得重要意义，而英国在本世纪的最后 1/3 经历了从一个寡头统治的国家到一个几乎是民主国家的转变，那么这是不足为奇的。这一方面的最新最深刻的著作即韦伯夫妇的《英国工联的理论和实践》一书，被著者称为论述工业中的民主的论著，是有道理的。在他们以前，已故的托罗尔德·罗杰斯^①在他的关于经济历史观的讲课中（不过经济历史观同唯物主义历史观很少有共同之处，而只是在个别点上同它一致）曾经把工会称为工人合伙制（Labour Partnership），这在原则上是和他们的说法殊途同归的，但是它同时也说明了工会职能在民主制中的扩展的界限，如果超越了这一界限，工会在民主社会中就没有容身之地了。不管企业主是国家，是地方自治机构，还是资本家，工会作为受雇于某一工业的全体人员的组织，始终只有在它满足于保持参与者的地位时，才能同时既维护这些会员的利益，又促进普遍福利。超出了这一点，它就总是有蜕化成具有垄断的一切恶劣特性的排他性团体的危险。它在这一方面同合作社一样。作为某一个整个工业部门的支配者的工会，是许多老一辈社会主义者的理想，它实际上只是一种垄断性的生产合作社，一旦它建立在垄断的基础上或者实行了垄断，它就是同社会主义和民主相对立的矛盾，不管它的内部体制是什么样子。它为什么同社会主义相抵触，这是用不着多说就明白的。同整体对立的合作制不是社会主义，正如一个寡头政治社会中的国营企业不是社会主义一样。但是为什么这样的工会和民主相抵触呢？

这一问题取决于另一问题：什么是民主？

^① 詹姆士·托罗尔德·罗杰斯（1823—1890），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著有《从经济上对历史的解释》（1888年）等书。——编者注

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似乎很简单。乍一看，不妨认为把它解释成“人民的统治”就算解决了。但是只要略加思考，我们就会明白，这样说不过是下了一个十分肤浅、纯粹形式的定义，而今天使用民主一词的人几乎全把它理解为不仅是一种单纯的统治形式。如果我们消极地说明自己的想法，把民主解释为不存在阶级统治，解释为一种社会状况的名称，在其中任何阶级都不能享有同整体对立的特权，那么我们就同问题更为接近得多。这样一来，也就已经是对于为什么垄断团体在原则上是反民主的这一问题的解释。此外这一消极的解释还有一个优点，它不像人民的统治一词那样给多数人压迫个人这一思想留有余地，而这一思想是绝对违背现代意识的。今天我们认为，由多数人压迫少数人是“不民主的”，尽管它起初曾被认为同人民的统治完全没有矛盾。^①

① 布朗基主义的前后一贯的主张者仍旧总是把民主首先理解为镇压力量。例如伊波列特·卡斯蒂在他的《第二共和国史》的前面写了一篇导言，它的最高潮是对恐怖统治的真正歌颂。导言中说：“最完善的社会是暴政在其中成为整体的事业的那一社会。这一点基本上证明，最完善的社会是魔鬼的〔即个人主义的〕意义上的自由在其中最少的那一社会……人们叫做政治自由的那一东西不过是用来装饰众人的合理的暴政的一个美丽的名字而已。政治自由不过是把若干个人自由献祭给人类社会的专制的神，献祭给社会理性，献祭给公约。”——“从这一时期〔从1793年10月到1794年4月，在这一时期内，吉伦特派，艾贝尔派，丹东派相继被砍头〕起真正开始了人类社会的这一永恒屏障即权威原则的再生。公安委员会（它是由当时情况决定的政府形式）在摆脱了温和派和极端派之后，在得到防止任何权力冲突的保障以后，获得了必需的力量和统一来站稳阵地和保卫法国免于迫在眉睫的无政府状态的危险……不，致第一法兰西共和国于死命的不是政府，而是议会分子，是热月的叛徒们。无政府主义的和自由主义的共和派（他们的种族蠢蠢布满法兰西）徒劳地继续进行老一套的诬蔑。罗伯斯庇尔始终是一个杰出的人物，不是由于他的天才和德性，这些在这里是次要的，而是由于他对于权威的爱好的，由于他的强大的政治本能。”

对于罗伯斯庇尔的这种崇拜在第二帝国以后就不能维持下去了。对于60年代中期走上舞台的、首先是反教会的年轻一代布朗基主义社会革命家来说，罗伯斯庇尔由于主张泛神论因而过分小资产阶级的了。他们一心信奉艾贝尔和阿那夏尔西斯·克洛茨。但是在其他方面他们是像卡斯蒂那样推理的，就是说他们像他一样把个人利益服从普遍利益这一正确思想发挥到极端。

补注：俄国布尔什维克的政治学说同卡斯蒂的阐述的内在的类似，是一眼就可以看出的。

正是按照今天的理解，民主这一概念包含着一个法权观念：社会的一切成员权利平等，而多数人的统治（人民的统治在任何具体的场合都将归结于此）就受到这一观念的限制。这一法权观念愈是被采用，愈是支配一般的意识，民主就更加同一切人的尽可能最高程度的自由具有同样的意义。

当然，民主同无法律状态不是一回事。民主同其他政治制度的区别，不可能是在于不存在任何法律，而仅仅是在于不存在规定或承认以财产、门第、信仰为基础的例外的那些法律，不在于完全不存在限制个人权利的法律，而是在于废除限制普遍的法权平等、限制一切人的权利平等的一切法律。如果说民主因此和无政府状态是根本不同的事物，那么仅仅因为在民主之下多数的决议起决定作用并且要求任何人都承认由多数决定的法律，就把专制、暴政等等字眼加于作为社会制度的民主，这就是或者可能是抹杀一切差别的无谓的概念游戏了。的确，民主不是反对被个人感觉为暴虐的法律的绝对屏障。但是在我们的时代存在着一种几乎是无条件的保证，这就是，一个民主社会的多数人不会制定持久损害个人自由的法律，因为今天的多数往往会成为明天的少数，任何压迫少数的法律都会威胁暂时的多数派本身的成员。真正内战时期的多数派暴政总要行使的东西，是和现代民主中的多数派统治根本不同的。不如说在实践中已经表明，一个现代国家中的民主制度存在得愈久，对于少数人的权利的尊重和照顾就愈增加，党派斗争就愈失去憎恨感。^①凡是认为没有暴力行动就不可能设想实现社会主义的人，也许会把这一点看成反对民主的论据，事实上在社会主义文献中并不缺少这种论调。但是凡是不醉心于空想观点（即认为现代民族国家在长期的革命灾变的影

^① 从这一观点看来很有意义的是，对我在无产阶级专政思想上犯的罪过的最激烈攻击来自欧洲最专制的国家——俄国——的国民，这一攻击在萨克森得到最多的共鸣，而萨克森的统治者为了维持秩序，牺牲了还算民主的邦议会选举权，采用了不公正的三级选举制。与此相反，在比较民主的国家的社会主义者那里，有关的文章却部分地得到无保留的赞同，部分地受到广泛的承认。〔写于1899年！〕

响下将分解为无数彼此完全独立的集团)的人会把民主看成不仅是一种只有作为工人阶级结束资本主义的工具才是良好的政治手段。

民主是手段，同时又是目的。它是争取社会主义的手段，它又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形式。不错，它不能创造奇迹。它不能在像瑞士这样的工业无产阶级占人口少数(200万成人中还不到50万)的国家中使政治统治落到无产阶级手里。它也不能在像英国这样的无产阶级占人口绝大多数(即使还不是社会主义中的)十分显著的进步。在全国3/4的地方，公立的小学校一般是从那个时候起才存在的，在那以前英国只有私立学校和教会学校。入学的人在1865年达人口的4.38%，1896年却达到14.2%；1872年国家才只为小学每年单独支出0.15亿马克，1896年就支出了1.27亿马克。郡和市镇的管理学校和济贫事业的行政机构不再为有产者和特权者所垄断，工人群众在那里有着同最大的地主和最富的资本家一样的选举权。间接税不断降低，直接税不断提高(1866年征收了约1.2亿马克的所得税，1898年征收了约3.3亿马克，此外还要加上由于提高遗产税而得的至少8000万到1亿马克的额外收入)。农业立法摆脱了对于地主的财产绝对主义(Eigentumsabsolutismus)的恐惧，而一向只是在为了交通和卫生方面的目的才得到承认的土地征用权，在有关经济变化时原则上也被采用了。国家关于直接和间接受雇于它的工人的政策根本上起了变化，这是大家知道的，工厂法从1870年以来经历的扩展也是一样。这一切和欧洲大陆对它的不同程度的模仿，虽然不完全是，但基本上是要归功于民主或者有关各国所掌握的那一部分已经实现的民主的。如果说在个别问题上，政治上最先进的各

国的立法不像政治上相对落后的各国在急于行动的君主或他们的大臣的影响下有时能做到的那样迅速进行，那么从另一方面说来，在民主已经根深蒂固的各国，在这些事情上是不会发生倒退的。

民主在原则上是阶级统治的消灭，即使它还不是阶级在事实上的消灭。有人谈论民主的保守性，这在某一方面来说是正确的。专制主义或者半专制主义既使自己的支持者也使自己的敌人对它的能力的大小产生错觉。因此在专制主义统治着或者还存在专制主义传统的国家里，就有夸大的计划，夸大的言论，进退不定的政策，对于颠覆的恐怖和对于镇压的希望。在民主中，各党派和站在它们背后的各阶级很快就懂得自己的力量限度，而且任何时候只着手实现根据当时的形势看来能够合理地指望做到的事情。即使当它们把自己的要求抬得比认真考虑的稍高一些，以便在不可避免的妥协时——而民主就是妥协的大学——可以放弃，那么这也是有分寸的。因此在民主中即使是极左派也往往表现出保守的色彩，而改革因为是比较均衡地进行的，所以也显得比实际更为缓慢一些。但是民主的方向毕竟是显而易见的。民主制的选举权使它的持有者潜在地成为共同体的合伙者，而这一潜在的合伙长久下去一定会导致事实上的合伙。对于一个在数量上和文化上都不发达的工人阶级来说，普选权可以长期表现为选举“屠夫”本身的权利，但是随着工人的数目和知识的增长，它就成为使人民代表从人民的主人转变成人民的真正仆人的工具。如果说英国工人在议会选举时投旧党派的成员的票，从而形式上表现为资产阶级政党的尾巴的话，那么不管怎样，在工业选区里，这一“尾巴”叫头摇摆的情况远比相反的情况为多。即使完全不把 1884 年的选举权扩大连同地方议会的改革为英国的社会民主党争得了作为政党的公民权这一件事考虑在内的话。^①

在别的地方情况是否基本上不同呢？普选权在德国可能暂时曾经作为俾斯麦的工具为他服务，但是最后却迫使俾斯麦作为它的工具为

^① 英国的民主选举权从那时以来所得到的扩大，使工党有了成为执政党的希望。——补注

它服务。它可能一时曾经对易北河以东的容克有利，但是很久以来已经成了这一批容克害怕的东西。普选权曾经能够使俾斯麦在 1878 年有可能为自己锻造了社会党人法这一武器，但是这一武器也是在普选权上碰得变钝和发脆的，它后来终于被人借助普选权从俾斯麦手中打掉了。如果俾斯麦在 1878 年凭着自己当时拥有的多数而制定的不是一个警察性的非常法，而是一个重新把工人排除在选举权之外的政治性的非常法，那么他就可以在相当长时期内给予社会民主党比用前者所能做到的更加厉害的打击。当然在那种情况下他也会打中另外一些人。普选权从两方面说来都是颠覆的代替品。

但是普选权只不过是民主的一个片段，虽说是一个长久下去一定会像磁石吸引分散的铁屑一样把其他片段吸引过来的片段。这一过程固然进行得比许多人所期望的要慢些，但尽管如此，它还是在进展着。如果社会民主党在理论上也毫无保留地站到普选权和民主的立场上来，并且接受由此得出的一切有关自己的战略的结论，那么它就再也不能比这样更好地促进这一进展了。

社会民主党在实践中，就是说在自己的行动中，毕竟总是这样做的。但是它的文字上的代表者在自己的解释中往往与此背道而驰，而且目前也还要与此背道而驰。在占有的特权在欧洲到处都不受限制地占支配地位的那一时代写下来的词句，在当时条件下是可以解释清楚的，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有道理的，但是在今天就只是失去作用的累赘了。然而这些词句却被人用敬畏的态度对待，似乎运动的进展取决于它们，而不是取决于对能做的事情和必须做的事情的活的认识。或者，举个例子来说，在社会民主党的代表在一切有可能的地方实践上都已站在议会工作、比例人民代表制和人民立法（这一切都是同专政相矛盾的）的立场上的这一时代，坚持无产阶级专政这一词句究竟有什么意思呢？^①这一词句

^① 例如可参看奥芬巴赫的社会党人反对以暴力压制地方议会中的非社会党少数派的宣言以及这一宣言在勃兰登堡省社会党地方议员代表会议上所得到的赞同。（《前进报》1898 年 12 月 28 日）

今天已经如此过时，以致只有把专政一词的实际意义去掉并且赋予它随便什么削弱了的意义，才能使这一词句和现实相一致。社会民主党的全部实践活动都是归结于创造一些状态和先决条件，它们能够促成和保证现代社会制度在不发生痉挛性暴发的情况下转移为一个更高级的制度。社会民主党的信徒觉悟到自己是一种更高级的文化的先锋，他们一再从这一觉悟汲取鼓舞和激励，他们所力争实现的社会剥夺在道义上的权利根据归根到底也是在于这一觉悟。但是阶级专政却属于较低下的文化，姑且撇开事情的当否和实现可能性不谈，如果激起了下面这样的思想，那就只能看成是一种倒退，是政治上的返祖现象。这种思想是，从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一定不可避免地要通过某一时代的发展形式来实现，在这一时代里，还完全不知道今天的传播和争取法律的方法，或者只知道这些方法的很不完善的形态，而适合于这一目的的机关是没有的。^①

我特意说从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而不像今天频繁地那样说“从资产阶级社会（von der bürgerlichen Gesellschaft）”。“bürgerlich”一词^②的这种应用，不如说同样也是返祖现象，或者无论如何是一种言语上的含混，这种情况应当说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用语的缺陷，是导致敌人和朋友的错误解释的绝好桥梁。这里的责任一部分在于德语，它没有专有的词来表达同特权的资产者这一概念有区别的社会的权利平等的市民这一概念。企图为前一概念或后一概念创造一个专门的术语并使它成为惯用语的一切尝试迄今都告失败，因此我认为，使用外来语“Bourgeois”来表示特权的资产者和有关的事物，比由于把它翻译成“Bürger”或“bürgerlich”而为一切可能有的错误理解和错误解释开门，无论如何还是要好一些。

今天说到反对资产阶级和消灭资产阶级社会时，任何人毕竟都懂

① 关于布尔什维克通过恐怖主义的暴力把工业只是部分地发达的俄国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冒险尝试，将在补遗章中论述。——补注

② 德文中这一词有“市民的”和“资产阶级的”这两重意义。——编者注

得指的是什么。但是反对或者消灭市民社会是什么意思呢？特别是在德国，当它的最大的、为首的邦即普鲁士的问题仍旧在于首先摆脱阻碍市民发展的很大部分的封建主义的时候，这样说是什么意思呢？没有人想到要把作为一个根据民法维持秩序的共同体的市民社会致于死命。相反，社会民主党不想解散这一社会和把它的成员全部无产阶级化，他们宁可坚持不懈地致力于使工人从一个无产者的社会地位上升到一个市民的社会地位，从而使市民地位或市民生活普遍化。社会民主党不想用一个无产阶级社会来代替市民社会，而是想用一种社会主义社会制度来代替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如果我们不去使用前一种有歧义的说法，而是坚持后一种毫无歧义的解释，就是好的。这一来我们也将摆脱很大一部分其他的矛盾，这些矛盾是敌人并非毫无道理地在社会民主党的用语和实践之间指证出来的。个别的社会主义报刊今天以使用傲慢的反市民的言语为乐事，如果我们作为隐士而孤立地生活着，这样做是恰当的，但是在并不宣称完全“按资产阶级方式”安排自己的私生活是违背社会主义思想的这一时代，这样做就是荒谬的了。^①

最后，也许可以奉劝的是，在对于“自由主义”的宣战中，应当有些分寸。近代大规模的自由主义运动首先对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有利，而给自己加上自由的名义的政党是纯粹的资本主义卫士，或者在发展过程中成了这样的卫士，这样说的确是不错的。在这些党和社会民主

^① 就这一点来说，拉萨尔比我们今天要合乎逻辑得多。当然，他单纯从政治上的特权推演出资产阶级这一概念，而没有至少同时也从经济上的权势地位去推演，这是一个巨大的片面性。但是在其他方面，他是足够的现实主义者，从一开始就把上述荒谬观点的锋芒削去了。他在《工人纲领》中宣称：“在德语中把 Bourgeoisie 一词翻译成 Bürgerium。但是它在我这里并没有这个意思。我们大家都是 Bürger：工人，小市民，大市民等等都是。不如说 Bourgeoisie 一词是在历史进程中获得了表达一个完全确定的政治方向的意义的。”（《拉萨尔全集》第2卷，第27页）拉萨尔在那里进一步对无套裤主义的奇怪逻辑所说的话，特别应当向那些文人推荐，他们在咖啡馆里“自然主义地”研究市民阶级，然后又按照他们的干瘪的成果来判断这整个阶级，正像庸人认为在酒徒身上看到现代工人的典型一样。我毫不犹豫地宣称，我认为市民阶级——德国市民阶级也不例外——就整个来说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道德上还是相当健全的。

党之间当然只能存在敌对的关系。但是说到作为世界历史性运动的自由主义，那么社会主义不仅就时间顺序来说，而且就精神内容来说，都是它的正统的继承者，而且这一点也在实践中、在社会民主党必须对其表示态度的每一原则问题上表现出来。当社会党纲领的某一经济要求将以某种方式或者在某些条件下实现时，如果这些方式或条件看来会严重危害自由的发展，那么社会民主党从来不惜对此采取反对的态度。对于它来说，保障公民自由始终要比实现某种经济要求占更高的地位。自由人格的培养和保障是一切社会主义措施的目的，也是那些表面上的强制措施的目的。对这些措施的比较精确的研究始终表明，这里所涉及的那一种强制，是应当提高社会中的自由的总和的，它所给予的自由应当比它所剥夺的更多，而且是给予比它所剥夺的更为广泛的人群的。例如法定最长劳动日事实上是一种最低自由的规定，是对于超过每天一定数目的钟点出卖自己的自由的禁令，它作为这种禁令在原则上是同受到所有自由主义者赞许的对于出卖自己从而持续地处于人身隶属地位的禁令站在同一立场上的。就这一点来说，第一个实行最长劳动日规定的国家是欧洲的民主方面最先进的共同体即瑞士，这不是偶然的，而民主不过是自由主义的政治形式。自由主义是反对使各族人民屈服于外部强加的或者仅仅还能从传统获得根据的各种制度的反抗运动，它试图首先作为各时代和各民族的自决权^①的原则而得到实现，这两个原则形成了17世纪和18世纪的国家法哲学家的永恒的争论，一直到卢梭在他的《社会契约论》中把它们列为任何宪法的法律有效性的基本条件，法国革命则把它们——在充满卢梭精神的1793年民主宪法中——宣布为不可让渡的人权。^②

① 在第一版（第130页）中“自决权”一词作“主权”（die Souveränität）。——编者注

② 第25条：“主权属于人民。它是统一而不可分的，不可动摇和不可让与的。”第28条：“人民经常有重新审查、修改和更换其宪法的权利。这一代人不能使后代人服从他们的法律。”（见《世界史资料丛刊初集：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13页。——编者注）

1793年宪法是那一时代的自由主义思想的合乎逻辑的表现，对它的内容的粗略浏览就可以表明，它对于社会主义的阻碍过去或现在是多么少。巴贝夫和平等派也曾经认为它是实现他们的共产主义意向的极好的出发点，并且因此把恢复1793年宪法写在自己的要求的最前面。后来表现为政治的自由主义的那些东西，是旧制度推翻以后为了适应或满足资本主义市民阶级的需要而作的削弱和迁就，正像所谓曼彻斯特学说不过是经济自由主义的经典作家所奠定的原则的削弱和片面表述而已。事实上没有任何自由主义思想不是也属于社会主义的思想内容的。甚至看来完完全全是曼彻斯特式的经济上的个人负责（Selbstverantwortlichkeit）的原则，在我看来，社会主义既不能从理论上对它加以否定，也不能在任何可以设想的情况下使它失去作用。没有责任就没有自由；我们尽管可以在理论上对于人的行动自由愿意怎么想就怎么想，在实践上我们却必须把它当作道德律的基础而从它出发，因为只有在这一条件下社会伦理才是可能的。同样，在交往的时代中，在我们的人口以百万计的各邦中，如果不假定一切有劳动能力的人都要在经济上个人负责，健全的社会生活就是不可能的。承认经济上的个人责任，是个人为了社会给予他的或者向他提供的服务而对社会的报偿。

请允许我在这里从已经提到过的我的论述《空间和数目的社会政治意义》的文章中引用几句话：

“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有劳动能力的人的经济上的个人责任也只能在程度上有所改变。劳动统计可以显著改进，劳动介绍可以大大改善，劳动变换更加容易了，并且可以形成一种劳动权，使个人有可能得到比今天所有的大得不知多少的生存保障，选择职业也比今天容易得多。最先进的经济自助机关——大工会——在这一方面已经指明了发展也许可能采取的道路。如果说强大的工会今天保证它的有工作能力的会员有一定的就业权，而企业主没有很有力的、也被工会承认的理由就解雇一个工会会员看来是不明智的，如果说这些工会在介绍职业时把申

请的次序和需要结合起来，那么在这里面已经有民主的劳动权发展的暗示了。”（《新时代》，第15年卷第2册第141页）^①这一方面的其他开端今天以工业法庭、工人议会以及类似机构的形式表现出来，在这些机构里，民主的自治虽然往往还不完备，但是已经具备了形态。另一方面，公共服务特别是教育机构和互助机构（保险等等）的扩展无疑大大有助于排除经济的个人责任的一切严酷性。但是由国家保证每人按自己的职业就业的这一意义上的劳动权，在可预见的将来是完全不可能的，也是根本不能想望的。这种劳动权的辩护者所希望的东西，只有通过上述途径即通过种种机关的结合，才能在对社会有利的情况下得到，普遍的劳动义务同样也只能以这种方法在没有令人窒息的官僚制的情况下实现。在像我们的现代文明国家及其工业中心这样巨大和复杂的机体中，一种绝对的劳动权只能起瓦解作用，也许“只能（把它）设想为最可恶的专横和永远的争吵的源泉”。（出处同上）

自由主义在历史上有过打破中世纪的受束缚的经济及相应的法律制度对于社会的继续发展所加桎梏的任务。它最初获得的固定形态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这并不妨碍它在事实上表现一个更为深远得多的普遍的社会原则，这一原则的完成将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不会创造任何类型的新的束缚。个人应当是自由的——不是像无政府主义者所梦想的那种形而上学意义的自由，就是说摆脱对社会的一切义务的自由，而是在移动和选择职业时不受任何经济强制的自由。这种自由只有通过组织的手段才成为一切人都能得到的。在这一意义上可以把社会主义也称为有组织的自由主义，因为如果比较精确地考查一下社会主义所要求的组织以及它怎样要求这些组织，那么就会发现，这些组织同表面上与它们相似的封建主义机构的区别恰恰首先在于它们的自由主义：它们的民主主义的体制，它们的容易加入。因此，力求具有类似行会的排他性的工联固然是对于资本主义使劳动市场过剩的倾向进行

^① 德意志共和国制定的工厂委员会法是走向实现这种劳动权（作为一切工人和职员得到法律保证的权利）的一个重大步骤。——补注

防御的产物（这对于社会主义者来说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同时正因为它的排他倾向，它也是一个非社会主义的团体，其非社会主义的程度取决于排他倾向对它支配的程度。对于作为一整个生产部门的所有者的工会也适用同样的说法，因为它同“纯粹”生产合作社一样，是要按照自然的必然性而趋向排他性的。^①

在这一方面，可以从拉萨尔的《既得权利体系》一书中引用一句话，我一直把这句话看作对于这一问题的确切的指南。拉萨尔在书中说：“我们时代的深刻的潮流所反对的以及这些潮流所仍旧引以为苦的东西，不是个别性的因素，——不如说这一因素将以和普遍性因素同样的坚决性站在这些潮流的一边——，而是从中世纪就传下来的，仍旧附着在我们肉体上的特殊性的赘疣。”（《既得权利体系》第2版，第1卷第221页）如果把这句话转用到我们的题目上，那就是：组织应当成为个人和整体之间的联结体，而不是分隔体。如果拉萨尔在上引的段落里谴责自由主义，说它不是为个人自体而只是为处于特殊地位的个人要求它所宣布的权利，那么这一责难是针对当时的自由党即“我们所谓的自由主义”，而不是针对理论的自由主义的，而且这一点在紧挨着的前面一句话中也已经明白地说出来了。

二、民主制的联邦制原则

上面的阐述所指出的并不是很简单的问题，不如说它的内部包藏着一系列的暗礁。到目前为止，单是政治平等在任何地方都没有被证明为足以保证以大城市为重心的社会的健康发展。正如法国和美国所

^① 我认为今天引起如此热烈的讨论的关于疾病保险储蓄会中自由选择医师的问题，也应当根据上述准则来加以判断。不管促使疾病保险储蓄会限制选择医师的是什么样的地方性环境，这种限制在原则上肯定是非社会主义性的。医生不应当是某一闭锁的团体的职员，而应当是社会的职员，否则我们就将逐渐达到这样的地步，即必须对《共产党宣言》中的资产阶级“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这句话必须作出奇特的修订了。

补注：这里的阐述屡次被解释为独断地确定医生可以不受限制地进行营业竞争。但这决不是我的想法。我的话不过是对于这里和那里出现的贬低医师社会职能的倾向所作的——正像我所承认的——过分尖锐化的抗议。

表明的，它不是对抗一切类型社会寄生和腐化现象的蔓延的万应灵药。如果在大部分法国人民中不是潜藏着如此异常丰富的团结性，如果这个国家不是在地理上得天独厚，那么法国一定早就已经由于在那里根深蒂固的官僚作风这一国难（Landplage）而毁灭了。无论如何，这一灾难成了为什么尽管法国人具有高度的精神活力，而法国却在工业发展上日益落在邻国后面的原因之一。如果要想使民主制不致比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更会孕育官僚主义，就必须使它建立在一切行政单位和成年公民都具有相应的经济上个人责任的广泛分散的自治之上。对于民主的健康发展，再没有比强制的一律和过度的保护主义更为有害的了。这些东西为合理地区别有生命力的制度和寄生的制度造成困难或阻碍。如果国家一方面废除对生产者组织的一切法律障碍，并且在可以预防职工联合会蜕化为垄断性团体的一定条件下，把某种监督工业的全权转交给它们，从而提供了防止压低工资和过度劳动的一切保证，另一方面通过前面说过的那些机构设法做到任何人都不会由于极端贫困而被迫按照可耻的条件出卖自己的劳动，那么，在国营企业和合作企业之外是否还存在由私人为了自己的利润而经营的企业，这对于社会来说就是无所谓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将完全自动地获得合作的性质。

创设上述机构，或者在已经着手创设的情况下使它们继续发展，是我们所称的生产社会化的不可缺少的先决条件。如果没有它们，那么所谓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所引起的后果恐怕只会是生产力的无度的荒废、无意义的实验和无目的的暴力行动，工人阶级的政治统治事实上只能以受到各革命俱乐部恐怖专政支持的一种专政的革命中央权力的形式来实现。布朗基主义者所设想的就是这样的中央权力，《共产党宣言》和它的作者在写作它的时代发表的其他著作中所假设的也是这样的中央权力。但是，“由于首先有了二月革命的实际经验而后来尤其是有了无产阶级第一次掌握政权达两月之久的巴黎公社的实际经验”，所以《宣言》中提出的纲领“有些地方已经过时了”。“特别是公社已经证

明，‘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①

马克思和恩格斯 1872 年在《宣言》新版的序言中就是这样说的。他们提到进一步发挥了这一思想的《法兰西内战》一书。但是如果我们把这本被提名的书打开并且读一下有关的一节（即第三节），我们就会发现，那里阐述的纲领就其政治内容来说在一切重大特点上都表现了同蒲鲁东的联邦主义的极大类似性。

“民族的统一不应当被破坏，反而应当〔借助于公社的机构建立起来。要实现民族的统一，必须〕通过消灭国家政权而组织起来。这个国家政权以民族统一的体现者自居，但是企图脱离民族、凌驾于民族之上，它的确只是民族躯体上的寄生赘瘤。有必要把旧政权的纯粹压迫机关割掉，同时应当把这个政权的合理职能从一个希图驾于社会之上的权力那里夺过来，交给社会的负责的公仆。普选权不应当是每三年或六年决定一次，究竟统治阶级中的哪一个成员应当在议会里代表和践踏人民，而是应当为组织在公社里的人民服务，正如个人选举权为任何一个其他的企业主服务，被他用来为自己的企业寻找工人、监工和会计一样。”

“公社与国家政权间的对立被看成从前反对过分集中的斗争的夸大形式。……相反，公社制度将把迄今被靠社会供养而又阻碍社会自由发展的寄生赘瘤——‘国家’所吞食的一切力量归还给社会机体。仅仅通过这一行动它就会推动法国的复兴了。”^②

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就是这样说的。

我们现在来听听蒲鲁东的说法。因为我手头没有他的论述联邦主义的书，我想从他的论述各工人阶级的政治能力的著作中引用几句话，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48—249 页。——编者注

②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第 56—57 页；《选集》中的译文是根据英文本译出的，而伯恩斯坦引用的是德文本，因此这里的译文略有出入。——编者注

他在这一著作里顺便宣扬了工人应当结成自己的政党。

“在一个根据真正的人民主权概念即根据契约权利的原则组织起来的民主制中，中央权力对于民族的任何压迫的或腐化的行动都成为不可能；甚至假定有这种行动都是荒谬的。这是为什么？”

这是因为，在一个真正自由的民主制中，中央权力同代表会议即为了协商而召集的地方利益的自然机关没有区别。

这是因为，每个代表首先是选他作自己的代表的那一地方的人，是它的使者，是它的市民之一，是受委托捍卫它的特殊利益或者在大法官（指民族——伯恩斯坦）前面尽可能使这些特殊利益同普遍利益协调的特别全权代表。

因为结合起来的代表们从他们内部选出一个中央执行委员会，并不是为了使它与他们自己不同，高出于他们之上，有可能坚持同他们的冲突。

没有中庸之道：公社将不是至高无上就是〔国家的〕支部，不是全就是无。不管你们打算给公社以多么美好的东西，如果它不再从自身汲取自己的权利，如果它必须承认一个更高的法律，如果它所属的那一大集团被宣布为它的上级而不是它的联邦关系的表现，那么从这一时刻起，它们就不可避免会有一天处于彼此对立之中，会爆发冲突。”不过那时候道理和权力都将在中央权力方面。“由各集团来限制国家权力的思想，当从属和集中的原则支配着这些集团本身时，就是一种不能自圆其说的思想，姑且不说是一种矛盾。”这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市政原则。与此相反，一个“联邦制的法国”，“一个可以被认为是表现了独立理想的制度，它的第一个行动是把完全的独立还给公社，把自决还给各省”——这是工人阶级必须写在自己的旗帜上的市政自由。（《工人阶级的政治能力》，第224、225、231、235页）。《法兰西内战》中说：“生产者的政治统治不能与他们的社会奴隶地位的永恒化并存”，而我们在《政治能力》中读到：“政治平等一旦被宣布，并且通过运用普选权而得到实践，民族的倾向就是经济平等。”“工人候选人难道不正是这

样理解的吗？但这也是他们的资产阶级竞争者所不愿意的。（《政治能力》，第214页）总之，尽管马克思同“小资产者”蒲鲁东之间在其他方面有种种区别，他们在这些点上的思路却是能多么相近就多么相近的。

现代社会的一般发展正趋向于不断增加市政机构的任务和扩大市政自由，而公社成了愈来愈重要的社会解放的杠杆，这也是完全不容置疑的，而且从那时以来已经屡次在实践中得到证明了。马克思和蒲鲁东所描述的现代国家的这种解体和它的组织的彻底改变（由省代表大会或州代表大会的代表组成国民大会，而省代表大会或州代表大会则由公社的代表组成）是否当然必须是民主的第一项工作，从而使向来的国民议会的形式被废除，我认为这是可以怀疑的。现代的发展已经表明，有许多机构的规模已超出市政机构和甚至州和省的控制之外，因此在它们改变组织以前，中央行政机关的监督是不可缺少的。地方自治机构等等的绝对主权，在我看来也不是什么理想。地方自治机构是民族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对于民族的义务和对于它的权利一样多。例如，对它正像对个人一样，不能把对于土地的无条件的和独占的权利让与它。贵重的国有权利如森林和河流的权利等等，归根到底不是属于地方自治机构或州（它们也只是享用者），而是属于民族。因此，民族利益而不是省的或地方的利益在其中占首位或者成为代表的首要义务的一个代议机关，看来在过渡时期正是不可缺少的。不过除了它之外，那些代表大会和代议机关将获得愈来愈大的重要性，以致不管发生革命与否，中央代议机关的职能将变得愈来愈小，从而使这些代议机关或者官署对于民主的危险也愈来愈小。在各先进国家，这种危险今天已经很小了。

但是这里重要的事不是对那一纲领的细节加以批评，而是要着重指出，纲领中怎样有力地强调了自治是社会解放的先决条件，怎样把从下而上的民主组织描述为实现社会主义的道路，蒲鲁东和马克思这两个对头怎样在自由主义这一点上到底重新取得了一致。

地方自治机构和其他自治机构在完全的民主制之下怎样完成自己

的任务，它们将承担这些任务到多大程度，这必须由未来教给我们。但是就这一点来说是明确的：它们越是突然地获得自由，就要越多越急躁地进行试验，因而出差错的危险就越大；而工人民主派在自治这一学校中所受的训练越多，这些自治机构就会越仔细越实际地进行，整体的福利也就得到越多的保障。^①

尽管民主一眼看来似乎很简单，但是它的问题在像我们这样复杂的社会中却决不是这样容易解决的。只要从韦伯关于英国工联的理论中读一下英国工联仅仅为了找到管理和领导的合适形式就曾经必须作和还在作多少次试验，以及对于工会来说有多少事情要取决于这一体制问题。七十多年以来，英国工会已经能够在这一方面充分地发展。它们从最原始的自治形式开始，并且通过实践曾经不得不确信，这种形式也只适用于原始的机体，十分小的地方工会。它们愈发展，就逐步地学会把关于教条的民主主义（限权代表委托书（gebundenes Mandat），不支薪的职员，无权的中央代表机关）的某些得意的想法当作对于自己的顺利发展起瘫痪作用的东西而加以抛弃，并且造成一种具有代议制的大会、支薪职员和有全权的中央领导机关的有实效的民主制来代替它。“工业民主制”的这一段发展史是非常有教益的。即使说适用于工会的一切并不都适用于民族的行政机构的各单位，但是其中毕竟有很多东西是适用的。韦伯的书的有关一章是民主行政学的一个片段，而且在许多方面是同考茨基在论述直接人民立法的书中所得的结论相吻合的。工会的发展史表明，执行的中央行政机关——工会的国家政府——纯粹是从由于机体在地域上的扩展及成员的人数而成为必要的分工产生的。随着社会的社会主义发展，这种集中也有可能以后重新成为多余的。但是暂时它即使在民主制中也将是不能缺少的。正如在本章第一节的结尾所已经阐述的，较大的城市或工业中心的地

^① 可以毫不夸大地说，德国社会民主党历年以来在公开和自由的自治的种种领域中对自己的信徒所作的训练，对德国革命的有组织的进行起了很有益的作用，而且还在起着这种作用。——补注

方自治机构要把当地的一切生产企业和贸易企业接收下来自己经营，是不可能的事。同样，根据实践的理由已经可以看出，这些自治机构也不可能在一次革命的起义中把那些企业一股脑儿地立刻加以“剥夺”，更完全不必提从公平合理的角度来看这样做是不合适的了。但是即使它们这样做了（不过这时它们在大多数场合得到手的只会是空壳），它们也将被迫把大多数厂店出租给合作社，不管是个人的合作社还是工会，让它们从事自己的合作经营。^①

在每一个这样的场合，正像对于地方的和全国的自营企业一样，需要保障各个职业的整体的一些利益，因此仍旧给工会留下了进行监视活动的余地。特别在过渡时期，现存的各机关的多样性是有很大价值的。

不过我们还没有到这一地步，我的意图并不是要展示未来的图景。我所关心的不是在比较遥远的将来将发生什么，而是现在能够和应当为现在本身和最近的将来做些什么。这些阐述的结论是这个非常平凡的原理，即争取民主和造成政治的和经济的民主机关，是实现社会主义的不可缺少的先决条件。如果有人对此反驳说，在德国不经过政治灾变而争取到这一点的希望很小，甚至是简直等于没有，说德国的市民阶级变得愈来愈反动，那么这样说也许对于目前时刻是对的，尽管也有不少现象表明相反的情况。但是不可能长久如此。人们所说的市民阶级是一个很复杂的阶级，是由形形色色的具有很不相同的或者差别很大的利益的阶层组成的。这些阶层只有当它们感到自己是同样地受到压迫或者同样地受到威胁的时候才能长久地保持团结。在目前的场合当然只能谈到后一种情况，就是说市民阶级之所以形成一致的反动一帮，是因为它的所有的分子都感到同样受到社会民主党的威胁，有一些是感到自己的物质利益，另一些人是感到自己的思想意识的利益，即自己的宗教，自己的爱国主义，自己的想使国家免于—场暴力革命的恐怖的

^① 在这种时候不用说会产生相当麻烦的问题。不妨想一想近来的许多混合企业，它们雇用了一切可能的行业的成员。

愿望受到了威胁。

不过这是不必要的。因为社会民主党并不是同等地威胁他们全部的，而且并不威胁任何作为个人的人，社会民主党自己也决不热衷于一场反对整个非无产界的暴力革命。这一点说得和论证得愈明白，那种一致的恐怖就消退得愈早，因为市民阶级的许多分子感到自己受到来自另一方面的压迫，他们宁可对这一方面（工人阶级也受到它的压迫）而不是对工人作战，宁可当后者的而不是当前者的同盟者。他们也许是不可靠的家伙。但是如果对同盟者宣称，我们打算帮助你们把敌人吃掉，但是在这以后我们要立刻把你们吃掉，那是训练不出好的同盟者的。因为在任何情况下问题都不在于普遍的、同时的和暴力的剥夺，而是在于通过组织和法律而逐渐实行赎买，因此哪怕在言语上也同事实上已经过时的贪食奇谈（Freßlegende）分手，也肯定不会对民主的发展有什么损害。

具有各种僵化的等级制度的封建主义几乎到处都必须用暴力来炸毁。现代社会的各种自由制度同那些制度的区别恰恰在于，自由制度是有伸缩性的，有变化和发展能力的。用不着炸毁它们，只需要继续发展它们。为此需要组织和积极的行动，但不一定需要革命的专政。不久以前（1897年10月），瑞士社会民主党的一家机关报、巴塞尔《前进报》写道：“既然阶级斗争以一般地消除阶级差别为目的，那么在逻辑上必须假定有一个一定要开始实现这一目的、这一理想的时期。这一开端，这些前后相继的时期，在我们的民主的发展中已经有了基础，这一发展帮助我们逐步用社会民主的扩大来代替阶级斗争，把阶级斗争吸收到民主的发展里面来。”西班牙社会党人巴勃罗·伊格来西亚斯最近说：“不管是哪种色彩的资产阶级必须确信，我们不打算用他们曾经一度运用的手段即通过暴力行动和流血来强暴地夺取统治，而是要用同文明相称的合法手段。”（《前进报》1898年10月16日）英国独立工党的主要机关报《劳工领袖》根据相似的见解毫无保留地赞同福尔马尔关于巴黎公社的言论。但是谁也不会指责这家报纸，说它同资本主义和

资本主义党派作斗争时采取温顺态度。社会主义的英国工人民主派的另一家机关报《号声》在刊登它所赞同的我的论述崩溃论的文章的摘要时加了如下按语：

“造成一种真正的民主——我确信，这是我们当前的最紧急和最重大的任务。这是最近十年来的社会主义战斗给予我们的教训。这是从我对于政治的全部知识和经验得出来的学说。在社会主义成为可能以前，我们必须建设一个民主主义者的国家。”

第四节 社会民主党的当前任务

而她是什么样子，她就敢表现出什么样子。

席勒：玛里亚·斯图亚特

一、国防问题，对外政策和殖民地问题

一个党的任务是由许多方面的因素决定的：由它的活动领域中的一般经济、政治、知识和道德的发展状况，由同它并肩或对立地行动的各党的性质，由它所掌握的手段性质以及由一系列主观的思想因素尤其是它的总目的以及它对于达到这一目的的最好途径的见解而决定的。就第一个因素来说，在各个不同的国家之间还存在着多么巨大的差别，这是大家知道的。即使在工业发展水平差不多相等的国家中，我们也发现很显著的政治差别和人民群众精神倾向上的巨大差异。地理位置的特点，根深蒂固的人民生活的习惯，因袭的制度和各种传统产生了意识形态上的差异，这种差异只能缓慢地服从上述发展的影响。即使在社会主义政党起初是以相同的前提为自己行动的出发点的地方，它们随着时间的推移也不得不使自己的活动适应本国的特殊条件。因此在一个既定的时刻固然可以提出希图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社会民主党政策的总原则，但是不能提出同样适用于一切国家的行动纲领。

正如前一节中所阐述的，民主在远较屡次假定的更高的程度上是社会主义的前提，就是说它不仅作为手段，而且也作为实体是这样的前提。如果没有一定程度的民主制度或传统，那么现在的社会主义学说根本是不可能的。固然会有工人运动，但是不会有社会民主党。现代社会主义运动，不管它的理论上的解释怎样，事实上是法国大革命中间以及通过它而获得普遍效用的那些法权概念对于工业工人的工资运动和工时运动的影响的产物。如果没有这些法权概念，这些运动也会存在，正如在没有这些法权概念的情况下，在出现这些法权概念以前，曾经有过同原始基督教联系在一起的人民共产主义^①一样。但是这种人民共产主义是很不确定的和半神秘的，而工人运动如果没有那些法律制度和法权观点（不过它们至少有一大部分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伴侣）为基础，就会缺乏内在的关联性。如果要提出一个差不多相当的样子，那就是东方各国，今天那里的情况是同这相似的。一个政治上无权的、在迷信中和有缺陷的教育中成长起来的工人阶级，固然会暂时起来反叛和小规模地进行密谋，但是决不会展开社会主义运动。需要某种程度的远大眼光和相当发达的权利意识，才能把一个偶然起来暴动的工人造成一个社会主义者。因此政治权利和学校到处都在社会党的行动纲领中占着显著的地位。

这是非常一般的论述。因为对社会党行动纲领的细节进行评价，并不在本书的计划之内。至于特别说到德国社会民主党爱尔福特纲领中的当前要求，那么我决没有想到要提议对它们加以改变。恐怕同任何社会民主党人一样，我不认为所有各项都同样重要或同样适当。例如我认为，免费的诉讼和辩护在目前条件下只是在狭小的限度内才是值得推荐的，而为了使无钱的人也能伸张自己的权利，固然必须作出一些规定，但是并不迫切需要将目前的财产诉讼的大部分由国家付费承

^① 前几年我（肯定也有别人）曾经一再碰到这样的事，即在一次鼓动会议结束时，一些初次听到社会主义演讲的工人或手工工人到我这里来对我说明，我在会上所说的，在圣经中全都已经有了，他们能够一句一句地指出给我看。

担和将律师全部归国家管理。同时，既然目前的立法者，哪怕是出于其他理由，尤其不愿听说这样的一种措施，而社会主义的立法如果没有司法机关的彻底改革就不能得到贯彻，或者只有在创设新的司法机构（例如已有的工业仲裁法庭）的情况下才能得到相应程度的贯彻，因此这个要求可以作为有待争取的发展的标志而安静地保留在那里。

而且 1891 年我就已经在一篇论述当时提供讨论的纲领草案的文章中十分明确地表达了我对于以目前这种形式表现的这一要求是否适宜的怀疑，并且宣称，有关的一节给予了“太多而又太少”。（见《新时代》第 9 卷，第 2 册，第 821 页）这篇文章属于考茨基和我当时作为论述纲领问题的集体作品而写作的一组文章之列，这一组文章的前三篇几乎完全是考茨基的精神作品，第四篇则是我写的。这里仍旧可以从其中引用两段话，它们说明我那时对于社会民主党的实践所采取的立场，从中也可以看出，从那时以来我的看法的改变是多么大还是多么小：

“简单地要求以国家资金供养全部失业者，这意味着不仅把每一个不能找到工作的人，而且也把每一个不想找工作的人都交给国家负担。……用不着真正成为无政府主义者就可以看出，无穷无尽地依赖国家是太过分了。……我们要坚持这样的原则，即现代无产阶级固然贫穷，但不是贫民。在这一差别中存在着一个整整的世界，存在着我们的斗争的本质，我们的胜利的希望”。

“我们之所以建议用‘常备军转变为人民武装’的公式代替‘以人民武装代替常备军’，是因为这一公式确定了目标，而且给党留下自由行动的余地，使它在解散常备军根本行不通的今天就已经能够要求一系列至少可以尽量缩小军队和人民之间的对立的措施，例如废除特别军事裁判权，缩短服役年限等等。”（第 819，824，825 页）

由于“是常备军还是民兵”这一问题近来成了热烈讨论的题目，因

此在这里插进几句关于这一题目的话，将是适宜的。^①

我首先认为，用上述措辞提出问题是错误的。应当这样说：政府军队还是人民军队。这样一来问题的政治方面从一开始就毫不模糊地指出来了，即军队应当成为统治者的工具还是应当成为民族的武装屏障，它应当从国王还是应当从人民代表机关接受决定性的指令，应当向站在民族前头的个人还是应当向宪法和人民代表机关宣誓效忠？任何社会民主党人的回答都是不能含糊的。固然人民代表机关既不是社会主义的，宪法也不是民主的，因此受人民代表机关管辖的军队仍旧时时能够被用来镇压少数人或者说只是在议会中处于少数而实际上却是多数

① 在这以下的叙述已经由于世界大战、国际联盟的创立以及加于德国的和平条件而过时了。不过我把它保留下来，因为它曾经惹起激烈的争论，而它所表达的原则立场今天也还是我的立场。我的立场同对于民族主义意图的任何让步是毫不相干的，我在世界大战中的态度想必已经充分表明了这一点。但是我也关心使人认识到，这种态度——否决战争拨款等等——同对德意志民族的命运漠不关心的态度毫不相干。挑起世界大战，既是对德意志民族犯罪，也是对其他民族犯罪，不过德意志民族的利益尤其要求向其他民族的民主主义者提供证据，说明在德意志民族中仍旧有坚持反对德皇政府的战争政策的人。不言而喻，作为社会民主党人，我认为国际和平联盟一旦成为现实，就是和平地解决问题的最好保证，这些问题一向是只能依靠均势协定、军备竞赛和类似的东西而暂时除去自己的威胁和平的性质的。——主要的事情是，国际联盟要真正成为名副其实的东西。暂时我们还没有这样的实体，而仅只是有了形式，而且连形式也还是缺陷很多的。一种原则上改良主义的社会民主党政策必须力图坚持这一形式，为消除错误和弥补缺陷工作，而这一政策就是本书的思想基础。不过这一政策之所以必须力图这样做，也可以是根据以下的理由：随着战争的逐步从盖然性的领域消失，在迄今的而且部分地仍旧残存的大国对立的情况下形成不可解决的二律背反的那些问题，就成为可以解决的了。

加于德国的和平条约把人民武装的组成和训练的问题抛在一边了，这是因为，条约只允许德国维持一支募兵军队，而且只是小规模，连进行反对小小的比利时的战争也不够。谁要是像本书作者一样深信，对于德意志民族来说，再也不能发生比卷进一场新战争更为毁灭性的事，那他就不会有任何理由反对哪怕把德意志民族（丧心病狂的民族主义者用关于一场复仇战争的思想把它的头都弄昏了）对于这样一场战争可能性的幻想都剥夺掉。它的精神能力和物质能力应当用于和平工作。但是我认为这种手段本身很不适于带来人们期望于它的精神效果。即使在防卫能力的训练受到禁止的地方，军国主义精神也能发展起来，但是进行这种训练，却不是必然会变质成为军国主义。——补注

的人。但是只要一般说来还只是民族的一部分被武装起来并且必需听命于当时的民族代表机关，那么就没有任何防止上述可能性的解救方法。在我看来，在今天这样的技术条件下，即使所谓“普遍武装人民”也只是反对有组织的武装力量的一种虚幻的屏障而已。如果有组织的武装力量的组成成分还不能保障人民不受暴力迫害——不过在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时，已愈来愈有保障了——，那么普遍武装人民在任何时候都只会引起双方的无谓牺牲。在普遍武装人民还有必要的地方，由于政治的原因，它决不会得到承认，在有可能实行的地方，它就是多余的了。我越是渴望教育出坚强无畏的一代来，我就越不认为普遍武装人民是社会主义的理想。幸而我们已愈来愈习惯于不用射击而用别的办法来解决政治分歧了。

问题的政治方面就说到这里。至于技术方面（军事训练，兵役年限等等），我坦率承认我够不上是能对此作出完善判断的内行。以前各时期的表明适宜用迅速训练成的军队的那些例子（革命战争，解放战争）不能直接搬到今天基本上已经改变了的作战条件上来，而最近在希土战争和西美战争中在志愿兵方面所得的经验，我认为同样也不能原封不动地应用于德国所必须预计到的那些可能性。因为即使我也认为在我们这些人里有人往往夸大“俄国的危险”或者想在这种危险也许最少的地方去发现它，但是我毕竟承认，人口的绝大部分由政治上缺乏自己意志的、十分无知的农民组成的一个国家，始终能够成为它的邻国的危险。因此在这样的场合，就宜于把战争尽可能快地推到敌人的国土上并且在那里进行，因为在现代国家中，在本国土地上作战就已经是一半失败了。因此问题在于，一支民兵军队是否具备能保证取得上述结果的那种战斗准备、可靠性和凝聚力，或者说，为此要求多长的军事训练。在这一方面，我认为暂时只能有把握说到这种程度，即在对青年进行了适当的防卫能力教育和消除了军事陋规的一切残余和遗物的情况下，一定有可能大为压缩兵役期，而丝毫不致损害民族的防卫力。当然在这一方面，目前领导军队的人的善意起着很大的作用，但是人民代表

机关现在已经能够通过对于军事预算的压力来有效地补充这种善意了。在这一方面同工厂立法的情况一样，强制缩短兵役期将使守旧精神和特殊利益目前宣布为“不可能”的许多事情成为可能。由此可见——在人们认为维持一支既能进攻又能防御的武装力量仍旧有价值的限度内——除了军队政治态度的不可缺少的改变以外，首要的问题不是要不要民兵，而是立刻和——逐步地——在以后可能多大地缩短兵役期而不致把德国置于同邻国比起来不利的地位。

但是，社会民主党作为工人阶级的党和和平的党，是否关心国防力量的保持呢？从许多角度看来，很容易诱使人对这个问题作出否定的回答，特别是在以《共产党宣言》的“工人无祖国”这句话为出发点的时候更是如此。这句话也许对于那些没有权利并且被排除于公共生活之外的 40 年代的工人是适合的，但是在今天，尽管各民族相互间的交往已经大为增加，它却丧失了它的大部分真理性，并且随着工人由于社会民主党的影响而愈来愈从无产者变为市民，还将丧失更多的真理性。工人在国家、地方自治机构等等中是有平等权利的选民，从而也是民族的公有财产的共同所有者，他的子女由社会教育，他的健康由社会保护，社会保障他不受欺侮，在这种情况下，工人将有祖国，而不致因此不再是世界公民，正像各民族可以互相接近，却无需停止过自己的生活一样。如果全人类有一天都只用同一种语言讲话，那看来也许是非常好的。但是未来的人类将因此失去的刺激和精神享受的源泉该是多么大啊！各民族的完全解体不是一个美丽的梦，无论如何不能期望它在人类的将来出现。但是正像不应希望任何一个别的伟大文明民族丧失独立一样，社会民主党对于德意志民族，即曾对各民族的文化事业贡献过并且正在贡献着堂堂正正一份的德意志民族在国际会议上是否受到压抑，是不能漠不关心的。

今天人们对于社会民主党夺取政治统治这件事谈得很多，而至少就社会民主党在德国已经获得的势力来说，它在那里不是没有可能通过某种政治事件在不久以后把决定性的作用夺取到自己的手里来。但

是恰恰在那时，由于邻近各民族还没有达到这种程度，德国社会民主党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就会像英国革命时的独立派或法国革命时的雅各宾派那样，成为民族的党，就是说，德国社会民主党将必须表明自己担负得起同样坚决地保障阶级利益和民族利益的任务，以此来加强它作为领导政党或领导阶级的资格。

我并不是出于任何沙文主义的一时冲动而写下这些话的。实际上，我既没有理由也没有原因产生这种冲动，不如说，我不过是在对社会民主党在这种局面下应负的义务进行客观的研究时这样写的。我今天仍和任何时候一样重视国际精神，我也不认为这一精神会由于我在前几段话中所阐发的原则而受到任何形式的损害。只有当社会民主党局限于进行理论宣传和社会主义的实验时，它才会坚持以纯粹批判的态度对待民族政策方面的问题。但是政治行动本身就已经是同非社会主义界的妥协，而且要迫使采取并非一开始就是社会主义的措施。虽然如此，民族性措施继续发展下去，也会成为同市政措施一样的具有社会主义性的东西。民主国家中的社会主义者今天毕竟已经乐于自称民族主义者，而且不拘于社会化这个字眼，毫无顾忌地谈论土地等等的国有化。社会化这个词远不如国有化那样明确，与其说是国有化一词的改善，毋宁说是它的一种权宜的称呼。

以上所说已经在原则上指出了社会民主党在目前情况下对于对外政策方面的问题表示态度时所必须依据的观点。即使工人还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市民，但是既然他们对于民族利益不能漠不关心，那么他们在这一意义上说来就不再是无权利的了。即使社会民主党还没有掌权，它毕竟已经占据了一种使它承担了一定责任的有势力的地位。它讲的话是相当地举足轻重的。在现在的军队构成的情况下，在小口径炮对士气的影响还完全不能判明的情况下，帝国政府在敢于进行一场遭到社会民主党坚决反对的战争以前，是会三番五次地考虑的。社会民主党即使不举行有名的总罢工，也能够对和平发表重要的——即使不是决定的——意见，而且将遵循“国际”的老格言来经常地和积极地这样

做，只要这是必要而且可能的话。当德国与其他国家发生冲突而不能达成直接的协议的时候，社会民主党也将根据它的纲领主张通过仲裁的方法来解决争端。但是如果，或者说因为，英、法、俄各国的沙文主义者对符合德国的眼前或将来利益的措施产生反感，社会民主党也没有任何必要鼓吹放弃保卫德国的利益。只要在德国方面涉及的不仅是个别集团的对国民福利无足轻重或者甚至有害的偏爱或特殊利益，只要实际上事关民族的重大利害，那么国际精神也不能成为对外国当事人的权利要求怯懦地让步的理由。^①

这不是什么新的见解，不过是对作为马克思、恩格斯和拉萨尔关于对外政策问题的几乎全部意见的基础的那一思想过程的概括而已。由此推荐的也不是什么危害和平的态度。各国今天已经不那么容易投入战争了，在某些情况下，采取坚定的态度可能比不断地让步更加对和平有利。

现在有很多人认为欧洲均势的理论已经过时，就它的旧形式来说它也的确是过时了。但是按照改变了的形式，大国的均势对于解决国际争执问题还是起很大作用的。有时问题仍旧在于，为了促使或阻挠事情的实现而主张某一措施的大国联合强大到什么程度。我认为，保证德国在这种场合有参与决定的权利，这是德国国家政策的一个正当的任务，而从原则上反对相应的措施，这是在社会民主党的任务范围之外的。

选一个明确的例子来说吧。胶州湾的租借，当时曾经遭到德国社会主义报刊的痛斥。如果这种批评只是涉及实行租借时的情况，那么这就是社会民主党报刊的权利，甚至是义务。最坚决地反对采用或者促成瓜分中国的政策，也是同样正确的，因为瓜分根本不符合德国的利益。但是如果一些报纸还要走得更远，竟宣称党在任何情况下和在原

^① 上面这几句话当时曾经被解释为我对于德国沙文主义者的让步，后来人们认为我在世界大战中的态度是与此矛盾的。但是这些话根本不是在说战争与和平的问题，而是在说社会民主党在和平时期的对外政策。——补注

则上必须谴责取得那一港湾的行为，那我是完全不能赞同的。

瓜分中国以及使德国得到中华帝国的一部分，这并不是德国人民的利益所在。但是使中国不致成为其他各国的掠夺物，却是对德国人民有很大利害关系的，使中国的贸易政策不致服从某一外国或者某一外国联盟的利益——总之，使德国对于一切有关中国的问题都能参与一份决定性的意见，这是对德国人民有很大利害关系的。德国同中国的贸易需要这种提出异议的权利。既然取得胶州湾是保证和加强德国的这种异议权的一种手段——而取得胶州湾有助于此，是很难加以反驳的——，那么仅就这一点而说，我认为就是社会民主党不应当在原则上反对这件事的一个原因。撇开着手取得时所采用的方式和在与此同时所说的冠冕堂皇的话不谈，这并不是德国对外政策上的最恶劣的坏事。

问题在于保证同中国进行和在中国进行自由贸易。因为不容怀疑，即使德国不取得胶州湾，中国也会日益被卷入资本主义的经济范围，即使德国不取得胶州湾，俄国也会继续实行它的包围政策，并且一有机会就占据满洲的港湾。可见问题只是在于，德国应当袖手旁观，让中国通过一个接一个既成事实而愈来愈陷入从属俄国的地位，还是应当确保一个阵地，使自己在正常的情况下也能以此为基础而在任何时候对中国的事情的进展发生影响，而不致不得不满足于事后提出抗议。只要租借胶州湾过去和现在都像以往所宣布的那样只是为了使德国在中国的将来利益获得保障，那么在这一限度内社会民主党也就可以对此表示赞同，而丝毫不必放弃自己的原则。

不过在社会民主党对于德国的对外政策领导不担负责任的情况下，问题根本不在于积极支持这一政策，而只是在于正确地论证社会民主党的消极态度。在不能保证这些打算不致越过人民代表机关而被利用来达到和已经公布的不同的目的、例如作为取得以未来较大利益为牺牲的某种微小日常成就的手段的时候，在没有得到这样的保证的时

候，社会民主党不能为对外政策的措施承担任何一份责任。^①

就这样，正像人们所看到的，这里所阐述的决定对待对外政策问题的态度的准则，是同社会民主党迄今在实践中所采取的态度相当一致的。它的原则前提在多大程度上同党内占支配地位的观点相吻合，这就不是要我来讨论的了。

总的说来，在这些事情上，传统所起的作用比我们所想的要大得多。就一切努力前进的党的本性来说，它们对于已经完成的变化是很不重视的。它们的主要着眼点始终放在还没有改变的事物上，这对于一定的目的——目标的确定——来说是一种完全正当的和有用的倾向。但是这样的党如果被这一倾向所渗透，也就容易陷入这样的习惯，即超过必要和有效的限度而更为长久地坚持传统的判断，而这些判断的前提已经大为改变了。它们忽视或者低估这些变化，它们总是宁可寻求尽管如此仍旧能使这些判断看起来正确的那些事实，而不是根据有关的全部事实去研究这一问题：判断是否已在这一段时间内变成成见。

在我看来，这种政治的先验主义在处理殖民地问题时往往也起某种作用。

扩展新的殖民地是否取得成功，今天在原则上对于社会主义或工人运动来说完全是无关紧要的。认为殖民地的扩展将推迟社会主义实现的这一观念，归根到底是以如下的完全过时的思想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的实现取决于十分富裕的阶层的缩小和群众的贫困的增长。前一点（富裕阶层的缩小）是一个童话，这已经在前面几节中证明了，而贫困理论目前已经相当普遍地被抛弃，即使并不是彻头彻尾和直截了当地被

^① 为了正确地判断以上的话，请回想一下，在写下这些话的时候，即在1898年和1899年之交的冬天，因为对日本作战失败而精疲力竭并且由于内部混乱而动荡的中国，看来正打算接受沙皇俄国的完全支配。但是我承认我低估了一个毫无顾忌地从属于它的国王的情绪对于德国对外政策的影响。——补注

抛弃，那么至少是以这样的形式即找一些借口而把它抛弃^①。但是即使这一观念是正确的，今天与德国利益有关的那些殖民地也还远不能如此迅速地对本国的社会状态发生反作用，哪怕把可能发生的灾变推迟一年之久也做不到。在这一方面，德国社会民主党对德意志帝国的殖民政策根本没有什么可以害怕的。因为情况如此，因为德国已经取得的殖民地（对于它也许还可能取得的殖民地来说同样适用）的发展需要花如此多的时间，以致在许多年内都谈不到对德国的社会关系发生值得一提的反作用，正是根据这一理由，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处理关于这些殖民地的问题时也能够不带先入之见。甚至谈不上殖民地占有会对德国的政治情况发生什么重大的反作用。例如海军沙文主义无疑同殖民沙文主义有密切联系而且从它汲取某些养分。但是如果没有它，海军沙文主义也会存在，就像德国在想到要取得殖民地以前早就有了海军一样。不过无论如何仍旧应当承认，这一联系还是最适宜于用来说明，原则上反对殖民政策是正当的。

① 亨·库诺在他论述崩溃论的文章中试图寻找借口来进行解释。他写道，如果说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的结尾说到了“贫困程度的不断增长”，那么应当把这理解为“不纯粹是工人的经济生活状况的绝对下降”，而“只是同不断进步的文化发展相比的、从而就是同生产率的增长和一般文化需要的提高相比的、工人整个社会地位的下降”。贫困这一概念不是确定不变的。“在某一工种的同‘雇主’在教育程度上悬殊很大的工人看来值得努力追求的状况，在另一工种的也许在精神上比‘雇主’还要优越的熟练工人看来，也许是他们要愤怒地起来反抗的一大堆‘贫困和压迫’。”（见《新时代》第17年卷第1册，第402—403页）

可惜马克思在这里涉及的那句话里不仅说到日益增加的贫困和压迫的程度，而且也说到了日益增长的“受奴役、堕落和被剥削”的程度。难道我们也应当按照上述的——匹克威克的意义来理解吗？例如是否能够假定有一种工人的堕落同普遍良好风尚的提高比起来只是一种相对的堕落呢？我不想作这种假定，库诺恐怕也不想。不，马克思在有关的段落里是完全正面地说的：“掠夺”资本主义转化过程的“全部利益”的“资本巨头不断减少”，“贫困、压迫”等等的程度不断加深。（《资本论》第1卷，第831页）可以根据这一对比来论证崩溃论，却不能根据比精神上更低下的上司（这是在任何办公室里，在一切教阶制的组织中都会发现的）超过的道德上的贫困来论证它。

顺便说一句，库诺在这里只能通过使各工种的具有根本不同的社会概念的工人突然出场的办法来使崩溃论所根据的那几句话同现实协调，看到这一点，对我来说是一个小小的满足。这难道也是“英国的工人”吗？——第1版第148—149页注

就其他方面来说，在取得殖民地时固然始终有理由要严密地考察它们的价值和前途并且严格地检查同土著居民的协定和对他们的处理，也要检查其他方面的行政管理，但是没有理由把取得殖民地看成是从根本上应当予以谴责的事。社会民主党的由于当前的统治制度而决定的政治地位，禁止它在这些事情上采取除了批评的态度以外的别的态度。而关于德国今天是否需要殖民地的问题，就完全还是有待获取的殖民地来说，是可以十分正当地给以否定的回答的。但是未来也有权利要求我们加以考虑。如果我们考虑到，德国目前每年要输入大量的殖民地生产品，那么我们也必须对自己说，有一天这样的时刻会来到，那时也许值得期望，至少能从自己的殖民地取得这些生产品的一部分。我们不妨把德国的发展过程设想得尽可能迅速，不过我们毕竟不能沉迷于错觉，以致看不到这一事实：一整批别的国家还需要很长的时间才可以过渡到社会主义。如果说，享受热带植物的产品是无可非难的，那么自己栽培这些植物，也就能够是无可非难的了。在这里起决定作用的不是应否做，而是怎样做。欧洲人占领热带各国，既不是必然要损害土著居民的生活乐趣，而迄今的情况甚至也不是到处都是这样的。此外，承认野蛮人对于被他们占有的土地的权利也只能是有条件的。归根到底，较高的文明在这里也有更大的权利。赋予利用土地的历史的权利名分的，不是土地的征服，而是土地的经营。^①

在我看来，这就是应当对社会民主党对待殖民政策问题的态度起决定作用的基本观点。它们在实践中也不会使党的投票产生多大的改变，但是我要重复说，重要的不仅是在一定的场合怎样投票，而且也在于怎样论证这样的投票。

社会民主党内有些人认为，对民族利益的任何拥护，都是沙文主义

^① “甚至整个社会，一个民族，以至一切同时存在的社会加在一起，都不是土地的所有者。他们只是土地的占有者，土地的利用者，并且他们必须像好家长（boni patres familias）那样，把土地改良后传给后代。”（《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875页。——编者注）

或者是对国际精神和无产阶级的阶级政策的损害。多美拉·纽文惠斯当年曾经声称，倍倍尔关于社会民主党在俄国万一进攻的情况下将为保卫祖国献出自己的党员的这一著名声明是沙文主义，同他一样，贝尔福特·巴克斯近来也认为亨·迈·亨德门的一个类似的声明是应加谴责的排外主义。^①不过必须承认，维护本民族利益到什么程度就不再正当而且转变成伪爱国主义，要确定这一界限并不总是容易的；但是矫正偏向一面的夸大的治疗手段肯定不是偏向另一面的比这还大的夸大。不如说应当从文明各国民主派的活跃的思想交流中去寻求这种手段，并且要得到一切为和平努力的因素和机构的支持。

不过让我们回到关于党纲的当前要求这一问题吧。如果说这些要求中的某几个在党的鼓动和议会行动中一直没有提到日程上来，或者仅仅以局部改良的形式提到日程上来，那么就另外一些要求来说，在某些地方已经远远超过了纲领所要求的目标。例如纲领要求禁止 14 岁以下儿童的谋生劳动，1897 年的苏黎世工人保护代表大会规定 15 岁是儿童谋生劳动的最低年龄界限，许多社会党人认为这还是太小。但是我却确信，在现存的条件之下不能把这一扩大看成一项改进。如果劳动时间被限制在这样的程度内，使年轻的身体可以在不受损害的情况下承受得住，并且留下足够的游戏、休息和教育的时间，那么即使把年轻人开始从事生产性劳动的时间降低到 14 岁，也还不是多大的坏事，以致必须加以普遍的禁止。问题完全在于劳动的性质和条件，而且这也是今天的立法在原则上已经承认了的，立法完全禁止某些行业雇用少年工人，在允许另一些行业雇用的同时明确地规定了每天的劳动时间。我认为少年保护的合理发展在于进一步改善这些规章和使教育制度完善化，而不在于机械地提高工业劳动的年龄限度。

^① 亨德门斩钉截铁地坚持这样的思想：英国为了保护自己的食品进口，需要一支敌得任何可能的敌国联合的舰队。“我们作为一个自由人的民族的生存依靠着我们在海上的优势。对于目前任何一个别的民族都不能这样说。尽管我们社会主义者天然地多么反对军备，但是我们必须承认事实”。（《正义报》，1898 年 12 月 31 日）

此外，这一问题同学校问题的联系是得到公认的。少年劳动的问题如果要取得满意的结果，就必须从学校的角度并且同学校联系起来加以管理。^①当工业劳动对卫生以及学校的精神的和道德的教育任务有害时，并且在这一限度内，工业劳动应加禁止；相反，任何还涉及不再是受义务教育年龄的人的普遍禁令，则是应当坚决受到谴责的。把像限制生产和限制工人竞争这样的经济考虑夹杂到这一问题中来，是完全错误的。相反，始终想到生产性的（或者用一个歧义较小的字眼来说，对社会有用的）劳动具有高度的教育价值并且仅仅因此就已经应当被看成一件由于本身的原因而值得反对的事，这倒总是好的。

同提高已列入纲领的各项要求这一问题比起来，补充纲领这一问题在今天是更为重要的。在这一方面，实践已把一整批问题提到日程上来。在制定纲领的当时，这些问题的一部分还被认为是遥远的事情，无须社会民主党专门为之操心，另一部分则连它们的重要意义都还没有得到充分的认识。这些问题包括农业问题，地方自治政策问题，合作社问题和工业法方面的种种问题。社会民主党在爱尔福特纲领起草后八年以来的巨大发展，它对于德国内政的影响以及其他国家的经验，已使更为密切地关心这些问题成为不可避免的事，而且当时有关这些问题的一些支配性意见，已经基本上得到了纠正。

二、农业问题

关于农业问题，连那些认为农业经济注定要没落的人，也已经显著

^① 一位英国工程师、社会民主同盟的成员约翰·理查逊曾经在《怎样才能做得到》一书中制定了一个实现社会主义的计划，规定到21岁为止应实行同完全免费维持学生生活联系在一起的义务教育。但是从14岁起每天应当以4小时，从19岁起每天应当以6小时从事生产性劳动。尽管这一计划十分低估了事情的经济困难，但是它在这一点上以及在其他许多方面无论如何是从完全明智的原则出发的。作者写道：“要想使一次社会改革取得成功，就必须遵守下列条件：第一，它必须是可能的，就是说它必须考虑到现有的而不是应有的人性；第二，它不应当试图对社会的结构进行暴力的或突然的改变；第三，在逐步实行这一改革的同时，它的效果每一次都必须是直接的和确实的；第四，一旦开始了这一改革，它的效果必须是持久的，它必须自动地起作用；第五，它的效果必须符合正义的要求，它的实现必须符合公正的要求；第六，它必须具有伸缩性，即容许经常的扩展、修订和改善。”（《怎样才能做得到，或建设的社会主义》，伦敦二十世纪出版社）

地改变了他们对于这一没落的实现速度的见解。在最近的关于社会民主党应当遵循的农业政策的争论中，固然在这一点上也还有着巨大的意见分歧，但是争论在原则上是围绕这样的问题的：社会民主党是否应当援助本来面目的农民、就是说作为独立的土地经营者的农民反对资本主义，如果应当，那么应当到什么程度。

提出这一问题比回答它要来得容易。农民大众即使不是雇佣工人，仍旧属于劳动者阶级，就是说，他们不是依靠单纯的财产名分或生来的特权而维持生计的，这一点使他们本来就接近雇佣工人阶级。另一方面，他们占德国人口的很大一部分，在选举时他们的投票在许许多多选区中都起着决定资本主义党派与社会主义党派的胜负的作用。如果社会民主党过去或现在不想局限于做这一意义上的工人党，也就是说基本上只是工会运动的政治补充的话，那么它必须考虑至少使农民的一大部分关心社会民主党候选人的胜利。人们要长期使多数小农做到这一点，只有通过拥护那些给他们以在最近的将来获得改善的希望、给他们带来直接的方便的措施才行。但是在许多具有这种目的的措施上，立法不能对小农和中农加以区别，另一方面，当立法把农民当作公民和劳动者来对他进行帮助时，也不可能不把他当作“经营者”而至少给以间接的支持。

这一点也表现在考茨基所提出的社会主义农业政策的纲领上，他在关于农业问题的著作的结尾，在“农民阶层的中立化”的标题下描述了这一纲领。考茨基令人信服地指出，即使在社会民主党胜利以后，党也没有理由用高压手段来实行排除农民的田庄。但是考茨基同时也坚决反对支持这样的措施或提出这样的要求，这些措施和要求企图按照人为地维持作为经营者的农民这一意义来实行“农民保护”。考茨基建议实行一大批旨在减轻农村公社（Landgemeinde）的负担和增加它们的收入来源的改良，或者宣称，支持这些改良是可以容许的。但是哪一阶级将首先从这些措施得到好处呢？按照考茨基自己的叙述，是农民。因为正如他在他的著作的其他一些段落中所强调的，在农村中，即使在

普选权支配之下，也谈不到无产阶级能对公社事务起值得一提的影响。农村的无产阶级过于孤立，过于落后，过于依赖控制他们的那少数几个雇主，以致起不了这样的作用。“除了对土地占有有利的公社政策以外，在那里不能设想有另外的公社政策”。今天同样也不能“设想由公社经营的近代农业，由村社经营的合作制的大农场”。（《农业问题》，第337及338页）虽然在这一限度内这样说是正确的，但是像“将大地产的狩猎区并入农村公社”、“由国家负担学校、济贫和道路的费用”这样的措施，显然将起改善农民的经济状况、从而也起有助于巩固农民占有的作用，因而在实践上也将起保护农民的作用。

我认为在两个前提下拥护这种农民保护是不必担忧的：第一，存在着有力的农村工人保护同它相对立；第二，民主在国家和公社中占支配地位，这一点本来就是实现农民保护的先决条件。^①考茨基也假定有这两点。但是考茨基低估了农业工人在民主的农村公社中的重要性。只有在完全处在交通圈外的公社里，农村工人才像他在上述地方所描写的那样孤立无援，而这样的公社的数目将愈来愈少。一般说来，农业工人今天已经相当觉悟到自己的利益，而在普选权支配之下会愈来愈是这样，考茨基自己也为这一点举出了足够的材料。此外在大多数公社中，在农民本身之间存在着形形色色的利害对立，而且农村公社的手工业工人和小商人中也包括在许多事情上同农业工人比同农民贵族有着更多的共同利益的分子。由于这一切，很少会发生农业工人单独地同团结一致的“反动的一帮”相对立的情况。不如说，在农村公社中，长久下去，民主也一定会朝社会主义的方向起作用。我认为，民主同交通工具

^① 我在这里撇开了同这些问题联系在一起的管理技术问题。把筹集资金的义务分配给一个机构——国家，把对于这些资金的不受限制的支配权分配给另一个机构——公社，这显然是荒谬的。必须承认国家作为筹集资金的机构对公社的支出有广泛的财政监督权，否则公社就必须至少自己负担所提出来的目的所需费用的一部分，这样就可以使不恰当的支出也成为公社的负担。（就我来说，我认为在这些事情上，国家应当成为辅助的财务局，而不是主要的财务局。）（方括号中的这一句在第2版中已删去。——编者注）

的重大变革的反作用结合起来，是比农业经济的技术改造更为强大的解放农村工人的杠杆。

不过考茨基的纲领的主要方面，而且正是在他最着重的各点上，事实上只是资产阶级民主的要求在农业关系中的应用，这些要求由于对农业工人的扩大的保护规定而得到加强。根据前面所说的可以明显地看出，这一点在我眼中决不当说是过错。我所说的也没有一点不是考茨基本人曾经特地强调过的。他甚至说，必须拒绝把社会民主党农业纲领的名称加给他的纲领，因为纲领中在有关农村自治方面有利于农业工人的那些要求，一部分已经基本上包含在社会民主党的劳动保护要求和当前的政治要求之中，而另一部分则除了森林经营和水利经营国有化的要求以外，只列举了一些“小措施”，这些措施在别的地方已经部分实现，而社会民主党在这一方面同其他党派的区别，只是在于它代表普遍利益反对私有财产时的彻底性。不过一个纲领是否能被称为社会民主党的纲领，的确也完全不取决于个别要求的意义，而是取决于全部要求在其互相关联中的意义。社会民主党当作当前要求提出来的，只能是适合目前情况的要求，不过要具有这样的条件，即它们包含朝着社会民主党所争取的社会制度的方向继续发展的萌芽。但是这一类的要求没有一个不是这个或那个非社会主义政党所不能或不会拥护的。凡是一切资产阶级党派必然要在原则上加以反对的要求，仅仅由于这一事实就要被说成是空想的了。另一方面，社会民主党也不能根据如下的理由而提出在现存的经济关系和力量对比的情况下与其说是会有助于动摇目前的财产关系和统治关系、不如说是会有助于巩固它们的那些要求，这一理由是：这些有关的措施在另一些条件之下，在一个进一步的发展阶段，能成为对生产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杠杆。例如不动产抵押的国有化就是考茨基在经过慎重考虑以后决定放弃的这一类要求中的一个。〔这一要求目前不是社会民主党的事情。〕^①

① 方括号中的话在第2版中已删去。——编者注

如前所述，我在原则上是完全赞同考茨基的纲领的，我不想通评纲领的全部细节，不过我认为不应当把某些有关它的话忍住不说。在我看来，正如已经阐述过的，社会民主党对于农村居民应当完成的任务可以分成三类。这就是，第一：克服一切仍旧存在的地主封建主义的残余和支柱以及为公社和县内的民主而斗争。从而要像考茨基所提出的那样，主张废除世袭财产制、私领区、狩猎特权等等。在考茨基的“在公社和省实行最充分的自治”这样的措辞中，我认为“最充分”一词选用得不好，我想用“民主的”一词来代替它。最高级形容词几乎总是要引起误解的。“最充分的自治”可以是指参加者的范围而言，在这种情况下，它所要说的意思肯定可以用民主自治一词更好地加以表示；但是它也可以是指支配权而言，在这种情况下它就会意味着公社的专制主义，这既没有必要，也同健全的民主制要求无法协调。在公社之上有着民族的普遍立法，它分配给公社确定的职能，并且代表整体利益来反对公社的特殊利益。第二，保护农业中的劳动阶级和减轻他们的负担。这一项包括狭义的劳动保护：废除仆役条例，限制各种工种的雇佣工人的劳动时间、卫生警察、教育制度，以及使作为纳税人的小农减轻负担的那些措施。我认为，就劳动保护的方面说来，考茨基建议禁止少年工人在晚上7时到早晨7时之间劳动，是不合适的。在夏季这意味着把劳动从早晨的时间移到一天里最热的时间，目前在这一段时间内习惯上反而是完全停止劳动的。夏天在乡间一般早起，而对于收获期的某几种劳动说来，是不可避免要趁早开始的。^①标准劳动日在乡下不可能像在工业中一样实行。正像考茨基自己也阐述过的，只有通过为一年的整个劳动周程规定的劳动计划这一手段，才能实现标准劳动日。这一计划照顾到各种不同的取决于天气等等的季节劳动的性质，而它的基础是幼年工

^① 例如在牧草栽培中割草时，幼年人担当的任务是把割下来的草铺开，使它在一天之内晒干。如果不禁止他们干这种劳动以及作为补充的翻转和堆积的劳动，那么在最热的月份里允许在上午8时到10时、下午4时到8时的时间里干这种活，对于他们和对于事情本身都是更加有益的。

人以及成年工人的可以容许的劳动时间的平均最高限度。这样一来，同成年人的 8 小时标准劳动日相当的将是幼年人的 6 小时标准劳动日。第三，反对财产绝对主义，促进合作制度。本项包括像这样的要求：“限制土地私有权，以促进：一、土地划分，消灭耕地交错状态；二、土壤改良；三、传染病预防。”（考茨基：《农业问题》）“减轻过重的佃租，通过为此目的设立的法庭实行。”（同上书）由公社建筑卫生舒适的工人住宅。“通过立法促进合作制的联合”（同上书）^①。赋予公社以通过购买或剥夺而获得土地并且以低额地租出租给工人和工人合作社的权利。^②

三、合作社政策

上面举出的最后一个要求引出了合作社问题。在关于合作社的经济能力的一节中所作的论述以后，我在这里简单地说一下就行了。今天的问题不在于，应不应当有合作社。不管社会民主党愿意不愿意，合作社已经存在而且还将存在下去。固然社会民主党过去或者现在能够通过它对于工人阶级的重大影响而延缓工人合作社的推广，但是它不会由此而对自己和工人阶级有所贡献。在党内已经屡次表现出来的对待合作社运动的冷淡的曼彻斯特主义同样不值得推荐，这种主义通过宣称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不可能有社会主义的合作社来论证自己。不如说，重要的是应当采取明确的态度并且弄清楚，社会民主党能够推荐什么样的合作社和根据党所掌握的手段来从道义上加以支持，对于什么合作社则不能如此。1892 年在柏林举行的党代表大会关于合作社制度所作的决议，仅仅由于以下的原因就已经是不充分的了：它所看到的只是合作社的一种形式，即工业生产合作社。如果把这种合作社设想成反对资本主义工厂的独立的竞争企业，那么在这一限度内对它们采取最大的冷淡态度当然是恰当的。但是适用于它们的经济能力的看

① 参看考茨基：《土地问题》，三联书店 1955 年版，第 505—506 页。——编者注

② 新的英国地方行政法包含一项这种类型的条款，当然是附有极多的限制的。自由党政府在 1894 年提出这一条时的最初的措辞要更为激进得多，但是鉴于以上院为后盾的保守党的反对，不得不把它改得缓和了。

法，对于合作企业的其他形式并不适合。对于消费合作社以及那些同它们联系在一起的生产合作社就不适合。对于农业合作社来说这种看法是否也能站得住，也是成问题的。

我们已经看到，信用、购买、制酪、加工和贩卖合作社在一切现代国家的农村居民中的突飞猛进达到了多么厉害的程度。但是这种合作社在德国大抵都是农民合作社，即农村“中间等级运动”的代表者。它们同日益增长的资本主义积累所带来的利息降低结合起来，实际上能够大大有助于保持农民经济对于大经营的竞争能力，这一点我认为是无法驳倒的。这些农民合作社其实大多数是非社会主义分子、小资产阶级自由派、教士、反犹太主义者比武的场所。社会民主党在今天对于这种合作社几乎是根本不加考虑的，哪怕在它们的队伍中也许也有不少同社会民主党比同上述那些党派更为接近的小农。这些合作社的调子是由中农确定的。如果说社会民主党曾经有过借助合作社对农村居民的那一阶层产生较强烈影响的希望的话，那么它恰好没有接上头。它今天只能或者也许只能考虑农业工人和细小农民的合作社，这种合作社的形式还没有被发现，或者无论如何还没有经过试验。但是如果我们考虑到农业工人的持久性工会组织迄今即使在英国也还没有存在的可能，虽然那里并没有仆役条例和结社禁令加以阻碍，考虑到因此这种组织在我们这里也很少有前途^①，而另一方面一切可能有的代理人今天都在着手通过永佃农庄和其他类似的创造物（Schöpfung）来把农业工人束缚在乡土上，如果我们这样考虑的话，那么我们必须也对自己说，社会民主党负有任务至少要指出一条道路，使农业工人有可能按照自己的方式利用合作社这一手段。为了这一目的，最重要的要求是：足够的土地和开辟销售可能性。就前者来说，我认为上面举出的要求，即公

^① 关于意大利农业工人运动几年来所能够记录下来的显著成就，我认为还不适合对它们的社会经济影响下一个总结性的判断。不过它们无论如何是值得注意的。德国争取实现了民主共和国，这毕竟也为德国农业工人（他们的组织在战前最后几年已经有了出色的蓬勃发展）扫清了通向伟大创造的道路。——补注

社应当保有通过剥夺获得土地并且按照公平的条件出租给农业工人合作社的权利，是对于民主的发展最切近的要求。而当农村的工人合作社还必须同资本主义商业界的抵制作斗争时，城市的工人合作社能够为它提供销售可能性。

然而农村工人合作社即使如此还是停留在纸上的，因为首先还应当争取民主。也许目前还可以考虑像弗·奥本海默尔所建议的那样，通过自助或私人资金创办这样的合作社。但是这同创办消费合作社一样，对于作为政党的社会民主党来说，都不在它的任务范围之内。作为从事政治斗争的党，它不能插手经济性试验。它的任务是把阻碍工人的合作社运动的立法障碍清除掉，并且为合乎目的地改造在必要时可以负起促进这一运动的使命的那些行政机关而斗争。

但是如果说社会民主党作为政党没有创办消费合作社的使命，那么这并不意味着它不应当对消费合作社关心。所谓消费合作社不是社会主义企业这种被人爱用的解释，是以形式主义为根据的，同一种形式主义曾经被长期用来对付工会，现在开始让位给相反的那一极端了。一个工会或者一个工人消费合作社是否社会主义性的，不取决于它们的形式，而是取决于它们的本质，取决于贯穿它们的精神。它们肯定从来不是森林，但是它们是树木，能够成为森林的很有用的部分和真正的荣誉。如果不用比喻来说，那就是，它们不是社会主义本身，但是它们作为工人组织包含着充分的社会主义因素，足以把自己发展成社会主义解放的有价值的和不可缺少的杠杆。如果始终充分听任它们自己从事自己的组织和管理，那么它们肯定会极好地完成自己的经济任务。但是，许多社会主义者从前对工会运动所抱的厌恶和甚至敌对态度，逐渐转变为友好的中立，然后又转变为一致感，消费合作社的遭遇也将同它一样——部分地说来已经是这样了。实践在这里也是最强大的指导者。^①

不仅是工人革命运动的敌人而且也是任何工人解放运动的敌人的

^① 自从写了以上的话以后，工人消费合作社已经在社会民主党内争取到完全的承认。——补注

那些分子，曾经通过他们的反对工人消费合作社的战斗迫使社会民主党不得不作为政党而支持消费合作社。经验也同样表明，关于合作社从政治性的工人运动夺取知识力量或其他力量的这一类担心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在个别地方也许会暂时一度出现这种情况，但是就长远来说无论在什么地方都不如说会出现相反的情况。社会民主党在具备建立工人消费合作社的经济和立法的先决条件的地方可以放心地看着它们建立，而且它对它们表示充分的好意和尽力促进它们，将是有好处的。^①

也许只有根据某一种观点才能够把工人消费合作社看成原则上令人担心的东西，就是看成妨碍更好的东西的好东西。在这种场合，由公社组织商品购买和商品贩运，应当算是更好的东西，几乎在所有的社会主义体系中都是这样规定的。但是第一，民主的消费合作社为了要把它所在的公社的所有成员包括进来，根本不需要作任何原则上的变动，只需要扩大它的构成，而这同它的自然倾向是完全一致的（个别小地方的消费合作社今天已很接近于把公社的全部居民列为成员了）；第二，这一思想的实现还在十分遥远的将来，它需要许多政治的和经济的变化以及发展的中间阶段作为前提，因此如果由于考虑到它而放弃工人今天借助于消费合作社所能获得的利益，那将是荒谬的。今天，如果考虑到的只是政治的公社，那么问题只能在于由它来照料完全确定的普遍需要。

四、地方自治政策

这一来我们最后就说到了社会民主党的地方自治政策。长期以来这也是社会主义运动的继子或者是它的一个继子。例如在还不很久以前，在外国的一家现在已经停刊的由一些很富于才智的人编辑的社会主义报纸上，就曾经以嘲笑的态度把下面这样的思想当作小资产阶级思想而加以拒绝了：今天已经可以利用市政府作为社会主义改良工作的杠杆，社会主义要求的实现可以从地方自治机构出发，但并不需要因此撇开议会活动不管。命运的讽刺使这家报纸的主编只有凭借市政社

^① 但是这种促进不应当是允许消费合作社经营劣等商品等等。——第1版第160页注

会主义的力量才能进入本国的议会。在英国也是一样，社会民主党在成功地做到把自己的代表送入国会以前，也在地方自治机构中找到了进行卓有成效活动的丰饶田地。德国的发展与此不同，社会民主党在这里，在以值得一提的程度立足于地方自治代表机关以前，早已得到了议会的公民权利。随着党的日益增长的扩展，它在地方议会选举中的成就也增加了，因此愈来愈出现了制定一个社会主义地方自治纲领的必要，而对于个别的邦或者省来说，关于这样的纲领也已经取得一致了。例如就在最近，1898年12月27日和28日，勃兰登堡省社会党地方议员的一次代表会议就地方自治机构选举的纲领达成了协议，这一纲领整个说来是出色地符合它的目标的，没有任何一条会引起原则性的批评。但是它只限于提出属于今天地方自治机构所拥有的权利范围之内的要求，并不去对根据社会主义观点地方自治机构应当有什么权利和任务这一问题进行原则性的分析，而对于一个行动纲领也不可能指望它是别的样子。反之，社会民主党的总的地方自治纲领在这一问题上却恐怕必须说几句话。社会民主党为地方自治机构要求什么，它期望从地方自治机构得到什么？

爱尔福特纲领在这一方面只是说：“人民在帝国、邦、省和市镇内的自决和自治，由人民选举官厅”，并且为一切选举要求一切成年人的普遍、平等和直接的选举权。它对于上面列举的行政机构相互之间的法权关系没有表示意见。毫无疑问，大多数代表同本书的作者一样，在当时对这件事情是这样理解的：列举这些机构时的顺序应当表明它们的法权等级，因此在发生冲突的场合，帝国法律应当胜过邦等等的法律。但是这样一来，举例说吧，人民在市镇中的自决就将部分地重新被取消或者受到限制。正像早在前面已经阐述过的，实际上我在今天仍旧认为，国家的法律或决议必须构成社会的最高法律权威。但是这并不是说，国家和地方自治机构之间的权利和全权的界限应当像今天这样。

例如，地方自治机构的剥夺权在今天是很受限制的，因此一整系列的经济政策性的措施将在地主们的抵抗或过分的要求中遇到简直是不

能越过的障碍。因此扩大剥夺权也许是地方自治社会主义的当前要求之一。不过并不必须要求绝对的、完全不受限制的剥夺权。地方自治机构将永远承担义务，在剥夺时遵守一般法律关于保护个别人免受偶然的多数人的专横之害的那些规定。在任何社会中，一般法律所容许的财产权必须在一般法律还容许的时候和在它所容许的程度上不受触犯。用除了赔偿以外的方法来剥夺被容许的财产，就是没收，这只有在非常的环境压力（战争、瘟疫）的情况下才能够是正当的。^①

因此，如果可能有社会主义的地方自治政策的话，社会民主党除了必须为地方自治机构要求选举权的民主化以外，还必须要求扩大它的在德国许多邦还受到很大限制的财产剥夺权。此外还有它的行政特别是治安警察的行政要完全不依赖国家权力。它必须向地方自治机构要求的東西，就赋税政策和学校政策方面来说，基本上已在党的总纲领中规定下来了，不过勃兰登堡纲领中做了一些有价值的扩大（设立学校食堂、任用校医等等）。此外，把一些同地方自营企业或公共服务业以及地方自治机构的工人政策有关的要求提到首要地位，这在今天已是正当的了。就前一项来说，应当作为原则性要求提出的是，一切针对地方成员的普遍需要并且带有垄断性质的企业应由地方自治机构在自己

① 几年以前我在为拉萨尔《既得权利体系》的摘录所写的序言中已经竭力表达了这一思想。正像拉萨尔所写的，这一著作本身的目的是使革命法和实在法和解，就是说在革命法中仍旧使实在法得到满足。我不惜冒着被责备为小市民思想的危险，毫不踌躇地宣称，我认为关于不过是法律形式掩盖下的没收的那种剥夺（根本不必谈按照巴歇尔方案进行的剥夺了）的思想或观念，即使完全撇开这种剥夺从纯粹经济的实用主义理由看来也是应加谴责的这一点不谈，仍是完全应加以谴责的。“不管人们假定在那时——在走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要对迄今的财产特权的领域进行多么广泛的干涉，这都不可能是无意义地支配着的野蛮暴力，而将是一种确定的法权观念的表现，哪怕这一观念是新的并且是以原始力量得到贯彻的。”（《拉萨尔全集》第3卷，第791页）。“剥夺剥夺者”的最符合原始的社会主义法权原则的形式是通过组织和机构实行赎买。

新版补注：同这里所阐述的相反，那些自称布尔什维克的俄国社会主义者，当他们在俄国取得统治以后，实行了规模最广泛的不加赔偿的没收。俄国的人民大众从这里没有得到丝毫的好处，却吃到了最糟的经济混乱的苦头，这一点连布尔什维主义的代言人们自己也几乎不再反驳了。

的管理下经营，此外地方自治机构还应当努力不断扩大它对于所属居民提供服务的范围。关于工人政策，必须向地方自治机构要求：它作为工人的雇主，无论是涉及自己管理下的劳动还是契约劳动，都要把有关工人的组织所承认的工资率和劳动时间当作最低条件来遵守并且保障这些工人的结社权。不过这里要说明一下，努力促使地方自治机构作为工人雇主在劳动条件和福利设施方面为私人企业做出良好的榜样，即使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如果为地方自治机构的工人要求这样高的条件，以致使他们同自己的同行比起来处于一种异乎寻常的特权阶层的地位并且使地方自治机构的生产比私人业主贵得很多，这毕竟是一种近视的政策。长久下去这只会导致腐化和集体意识的削弱。

现代的发展还分派给地方自治机构另一些任务：设置和监督地方疾病基金，也许在不太久的时期以后要加上接管残废保险。此外还有设立劳动介绍所和工业法庭。在劳动介绍所方面，社会民主党主张作为最低要求应当保证它们的〔劳资双方〕同数代表的性质，关于工业法庭则主张强迫采用和扩大它们的全权。社会民主党对于地方自治机构实行失业保险的尝试即使不抱否定态度，也是表示怀疑的，因为目前占优势的看法是，这种保险是工会的合法任务之一，工会也能够更好地照管它。但是这一点只适用于组织得很好的工种，可惜他们还是工人阶级的一个微小的少数。工人的大多数还没有组织起来，而且地方自治机构在工会参加下进行的失业保险，未必不能这样地组织，使它远不能成为对工会的合法职能的侵犯，而恰好成为促进工会的手段。无论如何，在实行这样的保险的地方，社会民主党地方议员的任务是，竭尽全力督促工会参加。^①

^① 在这一方面，也是首先由实践按照上面的阐述的精神做了决定。1901年首先在甘特采用并且得到广泛模仿的制度，实现了由地方自治机构和工会联合照管的失业保险。——补注

在写了上面这些话以后，在某几个德国市镇中，通过由地方自治机构向工会提供失业基金而解决了这一问题。——英译本第194页注

因此市政社会主义按其整个性质来说是我们在前一节中所称为**民主的劳动权利**的形成或完全实现的不可缺少的杠杆。但是在地方自治机构选举权是等级选举权的地方，市政社会主义将要并且一定要保持为补缀的工作。但是在德国的远远超过 3/4 的地方是这种情况。因此我们在这一方面也像在有关邦议会（地方自治机构在很大程度上的确是从属于它们的）和其他自治机关（县省）的方面一样，面临着这一问题：社会民主党怎样才能做到废除对它适用的等级选举制度和争取这一制度的民主化呢？

社会民主党目前在德国，除了口头的和文字的宣传手段以外，还有帝国议会选举权作为贯彻自己要求的有效手段。这一选举权的影响是如此强大，它甚至扩展到由于财产资格选举权或者等级选举制度而使工人阶级无法进入的那些机构，因为各党派在那里也必须考虑到帝国议会的选举人。如果帝国议会选举权得到不受任何侵犯的保障，那么把对于其他机构的选举权当作从属性问题看待，就因此而在一定程度上有道理可说了，尽管如此轻率地对待这一问题仍是错误的。但是帝国议会选举权决不是有保证的。固然各届政府和执政党轻易不会下决心改变它，因为它们自己恐怕也要对自己说，这样一种措施一定会激起德国工人群众的仇恨和愤慨，而有了适当的机会，这种仇恨和愤慨就会以种种方式使它们很不痛快地感觉到。社会主义运动已过分强大，德国工人的政治自觉已过分发达，以致人们不可能用骑士的态度来对待它们了。人们也可以假定，甚至普选权的主要敌人中的一大部分，对于剥夺人民的这种权利也会感到某种道义上的胆怯。但是如果说在正常条件下限制选举权会制造出一种革命的紧张状态及其对于统治者的全部危险，那么与此相反，要对选举权作这样的变动，即只允许独立的社会党候选人在例外的情况下取得成功，这是谈不到有什么严重的技术困难的。在这里起决定作用的仅仅是政治上的考虑。不过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以政治考虑为根据的担心在那时将像秋风扫落叶一样地被吹散，这一点在这里就用不着详细叙述了。要阻止这种情况发生，是社

会民主党力所不及的，这也用不着说了。在社会民主党这一方面，当然可以把关于不让自己受任何挑拨的引诱而进入暴力冲突的决心贯彻到最彻底的程度，但是它没有力量阻止政治上无组织的工人，使他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卷入这样的冲突。

根据这个和其他的理由看来，使社会民主党的政策片面地取决于帝国议会选举权的条件和可能性，就不是好办法了。而且我们已经看到，就国会选举权来说，也并不是像人们根据 1890 年和 1893 年的成绩所推论的那样迅速地进展的。在 1887 年到 1890 年这 3 年的时期里，社会党的选票数增加了 87%，从 1890 年到 1893 年这 3 年的时期里，增加了 25%，而在 1893 年到 1898 年这 5 年里却只增加了 18%。这一增长就本身来说也还是很显著的，但是这种增长并不能使我们有理由期待在最近的将来发生非常的事情。

不过社会民主党并不是仅仅依靠选举权和议会活动的。在议会之外也保留着它的巨大的和广阔的活动场所。即使议会对社会民主党关门，社会主义的工人运动仍将存在。没有比俄国工人界的可喜的活动能更好地证明这一点了。但是随着社会民主党被排除出代议机关，德国工人运动将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今天把它的各个部分结合起来的内在联系，它将带上混乱的性质，而代替镇静的、不断的稳步前进的，将是跳跃式的前进运动，并伴有不可避免的倒退和衰竭。

这样的一种发展既对工人阶级没有利益，而在社会民主党的某些敌人看来，它也不是值得想望的。这些敌人已经达到了这样的认识，即认为当前的社会制度并不是为了永恒而创造的，而是受变化的规律支配的，只有在政治权利上也考虑到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以及阶级发展中的变化的时候，一场灾变式的发展及其一切恐怖和破坏才能因此避免。看透这一点的人的数目正在不断地增长着。如果社会民主党有勇气从实际上已经过时的一套惯用语中解放出来，并且愿意表现为它今天实际上的那个样子，即一个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改良政党，那它的影响

将比今天更加大得多。^①

问题不是在于发誓放弃所谓革命的权利，这一纯粹思辨的权利是任何宪法也不能把它写成条款，世界上任何法典也不能加以禁止的。如果我们放弃了呼吸的权利，自然规律就要强迫我们死亡，——只要这种情况还存在，革命的权利就将存在。这一不成文的并且无法规定的权利不会因为人们站在改良的立场上而受到影响，如同防卫的权利不会因为人们制定了调整我们的个人争执和财产争执的法律而被废除一样。

但是难道社会民主党今天不是一个力图通过民主改良和经济改良的手段来实现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政党吗？根据斯图加特党代表大会上的一些反对我的声明看来，也许不是。但是人们在斯图加特把我写给党代表大会的书信解释成攻击党在布朗基主义的水路上航行的控诉，而事实上它只是针对一些人的，这些人用布朗基主义性质的论据和空话来攻击我，并且打算促使通过一个反对我的代表大会宣言。如果说一些素来冷静和客观地判断的人由于我的文章（非常违反我的意志和期待）所引起的嘈杂之声而暂时被引入歧途，出来反对我，并且从而表面上赞同那些叫嚷把我逐出教门的人，这却不能使我有过任何一瞬间对这种一致性的转瞬即逝的性质产生错觉。我除了把库诺对我反对崩溃空想的言论的反驳看成一种暂时情绪的产物，还能把它看成别的什么呢？就是这同一个库诺在1897年春天还曾写道：

我们离开资本主义发展的最终目的还相当远，我们生活在商业和工业的主要中心，眼看到生产的巨大增长和自由资产阶级的没落，只会过分乐意低估还把我们同这个目的隔开的那些距离和阻碍。究竟在哪个国家里资本主义的自己破产已经进展得这样远，以致这个国家能够算是对于社会主义经济形态已经成熟的呢？在英国不是这样，在德

^① 这句话受到了最大的攻击。但是凡是不拘泥于文字（这是可以作种种解释的）而是按照这里阐发的精神来理解这些话的人，就会懂得为什么尽管已经发生了1917年、1918年和1919年的多次革命，我仍旧宣称坚持它。——补注

国和法国更不是这样。(库诺:《我们在东亚的利益》,载于《新时代》第15年卷,第1册,第806页)

甚至斯图加特党代表大会的反对我的声明的断然裁决也没有能够使我关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大多数人离开布朗基主义的发作很远的这一信念有所动摇。在奥恩豪森演说以后,我就知道,不能指望党代表大会采取同它实际上所采取的不同的另一种态度,在这以前我也已经在书信中十分确定地说明了这一点。^①

奥恩豪森演说从那时以后分享了非常人物的许多别的演说的命运,它被半官方地纠正了,云彩被解释成了一只貂^②。而党在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以来是按什么样的精神发表意见的呢?倍倍尔在他的关于暗杀企图的演说中竭尽全力对认为社会民主党主张暴力政策的看法提出异议,所有的党报都赞赏地报道了这一演说,任何地方也没有发出抗议。考茨基在他的《农业问题》中发挥了社会民主党农业政策的基本原则,这些原则完全是民主主义改良的原则,而在勃兰登堡通过的地方自治纲领则是一个民主的改良纲领。党在帝国议会中赞成扩大工业仲裁法庭的全权和强制采用这种促进工业和平的机关。党的代表在议会里发表的演说全都散发着改良的气味,按照克拉拉·蔡特金的说法,“伯恩施坦派”在斯图加特已经被送终了,但就是在同一个斯图加特地方,在代

^① 在斯图加特代表大会前几天,在1898年9月6日,威廉第二在威斯特伐利亚的奥恩豪森宣布了一项法律,威胁要对胆敢阻止一个人进行工作或者唆使他罢工的那些人处以惩罚性劳役。这样一次演讲理应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中间制造出一种革命的情绪,这是世界上最自然的事情。但是这一威胁成了泡影。帝国议会以很大的多数否决了关于这一问题的一项法案,虽然这一法案不过是皇帝所宣布的那一法律的冲淡了的版本。这一演说的命运证实了我的断语。——英译本第198页注

1898年9月6日,威廉第二在奥恩豪森温泉的一次宫廷午宴上宣布了一项将对煽动罢工处以苦役的法律。但是在帝国议会1898—1899年之交的冬季会期中,一项包含上述主旨的法律草案被很大的多数否决了。——补注

^② 云彩的德文为“Wolke”,貂的德文为“Wiesel”。云彩是白的,貂皮是黑的,这句话可能是说半官方对奥恩豪森的演说作了颠倒黑白的解释。1993年英国出版的本书新的英译本就是按这一意思翻译的。——编者注

表大会以后不久，社会民主党就同资产阶级民主派结成了地方议会选举的选举联盟，而符腾堡州的其他城市学了他们的榜样。在工会运动中，一个工会接着另一个转而采用失业补助制度，这实际上意味着放弃纯粹的结社性质，并且它们宣称赞成同数代表制的、包括企业主和工人的城市劳动介绍所，而在许多大的党区——汉堡，爱尔伯斐尔德，社会党人和工会会员已着手创设消费合作社。到处都是为了改良的行动，为了社会进步的行动，为了争取民主的行动——“人们研究日常问题的细节，去寻求在日常问题的基础上推动社会沿社会主义方向朝前发展的杠杆和出发点”。正好在一年以前我就是这样写的^①。我看不到任何的事实能够促使我从其中撤回一句话。

此外我还要重复说，社会民主党越是下定决心要表现为它实际的那个样子，它的贯彻政治改良的希望也就越是增加。恐惧肯定是政治中的一个伟大因素，但是如果有人以为煽起恐惧就能做到一切，那就是自己骗自己了。英国工人获得选举权并不是在宪章运动表现得最革命的时候，而是在革命口号销声匿迹并且工人为了争取改良而同激进资产阶级结成联盟的时候。谁要是反对我说，德国不可能有相似的情况，那么我就要请求他读一下，还在15年和20年以前，自由主义的出版物上关于工会斗争和工人立法是怎样写的，以及这些党派的代表在要就与此有关的诸问题作出决定的帝国议会上是怎样说和怎样投票的。这一来他也许会承认，政治反动决不是资产阶级德国的最具特色的现象。

末章 最终目的和运动

——康德反对 Cant^②

本书已有好几处提到，在对事实和思想作出判断时，即使在社会民

① 《社会民主党的斗争和社会革命》，载于《新时代》第16年卷，第1册，第451页。

② 德文中的Cant一词是取自英文的外来词，它在这里的意义是：“（虚伪的）口头禅”，而它的发音和哲学家康德的姓完全一样，为保存伯恩斯坦原来使用这一词的双关意义，所以没有把它译成中文。——译者注

主党党内，传统也起着重大的影响。我特地说“即使在社会民主党党内”，因为传统这个力量是任何党、任何文学或艺术流派都不能摆脱的非常广泛的现象，它甚至强烈地影响了大多数科学。它也几乎从来没有被彻底根除过。在人类认识到传统同现存状态无法协调，从而有可能把前者完全束之高阁以前，总必须经过一个相当的时期。在这件事发生或者能够在不损害已定事物的条件下发生以前，传统通常是把那些没有强大的、不断起作用的利益或外部压力加以联结的事物团结在一起的最有力的手段。一切讲求行动的人（尽管就他们的目的来说他们是多么革命的）对于传统的直觉的偏爱就是由此而来的。“Never swap horses whilst crossing a stream”^①——渡河中途切勿换马——老林肯的这句格言，同拉萨尔反对“自由主义的吹毛求疵精神”和“个人自以为是和自作聪明的毛病”的著名诅咒，所根据的思想是相同的。传统在本质上是保守的，而批判总是首先是破坏的。因此在重大行动的刹那，即使是实质上极有道理的批判也可能成为有害的，从而是可加责难的。

承认这一点，自然不是把传统奉为神圣并且禁止批判。各党派并不总是处在要求把全部注意力只放在一件任务上的那种急流之中。对于一个希望跟得上实际发展的党来说，批判是不可缺少的，而传统则可能变成压迫人的重担，从推动的力量变成束缚人的桎梏。

但是人类只是在极少的情况下才乐意对他们的传统所根据的前提中已经发生的变化的重要性给以充分的考虑。通常他们宁可只在一定的限度内估计这些变化，即只承认不可抹煞的事实，并且把这些变化尽可能同传统的口号协调起来。这种手段叫做讲歪理，而由此得到的言语上的成果通常就是 Cant。

Cant——这是英语中的一个词，据说起源于16世纪，是用来描写清教徒冒充虔诚的单调歌咏的。它的一般意义是指虚伪的口头禅，它

^① 见林肯：《对民族联盟的答复》（1864年6月9日），原文为：“It was not best to swap horses when crossing a stream”（渡河中途最好不要换马）。这句话的意思是在紧要关头切忌改变策略或更换领导人。——编者注

们或者出于不动脑筋的人云亦云，或者被人在自觉其虚伪性的情况下用来达到某种目的，不管所涉及的是宗教还是政治，是灰色的理论还是绿色的生活。^①就这一广泛的意义来说，口头禅（Cant）是很古老的——例如再没有比古典时代以后的希腊人更糟糕的“念口头禅的人（Cant-drescher）”了——并且以不计其数的种种形态渗透到我们的整个文化生活中间。每一民族，每一阶级和每一个由教义或者利害关系联结起来的集团都有自己特有的口头禅（Cant）。它部分地已经变成纯粹属于习惯的东西，变成单纯的形式，以致再没有任何人会被它的空洞无物所欺骗，而对它进行斗争就等于闲得没事去做打麻雀。但是对于披着科学性外衣出现的口头禅（Cant）和已经成为政治口号的口头禅（Cant），却不能这样说。

我所说过的“人们通常称为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的东西，对我来说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这句话，曾经多次被解释为否认社会主义运动有任何确定的目的，格奥尔吉·普列汉诺夫甚至发现，这句“名言”是我从格尔哈特·冯·舒尔采-格弗尼茨^②的《论社会和平》一书中捡来的。这就是说，在那本书里有一个地方说道，把一切生产资料的国有化当作最终目的，这对于革命的社会主义来说固然是不可缺少的，但是对于把最近目标看得比较远的目的更为重要的实践的社会主义来说，却不是如此。既然这里把某种最终目的说成是实际目标所不必需的，而我也承认对于某种最终目的很少兴趣，因此我就成了舒尔采-格弗尼茨的“不加批判的追随者”。必须承认，这样的指证表现了惊人的博学深思。^③

① 这是借用歌德《浮士德》中的话：“亲爱的朋友，一切理论都是灰色的，而生活的黄金树是绿色的。”——编者注

② 格尔哈特·冯·舒尔采-格弗尼茨（1864—1943），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他的《论社会和平》、《马克思还是康德》等书都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编者注

③ 见1898年的《萨克森工人报》第253—255号上发表的一组论文：《我们为什么应当感谢他。给卡尔·考茨基的公开信》。考茨基在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上说，即使社会民主党不能听从我的观点，它毕竟能够因为我的论文所提供的启发而感谢我。在普列汉

八年前,当我在《新时代》上评论舒尔采—格弗尼茨的书时,虽然我的批评还受着我现在已不再主张的那些假设的强烈影响,但是我已经把关于最终目的和实际改良行动的原则性对立当作无关紧要的问题放在一边,并且承认——并没有遭到反对——,对于英国来说,像舒尔

诺夫先生眼中这是过分温和的批评。他妄以为,我在斯图加特已受到压倒多数的党代表的摒弃,但是他对此还不满足。我作为一个“思想贫乏得惊人的”无知者和资产阶级改良的“无批判的追随者”,作为一个“给了社会民主党理论以沉重打击并且力图——不管是自觉地还是不自觉地在这里都是一样的——以埋葬这一理论来博得‘联合起来的反动的一帮’的欢心”的人,必须被可耻地逐出一切正义者的团体,或者如普列汉诺夫先生所说的,“被社会民主党埋葬”。(这里所引的普列汉诺夫的话的译文可参看《反对哲学中的修正主义》,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6—38页。——编者注)

我不想在这里使用谚语中对诸如此类的刽子手行径所说的话。每一个人都按自己的本性行事,谁也不会指望孔雀唱出和谐的调子来。不过说我为博取“联合起来的反动的一帮”的“欢心”而从事我的杀人行径,这句话却使我不得不作一个简短的说明。

我在本书的其他地方引用了几家接受了我的结论或者自己发表了和我相似的意见的社会党报刊。名单可以拉得很长,但是对我来说重要的事情不是依靠思想相同的人的数目和名望的声势来加强我的论据。不过为了使普列汉诺夫的斗争方式真相大白,我必须还要说明一下,在俄国活动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中,即使不是极大的部分,也有一大部分人,其中包括俄国的工人报的编辑部,曾经声明坚决拥护一种同我十分相近的立场,这些人曾经把我的许多“内容贫乏的”论文译成俄文并且以单行本传播。这也许不是为了博取普列汉诺夫的“欢心”。但是在他所十分熟悉的这种情况下谈论“联合起来的”反动的一帮,这是多么无聊的态度啊!——顺便说一句,这一用语同马克思和恩格斯始终摒弃的关于反动的一帮的那一用语比起来,荒谬的程度要超过10倍。——第1版第169—170页注

我在这里和以下的地方原封不动地保留了一些对普列汉诺夫的攻击的尖锐的反驳,虽然攻击我的人现在已经去世了。不过我不能不说明,即使在我写下这些反驳的话时,我从未有任何一刻否认过普列汉诺夫在俄国传播马克思学说方面所立下的巨大功绩,我对于他为了社会主义事业的忘我活动是以非常感激的心情纪念着的。尽管他的攻击当时曾经狠狠地伤害了我,但是我并不因此怀恨这位在那么悲惨的境遇中死去的人,这尤其是因为,这一攻击显然是出于那种害怕被他看作至高无上的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宣传会由于我的著作而受到损害的感情,我固然不得不宣称这种感情毫无根据,但决不认为它是卑鄙的。

不用说,我现在比过去更加认为,产生这种恐惧的那一见解是值得反驳的,因为它是产生尼·乌里扬诺夫·列宁的学说的思想基础。普列汉诺夫的这位学生和当年的合作者,在俄国的大危机中恰恰和老师背道而驰,从而使后者的残年极为痛苦。但是他所做的不过是像后者一样,把这一学说的唯物主义因素夸大到极端而已。——新版补注

采—格弗尼茨所展示的那种进一步的和平发展的前景，至少并不是不可能的。我表示确信，在继续自由发展的过程中，英国工人阶级固然要提高自己的要求，但是他们只会要求那些每一次都毫无疑问地表明了必要性和实行可能性的事。这种说法在基本上同我今天所说的没有差别。如果有人打算拿英国社会民主党^①在这一期间所取得的成就来反驳我，我就要这样回答：这一进展是同英国社会民主党从一个空想的革命的宗派（恩格斯自己曾一再把它说成这样）到一个实际的改良的党的发展携手并进的，而且正因为有后一发展，才使前者成为可能。没有任何会动脑筋的社会主义者今天还梦想社会主义在英国会立刻通过一次大灾变而取得胜利，没有人梦想革命的无产阶级会突然地夺取议会。相反，人们愈来愈指望市政府和其他自治机构中的工作，人们抛弃了从前那种轻视工会运动的态度，同工会运动，并且在这里和那里也同合作社运动发生了密切的联系。

那么最终目的呢？哦，这始终恰恰是最终目的。“工人阶级……不是要凭一纸人民法令去推行什么现成的乌托邦。他们知道，为了谋求自己的解放，同时达到现代社会在本身经济因素作用下不可遏制地向其趋归的那种更高形式，他们必须经过长期的斗争，必须经过一系列将把环境和人都加以改造的历史过程。工人阶级不是要实现什么理想，而只是要解放那些由旧的正在崩溃的资产阶级社会本身孕育着的新社会因素。”^②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一书中就是这样说的。我在写下关于最终目的的那句话时，所想到的虽然不是这段话的全部观点，但确是它的基本思想。因为归根到底，这句话难道不正是说，运动即一系列的过程是一切，而任何事先详细确定的最终目的同它比起来是无关紧要的吗？我在当时就已经声明，如果这句关于最终目的的话的形式会容许人把它解释成宣称任何表述为原则的工人运动的一般目的毫无价值

① 我在这里是在广泛的意义上使用“社会民主党”一词，所指的是整个独立的社会主义运动。——英译本第 203 页注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第 60 页。——编者注

的话，那么我乐意放弃这种形式。但是在预先设想运动结局的各种理论中，凡是超出一般地表述的目的（即决定运动的原则性方向和性质的目的）的东西，必然要不断地陷入侈谈空想，并且在某一时期成为运动的真正的理论进步和实践进步的阻碍。

谁只要稍微知道一些社会民主党的历史，也就会知道，党是由于继续不断地违背这样的理论和违反根据这些理论作出的决议而行动才壮大起来的。恩格斯在为《内战》新版所作的序言中谈到公社中的布朗基主义者和蒲鲁东主义者，说他们二者都为实践所迫而违反自己的教条而行动；他所说的这种情况还曾经屡次以其他的形式重复出现。一种理论或者原则宣言，如果不是广泛到足以容许在每一个发展阶段都照顾到工人阶级的眼前利益，那么总是要被突破的，正如一切否定改良性琐碎工作和否定对接近的资产阶级党派的支持的誓言总是一再被忘记一样。而历届党代表大会总是一再要听到这样的诉苦：在这里或那里的选举斗争中，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没有被充分提到重要的地位。

在普列汉诺夫从舒尔采 - 格弗尼茨那里引用来攻击我的那句话里说，社会主义由于抛弃了关于工人 [在现代社会中] 处于绝望境地的断言，就失去了自己的革命锋芒，社会主义就被用来论证立法性要求了。从这一对比可以清楚地看出，舒尔采 - 格弗尼茨总是按照以暴力颠覆为目的的努力这一意义来使用“革命的”这一概念的。普列汉诺夫颠倒了事实，把我抛进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反对者”之列，因为我不认为工人处于绝望境地，因为我承认他们的处境有改善的可能性，并且承认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肯定的种种其他事实。

“科学社会主义”——的确的确。如果说科学一词曾经被贬低到纯粹的口头禅 (Cant)，那就是在这一场合。关于工人处境的“绝望性”的原理是在五十多年以前提出来的。它贯穿 30 年代和 40 年代的全部激进的和社会主义的文献，似乎有许多确凿的事实证明它正确。因此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宣称最低生活费用是天然的工资；《共产党宣言》中斩钉截铁地说：“相反，现代的工人却并不是随着工业的进步而上升，而是每

况愈下地降到本阶级的生存条件的水平以下。工人变成赤贫者，贫困比人口和财富增长得还要快”；在《阶级斗争》一书中说，工人处境的最微小的改善“在资产阶级共和国内部始终是空想”；这都是可以理解的。如果工人的处境今天仍旧是绝望的，那么这一原理今天当然也是仍旧正确的。普列汉诺夫的责备包含这样的意思。照他说来，工人处境的绝望性是“科学社会主义”的颠扑不破的公理。承认同它相抵触的事实，照他说来就是追随确认这些事实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因此他们才配受考茨基向我表示的感激。“一般地说，我们应当感谢一切‘经济协调论’的拥护者和崇拜者们，首先，当然是感谢不朽的巴夏！”^①

英国幽默大师狄更斯在他的一部小说^②中很出色地刻画了这种争论方式。一个生活贫苦但是有些自高自大的女人对她的丈夫说：“你的女儿嫁了一个叫花子”，当丈夫反驳她说，新女婿毕竟并不就是叫花子时，他得到了毁灭性的尖酸的回答：“是吗？我可不知道他有一大笔不动产。”^③反驳一种夸大，就等于主张另一极端的夸大。

到处都有天真的人，这样的诡辩可以对他们造成印象。承认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对于社会主义的前提的一些反对意见——这是多么背弃正道啊！但是我已经锻炼得足够坚强了，我只把维尔弗太太的讽刺看成幼稚。一个错误不会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度赞成它就值得保持不变，一个真理不会因为第一个发现它或表述它的是反社会主义的经济学家或者不十分重要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家就减少力量。在科学的领域里，倾向不能赋予特权或者发布革出教门的命令。舒尔采-格弗尼茨先生在表述现代英国发展史时的片面性（这我在当时无疑已经足够尖锐地加以否定了）并没有阻碍他在《论社会和平》一书以及在他的专著

① 普列汉诺夫：《反对哲学中的修正主义》，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8页。——编者注

② 指《我们共同的朋友》。

③ 中译文参看智量译《我们共同的朋友》下卷，1986年上海译文出版社版，第378—379页。这个女人就是下面提到的维尔弗太太。——编者注

《大企业是经济的和社会的进步》中确认对认识当前经济发展有重大价值的事实。我根本看不出其中有什么可以指责的地方，而且我乐于承认，我通过舒尔采—格弗尼茨，同样也通过其他由布伦塔诺学派出身的经济学家（赫克纳，辛茨海麦尔），才注意到许多我在以前不重视或者重视得很不够的事实。我甚至不羞于承认我也从尤利乌斯·沃尔夫^①的《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社会制度》一书中学到了一些东西。

格奥尔吉·普列汉诺夫把这叫做“〔科学社会主义〕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学说的折中主义的混合”。似乎科学社会主义的9/10的元素不是采自“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著作，似乎竟然有一种党的科学。^②

① 尤利乌斯·沃尔夫（1862—1935），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他的《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社会制度》一书激烈攻击马克思主义。——编者注

② 一个看法同我很接近的俄国社会主义者谢·普罗柯波维奇，在比利时社会民主党的杂志上的一篇关于斯图加特党代表大会的十分精辟的文章中责备我，说我在反对企图使科学成为党务的罪行的斗争中不彻底。由于我承认理论对于党的策略起一定影响，我自己就助长了在这一方面在社会民主党内存在着的混乱。他写道：“同理论知识比起来，党的策略远为更加取决于实际的社会条件。不是理论知识对党的策略发生影响，而是相反，党的策略无可争辩地影响着支配党的学说。对于现代群众运动来说，福尔马尔们永远是走在伯恩斯坦们前面的……如果从事行动的人坚持这样的观点，即认为关于经济发展的某种见解能够影响党的策略，那么科学将始终是‘党务’。只有从人们承认科学必须为党的目的服务而不是必须决定党的目的的那一时刻起，科学才是自由的。”我不应当反对人们把党的策略看成取决于某种我认为错误的学说，而是必须反对人们一般地把党的策略看成取决于某种社会发展理论。（《社会的未来》，1899年第1期，第15—16页）

我可以毫无保留地赞成上面所讲的一大部分，正如我在第一章中论述折中主义的作用时所已经暗示的那样。当我收到普罗柯波维奇的文章时，这一章已经印刷了。凡是学说僭居了统治者地位的时候，作为叛逆而替自由的科学冲锋陷阵的就是折中主义。但是我不能设想，可以有缺乏集体信仰的持久的集体愿望，尽管助成这一信仰的在很大程度上是利害关系，但信仰毕竟同时还要取决于对一般说来值得想望的和可行的事物的某种广泛流行的见解或认识。因此，没有这样的集体信念，也就没有任何坚忍不拔的集体行动。我的那个遭到普罗柯波维奇反对的句子就是肯定这一事实的。（在决定策略问题时的）第二个因素是属于智力性质的：对于社会状况的认识的水平，对于自然和对于社会机体及其诸元素所达到的洞察。”（《新时代》第16年卷第1册，第485页）我既然认为事情是这样的，从这一见解出发，我在讨论策略问题时就不能把理论认识的参与排斥在外，而只是反对人们不把科学本身当作处于党外的事物来对待。何况为一件事情服务同样就是对它产生影响。麦菲斯托非尔斯已经说过：“归根到底我们是依赖我们所创造的生物的”。

对于普列汉诺夫的科学社会主义说来，不幸的是，前面引用的关于工人处境的绝望性的那几句马克思主义的话已经在—本名叫《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书中被推翻了。在这本书里，我们读到了由于1847年的工厂法的作用而产生的兰开夏纺织工人的“体力和精神的复活”^①，这是连最迟钝的眼睛也看得见的。由此可见，为了使工人阶级的一个大部类的地位得到某种改善，甚至不需要资产阶级共和国。在同一本书中说，现在的社会“不是坚实的结晶体，而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机体”，^②在这一社会的官方代表处理经济问题时，“进步仍然是无可怀疑的”。^③不仅如此，作者在书中用很多篇幅来论述英国工厂立法的成就，以便鼓舞大陆去仿效并且从而促使社会的革命过程采取愈来愈人道的形式完成。这一切都不是意味着工人处境的绝望性，而是意味着改善的可能性。既然自从1866年这本书写成以来上述立法并没有削弱，而是改善了，普及了，并且得到了朝同样方向起作用的法律和制度的补充，因此现在比起当时更加远远谈不到工人处境的绝望性了。如果确认这样的事实就是追随“不朽的巴师夏”，那么在这一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追随者中，首先就要数到卡尔·马克思。

普列汉诺夫非常得意地引用李卜克内西在斯图加特党代表大会上的发言：“像马克思那样的人必须住在英国，才好在那里写他的《资本论》，但是伯恩斯坦却被英国资产阶级的巨大发展慑服了”。不过他认为这样说对于我还嫌太客气了。他说，并不一定要成为像马克思那样的人，才能住在英国而继续效忠（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精神的）科学社会主义。我的堕落不如说是由于我对这一社会主义“研究得很差”。

不言而喻，我是不乐意同这样一个人去就后一点争论的，这个人的科学竟要求宣称，在大变革以前的任何情况下，工人阶级的处境都是绝望的。对于李卜克内西就是不一样了。如果我对他的发言理解得不错，那么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要给我酌情开脱。尽管我乐意承认这一点，

① 参看《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41页。——编者注

②③ 同上书，第10—13页。——编者注

我仍旧必须声明，我不能接受这种开脱。当然我决不是要同思想家马克思较量。但这里的问题不在于我同马克思比起来低劣到多大程度。任何在知识上和思想上远不能望马克思之项背的人在反对马克思时都可能是正确的。问题在于，我所确认的事实是否正确，它们是否能证明我由它们得出的结论是正确的。从前面所说的可以清楚看出，连像马克思这样的人也不能摆脱这样的命运，即在英国大大地修改了他的先人之见，他也在英国背弃了他带到那里去的某些见解。

人们可以反驳我说，马克思固然承认了那些改善，但这些细节对于他的基本观点很少影响，《资本论》第1卷最后的关于资本积累的历史趋势的一章就证明了这一点。对此我可以反驳说，如果这种说法是正确的话，那么它所反对的是那一章，而不是我。

人们可以按照种种不同的意义来理解这个多次被引用的一章。我相信我是第一个而且是不止一次地把它解释为一种发展趋势的总结性描述的人，这种趋势是资本主义积累所固有的，但是它在实践中不能不折不扣地贯彻，因此也不一定会促使产生那一章中所描写的对立的尖锐化。恩格斯从来没有反对我的这种解释，无论口头上或是在出版物上都没有宣布这是错误的。1891年我在论述舒尔采-格弗尼茨的一本著作的文章中就涉及的问题写道：“显然，凡是在立法、在社会的有计划的和自觉的行动适当地进行干涉的地方，经济发展趋势的统治就能受到干扰，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能被消灭。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但从来没有否认这一点，相反却是经常强调了这一点。”（《新时代》第9年卷第1册，第736页）当时恩格斯也没有说任何反对的话。如果这样地理解上述一章，那么就永远可以悄悄地在它的个别原理中加进“趋势”一词并且从而免除用煞费脑筋的解释妙法使这些原理同现实取得一致的必要性。不过这样一来，实际的发展愈向前进，这一章本身就会或者可能会愈加变得不重要。因为它的理论意义不在于阐明了资本集中和积累的一般趋势，这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社会主义者早在马克思以前就已证实了的，而是在于马克思对于资本的集中和积累在较高阶段实现时

的条件和形式以及它所引起的后果的独特表述。但是在这一方面，实际发展不断产生新的制度和力量以及新的事实，面对着这些新事物，那一章里的表述就显得不充分了，因而也相应地失去了充当对于即将到来的发展的预言的资格。这就是我的见解。

但是也可以对这一章作另一种理解。人们可以把它解释成这样：上述的以及也许还要发生的一切改善只能对咄咄逼人的资本主义的趋势给予一些暂时的矫正，它们只是无关紧要的修改，从长远来说不能对于马克思所确证的对立尖锐化起什么根本性作用。不如说，这一尖锐化归根到底，即使不是逐字逐句地，那么毕竟基本上要按照所描述的方式出现，并且将导致所暗示的灾变式变革。这一解释能够以这一章的结束语斩钉截铁的词句为根据，并且由于以下的情况而得到某种加强：在这一章最后毕竟又一次提到了《共产党宣言》，而就在这前面不远，黑格尔连同他的否定之否定也出现了——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否定了的个人财产在新的基础上的重建。

照我的看法，不可能简单地宣称一种解释是正确的，另一种解释是绝对错误的。对我来说，这一章不如说是说明了贯穿马克思的这一整部宏伟著作并且也在其他地方以比较不那么明确的方式表现出来的二元论。这种二元论是：这一著作希望成为科学的研究，同时却希望证明一个早在它起草之前就已完成的论纲；这一著作的基础是一个公式，在这一公式中，发展应当导致的结果从一开始就已经确定了。回到《共产党宣言》，在这里指明了马克思体系中实际存在的空想主义残余。马克思基本上接受了空想主义者的解决方案，但是认为他们的手段和证据是不充分的。因此他对此着手修正，而且用的是科学天才所具有的勤奋、批判的尖锐性和对真理的爱。他不隐瞒任何重要事实，而且只要研究对象同证明公式的最后目标没有直接的关系，他也不去勉强缩小这些事实的重要意义。在这一限度内，他的著作摆脱了一切必然会损害科学性的倾向^①。因为对

^① 不用说我在这里撇开了处理人物和表述事件过程时表现出来的那一倾向，这是同经济发展没有必然联系的。

于工人阶级解放要求的一般同情本身并不是科学性的障碍。但是一旦马克思接近认真讨论那一最终目的的地方时，他就变得不可靠和不能信赖了，就产生了本书中尤其是在关于现代社会收入变动的一章中指出来的那种矛盾，就表明了这一伟大的科学天才原来到底是一种教义的俘虏。说得形象一些，他在一个现成的脚手架的框框里建造一座巨大的建筑物，在建筑过程中，只要科学建筑法的规律同脚手架的构造与他规定的条件不发生冲突，他是严格地遵守这些规律的。但是在脚手架太窄以至不容许遵守规律时，他就忽视规律或者避开规律。在脚手架限制了建筑物，从而使它不能自由发展的地方，他不去拆毁脚手架，却不惜牺牲比例而在建筑物本身上作了改变，从而使建筑物更加从属脚手架。他不去完成这一著作，却一再就细节作修改，是否因为意识到这一不合理的比例呢？无论如何，我的信念是，不管那种二元论表现在什么地方，为了使建筑物得到自己的权利，都必须摧毁脚手架。马克思永垂不朽的地方在于建筑物，而不在于脚手架。

没有什么比还不能摆脱这一著作的辩证法公式——这就是上述的脚手架——的那些马克思主义者中受束缚较深的人的拘泥态度更使我坚持这一见解了，正是他们企图用这种拘泥态度坚持《资本论》的某些已被现实推翻的主张。只有这样我至少才可以对自己说明，为什么像考茨基这样一个素来如此注重事实的人竟能在斯图加特反对我关于有产者人数一年比一年增加而不是一年比一年减少的说法，他说：“如果这样说是对的，那么不仅我们胜利的时刻要大大推迟，而且我们根本不会达到目的。如果是资本家而不是无产者在增加，那么发展愈向前进行，我们离开目的就愈远，那么巩固起来的将是资本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

如果不同马克思的证明公式联系起来看，我就不会相信上面这句被普列汉诺夫当作“中肯的”而完全加以赞同的话是出自考茨基口中的。罗莎·卢森堡在前面提到过的那些文章（就方法论一般说来，在反对我的文章中这些是写得最好的）中也根据同样的见解反对我说，按照我的解释方式，社会主义将不再是客观的历史必然性，而是将得到唯心

主义的论据。尽管她的论证表明了令人毛骨悚然的逻辑混乱并且结果竟非常武断地把唯心主义同空想主义混为一谈，但是她在这一点上毕竟触及了问题的核心：我实际上并不认为社会主义的胜利要取决于它的“内在的经济必然性”，不如说我认为给社会主义提供纯粹唯物主义的论证，既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必要的。

有产者的人数在增加而不是在减少，这不是资产阶级协调论的经济学家的发明，而是税务机关在常常引起当事人很大不满的情况下查明的事实，这一事实今天已不再能够加以动摇了。但这一事实对于社会主义的胜利有什么意义呢？为什么社会主义的实现取决于这一事实或者对它的驳斥呢？不过是因为，辩证法的公式看来是如此规定的，是因为如果承认社会的剩余产品不是被数目日益减少而是被数目日益增加的有产者所占有，那么脚手架上的一根柱子就有滑脱出来的危险。但是这一问题只影响思辨的学说，对于工人的实际努力来说，它是十分次要的。无论是工人争取政治民主的斗争，或是他们争取工业中的民主的斗争，都不会受到它的影响。这一斗争的前途既不取决于这根柱子即资本集中在数目日益缩小的巨头手中，也不取决于这根柱子所在的整个辩证法脚手架，而是取决于同一般的社会进步特别是同工人阶级本身智力和道德的成熟联系在一起的社会财富或社会生产力的增长。

如果社会主义的胜利取决于资本巨头数目的不断缩小，那么社会民主党要想合乎逻辑地行动，即使不必须用一切手段去支持资本积聚在日益减少的人的手中，但是至少也必须不去做一切能够阻止这一缩小的事情。事实上他们所做的常常与此相反。当他们在捐税政策问题上的投票能起重要作用时，情况就是这样。从崩溃论的立场来看，它的实际行动的一大部分是潘娜洛普的工作。^①但是在这一方面错误的不是

^① 潘娜洛普为希腊神话中英雄奥德赛的妻子，在奥德赛出征未归时，她为了哄骗围绕不休的求婚者，假意说必须先为自己的公公织成一件寿衣才能考虑他们的要求，实际上她每天晚上把织好的部分拆掉，因此一直织不完。这里喻指永无成功希望的工作。——编者注

是社会民主党。错误在于学说，它为那种把进步看成取决于情况的恶化的观点留下了地盘。

考茨基在他的《农业问题》的序言中反对那些谈论克服马克思主义的必要性的的人。他说，固然他看到出现了怀疑和犹豫，但是仅仅这些还不等于超出已经达到的发展之上的发展。

这样说在这一限度内是正确的：怀疑和犹豫还不是积极的反驳。但是它们可以是走向积极的反驳的第一步。但是问题在于：究竟是要克服马克思主义本身，还是要排除马克思主义的某些空想主义残余呢？我们必须在这些残余中寻找批评马克思主义的人所指出的马克思主义在理论和实践上的矛盾的根源。我这本书已经超过了应有的篇幅，因此我必须放弃详细讨论一切与此有关的各点。但是我因此更加感到我有义务声明：我认为由其他方面提出的反对马克思学说的某些细节的一整批意见还没有被驳倒，有一些则是驳不倒的。因为这些反对意见对于社会民主党的努力来说是完全不关重要的，我就更加能这样做了。

在这一方面我们不应当太敏感。已经不止一次发生过这样的事：马克思主义者非常热烈地反对一些被他们认为同马克思的学说针锋相对的见解，但是到了最后却真相大白，臆想出来的矛盾大部分是根本不存在的。别的不提，我心目中就有由于已故的斯蒂贝林博士关于资本积聚对剥削率的作用的研究引起的论争。无论是斯蒂贝林的表述方式或是他的计算的细节都有许多错误可以指摘，揭露这些错误，首先是考茨基的功劳。但是《资本论》第3卷表明，斯蒂贝林的著作的基本思想，即剥削率随着资本的日益增加的积聚而减少的思想，并不像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当时所认为的那样，同马克思的学说相矛盾，纵然他对于现象的论证是和马克思不同的。但是在那个时候，斯蒂贝林必须听人家说，如果他所发挥的见解是正确的话，那么今天的工人运动的理论基础即马克思的学说就是错误的了。而且那些这样说的人的确能援引马克思的许多章句。对于由斯蒂贝林的论文引起的争论作一分析，是可以对

例解价值学说的种种矛盾起良好作用的。^①

在估计历史上的经济和暴力之间的关系时，也存在着类似的矛盾，而在判断工人运动的实际任务和可能性时的矛盾（这已经在别处讨论过了）则是这一矛盾的副本。不过这一点必须在这里回过头来再谈一次。但是应当研究的不是下一问题：在起初的时候以及在历史向前发展的过程中，暴力曾经在多大程度上决定了经济，以及经济曾经在多大程度上决定了暴力；应当研究的只是暴力在现存社会中的创造力量的问题。从前马克思主义者有时认定暴力在这一方面只起纯粹消极的作用，现在则显然可以看到在相反方向上的夸大，认定暴力几乎有无所不能的创造力量，而对政治活动的强调简直就成了“科学社会主义”（或者也叫“科学共产主义”，按照新的时尚，这一用语被修改成这样了，虽然对于它的逻辑意义并没有多大好处。）的精髓本身。

现在如果再回到过去几代人关于政权的能力的偏见，那是荒谬的，因为这也就是说，还要追溯到这些世代的前面去。例如空想主义者在这一方面所抱的偏见就是有充分根据的，的确，我们几乎不能说它是偏见，因为它们是以那一时代的各劳动者阶级的实际不成熟性为依据的，由于这种不成熟性，一方面只可能有暂时的暴民统治，另一方面只可能倒退到阶级寡头政治。在这种情况下提到政治，只能被认为是脱离更

① 在这一方面，我要提请注意发表在 1887 年的《新时代》上的署名“Lxbg.”的论述斯蒂贝林著作的非常值得注意的文章，这篇文章除了别的问题外还预料到了利润率问题的解决。这位我不知道的作者就剩余价值所说的话，实质上同我在本书关于价值理论的一节中所发挥的见解完全一样。他写道：“剩余价值率即利润总和对于工资总和的比例，是一个不能用于个别生产部门的概念”。（第 129 页）当时考茨基对他的反驳，肯定是根据《资本论》已有各卷所能说出的最好的东西，而且也打中了 Lxbg. 用来表达他的思想的形式。要知道剩余价值率这一概念无疑是可以用于个别生产部门的。但是 Lxbg. 的真实想法却是正确的。剩余价值率只是对于被看作统一体的总经济才是一个可衡量的量，因此只要总经济没有成为现实，它对于个别的生产部门就是无法确定的，至少是只要人们不使劳动价值同工资直接发生关系，它就是不能确定的。换句话说，对于个别生产部门的剩余价值率不存在任何真实的尺度。

新版补注：这里引用的作者的全名是 M. 卢森堡。他在 1919 年底出版了《通货匮乏及其克服》一书（佛兰肯豪森，施罗德及荷尔纳尔公司），我认为非常值得注意。

为迫切的任务。这样的前提今天已部分地被消灭了，因此没有任何能思考的人会想到用那一时代的论据来批评政治行动了。

我们已经看到，马克思主义首先把这一问题倒转过来，并且指出工业无产阶级潜在的能力，宣称政治行动是运动的首要任务。但是这样一来，马克思主义就徘徊在一些重大的矛盾中：它也承认，工人阶级还没有达到自身解放所要求的成熟程度，解放的经济前提也不具备；这一点使马克思主义同煽动人心的党派有所区别。但是尽管如此，它一再致力于一种假定这两个先决条件都已几乎实现的策略。我们在它的出版物中碰到一些非常尖锐地强调工人的不成熟性的段落，同最早的社会主义者的空论很少区别，但是紧接着可以碰到另一些段落，按照这些段落就应当假定，一切文化，一切智慧，一切德性都只能在工人阶级中找到。这些句子使人无法理解，为什么要说极端的社会革命家和暴力无政府主义者是不正确的。与此相应，政治行动始终指向指日可待的革命性灾变，同这一灾变比起来，合法工作长期只被看成一种 *pis aller*，^①一种纯粹暂时的对策。我们也没有对下一问题进行任何原则性的深入探讨：从合法行动能指望什么，从革命行动能指望什么。^②

在上述一点上，存在着很大的差别，这是一眼就可看清楚的。但是通常只是这样地解释这种差别：立法或者合法改良的道路是比较缓慢的，革命暴力的道路是比较迅速和激烈的。^③但是这只是在一定条件下才是正确的。是合法道路还是革命道路更为有效，关键完全在于措施的性质，在于这些措施与不同的人民阶级和人民习惯的关系。

在这里大体可以说，革命的道路（始终是在革命暴力的意义上说

① 法文，意为“权宜之计”。——编者注

② 这在基本上要归咎于下一情况：马克思在世时，大多数国家的政治性工人运动还必须首先为有效的合法活动争取先决条件。——补注

③ 马克思在关于劳动日的一章中在这一意义上说到“法国的革命方法还是显示了它的独特的优点”，这是在 1848 年法国的 12 小时法中表现出来的，这一法律为一切工人和一切工厂毫无区别地规定了同样的工作日。这是不错的。但是这一激进的法律在一个世代以上的时间内一直是无效的具文，这是已经证实的。

的)就排除少数特权者在社会进步的道路上设置的障碍来说,工作完成得较快;它的长处在于消极方面。

根据宪法的立法在这一方面通常是工作得较慢的。它所遵循的通常是妥协的道路,不是废除既得权利,而是赎买既得权利。但是当广大群众的偏见,当他们的狭隘眼界成为社会进步的障碍时,它就好比革命强了,而当问题在于创造有持久生命力的经济制度时,它就表现出更大的优越性,换句话说,就是积极的社会政策工作的优越性。

在立法中,智力在平静时期驾驭感情,在革命中则是感情驾驭智力。但是如果说感情经常是有缺点的指挥者,那么智力就是迟钝的发动机。革命失之于过急的地方,日常立法失之于拖拉。立法作为有计划的暴力起作用,革命则作为自然发生的暴力起作用。

一个国家一旦达到了这样的政治状态,即有产的少数人的权利不再形成社会进步的严重障碍,政治行动的消极任务退居积极任务的后面时,那么诉诸暴力革命就成为毫无内容的空话了。^①人们可以推翻一个政府,一个有特权的少数,但是不能推翻一个民族。

尽管在法律背后的受着武装力量保护的当局有很大的势力,但是甚至法律也往往无力反对一个民族的根深蒂固的风俗和偏见。19世纪末意大利的经济衰退的最后根源决不是萨伏依王室的恶意或者它的善意不够。面对着已成为官僚积习的贪污腐化和人民群众的轻浮习气,就是意图最好的法律和法令也往往要失效。西班牙和希腊的情况与此相似,而在东方则程度还要严重。甚至在法国,共和国固然为民族的进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它不但没有铲除民族生活的某些心腹之患,反而加深了它们。在资产阶级君主制之下被认为是前所未闻的贪污腐化,在今天看起来就像是无害的游戏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仅仅在概念中才是一个统一体,法律上宣布的人民的主权还不能使人民成为实际上起决定作用的因素。这一主权能够使政府恰好从属于官

^① “幸而这一国家的革命主义已经不过是一句装模作样的空话了。”——《英国独立工党每月新闻》,1899年1月。

吏、职业政治家和报纸老板，而政府在这些人的面前本来应当是强有力的。^①这一点对于革命政府也同对于立宪政府一样适用。

在工人阶级还没有具备自己的十分强大的经济性质的组织并且没有通过在自治机构中的训练而达到高度的思想独立性的地方，无产阶级专政就是俱乐部演说家和文人的专政。我不希望那些把压迫和刁难工人组织以及排斥工人参加立法和管理看成登峰造极的统治艺术的人有朝一日在实践中体会这一区别。^②我同样也不希望工人运动本身体会这一区别。

尽管自从马克思和恩格斯写作的时候以来，工人阶级在知识、政治和经济方面都有了巨大的进步，但是我认为它即使在今天仍旧没有充分发展到能够接收政治的独占统治的程度。我认为我有必要公开说出这一点，尤其是因为恰恰在这一方面，有一个口头禅（Cant）悄悄地混在社会主义的文献里面，这个口头禅（Cant）有压倒一切合理判断之势，而且我知道我在那些形成本阶级解放斗争的先锋的工人那里，比在任何别的地方更有把握遇到对于我的阐述的客观判断。在我与之交谈过社会主义问题的工人中，我还没有听见有谁在这一点上的见解和我本质上不同。只有从未同实际的工人运动有过密切关系的文人，才会在这一方面做出另一种判断。格奥尔吉·普列汉诺夫对于所有那些社会主义者的滑稽的愤怒（我不想用更尖锐的说法了）就是由此产生的，这些社会主义者并不是从一开始就把应当成为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的那些东西加在这一整个阶级身上，在普列汉诺夫认为已经有答案的地方，他们认为还存在着问题。[因为——我就是无产阶级！谁对于运动的想法与他不同，谁就是学究和庸人。这是一个老调子，但是它的魅力决不因为年龄大而有所增加。]^③

① 不用说，这里仅仅是指道德力量，就是说精神的独立性。——法译本第 297 页注

② 仅就这一点来说，今天屡次见到的、社会主义者向布朗基主义的最野蛮的畸形发展的倒退，以俄国为出发点并不是偶然的。这种布朗基主义作为理论竟被一部分的西方社会主义者甘心接受，这要归咎于战争对于人们思想的影响。——补注

③ 方括号中的话在第 2 版中已删去。——编者注

如果人们把将来理当发生的事思辨地搬到现在来，或者硬说它是属于现在的，那么人们就还是没有克服空想主义。工人们是什么样子，我们就必须把他们看成什么样子。他们既没有像《共产党宣言》所预见的那样普遍地赤贫化，也不是像他们的臣仆要我们相信的那样地不受偏见和弱点的束缚。他们有着他们在其中生活的经济和社会条件的德性和罪恶。无论这些条件或是它们的影响都不是一天之间就可以消除的。

即使是最有力的革命也只能很缓慢地改变一个民族的大多数人的水平。社会主义的敌人有一个出名的计算：收入的平均分配对于广大群众的收入只能有很小的改变，对此可以完全恰当地回答说：在社会主义试图实现的事物中，这样的平均分配只占极小的部分。但是不应当忘记，另一件事即生产的提高不是能轻易地咄嗟立办的。“只有在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了一定程度，发展到甚至对我们现代条件来说也是很高的程度，才有可能把生产提高到这样的水平，以致使得阶级差别的消除成为真正的进步，使得这种消除可以持续下去，并且不致在社会的生产方式中引起停滞或甚至倒退。”这是哪一个庸人、哪一个学究写的呢？不是别人，原来就是弗里德里希·恩格斯。^①

我们是否已经达到了消灭阶级所必需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呢？从前在这一方面曾经列举过根据把特别顺利的工业的发展普遍化而得出的幻想的数字，但是近来社会主义著作家却在努力根据慎重的、深入到细节的计算而获得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能力的实事求是的估价，而他们所得的结果同从前的数字出入很大。^②以前假定的把劳动时间普

① 参看《论俄国的社会问题》，前进报版，第50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73页。——编者注）

② 参看阿特朗铁库斯：《未来国家的一瞥，社会国家中的生产和消费》（斯图加特，迪茨版）以及发表在配恩奈尔斯托斐尔的《德意志言论》1897—1898年卷上的约瑟夫·李特尔·冯·诺依保尔博士的论文《略论集体主义》。两种著作都不是无可指责的，但是可以热情地推荐给愿意通晓有关问题的人。诺依保尔认为，如果平均计算全部机器的效能，那么就可以表明，它们才勉强能节约1/3的人类劳动力。

遍减少到 5 和 4 小时或者干脆减少到 3 和 2 小时，这在最近时期内除非打算把普遍生活水平大大降低，就根本谈不到。即使有了集体的劳动组织，要想在维持同样的产品量和工作量的条件下大大缩短 8 小时工作日，就必须在很年轻的时候开始劳动，到很大的年纪才能停止工作。

总而言之，我们不能在两三年之间使整个工人阶级处于同它现在生活在其中的环境有重大差别的环境。那些喜欢在无产的阶级和有产的阶级的数量对比上滥作最大程度的夸大的人本来正应当是首先看清楚这一点的人。但是一个人在一点上不合理性地思考时，在另一点上通常也是一样。普列汉诺夫看见别人把工人的处境说成并非绝望就大发雷霆，因此如果同一个普列汉诺夫，在看到 I 阐述为什么在最近期间不可能放弃有劳动能力的人在经济上个人负责的原则时，就下了“庸人的”这样的毁灭性判决，那是丝毫不会叫我惊奇的。

但是谁只要在实际的工人运动中见识一下，谁也就会发现，那里很不重视摆脱被资产阶级出身的矫揉造作的无产者认为小资产阶级性的那些特性，在工人运动中人们根本不培植什么道德上的无产阶级主义，相反却很想把无产者造成一个“庸人”。依靠不稳定的、无祖国和无家庭的无产者是不可能持久和巩固的工会运动的；使这样多的英国工人领袖——社会主义者和非社会主义者——成为禁酒运动的热心信徒的，不是资产阶级偏见，而是在几十年的组织工作中获得的信念^①。工人社会主义者懂得自己本阶级的缺点，他们中的有良心的人远不会去把这些缺点美化，而是试图尽全部力量来克服它们。

我必须在这里再一次回到李卜克内西的话上来，他说我被英国资产阶级的巨大发展慑服了。这在以下限度内是正确的：我确信从前流传在我们的文献中的、以有缺陷的统计为根据的关于中产阶级消灭的报道是错误的。但是仅仅这一点还不足以推动我去修正我关于向社会

^① 独立社会主义工党的执行委员会最近也在一份通告信中热情劝告各支部不要在自己的俱乐部中出售酒精饮料。——第 1 版第 186 页注

主义的发展的速度和性质的观点。同现代典型的工人运动的更加密切的接触所给我的教训比这重要得多。我并没有不加批判地由此做出一般的推论，我深信大陆上的情况同英国在原则上并没有区别，我从许多方面得到了证实。这里涉及的不是民族现象，而是社会现象。

我们不能要求一个大多数都住得很挤，教育得很差，收入不稳定也不充分的阶级有那样高的知识和道德水平，而一个社会主义社会的建立和维持是以这样的水平为前提的。因此我们也不想硬说他们有这样的水平。我们因为现代工人运动部分地揭示和部分地创造出来的智慧、毅力和精力的巨大财富而感到高兴，但是我们不把就少数优秀分子（就算有几十万人吧）说来是正确的事实无批判地转用到群众身上，转用到千百万人身上。我不想复述工人们就这一点在口头上和书面上对我说的话，我也用不着在明智的人面前为自己辩护，洗刷伪善主义和学究自大的嫌疑。但是我乐于承认，我在这里是用两种尺度来衡量事物的。正因为对于工人阶级期望很高，我对于一切旨在败坏他们的道德判断力的东西的批评要比对于上层阶级中在这一方面发生的事的批评严厉得多，我非常遗憾地看到工人报刊中这里或那里有一种文学颓废主义的声调扩展开来，因为这只能起扰乱并且最后腐蚀人心的作用。一个努力向上的阶级需要一种健康的道德，不需要任何颓废的倦怠。只要工人阶级精神抖擞地追求眼前的目的，那么它是否为自己确定了描绘好的最终目的，毕竟是次要的事。重要的是，它的各项目的要充满某种表现经济和全部社会生活的较高阶段的确定的原则，要贯串表现了文化发展中的一种进步、即一种较高的道德和法权观念的社会观。

按照这种看法，我不能赞同“工人阶级不是要实现什么理想”^①这句话，我宁可把它看成一种自我欺骗的产物，如果它不是它的作者的纯粹的文字游戏的话。根据这种精神，我在当时就求助于伟大的柯尼斯堡哲学家、纯粹理性的批判者的天才来反对口头禅（Cant），这种口头禅

① 这是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说的话，见本章开头时的引文。——编者注

(Cant) 企图在工人运动中定居下来, 而黑格尔辩证法为它提供了舒适的藏身之地。我因此使许多人^①对我进行狂怒的攻击, 但是这只能使我更加坚定地相信, 社会民主党必须有一个康德, 他总有一天要十分苛刻地对传统的教义进行批判的审查和严厉的责备。他要指出, 这一教义在表面上是唯物主义在哪些地方, 实际上是最高程度的、因而也是最容易把人引入歧路的空泛意识形态, 指出轻视理想和把物质因素抬高为无所不能的发展力量是自我欺骗, 而传布这种欺骗的人已经自己通过行动随时发现了或者将要发现它的本来面目。这样的一个人将能以令人信服的尖锐性揭露, 在我们伟大的先驱者的著作中, 哪些是值得并且一定要永垂不朽的, 哪些必须并且能够放弃。这样的人也将使我们有可能对那些著作做出公正的判断, 这些著作虽然不是以目前被我们认为有决定意义的出发点为根据的, 但毕竟趋向与社会民主党为之斗争的那些目的相同的目的。任何不偏不倚地思考问题的人也不会否认, 社会主义的批评在这一方面是常常很不够的, 它暴露了模仿时期 (Epigonentum)^② 的一切阴暗面。

我自己也在这一派别^③中尽了忠实的义务, 因此我并不责备任何人。但是正因为属于这一学派, 我认为我有理由表达对于改良的需要。如果我不是必须担心被人误解的话 (我当然是准备它被人错误地解释的), 我就要把“回到康德去”这句话翻译成“回到朗格去”。因为既然对于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来说, 赞成这一格言并不是要回到这位柯尼斯堡哲学家所写的每一个字, 而只是涉及他的批判的基本原则, 那么对于社会民主党说来, 也就不涉及回到弗里德里希·阿尔贝特·朗格的全部社会政治观点和判断。我想到的是朗格所特有的把两种特点结

① “许多人”在第1版(第187页)中作“普列汉诺夫先生”。——编者注

② Epigonen 本来指希腊神话中攻打德拜城的七英雄的后代, 后用来指文学或科学流派的后继者, 包含说他们只能模仿先驱者的思想或形式而缺乏创造力的意思。——编者注

③ 指马克思主义学派。——编者注

合起来：他光明磊落、无所畏惧地支持工人阶级的解放努力，同时具有高度的科学公正态度，随时准备着承认错误和接受新的真理。也许像我们在朗格的著作中碰到的宽宏大量只可能在缺乏透彻的尖锐性的人身上发现，而这种尖锐性是马克思这样的开辟道路的人的特性。但是并不是每个时代都产生一个马克思，而且即使对于一个有同等天才的人来说，目前的工人运动也是过于广大了，不可能给他让出像马克思在工人运动历史上所占的地位。它今天除了需要好勇善斗的人之外，还需要组织和总结的人，需要这样的人，他们站得足够高，能够把糠秕同麦子分开，并且思想足够开阔，能够承认即使不是长在自己的苗圃里的树苗。他们在社会主义思想的领域里也许不是国王，却是热情的共和主义者。

跋*

一本著作所受到的待遇给予它的作者的震惊是很少像本书给予本文作者的震惊一样的。人们从第一版的序言可以看出，我主要是把它作为同我的社会主义批评家的争论而写下的。当时我住在伦敦南部的一个相当偏僻的郊区，交往很少，在德国的日报中我通常只读几份社会民主党机关报。我固然也对我的书会遇到党员同志们的反驳作了准备，但是我没有想象到，它在党内会引起一场愤怒的风暴，并且除此而外还在非社会主义界的比较广泛的范围内为我博得了一定的名声。我从前一直习惯于把同党员同志的争论看成社会民主党的家庭事务，当然敌人的机关报可以按它们自己的方式认识这些问题，但是只要涉及的不是政治策略方面的问题，它们是不会对此发生多大兴趣的。

如果说这本书的遭遇不同，那么这首先恐怕要归因于这一情况：在这本书里第一次有一个属于马克思主义学派的社会主义者对于马克思

* 这是伯恩斯坦为本书1920年第2版写的跋，他在本书的注解中常常提到它，但是称之为“补遗”。——编者注

主义本身的一系列原理进行了批评，而在那以前，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讨论几乎永远只是围绕这些原理解释和由它们产生的结论进行的，马克思主义则被看成这样的社会主义学说，它通过宣告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迫在眉睫的崩溃而教育工人对国家直截了当地采取敌对态度并且在有关民族利益的方面采取绝对的冷漠态度。随着对于马克思学说的钢铁般构造的信念的动摇，人们认为，工人的这一精神素质也就必然要被动摇了，而且工人因此就会接近对国家比较不那么敌对的倾向了。因此本书在资产阶级出版物中受到热烈的欢迎，各式各样的称赞雪片般地飞来。

单是这一情况就已经必然要使我的处于同资产阶级政党的斗争中的党员同志对此不满，而那时刚刚创立的民族社会党的领袖们、即现在已故的弗里德里希·诺曼^①和他的来自知识界的战友，则把在我的党面前暴露我当成自己的拿手好戏。他们懂得怎样巧妙地把从本书引用的话组织起来，使它们看起来像是民族社会主义学说的一个证明环节，他们就用这些引文在一些集会上反对我党的演讲人，并且使其中相当多的敌不过这种诡辩法的人感到迷惑。当我回到德国的时候，有一个这样的同志对我说：“当诺曼在会上说‘这是伯恩斯坦说的’时，我吓得脸都白了”，他还坦率地把他拟好的准备在一次党代表大会上反对我的发言读给我听。当他后来实现了这一意图时，我能够怨恨他吗？不如说我有理由怨恨诺曼，他在他的刊物上扬扬得意地写道：“伯恩斯坦是我们在社会民主党阵营里的最前面的哨兵”，他却并没有考虑到，这句挑衅性的话必然要在党的大批鼓动员中唤起尽可能迅速地摆脱这一危险的“哨兵”的愿望。

我固然对马克思的一些原理进行了批评，却没有毫无保留地表述由这一批评推演出来的那些结论，而只是限于一些更带暗示性的言论，这一点在受过理论训练的社会主义者行列中又引起了不愉快的感觉。

^① 弗里德里希·诺曼（1860—1919），德国自由主义政治家，1896年创立民族社会主义联盟，出版《援助》周刊。——编者注

一些人认为这是缺乏道义上的勇气，另一些人认为这是缺乏成熟的理论思考。我的确由于顾虑到党在鼓动方面的需要，并不总是从我的批评性原理中作出最后的推论，却认为促使人们深思熟虑我认为可以怀疑的东西，就已经足够了。但是我不愿意公开吹嘘我抱保留态度的原因，因此我在理论家中间的遭遇并不比在鼓动家方面好一些。攻击的浪潮从两个阵营向我倾泻，在一次党代表大会——1899年汉诺威——上对我进行了正式的审判，而如果说对我个人并没有发生严重的事情，并且社会民主党内始终保持的对于自由意见的尊重反而出色地得到证实的话，那么我毕竟没有能幸免对于我的批评性原理和积极建议的尖锐拒绝。

我的思想和感情过分密切地同党结合在一起，以至我不能有意识地为党制造麻烦，我在回答来自党内的那些多半是十分愤激的攻击时只限于对误解和曲解进行辩护，而让时间去就我所阐述的预断作出定论。就这一预断的大多数论点来说，所下的定论是肯定性的，也就是说，我的结论得到了证实——我相信我可以这样断定，而不致招来责难，说作者的虚荣心使我眼睛看花了。这次新版就关于企业发展、阶级结构和收入分配的论断所作的补注中的数字证明，到战争爆发时为止的发展是沿着本书所指出的道路进行的。我的关于危机问题的形态变化的论述也可以算是已经得到事实的证实。而我在本书中就资本主义对于危机的对抗手段的经济力量及其社会的反面所说的话，几乎是一切社会主义者和社会改革家共同的认识。

当然，比我在这些问题上所说的话还要超过的理论是并不缺乏的。弗朗茨·奥本海默尔曾经在许多著作中主张这样的理论：卡尔·马克思所认为的资本的剥削倾向及其后果（由生产过剩引起的危机也属于这些后果之列）是根本不可能发展起来的，如果封建贵族对于土地的暴力占有没有为这种剥削创造经济上的先决条件的话；而这种剥削的继续存在只能归咎于垄断性大地产的继续存在。他在他的《大地产和社会问题》这一著作中试图根据经济史来经验地证明这一用动人的辩证法

演绎地写下的学说，而他的十分严密的论证具有强大的说服力，这是必须承认的。当然他所说的基本上不外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的最后一章《近代殖民理论》中所说的，即资本主义剥削要想展开，必须有这样一批人口，他们为了自己经营农业而逃向农村的出路已被法律或垄断切断了。不过美国、加拿大等国的经济史表明，在这种逃亡可能性高度存在的地方，现代工业也能够发展，而那时由于竞争规律的作用就会创造出助长垄断的兴起和扩展的条件。奥本海默尔在演绎时所引以为决定性根据的“经济人”，归根到底同样也是一个抽象，因为在现实中有形形色色的非经济的动因在人们选择居住地和职业等等时影响他们，从而导致脱离将呈现纯粹的经济人的世界的那一发展路线。无论如何，必须对奥本海默承认，他由于把社会发展中的纯粹经济因素同政治等方面的因素严格区分开来而为科学的认识立下了大功，并且揭示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社会主义经济学家的许多错误结论的源泉。

不久前去世的俄国社会主义者姆·图甘-巴拉诺夫斯基^①，一个除了提出独特的价值理论以外还提出了独特的危机理论的思想家，在许多方面同奥本海默是有共同之处的。他把自己的价值理论称为绝对劳动费用理论，这一理论拒绝马克思价值理论的形而上学形态（这一形态是它根据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的叙述而获得的），却因此更加明确地坚持资本主义企业主剥削雇佣工人的学说，并且企图通过指出“人类经济中的唯一现实的费用因素是人”而更加强有力地论证它。他的危机理论反对近代社会发生危机的内在必然性，因而同他对于马克思对利润率下降倾向这一规律的论证的否定（他认为这一规律是错误的）联系起来，并且合乎逻辑地导致他也反对资本主义生产必然在经济上崩溃的学说。由此可以立刻明白，图甘-巴拉诺夫斯基赞同本书中就马克思经济学的许多片段所发挥的思想，并且以自己的方式把它们继续发展成完全确定的结论。在我只不过表示批评的异议的地方，他却正面

^① 姆·图甘-巴拉诺夫斯基（1865—1919），俄国经济学家，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编者注

说出了自己的意见。我承认这的确是他的著作的一个长处。但是我今天也还必须承认，我决不能追随他的一切推论。他屡次陷入和马克思同样的并且被他算成马克思的的错误的那种论证，而他在那时所作的构想还要远远超过马克思。例如当他说明利润率下降学说同对工人的剥削增长的学说不能两立的时候，他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前一学说仍旧完全没有因此被证明是错误的。

在本书第 84 页上，把利润率的下降当作一件事实，而在发展的一般过程中它也是事实。但是经验同时也表明，在影响利润率变动的因素很多的情况下，这一变动的路线只可能是一根不规则的线，而且会一再出现这根线不是向下而是向上转折的时候。世界大战就其原来的效果来说，作为价值的破坏者和资本投放转入借贷资本领域的促进者，首先是一定要促使这根线上升的。但是当它后来引起工人的革命暴动（后来转变为工资等方面的要求）作为进一步的效果时，它就创造出了迫使利润率的线向下的力量。即使在这一方面，目前还不能说在最近的将来哪一种力量将表明自己是更强的。

除了图甘 - 巴拉诺夫斯基以外，还有其他的社会主义者在本书出版以后对于它的有关社会主义理论的各章以或多或少赞同的态度进行了研究，并且试图以它们为出发点而进一步发展或纠正马克思的理论。不过我必须放弃对它们分别进行深入考察的打算。对我来说，重要的只是根据一些例子来表明，我可以按照哪一方向追随这些尝试，在哪些地方我不能依从它们——要保持为“正统派”。我对于本书第 77 页上的注解中所描述的列奥·冯·布赫的价值理论的态度，在我应这一著者的要求为他的论著《劳动强度、商品的价值和价格》第 2 版所写的序言（后来转载于《关于价值的杂论》这一组论文中，见《社会主义文献》，1905 年卷，第 270 页）中已有精确的表述。序言中有一处这样说：“如果存在着确定劳动的紧张程度的尺度，那么规定商品的劳动价值的困难就消除了。”近来工业生理学的确在从事探索这样的尺度。所谓科学的企业管埋，也叫泰勒尔制度，就是朝这一方面走出的第一步，它企图把

劳动行为分解为它的纯粹机械的因素。但是只有通过进一步从生理学上确定个别的劳动因素所要求的神经力的消费，才能充分满足应当对于劳动价值的科学的规定提出来的要求。但是在这种时候不应当忘记，正像在那一序言中接下去所说的那样，这样发现的劳动价值“仍旧没有对产品的质量、使用可能性或利用价值作出任何说明”。

为了实践，俄国布尔什维克的领袖在最近大力对泰勒尔制度进行了研究。一般说来，有组织的工人对于这一制度是以很不信任或者公然拒绝的态度作出判断的，但是看来它在希望被人看成社会主义的极左翼的布尔什维克的阵营中却找到了很热心的辩护人。但是如果人们比较仔细地研究一下布尔什维克的企图，就可以理解这一点了。他们的企图在许多方面都同本书中所写下的关于社会主义发展的见解相矛盾，因此应当在这里对它作出评价。

尼·乌里扬诺夫·列宁，布尔什维主义理论和实践的主要代表，曾经因为本书而给予它的作者以叛徒称号的光荣。人们在政治上通常用这一词来指背叛了一个党或者一种运动的人，而这一场合涉及的问题却是为了党的利益而对教条观点进行的批评。不过在我这一方面无论如何存在着一种转变，而对于具有某种精神状态的人们说来，某一个人是从一种科学理论、譬如说从托勒密的天文学转向哥白尼的天文学，还是从一种社会运动转变出去，是无关紧要的，对他们说来转变就是转变，他们就是这样对转变作出道德上的判决的。也许不妨这样说吧。但是列宁在最近出版的一本著作里也把叛徒这一称号加在卡尔·考茨基身上了，虽然他决不能指责考茨基在任何方面背离了他一向捍卫的观点，而只能指责他拒绝为了布尔什维克政策所依据的观点而放弃自己有关社会发展条件和社会民主党政策的见解。这样不加分别地应用同一个概念于如此根本不同的事物，使人看出了他的判断方式的几乎令人吃惊的狭隘性，而我们在比较仔细地考察布尔什维克的冒险事业和它所根据的学说时，实际上也碰到了同样的狭隘性。

布尔什维主义的冒险事业在实际上是——或者迄今是——企图通

过一系列专横行动而撇开必要的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的尝试。在俄国，农业还占优势，工业也只是刚刚拥有就整个说来很少受过训练的工人阶级，但是据说这个俄国应当依靠专政而直接转变成一个社会主义社会。根据马克思的一句话，专政被命名为无产阶级专政，但是实际上它是一个党的专政，这个党依靠无产阶级的一部分，在一个顺利的时刻掌握了统治手段，借助征募来的近卫军和运用恐怖主义的措施而暴力地镇压了一切别的党派，不管它是不是社会主义的。这时西方列强的政府对这个党宣战并且用钱和军火支持由政治化了的将军们领导的反抗运动，这对于这个党是有利的。在革命中，几乎没有第二件事比一场从外面或者由反革命分子在内部强加于当权政党的战争更能赋予这一政党以掌握人心的巨大力量，这已是一个老经验了。马克思在他的论述 1848 年法国革命中的阶级斗争的论文中就这一点写道：“共和国面前一个民族敌人也没有了，于是也就没有什么重大的外部纠纷可以激发起活力，加速革命过程，推动临时政府前进或将它抛弃……共和国不论在国外或国内都没有碰到什么抵抗。这种情况就使它解除了武装。”^①布尔什维克遇到了这种抵抗，就帮助它发挥了一股力量，这股力量使它在国内的实际支持者同其余的居民之间的比率提高了好几倍。这种情况使其他社会主义党派对于它的内政措施的抵抗完全陷于瘫痪，因为这些党派不愿承担哪怕是间接帮助外敌和从事反革命的恶名；这种情况给予他们的在残酷程度上往往超过沙皇专制暴行的那些镇压措施（例如取得和枪毙人质）以正当防卫的名义或外观；这种情况使他们处于能够煽起民族偏见来同阶级仇恨一起作为推动力的地位，还为他们提供解释在他们的统治下俄国的经济混乱、饥饿和贫困大大增加这一事实的最方便、最容易蛊惑人心的遁辞。这种混乱有多大程度必须算在继续存在战争状态的账上，有多大程度必须由布尔什维克的特殊的社会和经济政策负责，当然是不容易分清的，而公平地说来，必须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388 页。——编者注

承认无论如何其中有一大部分应当归咎于前者。但是不应当忘记，连战争状态的继续存在这一事实本身在很大程度上恰恰又是布尔什维克的政策的后果，而如果说这一后果不是他们所期望的，那么它毕竟是以客观的必然性引起的。他们在1917年用武装力量解散了选举出来的、他们在其中占少数的国民议会^①，并且把俄国置于一个党的专政之下，他们就是由此而自己挑起了内战，并且给外国以拒绝承认他们的政府的理由或借口。他们惯于在他们与之正式维持和平或者着手缔和的那些国家中从财政上支持旨在颠覆其宪制和经济的鼓动，这同样也延长了战争状态。

但是即使没有战争和战争状态，布尔什维主义的冒险事业也必然要引起生产倒退的后果，这从下面的简单事实就可以看出了：领导者们曾经一再认为不得不取消已经采取的经济政策性质的措施，并且部分地恢复以前被废弃的资本主义经济的方法，部分地把一夜之间社会化了的企业中的劳动置于强制规定之下，这些强制规定同不受限制的资本主义制度的那些强制规定比起来是毫不逊色的。他们必须放弃最初宣布的想法，即对于商业的和技术的企业领导人以及其他完成特别熟练和负责的工作的职工只付给比一般雇佣工人略高一些的薪金，因为经验教导他们，要突然废除根深蒂固的社会习惯，是不免要受到惩罚的。他们转而像资产阶级企业主一样以很高的薪金为诱饵来为他们的许多工厂等等的机构获得尽可能有效率的人手。读一下列宁怎样向公众解释这一转变的文字，是很有趣的。他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这一著作（1918年伯尔尼版）中写道：

“而专家，因为受了过去培养他们成为专家的整个社会生活环境的影响，大多数必然是资产阶级的。……现在我们不得不采用旧的资产阶级的方式，同意付给资产阶级最大的专家以很高的‘酬劳’金。了解情况的人都看到了这一点，可是并不是大家都仔细考虑到了无产阶级

① 指立宪会议。——编者注

国家采用这种办法的意义。显然，这个办法是一种妥协，是离开巴黎公社和任何无产阶级政权的原则的，这些原则要求把薪金降到中等工人工资的水平，要求在事实上而不是在口头上同升官发财的思想作斗争。”^①

的确，这一措施意味着：

“不只是在相当部门内，在相当程度内停止一下向资本的进攻……而且还是我们社会主义苏维埃国家政权向后退了一步，因为这个政权一开始就宣布了实行把高额薪金降低到中等工人工资水平的政策。”^②

资产阶级的奴仆——列宁在这里表示尤其要把这一光荣称号用于孟什维克、马克西姆·高尔基的机关报《新生活》这一派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尽管可以耻笑这一承认，但是布尔什维克却用不着因为这种耻笑而烦恼。

“在历史上任何一次胜利的战役中，胜利者未必没有犯过个别的错误，未必没有遭受过局部的失败，未必没有在某一方面、在某一地方暂时退却过。而我们进攻资本主义的‘战役’，比最困难的战役还要困难百万倍，如果因为部分和局部的退却就垂头丧气，那是愚蠢而可耻的。”^③

在这里用列宁自己的武器来打击他并且谈论背叛行为，恐怕是相当容易的。但是这里涉及的问题更为严重。他谈到了军事战役。但是正像大家所知道的，在军事战役中是不能像他所主张的那样把统帅的失策不当作一回事的。由于专门知识不足而产生的错误，反而要极为严厉地算成统帅的责任，有些时候要他受到撤职或逮捕的处罚。人们理所当然地要求他对于他的作战地区和各个作战行动的后果有透彻的

① 《列宁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27页。参看《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82—483页。——编者注

② 同上。——编者注

③ 《列宁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28页。参看《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83页。——编者注

知识。一知半解地到处摸索要作为罪行由他负责，因为这意味着以人命为牺牲的试验游戏。列宁没有注意到，他用他的比喻说出了对于布尔什维克荒唐的社会变革方法的最尖锐的判决。因为如果说反对资本的战役比最困难的军事战役还要困难几百万倍，那么就应当要求以对国民经济的本质和要求的更为深刻得多的洞察以及更为仔细得多的预先研究来进行这一战役，而不是依靠在普罗克拉斯提斯^①式地应用从马克思的著作中挖掘出来的一些口号时所作的试验来进行。要知道任何一个错误的措施在这里也是意味着无目的地消灭生命和此外还要一般地损害人民福利。

正像工资的机械的平均化一样，工人的机械的平等化——布尔什维克是从这里着手实行社会化的——也立刻表明了失败。在1919年3月30日的布尔什维克刊物《北方公社》中说：

“在目前时刻，在无产阶级本身的内部，展开了针锋相对的两种倾向之间的一场可怕的斗争……由于工资的平均化，由于在工厂的管理中采用多数表决的原则，由于一种所谓的民主政策，我们切断了我们自己正坐着的树枝。因为我们的无产阶级的精华即最好的工人，宁可到农村去和从事家内劳动，只不过是為了不留在被称为工厂的那些破落的和灰扑扑的堡垒中。

正在实行中的是十足字面意义的低级工人的专政。”（转引自社会革命党人波立斯·索可洛夫的著作《布尔什维克对自己作出了判决》的法文版）

由此看来，似乎人们不问工厂工人的劳动性质而把他们当作一个整体让他们直接投票决定工资率，而在这种场合实际发生的情况可能是，高度熟练工人被不熟练的工人以多数击败。在这种场合，布尔什维主义的追随者喜欢使用的“形式民主”一词就有了实际的意义。这是按错误的形式运用的民主。现在布尔什维克也看到了这一点，并且以

^① 希腊神话中的强盗，他强迫过路人躺在一张床上，比床长则砍脚，比床短则拉长。——编者注

人民委员会的一项命令为根据而采用了一种区分成 27 种不同的工人类别的工资率表。但是既然能犯这个大错误，这就又一次表明布尔什维克在进行冒险时对经济问题本质的理解多么肤浅。他们相信，如果他们把从马克思那里得来的关于资本的生产过程和劳动力的购买及其价值的确定的若干一般化原理刻板地不加分别地应用于分化得很多的各经济部门，他们就可以解决这些经济问题。只有实践才必然教导他们，马克思的著作仅仅是概括的批判，却不是国民经济的手册，而事实的顽强的逻辑迫使他们作出的自白，数目是不小的。这些自白事实上只是本书中所写下的那些论断的确认，即使他们不承认这一点。例如在布尔什维克的《俄国通讯》德文版 1920 年 2 月号上，有一篇布尔什维克党人加克亨的论述《我们同小工业和生产合作社的关系》的文章这样说（黑体字是我用的）：

“除了我们工业的集中化了的部门中的强大国营托拉斯以外，我们被迫——不管我们愿意不愿意——允许小企业和家庭工业存在。如果说我们在新的基础上的国民经济建设开始时认为，我们似乎可以在加速集中化的道路上使这一类型的工业转变成中等工业或大工业，从而摆脱这一类型的工业，那么这一过程的进展以及它的由于战争和经济封锁而引起的各种错综复杂情况很快就使我们深信相反的情况：我们已经看出，在小工业成熟到适于集中化以前，还要维持一个较长的时期，人们必须为它提供这一相对说来漫长的发展的可能性……”

对于我国小工业特别是家庭劳动情况的比较精确的了解，十分清楚地表明，这一类型的生产在我们的全部经济生活——连同它的不发达的分散的农业和居民的文化落后状态——中扎的根是如此之深，如果人为地促使它消灭或者加速它的发展，就会引起一大批不可克服的障碍和摩擦。一整批家庭工业具有如此巨大的独立性，对于居民生活必需品的供应有如此巨大的重要性，以致大工业的相应各部门是绝对不能同它们竞争的，也不能用大量生产的廉价商品来代替它们的产品。例如一批在家庭工业中制造的木器、铁器和陶器，在国内市场上——就

便宜和适合消费者的需要来说——是没有竞争对手的。”

该文继续阐述说，如果说人们在像战争以前那样的正常条件下可以指望这些工业类型的消失同大工业的迅速发展比起来相对地迅速，那么人们即使“在我国大工业的最困难的危机中……也不再能够谈得到这一过程加速发展的可能，尽管劳动的解放和生产资料的社会化创造了这一方面的一切外部先决条件。”作者继续说：

“我们必须——相反地——预计到这一过程会拖延得较久，甚至上述小工业部门的发展会有新的上升——作为大工业企业的某种瓦解的结果，也作为巨额资金集中于某一部分农业人口手中的结果，农业人口为这笔钱寻找用途。”

作者根据这一论断提出一些建议：怎样能够支持那许多小工业和家庭工业，而不致因此夺取大工业的原料等等——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发生这种事。这些建议中有许多是可以怀疑的，但是在这里可以不去讨论它。重要的是，承认私人企业在俄国工业中也还是较长时期内大规模地存在和不可缺少的。但是私人企业就意味着私人资本，哪怕这种资本是分配在好几十万小企业中的。既然布尔什维克此外还同意允许小农和中农经营不受妨碍地继续存在，甚至还通过分割大地产来增加它们的数目，那么私人资本在俄国国民经济中就有着如此巨大的地盘，以至在那里根本谈不上社会公有经济充分实现这一意义上的共产主义。我无法做到弄清楚布尔什维克俄国的私有企业和国有企业的统计数字，我也不能肯定，究竟有没有这种统计数字。但是我相信作这样的假定是不会错的：俄国除了许多小的私营企业以外还有一大批中等私营企业，而即使在目前还不是这样，那么在上述条件下，如果要整个经济生活不致停滞，就必须使一系列小企业逐步变大起来，却不致因此立刻发展成大企业。最后引用的那一段话的结尾一句甚至暗示了这一情况。

由此可见，本书第 134 页^①所提到的关于半年的社会主义统治权

① 这里的页码是原书的，见本书第 230 页。——编者注

力足以把资本主义社会移交给“历史”的那一宣告是怎么一回事了。俄国做到了摧毁资本，布尔什维主义的文献充满关于过多的资本被破坏的诉苦，如果说人们不应否认，关于应当归咎于战争和封锁的声称有相当的道理，那么人们可以在研究经济问题的布尔什维克机关报刊上看到大量关于由错误的财政措施、缺乏责任感、官僚主义繁琐作风的增加而不是减少、某些苏维埃中地方特殊利益占有优势以及其他类似情况而引起的无限的资本浪费的报告。有坚定信仰的布尔什维克们的确尽了最大的可能来防止弊害，而公开说出看到的弊害这种做法往往会令人感到痛快。但是条件恰恰比善意更强，在经济生活中起决定作用的不是个别理想主义者的行动，而是群众的态度，而群众的道德不会由于恐怖主义而得到提高，却是降低了。不需要特别的预言家的才能，只需要对历史和群众心理有一些知识，就可以达到我在本书第 160 页和 182 页上所表述的那些结论，就是说，如果在一个时刻，就像在革命中一样，人心沸腾，群情激昂，那么这一时刻是最不适合深入地有组织地继续发展生产的；阶级专政并不表示文化的进步，而是表示文化的倒退。但是必须肯定，几乎布尔什维克革命历史中的任何一章都为那些原理的正确性带来了证据。甚至苏维埃共和国的教育制度，它的广泛的计划本来是布尔什维主义的陈列品，但是除了个别绿洲以外，它在布尔什维克破坏性暴力政策的影响下，也受到了严重的妨害。

在伟大的政治革命中经常可以区分两个阶段：以排除摇摇欲坠的事物为主的阶段和有组织地建设已成为必要的新事物的阶段。在第一阶段很少能避免任何起恐怖作用的行动，但是这种行动仍旧并不因此就必须是野蛮的暴力行动，它同样也无须经过一个长时期。相反，尽可能迅速地度过这一阶段，倒是对革命本身有利益的。因为如果同这一阶段相联系的内战拖得愈长，那么正像一切过去的革命所已经表明和我们现在重新看到的那样，第二阶段的创造性工作就要受到损害，很大一部分将成为不可能。但是既然创造性工作是目标，第一阶段的恐怖主义只是手段，因此社会主义者的努力必须放在为保证那种相互关系

创造条件上。在发达的资产阶级社会中可以通过社会民主党的工人运动做到这一点。这一运动在政治上也好，在经济上也好，作为党的运动也好，作为工会运动和合作社运动也好，都是有组织的建设性革命的学校。工人运动发展了对于各时期能带来最大利益的应当着手进行的事物的感觉，同时也发展了实现这些事物的能力，它磨砺了对于实际上已过时的事物和还具有生命力和发展能力的事物的鉴别能力，因此它防止有害的试验，这种试验的害处总是落在工人身上的，它也保证那种被认为是必要和行得通的建设性工作取得成就。当然在这里一切闪闪发光的东 西也并不都是金子，我们还没有生活在尽善尽美的时代。但是正是在 1918 年德国革命的日子里已经表明，德国拥有通过工会工作、党的工作和合作社工作训练出来的强大的工人运动这一事实对这次革命有多大的好处。在最短的期间就走过了第一阶段的道路，并且能够开始建设工作。^①如果说引起革命的环境，即由于世界大战而产生的德国经济生活的破坏和社会伦理的动摇，对于社会工作不是如此极度不利的话，那么就会以更为出色得多的方式表明，以 100 万在政治上组织起来的和 300 万在工会中组织起来的工人为支柱和动力的一场革命可以怎样不流血地进行和可以完成多么伟大的改良工作。但是帝政以最沉重类型的债务和义务的形态遗留给革命的可怕负担，不允许它自由地呼吸，而革命的事业也因为如下的情况受到了严重的损害：布尔什维克成功地争取到一部分政治上很少受过训练的德国工人，特别是其中的容易激动的青年分子，支持他们的表面上激进的苏维埃专政的学说和支持煽起革命的罢工，而这些罢工屡次给德国的经济生活带来严重的损害，并且招致了令人痛恨的武装力量干涉的恶魔。布尔什维克为国外宣传花费了公共基金中的一大笔钱，这是众所周知的，因此也可以在这里说一下。在这一方面，他们除了别的以外还可以援引他们的

^① 本书第 278—279 页上说明了一项基本方针。此外我想提一下我于 1919 年 2 月在巴塞尔大学政治科学研究生班上所作的讲演：《一种社会化理论的中心思想》，这一讲演的速记记录已由巴塞尔的国民报出版社以《企业的社会化》为题出版。

统治俄国的沙皇前辈的范例，但是他们不能声称，他们所用的方法，即在其他国家维持着支薪的代理人以便促进针对这些国家的民主发展的反抗运动以及在它们的各社会主义政党中引起不和的这种方法，在社会主义运动中有其先例。不过他们在这一方面以及除此而外的许多其他方面毫不犹豫地回过头来使用旧制度的最恶劣的方法，却是同他们的整个政治上的思想方式相一致的。他们的社会主义理论，在它没有倒退到马克思以前的限度内来说，是一种粗暴化了的马克思主义，他们的政治学说是对于野蛮暴力的创造力的过高估计，他们的政治伦理不是对于在 18 世纪法国大革命中得到古典表现的那些自由主义理想的批判，而是它们的否认。但是正像他们由于事实的不屈不挠的发言而已经认识到不得不对他们的经济政策加以彻底的修正一样，这样的时刻也不会不来到，那时他们在人民渴望自由和权利的无法根除的要求起来反叛的面前，也将不得不彻底地修正他们的政治和伦理。

三联书店 1965 年版，根据殷叙彝译
《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
任务》，1921 年斯图加特和柏林德
文修订增补第 2 版译出

辩证法和发展

答卡·考茨基的《伯恩斯坦和辩证法》一文

我就黑格尔的辩证法对马克思恩格斯学说的不幸影响所讲的话，给我招来了一阵骤雨般的关于辩证法的指教。但是，这些指教当中大多数只是改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自己关于这个题目所作的说明，因此，它所告诉我的没有丝毫不是我早已知道的、在前些年中我自己经常热心主张的东西。不过，除了传统看法的捍卫者以外还有一些人，他们责备我虽然触到了一个实际的伤痛处，但是却把疾患指错了。好像我是用这样一种方式表达个人意见的，这种方式容许解释成仿佛我在原则上是辩证法的反对者，然而我事实上远比那些把我说成辩证法的叛徒的人更按照辩证法的本意来对待事物。他们，首先恰恰是考茨基，和我对比之下都是非辩证学者。

我认为只有当大家放弃捍卫站不住脚的东西时，才可能进行有益的论战。所以，我愿意直截了当地承认：假若在第 21 页上附注的末尾，我不说“只要”而说“那种”，也就是说，假若我声明，我的批评只适用于对社会主义理论一向有影响的那种黑格尔辩证法，那么我就会把我在这个问题上所采取的原则性立场叙述得更精确一些。

任何一个有常识的人都不会直截了当地抛弃辩证的思维，这倒也是显而易见的。恩格斯在《反杜林论》里看成形而上学的思维而同辩证的思想方式对置起来的东西，乃是一个极端情况，实际上任何有判断力

的人也不再有这样的极端情况。今天普遍承认，如果不既从事物的分离化或特殊性上考察事物，也从事物的关联、关系（其中包括事物的形成、发展）上考察事物，就不可能作任何理性的思维或研究。这里涉及的并不是辩证的考察方法要得或要不得的问题，而是黑格尔给这种考察方法提出的公式的相对价值问题，是这些公式的适用性的限度问题。

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一书中把辩证法定义成这样一种看法：“不应把世界理解为已完成的事物的总和，而应理解为过程的总和，其中各个似乎固定的事物及其反映于我们头脑中的意象即概念，都是处在不断变化之中，时而发生，时而消灭，在这种变化中……一种前进的发展终究会给自己打通一条道路。”^①恩格斯补充说，这个伟大的思想“特别从黑格尔的时代起，就已经深入一般人的意识，现在未必有人还会出来从它的一般形态上来反对它了”^②。这在原则上当然是正确的，正因为如此，把反对辩证法的某些运用方式当成反对发展的理论看待，是不合理的。实际上，争论完全是环绕着另一件事。争论的顶点是以下的问题，或者说可以表述为以下的问题：我们应当怎样理解上面引的恩格斯的话里的“不断变化”一词呢？我们如何重视它所依据的基础思想呢？

我们就拿前一篇文章里已经引过的人体内新陈代谢的事实为例吧。根据生理学家的研究，人在不超过10年的时期内，要更新组成他的身体的一切物质部分。照这种观点来说，因为新陈代谢不断地在进行着，所以人在任何一瞬间都和前一瞬间不相同。可是他依然是同一个人格。他的身体特征、他的精神素质、他的禀性基本上还是一样的。的确，他在这段时间内变老了一些，在各个不同方面发生了相应的变化，经历了一个发展。但是发展虽然要靠那种新陈代谢的不断进行，它本身却完全是另一种东西。它是由那个人现有的肌体所决定的，固然

^① 参见《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4页。——编者注

^② 参见上书同页。——编者注

可以由于新陈代谢的减缓或加速而受到阻抑或促进，但是它不会转入这样的途径：发展的结果成了另一个物种的个体。因此，这个“不断的过程”是对于作为物种的人或作为人格的人来说的。人们可以靠一定种类的营养，使一个人在一定的方向发展，但是人们无法靠食物把他改造成另一个人格，改造成另一个人种（种族）的一员，或者甚至改造成动物界另一个物种的一员。在这里同时要提到，虽然生物学的进化论（达尔文主义）证明了一切生物都起源于少数基本形态，但是要想借杂交或其他任何方法，由一个已经进化的物种的个体培养出同一基本种属的另一个进化的物种的个体，是不可能的。

因此，说不应把世界理解为“已完成的事物的总和，而应理解为过程的总和”，是不完全正确的。如果我们要理解世界，我们却必须把它理解为当时已完成的事物与过程的总和。我们同时既有不需要一秒钟就完成了的过程，又有曾需要或将需要几千年或几十万年才完成的、对一切实际目的来说是“永恒的”过程。如果我置身于一条河里，那么在任何一瞬间我都不是处在同一个由许多部分的水组成的集体中，然而我始终是在同一条河里，这条河也许几千年来就走了同一条河道，未来几千年还要走这条河道，一直到河本身终于被泥沙淤塞或干涸为止。从永恒性的观点来看，河里的水及河本身都是变化无常的，也就是说都是“过程”，作为过程而论，都是同类的。但是水作为某些元素按一定比例的化合物，河作为水的一定形式的集合，则是已完成的事物，它们的意象即水和河这两个“概念”也是这样。作为已完成的事物来说，水和河彼此是不同的，它们各自是“固定的”，也就是说， H_2O 化合在一定的温度情况和压力情况下，在任何时候都是水，而水在一定的集合条件下总是一条河。

辩证的观察方法的陷阱在于：它的公式使人们对事物的特殊性进行这样的抽象，这种抽象对阐述和研究的一定目的来说是完全可以容许的，甚至是不可缺少的，但是有些时候，由于对象的性质或研究目的的性质，根本不可能或者只容许在一定限度内进行这种抽象，上述公式

也唆使人们进行抽象。应当直截了当地承认：黑格尔本人是不希望这样做的。对我来说，问题从来也不是要贬低这位思想家，而只是指明他的辩证法的危险性。^①

因此，对于这种研究来说，可以完全不管下列情况，即黑格尔是否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那种意义的唯心主义者，也就是他实际上把思维过程或“理念”看做现实的创造者，或者是否像那些精通他的哲学的青年专家所断言的那样，黑格尔的创造世界的“理念”至少原先只是在概念上把现实世界的客观的运动规律和发展规律综合成一种普遍的基本规律，上述的运动规律和发展规律是作为这一基本规律的特殊表现（我们现在可以说，作为它在一定条件下实现的形式和应用）从该规律中产生出来的。换句话说，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在他那里至多存在于表现方式中，但是决不存在于（世界）观本身中。世界的最后的基本规律，作为根据经验证实的事实，我们并不认识，所以，我们只能在概念上把它理解为我们的从科学的证实的事实中得出的那些结论的产物。在这个意义上，对于一切具有这样一种统一的世界观的人来说，——无论他们叫做黑格尔还是别的什么人，——思维过程就是现实的创造者（完全撇开下面一点不谈，即对我们来说任何事件只有通过思维过程才成为“真实”的）。而且，这对于那些驳斥康德的“物自体”的唯物主义者特别适合。^②

① 这样说也许更正确一些：指明黑格尔自己所说的诡辩的辩证法的危险性。我的非难实际上至少是否定构成的概念辩证法。

这里给考茨基一个评语是适当的。他断言，我在我的著作中给辩证法“加上大量轻蔑的形容词”，“和这种滥用贬词对比之下”，我对辩证法的清算就“有些缓和”了。但是，他所说的我的清算，事实上是在我的著作中论辩证法的一章的开头，即第23页上。而他最初所引的那些无礼的形容词，在我的著作的后面（从第26页起）才出现。无论这些形容词是否正确，试问从什么时候起人们读书是倒着读呢？

② 杜林就是说明这一点的一个典型实例，在他的著作中可以看到对“物自体”的谴责，和最近那些人对我们提出的谴责一样，他们同样硬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来自康德。据杜林说，人们“最需要警惕的就是轻率，由于轻率，理智的最重要的基本概念会丧失它对认识世界的本质或关系的绝对意义”。康德的体系一向就是这样一种轻率，它

但是，在黑格尔一旦构成他那世界和事物的一般概念（无论这种概念是怎样得出的）之后，就显而易见，这种只表明事物的实际存在中的各种“要素”的概念包含着合而为一的一切对立（这些事物的实际发展将使这些对立成熟起来），或这些对立实际上所采取的各种形式。按照这种观点，辩证法这种矛盾的逻辑学，也就是说，这种以漠视形式逻辑的第一命题（认为一种事物不可能是不同于它本身的某种东西）为基础的逻辑学，就获得了一种合理的意义。如果我们通过抽象而构成动物这个概念，那么我们就得到了一种包含着最大矛盾的观念：这个动物可能是一只老虎，或者是一条蚯蚓，或者是一个滴虫。但是，这些矛盾只存在于动物这个概念之内，实际上，在老虎、蚯蚓和滴虫之间固然存在着差别，但是，老虎并不也是一条蚯蚓，这是不矛盾的。在更详细地加以观察时，辩证法的一切原理也都以同样的方式消失。谁要对此有兴趣，他可以在例如我以前所引证的席特洛夫斯基博士的那篇容易了解的论文，即《在黑格尔和马克思著作中的无矛盾性》^①中，找到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给“形而上学者”提出的一切谜语的答案。在那篇论文里，自然界的所谓矛盾每次都仅仅表现为自然观中的矛盾。例如，席特洛夫斯基指出，恩格斯在《反杜林论》第74—75页^②上把生命解释为蛋

那“针对着理智的怀疑主义的性质”在今天“有目共睹”了（《哲学教程》，第38—39页）。从（我）加上着重号的字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出相当多的哲学上的唯心主义。在杜林的著作的前文中有个地方是这样说的：如果人们知道了事物的真实关系，即存在着一切思维规律赖以产生的基本关系，那么人们可以毫不迟疑地使用这样一种讲话法，仿佛自然界的事物都遵循客观逻辑。“思维和存在的相互保证是以它们的实际统一为基础的”（第30页）。然而，正如在恩格斯的著作中可以读到的，在杜林的著作里，决不止于唯心主义的阐述方式，而是当经验离开他时，他就一再按照他的理智的要求去补充世界观念，也就是说，让他的思维过程作为现实世界的理念创造者参与活动。世界是而且必然是像这个思维过程的逻辑所要求的那样。但是，杜林和其他任何唯心主义的或唯物主义的同一性哲学家不同，他不心想求助于一个不再具有因果性的“物自体”。在他的著作中所谓的“本身相同而恒定的东西”，而且被宣布为真实的东西，实际上却是杜林的“创造的想象”的产物，也就是说，是先验的。一望便知，上述创造的想象和创造世界的思维过程是一对孪生姊妹。——作者注

① 《德意志言论》，1896年。

② 参见《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70年版，第78页。——编者注

白体的存在方式，他以这一定义在原则上自己反驳了他在同书第7页^①上给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无用性所举的例子——即确定死亡的时刻是不可能的；他还指出，恩格斯认为运动就是一种矛盾，因为运动的前提是一个事物同时在两个地方，这一原理被同样由恩格斯提出的关于我们没有超乎现实的创造行动就能从无到无^②的那一原理毁坏了。

事物终究是事物。我们对世界联系的认识是不完全的，一部分是由于我们目前有局限性的认识方法，一部分是由于我们在觉察方面经常受到阻碍。^③如果我们承认这一点，如果我们在不能进一步扩大我们认识界限的时候把处于这种界限上的各种事物关系看作“物自体”，那么，我们就能使在上述界限这边的整个领域摆脱逻辑矛盾及其全部暧昧不明之处。但是，如果我们为了某种爱好而否认这种界限的存在，我们就会把矛盾带进我们的整个世界观里去，而且要冒这样一种危险：一有机会就使我们理解神秘的更高的理性和充满矛盾的辩证法的那种权利遭到牺牲。那时，辩证法就不会成为说明已知关系和表述问题的手段，而成为进行任意构想的推动力或指导，成为对事物进行真正科学的观察的障碍。今天，根据概念来进行构想，在自然科学中已经普遍地得不到人信任了，所以这种危险确实是很小的。在社会科学领域内情况就不同了。

考茨基向我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反驳以上这种责难的言论，他认为这样就可以否定我关于根据辩证法进行任意构想的危险所说的话一般对于马克思主义的适用性。特别他向我指出《资本论》第1卷第2版的跋里的本身很精辟的话，马克思在那里说，研究必须先掌握和调查了详细资料，然后研究者才能开始适当地叙述现实的运动。大家知道，在

① 参见《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70年版，第19页。——编者注

② 参见《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70年版，第52页。——编者注

③ 恩格斯所认为的使“形而上学的”观察方式遭到失败的那些困难，在加以比较仔细的观察时，表现为在用我们的器官和辅助工具来确定自然界中最细微的转变这一方面的实际困难。这些困难同存在于我们肉体认识或觉察的边缘地区内的、我们只有借助于数学才能加以说明的那种过程有关。

马克思的著作中说，如果做到这一点，那么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①。考茨基说，这里很明显，不论危险多么近，但在马克思看来，“深入现实的产物”是先验的结构。

我们尽管尊敬马克思，对以上的话仍不妨这样来回答：一个著作家断言自己，甚至相信自己一向是按照这些或那些原则进行工作的，并不足以证明他实际上一贯遵守这些原则。就一部像《资本论》这样的具有高度倾向性的著作来说，最不足以证明这一点。这部著作无疑包含有极丰富的客观知识材料，是深入现实的产物。但是作为一部书而论，他在编写上不单纯是所提及的所研究的细节的客观叙述，因此它是一个斗争著作，也不妨说是一个论战著作。我是一个熟悉这部著作至今几乎 20 年的人，我相信我多少还能够分辨，它在什么地方和在多大程度上符合上述要求，在什么地方倾向或辩证的结构使他的著者丧失了科学的客观性。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出现了种种自相矛盾，他往往忽视他自己确认过的重要事实，这根本是无法再否认的，而且正是他的门徒应当坦率地承认这一点，因为否则他们就会助长这种信念：随着那些矛盾的暴露，整个的书要被驳倒。

总之，有一点是显然的，例如在马克思的这部主要著作中描述手工业式生产向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过程的各章与《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一节^②之间，不仅存在着那种由于前者是叙述一个现实过程、后者是勾画一幅远景而自然要产生的区别。两者之间却也存在着这种区别：在前一个场合，辩证法只是用来研究实际事实的手段，在这种研究中，只要考虑的是事物的发展，在任何地方对事实本身也不加歪曲；但在后一个场合，给各种事实作了一个不充分的、片面极端化的描绘，使之适应预先按辩证法构造的图式。反驳这件事的那些人会指出，上述图式中所包含的思想，没有丝毫不是《共产党宣言》里——甚至《神圣家族》里——已经有的思想。这样也没有把该图式的家谱讲完，但对于这

① 见《资本论》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22 页。——编者注

② 即《资本论》第 1 卷第 24 章第 7 节。——编者注

里要讨论的问题来说，只须弄清以下一点就够了。正如我在我的著作中所指出的，《资本论》归结于一个在马克思着手研究以前早已完成的论点。

任何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都不像辩证法那么容易作出这样的结构，都不像辩证法那么任意加给这些结构一件似乎可信的外装，因而都不像辩证法那么危险。因为很少运用辩证法的人在运用时遵循黑格尔本人为它所规定的法则。^①

所以，如果考茨基引用恩格斯的这句话，即辩证法是“最好的工作方法”，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最锋利的武器”，那么最好打个折扣来理解这句话，而且不要忘记，辩证法也完全是一种两刃武器。

“但是，如果从马克思主义中抽去辩证法，那么马克思主义还剩什么呢？”考茨基这样大叫大嚷，并且举出杜林作为例子来责难我：杜林在1875年已经就马克思主义说过同我现在所说的几乎是一样的话，却要比我更合乎逻辑一些；他已经把马克思主义骂得体无完肤了。我对此只能回答说，问题和例子都暴露了令人遗憾地缺少辩证法。如果我关于辩证法和马克思主义所说的话，同杜林所说的“几乎是一样的”，那就正好不是“一样的”，要不然就无须加“几乎”这个附加语了。因此，我绝对没有责任从我的批评中得出像杜林一样的结论。甲说，“这棵树的根和干都腐朽了，必须把它砍掉”。乙说，“这棵树已经长大了，必须去掉一些树枝”。难道这“几乎是一样的”吗？已经发觉持斧者的考茨基回答说，是的。“不是树枝就是树干，反正要砍下一些东西来，这就够了”。这就是我所不能赞同的那种辩证法的一个典范。

如果马克思的学说没有我在我的著作里当作黑格尔辩证法中的背

^① “所以，黑格尔学派对确实资料及确实资料丰富得难以接近这件事，认真地抱有一种恐惧，然而恰恰只有从经验事物的具体细节才能认识真理，而且恰恰只有从细节中才能找到真理的证据的严密性”（斐迪南·拉萨尔：《既得权制度》的序言）。拉萨尔接着说，当然经验科学是“一种比一般讲空话的圆滑气更远为难以获得的，也是远为顽强的元素”。

叛性因素而加以攻击的东西就不能存在，那他的学说就很不妙了。

考茨基接着说，“一切发展的动力是对立面的斗争”，他并且问我，我是否认为这种观点是错误的，或者认为它在黑格尔或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所得到的特殊形式是错误的。对此我首先要提出这样的反问：如果这句话是正确的，那么，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即建立在社会成员的和谐一致的共同生活之上的社会将成为什么呢？难道在这种社会中再不会有什么发展了吗？

我并不认为对立面的斗争是一切发展的动力，相似的力量的合作也是发展的一个巨大动力。

但是，即使这句话是正确的，它也并非黑格尔的发现。

“自然为完成它的所有营造物的发展而使用的手段，就是在社会中这些营造物的对立……一切美化人类的文化，最美好的社会制度，不过是非社交性的果实”（当读作追求特殊利益的果实）。

在一个名叫伊曼努尔·康德的人 1784 年所写的论文《世界主义意义下的通史观念》中可以读到这些话。^①康德只是扼要重述了经济自由主义的斗士在整个 18 世纪当中宣扬的东西。

如果说对矛盾是发展的一个最重要的动力的认识构成马克思主义的最锋利的武器，那么马克思主义在兴起时也不单在黑格尔哲学中找到这种认识。那个时代的全部激进主义的文献都充满了这种认识。从无数的源泉向马克思主义喷涌一些要素，这些要素合起来构成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学说体系。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就赞美经济的利益斗争是进步的担当者；从他们那方面的要素中找不到的东西，从浪漫主义者方面找得到，从浪漫主义者方面找不到的东西，从社会主义者方面找得到。

“我不久便发觉，这两门科学（历史学和政治经济学）之间存在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不能研究一门而不研究另一门，也不能把它们彼此分开

① 参看哈顿施坦版第 4 卷，第 146 页。

各自深入……前者提供事实，后者说明原因……我追寻了重大事件的过程……向来总是只有彼此对立的两派人：想要靠自己的劳动而生活的人是一派，想要靠别人的劳动而生活的人是一派……贵族和平民，奴隶和脱离奴隶者，教皇党人和皇帝党人，红玫瑰党和白玫瑰党^①，王党党员和议会党员^②，自由民和隶农——这一切不过是同一种类的变化形式罢了”。

阿道尔夫·布朗基^③——大布朗基（经济学家）——在1825年这样写道。他当时属于圣西门学派，圣西门主义者如何极力强调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是当前社会斗争的基本原则，如何赞美无产阶级，是众所周知的。^④

社会发展由于利益的矛盾；把经济当作历史上的斗争的说明原因；把历史理解为一系列以变化了的形式反复重演的阶级斗争——这一切都早于马克思主义，而且是在不知道黑格尔辩证法的情况下发现的。欧文、傅立叶和圣西门的学派的文献表明，把社会主义的来源归之于生产发展的结果，这一点也不依赖黑格尔辩证法的形式以为支持。关于资本主义集中的预言，也不是标志出马克思主义与以前所有社会主义学派不同的一面。完全撇开英国人不谈，例如在弗朗索瓦·维达尔1838年出版的《在应用蒸汽的影响下商业工业农业及一般文明的利害社会经济学》中已经阐述了这个预言。把机器当作推动工业和商业中劳动者联合与小企业毁灭的力量；工业和商业相结合的必要性；百货店

① 分别指1455—1485年英国“玫瑰战争”中的兰卡斯特王室一派人和约克王室一派。——编者注

② 分别指英国查理一世时代拥护王家的一派和反对王家的清教徒。——编者注

③ 法国革命家、空想共产主义者奥古斯特·布朗基的哥哥。——编者注

④ 上面的引文采自W.柴尔可索夫所写的小册子《社会主义史记录》。作者是一个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他打算通过这样的引文否定恩格斯和马克思有资格说他们的理论是独创的。他忘记了，独创性从来不在于一个理论的要素，而在于要素的结合和运用。然而，我们仍不得不向柴尔可索夫先生承认，在通俗读物里面通常所说的马克思主义的发现当中，极少的东西是马克思或恩格斯发现的。这是恩格斯自己在种种场合顺便说明的事，在科学史的其他部门里也素来如此。

的扩充；公务的扩大；政治国家的逐渐死亡——这一切在维达尔的著作里都阐明了，而且完全没有引用黑格尔的辩证法——甚至多半也完全不知道黑格尔辩证法。

如果我们回过来看马克思和恩格斯本身，我们就会发现，他们在科学知识方面给他们的社会主义先驱的成绩上所加添的东西，归结于斯宾塞学派为进化论所提出的精密公式的，远比归结于著名的“否定的否定”的要多。^①为了不引起误解起见，我要立刻补充一句：斯宾塞的公式——分化与统合或特殊化与新的综括——和黑格尔的发展学说没有原则上的矛盾，但是它把黑格尔的思想表达成了这样一种形式，这种形式比黑格尔的原理要少引起误解的应用或误人的推论。这毕竟不是那么无关紧要的事。根据任何方法都可以进行错误的推论或构想，在这点上考茨基是正确的。但是，对于我就黑格尔的公式在马克思主义中的作用所说的话，这有什么有力的反对理由呢？

* * *

两条道路选一条。或者坚持这种思想：给社会主义学说一个科学根据而加以继续发展，或者不坚持这种思想。在后一种情况，当前的争论自然是无益的游戏。但是在前一种情况，大家却也要破除一个恶习，即这一回把最大价值放在严密地观察方法与主题的一切细枝末节上，把使用不完全正确的术语看成就是无知的证据，而另一回又嘲笑对方法和概念进行审查是“经院哲学”。方法论的继续发展乃是各门科学的发展上重要的一面。^②

① 例如参看《资本论》第1卷中论生产形式发展的很精彩的各章。

② 在齐思提亚科夫斯博士的著作：《社会与个体：一个方法论的研究》（柏林，奥托·里普曼出版社）中，作者就社会科学给这一点作了一个很恰当的叙述和证明。他写道，“要想在科学上达成一种进步，人们必须关于最简单的概念取得谅解。可是如果同样的现象叫不同的名称，或者不同的现象叫同样的名称，那么就不能达到任何一般的结果”（第32页）。在这一点上，马克思主义要对种种错误负责，这是根本无法否认的。例如，“唯物主义”和“物质的”这两个概念按多么不同的意义没使用过呢？“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个概念的无区别的使用，什么样的混乱没有造成呢？把《资本论》中应用的概念作一个系统的分析，将会是一件很有功绩的工作。

现在考茨基否认我所举的说明矛盾辩证法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的影响的实例是中肯的。

关于这点，在原则上我要说以下的话。我当然从来没有想断言或假定，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简单地推断，因为发展是按否定之否定的形式完成的，所以将要发生这种或那种事件，有这种或那种结局。这样幼稚的事我甚至不会从最近的俱乐部狂热之徒那里去找，更不要说从《共产党宣言》的作者那里去找了。我一向所主张而且现在所坚持的，是一种符合那个公式的看法和推论方法，屡次混入他们的政治考虑之中，而且，借马克思的话来讲，把政治考虑“诡辩化”了。这是无法从文件记录上来证明的，因为没有人明白地讲自己有这种事情，所以只能从事实本身据心理学来论证它。但是，因为每一个实际的错误都可以有种种不同的解释，所以对于那些自己已经作出解释的人，不可能想加以说服。以考茨基而论就是这样。在他看来，例如关于德国国内事态的发展方面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错误，每一次都可以用以下理由简单而彻底地来解释：他们对德国资产阶级估计得过高了，德国资产阶级或德国自由主义在活力和刚毅性上总是达不到他们的预期。

仅仅举一个情况便足以反驳这种似乎蛮有道理的解释了，即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对德国资产阶级抱着其坏无比的意见开始他们的社会主义生涯的。在这里我只指出《德法年鉴》中马克思的文章《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那篇文章最后按纯粹黑格尔的原理阐明了，在德国，摆脱专制主义的政治解放只有是无产阶级革命才有可能。在德国，“资产阶级社会的每个领域在欢庆它的胜利以前，都先经历它的失败”……“逐步解放的不可能性必定产生全部自由”。“无产阶级要求否定私有制，那它只是把……它自己未出力而已经体现了的社会消极结果提升为社会的原则”。在德国，“不打破各种奴役，就不能打破任何一种奴役……德意志人的解放即人类的解放。这种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

就是这种辩证的论证，我说它“按对立面的和对立面的发展的哲学

的看法，把需要一个世代才能实现的事情看成了一次政治革命的直接结果，政治革命必须首先为资产阶级创造自由发展的余地”。^①在革命发生以前，资产阶级的无能已经由黑格尔的教条断定了。但是，德国资产阶级无能这个教条虽然有很多夸张成分，却仍旧有合理的内核，它还不像我所指责的《宣言》中以下一句话和历史理论本身有那么原则性的矛盾。《宣言》里说当时（1847年）即将来临的资产阶级革命只能是一个无产阶级革命的直接的序曲。考茨基想要给“直接的”找根据，他引证了英国和法国的大革命，它们在经过中本来会使“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开端”——平等主义者，巴贝夫党人——成熟的。假如德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在比那两次革命远为进步的条件上和它们有类似的发展，那么预期在它的经过中发生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较之1648年或1793年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有“完全不同的影响”，这也是十分逻辑的想法。而且也出现了这种情况。证据：当革命到来时，它成了一个欧洲的革命，而且使六月斗争成熟了。于是考茨基洋洋得意地大叫：“难道马克思和恩格斯不负责任的空想就在于他们对德国所预期的事对全部中欧也应验了吗？”

我就把这叫做辩证法！所讲的是德国资产阶级革命的预计的影响，而当时在政治和经济上比德国远为发达的法国一个事件却算成了预言的逻辑正确性的证据！据席特洛夫斯基的意见，黑格尔的矛盾逻辑只能同一种主张空间与时间的观念性的哲学并行不悖。考茨基并不责备他说谎；他非常——唯心地对待空间和时间。他提出上述空间同一性的证明之后，立即同样容易地克服了一个时间差距，他凭着几乎迟后3年——1850年9月——马克思反对威利希—沙佩尔的声明里的一句话来反驳我对1847年《共产党宣言》中关于无产阶级迫近所作的宣

① 《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第23页。——编者注

告的评论。^①

事实上，无论 1648—1649 年的平等主义者运动或 1795—1796 年的巴贝夫主义者的运动，都不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开端。在那两个运动中都找不到无产者。因此，我在我写的关于平等主义者的著作里，也故意避免把无产者一词用于平等主义者，宁可把这个运动称作一个平民激进主义的运动，同样在我给《德维尔·巴贝夫》所写的跋中，我也明确地强调了平等党人“不是一个无产阶级的党的领导者”，当时还没有一个这样的党。^②无产者在 1648 年和 1793 年是一个完全不独立的角色。另一方面——这涉及一个目前在社会主义文献中还经常出现的错误——可以特别称为资产阶级的阶级——富裕商人和工业家——在 1642—1649 年和 1789—1794 年与 1848 年的德国资产阶级的作法在原则上没有两样。1648 年和 1793 年时在议会中律师、教士或前教士、医生及其他（在法国已经有文人），总之，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政治领导权，而在议会外面城市小资产阶级连同它的劳动者和农民阶级提供推动的革命分子。这些人及后来的革命大军使革命带上了英雄戏剧式的性质，但是工商业资产阶级不久就满怀厌恶地忍受革命，或者直接试图促使它结束。要在德国的资产阶级的态度里去找德国 1848 年的革命和 1642—1648 年的革命及 1789—1794 年的革命的经过所以根本不同的原因，是完全错误的。假使其他各阶级发挥了更大的热情，当时在德国存在的一小撮资产阶级根本不能削弱革命。其他各阶级所以缺乏热

① 在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时，科伦共产党人案的揭发材料中重印的演说词。在那个演说中，马克思就德国工人为掌握政权还要先获得的能力所说的话，不也和《宣言》中的宣告根本不同——“直接”继起的无产阶级革命扩展成 50 年的内战和国际斗争——，而且也 6 个月以前（1850 年 3 月）刚发布的共产主义者同盟执行局的通告信的内容根本不同。后者谈到预计即将来临的法国革命时说，革命将在法国带来工人阶级的“直接胜利”。一个像马克思这样对法国社会状况有极透彻认识的人可以写出如此难于置信的话，如果我要从一种诱人作出错误结论的辩证法中找这件事的解释，难道是那么骇人听闻的吗？如果我在我的著作中对黑格尔有些不客气，这当然不是为了贬低马克思和恩格斯。

② 《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第 72 页。

情和力量，1848年在德国存在的小小的工人运动对此又完全没有责任；就是在柏林，工人阶级当中最有知识的分子——机器制造工人，却和资产阶级民主派走在一起。工人大会对资产阶级民主派同样表示和解态度。对法国发生的事件的恐怖的确也有助于加强妥协情绪，但是这并没有决定性。更重要得多的是，经济的矛盾之外又加上民族矛盾，德意志最大的一个邦的政府掌握下的军队与官吏，和查理一世及路易十六世所掌握的在性质上完全不同。还有文明发展——情报工作，交通线路等——的一般状况比较高，这也夺去了1848年革命的基本力量。总之，几个流行的俗套“阶级斗争，资产阶级，无产阶级”远不足以说明德国革命与英国革命及法国革命的经过的不同。

然而，没有人会责备马克思在1848年以前对这里和那里的条件的差别没有充分认识，或者低估了这种差别对预料中的革命经过的影响。我至少会把这样的“事后过度聪明”看成无比的低级趣味。我所揭明的并不是这种算计上的谬误或错误。如前所说，我强调的谬误是一种违反马克思学说本身的谬误。我们且假定马克思的一切其他前提都实现了，革命在德国也逐步加强地展开了（当然这里面就包含着，革命的开端和现实有的开端是不同的），那么革命本身就会成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的直接的序曲”吗？肯定不会。因为这需要有一个完全不同的社会经济基础。这需要一种比德国在50年前的工业发展先进得多的工业发展，比当时的无产阶级人数多得多和教育程度高得多的无产阶级。革命正是在这点上，或者说如果革命有了依考茨基所假定的那种经过，“永久的革命”正是在这点上丝毫不能使情况有所改善。“Inter arma silent artes”〔战争时期艺术缄默〕——并非这样一种动摇了对事物存续的一切信念的革命是适于工业发展的时期。这样的革命可以使一些阶级——无论是什么阶级——显露头角，但是却不大能改变它们的状况和力量。因此，我坚持我的这一主张：引自《宣言》的那句话和1850年3月共产主义者联盟的通告信及其实行恐怖政策的指示，是历史的自我欺骗的产物，在一个认识马克思而且在理论上了解马克思的人来说，这种自我欺骗只有从他

重陷入一种错误的辩证法可以得到解释。但是考茨基的辩解，即马克思和恩格斯在 1847 年不是过高估计了无产阶级，而是过高估计了资产阶级——假使他说得对——实际上就是把他们说得更坏。这是我坚决否认的。他们无疑是过高估计了当时的无产阶级。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恩格斯为《论共产党人案》和《论住宅问题》的新版所写的序言。关于这两篇序言对以后的“青年派”的影响，最有资格的裁判者就是青年派本身。“青年派”并不只是由于 1890 年的决选问题和五一节才和议会党团有了对立的，这一点考茨基不会不知道。我手头没有他们的报刊，所以对我的主张提不出详细证据。但是据我所知，当时“青年派”的最坚决进行斗争的报刊之一，《萨克逊工人报》，刊载了上述共产主义者同盟的通告信，作为反对党领导执行的政策的王牌。“青年派”按照他们的方式解释这个通告信，现在考茨基又对它作另一种解释，依照人们强调一定的词句或对这些词句的理解，这一种解释或另一种解释便是正确的。但是，这——容许作不同解释——正是我对于发表这个文件，或者不如说对于它发表时的解说方式要指责的地方。

同样的话也适用于恩格斯在《论住宅问题》的序言里给社会民主党内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所下的定义。考茨基对那一段话想要这样去理解，仿佛恩格斯只是从小资产者的阶级地位出发来阐明他对社会主义运动的态度。可是，青年派对这段话的理解略有不同，他们特别还把这段话——为了不提任何活着的人——同葛利伦贝格之类的人连在一起，而梅林最近在我前面提到的论战中也以类似方式提出这段话来攻击主张建立合作社的社会主义者。一切不直接有关为了把全部生产资料转变为社会所有而夺取政权的行动，人们都恰好可以用这段话把它当成进行“社会拼凑”的“小资产阶级的”工作而一笔抹杀。

按照考茨基的意见，我之所以把这句话归结为一种极庸俗的解释，只能这样来说明，即我感觉这句话“说中了自己”。我对于这种谄媚的心理学上的说明不愿意再详细讨论，我只指出一点就够了，即如果在今天有人对我说我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者，和如果有人对我说

我是一个伦理学的社会主义者，可以使我差不多同样激动。这些称号按其一般性来讲，说明的东西真少得可怜。我们中间有谁还没有指责过别人的小资产阶级性，而且从别人那里没有受到过同样的指责呢？

但是，我不是在我的著作中为蒲鲁东唱颂歌吗？考茨基叫嚷道，“恩格斯的预言才能在1887年当然没有预想到这一点，《苏黎世社会民主党人报》的编辑决心要使蒲鲁东复活”。我对此的答复首先是，考茨基似乎有点太容易忘事了。

我在我的著作中所说的赞扬蒲鲁东的话，实际上恰恰就是我在1896年在《新时代》上关于他已经讲过的话，当时考茨基却连一个字也没有暗示那篇文章意味着一种不能容许的蒲鲁东的复活。^①不过，如果谈的是一个经常靠那些已把他置于死地的人而得以复活的人，那么“复活”根本就是一件奇怪的事。

拉萨尔在《巴师夏·舒尔茨》中写道，“蒲鲁东以前是个才子，可是从来不是经济学家”。但是，假如罗伯尔图斯报道得不完全错误，同一个拉萨尔就留下一份联合计划，它和蒲鲁东的社会政治理想完全一致。^②

但是蒲鲁东还有第二位“使他复活者”。

大家知道，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以什么样的嘲笑态度对待蒲鲁东的“构成的”劳动价值，即蒲鲁东的这种思想：通过任何措施来确定每种劳动的劳动价值，并且为实际的生产者（劳动者）保障这种价值。在《贫困》中还谈不到蒲鲁东的方法的问题（只是通过谈起布雷的著作

① 《政治家兼政论家蒲鲁东》（《新时代》，1897—1898年，第2卷）。在那里我关于蒲鲁东写道，“如果他有不少言论在今天我们认为极端褊狭，那么我们不可忘记，这些言论是对一种极端愤世嫉俗的政治煽惑的反动的表现，没有人会比努力上进的工人阶级更为不幸了”（第617页）。在那篇文章的另一个地方，我讲蒲鲁东“比他今天在社会主义者中间享有的名声要好些”。

② 据罗伯尔图斯在1871年9月8日给鲁道尔夫·迈耶尔的信，他在拉萨尔生前就已经要证明他和蒲鲁东是一致的，事实上在拉萨尔和蒲鲁东之间存在着一种比前者所意识到的要强得多的精神契合。

等作为一个信号)，但是整个想法被当作荒谬的东西而抛弃了。

然而，如果我们看一看马克思于1875年在论述哥达纲领草案的信里所描绘的共产主义社会如何从资本主义社会中发展出来的景象——因而，看一看对于现今活着的社会主义者来说无论如何也比以后的共产主义可能形式更重要的社会阶段——出人意料之外，我们会突然遇到这个构成的劳动价值。马克思宣称，在消费资料的分配中，“是商品等价物的交换中通行的同一原则，即一种形式的一定量劳动同另一种形式的同量劳动相交换”。^①《资本论》第3卷里按同样的意思说，“第二，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消灭以后，但社会生产依然存在的情况下，价值决定仍会在下述意义上起支配作用：劳动时间的调节和社会劳动在不同的生产类别之间的分配，最后，与此有关的簿记，将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重要。”^②这段话里同样非常明确地表示了“构成的”价值。所假定的方法是不同的，但是事实本身在这里也有它的地位。^③马克思和蒲鲁东如何在政治领域中终于在联邦制上彼此相遇，我在我的著作中第134—136页上已经指明了。

人们可以轻而易举地从辩论上消灭一个著述家，人们可以给他的著作贴上一个标签，从而宣布把它处死刑，这样做至多能够对付他的弱点和异想。至于他在有生命力的思想方面所阐明的东西，靠聪明的辩论是不能把它除掉的。

然而，蒲鲁东不仅按上述方式在理论上恢复了一部分名誉，他也——更重要得多——在实践上，即在现实创作上正在复活中，而且快要完全复活了。在现代合作社运动中形成一种生产的和配给的联合制，它的主要特征使人很清晰地想起蒲鲁东的建议。构成重点的不是生产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4页。——编者注

② 见《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965页。——编者注

③ 有人会对我提出反对意见说，方法问题、前提问题正是决定性的东西。这在原则上是正确的。然而在《贫困》中也论驳了布雷的建议，该建议的前提和上述前提是非常接近的。参看《哲学的贫困》第2版，第52—53页。——作者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17页。——编者注）

合作社，而是配给合作社。这些机构并不是小资产阶级的创造，而是工人的创造；它们是工人运动的机关，在大工业把工人大量集结起来的地方最为强大、最为有效。

世界历史有它自己的讽刺。正当恩格斯认为关于蒲鲁东在工人运动中的作用可以说“在理论上已被消灭，在实践上已被排除”的时候，一个蒲鲁东思想的根苗恰就在蒲鲁东似乎遭到了最大失败的地方，即在比利时的佛来米人中间开始萌芽了。^①当然，这不是旧日的或整个的蒲鲁东，假若人们打算把上述思想的专利权归之于他，那么这在我们说来就意味着对蒲鲁东的许多前辈和同时代的人评判得不公平；但是，那是一种他所宣传的、并以他命名的思想，它在新的合作社运动中开始成形。使蒲鲁东“复活”的不是《苏黎世社会民主党人报》的编辑，而是工人运动本身——而且一部分是在马克思的标记下进行斗争的工人运动。当该编辑还抱着神圣的热忱对每一个仅仅说出蒲鲁东的名字的人进行攻击的时候，这个被击败的小资产者在他的墓穴中就已经活跃起来了。^②

① “在比利时，佛来米人已经把瓦隆人从运动的领导位置上排除出去了，已经废黜了蒲鲁东主义而大大提高了运动的水平”（恩格斯在他的《论住宅问题》的序言里的话）。——作者注。（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3页。——编者注）

② 蒲鲁东在这点上也和拉萨尔一样：他时而由于他的明显的虚荣心而给人以刺激，时而由于他的修辞力量、丰富的思想和犀利的分析而令人感动。当我在狄尔论蒲鲁东的著作（我对这些著作的判断一向是不完全公道的）的促使下，重新更详细地研究蒲鲁东的时候，我得到的对于他的评判比我在此以前对他的评判要好得多，而当我为了编订埃里梯尔关于二月革命的著作（见本书第××页。——编者注）而不得不更仔细地研究这次革命及蒲鲁东在这次革命中的作用时，这种好的评判更加强了。此外，马克思对蒲鲁东当时的政治态度也一再表示过赞成的意见。

附带提到，考茨基认为，假使我多搞一搞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我为埃里梯尔的著作所写的后记或许就包含“较少的对未来革命者和那些想要成为未来革命者的人的教训”。我对这一点非常怀疑。因为在那篇后记里根本找不到关于人们将来必须怎样做的任何指示。我只是研究那些在未来的革命中会按照和二月革命中类似的方式被考虑到的各点，而让读者自己得出他的结论。但是，考茨基总要反对历史事件的有教训意义的讲法，这叫我有些惊异。

这也是历史辩证法的一例，谁要是喜欢公式，他在这里面甚至可以发现一些“否定之否定”。只不过什么问题也不会由此得到说明。因为如果说马克思并没有完全打死已故的蒲鲁东，那么重新复活的蒲鲁东更不会打死活得更久的马克思。这种关系同舒尔茨—德里奇和拉萨尔之间的关系相仿。舒尔茨—德里奇在今天同 10 年或 20 年前一样没有死去——他作为德国合作社制度的先锋继续活着，他曾经不屈不挠地争取了为这个制度的发展而必要的权利。但是拉萨尔也同样继续活着，固然在某些点上他激烈地攻击过舒尔茨—德里奇并且自以为已经把他打死，而恰恰就在这些点上——工资铁律和国家给予贷款的生产合作社——他今天被认为过时了。在今天大部分还具有充分生命力的，并不是他为了宣传鼓动而把自己的社会主义思想像塑造似地概括成的公式，而是这种思想本身。所以，即使马克思认为必须特别强调的一些原理遭到否定，整个马克思的学说体系也不必因此而崩溃。

关于把全部生产资料转变为社会所有的公式，恩格斯在 1887 年写道，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说它只有在遥远的、几乎无法预见的时代才可能实现。这个公式意味着什么呢？它的实现将意味着什么呢？如果我们设想一下现代社会中经济生活的丰富多样的形式，城市和乡村中生产部门和经济单位的巨大差别，那么我们就不得不说，这个公式或者是只能表示今天在立法中已经日益清楚地表现出来的那种国家上级所有权的一般原则，或者是——只要不是等到发展在一切领域中创造出——为了通过私人企业转变成社会主义企业本身来实现它，又需要极大量的创造。历史不容许二者择一，它不受“或者是……或者是”的指令。它的格言是：“既……，也……”我们愈向这个格言深入，我们愈少看到由唯一的十分纯粹的原则支配了社会生活的历史时期，如果相信像现代社会这种许多千年发展的产物，竟能够在不太远的将来根据一个唯一的公式得到改造，这是一种完全非辩证的想象。如果要生产的社会化成为普遍的现实，就必须不从一个方面而从各个不同的方面着手进行。但是，这件事进行得有多快，那是任何人也难说的，因

为这里面有管理技术因素和心理因素的问题，这些因素凭推测是根本无法估计的。以国家、省区和市镇为代表的全体，可以把若干企业和生产部门转变成国家的、省区的和市镇的企业，但是他们对于属于其余企业的人，却无法命令他们组织生产合作社。总之，马克思的公式只能作为原则、作为法权思想来充当一般的纲领。对于经济实践来说，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它无论如何也还要容忍其他异教的神和它并立。人类的历史在这方面是共和制的，它不承认任何“社会王国里的国王”。关于制度方面它是折衷主义的，关于时间标准方面是可怕的“小资产阶级的”。

最后，考茨基还认为必须保护恩格斯，使他免受这种嫌疑：似乎他在《法兰西阶级斗争》的导言中所纠正的是某种别的东西，而不是1848年的错误。他认为恩格斯在那里批评的是那时的斗争方式，而不是1895年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斗争方式。不错，我究竟在什么地方写过一句主张后一见解的话呢？考茨基在这里直截了当地把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年的时代之后的整个时期内所主张的关于运动进程的见解同德国社会民主党所遵循的斗争方式等量齐观。但是，它们早就不是这样了。马克思关于哥达纲领草案的信，以及像在今天国家中普选权“决不可能具有比成为衡量工人阶级成熟的标尺更多的东西”^①的种种意见，据我看来就充分清楚地表明，对斗争还有不同的看法。在这以前，恩格斯从来没有像在这篇导言里那样毫无保留地承认普选权的价值。这篇导言毫无疑问是对德国社会民主党迄今所采取的策略的批准。我说的正是这件事，我所反对的并不是这种策略，而是用过了时的1848年策略的口号和论据来装饰这种策略。这就是我从这篇导言得出的结论。

“不”，考茨基说，“恩格斯一如既往，仍旧是一个老革命家”。他引

^① 恩格斯的原话是：“普选制乃是工人阶级成熟的标尺。在今日的国家里面，它不能而且从不会提供更多的东西；不过，仅此一点也足够了。”参见《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73—174页。——编者注

证了恩格斯谈到社会民主党不能放弃革命权的一段话作为证据，并且告诉人们说，恩格斯原来为《阶级斗争》的导言写了一个同发表的那个不同的结尾，只是按照德国朋友们（他们觉得这个结论“太革命了”）的愿望才把它删掉。如果这一结尾在恩格斯的遗稿中，那考茨基会要求我把它发表出来。它将表明，我引证恩格斯的话的权利是多么小。

首先，我要回答说，一直到我读到考茨基的有关报道的时刻为止，我毫不知道那个被压下来的结尾，而且我手头没有这样一份手稿。考茨基所报道的事实并没有因此就被否认。这一手稿也很可能还存在——只不过不在我所保存的文件里。它可能在存放于其他地方的函件之中。其次，这个革命的结尾也许只会证实我在不知道它的情况下所写的一句话：恩格斯并没有得出从导言的主要内容中产生的一切结论。如果一个人一方面赞扬“长期、持续的工作”、“缓慢的宣传工作和议会活动的工作”，并且把同军队发生大规模冲突看做能够阻碍运动前进的唯一手段，那么，“革命的结尾”对此就完全格格不入了。

此外，恩格斯并不是头脑不清的人。虽然他对于在结尾时拿出强有力的王牌来有所偏爱，但是用一种同前面的话直接矛盾的东西来作结语，这并不是他的风格。恩格斯在导言结尾所讨论的，是起草这篇导言时正好在德国提上议程的防止颠覆的法案。^①他可能超出德国朋友们认为是必要的或者适当的程度，更加率直地针对这一法案而力倡“革命权”。但是，这同导言的其他内容毫无原则性的对立。

第三，就“革命权”而论，它是不成问题的。如同我在我的著作中^②所指出的，既不能把它列入法律，也不能加以禁止。如果一个民族认为革命是必要的和可能的，那么它就进行革命，对此既不容许稍加禁止，也不容许稍加胁迫。要在这方面进行研究，完全是多此一举，因为实际上起着决定性作用的始终是根本无法控制的情感和不可衡量的影响：普遍的情绪，特别是政治状况。各国人民曾经为了微不足道的挑衅而

① 1894年提交德国议会讨论的新的反社会党人法，1895年被否决。——编者注

② 指《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编者注

推翻政府，也曾经平静地忍受更加恶毒得多的挑衅。但是一般说来，一个国家的各种制度愈自由，引起革命起义的动因也就愈会消失，而用暴力推翻由人民通过民主选举任命的政府是一种没有人会赞同的行动，这都是不言而喻的。

经常重提“革命权”，这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一种权宜之计，是至少在形式上还培植一件人们事实上已经束之高阁的事情，是一种给假花浇水的做法。

但是，由于我断定这一点，我是不是就热心于反对“革命精神”呢？我说，马克思主义所实现的和平进化的社会主义同粗暴的恐怖的人民运动的融合，只表明是一种妥协，但并不是对立的消除，^①考茨基把这句话解释成对马克思主义中的革命精神的“驱除”。

这就使我们面临着这样一个问题：这种革命精神究竟是什么？是在精神上超越今天的所有制形式和生产形式吗？是在精神上摆脱受这种所有制形式制约的社会观的限制吗？那么革命精神就是社会主义精神，我当然不会反对它。

或者，这是在实践上漠视今天社会的法权概念和道德概念吗？在这方面，经验已经向我们指明，这种漠视会导致什么结果。考茨基本人也曾写过文章，严词申斥闭门造车的做法，因此这一说法是根本不可能的。

制造革命同样是不可能的。

因此，就我所想“清除”的东西来说，我和考茨基的差别实际上只剩下上面提到的给白铁皮制的花浇水那件事。在德国的当前情况下，“革命权”并不能比飞行权说明更多的问题。如果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即迫使德国工人为了行使其权利而求助于它，那么，只要他们发现了手段和可能，也许他们多半会自动这样干起来。只要我还不能给他们提供飞行机器，我认为我的任务并不是大肆宣扬飞行权，而是强调对现代发展

① 参看本书第 169 页。——编者注

使工人可以运用的那些前进运动——解放工作——的手段加以利用和发展。

没有必要拿黑格尔关于历史从来不在同样的条件下重复的这一原理来教训我。因为强调今天的情况和《共产党宣言》作者在写宣言时所面临的情况不同的这一思想，若干年来一直是我的政治工作的指导思想。我想做的事情是：根据实际情况已经发生的巨大变化在社会主义理论方面作出结论。在这段时间里，整个社会生活已具有另一种性质，政治制度、法权关系和社会观念都已发生了变化，已经出现新的机关来联合和保持社会的力量因素，经济活动的新形式已经形成，交往生活已经成了另一个样子，整个文化水平也已经提高。在这种情况下，工人阶级的解放斗争不是必然地要导致像某些国家的资产阶级的政治（不是经济）统治已经宣告开始的那种灾变；改变了的武器技术并不是使人不再考虑街头冲突的唯一因素；阶级斗争的加强不一定意味着发展到较残酷的斗争形式；而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有可能通过改进和扩大今天已经运用于这一目的的那些政治机构和经济机构来实行的，而且最终也多半是会这样实现的；我认为以上这些是辩证的历史观的自然结论。

发表于1899年6月。选自马元德、严隽旭、彭金安、蔡升译《社会主义的历史和理论》，东方出版社1989年版，第295—321页

科学社会主义怎样才是可能的

前 言

一切才能的直接目标不是利益就是舒适；与此相反，一切知识的直接目标却是对真理的研究，而且与此相应，也是对涉及双方的领域的多样性的研究。

Th. 伯克尔：《妇女对科学的影响》

与所有的社会改良政党一样，社会主义的生机勃勃的源泉也是当前社会制度的明显的缺陷。只要这一源泉还在流动，社会民主党这个战斗的社会主义政党就丝毫不必害怕对它的理论自我批评。

Th. G. 马隆里克：《当代马克思主义内部的科学和哲学危机》

本书的内容是今年5月17日我在柏林的社会科学大学生联合会所作的一次演讲。我力求根据草稿和记忆尽可能准确地复述我在上述集会上的讲话。第一节是以详细的手稿中的论述为基础的。我在演讲时作了一些纯粹解释性的补充，现在也把它们收入本书，除了一些文字上的修饰外未作任何改动。本书的第二节的内容在我作演讲时还只有一个比较详细的提纲，因此这里的文字虽然是忠实地遵循当时论述的思路的，却不能保证是原来演讲的准确复述。我在以小册子形式出版

此书时还以脚注或短短的补遗的形式作了一些我认为恰当的补充。在这本小书的文本中，我特意没有加进本质上与我在这次集会上的论述无关的任何内容。

我之所以要如此慎重，是由于考虑到报刊上对我的这次演讲的某些评论。我既没有时间，而且坦白说也没有兴趣在报刊上就应当怎样理解演讲的个别段落或者（因为我的对手大部分是喜欢对别人的思想妄加猜测的）就我对这些部分的整体思想打笔战。有一些针对口头语言很容易产生的，涉及演讲倾向的真诚的错误理解，可以通过书面的复述来更正。但是对于恶意的曲解是任何更正都无济于事的。

在由这次演讲引起的争论中，阿道夫·瓦格纳教授指明，能对它提出的最重要的理论性反对意见是：我所提出的问题基本上只是关于科学概念的文字之争。如果用“定义之争”代替“文字之争”这个词，那么我承认这句话在形式上是正确的。对我来说，这实际上首先涉及的是科学概念的界限。但是在这一界限问题后面，对我来说——而且对别人来说也是有意地和无意地——隐藏着一个普遍的关于理论思考界限的问题，而且在实践行为受理论思考影响的范围内也涉及一个普遍的关于实践行为界限的问题。因此我在本书中回到这一问题而且还要在这里再次说明，我很长时间以来就在研究本书中讨论的这个问题，并且有时还把它拿出来进行争论。例如，两年前在维也纳《时代报》发表的对马萨里克论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社会学基础的著作的评论。我在那篇文章中说：“顺便说一句，对于一种像社会主义理论这样的理论（它研讨的是应当发生的事情）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成为科学并且是否需要成为科学，是值得费些力气进行一次精确的研究的”（《时代报》1899年7月15日）。

我要把这次演讲理解成这种研究的一个步骤。如果它能引起一场有成果的讨论，我将是很高兴的。

爱·伯恩施坦

1901年5月29日于大利希特费尔德



在当前传播的社会主义理论中影响最大的是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制定的学说体系，今天几乎所有国家中绝大多数的战斗的社会主义者都信奉这一学说，根据它来确定自己的要求和目标的方向。这一学说的创始人把它称为科学社会主义。在你们中的多数人所熟悉的而且也是值得你们所有的人都熟悉的一本著作即《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这是恩格斯的一本同样值得阅读的论战著作即《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一书的节录）中，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说，马克思通过他所完成的两项科学发现即唯物主义历史观和对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剩余价值的揭示，使社会主义成了科学。尽管这并不是最早宣扬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科学”称号的文句，但却是最正式的。在比这句话第一次发表——1877年——更早出版的社会主义书刊中，已经屡次刊载包含同样提法的文章。甚至一位通常与卡尔·马克思敌对的德国社会主义者，颇有才华的约·巴·冯·施维泽也在文章中写道，当马克思的巨著《资本论》第1卷问世时，他在读完这本书以后说过：“社会主义是一门科学。”

但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我们采用这一简化的说法）既不是唯一的，也不是第一个自称科学的社会主义学说。你们可以在马克思自己那里，同样也是在《资本论》第一章的注24中读到，从来没有哪一个学派比法国社会主义者蒲鲁东的学派更多地滥用科学一词。但是在马克思写下这些话的当时，蒲鲁东是罗曼语系国家影响最大的社会主义者。不过如果你们读一下蒲鲁东以前出现的两个法国社会主义学派即傅立叶的门徒和圣西门的门徒的著作，然后你们到英国去并且读一下罗伯特·欧文学派的著作，你们就会在那里足够频繁地遇到相似的援引科学作证的词句。拉萨尔的著作中也有这样的词句。几乎可以说，19世纪差不多所有的社会主义者都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声称自己的学说是

科学。

乍一看，这种互相吻合的情况容易引起我们的不信任。我们毕竟已经熟知这些学派之间在观点方面和结论方面有着极大的差别。蒲鲁东曾多么激烈地反对傅立叶分子，卡尔·马克思又是多么愤怒地对这同一个蒲鲁东进行批评和鞭挞啊！但是马克思自己也受到一些社会主义者的批评，他们对他的谴责正和他对别人的指责一样：空想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概念游戏。撇开最近的批评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者不谈，我只提一个今天已经差不多被人忘记的法国社会主义者保尔·布鲁斯博士，^①他在当时曾起过相当大的作用，也是一位博学之士。他曾一再指责马克思的乌托邦思想，并且最后在悼词中称马克思为最后一个伟大的乌托邦主义者。如果在统统同样地援引科学作证的社会主义者中存在如此大的分歧，如果这些分歧不是仅仅涉及非本质问题或者附带的应用问题，而是在许多情况下一直涉及他们学说的根源。（而实际情况正是这样），那么难道不会有人产生这样的想法：这些社会主义者可能都是错误的，其中任何一个都不能声称自己拥有寓言中的神奇戒指，任何一个都没有权利把自己的社会主义称为科学？

不过即使我们把理论或体系之争搁置不论，并且坚持在它们的生存斗争中今天已成为胜利者的那种学说，即马克思主义，我们仍旧会在那里碰到一些容易使具有批判素质的人们吃惊的地方。

我们看到，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是从两个理论发现推论出社会主义的科学性的，其中之一是剩余价值学说。恩格斯写道：“已经证明，无偿劳动的占有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通过这种生产方式对工人进行的剥削的基本形式；即使资本家按照劳动力作为商品在商品市场上所具有的全部价值来购买他的工人的劳动力，他从这种劳动力榨取的价值仍比他为这种劳动力付出的多，这种剩余价值归根到底构成了有产阶级手中日益增加的资本量由以积累起来的价值量。这样就说明了资本主

^① 保尔·布鲁斯（1844—1912），法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曾参加巴黎公社，后来是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可能派”的领袖之一。——编者注

义生产和资本主义生产的过程。”^①

根据这一段话，人们会设想在对剩余价值的科学证明和社会主义之间应当存在这样一种内在关系，即从剩余价值的事实可以推论出社会主义的必然性。但是我们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却可以发现一大批与这一结论矛盾的句子。属于这类句子的最尖锐的意见见于恩格斯1884年为《哲学的贫困》德文版写的序言。他在那里坚决反对那种认为可以从剩余价值的事实中推论出社会主义必然性的观点。他援引马克思的一句话指出，这种观点从经济学上说在形式上是错误的，因为这“只不过是把道德应用于经济学而已”。^②根据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规律，产品的绝大部分不属于制造这些产品的工人。恩格斯继续说：“如果我们说，这是不公平的，不应该这样，那么这句话同经济学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我们不过是说，这些经济事实同我们的道德感有矛盾。所以马克思从来不把他的共产主义要求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必然的、我们眼见一天甚于一天的崩溃上；他只说了剩余价值由无酬劳动构成这个简单的事实。”^③

这和上面引用的段落听起来如此不同，以致读者首先得到的印象是，这里存在着一个无法解决的矛盾。起初说剩余价值学说是社会主义的两个科学支柱之一，而我们从恩格斯那里了解到，他在包含这一内容的著作付印之前曾把手稿读给马克思听并且与他作了深入细致的讨论，因此这一著作可以说是经过马克思核准的。现在却宣称剩余价值原理对社会主义缺乏证明力。就这一个问题来说，我们认为论据已经丧失了。

也许会有人站出来反对上面最后引用的恩格斯那句话的合法性。企图确定恩格斯和马克思在思想方法上的重大差别的尝试已屡见不鲜，而且也并不是统统都失败的，尽管我认为它们大多数明显地夸大了问题。在某些领域，恩格斯不能说是马克思的完全准确的解释者。但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40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中文第1版，第209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209页（黑体是伯恩施坦使用的——译者注）。

是在目前我们谈论的这个问题上这样说却很难说是确切的。我们确实看到马克思本人说过许多明确无误地表示同样观点的话。恩格斯在上引段落中提到的句子^①同样也允许人们作出与恩格斯不同的另一种解释。但是如果我们在《资本论》中看到那里论述的例子中“(雇佣工人的)劳动力使用一天所创造的价值比劳动力自身一天的价值大一倍。这种情况对买者(资本家)是一种特别的幸运,对卖者也决不是不公平”。^②或者在马克思关于哥达纲领草案的信中读到“难道它——指今天的劳动所得的分配——事实上不是现今的生产方式基础上唯一‘公平的’分配吗?”^③并且紧接着指出,在除了完善的共产主义以外的任何形态中,在劳动报酬和劳动提供之间必然存在量的差别,那么我们就再也不会怀疑恩格斯的话是正确地复述了马克思的观点的。

在社会民主党的通俗书刊中,甚至在出自恩格斯之手的或者得到恩格斯和马克思赞赏的著作中,确实是极其坚决地把剩余价值的事实当作社会主义的论据与别人论战的,《资本论》中是一再把剩余价值称为剥削的,而在涉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时,剥削总是意味着道德上应加谴责的,意味着——正如剥削(Ausbeutung)与赃物(Beute)这两个词在语言上的关系所表明的——经过伪装的抢劫。这就是说,从社会角度——不是作为个别的资本家——来考虑,资本家是工人阶级的掠夺者或重利盘剥者。

① 指《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中的下面一段话：“如果一个产品的交换价值等于它所包含的劳动时间,一个劳动日的交换价值就等于一个劳动日的产品。换句话说,工资应当等于劳动的产品。但是实际情形恰好相反。”马克思对此加了下方的注释：“经济学家对李嘉图的这种非难,后来被社会主义者抓住了。他们假定这个公式在理论上是正确的,责备实际与理论相矛盾,要求资产阶级社会在实践中贯彻它的理论原则的臆想的结论。英国的社会主义者至少就是这样把李嘉图的交换价值公式倒转过来说反对政治经济学。”(以上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中文第1版,第208页及第13卷第52页。——编者注)

② 《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版,第226页(括号中的字是伯恩斯坦加的,黑体是伯恩斯坦用的——编者注)。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2页。——编者注

那么这与上面涉及的恩格斯的话怎样才能协调一致呢？恩格斯在那句话以后接着说的几句话为我们提供了一点线索：“但是，在经济学的形式上是错误的东西，在世界历史上却可以是正确的。如果群众的道德意识宣布某一经济事实，如当年的奴隶制或徭役制，是不公正的，这就证明这一经济事实本身已经过时，其他经济事实已经出现，因而原来的事实已经变得不能忍受和不能维持了。因此，在经济学的形式的谬误后面，可能隐藏着非常真实的经济内容。”^①

这就是说，并不是剩余价值的事实直截了当地为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必然性提供证明，而是群众对剩余价值的厌恶、他们对剥削的判断成为现存制度是不能容忍的证明，或者（如果我可以这样表述的话）成了表明现存状态已不能维持下去的指示器，只不过不能维持下去的原因不是在于剩余价值的占有，而是要到其他经济事实去寻找。

如果这是正确的话，那么我认为，关于剩余价值的发现使社会主义成为科学的那句话就被推翻了。这一发现的贡献本身尽管在科学上有很高价值，在理论上无可辩驳，但是按照这里所作的分析，它毕竟丧失了任何对社会主义的科学证明力。不仅如此，按照这一分析，它甚至根本不能被当作反对现存社会的科学证明，这正如比方说关于奴隶劳动的产品必然超过奴隶的消费的发现不能成为反对以奴隶制为基础的社会制度的科学证明一样。

顺便提一下，我认为在马克思确认剩余价值这件事上使用发现一词很容易起误导作用。大家都承认，早在马克思以前剩余价值的事实就已是众所周知的，而我必须承认，仅就确认工人通过工资并未获得制成产品的市场价值与原材料价格加上工具磨损等等之间的全部差额这一情况而言，这一发现在我看来不是什么特殊的贡献。马克思著作的有关章节的重要意义在于对资本主义经济中剩余价值生产的方式和方法以及它们对社会发展所产生的后果的发现和深刻分析。我甚至认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中文第1版，第209页。

为，对于马克思的绝大部分有关研究的认识价值来说，人们是否在所有论点上都接受马克思推论出剩余价值的做法，是相当无关紧要的。你们并非不了解，今天有相当多的社会主义者根本不承认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的出发点：把价值折算为按时间计算的人的劳动量，而是赞同盎格鲁—撒克逊学派的边际效用价值学说。但是这些社会主义者仍旧承认工人今天是受到剥削而且必须生产剩余价值的，只不过他们是用另一种方式，即按他们的观点来说较少带有形而上学性质的方式提供证明的。^①当然，也有这样一些人，他们声称在证明剥削时考虑价值学说根本是错误的，他们认为无需任何价值理论就可以从关于生产的学说，从剩余产品推论出剥削。这方面的一个例子是巴里的安东尼奥·格拉齐阿代教授的值得重视的著作《资本主义生产》。

现在回到我们的主题。根据恩格斯，我们认为群众反对剩余价值的谴责是一个指示器，它表明另一些经济事实已使今天的，以剩余价值为基础的经济制度成为不能容忍和无法维持的了。这些事实是什么呢？

恩格斯在前引段落中声称，马克思是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必然的、在我们眼前趋向实现的崩溃当作他的共产主义要求的基础的。你们也许已很了解，一些时候以前在社会民主党从事理论工作的成员队伍里，曾就这一从崩溃推论出社会主义的观点进行了非常热烈的争论，而在统统都是来自马克思学派的人们中间表现出相当大的意见分歧。我不想在这里详细谈论我自己也参加的这些辩论，只提一下这个事实就够了：在他们中间，关于应当怎样理解这一崩溃存在着不止两种不同

① 对他们来说，剩余价值属于利息的范畴，或者说剩余价值的各种分支每次都构成利息这一集合概念的各种特殊形式中的一种，而这一集合概念包括所有来自财产、独占权、优惠地位等等的收入。显而易见的是，人们通过这种观察方式也能够在反对资本家和垄断者占有剩余价值的斗争中达到与根据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所能达到的完全同样的原则立场，而问题与其说是在于马克思的学说是正确的而哪一种学说是错误的——因为从根本上说它们不过是阐述同样一种基本思想的两种不同方式——不如说是在于其中哪一种具有更大的统一性和概念明确性这一优点。这个问题本身又是在社会发展的一个比较进步的阶段才对实践具有重要意义的。

意见，而如果你们认真地思考我刚刚念过的恩格斯的话，那么你们也会理解这一情况了。这句话里的“必然的”是什么意思？“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崩溃”是什么意思？人们可以从这句话想到一次不可避免的经济崩溃，一次大的经济灾难，但也可以想到以资本主义为基础的社会制度的一次大崩溃，还可以设想这些情况的各种各样的复合。其次，这一崩溃究竟有没有被证明是必然的？它是可以科学地证明的吗？或者说，它也许只不过是一个或多或少可能的假设？此外，社会主义是否会以科学的必然性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崩溃而来到？如果我们试图确认社会主义的科学性，这些问题都是我们必须回答的，或者必须清楚认识它们的影响的。全部历史经验和许多当前的现象都证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以前的各种生产方式完全一样，都不是永恒的，但这里涉及的问题是，它的结局是否将是一次崩溃，这次崩溃是否可望在较近的将来发生以及它是否会以必然性导致社会主义。对于这一或这些问题，社会主义者方面作出的回答是存在很大分歧的。

社会主义者据以推论出社会主义的证明的其他各种假说或演绎的情况也一样。我只想请你们想一下铁的经济工资规律的命运，拉萨尔当时是把这一规律当作他的鼓动的论据的。很少有一种经济学说像这一学说那样被人们以如此坚定、如此热烈的心情相信过。多年以来它曾是现代工人运动的习惯用语，是工人运动的最有本领、最忠诚的斗士由之汲取精神力量的信条。而忽然有一天，人们坚决地——我几乎要说是粗暴地——宣称，不存在这一“规律”，它的论证是非科学的，必须把它从我们的纲领中删除。根据我得到的消息——如果这是可靠的话——，当时一些勇敢的战士为了承认这一新的解释曾经进行了相当艰苦的内心斗争，但是情况就是这样。今天那一“规律”可以说是被否定了，但在我看来，这是矫枉过正了，再也没有人谈起它。请你们再允许我提到这一观点，即工人阶级的经济处境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必然愈来愈坏，工人将愈来愈贫困——这一观点被称为贫困化理论。这一观点一度曾得到广泛传播，看起来是有牢固的科学论据的——它

贯穿《共产党宣言》并且在年轻的一代社会主义者的许多著作中一再出现——今天它也被放弃了。还有工业和农业平等发展的观点，资本家阶级融合的观点，各种劳动的差别取消的观点——这是整整一张被认为科学上有效的理论单子，而这些理论都被证明为错误的了——不，我们不要夸大，它们只是都被证明为局部真理了。但是，局部真理对于科学性来说往往比完全的错误更加危险，因此我要说，人们鉴于社会主义代表人物面对社会现象的判断中发生的上述的和和其他的变化——恩格斯谈到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另一个基础即唯物主义历史观也经受了自己的命运——就会情不自禁地赞同关于社会主义在科学上破产的流言蜚语。当我们在实践的运动方面看到社会主义蒸蒸日上，社会主义政党在几乎所有的国家中取得接二连三的成就，工人运动赢得了一个又一个的阵地并且日益可靠地接近明确的、自己确定的目标，日益明确地表达自己的要求的时候，社会主义在科学的领域遇到的却似乎不是更大的统一性，而是理论上的分崩离析，社会主义的理论代表人物却不是信心十足，而是充满怀疑和精神涣散。如果我们看到一个方面并不妨碍另一个方面的话，那么就会十分自然地提出一个问题：在社会主义和科学之间究竟有没有内在的关系，科学的社会主义是否可能以及——我作为社会主义者要补充提出这一个问题：究竟是不是必须有一种科学的社会主义。

请你们不要以为这是第一次提出这个问题。在其他国家已有十分博学的人士在探讨这个问题，我自己也在若干年以前，尽管是用略为不同的词句，提出过这个问题。正如刚刚阐述的那样，这个问题恐怕也并不是表述得很恰当的。

请你们允许我在这里提起另外一个学科的一个例子。18世纪中叶哲学领域的思想非常混乱。思想家们似乎不再能互相理解。于是1781年哥尼斯堡的伊曼努尔·康德提出了他的纯粹理性批判，它的首要目的是达到对哲学有可能完成的任务的自我理解，告诫并指导人们认识理性哲学思考的局限。由于他的书的文体和章节安排有些晦涩，

不能立即被人们理解，1783年他以易懂的形式在一部短短的著作里阐述了它的主导思想，书名是《对任何将能作为科学出现的未来的形而上学的引论》。他在这本书里在作了必要的预先解释以后提出了两个问题，然后他以清晰的概念分析来一个接一个地对之作出回答。第一个问题是：形而上学究竟怎样才是可能的？第二个问题是：形而上学作为科学怎样才是可能的？^①我认为，伟大哲学家的这一做法对我们来说是一种指导，它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想达到对当前这个问题的令人满意的解答，我们应当怎么办。当然我们不需要盲目地按照与康德同样的形式提出问题，而是必须使问题适合我们要处理的对象的不同性质，但是我们必须按照与康德同样的批判精神提出问题，这种精神既坚决反对损害一切理论思维的怀疑主义，也反对一成不变的教条主义。

我们必须首先弄清楚，当我们谈到社会主义同科学的关系时，我们一般所说的社会主义应当是什么意思，然后再转到另一个问题：科学社会主义是可能的吗？它怎样才是可能的？

什么是社会主义？对于这个问题可以有各种不同的回答，但是，对于我们的探讨来说，只有那些同一种特定的社会制度的概念结合在一起的回答才是可以考虑的。这些回答可以分为两类。人们可以说，社会主义是关于一种特定的社会制度的观念、概念和学说。人们也可以把社会主义理解为争取一种特定的社会制度的运动。但是，无论是把它理解为状态、学说还是理解为运动，社会主义在这里总是同一种理想主义的因素联结在一起的，或者是这一理想本身，或者是朝着这样一种理想发展的运动。因此，它是一种彼岸的东西，当然，不是在我们所居

^① 康德对后一个问题的回答是人所共知的：形而上学恰恰只有作为对纯粹的——即在经验之前并且只有它才使经验成为可能的——理性的批判才有可能科学，我们今天把这种批判称为认识批判。“由此可见，批判，也仅仅只有批判，才包含全部经过认真检验的并且被证明为可靠的实行的计划，甚至全部实行的手段，而形而上学是通过这种实行才能成为科学的；它不可能通过其他的手段和途径成为科学”。尽管现代进化学说对康德的理性批判的个别部分作了纠正，但是他对理性批判的基本原则和重要意义所作的原则性论述仍旧是不可动摇的。

住的地球的彼岸，而是在我们能够确实感知的事物的彼岸。它是一种应当发生的东西，或者是朝着应当发生的东西前进的运动。这种看法甚至适用于保守的社会主义体系。但是我们在考察时不想涉及而且也可以不涉及这种社会主义体系，因为它只是错误地使用了社会主义的名称。如果我们希望避免一切概念混乱，那么我们最好不要把如此模糊不清的 *societas*（社会）的概念，而是把明确得多的 *socius*（同伙或合作制）的概念看成社会主义这个词的语源。一切事物都可能是社会的，如果把“社会的”（*gesellschaftlich*）这个词当作语源，那么一些跟目前的社会主义工人党所希望的根本不同并且不能相容的意图就有权利使用社会的（*social*）和社会主义的概念了。但是，这些党的要求是没有任何一个不适合“合作制的”这一概念的。我曾经从这一意义上把社会主义描述为走向合作制的运动^①，这里也要继续按这一意义来使用它。

当我们谈到科学社会主义时，这经常只能是指社会主义意图、社会主义要求的论据而言，指这些要求所根据的理论而言。社会主义运动作为群众现象固然构成这一理论力图理解和说明的对象，在一定情况下，理论还力图为运动辩护和对它进行教育。但是不言而喻，社会主义运动同德国农民战争、法国革命或者其他任何一种社会斗争一样，都不是科学的运动。作为科学的社会主义诉诸认识，作为运动的社会主义把利益作为自己的最主要的动机，不过必须强调指出，利益在这里不是理解为仅仅个人的或经济的自私利益。还有一种道德的（具有社会感的）、理想主义的利益。但是没有利益就没有社会行动。认识可以唤起或引起一种利益，但是只要它不同一种利益发生紧密的联系，不同一种利益融合在一起，它本身向外就是不活动的。另一方面，一种物质的或意识形态的利益固然能够推动认识，能够促进认识的传播，但是它总是只有在这种认识有助于它的目的或者至少不损害它的目的时才会自觉地、有意识地这样做。因此，在作为知识体现者的科学和任何一种政治

① 参见本书第 237—238 页。——编者注

的、经济的和思辨的利益之间始终可能存在一种对立。

二

现代社会主义被恩格斯描述为目前社会中有产者和无产者、资产者和雇佣工人之间存在的阶级斗争的产物。很清楚，它本身不可能是一种纯粹的科学认识的运动。阶级斗争是利益的斗争，任何利益都必须或多或少被明确地认识到，才会导致斗争，至于要把有产者和无产者之间最初仅仅偶然的、仅仅在某一地区和某一职业中发生的和围绕次要事情展开的斗争理解成普遍的历史性的阶级斗争，那甚至必须以一种对社会关系的相当进步的认识为前提。但是即使如此，阶级斗争始终是首先为实现一个阶级或政党的利益而进行的斗争，而不是认识原理的斗争，一般说来只有当认识原理同一个阶级或政党的利益一致时，它才是认识原理的斗争。此外，社会主义不仅是把工人们在各个时期在经济和政治领域内同有产者展开的斗争所围绕的各点简单地记录下来并且加以综合。作为学说它是这种斗争的理论，作为运动它使这一斗争集中到一个确定的目的上来，这个目的就是把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改造成按集体主义方式管理经济的社会制度。然而，这个目的不是仅仅由理论预先描述的、或多或少注定要发生的行动，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人们企求达到的一个目的，为了实现这个目的要进行斗争。然而，由于社会主义把这样一种未来图景当作目的，由于它在一定程度上使自己在目前的行动取决于对这一目的的考虑，社会主义就势必相应地包含着有一部分空想主义。我当然并不是想说它所追求的是不可能的或不现实的，我只是想以此来证明，它带有一种思辨的理想主义的因素，包含着有一部分科学上没有得到证实的东西或者科学上无法证实的东西。这里所涉及的科学，即社会学，不能像精密科学预先确定某种现象那样确切地预言社会主义力求达到的社会制度在任何情况下都将到来。它只能说明这种社会制度多半可能在什么条件下到来，并且近似地估计它

的可能性的程度。

社会主义中的不是绝对有把握可知的因素也绝对不能直截了当地被称为社会主义理论中的错误。正如甚至精密科学中的最严格的门类为了自身的发展也不能缺少假说一样，以社会进步为目标的应用社会学也不能不对未来可能的发展预先加以描绘。这样的预先描绘总是一定程度上的乌托邦。我已经说过，我在这里并不是把乌托邦当作与过分梦想的、飞越到不可能实现的领域的幻想同等意义的词使用的。当然，它也经常在这一意义上被人使用，但是如果仅仅这样理解，那么把这个词与罗伯特·欧文、圣西门、沙利·傅立叶这样的人、现代社会主义的这些先驱者联系起来就会是世界上最大的不公正。人们通常是把他们称为 19 世纪三位伟大的乌托邦主义者的。

恩格斯在我上面引用的著作中作出了伟大的贡献，捍卫了这三位社会主义者，驳斥了除恩格斯的敌手杜林以外还有一些人对他们所作的人云亦云的轻蔑批评。他为他们恢复了名誉，而事实上人们即使在今天也能够向那些“乌托邦主义者”学习。恰恰也有一种创造性幻想，即这样一种想象力，它依靠对现实力量和过程的敏锐洞察力的帮助，能够生机勃勃地想象，能够预先想到有重大意义的发现。

如果人们不是把现实主义者理解成狭隘的、只考虑当前生活、只注意身边最近事物的庸人，而是理解成那样的人，他们能够更加深刻地看到时代的问题的根本并且能够在探寻和研究决定人的行动的力量方面表现出更加敏锐的洞察力，那么欧文、圣西门和傅立叶就是他们时代的非常重要的现实主义者。在他们的理论和对实践的建议中有许多在我们今天被看成是极度天真的产物，是幻想，但对他们的时代来说，这些东西的天真和幻想的程度却小得多，而且是与他们在其中生活的条件和他们必须对付的各种力量完全适合的。例如，如果考虑一下欧文开展主要活动时期的英国工人阶级低下的思想和道德水平以及政党的性质，人们也就会理解为什么欧文避开政党政治和与它有关的政治活动并且号召一切阶级和政党的善意的成员参加社会改良工作。但是欧文

放弃政党政治决不意味着他在原则上放弃有利于工人阶级的政治改良和立法措施。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强调的，欧文是工人保护立法最早的和最热心的鼓动者之一，并且曾多次参加为工人现实要求而进行的鼓动和示威。

我们从罗伯特·欧文开始。他通过对他的时代的哲学学说的详尽研究，并且通过对工业中技术变革的社会影响的观察，形成了一种与唯物主义历史观非常相近的社会观。欧文孜孜不倦地宣传他的那句尽管不无夸大却基本上完全合理的话：人的性格是（外界）为他造成的，不是他自己造成的——这就是说，人在出生时由父母给予或者传下来的素质和他周围的环境决定人的性格和行为，而这句话也是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早在1815年，欧文就在他的一篇著作里阐明，工厂工业的扩展将在民族的整个社会生活方面引起多么深刻的变化。^①

欧文有关经济的建议统统都是从作为最进步经济形式的大工业的角度出发而提出的，他的组织集体主义公社——他称之为“和谐公社”——的计划立足于根据当时的技术水平所作的精确计算。我们今天由于这些计划无法实现它们所企求的目的而认为它们是乌托邦主义的，但它们对于它们的时代来说却是摆脱了幻想的乌托邦主义的一个进步。欧文始终努力遵循科学的认识，他的学生把他们所创办的教育学院命名为科学会堂。欧文对他当时的官方经济学的批评很少涉及具体问题，但是他的有才华的学生们汤普逊、勃雷、霍杰斯金等根据他与此有关的论述在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沙利·傅立叶也和欧文一样努力赋予他的社会改良以科学的基础。仅就他在提出他的世界哲学和描绘遥远未来的发展时而言，他是被一

^① 欧文在《论工业体系的影响》一文中说：“以往，立法者似乎只是从一种观点来看工业，也就是把它看成国家财富的一种来源。工业扩大后，任其自然发展时所产生的其他巨大后果，一直还没有引起任何立法当局的注意。但我们所谈到的政治和道德的后果，却很值得最伟大和最贤明的政治家竭尽心力地加以处理。工业分布在全国各地，使居民产生了一种新性格。”中译文见《欧文选集》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2版，第134—135页。——编者注

种毫无节制的幻想迷住了，这种幻想是和超出任何可以允许的假说范围的、真正的玩弄辩证概念的癖好结合在一起的；但是他毕竟用一系列非常富有成果的思想充实了历史科学和社会科学，这是他的功绩。（参看补遗三。）他的关于情欲和感情的学说证明他是人的心灵的敏锐的探索者；他提出使所有那些情欲都有可能为了整体的利益自由发挥的思想，他主张使劳动具有吸引力或者如此分配劳动、使各种劳动都由对之最感兴趣的人来承担的思想，这些都称得上具有永恒的价值。他的论家务——农业协作社的著作的批判部分是对他在其中生活的那一时代的法国经济状况的精辟揭示，而它的正面论述的部分阐述了建立把工业、农业和家庭经济联合起来的大协作社的建议，这些建议几乎是比欧文的“家庭移民区”更加按照大经济的经营方式设计的，傅立叶曾孜孜不倦地指出这种经营方式的优越性。

在圣西门那里很难找到可以按照缺乏可能性或非常缺乏可能性这一意义或者按照幻想的思辨这一意义而称之为乌托邦的那种思想。当然，他的幻想也使他脱离直接处于他面前的事物并且阐发只有在稍晚的时代才会实现或者才会具有现实意义的思想。但是他的幻想完全是以科学的研究和推论为根据的。他可以被称为现代社会学之父。他的学生和合作者奥古斯特·孔德后来有条理地阐述并且形成一个完整体系的学说，就其思想内容来说绝大部分是圣西门早已阐述过的。关于把作为科学的政治这一概念扩大到包括整个社会状况的要求是来自他的；关于社会关系即财产关系、生产制度和阶级形成构成各个时期国家制度的决定性基础的思想是来自他的；把人的精神发展阶段划分为神学的或形而上学的观点的时代和实证的即科学的观点的时代，并且指出在这些思维方式和当时的社会制度之间存在一种因果关系，这种想法也是来自他的；最后，是他和孔德把社会状况划分为批判的状况的时期和有机的状况的时期——后者是这样一个时期，那时的社会的基础和制度是一致的；前者是这样一个时期，那时作为社会制度基础的思想受到攻击并且丧失了凝聚力，那时新的阶级兴起了，对现存权力采取敌

对态度，直到矛盾发展到极端，旧的制度被推翻，一种新的制度建立起来，一种与社会生活的已经改变的基础充分适应的“新的宗教”得到传播，于是社会因此重新进入一个有机的状况阶段——“社会合题”的阶段。在圣西门那里，近代上升为社会决定性因素的阶级起初是作为实业家出现的，这一阶级与当时法国的状况相适应，还是被理解为把工业经营者和工人一起包括在内的——前者是工业的头领，“老板”。孔德和他所创立的实证主义学派坚持这一思想，但是真正的圣西门学派却明确指出实业家或生产者的概念是指工人，而圣西门主义者的激进一翼则很快又用无产者代替了工人。^①

圣西门企图创立新的基督教派的尝试与他的学说的科学性没有任何原则性矛盾。因为这种基督教不应当是教条的，而应当是一种感情宗教和理性宗教。孔德（他的创造天才不如他的老师，但是在有条理的思考方面胜过他，当然在孔德那里，这种思考有时又会退化成幼稚的学究气）在名称上也排除了它与旧的启示宗教的关系，把他的新宗教称为“人道的宗教”。据他说这样一来就可以消除科学思维和宗教感受之间的任何二元性。

现在如果我们把马克思主义学说与三位所谓乌托邦主义者的学说比较起来观察，那么我们会发现，后者的科学成分尽管比前者的科学成分有更加扎实的基础并且得到更加充分的阐述，但是后者和前者一样，并不全部都是科学。可供那种受倾向、受意志支配的幻想自由驰骋的领域受到更大的限制，也为它的方向作了更加明确的规定，但是这一领域并未因此就完全消失。恩格斯在前引著作中是这样说明二者的区别的。他分析说，欧文、傅立叶、圣西门由于他们面临的关系还不成熟，基本上还是社会主义体系的发明者，是企图从头脑中制造出完善的新

^① 与此相应，圣西门主义者早已在工人中进行活跃的宣传，其中包括在工业发达的里昂进行宣传。1831年11月那里的织工大起义几乎是在一次圣西门主义者的鼓动之后紧接着发生的，这一派的代表也参加了工人的委员会，建立工人合作社的最早尝试也是圣西门的门徒进行的。

社会秩序体系的思想家，而这种体系应当通过宣传和示范实验从外面强加给社会，但是根据马克思主义学说，社会变革的手段“不应当从头脑中发明出来，而应当通过头脑从生产的现成的物质事实中发现出来”。^①这句话说明了从最初提到的三位社会主义者以及他们的继续他们理论工作的学生发展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那条路线的方向，就这一限度而言，我认为它是说得非常恰当的。在这条发展路线上，发明和发现之间的比例关系实际上是日益偏向后者的。尽管如此，我认为这句话朝两方面说都包含一部分夸张。在朝向欧文、傅立叶、圣西门方面，它把发现与发明在他们学说中所占的地位对比说得过分不利于发现，但他们却也是更加重视发现的。对于现代社会主义这一方面，这句话宣布它摆脱了发明，但是我认为它既没有也不可能摆脱。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奠定基础的社会主义与欧文、圣西门、傅立叶的体系的区别在于前者对导致社会主义的力量和手段作出另一种评价。人们根本不需要长篇大论地说明为什么这种社会主义在这一点上和他们的体系相比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进步。但是它作为理论毕竟不纯粹是对这些力量的认识的科学，而是除了认识以外还有一定程度的发明，即使不是对手段本身的发明，毕竟也是对应用这种手段的形式和方法的发明。这里不是详细证明这一点的地方，我只能作为我的信念表示，马克思和上述他的先驱者们在这一方面的区别与其说是观点上的完全对立，不如说是程度的不同。^②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中文第1版，第741页。

② 关于欧文、傅立叶和（如果不是圣西门本人，至少是）圣西门的学生，人们可以像上面涉及欧文时也已经提到的那样说，他们之所以被人打上乌托邦主义者（按这一词的坏的意义来理解）的烙印，主要是由于他们的旨在导致他们所追求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手段不合适，是由于在他们那里在这一点上存在着目的或目标与手段之间的不相称。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对此作了论述。他同时为了替他们辩解作了中肯的分析，指出他们的手段的不成熟是由于他们当时的社会发展还不成熟的状态决定的。但他在《反杜林论》第4页上说，他们认为真理在什么时候和什么地方发现，真理由什么人来阐明，是不取决于历史发展的偶然事件，我对他的这一意见却不赞同。这种一概而论的说法会使人对他们的历史观产生一个错误印象。（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57—358页。——编者注）

但是让我们重新接过我们的话头继续谈下去。

我说过，社会主义作为战斗的运动不可能完全没有倾向地对待科学。这是由事物的本质决定的，因为它的首要目的不是实现科学的要求。但是在评判对于发展因素和发展规律的科学认识的价值时，它力求依靠科学来选择自己的手段和方法，根据科学来衡量自己当时的目的。这是在社会民主党内得到公认的原则。问题只在于，一个政治斗争的党的性质是否容许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容许社会主义具有理论上的客观性，这种客观性是真正科学性的先决条件。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是，这种客观性的程度取决于作为客观认识的科学同政党的纲领和理论之间的界限是否清楚。

英国政治家和哲学家培根在他的一篇著作中说，国家事务和科学之间的区别就在于，在科学中只有变动和运动才是合适的，而国家事务则要靠权威和威望。培根是专制君主制的辩护人，他所理解的权威的意思对于我们来说是不能适用的。而且在这里也不必去探讨，在这一点上对于各个时期的狭义的国家制度来说什么是合乎愿望的。但是如果按照实际的样子来看待事情，并且把国家事务这个词换成政党（在目前情况下政党完全属于广义的国家事务并且执行社会机体中的重要职能），^①那么培根的对比今天在原则上也是合适的。政党比现代国家更加具有权威性质——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它们捍卫它们力求实现的某些原则和要求，而为了能够以应有的毅力来捍卫这些原则和要求，它们在必要的时候必须要求自己的追随者毫无保留地为之献身。我完全承认这一点，尽管我认为，如果在这一方面使用像伊斯兰教所用的不可动摇这样的说法，或者像差不多 30 年前一家社会主义刊物所做的那样，要求它所捍卫的学说具有天主教教会赋予教皇的那种永无谬误的性质，那是过甚其词。我们早已不干这种事了。事情不在于信仰或良心上的强制，而只在于承认党的决议对于党员的政治态

^① 培根自己使用了包括国家和社会在内的“Civil Affairs（公民事务）”一词，正如当时还根本不存在区别于国家科学的社会科学一样。

度是有约束力的，在于党员应当维护被党宣布为基本的那些要求和原则，一个强大的党没有这两个条件是无法长久地存在下去的^①。在这一限度上说，必须承认每个党有某种不容异见的权利。但是正因为我认为这样的权利，我认为需要严格划分党和科学的领域。而这就首先要求我们对科学的理解取得一致。

如果我们严格地表达科学这一概念，那么，科学仅仅是经过系统整理的知识。知识就是对于事物的真正性质和联系的认识，而就各个时期的认识的状况来说，始终只有一种真理，所以在每一知识领域也始终只有一种科学。对于所谓精密科学来说，这是得到一致公认的。现在没有人会想到说自由主义的物理学、社会主义的数学、保守主义的化学等等。但是，关于人类的历史和人类的制度的科学是另一个样子吗？我不能同意这一点，我认为自由主义的、保守主义的或社会主义的社会科学是荒谬的说法。当人们遇到这样一类观点时，只要仔细考察一下总会发现：问题在于忽略或低估了科学地阐述的理论或学说同科学本身之间的差别，仅仅因为一种理论或学说的结构在形式上符合科学推理的要求就把它称为科学。但是只要一种学说体系的前提和目的包含着超出无倾向性认识之外的因素，那么科学的形式就还不能使它成为科学。而社会政治的理论恰恰通常是这样，社会政治的学说则始终是这样。^②

社会学说和政治学说同相应的科学的区别在于，恰恰在科学继续

① 不言而喻，这个准则在实践中可以作各种各样的解释。但是一个党如果不想堕落成宗派或者停留在一个宗派的立场上（因为政党常常是作为宗派开始的），就不会过分狭隘地使用“基本的”这一概念；一个党如果不想成为在大多数问题上具有不同观点的人的单纯的集合体，就不会把这一概念限制为纯粹的形式。Est modus in rebus（万物有尺度）——当我谈到政党的时候，我假定对于它的本质和正常的生存条件是意见一致的。

② 例如，一个从政治上保守的观点制定的社会学说可以成为一个经过周密思考、严格合乎逻辑地建立的学说体系，然而它并不因此就成为社会学科学，它同社会学科学的关系，就像素食食谱同味觉生理学和营养生理学的关系一样。这样说当然并不是对这类学说和食谱的存在判处死刑。

前进的地方，社会和政治学说却停下来了。它们服从一定的目的，而目的涉及的不是一种认识，而是一种愿望，即使这些学说在某些方面还有取得新的认识的余地，这些目的也使它们具有**已经完成的和持久不变的**性质。但是科学的社会学是永远不会完成的，因为它的对象社会是一个活生生的有机体，因为它对于这一有机体所遵循的规律还没有认识到最后的、终极的真理。不言而喻，各种科学也有它们的不可动摇的成就。不能把关于经常变动的原理理解成这样：似乎科学并不要求充分考虑所有已经确定的经验和认识原理，似乎科学容许在推理方式中有某种任意性。相反，科学在这一点上有着严格的精确性，因为它们的任务在于发现按照规律不可避免的东西。至于所考察的现象和事情的最终原因和所确定的发展的最终结果，科学是不知道的。科学不承认自己的学术体系的最后终结，而是允许经常用新的事实来加以补充和纠正。对于科学来说，除了认识的目的之外，不存在任何其他指导性的目的。^①

蒲鲁东无疑怀有赋予社会主义以一种科学基础的良好愿望，他按照这一意图在给马克思的信中（他在这封信中告诉了马克思他的著作的内容，马克思在著名的《哲学的贫困》一书中对这一著作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写道（我在这里比在会上更加详细地引用这一段话）：“让我们共同探讨社会生活的法则，探讨这些法则得到贯彻的方式，以及我们用来发现这些法则的方法，但是，在我们摧毁一切先验的教条体系之后，为了上帝的缘故，我们要防止我们自己向人民宣传教条主义。我们永远不认为一个问题是已经详尽无遗地解决了的，当我们用尽了我最

^① 一位发言人在会上提出反对意见（我在其他场合也遇见过这种反对意见），说不能同意这一点，因为譬如说医学无疑是一种科学，它的目的就是治疗。我过去和现在都要反驳这种反对意见。治疗是一种技术即实践医学的任务，它当然是以彻底掌握医学科学为前提的。但是医学科学本身的任务不是治疗，而是认识**治疗的条件和方法**。如果以这种概念上的差别作为样板，那么即使在更加复杂的场合也就可以容易地确定，科学到哪里为止，技术或学说从哪里开始。

后一个论据的时候，如有必要，请您让我们施展辩才和嘲笑重新从头开始。”^①

“我们永远不认为一个问题是可以已经详尽无遗地解决了的”——这对于社会主义来说确实是一个恰当的格言，如果社会主义能够并且愿意成为科学的话。社会主义不仅是并且不可能仅仅是科学，不是并且不可能是纯粹的科学，我认为我在前面已经证明了。表达这一概念的词就已经排除了这一点。没有一种主义是科学。我们用主义所表示的是观点、倾向以及思想或要求的体系，但不是科学。任何一种真正的科学的基石是经验，科学是建立在积累起来的知识之上的。而社会主义是关于一种未来的社会制度的学说，因此它的特征恰恰缺乏严格的科学证明。

但是尽管如此，在社会民主党所主张的社会主义和科学之间仍旧存在着密切的关系。社会主义愈来愈从科学的武库中汲取自己的论据。在所有的社会党派中，社会主义是最接近科学的，因为作为一个上升阶级的运动，它对现存事物的批评比任何其他政党或运动都更为自由，而批评的自由是科学认识的基本条件之一。社会是一个有生气的、不断发展的机体，一个对于这种进步——我们亲眼看见这种进步的方向——寄予期望最多的那个党或阶级自然也比任何其他党或阶级更为关心认识的进步。

仅仅因为对社会的联系的认识能保证社会民主党找到适于加速社会进步的手段以及避免阻挠或者延缓社会进步的手段，社会民主党或者社会主义就已经要关心这一进步了。社会主义固然像前面说过的那样始终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意志的事业，但它并不是随心所欲的事业。为了达到所企求的目的，它需要关于社会机体的力量和联系、关于社会生活中的原因和结果的科学作为指南。

科学社会主义的称号会使人错误地得出一种观念，似乎社会主义

^① 1846年5月17日的信。

作为一种理论希望或者应当成为纯粹的科学。这种看法不仅是错误的，而且它对于社会主义来说隐藏着一种不小的危险。因为它非常适合于使社会主义恰恰丧失科学判断的最主要条件之一，即科学的客观性。这样一来，现有的社会主义学说体系中的每一原理，就会按其已经取得的形式被看作是社会主义论证的链条中一个不可代替的环节，而正是因为社会主义力图在理论和实践之间保持联系，上述情况在一定条件下也可能给实践带来不利的影响。因此，与其使用科学社会主义的名称，我认为不如使用这样一个名称，它既充分表达这一思想，即认为社会主义是建立在科学认识的基础上并且承认这些科学认识是决定方向的因素，同时又排除这样的观念，即似乎社会主义提出或承认一种要求，认为自己仅仅是科学并且作为科学在某一时期内是完成了的。我认为，最适合这个双重需要的名称是批判的社会主义——按康德的科学批判主义的意义理解的批判。

当我说这些话的时候，我要立即补充一句，我决不是宁愿采取这一名称的唯一的社会主义者，也不企求做第一个提出这一名称的人。毋宁说，它应归于这样一个人，他同样属于马克思主义学派，然而在许多问题上持有与我不同的观点。我指的是罗马的安东尼奥·拉布里奥拉教授。早在1896年，拉布里奥拉在一本纪念《共产党宣言》的著作中声称，最适合于马克思主义的名称不是人们通常不假思索地使用的科学的共产主义这一称号，而是批判的共产主义这一名称。^①

不是由于一时兴起，也不是由于咬文嚼字，而正是出于使社会主义理论具有尽可能高度的科学性的愿望，才促使人们对“科学的”这一附加的称号表示反对。问题在于防止对科学和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作一种错误的解释。与此相反，科学社会主义这个名称对于我来说只有在

^① “批判的共产主义——这就是它的真正的名称，再没有比这更适合这一学说的名称了”（《纪念〈共产党宣言〉。关于唯物史观的探讨》第1卷，1896年罗马意大利文版）。拉布里奥拉的哲学著作表明，他作为哲学家与其说是康德主义者，不如说是黑格尔主义者。

其中“科学的”这一概念正是按批判的意义被理解为要求和纲领时才保持它的充分理由，这个要求是社会主义向自己提出的，它表明，科学的方法和认识对于它的愿望具有指示方向的力量。

科学是没有倾向的，它作为对于实际事物的认识不属于任何党或阶级。与此相反，社会主义是一种倾向，它作为一个为新事物而斗争的党的学说不能仅仅把自己束缚于已经确定的事物上。但是，因为它所追求的目的同对现代社会的动力的科学考察所表明的社会发展是方向一致的，所以社会主义学说能够比任何别的学说更加满足科学性的要求，社会主义的党，即社会民主党，能够比任何其他政党更加使自己的目的和要求同与之有关的科学的学说和要求一致起来。我可以把我的思想概括为这样一句话：科学社会主义在多大程度上是必需的，也就是说人们可以合理地向一个想要创造崭新事物的运动的学说要求多大程度的科学社会主义，它也就在多大程度上是可能的。

补 遗 一

我在这里引用上面提到的格拉齐阿代著作中的几段话：

“但那时通过稍微认真的检验就不难理解，即使剩余劳动的理论有牢固的根据，仍旧存在着一种剩余价值。如果利润的来源即剩余劳动存在，那么剩余劳动的后果即利润正是由之产生的产品也存在。古典社会主义的价值理论的失效不能使一件并不取决于这一理论的事实消失……”

“简而言之，我们看到我们必须加以探讨的现象是按如下的逻辑顺序依次排列的：首先是劳动，其中一部分成为剩余劳动，这是为马克思的批判所承认的；然后是产品，其中以剩余劳动为来源的部分构成利润；最后产品终于转化为价值，而没有付出费用而取得的那一部分产品则转化为剩余劳动。由此可见，价值在这三个事实中是最肤浅的，最大程度地派生的。它在一个既定的历史时刻是产品的一个社会特性，但

是它要以产品为前提。如果相信利润起源的问题即构成利润的产品的起源的问题与价值问题相重合，那么这就与在化学中认为可以用简单化合物所产生的衍生物来解释前者的观点一样了……”（《资本主义生产》第6和7页）。

“面对（反社会主义经济学家针对劳动价值理论的）这一十分巧妙的攻击，多数马克思主义者暴露了一种确实令人难以相信的鼠目寸光，不过这对于伟大导师的所有门徒来说却是十分自然的。他们不是接受他们的敌人的论证中的正确内容，即对他们的价值理论的反驳，并且与此同时证明自己的学说的基本真理（正因为是基本的）是不取决于这一或那一理论的，他们却死死抱住‘aut sint ut sunt aut non sint’^①这样的学术态度不放，而由于他们以变本加厉的狂热对他们学说的错误部分也加以维护，这就进一步证实了敌人恰恰据以攻击他们的那种价值理论的所谓的重要意义。”（《资本主义生产》第245页）

这里不是详细论述格拉齐阿代理论本身的地方。我在这里涉及的一个论点——价值理论对于证明剩余劳动是无关紧要的——与格拉齐阿代持同样的观点，这可以从与格拉齐阿代的著作同时出版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的如下几句话看出来：

“一个民族从事生产活动的那一部分人的剩余劳动是一件经验的、可以根据经验证明的事实，不需要任何演绎的证明。马克思的价值理论是否正确，对于剩余劳动的证明是完全无关紧要的。这一理论在这一方面不是论证命题，而只是分析和例解的手段。”^②

弗里德里希·戈特尔在他1897年出版的著作《价值思想》（耶拿费舍出版社出版）中对国民经济学的全部迄今的价值理论（他称之为“所谓的价值学说”）发动了激烈的正面攻击。他举出了一个打击面有些

① 拉丁文，意为“本来是什么样子，就应当是什么样子，否则就不能存在下去”。——编者注

② 参看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本书第180页。——编者注

宽，但读起来很有趣的证据：价值——作为单个对象——是一个形而上学的一先验的观念，它掩盖着一个还有待批判地揭示的教条。这本十分机智的论著有些地方读起来像是讽刺作品。作者是一个爱开玩笑的人。

顺便说一下，本书第 62—63 页上称之为局部真理的所有原理的情况都像价值学说的情况一样。这些原理是以真正的事实为根据的，但表述得不准确，对它们的解释也有所夸大。既然可以确认存在这种情况，那么不言而喻，丧失效力的仅仅是公式或对公式的解释，而不是事实本身。

我在那次集会上曾在演讲的有关之处用一句解释性的插话强调指出这一点，因此也在这里作了补充。

补 遗 二

这一演讲的听众中有些人把合作制这一用语理解成是指社会主义实现的形式，而实际上——我希望本文的读者会毫无困难地看出来——它在这里只是表明社会主义所涉及的权利原则即民主。socius 是权利平等的同伙。

我在紧接着瓦格纳教授的一点意见之后进行的辩论中曾特别强调并且补充说，在涉及合作制组织问题时，我决不是把社会分解成完全自由的合作社这一思想的信奉者。我认为所谓的强制性合作机构，即国家和市镇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仍有重要的任务。在它们和自由的合作社之间如何分配社会任务，这在任何给定的时刻都是取决于发展和被认识到的合适性的事；关于有多少经济工作会留给个人去自由进行，情况也是这样。

我之所以着重指出这一点，是因为 5 月 20 日的《星期一世界报》上一篇关于我的演讲的文章认为我似乎首先想要自由的合作社，只是附带地同意国家和市镇保留一些社会职能。这完全不是我的观点。上述

文章根本不是我的演讲的报道，而是一篇十分片面的概述，贯穿着该报编辑自己的个人思考，对这些思考我是一无所知的。

补 遗 三

傅立叶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过程的表格证明他对历史发展的条件具有很高的洞察力。他把将接着“文明”（他把先进国家已经达到的发展阶段称为这样的时期）以后来到的社会状况称为“保障时期”，这已从这一期间实际发展所采取的进程明显地得到证实。全部现代社会改良，包括自愿的和公共的，表现为一个针对一切可能的意外事故和对生存的伤害提供保障——保险——的体系。如果说傅立叶把他那个时代仍旧普遍承认为天堂般的人类原始状态（伊甸园时期）称为“幸福的阴影”，那么他在这样做时表明自己是一个高度现实主义的心理学家。他对未来发展的往往十分狂热的描绘，如果经过认真的观察，可以看出是一种与现代发展理论非常接近的自然观和世界观的产物。

欧文曾对机械的自然科学作了许多研究，他按照这种科学的精神夸大了他关于人的性格取决于自己的环境的学说。他谈到自己时说当他还是一个年青人的时候，他在曼彻斯特与约翰·道尔顿（他后来作为化学中原子理论的奠基者而获得了世界声誉）是亲密的朋友，并曾和他以及另外几个朋友举行定期聚会，争论哲学和科学问题。那时道尔顿已阐发了他的原子论的基本思想，获得了理性机器的绰号，因为他把人称为单纯的机器，认为人是由自然界和社会教育成理性机器的。此后不久，道尔顿在曼彻斯特的文学和哲学协会宣称世界是一个大实验室，人是纯粹由各种化合物装配而成的东西，因此他后来获得了这样的头衔：想要以化学方式制造人的哲学家。

这种激进的原子论观点也在欧文的社会学说中起了作用。当他一再作出能够通过适当手段赋予人以“随便哪一种性格”的保证时，他忽视或者低估了有机原则的重要意义。在这一方面，傅立叶比欧文强，虽

然他是从一种物理原则——牛顿的重力学说出发。在傅立叶那里，已经更加强发展，而不是创造。他不想塑造人本身，而是想通过适当的组织使人的爱好和感情能和谐地发展和发挥作用。他基本上是富有审美感的，欧文则是纯粹功利主义的。

补 遗 四

科学性排除推论方式中的任何随意性，任何一种科学的任务都是要探明它的研究领域各种现象中的合乎规律的必然性，这一事实导致的结论是：科学社会主义这一概念假定存在着对社会主义的合乎规律的必然性的严格符合逻辑的证明，或者要求提出这种证明。问题也就是因此一再提出的。社会主义者声称，社会主义的内在必然性的证据已由科学社会主义提供了；谁否认这一点，也就以此推翻了科学社会主义。

通过本文 76 页^①以下的论述可以看出我认为这种证据并没有提出，而且是既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提出的。不过由于我仅限于说明概念，而正像一切对概念的说明一样，它很容易被人作出夸大的解释，因此我在这里要作如下的补充：

首先必须着重指出，这整个问题只涉及界限的确定。社会主义本身是一个有多种解释的概念，对内在必然性这一概念也可以这样说。有些人主张，社会主义有可能而且必须被证明为是一种内在的经济必然性。但是可以很容易地证明，这样的一种要求或开端恰恰从科学观点来讲是站不住脚的，因为经济学不能证明处于它的领域彼岸的任何事物，但社会主义从来不会完全彻底地融入经济学。如果与此相反，人们根据这一认识把内在必然性解释成社会的或普遍历史的必然性，那么这恰恰使彻底的科学证明成为不可能的了，因为那时必须加以考虑

① 相当于本书第 387 页。——编者注

的主观因素是不允许任何强制性证明公式的。人不是任何自动装置。无论如何，不依靠先验的演绎的帮助是不可能提出社会主义内在必然性的证据的，因此要求为这一必然性提供在科学上彻底的证据，恰恰从科学性的观点看来是不合理的或应加以谴责的。

于是有人声称，如果情况是这样，那么社会主义学说就不包含或者不再包含任何会使人不得不加入社会主义政党的内容了。但这一看法本身又是对事物的一种完全先验性观点。首先，甚至关于我们人类大家总有一天一定要死的认识也不会迫使人在他的最后时刻到来之前就躺到他的垂危卧榻上去。其次，人们提出怀疑的只是为社会主义的内在必然性提供彻底科学的证据的可能性，而不是这一事实本身的可能性或盖然性。不如说，社会发展的那些可以接受科学检验的因素就其整体来说完全明确无误地指出现代社会正以不断加强的劲头朝社会主义发展。由此可见，问题基本上在于：在这里，以对社会主义机构更加公正和更有实效的深刻认识为根据的意志决定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能起一种自我创造的作用。从目的的角度看来被认为对社会进步必不可少的东西作为一种历史内在必然性的一部分只具有或多或少的盖然性，但是使人不得不参加社会主义政党的道义强制力并不因此丧失。相反，由于意识到实现被认为公正的和有实效的事物的关键很大程度上在于我们的意愿和行为，而不仅在于由历史强行决定的必然性，这种强制却加强了。

在实践中，关键从来也不是在于一般来说只能举出的社会主义内在必然性的证据，——具体的证据总是只能为某些社会主义措施的必要性提供的——，而是在于一种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合乎愿望性和可能性的证据。社会主义的鼓动迄今总是以提供这种证明为目的，它依靠这种证据获得吸引力，却只是十分间接地触及我们现在谈的概念界定问题。

补 遗 五

各国社会主义政党的历史中都有关于错误的理论原理对社会民主党的实践起有害影响的例子。对于早期社会主义理论来说，这也已得到普遍承认，但现代社会主义的历史并没有摆脱这种情况。例如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当时就曾谴责北美和英国的社会主义者，说他们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一种宗派教条，而在几年以前——1897年考茨基还指责英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巴克斯鼓吹“乌托邦马克思主义”。

我只限于作这一概括性提示。我在这次演讲中，由于考虑到它的听众的情况，在涉及目前社会民主党内仍起较大作用的争论时仅限于作简短介绍，却不表示任何态度。与此同样，我在这条补遗中也只限于纯粹原则性的论述。

这里要避免两个极端：无原则的、粗糙经验主义的试验和宗派性的教条主义。任何理论都不会提供不出差错的手段来反对实践中的过失，我们只能谈论排除由于缺乏理论认识或根据错误理论而产生的那些失误。这种排除是尽可能地通过把理论理解为生动活泼的、不断处于发展过程中的科学的对象而做到的。因此社会主义的纲领的理论部分，即应当表述科学认识的部分决不能过分详细。因为人们不能每年都制定新的纲领，但实际运动却从来不会停顿，认识也在前进，所以如果纲领的理论部分太详细，就总是会产生一方面在纲领与实践之间，另一方面在纲领与已经达到的认识之间的内在矛盾。前一个矛盾会导致破坏性摩擦，后一个矛盾会导致无原则的怀疑主义。因此这里阐述的问题，尽管起初只是一个概念界定的问题，但间接地也是一个具有实际意义的问题。从《星期—世界报》的文章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把科学社会主义概念限制在这里阐述的意义上，就会使工人对社会主义的科学性丧失信仰。这一结论是完全错误的。相反，通过这样的概念限定——人们在这里也可以采用受人欢迎的说法，即划分得清清楚楚

——恰恰会使那些已丧失这一信仰的人有可能恢复信仰，并且赋予它以比过去更加坚实的基础。

译自《科学社会主义怎样才是可能的？》1901年柏林德文版。殷叙彝、周家碧译。（部分译文已发表在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编译《德国社会民主党关于伯恩斯坦问题的争论》三联书店1981年版，第361—369页）

关于政治性的群众罢工的十二项原则

1. 德国政局，特别是在德国起领导作用的邦普鲁士政局的发展，迫切需要重新检验人民阶层用来保卫受到威胁的权利和争取长期没有取得的权利的斗争手段。继 1896 年在萨克森的选举权被剥夺之后，在汉堡和吕贝克的选举权也被剥夺，在德国中部和南部选举权状况恶化的威胁亦随之产生，而在普鲁士，陈腐不堪的、比过去更阻挠社会经济发展的三级选举制却被巩固地保存下来，所有这些和那些迹象都证明：帝国宪法中的一点民主，即议会普选权，在德国只是奄奄一息了。

2. 但工人阶级在自己的社会解放斗争中却不能缺少普选权的手段。因此，他们必须全力以赴，在这种权利受到威胁的地方去维护这种权利，在没有这种权利的地方去争取这种权利。

3. 直到一个世代之前，人民群众保卫自己权利的最后手段乃是街垒战斗。这种手段已经由于现代城市建筑和现今炮火技术而失去效用了。

4. 可是，罢工的意义却随着那种把大量的技术雇佣工人集中在城市和工业区的现代经济生活的发展而不断增长。现在每一次大罢工都已经是一个政治事件。正如所发生的那样，只要成千上万以至成十万的工人放下工作，就会感动如此广泛的居民阶层，致使舆论界不得不探究罢工及其原因。根据罢工所波及的经济部门的性质，例如，人数众多的运输工人参加罢工，则这种影响更能扩大。

5. 因此，罢工也成为政治斗争中可以利用的一种武器。罢工已经从各方面证明是这样一种武器。它在工人阶级表明意志而又不陷入虎口方面，是最有力的。

6. 诚然，政治罢工不是绝对无误的、随时可以任意使用的武器。它首先只是在广大群众参加的情况下才是有效的。根据其他邦的经验来看，例如在普鲁士，如果不是先在首都就已经有几十万工人参加罢工，罢工就不会有多大效果。

7. 但是，如此广大的群众只是在极为激动的情况下才可能共同举行罢工。因此，禁止在任何时候把政治性的群众罢工的思想当做儿戏来使用。轻率地举行政治罢工应该看做就像以往轻率地举行街垒暴动一样，这就是说，这种发动应该当做无谓的生存牺牲加以抛弃。

8. 其次，通过小规模政治罢工的反复试验“培养”总政治罢工这种思想是完全错误的。不成功的试验不是起培养作用，而是会把人们吓退。

9. 关于似乎通过一次巨大的群众罢工就可以把整个现今经济制度变革为社会主义的或共产主义的制度这种思想，也应该抛弃。这种思想的基础是对这种变革的前提完全无知，这种思想只会引导人们在现有条件下采取最荒谬的措施。

10. 在大城市里，如果群众不上街，就未必能举行政治性的群众罢工。另一方面，群众上街会大大加深自己的影响，从而大大提高自己的作用力量。但是，必须注意到：装备很差或装备不足的群众与训练有素、装备精良和行动一致的力量所进行的每一个斗争，都可能给前者带来失败和士气沮丧的后果。因此，必须力求不发生这样的冲突，而是使罢工尽可能保持一种非暴力的示威的性质。

11. 坚定不移的广大群众不会因挑衅而盲目行动，也不怕逮捕等迫害，他们的抵抗力是非凡的。群众罢工的目的不是打倒敌人，而是使他们因疲于奔命而让步。

12. 为了取得成果，政治性的群众罢工不仅要求有极其大量的群

· 伯恩斯坦文选 ·

众参加，而且要求把这些群众的精力集中在完全确定了的一定目标上。不确定的一般化的意图本身蕴藏着失败的幼芽。目标愈一致，愈明确，进攻点愈是限制在一定范围内，成功的可能性就愈大。

译自《政治性群众罢工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政治状况》1905年布累斯劳德文版第39—40页。史集译

社会民主党内的修正主义

前 言

我现在交给广大读者的这篇演讲是 1909 年 4 月 4 日我在阿姆斯特丹手工业者协会礼堂的一次集会上作的。集会是阿姆斯特丹大学生社会研究会同阿姆斯特丹大学生联合会法学会共同召集的。但是听众并不纯粹是大学生，除了大学生和大学毕业生以外，还有很多荷兰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的成员参加了集会。

这次是根据演讲的速记记录印刷成书的。我审阅和修饰了记录的文字，但在内容上未作任何更改。我没有完全删掉直接的演讲称呼，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用了非人称的句型来代替它们。为了尽量严格地保证读者看到演讲的客观性，我认为这样做是必要的。根据同一理由，我将记录中有关听众对演讲的某些地方的反应和他们在结束时的情绪的夹注删去了。为了一目了然，还分成了若干小节。

在附录中，读者可以重新读到 1909 年 3 月底我在柏林市郊夏洛腾堡社会民主党选民协会上所作的关于修正主义和社会民主党纲领的演讲的提纲，它表明用我所主张的修正主义观点来论证社会民主党的纲领是完全充分的。换句话说，德国社会民主党爱尔福特纲领理论部分中我所反对的那几点，不仅经受不住科学的检验，而且从鼓动的角度来

看也是没有必要的。

爱·伯恩斯坦

1909年4月中旬于柏林市郊什恩柏尔克

一、修正主义的名称的由来

主席先生在他的友好的致词里提到了社会民主党内马克思主义者同修正主义者之间的对立。我认为，这种把两者对立起来的提法是不完全妥当的，在演讲中我将有机会对此作我认为必要的纠正。但是，我首先想从你们都知道的那一情况谈起：很久以来，在各个国家里的社会民主党内，事实上出现了被称为修正主义的或者修正主义者的派别和分子。我故意说被称为，因为当事人决不是，至少决不是原来就自己把这个名称加在自己身上的。

修正主义者的名称是强加的、第三者编造的、并非自由选择的名称。不过我们时常在历史上看到这样产生的名称得到采用的例子。熟悉伟大人民党派和人民运动历史的人也会知道，恰好是这些强加于人的名称往往立刻被那些有关的党派——有的是出于赌气，有的是认为名称无关紧要——接受，当作它们的运动的称号而被他们自己使用起来。用不着说古代的党派了，中世纪意大利改革党的情况就是这样，它被它的反对者称作帕塔勒纳尔，意即捡破烂人的党^①。宗教改革时期也一样：新教徒这一名称原来也是个绰号。在尼德兰的历史上同样有出名的乞丐^②这一别号的例子。在英国大革命的时候，举足轻重的教友派的名称起初是用来骂人的。就连英国历史上的辉格和托利两大政党的命名也是如此。托利本来是强盗的意思，辉格就是酸牛奶^③。这

① 我国历史教科书上译为破衫党。——编者注

② 16世纪尼德兰反对西班牙统治的贵族革命派的别号。——编者注

③ 根据另一种看法，辉格一名是从 whiggamore= 赶马人转来的。

两个党派起初用这些名字互相辱骂，但是后来它们却心平气和地接受了对方给自己的称号，就这样叫了下来。当然修正主义这一名称还不像“酸牛奶”那样糟糕。在近代法国共和运动中，我们看到机会主义者这一名称起初是用来辱骂甘必大领导的共和党人的。1881年至1882年间法国社会民主党发生分裂的时候，有一派被另一派轻蔑地称为可能派，他们后来也泰然承受了这个被认为是骂人的名字。在美利坚合众国曾经有过并且现在还有这样的政治家，他们起初被反对者称为 **Mügwumps**（印第安人的酋长），后来就幽默地用来自称。总之，这些名称都是根据某种表面现象加上去的，后来人们就普遍承认了。

那么，社会主义的“修正主义者”是哪些人，他们想干些什么呢？这个词儿还很新鲜。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第一次使用修正主义者这一名称大约才有七八年的光景，而且是同一个此后从德国社会民主运动中消失了的人当时发表的一本书相联系的。这本书是阿尔弗雷德·诺西希博士的《社会主义的修正》，它虽然有些在我看来是相当好的细节部分，却遭到了所有社会民主党人，其中也有现在被称作修正主义者的人的拒绝。如前所述，诺西希博士从此以后退出了党，但是修正主义者的名称留下来了。后来它就被不加选择地用来称呼所有对社会民主党的传统理论进行批评的社会主义者，其中也有我自己。

但是从对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或者它的解释进行批评的意义上来说，修正主义这一概念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年代还要老些。早在1895年布累斯劳举行的党代表大会上，一位代表——1902年去世的富有才能的布鲁诺·什恩朗克博士指出：“在党内进行着一场思想方式的修正。”他当时是指农业问题而言，而且要求党的态度同农业关系的已经改变了的发展情况相适应。然而，此后他就放弃了修正这回事。我不知道他怎么又离开了他已经走上的道路。

在这期间，从1896年到1897年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正式的科学杂志《新时代》上，以《社会主义问题》为总标题发表了 my 几篇文章，它们对社会民主党内流传的一整套观点进行了批评。随后，1898年春天

我又发表了一篇文章反对关于一场预期的震动整个现代社会并使之崩溃的巨大经济灾变的理论。在这篇文章中，我针对灾变论的一位辩护者（他当时指责卡·考茨基和我在我们的文章中从来没有提过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顺便说了这样的话：“人们通常所称的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对我说来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①我补充说，我把运动理解为既是重大的、一般的社会发展，也是工人阶级特有的运动。这句话由于某种原因被德国资产阶级、尤其是自由资产阶级的党派抓住了，而当时新成立的民族社会主义党尤其认为可以利用它来反对社会民主党。但是我的文章在党内却遭到了一些人的尖锐批评，他们要求下一届党代表大会对此表示态度。这就是1898年秋天在斯图加特召开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为了回答那些攻击，我给大会寄去了一份书面声明。后来我将这篇声明刊载在一本后面还要谈到的书里，我在其中相当清楚地阐述了我对主要的争论点的看法。为了不使这次讲演拖得太长，我不想在这里宣读那份声明了，我只是要指出，那时我写下的一切至今仍是我的信仰。那份声明在斯图加特遭到了一些反对。代表大会结束以后，当时的一些朋友敦促我将我的观点系统地写成一本书。于是《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就问世了。它是10年以前出版的，到现在已印过8版，而且被译成了各种文字。在这本书的序言中刊载了上述给斯图加特党代表大会的书面声明。在一定限度以内，可以认为这本书是在德国被称作修正主义者的社会主义派别的基本著作之一。在这个派别的其他重要著作中，我的同志爱德华·大卫博士的、在我看来是出类拔萃的著作《社会主义和农业》可算是最有价值的。

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中泰然接受修正主义者名称的还有：约瑟夫·布洛赫博士，《社会主义月刊》的编辑；阿道夫·冯·艾里姆，一位从工人阶级中涌现出来的异常活跃的人物，曾长期担任国会议员，但最近一次落

① 这句话和作者在《新时代》上的文章中的原话在文字上略有不同。——编者注

选了；埃德蒙德·费舍，也是来自工人阶级，迄今担任国会议员；保尔·康普夫迈耶尔，现任慕尼黑邮报的编辑，是一位有成就的作家；保尔·勒贝，布累斯劳的一位编辑；亨利希·波伊斯，德绍的一位编辑；罗伯特·施密特，编辑和国会议员，德国工人联合会全国执行书记；其他还有许多人。

我在这里列举的这些人的主张是什么呢？他们有一个确定的纲领吗？到目前为止还不是如此。如果对他们的观点作进一步的研究，甚至可以发现他们之间在理论和实践方面的许多问题上有意见分歧。我想举一个实践方面的例子来说明：有些修正主义者——我已经提到布洛赫博士，我还可以举出第二个十分勤奋和干练的人：理查·卡尔韦尔——认为目前德国在贸易政策方面没有某种保护关税是过不去的，而大卫和我以及其他人的意见是：现代工人阶级必须毫无条件地维护各民族间自由贸易的原则，而且必须设法通过其他道路克服因为取消保护关税可能引起的困难。诸如此类的意见分歧目前在修正主义者中间还有不少。然而仅仅这一点决不能说明这一派别不行。谁只要追溯一下政党的历史，就会碰到这样的事实，即凡是由爱好批评的人组成的党派，也就是把批评放在首要地位的党派，要死守一定的条文是十分困难的。因此，修正主义在许多方面并不一致这一事实，也不能被用来证明这一运动是不高明的。

但是，有人会问：这些人之间至少该有一点是一致的吧。他们必须有一点是共同的吧，那么这一点是什么呢？这就使我想起我们可敬的主席关于马克思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所说的话来，似乎可以说：马克思主义的信奉者是一方，修正主义者是另一方。这种看法甚至流传很广，但是我不能承认它正确。因为如果它是中肯的话，就要以一个修正主义者必须是一个反马克思主义者作为前提才行。然而我不知道有任何修正主义者可以安得上这一称号。

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

反马克思主义者起初只是马克思理论的反对者的另外一种说法。

但是，什么是马克思理论的基础，什么是它的基本思想呢？区别马克思学说和马克思以前的社会主义者的学说的基本观点是什么呢？这就是，它对于发展思想、对于演变概念的比较根本性的实现，领会得比马克思以前以及和马克思同时的其他任何一个社会主义者都更为透彻和深刻。马克思以前的社会主义者大都是空想主义者，或多或少是一些异想天开的人，总而言之是善于空想的人。他们在观念中描绘出一个比当前社会美好的社会。他们是一些将一个想象中的最完美的社会当作目的并且试图为此去奋斗的人。要不就是一些改良主义者，他们抓住任何一种看来是有机可乘的、广泛的社会改良，把它置于首要的地位，但是对于现存的社会缺乏深刻的基本的分析，他们不能把这种改良直接从已有的需要中推导出来，他们没有问一下：改良同社会的整个发展进程，同社会已有的存在条件和各种力量是否相适应？与此相反，马克思所维护的观点是，现代社会是一个发展着的有机体，既不能任意地加以改变，也不能任意地使它僵化，这个社会宁可说有自己的完全独特的发展规律。——这些规律是一切想对这个有机体进行改良的人必须仔细研究的。在马克思的前期著作中已经说出了这一伟大的思想，但是马克思在1895年发表的以《政治经济学批判》为题的一书的序言中才对它作了最系统的概括。同一年，达尔文的第一本关于有机自然界进化理论的巨著也出版了，人们完全有理由将这两本著作相提并论。人们可以将它们在同一年出版这件事看作一种巧合，但是它们之产生在同一历史时代和同一时期，这决不会是巧合。它们的基本思想表现了同样的精神。

达尔文的书阐发了这样的思想：不能把生物的变化归因于创世主随心所欲的干涉，而是必须根据这些生物的生存条件来说明其原因。如同达尔文详述了植物和动物的新的形态和品种的起源一样，马克思阐明了人类各个社会发展的历史。当然这两者的发展条件在主要方面并不相同，因为无论是植物界还是动物界的发展，整个说来是不自觉的和无目的的，而人类却随着时间的推移将意识到自己的发展条件，也将

日益更多地自觉到斗争目的。然而，甚至这种自觉性也不能帮助人们摆脱所有的约束。按照马克思的理论，它还不能使社会的发展成为随心所欲的事情。人类在发展过程中依旧受到自己的生存条件的制约。换句话说：归根到底，经济即生活资料生产的方式方法（我要加一句话：因为自然界本身是最重要的经济部门）和生活资料生产的自然条件构成人类社会变化的历史中的最终决定性的因素。这种思想，虽然从前，即在马克思以前，已经有人发表过，却没有马克思所给予的那种严密的形式。马克思的功绩首先在于：他作为社会发展的理论家追溯到人类劳动手段的历史，把社会发展还原为生产工具——这一“人类器官的延长”的发展。

生产工具决定劳动的形态和生产率，并且通过劳动决定文明的水平。人们向自然夺取什么，人们如何耕耘土地，如何对农产品和地下矿藏进一步加工，从而使一定的空间里能有比从前更多的人生活，所有这一切最终都要取决于当时人们所掌握的工具的性质。生产关系决定人类的交往、人类的定居方式、统治关系和人类社会内部的阶级形成，而生产、定居、交往和统治的发展又影响道德的判断。在生存条件发生重大改变的时候，道德判断也随之改变，法权概念和司法机构同样要随之改变，因为产生了对于法权的不同的要求。同样，如果社会的经济基础改变了，政治制度也必须改变。这一切都在马克思的理论中得到了阐明。如果由于工具的改变，社会内部形成了新的生产方式，如果社会结构随着发生了变化，如果（起初是不自觉地）出现了新的阶级，后来它们变得强大起来而且带着日益增长的要求显露了头角，那么总要来到一个时刻，从那时起向前迈进的、新的阶级反对旧的、特权的、有产的和实行统治的阶级的斗争将变成一场夺取统治权的斗争。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这样的一部时时刻刻反复进行的、而且不断采取新形式的阶级斗争的历史。这就是马克思理论的基本思想。

人们可能对此作了片面的解释。人们可能夸大了技术经济因素的决定力量；人们可能忘记了人类具有思维的头脑，忘记了思想和意识形

态、道德和法权概念在一定程度上有着自己独特的发展，它们对于文化发展，甚至生产发展都是具有部分决定性的要素。人们可能十分片面地理解生产方式的概念，极其夸大了经济因素的影响。同样，人们可能从另一方面将马克思的历史观冲淡得黯然无色，把决定力量过多地归之于思想意识，过少地归之于经济因素。必须承认有这一切情况；然而这是，或者可能是一些错误和解释上的分歧，对它们进行反驳并不触及理论的核心思想。我确实认为，没有一个社会民主党人，而且没有任何一个多少比较重要的社会科学理论家不是在原则上接受了那一核心思想的。假若不是这样的话，那么过错不在于这些人而在于这个理论。一种具有内在真理的理论将超越党派斗争之上以不可阻挡之势得到实现。而这里就是这种情况。尽管思想还有自己的如此强有力的生命过程，但一般的法权等等观点的根源最终还是在于经济关系、社会状态和构成社会的阶级的性质，这在今天的科学界中几乎是老生常谈了。为了说明这种情况在政治上表现到什么程度，不妨从历史中，即从英国大革命的历史中举出一个小例子。

英国大革命时期有过一个著名的激进民主派，它的代表被自己的反对者称作平等派，意即革命家，平均主义者。事实上这一派中除了单纯的民主主义者和激进派之外也有共产主义者。平等派在革命高潮中制订了一个他们称做人民公约（agreement of the people）的宪法草案。他们在其中说明要废除当时的一切阶级特权，他们要求平等的选举权——但是加了一个附注：“为了一切不处于雇佣关系中的人。”如果当时曾有人用平等派自己的话对它的一个成员说：这种保留是不民主的，那么他就会十分惊奇而且不会同意这种非难。因为，到底是哪些人因此被剥夺了选举权呢？当时为工资而劳动的人的情况如何呢？对于英国革命的基础来说，最突出的一点就是，虽然革命按照惯例把社会的一切阶级一个接一个地推到了最前列，我们在这次革命的历史记载里却没有看到工人阶级的出场。我们固然看到了伦敦学徒的骚动，却没有看到工人的骚动或者其他举动：为工资劳动的社会阶层由于当时的社会

结构，在英国还处于十分不重要的地位，还没有发展起来。手工业工人在学会了他的行业之后很快就成为独立的工匠。对于他来说，雇佣工人的地位仅仅是一个过渡阶段，考虑到7年学徒的规定，雇佣工人阶段在每一个工人生命中大都只是很短的时期。因此，他并没有把他的师傅看成阶级敌人。从社会角度来说，他是一个半成年人，在师傅那里住宿和吃饭，在政治上追随他的师傅，组织上属于他。当时的政治家根本不会产生给予像这种工人的人们以选举权的想法，工人自己也不想要选举权，而且他们根本不会理解这种要求。当时和后来在其他一些国家里也有过这种情形。只要雇佣工人的状态对于手工业中的绝大多数已经满师的工人来说还是过渡状态的话，雇佣劳动者就不会构成真正意义上的阶级，因此他们也不会提出任何自己的政治要求。

三、修正主义和马克思的发展学说

在17世纪，当时的社会结构产生了一定的政治观点，这些观点是那一时代最激进的政治家也不能在思想上忽视的；同样，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产生了另一些社会观点，即使没有任何理论家，甚至没有任何宣传者，这些观点迟早必然会到处发展起来。资本主义的发展产生了工人阶级，所谓工人阶级就是说，只要你一旦成了雇佣工人，那么你一生都是雇佣工人。这就是说，这是一个由并非暂时而是长期在经济上依赖他人的雇佣工人形成的阶级，然而他们并不因此就像中世纪、中世纪后期和资本主义前夜的手工业帮工那样算是未成年的公民，而是必须以雇佣工人的身份结婚，以雇佣工人的身份建立家庭，从而也必须以雇佣工人的身份享有和维护对于国家和社会的广泛权利。过去的手工业帮工对于种种捐税有什么可关心的呢？这些捐税很少直接地，大多只是间接地通过他们的师傅同他们发生关系。现在的工人既然是一家之主，一切贸易政策和税收政策就都直接同他发生关系了；现在一切使生活费用昂贵的东西都使他处境困难，因此他对一切国家大事的利害感

就完全不同了，他必然会感到需要有人代表他参加制定法律，需要保持对立法和行政机关的影响。

这样，即使完全撇开暂时的经济冲突不谈，在工人和他们的已经成为资本家的师傅之间也自然会产生阶级对抗。工人们将会认识他们和主人之间的比较深刻的社会差别，他们的工资斗争具有了社会性质。这种情况在中世纪和中世纪后期的工资斗争中是没有的。当时的工资斗争大多只是为了零用钱之类的斗争，而不是为了生存条件的斗争。但是帮工的斗争通常完全不是围绕工资进行的。我们所知道的德国中世纪手工业帮工的一次最大的斗争即阿尔萨斯区柯耳马的面包帮工持续 10 年之久的斗争，是围绕着帮工在宗教节日仪仗队中应占据什么位置这一问题进行的。在今天的许多人看来这是可笑的，然而对中世纪的帮工说来，仪仗队中的位置不是没有意义的，而是相当重要的问题。我们不要忘记，当时的天主教在人民生活中起多么大的作用；仪仗队中的位置所反映的是有关社会地位的事情，但是这只涉及行业，不涉及阶级。

决定现代工人斗争的却是一些完全不同的因素。现在，为了工资、工作时间和工作权利的斗争是各种职业的工人运动的特征，并且正如现代生产把工厂和作坊中一切类型的工人团结起来一样，利害一致的感情也渗透了整个工人阶级。中世纪和中世纪后期的工人运动首先是个人的或分散的运动，或者一般的被压迫人民起义的一部分，现在则成了作为阶级的工人的运动，这一运动涉及终身雇佣工人的实际要求，他们对国家的权利要求，他们在商品的生产、交换和分配中的经济要求和希望被承认为成年人的社会要求。鉴于这一事实，卡尔·马克思及其合作者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才可以就近代工人斗争的伟大社会目的发表这样的思想：社会主义的手段和目的一定不能是发明出来的，一定应当是发现出来的，这就是说，要在这一伟大的日益发展的工人阶级的物质和权利要求中去发现，它们已经初步存在于这一阶级的实际发展的条件中了。一旦做到了这一点，他们就为社会主义意向提供比过去所能

想象出来的随便哪一种基础更为牢固得多的基础。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是由此把社会主义从架空幻想的领域拉到社会生活实际情况的坚实土地上来的（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他们比任何一个先驱者都更大程度地把社会主义理论从思辨的演绎法的范围转移到现实的归纳法的范围。

然而在当时的许多社会主义者看来，这是对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很大的限制。尤其是空想社会主义者，或者说他们的某种程度上正统的门徒（因为欧文、傅立叶、圣西门这时已经去世了），即那些创造了整套的社会体系、创造了异常美妙和完善的纸上社会的体系制造者们，以及自称为真正社会主义者的德国思辨哲学社会主义者们，认为马克思的学说极大程度地削弱了社会主义。卡尔·格律恩（一个真正社会主义者）有时甚至认为，要求把君主制国家变成立宪制国家是对社会主义的叛变。社会主义还深深地陷在空想主义之中，以至天才的德国工人社会主义者威廉·魏特林竟异想天开，认为必须招募囚犯来争取实现社会主义的目的。一切具有这种和类似想法的人必然认为，马克思的理论贬低了通过空想获得的伟大思想，就算还没有把它抛弃的话。在其他地方也有这种表现。不久前，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普列汉诺夫在柏林《前进报》的纪念专号上写道，那些在 80 年代的俄国按照我在这里简单描写过的方式说明马克思学说的人，受到了民粹派和有空想倾向的社会革命党人的攻击，被说成资本主义的助手或志愿仆从，因为他们像马克思也已做过的那样，强调资本主义发展对于工人阶级发展的必要性。但是当时在俄国发生过的情况，还曾在许多地方出现。其中有一件事还是很典型的。当我发表上述有关最终目的的那句话时，同一个普列汉诺夫非常激烈地攻击了我，然而他并没有能逃脱被俄国革命者称为“俄国的伯恩施坦”的命运。把在这里阐明的那一马克思学说转化成实践，在许多社会主义者看来，就是放弃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这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有道理的，因为按照我的看法，马克思的理论事实上已在原则上推翻了关于最终目的的观点。对于一种以发展思想为基础的社会

学说，不可能有什么最终目的，它认为人类社会是不断处于发展过程中的。根据这个学说，可以有大的方针路线和目标，但不能有最终目的。即使人们能够称为暂时的最终目的的事情，也不应当从头脑里先验地虚构出来，而必须是从运动的实际斗争本身出发形成起来的。

人们当然会发现，在马克思的著作中也指出过未来的图景。这主要是 1847 年已经写成的《共产党宣言》的结尾。那里宣称，工人阶级在夺取政权以后，将改变整个现存社会并且建立一个合作性质的新社会。然而这只是描述了一个很笼统的轮廓，而且同工人阶级按照其生活条件必然形成并且在实质上也已形成的社会意识是十分适合的，因而人们不能把它说成是纯粹的空想。人们完全可以用这种方法预言未来，也就是可以说：明显的发展趋势指出了事物的这种或那种未来面貌。这固然也只是推论，但并非以空想为基础，而是有事实根据的。尽管《共产党宣言》在一些细节上表现出很高的天才，尽管它已阐述了马克思社会理论中的许多问题，但它毕竟不能算是表现马克思所达到的完满的思想高峰的作品。不如说，马克思在英国（当时它是经济发展程度最高的国家）进行了研究以后所写的著作才属于这一范畴。《政治经济学批判》是这一类著作的第一部导言，巨著《资本论》（它有一部分是上述著作的改写）则是它们的高峰。在《资本论》序言中我们看到两条原理，马克思在其中特别尖锐地强调了有机的发展思想。第一条是：

“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①

显然，这一原理又一次包含了对社会主义革命思想的重要限制或者（假如愿意用这样的说法的话）削弱。它的意思是，工人阶级以及任何一个其他阶级都不能专横地按照自己的兴趣、自己的幻想或者随便哪一个现成公式来改造社会。要想使重大的社会改革成为可能，社会

^① 《资本论》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9—10 页。黑体是伯恩斯坦用的。——编者注

的全部生活条件就必须改变，必须达到一定的发展成熟程度。

我想引用的第二条原理同第一条一样，也是 1866 年写成的，它这样说：“现在的社会不是坚实的结晶体，而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有机体。”^①社会主义变革的概念在这里同样有着十分确定的界限。

任何修正主义者现在都承认马克思的这两条原理。的确，我乐于承认，修正主义者也许比马克思本人更加重视它们的意义和效力，并且无论如何比一些属于马克思学派但是在修正主义者看来形成了狭隘的马克思主义正统派的人更为重视，这些人认为马克思根据一定的历史前提提出的原理有着持久的教条的力量，而不是承认它只有相对的意义。在我们看来，以考茨基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统派不懂得，如果实际发展同毕竟只是由理论预示的发展不相符合（这种情况是屡次发生的），那么以最初的假定为根据而得出的公式也必须改变。他们不主张这样，而是僵死地并且徒劳无益地抓住这些公式，并且企图用种种手段来维护它们，这些手段纯粹是在解释上玩花样，同真正的科学理论是完全不相称的。可以说，许多这类马克思主义者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的一个宗派，因为他们逐渐回到《共产党宣言》的那些已经被马克思本人纠正的原理和思想，宁可依据《宣言》，而不愿依据马克思在发展最高峰时所写的著作。

四、马克思主义和大工业的发展

《共产党宣言》有一个几乎可说是有机的错误，这是马克思也承认的，因此后来他根据事实自己作了纠正，恩格斯明确地承认了这一点。它的错误在于远为过高地估计了现代社会发展的速度和片面性。马克思流亡时的多年同志威廉·李卜克内西有时曾公开说过这一点，并且在

^① 《资本论》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0—13 页。黑体是伯恩施坦用的。——编者注

私下对我谈过关于马克思在当时如何过高估计发展过程的有趣细节，但是对于马克思热烈的、革命的、生气勃勃的精神本质说来这是很可理解的。我们也不应忘记，当马克思写《宣言》的时候，他还没有到过英国，他只是从远方了解当时英国工人的巨大斗争运动，这个运动有时确实好像要以强大的原始力量推翻整个不列颠世界帝国。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纠正了许多他早先的假设。但是，在那里我们也可以发现，他对资本主义意义上的发展速度仍旧作了过高的估计和片面的评价。因此，从马克思写作时依据的那些假设得出来的整整一系列结论固然是正确的，但另一些就是不正确或者不再是正确的了。资产阶级经济制度的发展所费的时间比马克思及其拥护者当时所假定的要长得得多，它表明这一社会形态有着比他们所假定的更为巨大的扩展和改进的能力。因为发展延续得更为长久，资产阶级经济即自由交换经济的范围扩展得远为广阔，这一经济形态现在就完全不可避免地会创造出新的组织形式来，而马克思是不可能完全预料到这些形式的细节和充分估计它们的意义的。我们举一个事实作为例子，马克思虽然正确地预见了这个事实，却没有完全正确地估计到它的影响，而且没有超人的手段也是不可能精确地估计到的，这就是：资本主义所引起的世界交通的巨大扩展，海外国家不仅被卷入了世界贸易——这在从前就已经有了——而且被卷入了我们通常在欧洲也开采或制造的商品的生产和交换。与此相连的商品生产的巨大增长，只是在《资本论》已经写成、马克思已经从发达程度差得多的经济交流中得出他的结论并作出了一整套推论（其中一部分现在已过时了）以后，才开始急剧地发展起来。

我自己的祖国——德国的一些数字可以说明，今天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是何等巨大，世界贸易得到了何等蓬勃的发展。1880年德国对外贸易的价值不到60亿马克，1907年却已达到180亿马克；也就是说，这项贸易的价值增加了两倍，同时人口只增加了大约40%。对外贸易中的出口部分主要是德国工业品的输出。德国工业中的一些最大的工厂和企业简直可说是超出了简单的国有化的范围。它们不仅供

应本国，而且供应世界市场。在我们德国，有些工业有多至 2/3 的产品输往国外，只有不到一半的产品在德国本国销售。马克思逝世后四年，即在 1887 年，德国的铁路同国外的货物运输总计 1889 万吨，18 年后，即在 1905 年，达到 4360 万吨。德国港口的海轮运输在 1883 年（以进口和出口的商船所载货物计）是 1551 万吨，在 1905 年达到 3833 万吨。

电力工业即电机制造、电灯厂和发电厂的建立和开工——这一完全现代的工业（马克思只知道它的萌芽状态）的图景提供了一个例子，表明已经发展了怎样的世界市场关系和为此形成了怎样的全新形式。德国这一工业最大的公司之一是柏林通用电力公司。它在 1907 年共有股本 1 亿马克，这按照交易所的行情相当于 2.2 亿马克；此外还有债权资本 3700 万马克以及 4700 万马克的储备金，由此可见，如果不管交易所的行情，它共有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 18400 万马克。但是，它的资本力量还不限于此。这个通用电力公司在柏林电厂公司有股份，后者供应柏林绝大部分的电力并拥有共计 11400 万马克的资本，而其行情价格也是很高的。此外，它通过控制股票的方式实际操纵了它所开办的电力企业银行。这个银行设在苏黎世，因为在那里可以付较少的捐税并逃避一些讨厌的监督。银行贷款给全世界那些向柏林通用电力公司购置机器等等的电力企业，并通过占有股票而加入了 20 个左右的其他企业。其次，通用电力公司还有一个分公司——供电公司，此外，这个公司同美国最大的电力公司 General Electric Company（通用电力公司）订有互惠契约——人们也不妨选用一个包含较多恶意的名称来称呼这种契约。这两个实力雄厚的公司可以说把世界当作它们的国外市场瓜分了：“你们拿这半个地球，我们拿另外的半个”。这一来他们在征讨掠夺时就通行无阻了。柏林通用电力公司后来又在它的活动范围内同德国一个仅次于它的大电力公司即那个把大发明家威纳尔·西门子的名字放在首位、现在却由商人们在那里占据首位的西门子与哈耳斯克公司建立了卡特尔关系。这个公司拥有 9300 万马克资本并同拥有 11000 万马克资本的南德意志的西门子—舒克尔特公司有密切的联系。西门

子联合公司的另一个附属企业有 1500 万马克资本，它还控制了一个它所创立的电业银行，为它进行某些金融活动。最近这两个大联合公司悄悄地同仅次于它们的一些德国大电力公司缔结了关于在公开投标时采取一致行动的契约。这些公司中最重要的是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费尔登—古依劳麦和拉迈尔公司，它的名义资本是 8000 万马克，但还要加上附属于这一公司的一系列工厂的资本。德国庞大的垄断公司现在就以这种方式难解难分地阴谋勾结起来，以便尽可能使不仅德国的、而且世界其余大部分地区的全部电力工业屈从于自己。我们的大钢铁厂同这一现代工业的情况完全一样，它们联合成世界著名的钢铁联合公司，在纺织工业、造纸工业和印刷工业等等中也有联合公司，它们全都不仅为国内市场而且为世界市场进行活动，它们的网络远远超出了国界。于是，工人们的工作就落入了从前没有预料到的对于世界市场的从属地位。

总之，最近的发展创造了马克思还不知道而且还不能知道的工业和经济交流的组织形式。当马克思写作的时候，拥有 1000 至 2000 工人的企业已经算是异常巨大的企业了，而现在却有 2 万、3 万、甚至 4 万工人的企业。观察一下这一事实在先进工业的工人的思想领域中得到怎样的反映，会是十分有趣的。我们德国的官方企业统计把企业分为小型、中型和大型企业。它称 5 人以内的企业为小型企业，从 6 人到 50 人的企业为中型企业，超过 50 人的企业为大型企业。这是官方统计。现在看一看工人的算法。7 年前，即 1902 年，柏林的冶金工人自己进行了关于柏林的工资和工作时间比例的统计。在这印成书发表的调查中同样可以找到小型、中型和大型企业的区分。但是工人把 100 人以内的一切企业还都算作小型企业！他们的中型企业有 101 到 500 人，从 500 人以上开始才被他们算成大型企业！这一情况以几乎是滑稽的方式在我出席的一次冶金工人会议上表现出来。这次会议在听了演讲以后讨论了各个车间的情况，一位工人在会上发言，描述某一企业中发生的事件。他做出了一种表示蔑视的姿态说：“你们可以想象得

到，这是怎样的一家厂子，那里只有 100 个工人干活。”一个拥有 100 个工人的厂子的老板有时可以是百万富翁，但是在工人的眼里，“只有 100 个工人的”厂子在冶金工业中的地位并不比从前的一家小杂货铺大多少。

事情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1850 年，工业中几乎只使用 30 匹马力以下的机器，而现在大工业中采用了高达 3 万匹马力的机器。此外，现在还使用电来促进物质的转化，这就是创立了崭新的生产部门的电化学。虽然马克思没有能够事先描绘这一切，但是它们毕竟在原则上没有离开马克思的发展图式的直线，因而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派乐于引用它们来证明理论的正确性。但是，就其对于经济关系、工人阶级斗争的条件以及社会变革的可能性和形式的反作用而言，它们毕竟有马克思所没有估计到的意义。

能够对世界工业实行国有化吗？这将意味着什么呢？现代国家能够把那些大部分搞投机营业的工厂接收下来吗？——这些工厂用自己的产品和输出能力到世界市场上进行竞争，在争取销路和订货的斗争中全都发展了现代竞争的优点。如果国家既不愿意也不能够这样做，难道我们可以听凭那些在现代国民经济中占据如此重要地位的企业——这些企业雇用了整批的工人大军，人民福利的很大部分取决于它们的繁荣——难道我们可以听凭它们（由于国家不能立即把它们接收下来）在一个社会大灾变中遭到毁灭吗？这也是不可能的！必须采用根本不同的手段和方法，逐渐把它们纳入比较严格的社会监督之下，这种社会监督只有渐次地才能做到完全控制它们。俄国工业中心的工人已经在一次真正的革命运动中深切地领会这一点。

如此声势浩大而又充满希望地在 1905 年爆发的俄国革命——关于这次革命我们无论如何可以这样说：它当时所争得的成果根本不可能完全消灭，不管沙皇反动势力多么暴虐，至少有一部分是保存下来了——这次俄国革命曾经有一个时候在俄国的大工业中心哈尔科夫、罗斯托夫、莫斯科、彼得堡、华沙，特别是在罗兹（俄国的曼彻斯特）使工人

成为工业中的统治力量。沙皇政权被打倒了；官吏和警察的全部威权动摇了；警察甚至向工厂主说：你们去想法怎样对付这些工人吧，我们是无能为力的了！在罗兹的一些有 7000 到 8000 工人的工厂中，工人们一下子就仿佛成了主人。老板们逃到国外，把营业交给代理人或经理去维持。这些人有的被工人枪杀了；他们如果想逃命，只有干脆屈从工人的条件。但是这仅是比较短的一个时期。在这种情况下，这样一个时刻必然会来到，那时从前的工厂主会对工人宣布：“你们替我们维持工厂吧！我们经营不下去了，现在我们已经不在乎了”。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考茨基在荷兰就革命后的前景所作的演讲中发挥了这个思想：工厂主自愿放弃工厂将是工人阶级革命的第一个结果，工厂主将会像上面描述的那样说：“好吧，把工厂拿去吧！但是让我们安静！”是的，这是非常可能的，而且我承认，用这种方式进行剥夺将是廉价的。只是问题在于：工人是否应当或者是否能够把国家不能接收的工厂自己接收下来并顺利地继续经营呢？根据我们迄今所见到的一切，我们不得不作出这样的结论：工厂的工人既不愿意也不可能把工厂接收下来。如此廉价剥夺的工厂在一次革命中将是一场空欢喜。俄国工人的统治到处都是以这样的时刻结束的，那时工人反过来对工厂主说：我们想通了，现在你们还是主人，我们俯首听从你们的指挥。^①工人的工业专政简直从来没有实现过。经济生活有着一些单凭人的愿望不能超越的生命规律。

五、马克思主义和社会结构

我在这里阐述的并不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而是一些符合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思想的结论，虽然马克思本人并没有得出这些结论。一

^① 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切列万宁在《无产阶级和俄国革命》（斯图加特狄茨出版社版）一书中很慎重地提出了这个问题，但对于细心的读者这种慎重却会产生更为深刻的印象。不过就连他也没有对于经济方面给以充分的估计。

个社会的制度和习俗是建立在几千年之久的发展的基础上的，人们不能够从今天到明天一下子就改变它，使它按照另外的方向去发展。这特别是因为资本主义没有产生人们对它期待已久的后果：使社会的结构和机体简单化，普遍建立简单的关系。不，社会变得更加复杂化了，阶级结构变得更加多面了，它的分枝越来越广泛了。工商业中的小企业没有被消灭，只是被超过了，它们的性质和经济地位改变了。当然它们曾经整批整批地消失，被大企业消灭或吞并。但是资本主义本身又产生出新的小企业来代替它们。为了不停留于抽象的概念，我举一个例子。旧式黑白铁作坊这种工业在现代资本主义化的国家中几乎已经完全绝迹。黑白铁匠今天不再做锅、盆等等，这些东西今天是在工厂中制造的，他至多只是贩卖它们。旧的黑白铁作坊不得不放弃它的很大一部分工作。但是在从前的黑白铁匠的位置上，今天我们看到的是大、中、小的电器设备装配匠。一门具有别种形式的小企业的工业在大工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了！类似的情况我们还可以在许多工业部门中看到。

农业中的小经营则更为顽强地保持下来。在农业中，小经营和中等经营已经证明它们的抵抗能力和生产能力远远超过社会民主党过去在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的影响下所作的假定。马克思也曾预言农业中的小经营的毁灭，因为在他进行经济研究的时候，在英国这个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国家里，农业实际上大部分已在大地产的掌握之中。但是这种大地产是人为地造成并且通过英国法律的特点和英国的其他特殊条件维持下来的。此外也丝毫不容置辩的是：特别是当时在英国广大平原地区还占很大分量的谷物种植业保证了大经营对小经营的巨大优越性。

我还要作进一步的论述，因为我不想为了随便一种先入之见的理论闭上眼睛不顾事实。我力图认识真理。只要我确信，我提出的任何一个反对正统马克思主义者的原理与事实不符或者不再相符，我就会立刻放弃它。因此我还要承认另外一点，我认为可以相信，甚至在小经

营表现得最顽强的畜牧业中，合理的大经营所使用的人力的生产率是较高的。因此单纯从数学观点来看，这种大经营表明自己是优越的。但是还要考虑另外一个在现实世界中起着很大作用，因而不容忽视的因素，即劳动中的心理因素。让我们举一个大畜牧场为例。在这里，别的时候不说，还必须在晚上对牲畜加以照料，必须根据情况在晚上做清扫工作、喂水和饲料，无论如何必须照顾牲畜。在大经营中，这些工作是由一个雇佣工人即雇工来做的。对他来说，这种工作是劳动，他把它看作并且算作劳动，本是完全正确和合乎逻辑的事情，因为他做这种工作不是为了自己，这里没有他自己的利益。现在我们来了解一下有牲畜的小农或中农的小庄园。晚上他也要再到自己的厩里去一次，去照料牲畜，但是他不再把这算作劳动，对他来说，这只是往往使他感到某种愉快的活动，因为这是他的牲畜，是他饲养和照料的。对他来说，他在这方面的不可否认的体力支出通过心理因素得到了补偿或者至少是大大减少了。这就是所有国家的畜牧业中的小经营能够顽强地抵挡住大经营、甚至从大经营那里夺得地盘的原因之一。

1907年6月12日德国的行业和企业调查（其结果现在已由统计机关公布）证明，普鲁士农业中的中小农户增加了10%以上，德国其他地区的农户的数字增加得更多，并且这不仅是指户数，而且也指种植面积。确实，中小农户的种植面积比这类农户的数目增长得还要多，而大经营的户数和种植面积却减少了。^①但是工业的积聚（这是没有人能够

① 这里是官方统计中的有关数字：

	1895年	1907年	增加或减少%
极小经营（0.5公顷以下）·····	1 238 190	1 352 845	9.26
零细经营（0.5—2公顷以下）·····	809 923	748 132	-7.63
小经营（2—5公顷以下）·····	522 780	520 914	-0.36
中等经营（5—20公顷以下）·····	528 729	583 160	10.29
富农经营（20—100公顷以下）·····	188 114	175 976	-6.45
大农场（100公顷以上）·····	20 390	19 117	-6.24
	3 308 125	3 400 144	2.78

否认的，连最顽固的保守派也不否认，因为事实太明显了），甚至工业的积聚也没有产生使社会的阶级结构简单化的后果。它没有减少资本家阶级的人数，不，它反而使他们的人数大为增加了。因为站在前面谈到的巨大工厂后面的不是一个超级资本家，不是一营或几营以大小股东形式出现的财产共有者，不是一个团或几个团，而是整个整个的军团。

我在好几篇文章中已经提醒人们注意这一事实，并且指出，美国非常有名的、确实吞并了几百个工厂的钢铁托拉斯，有将近5万个股东。我曾经说过，在这里还要再说一遍：英国21个最大的细纱棉纺厂10年前联合成一个细纱棉纺托拉斯，固然在这一工业部门引起了相当巨大的积聚，但是并没有减少资本家的数目，因为这个托拉斯大约拥有4500个大小不同的股东。在工业中到处都发生着同样的过程，非个人的所有制形式逐步增加了。就是在那些最初是由一个人创办的企业

从此看来，在这些集团中，只有极小的（工人份地等等）和中等经营的集团增加了——后者恰巧是小农和中农经营的集团。一个较详细的分类表（和上表同样也是在1909年3月3日普鲁士王家统计局的统计通讯中发表的）进一步说明：在中等经营集团的两个相邻的集团中，接近中等经营的阶层得到了最有利的发展。虽然整个小经营集团减少了，它的上层（4—5公顷）却增加了4.98%。富农经营集团一共减少了6.45%，其中的拥有50—100公顷土地的阶层减少了11.87%（从31252减少到27542），而拥有20—50公顷的接近于中等农民经营的阶层却只减少了4.31%（从155439减少到143949）。就种植面积说，中等集团的变动如下：

经营	全部种植面积（1000公顷）		
	1895年	1907年	增加或减少%
4—5公顷以下	448	475	5.91
5—10公顷以下	1947	2233	14.70
10—20公顷以下	2797	3144	12.43
20—50公顷以下	4553	4497	-1.25

由此可见，在这些集团的任何一个当中，每一经营的平均种植面积都增加了。即使不应当忽视，这种结果一部分是普鲁士的向东部各省移民的政策——为了使德国农民移人受到波兰人威胁的各州而对大地产进行分割——和波兰人的对抗行动（他们同样也尽可能建立了农民庄园）所致，但是这一数字仍然响亮地驳斥了“农民经营的消灭”的理论。

关于畜牧业中的小农经营和大经营的生产力的比较，阿尔都尔·舒耳茨博士（他本人是一个实践的农业家）在《社会主义月刊》中报告了一些十分值得注意的事实（见《畜牧业的大经营和小经营》一文，《社会主义月刊》，1909年第7期）。

中，就是在那些企业中，所有权也是一代比一代更加分散，最初是在创业人的家庭内部分割，但是以后随着企业的不断扩大，也把股份转让给外人。为了替一种比股份公司更为严密的集体所有制找到适当的形式，人们终于在德国和其他地方发展了有限公司这种机构。伦敦《泰晤士报》的历史是说明个别企业的所有者的数目随着企业的发展而增加的一个典型例子。这个有名的企业是在 25 年前由一个名叫约翰·瓦尔特的人在伦敦创办的，以后由他的后代和杰出的管理人员继承，股权越分越多，《泰晤士报》就这样 1/32 地、1/64 地以至于 1/120 地从一手转到了另一手，直到前几年报纸成为一个有限公司的财产为止。许多大企业的发展是与此相似的。前面提到的西门子和哈耳斯克电力企业最初属于两个人，一个是有名的技师威纳尔·西门子，一个是有经商才能的机械师哈耳斯克。以后，由于西门子的几个儿子加入企业，财产所有者的范围扩大了，也有其他的人入股了，单纯的合资公司变成了合资有限公司。但是，随着企业的成长，即使这种所有制形式也嫌太窄了，现在它成了股份公司，股东即财产所有者没有几千也有几百。

任何地方也没有一份关于股东的详细统计。但是股东阶级的增加表现在收入和财产的统计中。收入的统计不是表明高收入和中等收入的人数的减少，而是表明它们的增加，而且它们的增长显著地超过人口的增长。在我的著作《社会主义的前提》（据我所知，它也译成了荷兰文）里，为了说明这一事实，我从普鲁士的收入统计中引用了几个数字。这些数字遭到了非难，因为它们是以两种不同的估税办法为依据的，也就是从两个税则略有不同的时期引用来的。但是这在当时是不可避免的，如果要想不完全忽视较近时期，或者要对过于相近的年代（因为彼此过于相近，很难表现出明显的变动情况）加以比较的话。然而，在一定限度内我接受这一批评：不能把那种对比看成绝对的，它的证明价值是有附带条件的。今天我们谈到这个问题时就能够有更大的把握了。

普鲁士在 1891 年实行了最后一次的大规模所得税改革，即所谓米

凯尔^①捐税改革，在这一次改革的基础上于 1892 年第一次提高了所得税。1906 年这一税则略有变动，并且从 1908 年起在估税办法中表现出来。如果我们拿米凯尔税则在变动以前的有效时期的第一年和最后一年即 1892 年和 1907 年的数字来看，那么我们会发现，在这一时期内，普鲁士的收入较低即每年在 3000 到 6000 马克之间的资产阶级的人数从 204714 增加到 369046，也就是说增加了 80.37%，年收入在 6000 马克以上的资产阶级的人数从 112175 增加到 190445，也就是说增加了 69.5%，而人口在同一时期只增加了 25.3%。我还可以进一步举出数字和举出收入更高的阶级的各个集团的变动情况，这将表明，每一集团中的增长都大大超过人口的增长^②。资本家人数是在增多而不是在减

① 约翰内斯·冯·米凯尔 (Johannes von Miquel, 1828—1901)，德国资产阶级政治家，1890 年至 1891 年间担任普鲁士邦财政部长。——编者注

② 为了不使听众厌烦，在讲演时不可能宣读过多的数字，在这里不妨补充一下。收入在 6000 马克以上的各具特色的集团的人数表明了如下的发展：

	1892 年	1907 年	增加%
一般的中等资产阶级：6000—9500 马克	63112	90145	42.8
富裕的中等资产阶级：9500—30500 马克	40618	79630	96.1
大资产阶级：30500—100000 马克	6665	17109	156.7
富翁：100000 马克以上	1780	3561	100
	112175	190445	69.5

可以被称为有产者的各阶层的财产税（“补充税”）在 1895 年（第一次征收）至 1908 年间表明了相似的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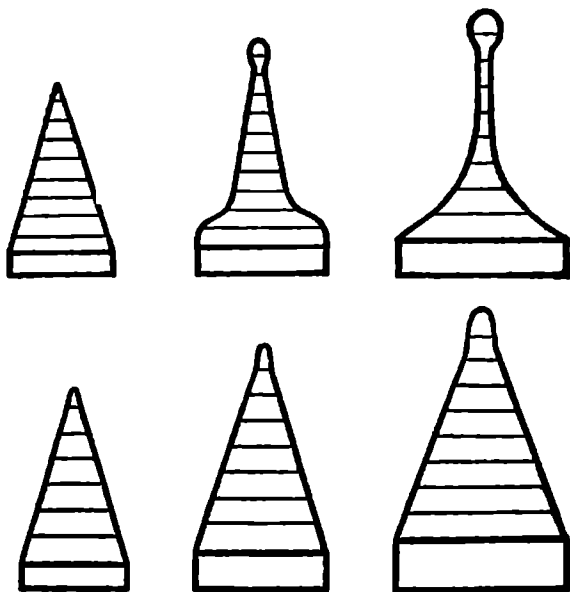
	1895 年	1908 年	增加%
中等资产：32000—52000 马克	162262	203818	25.6
富裕的中等资产：52000—200000 马克	179862	240391	33.7
大资产：200000—500000 马克	29373	43336	47.5
巨资：500000 马克以上	13631	21002	54.1
	385128	508547	32.0

所有集团的人数的增长都超过了人口增长率，后者只比 20% 多一点。

就算纳税人的增加有一部分是通过比较苛刻地应用评税办法而得到的，但是这些阶级的人数是在增多而不是在减少，这仍旧是不容置辩的事实。现代生活的全部发展证明了这一事实。

少。社会的基础是在改变，但是社会结构并没有变得更加简单。

最初在社会党人中传播的关于收入同财产变化的见解和事实上的变化之间的差别可以用两幅图来说明。



上图是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爱尔福特纲领的理论部分相符的。这个于 1891 年由卡尔·考茨基在我的合作下起草的纲领反映了我们社会主义者过去关于社会发展的观点。我们以由底座和竖立在它上面的有规则的圆锥体组成的社会角锥为出发点。底座是雇佣工人阶级，中段或中间几段是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最上一段即尖端表示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根据爱尔福特纲领，发展必然要导致或者已经导致这样的情况：角锥越来越接近在技术界称为瓶颈的形状，尖端膨胀成为圆头，中间越来越细而成为颈状，底座越来越厚实，就像上图的后两个角锥所表示的那样。一个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家、布累斯劳的尤利乌斯·沃尔夫教授很得意地设计了一张图来表示这种理论的最终结论，这张图中只有上面的表示百万富翁的粗大圆头和下面的表示工人的巨大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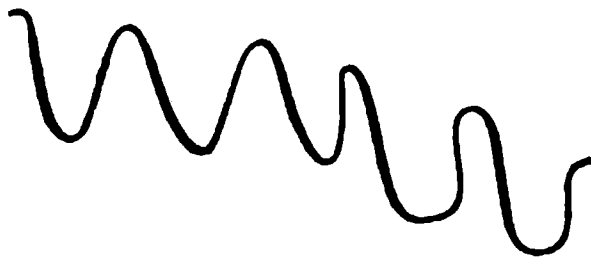
座，中间阶层完全消失，连一根头发那样细的颈形都没有了。当然是永远不会到这种地步的。但是实际上，中段根本没有变细过。下图的一组角锥是以今天实际的阶级结构倾向为基础的，它虽然表明了角锥形状的变化，但是基本上保持了圆锥形的结构。最上一段不再是尖的，而是变钝了，大资本家阶级比以前更加强大了，此外则中间阶层的阶梯几乎是原样，在工人阶级和巨富之间的阶层中没有一个环节显著地缩小。

有人从这一事实得出了结论：在这样的发展中一切都很美好，社会主义者没有理由抱怨事情的进程。然而这是根本错误的。人们只要仔细地看一看第三个角锥的下端：圆锥体建立在其上的底座大大加强了，无产者阶级即为工资而劳动的阶级的人数大大增加了，此外还有第二点即上下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了。顺便说一下，我的图形只是提供一幅呈现在我们眼前的倾向的图画，它不要求数学上的精确性。我们也可以通过一个悬挂着的手风琴来具体说明这种发展。我们把一个重量系在它的下部，同时用一个稍大一些的力量往上拉。最上面的部分即富翁阶级上升得最快，越来越巨大的财富集中在个别人手里。中间部分跟着上升，没有一节落在后面，但是越往下，上升运动便越慢，最下面即在工人那里最慢。但是这里也还有某种程度的上升，最下面的一节没有下降，绝对地说来工人阶级的景况没有比以前更坏，但是上下之间的差距大大地增长了，并且增加了社会上的不满。处于较高等级的阶层即广大的资本家，不管他们作为人来说是什么样的，但是从国民经济的角度看来，他们作为资本家来说，已经成了或者将越来越成为同创造性的劳动没有任何职能关系的寄生者，他们仅仅作为股东分享企业的赢利，但是在其他方面对这些企业并不负责。

六、崩 溃 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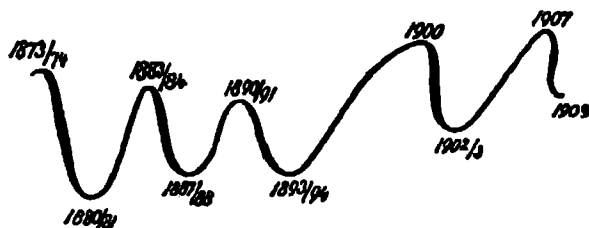
但是在这一期间，马克思主义的各种假设在第二点上也没有实现。阅读爱尔福特纲领的人会在第一部分的第四段中碰到下面这句话：“然

而有产者和无产者之间的鸿沟”——如果不是从道义上，而是从经济上理解这个词，那么还谈不上有什么鸿沟——“将由于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为根源的危机而更加加深，这种危机将日益扩大和具有破坏性”。在制定爱尔福特纲领时，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者都相信这一点。我们曾经设想，就营业状况说来，经济发展会走上一条越来越狭窄的螺旋道。这是这句话的含义，它在爱尔福特纲领中的表述方式就是在这种假定下得出的。如果想用图表来形象地说明爱尔福特纲领的思想，那么我们将得到一个下降线越来越长，上升线越来越短的曲线，而且繁荣时期的开始和新爆发的危机的开始之间的间隔也越来越短。大致像下图所表示的：



这是一条径直下降的商情曲线。但是实际的发展是怎样的呢？危机的历史和统计数字可以给我们提供这方面的情况。因此让我们来确定一下，德意志帝国建立以来曾经经历过哪些危机？1871年到1873年是一个大高涨，这就是有名的，或者说是声名狼藉的建设时期。在这个时期，似乎遍地皆黄金，无数资金被投入不可靠的企业。然后，在1874年，随着1873年的大破产出现了一次危机和萧条时期，一直延续到1880年到1881年间，几乎长达7年之久。这次危机的破坏性是这么大（我当时作为一个银行职员和活跃的社会主义者亲身经历了这次危机），以致当时的失业人数的比例和贫困程度都超过了后来的各次危机。只是到1881年才明显地出现了某种程度的高涨，然而声势很弱，时间不长，到1883年就达到了最高点。接着又出现了一次萧条，一直延续到1887年到1888年间，虽然不是完全和1874年到1880年的那一

次一样长，但也差不多。又出现了一个小的高涨，结果带来了强大的工人运动，但是也不过短短3年，就是说，只维持到1890年到1891年间。1891年，好日子就过去了。这正是爱尔福特纲领制定的那一年。这是一直延续到1893年的新的营业不景气的第一年。但是接着又出现了一个不仅在声势上，而且在时间上都是人们以前从未经历过的高涨，因为它直到1900年才宣告结束。随后又是一个新的萧条时期，然而不十分严重，到1903年就又过去了。从此开始的好转又很强大，一直维持到1907年。现在，从1907年起，我们重新处于一个营业不景气的时期，但是我们不知道它要延续多久，因此还不能确定它的规模。不过只要我们能够让事实来说话，我们就会看到和纲领所描绘的完全不同的另一条曲线。正是从1891年起，与其说是一条下降的商情曲线，还不如说是一条上升曲线。大家可以看看下面这幅根据上述商情的实际过程画出的图，并且同纲领规定的图作一比较：



这是同社会民主党人以前设想的情况完全不同的情景，完全不同的商业情况发展过程。对抗力量削弱了危机因素的力量，而这些对抗力量从前还没有达到这样的程度。由于社会财富大大增加和广泛散布，今天已出现了和过去完全不同的克服停滞危险的可能性。市场的高度扩大，创造了调节的可能性，这在以前虽然也存在，但从未达到同样的程度。工业卡特化同样使以前做不到的生产调控成为可能，这种卡特化以及种种其他的东西所起的作用，看起来将使营业活动中的危机和萧条比以前更快地得到克服。我不是说，这一切全都是对整个社会绝对有利的。卡特化可以帮助某些工业摆脱危机，但它却通过

人为地提高价格水平而加强了危机对其他工业的作用，而以前在危机中价格的降低通常是有益的。而且即使营业状况整个说来今天已有所好转，但是有一个情况毕竟没有改变（在这方面，爱尔福特纲领是正确的），这就是普遍的不安定今天并没有比过去减轻。各国工人阶级今天仍然听凭营业兴衰的摆布，他们受着不断进行的、一次又一次地把工人抛到总的劳动市场上去的工业改革的支配。这种不安定不仅是工人阶级才有，而且对于薪给阶级的其他成分中的多数人，对于商人，也同样起作用。我们可以把这种情况比做暴风雨在内湖里和大洋里掀起的波浪。如果暴风雨在湖里掀起的浪头很高，那就会造成一种可怕的景象：就湖的不大的面积说来，波浪和它所造成的破坏显得很大。另一次风暴在大洋里所掀起的波浪可能还要高得多，所造成的灾难可能要大得多，但是同大洋的全局相比，这就是微不足道的了。沧海中的一粟算得了什么呢？今天即使没有危机，工人也会在世界经济的大洋里被抛来抛去，个别人要在经济生活中生存，也变得更困难，更不安定，更加受到威胁了。波浪每天都在吞噬着大批牺牲者，可是世界经济的大海表面上仍在平静地流着。

如果说不应当从危机发展的旧公式已经站不住脚这一事实得出骗人的乐观主义，那么就不能忘记上述这一点。然而这个公式必定要垮台，而且以它为根据而提出的对于未来的一切期望，首先是关于将使现代社会遭到直接毁灭和完全崩溃的经济大灾变的思想，也必定随着它一起垮台。实现这种思想的可能性不仅没有增加，而且越来越减少了。先前同这一危机公式相连的一切妄想，都已经摇摇欲坠，而且只能是有害的了。

七、修正主义和社会主义实践

但是如果我们必须放弃灾变思想，那么不言而喻，人们所说的社会主义的当前工作就会获得更高的价值。因为这样一来，当前工作就不

是什么治标手段（这种手段的价值仅仅在于它们能使工人直到大灾变时都保持战斗力），而是成了重要的基本的准备工作。修正主义同别的观点即同社会民主党的旧观点相区别的一个主要因素，就是它对属于社会主义的当前工作的事情给以更高的评价。修正主义对议会工作的估价更高，并不是把它当做鼓动工作（虽然鼓动工作也有它的道理），而不如说是考虑到它的积极的立法成果，考虑它能争取一些法律，以便尽可能在法权和经济上引起深入的改变；更加重视社会民主党在地方自治机构中的活动，这也是不管估计得多高也不会过分的；更高地评价工会在经济生活中所能行使的全部职能的社会意义；更加关心工会组织的系统建设，同样也关心工人消费合作社的推广和建设——如果人们抛弃了那一危机公式的思想和经济大灾变的妄想，按照社会的实际发展状况来设想社会，那么所有这类工作就都获得了和过去完全不同的、更大得多的意义。

现在有人从另一面反驳这一论断说：作为必要的当前工作而提出的那些事情，全都已经在做着，社会民主党现在已经在做着！在一定程度上这样说是对的，但是仅仅是在一定程度上。差别在于，一项工作是在什么样的前提下进行的。当我的那本论述社会主义的前提的书出版并遭到激烈攻击的时候，一位波兰的社会主义者拉德·龚普洛维奇博士在伦敦的一次集会上说（这是对我能够说出的最有鼓舞力量的话）：“伯恩斯坦所推荐的，我们以前就已经做了，但是我们做的时候是半心半意的，而且我们的社会主义良心感到不安。伯恩斯坦使我们转移到能够全心全意地、无愧于社会主义良心地去做这些工作的地位。”这是否符合事实，我当然没有必要下判断。但它说中了我的意图。这句话对一个政论家来说是他所能受到的最高奖赏，它来自一个我到那时为止一直不认识的战友。

事实上，我们在追溯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时可以看到，它已被它的斗争的实际条件和它本身的发展引导到这样的地步：先前的、还是在半空想基础上产生的论断，一个接一个地破产了。起初，社会主义者认

为，议会同工人完全无关，去争论它同社会主义的伟大目的有什么关系，这完全是微不足道的小事。后来他们进入了议会，但是宣称，参加议会的各种委员会即使无害，也是毫无用处的。但是现在，社会民主党在议会中获得了重要地位，大家已习惯于这一思想了：工人阶级必须在一切立法和行政机构中全力进行工作，必须设法使这些机构充满工人阶级的精神。事情就这样发展到了这一点，而且还要越过这些点和另一些点。修正主义虽然在代表大会上被传统势力打败了，但是在实践中却胜利地得到贯彻。

我的一些社会民主党的同志会跑来对我说：这些听起来都是非常悦耳的，但是在进行这种细小工作时，大的着眼点、大的概括思想就从眼界中消逝了。如果你还要从工作中去掉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那么在这方面就会越来越糟。

我对这种时常听到的责难的回答是，现代工人已经不是小孩子了，不需要人们把月亮指给他们看，使他们欢欣鼓舞起来。现代工人阶级正在成熟着，而且它的广大阶层已经成熟了。它不需要空想，用不着这个毕竟是模糊的“最终目的”，去鼓励它为社会主义奋斗。为了向工人灌输争取伟大目的的热情和志趣，人们向工人指出的应该是完全不同的一些东西。首先应该指出他们在现代社会中日益增长的重要性，他们本阶级的历史使命，这一使命表现在：他们今天是对知识、技术、经济等方面的任何真正进步完全没有偏见的唯一阶级，他们的利益并不像其他社会阶级的利益那样，同已经陈旧和正成为陈旧的东西联在一起，这些阶级中有些是反动的，想保持过时的东西，有些只是半进步的，因为在进步过程中，它们作为阶级一定会失去这种或那种东西。只有工人是一经作为阶级出场就在各方面同社会进步联系起来。他们是社会进步的最可靠的先锋队，就像拉萨尔在工人纲领中号召工人时用这样美丽的语言所表示的那样：“你们是岩石，现在的教堂应当建立在它的上面。”如果人们向工人说明了这一点，并且向他们指出了不断上升的可能性（这种上升也许进行得很缓慢，但是由于工人的社会重要性不

断增长，只要他们能团结一致地前进，还是有把握实现的），那么，人们也就向他们指出了一个伟大的目的，这一目的是冷静的判断者也能相信的，因此，必然要起更强大的作用。我们再来看看社会角锥实际发展的图画。上部的圆锥体压迫着工人阶级的底座，妨碍它充分发展。圆锥体包藏着的数量日益增多的寄生者是把这个底座压住的重物。但是底座日益增大，工人阶级比其他阶级增长得快，底座的大小日益接近圆锥体，它的抵抗能力也就越来越强大。这是应该向工人指出的。这样做并不会使他们丧失同我们社会主义者在一起工作的热情，这样做不会使他们丧失远大的眼光，只不过是向他们指出，事实上应该怎样在社会中进行斗争，并且激发他们的自信心。有了这种自信心，即使在缓慢的前进中，也能使他们精神焕发，把力量保持在高度紧张的状态。

马克思关于社会崩溃的阐述向我们社会民主党人——要知道，我们都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生——展示出的旧的前景是一支军队在作多次迂回进军的图画。这支军队越过巉岩，穿过丛莽，但是在前进中，这条路越走越往下去，直到最后来到一个巨大的深渊面前，所争取的目的即未来国家在彼岸招手示意，需要经过一片大海——按照许多人的看法这是一片红色的海洋——才能到达那里。这个前景现在改变了，另一种远景出现了。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前景向我们指出的是工人的日常斗争（尽管有种种迫害，斗争还是在进行着，并且反复进行着）和工人在数量上、在一般社会势力上、在政治影响（任何政党都再也不能逃避这种影响）上的增长，这个前景向我们指出的工人阶级的道路不仅是向前的，而且同时也是向上的，不仅是数量上的增长，而且也是它的经济、道德和政治水平的提高，它作为参加国家和经济管理的因素的能力和活动的加强。社会民主党内被称为修正主义者的那些人所信奉的那一流派有志于这一前景，目前正在极其坚决地进行活动，促其实现。

附录 社会民主党纲领理论部分的提纲

由于这次演讲是向一般群众作的，我不想拉得太长而使听众感到

厌烦，因此它只涉及社会主义修正主义的基本问题，只阐明了从其中引出的对于社会主义实践的几个结论。其他结论只得原封不动地留下了。例如其中就有社会民主党对于资产阶级政党和政治上的中间组织的态度问题，以及这个与此相联系的问题：社会民主党是应当基本上保持为工人阶级的党，还是应当力求成为社会主义的人民党。由于修正主义者特别强调发展思想，这已经部分地预先决定了这些问题的答案：修正主义，这个基本上只有对于理论问题才有意义的词，翻译成政治用语就成为改良主义，即系统的改良工作的政策，它同把革命灾变当作运动的符合愿望的或被承认为不可避免的阶段的政策相对立。后一政策至多只能根据机会主义的功利原则区别对待非社会主义政党，但它在斗争中越是把灾变想象得很近，对待别的政党的态度就越是严酷和冷漠。改良主义则由于抛弃了灾变论，就已经达到下列情况：预见到同非社会主义政党屡次合作的理由和必要性，并在同它们的斗争中依照这一点来调整自己的语言。仅就这一点说，改良主义也是节制的意思。但是，对于下面这种成见无论怎样严峻地反对也是不会过分的：这种节制意味着放弃强有力的斗争手段，意味着一种软弱的让步和掩盖对立的政策。“作为一个修正主义者或者改良主义者，你怎么能赞成政治罢工、占领街道之类的事情呢？”对于这一问题我不止一次地回答说：“我赞成它们，因为我主张彻底的改良政策。越是把关于这一政策的思想放在突出的地位，这些手段就越有成效。”此外，彻底地强调改良思想，也使抹杀社会民主党的工人阶级政党的性质成为多余的了。

我始终认为，社会民主党必须坚持这种性质。它是那一社会阶级的政党，这一阶级的生存和发展条件千丝万缕地依赖着作为社会和文化进步的基础的经济进步——对于这一点的觉悟是社会民主党的统一意志（这是统一行动的最可靠的因素）的唯一保证。这是对于社会民主党必须表示态度的那些复杂的政治问题如农业政策、外交政策、商业政策、殖民政策等等的不可缺少的指南。工人阶级的政策并不意味着同一切其他阶级的利益绝对对立，但是它意味着不受其他一切阶级独特

的特殊利益的束缚。例如，社会民主党可以执行一种也对农民有利的农业政策，但它不能执行可以称为农民的阶级政策的农业政策。因此只有当工人自己成为人民中起决定作用的成分，而其他的人民阶层作为基本上从属于它的成分团结在它周围的时候，社会民主党才能在意义上和范围上成为“人民党”。职业和行业调查表明，社会民主党正在非常顺利地向前进。

它向我们表明，雇佣工人和职员阶级是人口中增长最快的阶级。如果说工业和商业中的小企业同样也比人口的平均增长率更为迅速地增长——在普鲁士拥有 2—5 人的企业在 1895 年到 1907 年间从 593884 个增加到 767200 个，即增加了 29.2%，同一时期的人口增长率是 19%，——那么不应该忘记，相当数量的这些企业是大企业的一部分，小业主中的很大的百分比今天愈加和工人相等了，因为，尽管他们的阶级还存在，但这一阶级中的各个人的生活大多建立在很不牢靠的基础上，这一阶级的成员进进出出的变动很大。如果说这不太符合农民的情况，那么第 21 页上引用的统计资料仍然表明，甚至农户中最顺利发展的阶层在数量上也愈来愈落后于人口的增长。人口增长了 19%，中农户只增长了 10.29%，小农户甚至减少了。农民没有在农业大经营面前覆灭，但作为社会阶级降低了等级。

应该根据这些见解来修正那些试图以德国社会民主党爱尔福特纲领为范本而详细地描绘社会发展的社会民主党纲领。我认为，比较合适的做法是在党纲里不作任何这样的详细描写，而是在像马克思非常老练地为法国工人党最低纲领所撰写的那样的几句一般的导言之后，只在纲领中规定一些原则和要求，至于理论的论证则放在宣言里面。宣言比起必须写得简短的纲领来，有可能更为精确地探讨问题，但是如果人们想保持爱尔福特纲领的结构，那么在撰写理论原则时，一定不能为修辞效果而牺牲科学准确性。做到这一点是非常可能的，我为我在夏洛滕堡的演说（本书前言中曾经提到它）所写的提纲可以作为具体的例证。我现在把它写在下面，同时我仍然要强调，这对于我说来仅仅是

思想内容的概述，而不是一个也考虑到形式的草案：

1. 在现代文明国家中，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统治着财富的生产和交换。资金雄厚的企业特别在商业和工业中把小企业完全排挤在后面。由独立的小企业主、小农民、小手工工匠、小商人和其他小业主组成的阶层在人口中所占的比例愈来愈缩小了。与此相反，受雇于资本主义企业的雇佣工人和领薪金工作的职员的社会地位增长得愈来愈快。增长的人口中的 3/4 以上注定要落到长期的经济依赖地位。

2. 对于受雇用的群众，特别是对于雇佣工人来说，资本主义除了意味着依赖性外，还意味着生活愈来愈不稳定。节省人类劳动力的技术革新一再把熟练工人从他们的队伍中抛掷出去，其次，由资本主义经济的投机特性产生的生意兴隆和营业停滞的盛衰交替，对于广大工人和职员群众来说，意味着一再反复的体力过度紧张和失业的交替。但是工人阶级越是发展，失业现象对于整个经济生活就越起麻痹性的反作用，并且把数以千计的业主抛入破产的境地。

3. 固然，现代资本联合——辛迪加和卡特尔企图对生产力进行一定的调整。但是它们这样做并不是为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利益和福利，而是为了在它们各自的工业中保持高价，保证尽可能高的利润。因此它不能消除周期出现的营业停滞的灾难，而只能改变表现形式，人为地保持高价则反而使停滞对于广大的劳动大众产生更加恶劣的影响。

4. 资本主义生产导致社会财富的巨大增长。但是这一日益增长的社会财富只有一小部分流入劳动阶级。土地所有者和资本占有者阶级通过各种形式的利润和地租占有了日益增加的大量剩余劳动。依靠财产证券不劳而获的人数不断增加，而他们的资本财富比他们的人数增长得更快。在个别人的手中积聚了过去从没有见过的大财产。为了工资或类似工资的薪金而辛勤劳动的广大群众的收入同资本家寡头——他们的奢侈在无限地增加并且在腐化着社会生活——的收入之间的差距扩大到惊人的程度。

5. 当生产和交换随着企业的扩展越来越具有社会性的时候，由于

财产的集体形式——股份公司等等——的发展，企业的所有主同他们的工厂的关系就日益被转让出去。社会总资本中愈来愈大的部分成为股东的财产。这些股东对于企业没有任何职能上的关系，他们只关心工厂应当带来的利润，但对工厂并不过问和负责。在庞大的垄断性企业后面，有一大批股东，他们加强了这些企业的社会势力，但他们是不劳而获的，过着寄生于国民经济的生活。

6. 对于这种寄生现象的过度发展，对于资本在工资和价格这两方面实行的垄断的压迫，单个的工人和职员是无力反抗的。只有通过政治的、工会的和合作社的结合，他们才能够抵抗资本的压迫倾向。结社自由和普遍的平等民主选举权是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解放的必要先决条件。

7. 在同资本权力相对立的一切社会阶级中只有工人阶级是促进社会进步的变革力量。其他反对资本主义的阶级或阶层不是想阻挡历史车轮前进或尽可能使它倒转的公开反动派，就是因为自己是中间阶层而在矛盾和犹豫之中彷徨。只有工人作为同资本主义对立的阶级代表了彻底进步的利益。工人作为阶级对于通过改进技术和征服自然力为生产服务来增加社会财富有最大的利害关系；作为阶级，他们对消灭寄生的企业形式和剥夺寄生的社会成分有最大的利害关系。

8. 他们的阶级利益要求把经济垄断转交给社会所有，并使它的经营对社会有利，他们的阶级利益要求把社会控制扩展到一切生产部门，把落后的企业纳入受社会管理的生产。但是，把工人组织成阶级，就是把他们组织成一个特殊的政党，而工人的政党就是社会民主党。

9. 社会民主党争取在国家、省、市镇中实行民主，把它当作实现人人政治平等的手段和使土地与资本主义企业社会化的杠杆。它不是只接受工人作为党员这种意义上的工人党，谁只要承认并捍卫党的原则，也就是说，谁只要采取创造的劳动反对剥削性占有的斗争的立场来对待经济生活问题，谁就可以参加它的队伍。但是，它主要面向工人；因为工人的解放首先应该是工人自己的事业。把这一思想灌输到工人中去

并且为了斗争在经济和政治上把他们组织起来，是社会民主党的主要任务。

10. 社会民主党的斗争并不局限于某一个别的国家，而是包括进入现代发展的一切国家。社会民主党透彻地认识到，现代交通工具的发展创造了这一切国家的工人日益增长的团结，目前还谈得到的民族对立的根源在于工人阶级所争取消灭的那种统治关系和剥削关系，因此社会民主党在经济斗争和政治行动中捍卫国际主义的原则，这一原则的目标是，在文明人类团结的范围内，在民族自决权的基础上建立各民族的自由联合。

三联书店 1963 年版。根据 1909 年阿姆斯特丹
德文版译出。殷叙彝、周家碧、李宗禹、李兴耕、
耿睿勤译

当务之急

决定的时刻到来了。德国社会民主党面临着一个问题，这问题对德意志民族的命运、对文明世界的前途有至为重大的意义。

在几个月内，某一报刊以及若干无足轻重的社团曾经有组织地大肆宣传了一些要求，最近几个星期又有一些身居显要地位的人物和有势力的团体有时甚至以更加尖锐的形式提出这些要求。一些给当前的战争打上征服烙印的纲领被提出来了。

大家记忆犹新，普鲁士上议院议长威德尔-皮斯道尔夫在1915年3月15日上院开会时曾经宣告，德国现在是战胜者了：“如果我们除了打退敌人的攻击而外不再有任何其他要求，我相信，在短期内达成和平是不会过分困难的。但是德国对此不能表示满足。我们在人员和财产方面既然付出了莫大的牺牲，我们就必须求得更多一些。只有在德国获得了防止邻邦以类似这一次的方式袭击我们的保证的时候，我们才能重罢干戈。”

1915年5月29日帝国议会开会时，保守党的代表冯·威斯塔尔普伯爵和民族自由党的代表希夫这两个议员，坦率地发言赞成兼并；前者援引了德国首相前一天的一个声明，声明的意思是，德国必须得到一切可能有的“真正的保证和保障”，使它的敌人“不管是单独还是联合起来”都不敢再来交战。对首相的话的这种解释，没有遭到帝国政府的驳斥。

此后又透露出有六个已经屡次给德意志帝国的政策指示方向的大经济团体，以大资本家的“德国工业家中央联合会”和大地主的斗争组织“农场主同盟”为首，在1915年5月20日向首相提出了一份请愿书，它们在其中要求：建成一个大殖民帝国，充足的战费赔偿，在欧洲实行兼并，单是在西部就要把1000万人以上——700万以上的比利时人和300万以上的法国人——强行置于德国统治之下。请愿书关于在兼并的领土上怎样实行统治和管理的条文表明他们对于这种强迫统治是怎样设想的：这种统治和管理必须使“居民对德意志帝国的命运不发生丝毫影响”。换句话说，将使这些被强制兼并的居民处于并且保持政治上毫无权利的地位。请愿书还进一步要求，一切产生重大的经济影响和社会影响的产业，在西部特别是所有大企业的工业产业，在东部特别是大型和中型的农业地产，“必须转入德国人之手”。

不仅如此。德意志联邦内的一个君主——巴伐利亚王，最近几天内在菲尔特^①所作的一次演说中曾表达过有关扩张我们的西部边界的要求，通过这种扩张我们将使南德和西德同海洋的沟通更加有利。

鉴于所有这些表示，德国社会民主党必须给自己提出这个问题：我们的议会党团在1914年8月4日的声明的条文中曾表示它与国际保持一致，谴责一切征服战争，那么在继续战争的问题上如果我们站在那些抱有和这个声明的条文截然矛盾的意图的人们一边，德国社会民主党是否能把这件事同党的原则以及党作为德国工人阶级的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的保护者所负的义务调和起来。

如果德国社会民主党面对着由统治者阶层中发出的那些声明而局限于表示学究式的和平愿望，那么上述条文就会被打上谎言的烙印。我们应该已经知道得非常清楚，大家对这种表示是丝毫不予考虑的。

我们当中若干人所担心的事，已经愈来愈值得注意了：有人允许德国社会民主党批准战争经费，但是在对于我们的民族前途至关重要的

① 巴伐利亚城市名。——编者注

决定上却冷冷地把它撇在一边。这种情况剥夺了我们使德国工人阶级的力量对一种政策发生影响的可能性，而凭我们由衷的、以历史经验为依据的信念来说，这一政策是给德国人民以及有关的各国人民带来利益的；我们可以让这种情况继续存在下去吗？

这次战争给卷入战争的各国人民已经造成了巨大无比的牺牲，而且每天还在扩大。世界历史上还未曾有过第二次其凶杀程度哪怕只和它大致相等的战争。野蛮时代的残酷同文明的最精巧的手段结合起来，夺去了各国人民的精华。在战争从各国人民夺去的财产方面，牺牲也同样是空前的。广大地区遭到破坏，人们一年里用于文化上还不致支出的那么多的钱，在这次战争中，为了杀人和毁灭未来幸福的基础，在一个星期之内就耗费掉了。随着战争的继续，破产正威胁着一切有关的国家。

在我们本国人民以及那些和德意志帝国正处于战争的各国人民的广大阶层中，日益强烈的和平热望确实正在抬头。统治者不敢去满足这种和平要求，而成千成万的人却都瞩目着惯于被大家看成和平之党的社会民主党，期待它说出解救苦难的话并且作出和言语符合的行动。

在征服计划已经大白于世之后，社会民主党就有了充分的自由，可以用最强有力的方式主张它的反对观点，而当前形势又使这一自由成为一种义务。

无产阶级有把握指望社会民主党今天也像在 1870 年那样万众一心地团结在一起，那时在类似的形势下，一切社会民主党人尽管有意见分歧，在战争一爆发时却都会联合起来，采取了一致的行动。

我们知道，交战国的另一方强加给另一方的和平条件不会带来真正的和平，却只会意味着新的军备以及新战争的前景。只有在自由协定的基础上才可能有真正的和持久的和平。

创造这种基础，不是一个个别国家的社会民主党的事情。但是一切个别的党都可以按照自己的地位和力量对造成这个基础有所贡献。

目前的局面号召德国社会民主党向这一目标采取断然的步骤。它

今天面临一个选择，或是服从这种需要，或是对它迄今在德国人民中间和全世界作为国际和平的斗士而享有的信任给以致命的一击。

我们不怀疑，我们的党将由此为我们在议会中及议会外的态度作出结论。我国人民的前途、幸福和自由，都系于社会民主党的最优良的传统上。如果我们的党没有力量作出决定，那么如下的任务就要落在我们肩上：作为推动力量把政策朝我们认定是正确的方向往前推进。

爱德华·伯恩斯坦

胡果·哈阿兹

卡尔·考茨基

发表于1915年6月19日《莱比锡人民报》。译自
《胡果·哈阿兹的生平和活动》柏林德文版第225—
227页。史集译

什么是社会主义

前 言

本书是1918年12月28日我在柏林交响乐大厅对一批人数异常多、成分很杂的听众所作的一次演讲。举办演讲的是公民和经济教育协会，它对在德意志共和国最初的纷扰动荡时期普及关于这一共和国的任务和能力的启蒙教育十分热心。根据协会的建议，为这次演讲作了速记记录，并且发行了印数相当多的小册子。小册子可惜的是根据未经校正的速记稿排印的，很久以来已经售缺了。但是一再有人需要此书，因此我现在将它仔细地校阅一遍，为了阅读的方便划分成章，重新交给书店。这次修改仅限于文字方面。在实质方面我有意识地使它保持不变，因为它是革命的最初的、充满希望的月份中的作品，就通贯全文的语调说，也不妨把它看成别具一格的历史文件。

爱德华·伯恩施坦

1922年2月于柏林雪纳堡

一、社会主义概念的起源和变化

全世界今天都在谈和写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什么，每个人对此

也总算有一点概念。但是如果一个个地问一下，他们所理解的社会主义是什么，那么我们得到的回答彼此将出入很大。不仅普通的老百姓，而且受过教育的、读过书的人甚至专家们也都是如此。我们从教科书中得到的也几乎到处都是互不相同的回答。我有一次利用对社会主义者讲社会主义的机会，让一批听众事先各在一张纸上写下关于他所理解的社会主义的简短解释，我从5个人得到5种不同的回答。当然差别不是绝对的。它们之间不存在完全的对立。这些解释之所以各不相同，只是因为写的人是从不同的观察点、从不同的方面考虑问题的，一个人把这一方面看作决定性的、最主要的或者最能概括全面的，另一个人则把那一方面看成这样。

从这样一些回答只能得到关于社会主义的定义的部分图画。某一部分描绘得多少还算正确，但问题本身没有讲透。一些人把社会主义理解为一种想象出来的状态，另一些人则认为它是一种运动，一种发展，还有一些人认为是一种政策或一种政治制度，更有人认为是一种理论或一种认识。也有一些人把社会主义概念同共产主义概念联系起来，把社会主义说成是共产主义的不完备形态或准备阶段，而共产主义则可以说是完成阶段，完全公有制的状态。

对于这些形形色色的解释究竟应当听哪一个呢？如果我们想具体地看一下分歧的情况，那么两部远近驰名的辞书对于社会主义的解释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样子。迈耶尔百科全书把广义的社会主义解释为“旨在消除支配着社会的阶级差别的一切意向的概括”，把狭义的现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解释为一种国民经济制度——前一解释中用“意向”一词的地方，这里用的是“制度”一词——这一制度要在以公有制代替私有制的情况下把经济生活置于公共的有计划的管理之下。

篇幅很大的社会科学手册却把社会主义解释为一种“在集体所有制基础上大规模地用公共资金从事经营的社会状态”。我们在这里查到的是一种状态，在那里查到的是一种制度，此外还有意向，这就是说有三种观察问题的不同方式。

再说一遍吧，应当听哪一个？

如果我们稍微考察一下社会主义的历史，我们就会知道，这个词本身即社会主义这个概念根本不是很古老的。因为在人类的历史上，80年或90年的确是很短的时间。社会主义一词第一次出现是在19世纪30年代的中期。一些人在英国，在高尚的社会改革家罗伯特·欧文的学派中，另一些人在法国，在伟大的社会哲学家圣西门的集团里说出了这个词。罗伯特·欧文及其学派和圣西门及其学派，作为社会改革家来说，他们的建议多少是激进的。但是他们决不是共产主义者，倒不如说是共产主义的反对者，而且他们尤其是阶级斗争的反对者。他们是道德家与调和论者，这就是说，他们是用伦理原则来论证自己的理论以及自己的实际建议和要求的。

但是社会主义这个词（从文法上说它是从 *societas* 即“社会”派生出来的）一旦见于文字，立刻就流行起来，并且被用于一切可能的复合形态，产生了应有的变化。第一个重要的社会主义史著述家路易·雷波把他的在上一世纪30年代末出版的著作命名为《对现代改革家或社会主义者的研究》，在其中列举了一系列社会主义体系；后来这些体系又增加了好些。特别是法国，在19世纪30和40年代，充斥着常常是很有趣的、在思想中构造新的社会主义形式的尝试。不过在这次讲演中，为了节省时间，不允许详细地研讨它们以及英国等国的著作家的类似著作。

在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1847年和1848年之间的冬天合著的《共产党宣言》中，已经有整整一系列社会主义的变种受到了批判：封建社会主义，保守社会主义，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空想社会主义，——这一《共产党宣言》对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作了批判性的说明。我们看到，社会主义概念的运用已经是极其多种多样、彼此出入很大的了。

在1848年的革命年代，社会主义概念进入政治，点缀了一些政党的名称。在法国，激进共和国的带有社会主义色彩的拥护者自称为

democrat socialistes——社会主义的民主主义者——而在德国，民主主义诗人哥特弗里德·金克尔（今天大多数人仅仅知道他的名字了）据此创造了“社会民主主义者”这一说法。这个词就是在这里第一次出现的。

1850年在英国产生了一个改革家学派，自称为基督教社会主义者，这就是弗里德里克·丹尼逊·莫理斯和诗人金斯莱的学派，这两个人做了许多牺牲，并且决不是为了任何一个阶级，而是大公无私地为社会主义工作，同时他们自认为可以以基督教为立足点。

后来在1863年，斐迪南·拉萨尔在德国出场了。一种新的工人运动展开了，首先为争取民主的选举权和由国家资助的生产合作社而斗争。拉萨尔在一次演讲中谈到了社会主义并且声明说，如果把他和他的信徒所要的东西称为社会主义，那么他们正是社会主义者。而他也确是社会主义者。新的运动在拉萨尔死后为自己创办了一份名叫《社会民主党人》的报纸，此后运动就自称为社会民主主义的运动了。

九年以后，在1872年，在爱森那赫出现了一个国民经济学的代表者的团体，他们被称为讲坛社会主义者。这些大学讲座上的社会主义者多半远离政治斗争。70年代中期产生了社会保守主义这一说法，而属于保守党派的天主教社会改革家和新教鼓动家于是自称为基督教社会主义者。新教徒社会主义者中的比较激进的一派在19世纪最后10年中起名为民族社会主义者。这样，表现为种种复合形态的社会主义一词已经有了整整一段历史。

如果我打算说明我所举出的各种党派或学派怎样应用社会主义和社会思想，那就离题太远了。我们还不如放下这些特殊品种，而只讨论今天在德国由一个大党代表的那种社会主义，这个党的成员或者简单地自称社会主义者，或者自称社会民主主义者。

* * *

德国社会民主党把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这两位伟大的斗士和思想家尊为社会主义意向和社会主义理论的公认的导师和阐述者。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1876—1877年写了一部论争性著作来论

述社会主义的意向和理论以反对在柏林大学主张一种特别的社会主义并激烈攻击马克思的欧根·杜林。这一著作（后来它的个别几章作为单独的启蒙著作出版，它在今天还没有受到足够热烈的推荐，它的名称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的引论对社会主义作了如下的解释：

现代社会主义，就其内容来说，首先是对现代社会中普遍存在的有财产者和无财产者之间，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的阶级对立以及生产中普遍存在的无政府状态这两个方面进行考察的结果。但是，就其理论形式来说，它起初表现为18世纪法国伟大的启蒙学者们所提出的各种原则的进一步的、似乎更彻底的发展。^①

这一解释给人的突出印象是什么？谁只要仔细地检查一下就会说：这里仍旧缺少对于这一内容本身的特性和本质的任何确定说明。只说了社会主义是从什么观点起源的，它表现为什么，但没有说出它实际上是什么。这种把社会主义作为体系来加以说明的解释现在在恩格斯或马克思的任何著作中事实上是找不着的。为什么找不着？难道他们对于它、对于它的本质没有确定的概念吗？哦，完全肯定是有的，这一点可以放心。但是他们反对任何关于社会主义体系的构想，反对任何固定的、一成不变的所谓社会主义的方案。对他们说来社会主义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完成着的社会发展过程。不是方案，不是图样，而是以今天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物质基础的一种运动，这就是他们所说的社会主义。这一社会主义是以无产阶级即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人阶级的阶级斗争为动力的。

这一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及其生产方式的标志是什么？标志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不是在小作坊中进行——当然也有例外，但不是常规，而标志一种社会状态的是常规的东西——而是在大企业中进行。社会的使用财富，只要不是农业的产品，都是在资本主义企业中生

① 译文可参看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70年版，第14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19页。——编者注

产的，这些企业用资本主义资金经营，其中的劳动是已经以多少完善的形式集体地，或者像马克思甚至也说过的那样，社会地实行的。在一个现代工厂中做工的人已经一同组成了一种共同体，它按照很发达的劳动分工而相应地分成不同的集团，但企业的人员是作为一个整体而集体地或者说社会地制造产品的。区别仅仅在于，企业是由个人领导的，它的利润是归个人占有的。固然今天纯利润并不总是被个别的人据为己有，而是为资本家集团甚至为由成千成万的股东组成的股份公司所有，但是这些资本家和股东形成了一个同工人和职员对立的整体，他们和从事生产的人比起来完全是另外一种人。

在这一制度下，生产者即工人（愈来愈多的商业职员或技术职员下降为工人）的一方和占有者即资本的持有者（或者是个人，或者是集团）一方互相分离，以致生产资料的占有完全和生产者分离。这一制度的前提是，从生产者的劳动中创造出超过他们的劳动力的价格之上的剩余价值，而社会的另一个完全不同的阶级就靠这一剩余价值生活。因为这一制度已被人感到是一种剥削的制度，它就引起工人和职员的经常的、一再重新发生的反抗。不仅在资本家和工人之间，而且也在资本家内部，产生了必然要一再重新爆发的争夺剩余价值的斗争。

后一方面说的是企业主彼此之间的竞争。一些企业主试图通过廉价抛售来打败另一些企业主，要做到这一点，归根到底就得改善经营以减少每件商品中的剩余价值份额。工厂扩大了，为的是在愈来愈广阔的基础上实行分工和专业化。企业（各式各样的工厂、采伐场）就是这样发展起来了，随着企业的发展，工人对企业主的从属性也发展了。在资本主义生产采取最现代化的形式即资本家联合成辛迪加或托拉斯时，特别可以看到这种情况。在资本家联合起来以后，只要工人还没有组织起来，资本家巨头集团就可以对千千万万的工人发号施令，对他们施加巨大的压力。这样发展下去就从资本家的竞争中产生出商业的危机和停滞。生产资料的发展超出了生产者的控制。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通常是预先生产，这种生产终究会发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市场

上发生了生产过剩的情况，产生了商业危机和随之而来的停滞，这一向是以工人的巨大贫困为其后果的。在已经形成一定程度的垄断的大辛迪加方面，最近出现了一些能削弱或缩短危机的情况，但通过垄断对公众的剥削因此也更加盛行了。

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这一日益尖锐化的情况最后要导致社会崩溃。根据这一理论，整个资本主义制度将由于自己的内部矛盾而崩溃。在这期间，由于资本主义企业的不断扩展，由于小企业和中等企业受到淘汰和排斥，无产阶级将逐渐强大起来，以致能夺取统治权，掌握国家，按自己的要求改变生产和整个社会。由此发展出来的新社会因而是经济发展达到一定成熟程度时的产物。这就是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

在这里从恩格斯的著作本身、从他的结论中引用几句话，是很恰当的。他在那里描述了一系列发展阶段。上述阶段他是这样描写的：

“一方面，机器的改进，因有竞争而成为每一个厂主所必须遵守的律令，这也就等于工人不断加紧被解雇：产业后备军。另一方面，生产的无限扩张，也是每一厂主所必须遵守的竞争规律。两方面都引起生产力的空前发展，供过于求，生产过剩，市场充塞，十年一次的危机，错误的循环：这方面生产资料和生产产品过剩，那方面没有工作和没有生存资料的工人过剩。但是，生产和社会幸福的这两个杠杆不能联结起来，因为资本主义的生产形式，除非在生产力和生产产品事先已转化为资本的条件下，是不许生产力发生作用和生产产品流通的，而这种转化，正为它们本身的过剩所阻碍。这种矛盾发展到荒谬的地步：生产方式起来反对交换形式。资产阶级无能继续支配自己的社会生产力的罪状已经证实了。”^①

于是开始了下一个阶段，对此我们大家都有了一些体验，我们现在

^① 着重号是按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德文原本中的斜体字加上去的。译文可参看：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70年版，第279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59页。——编者注

还处在这一阶段的变化发展之中：

“资本家本身不得不部分地承认生产力的社会性。大规模的生产机构和交通机构起初由股份公司占有，后来由托拉斯占有，然后又由国家占有。资产阶级表明自己已成为多余的阶级；它的全部社会职能现在由领工薪的职员来执行了。”^①

而最后来到了：

“无产阶级革命，矛盾的解决：无产阶级夺取社会权力，并且运用这个权力把摆脱资产阶级掌握的社会生产资料变为社会财产。它通过这一行动使生产资料摆脱它们先前的资本属性，而使他们的社会性有充分发展的完全自由。从此就有可能按照预先规定的计划来进行社会生产了。生产的发展使不同社会阶级的继续存在成为不合时宜的现象。随着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消逝，国家的政治威权也相应地趋于衰亡。人既已终于成了自己特有的社会化方式的主人，因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己本身的主人——自由的人。”^②

二、自由主义是社会主义的初步

上面说的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心目中的发展。那么，根据这一发展看来，社会主义者和他们的学说即社会主义理论的任务是什么呢？

第一，精确认识这一发展及其趋势，精确研究它的细节。

第二，为了由此产生的工人阶级即无产阶级的任务而组织和从政治上教育他们，建立无产阶级的政党。无产阶级的政党就是社会民主党。

第三，清除发展道路上的障碍。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就 1871 年的巴黎公社这样说过：

①② 着重号是按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德文原本中的斜体字加上的。译文可参看：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 1970 年版，第 279 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759 页。——编者注

工人阶级并没有期望公社作出奇迹。他们不是要凭一纸人民的法令去推行什么现成的乌托邦……而只是要解放那些由旧的正在崩溃的资产阶级社会本身孕育着的新社会因素。^①

而社会因素的这一解放，也就是社会发展的一切障碍的消除，这是无产阶级的任务，正如在无产阶级之前出现的资产阶级在当时也有这种任务一样。

要知道资产阶级——按照法文 *bourgeoisie* 一词的意义——在历史上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的第一节中可以读到简直是颂扬资产阶级的历史作用的句子。要知道这个资产阶级一度曾经是反对封建主义、反对行会资产阶级等等的解放者阶级。它曾经随着时间的推移清除了阻挡它发展的障碍，并且为了它自己的需要，为了它自己的生产方式，也就是说为了自由竞争，为了在国内市场以及后来在世界市场上的自由竞赛而解放了社会力量。在这一方面资产阶级是有历史使命的。正如《共产党宣言》中所写的，在1847年，这一使命至少在德国还没有全部完成，在其他一些国家也是如此。马克思和恩格斯有鉴于此，也为实践得出了结论说，社会主义者固然就社会观点说来已经以资产阶级的敌人自居，并且对他们进行了斗争，但是有些时候——《共产党宣言》中确是这样说的——必须在资产阶级对反动阶级采取革命行动的一切场合支持资产阶级；并不排除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暂时联合行动。

我们还是坚持用德文的资产阶级一词吧，尽管它有歧义。我们德文的 *Bürger* 一词是有两重意义的。它一方面单纯意味着一个巨大共同体的成员，不管它是无产者也好，资产者也好，贵族或者其他什么也好，每个人都是 *Bürger*（市民）。在另一方面它却是指一个一定的社会阶层即不属于世袭贵族的有产阶级的成员。在这里，*Bürger*（资产者、资产阶级）只要意识到自己是自己阶级的成员时，他就和工人或无产阶级处于

^① 译文可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0页。——编者注

对立的地位。但是如果我们心目中是有产的资本家阶级时，我们还是坚持用 *Bürger* 一词吧——它是在某一时候移植过来的。资产阶级除了经济的和政治的进步外，也在司法机构、法权概念方面，甚至也在伦理方面完成了很重大的进步。当它反对和废除等级制度时，它至少在原则上要树立一切人在法律面前的平等，尽管这在今天看来已算不了什么，但在那个时候确是一个不同寻常的进步。现代资产阶级至少在原则上要承认个性自由，个性的自由活动。而无产阶级利用了这一点，我们大家目前都利用这一点，用得很惬意。这在当时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自由主义——不是理解为政党，作为政党它的确常常是僵化了的，常常落入资本主义手中或者听它使唤——，作为世界观的自由主义在当年是一件伟大的事物，今天也决没有成为多余。

作为世界观的自由主义观念世界是在法国大革命的人权宣言中奠定的，这一革命宣布了个性自由，人对于本身自由的权利，每一代人的自主权。在人权宣言中说，任何一代人也不能为下一代人预先规定法律。这是一个非常革命的思想，斐迪南·拉萨尔在他的重要著作《既得权利体系》一书中进一步发挥了这一思想，并且按照这一革命的意义把它应用于现代的条件。任何一代人也不能为下一代人预先规定法律，这样说究竟是什么意思？这是说，任何一代人也不受根据前一代人的决议而得出的既得权利概念的束缚。不需要多加考虑就可以明白，这意味着一些影响特别深远的后果，尤其是就赔偿或剥夺问题而言。因为拉萨尔的既得权利体系事实上是一种关于进行革命剥夺的权利的理论，它认为，主张这一权利，要和这样的要求联系在一起：即使在暴力中，法权思想也要得到表现。人们当然可以在革命时说：“好啊，我们现在有暴力，可以为所欲为。”正是斐迪南·拉萨尔指出，甚至在革命的暴力中，法权思想仍旧必须并且能够有一席之地。他把自己的著作称为成文法即在法律中规定下来的法权和法哲学即自然法的协调。这一著作指出，按照法权观念，在什么时候必须进行赔偿，在什么时候则可以

直截了当地没收。

这里所描述的发展，即从行会制度、从等级制度等等的解放以及自由个性原则的确立，我们要归功于资产阶级。

这一需要几百年才能贯彻的发展，在历史上往往被我们仅仅解释成为一种观念的斗争。对它的背景，对为它提供动力的物质利益的斗争，人们长期以来很少加以注意。16世纪的改革^①，即上升的资产阶级的意向的这个第一次（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集中的运动，还有英国和法国的大革命——它们表现了观念的发展，这一发展还完全没有结束。因为说到观念，情况是这样的：它们固然最初是由在社会发展的孕育中完成着的物质过程所引起的，却具有独立地向前发展、超出它本身的实现形式之外的倾向。人的思想不是静止不动的，何况社会发展本身还在前进。例如今天的资产阶级显得和50年前不同，50年前它又显得和100年前不同，如此等等。此外资产阶级还分成很不相同的阶层。有大资本巨头阶层，大资本家和小资本家阶层，小资产者阶层，知识分子阶层，后两者形成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一个中间阶层。这些不同的阶层自然有不同的利益，从这一利益的差别产生种种不同形式的观念过程以及对于资产阶级在当年提出的一些原则的种种不同的解释。在资产阶级的发展时期，它的观念往往表现为乌托邦，表现为在观念上描绘出来的未来图画。不仅有社会主义乌托邦，也有或者曾经有过资产阶级乌托邦。18世纪时（特别是在法国）我们看到有一整批关于社会计划、关于未来社会的草案或图景的文献出现，它们都把自己装扮得很漂亮，但大多数是某种程度的资产阶级乌托邦，是建立在资产阶级思想体系上的妄想。

三、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的思想体系

但是，把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应用于无产阶级的地位，在进一步发展

^① 指从德国发生并且扩展到全欧洲的宗教改革运动。——编者注

时，就会产生出社会主义思想体系或乌托邦即平等共产主义。工人或者关怀无产阶级、关怀被剥夺财产的人的先进资产者提出了这样的理论：“你们资产者，你们的平等不过是说谎，你们不想有真正的平等，只要财产的不平等、生活条件的不平等继续存在，你们的在法律面前的平等就毫无意义。”这样，由于模仿资产阶级思想体系或者把它应用于无产阶级的地位，就形成了新的概念，现在或者称为共产主义，或者称为共产主义思想体系。这里就是引导出对我们的“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一问题的答案的关键所在。我们根据什么来认识一个观念、或者一件措施、或者一项政策是否社会主义或者是否社会主义性质的呢？换句话说，是否也有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如果社会主义没有任何尺度的话，那么什么是社会主义呢？

关于社会主义是否有思想体系这一问题是可以肯定地回答的。的确，有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而且有衡量它的尺度。我们打算怎样获得这些尺度呢？可以从臆想的社会推演出它来，这是许多人已经做过的。但是这始终是或多或少任意的、因而会引起误解的构想。事实上实际可用的尺度不是从一个苦心缔造的现成的社会方案推演出来的，不管有多少个别的人相信这个方案，而是从以实行社会主义变革为天职的社会阶级即无产阶级的现实的、以已经达到的经济水平为根源的活生生的需要和可能性推演出来的。不过对这一点必须正确地理解。我们必须把整个社会阶级和这一阶级的个别成员区别开来。无产者作为个人是和别人一样的人，这样的人自然是有缺点的。他受到各式各样的思想影响，他所受的教育大部分在今天还是有缺陷的，而且我们天天看到，他可能仍旧沉迷在应有尽有的偏见里，他是背负着这些偏见长大的。他除了长处以外也有从他的社会地位产生的人类的弱点。但是如果我说的是无产阶级这一阶级，那么我指的是工人全体，他们和其他社会阶层的对他们同情或感到和他们相连的那些成员一起，由于认识了自己的阶级地位及其原因而形成了确定的观念，这些观念力求实现一种更高级的社会形态。因此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共

产党宣言》也要求把无产阶级组织成阶级，以此作为共产党人的首要条件。

什么是阶级？一个特定的社会，在今天说来就是现代社会的一个阶级是这一社会的这些分子，他们在主要方面生存在同样的生活条件——财产和收入的情况——之下并且构成这一社会的一个相当重要的部分。在社会主义运动发生之前，已经有无产者，就是没有财产的、完全指靠雇佣劳动为生的人。但是无产者起初一般只是简单地感到自己是一个穷人。他的一伙只在富和穷之间划界限。那时无产者很能体会：那些是富人，我们是穷人。但是他作为工人是属于一个特殊的社会阶级的，和其他穷人、其他没有财产的人不同，这一点他还没有意识到。把工人组织起来进行运动，使他们在这一运动中感到自己是一个特殊的、赋有特殊任务的社会阶级的成员，——这首先成为德国人即 1847 年创立的共产主义同盟的成员的的任务，它在今天则是巨大的社会主义政党的任务。当他们组成阶级时，社会主义者为他们提供阶级意识。对于工人说来，认识到他们有一定的自己的物质利益是不够的，应当有这样的觉悟：他们作为现代社会的工人担负着崇高的社会革命任务，他们必须完成使社会向前发展的历史使命。这曾经是、现在也是一个完满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政党的组织前提。

在《共产党宣言》中已经阐述了这一点。但是斐迪南·拉萨尔在他于 1862 年对柏林工人所作的一次演讲（后来以《工人纲领》为标题印成小册子出版）中已经令人惊奇地说到了这一点，虽然用的词句多少有些不同，而且对有些说法甚至是可以提出异议的。这一著作我今天仍旧可以介绍给任何人阅读，虽然其中有些东西已经过时了。它到今天毕竟已经有五十多年了。拉萨尔在这一著作中，从我们时代的工人的历史地位出发，阐述了他所说的工人的“观念”。这就是说，他们向他们指出，他们由于自己的地位而赋有创造新社会的天职，然后他号召他们根据这一事实，不仅为自己的政治意向，而且为自己的整个生活方式、自己的整个精神世界作出结论；不管在哪里也要永远想着这一任务，一心

一意只想着这一任务并且从它作出结论。他向工人大声疾呼：“没有思想的人们的乐事和被压迫者的重担已不再适合你们了。你们全神贯注在这一思想中吧，永远不要忘记它吧：你们是岩石，现在的教堂应当建立在它的上面。”就是在今天人们也不应当忘记这些优美的词句，永远不要忽视，在粗俗的物质利益（这当然是有正当理由的）之上还有这一伟大的任务。

工人运动所经历的过程是怎样的呢？现代工人运动开始于个别的工厂暴动，起初是反对机器，然后组织集团。工人对于自己的阶级还没有任何概念，但是他们已经竭力追求别种状况，由于他们还看不到实现这些状况的手段，也没有政治权利，而且连取得这些权利的可能也没有，因此他们就组织小组，即热衷于多少是幻想的计划的集团。还没有任何在经济方面经过研究的理论可以传播。但是在发展进程中，工人在社会中的真正战斗即阶级斗争从骚乱和暴动的运动中产生了。而作为阶级斗争来说，工人阶级即无产阶级的斗争必然是政治斗争。紧紧抓住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凡是不仅为了确定的眼前要求而进行的斗争就是政治斗争；因为这种斗争涉及的问题已经是要实现无所不包的社会要求。工人的局部运动在任何时候对于社会来说都可能是无足轻重的，甚至是反动的。这种情况即使在今天也仍有可能。工厂的工人会为了特殊的利益而对整体进行斗争。在某种情况下工人甚至会以提高工资为代价而同企业主联合起来，通过抬高价格来欺诈大众。这不是阶级斗争。这样的一种斗争尽管可以有它的解释，或许有时甚至可以找到理由，但它和阶级斗争毫不相干，这是一种普通的利益斗争。

这类事情和社会主义毫不相干。使工人直截了当成为他们做工的工厂的主人，这种思想同样和社会主义毫不相干。在这方面我们在东方的邻国（俄国）所看到的不是社会主义。对于这一点没有人比卓越的社会经济学家卡尔·罗德贝尔图斯在他与鲁道夫·迈耶尔和拉萨尔的通信中讲得更尖锐了。大家知道，拉萨尔提出了由国家给生产合作社大量贷款的要求，他认为这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一种手段。但是罗德

贝尔图斯坚决认为，用这种方法创造出来的工人对企业的所有制是一种比资本主义所有制更坏的私有制。为什么？这很简单，因为它使工人——只要他们一旦成为他们自己的行业中的企业主——和整体对立起来，削弱改进技术和采用节约劳动的机器等等的动力，而这种削弱是对整体有害的。但是社会主义恰恰是整体利益高于各团体的任何特殊利益的思想，它是从阶级的共同利益、不是从集团的共同利益出发的，它和这种同整体利益相抵触的个别行业的利益是毫不相干的。

今天我们见到一种可以根据革命状态而加以解释的现象：从前大都组织在工会里的工人，今天在企业里和工会作对。^①我没有受委派在这里保卫或者攻击工会的领袖。他们可能犯了错误，这是另一回事。但是关于那种力图至少包括某一工业的全部工人并且按阶级斗争精神办事的工会的思想，无论如何比从企业到企业的做法（如果它本身不仅是工会斗争的一种手段的话）更接近社会主义。

根据同样的理由，我一辈子都反对通过分红来改善工人地位的思想。有些厂主出于慷慨，有些厂主另有打算，他们把自己工厂的利润给自己的工人。这也不是什么社会主义思想，因为这容易使分到利润的工人甚至和同一行业的伙伴对立。如果说可以谈到所谓分红的话，那么最值得争取的工人分红就是由工人全体和全行业的企业主协商订立的工资。

诚然，个别的工会也可能是保守的，在某种情况下甚至可能是反动的。我们在英国有过这样的经验：工会直接反对技术进步，因为它们认为它们的会员会由此吃亏，在别的国家里也到处发生过这种情况。我们经历过有些工会是保守的情况。但是一个包括一切行业的工人的工人党，不管它是像英国的工党那样基本上由工会组成的党也好，还是像德国的社会民主党那样在政治上组织起来的也好，就广义的革命即经济、政治、思想和道德这一切社会生活领域中的彻底进步来说，它只能

^① 这是1918年12月写的。

是革命的。为什么是这样的呢？因为在现代社会中，工人作为阶级，就全体来说，和几乎一切资产阶级政党不同，他们不受任何遗留下来的过去的制度的束缚。他们作为阶级没有任何和进步相抵触的利益。作为阶级来说，他们的幸福和痛苦是和社会进步息息相关的。如果说个别工人认为，社会进步、技术进步会使他们遭受损害，因为这种进步往往使工人过剩，那么全体毕竟从这一进步得到了产品增加和社会财富增加的巨大利益。但是这一利益正是社会进步的条件。因为社会财富不达到一定的阶段，就不可能在社会主义的意义上改变社会。

工人阶级最关心一切领域中的进步、生产和流通中的进步，因而它也是财产的一切特殊化利益的反对者。因此它正是社会主义思想的体现者。这也表现在工人对待国家的一般态度上。在国家的某一发展阶段上和面对着国家的某种宪法，工人阶级可能对国家抱敌对的态度，他们曾经对它抱敌对态度，在有些情况下必须对它抱敌对态度。但这只是在一定的统治情况下对一定形式的国家才是适用的。然而国家是民族这一巨大整体的结合，是巨大的共同利益当仁不让的捍卫者，就国家的这一职能来说，工人和它是立场一致的。工人是不和一定的国家连在一起的，他们根本不受这种看法束缚：社会一直要以国家的形式，也就是说通过国家结合起来。可以设想其他的结合形式。但是他们也珍视按照合乎理性的观点看来国家所赖以建立的那一基本思想，而这一思想又是拉萨尔在他的论述伟大的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的哲学的精心著作中曾经表达的，他为了说明它而引用了赫拉克利特的话：“献身于整体！这是道德的永恒的基本概念。”这必然也是工人阶级作为阶级所必须具有的道德，不管各种各样的工人作为个别的人的想法是怎样的。个别的人的缺点在整个运动中消失了。在整个运动中，作为共同的思想留下来的是，全体工人除了这个或那个人作为个人或许会有的与人不同的特性以外，在社会判断方式方面或多或少自觉地共同所有的东西。工人阶级是和整体思想不可分的。如前所述，在我向五个人提出他们所理解的社会主义是什么这一问题时，我从一个老工人那里

得到了一个经典式的答案。在他的纸上只有一个词，就是团结。在我看来，在能够用一个词表达出来的答案中，这是最正确的。整体感，人作为社会的密切联系，这对于普通人说来就是社会主义的基本思想。显然，他是把它和一种完全确定的社会经济概念（而且原则上也是正确的概念）联系在一起的。

但是怎样实现团结呢？工人在不同的行业里，在不同的工厂中做工，他们的利益有时相互抵触，这是不可避免的。在国家里面，团结是通过政治斗争来实现的，而工人阶级只有在民主制下进行这种斗争才能取得最大可能的成就。废除任何阶级特权，这是工人阶级的政治基本权利。个别资产者可能撇开阶级利益，从意识形态出发主张实现完全的民主，但没有一个社会阶级能像工人阶级那样无顾虑地、无保留地主张在一切领域中实现民主。民主是取消任何阶级特权，一切人具有平等的政治权利，而且不仅是参加公共代议机构选举的平等权利。但是民主的范围还要大得多。它延伸到整个司法机构，还延伸到一系列其他的公共机构。在现代社会中，它必然促使消灭一切资本主义垄断，或者促使除去它们的资本主义性质。它加强工人的政党组织、工人阶级为了自己的经济斗争而成立的组织，它提高对国家和地方自治机构的要求。凡是工人有充分民主选举权并且有阶级觉悟的地方，他们就向国家提出愈来愈庞大的、需要更大开支的文化性质的要求。他们加强了要求由整体（按企业的性质不同，分别由国家或地方自治机构）接收垄断企业的压力。这一点我们在和平时期已经能够观察得很清楚了。长期以来甚至也被许多社会主义者所低估的普选权的社会影响已经表现得如此突出，连固然并不反对民主权利，但在某一时期很不愿意进行争取普选权的斗争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也确信，这种斗争是完全有道理的，民主选举权是工人阶级为了争取更大的权利和贯彻更多的旨在改造社会的措施所能运用的巨大杠杆。我们在和平时期，根据我们在帝国、在各邦、在地方自治机构的政治工作已经体会到这一点。凡是一直注意德国和其他国家最近几十年来的社会政策立法的人，都不得

不承认，这种立法已经带来了某些重要改革。的确，对这些改革称赞得太过分了，但是它们确实存在着，而且大家公认，这种立法之所以能存在，是靠了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压力，在德国是靠了社会民主党这个社会主义政党的压力，它依靠民主选举权就能够以必要的强度施展这种压力。如果说，并不是在所有的国家都取得了同样的成就，那么这在某些国家正是由于选举权还受到限制。在另一些国家，例如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农业国的法国，这是因为工人阶级在数量上还不够多，而且缺乏政治上的统一。

从另一方面说，在德国所取得的成就会更大，如果选举权在最大的邦中没有受到限制的话，如果在选举权只是形式上平等而实际上也是不平等的帝国中，宪法不规定联邦院对人民议机构的立法决定可以干脆置之不理的话，如果国家和社会里的力量对比不是还妨碍选举权充分发挥作用的话。但是民主、民主选举权具有巨大的潜在力量，这个事实是得到证明的。那种阻碍选举权发挥其全部效力的力量对比现在已经被革命推翻了。这样一来，内政上的最大障碍被清除了，通向对现代社会制度进行彻底的有组织的改造的道路被打通了。而有组织的道路将是最好的道路。

四、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上的困难

但遗憾的是，我们必须对付的不仅是内政方面的障碍。目前要求社会化的呼声很高。我们从许多方面都听到这样的呼声。这是可以理解的。社会化是表达社会民主党所努力争取的公有化的概括性的专门名词，公有化将结束资本主义经济的灾难和不平。但是从一再发出呼声的这种样子，从“为什么不立刻社会化？”这一迫不及待的问题，的确表现出对于社会化的直接可能性和效力的巨大迷信以及对于在目前条件下妨碍它进行的、一部分是在政治领域内也存在着的困难的完全忽视。这是一种可以理解的急躁心情。我了解它，但是每个人毕竟应当

懂得，这样的大事不可能是几个星期或几个月的工作。今天我们的工业必须和极大的困难斗争，而且它将要碰到的其他阻力的大小我们还根本无法估量，因为我们还不知道战胜者的外国要把哪些条件加在我们德国人身上，今天如果设想，只要我们宣布这一或那一工业社会化，就可以在瞬息之间为工人或者为全体取得某种重大的改进，那就是——哦，我要毫不客气地说——相信奇迹。

国有化或地方公有化是公有化的标准形态。当然，它们本身不是目的；它们也只不过是达到以争取最大可能的普遍幸福为最高任务的那一目的的手段。达到这一目的的保证是，在经济领域中，在生产、贸易和交通中能带来最大可能的经济效率。如果我们着手进行社会化，那么我们就应当不断地问自己：我们所采取的以及能够采取的措施是否真正能使我们达到更高的经济效率，我们是否会在和这些措施有关的情况的压力下暂时不能前进，反而向后倒退呢？我了解我所说的这种急躁心情，并且把它当作推动力。但是我们不想向自己隐瞒，今天下的是什么赌注。公有化的主要问题是我们把生产和国民经济的其他部门置于整体的管理监督之下，而且是置于一个远比它们过去所受的更为有力、更为广泛的监督之下。使经济转归社会领导并且为社会服务，可以通过各种道路来实现，并不是只有一条固定的道路可走。目前在我们德国（农业除外），大约有 300 万个各式各样的生产、贸易和其他的企业，其中足有一半是小企业、个体企业或者也许只有一个伙计的企业，这些企业的社会化在目前是不能考虑的。如果我们把它们算得更多一些，把数字估计为 $2/3$ ，那么还剩下 100 万个大小不等的中型、大型和巨型企业，各种类型的生产、交换和运输企业。难道有人相信，如果我们到处不分青红皂白地用公务人员来代替企业主，这些企业立刻就会有所改善吗？我不相信。私营企业转归国营，是一个在每一个具体的场合都必须按照一定的观点仔细地、井井有条地加以完成的过程。人们必须研究，哪些经济部门或者哪些类型的企业能够首先最有效地为社会接管，哪些最好暂时还留在私人手里，甚至必须留下，以免经

济运转陷于停顿。在目前的时刻，有一个比“国营企业还是私营企业”这问题更为重要的问题：开工的企业还是停顿的企业？要知道我们的人民今天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指望工作为生。

战争以前德国就整个说来是一个富足的国家，在战后的今天它是一个贫穷的国家，不得不采取贫穷国家所执行的经济政策，并且因为它为了能够维持经济必须输入价值几十亿的原料和部分食品，所以它不得不尽可能大规模地输出制成品。要知道产品终归只能以产品支付。黄金很快就要枯竭，而我们所印的纸币，国外是没有人按票面价值接受的。

第二任德国首相卡普利维伯爵当年（上世纪 90 年代初）在指出德国不能自己生产它所需要的全部原料和食品时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我们必须或者输出商品，或者输出人。而输出人换句话说就是移民。我担心，我们很大一部分工人本来就会被引诱去移民。但是我们不想再人为地扩大这个数目。已经有人向我提出问题：他们应当到哪里去？这是一个很正当的问题。我们今天在世界上遇到的情况已和在这次可怕的、万恶的战争以前完全不同了。我们常常受到憎恨，它在一项敌视德国人的立法中明显地表现出来。这就使移民比在战前困难得多。这一来德国工人的境遇就像弗莱利格拉特关于革命前所说的：

“她寻找别人的炉灶，悄悄地坐在灰里”。

因此我们今天不应该通过靠不住的试验人为地再把数目扩大。我们应当争取把我们必须投奔国外的工人保持在尽可能低的数目上。

这是为什么我们必须小心谨慎、一步一步、井井有条地进行社会化，为什么我们必须使没有社会化的工业有可能在这一期间生存和工作的另一个原因。但是我还要再说一遍：社会化有种种途径。它可以采取这样的办法：将某些企业或工业群直接接受，使它们成为国营企业也好，地方国营企业也好，国营企业也好。但是它也可以这样进行，即由整体通过法律和法令而愈来愈多地干预企业的经营。今天整体已经部分地这样做了。工厂法也曾经在当年被资本家看作侵犯他们的尊严

的东西而加以反对。他们要做自己家业的主人。在我们这里，俾斯麦也曾经一度就工厂视察愤怒地发表和英国工厂主在它第一次实行时所发表的相似的意见。他也希望这个法律不要进入他的工厂。但是它毕竟进去了，为了整体的幸福，为了社会进步而且也是为了经济进步的利益而进去了。这可以进一步扩展。邦或者国能够作为整体的代表逐步参加管理它暂时留在资本家手中的企业；分享它的赢利，也参加决定价格，以杜绝一定会抬高物价的垄断。这在某些地方已经发生，而且还能够大加扩展。用这种方法，整体就能够获得愈来愈多的经济权利，愈来愈多地参与生产。

20年前我在一篇文章里说过一句话，今天我还承认它：一个好的工厂法可以比几百个企业和工厂的国有化包含更多的社会主义。因为在这里整体的利益在广泛得多的规模上得到了照顾，数目大得多的人的幸福受到了关心。和这比起来，国家是否多掌握几个企业以及是否只要有可能就仍旧按资本主义方式经营这些企业，这又算得了什么呢？

五、为什么要实现和怎样实现社会主义

工人阶级要求国家和行政管理民主化，企业民主化，并且要求把民主化扩大到一切部门，扩大到教育事业、体育、艺术和交通方面。工人运动在各个部门中都向前推进，这是由于它的全部本质和下列事实造成的，即它产生越来越多的在精神上也力争上进的分子，他们不满足于取得物质利益、提高收入，而是希望在精神上得到真正的解放。数目也许还不像我们大家所期望的那么大，但是进行学习、进行自我教育和精神上有大志的工人的数目正在不断增长。今天的确已经可以看到，许多工人表现出有能力由从事阶级活动进而担任帝国或各邦的最高职位。我是最不会奉承工人的。但是我敢说：工人运动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就是它向工人解释清楚并且使他们牢牢记住了什么是阶级觉悟。许多资产阶级和在座的许多人咒骂这种阶级觉悟，却不知道自己这样

做有什么意思。要知道具有完全意义上的本阶级的觉悟的工人，就是工人阶级的思想家。尽管我们的周围多么动荡不安，这一伟大的革命毕竟是比较平静地，我想说合法地进行着，这要归功于在我们的工人阶级中有大批这样的人。

在两星期以前在柏林举行的经济会议上，我对资本家说：你们常常咒骂工人运动，常常为它烦恼，但是现在你们看一看革命吧：我们在柏林经历的令人遗憾的冲突究竟是什么，天天举行的示威是什么？老实说，几乎没有任何人伤了一根头发。固然在这里或那里也出现了过火行动。但是整个说来运动是平静地，可以说是合法地进行的。原因何在？因为我们在革命以前已经有了工人运动，它把工人组织起来，它在政治上，在工会里，在一切可能的机构中教育了工人，使他们能够理解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国家生活，能够掌握社会上的相互关系，而不致像不懂得这些事情的工人那样瞎打一阵。

工人的阶级运动在一切领域内部要求按这样的精神改造社会，即消灭一切阶级区别并且由社会本身有计划地管理整个经济生活。我认为我可以这样说，这就是社会主义。它不是公式，不是图样，它也不仅是雇佣工人的事情。现代社会的广大阶层改变了自己的态度。有过一个时期，职员感到自己和老板一样，看不起工人。当我年轻时在一家银行做职员的时候，我有一个同事，他总是他的上司们的死对头，永远和他们作对。但是他接受不了这一事实：我是社会主义者，为工人操心。他是一个道地的柏林人，喜欢用柏林土话讲话。他老是用这句话来责备我：“鞋匠和裁缝关你什么事？”今天连银行职员的想法也已经完全不同了，更不必说其他企业的职员了。随着经济的发展，他们的境况也有了愈来愈大的变动。他们感觉到，他们的处境即使不是和工人相同，但已经相似了。这种发展还在继续。像职员一样，还有其他的社会阶层同这一伟大的通向社会主义的运动有直接的利害关系。社会地位的差别总是会有。为什么不应当有呢？只要差别不引起剥削，不导致压迫，那它们倒是使社会生活丰富化了。阶级差别应当消灭。至于个人的差

别、工作上、职业上和职业地位上的差别，这些不妨仍旧长久存在下去。

如果我把在这里所发挥的一切总结一下，那么我要给社会主义这样下定义：

社会主义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认识了自己的阶级地位和本阶级的任务的工人的社会要求和自然意向的总和。

为了解阶级的这些意向和任务，我们不需要从过去找到什么范例，我们不需要空想的虚构。每一个人都可以把未来的社会描绘得像他们所要求的那样美好，这完全可以听凭他任意幻想。但是运动本身从社会生活的现实基础，从构成运动的中心的那一阶级的实际需要汲取自己的力量和归纳出自己的目的。它根据这一阶级的需要提出自己的要求。而这些要求的总和——随便你读哪一个社会党的哪一个纲领——，**这些要求的精神总和、思想内容，我再说一遍，这就是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导致合乎目的的集体经济并且最终使社会机体全部成员的团结日益实现，导致社会的密切联系的实现。

正如我已简单提到过的，这当然是一个需要时间的过程。但是它是一个正在进行着的过程。在我看来，我们的革命所带来的巨大好处在于，它在德国清除了专制君主政体（以及与此有关的一切东西）和军国主义这两大势力，并且给人民带来了完全的民主。这个巨大的好处是被低估了的。如果人们从马克思在《资本论》这一著作的结尾所写的几句话得出结论说，他真正认为社会主义变革是在一个短促的时期内完成的行动，那么这是对对这些句子的极不成熟的理解。不，社会主义变革需要几年、几十年的时间。但是办法已经有了，无产阶级以及和它地位相同的阶级的巨大武器已经有了，即使他们在下一次选举时不能立即获得多数，就在那时我们也不会失败。民主选举权仍旧始终掌握在社会的最大阶级手里，而由这一阶级的阶级地位产生的坚持不懈的上进过程仍旧存在。所有这一切会作为动力而存在着，并且必然会把工人阶级所需要的改革争到手。至于要一下就实现这些事情，那么我们

的社会——你们去仔细看一下，到首都和其他城市去走一下，研究一下农村情况——，我们目前的社会太错综复杂了，这个有机体太富有生气了，它不是人们在任何时候都能够突然改变的死的机械。

再说一遍，我理解感染了许多人的那种急躁情绪。但是我必须补充说：我没有这种心情，而这不是因为 I 满足了，我渴望安静，而是因为我相信伟大的成就已经取得，工人阶级有自己的武器，它可以和古代伟大的物理学家阿基米德所说这句话的含意媲美：“给我一块立足的地方，我就要把世界翻过来。”工人阶级也可以这样说：“给我普遍和平等的选举权，作为解放的基本条件的社会原则就得到了。”20年前，当人们批评我讲过的一句话（我用不着在这里重复这句话）时，我写下了一段话，我在这里把它再说一遍。我在当时说道：

我的看法的结论是，社会主义的到来或将要到来，不是一场巨大的政治决战的结果，而是工人阶级在其活动的各个方面所取得的一整批经济和政治胜利的结果。不是工人所受的压迫、贫困和屈辱大大增加的结果，而是他们日趋增长的社会影响和他们所争得的经济、政治、一般社会和道德的相对改进的结果。我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从混乱中产生的，而是由于工人在自由经济领域中的有组织的创造同战斗的民主制在国家和地方自治机构中的创造和成就相结合而产生的。透过反动势力的一切抽搦和一切挣扎，我看到阶级斗争本身采取愈来愈文明的形式，我正是把阶级斗争即工人的政治和经济斗争的这种文明化看成实现社会主义的最好保证。

这是我在1899年写的，它今天仍旧是我的信念，今天有甚于任何时候。我意识到，我们将一步一步地比以前任何时候更快地（因为我们的阻碍减少了）但有组织地实现工人的要求，根据这样的认识我对没有耐心的工人大声疾呼：“我们已经争得了民主，即这样一种权利，关于它拉萨尔曾经对工人说过。它是你们的社会原则。要信任这一权利的创造力，它将比现代高度发展的国民经济这个如此敏感的机体的一切

可能的粗暴干涉更可靠地引导你们达到社会解放。”

因此我希望，对于那些还不了解社会主义并且对它抱有成见的人，我的解释即使不能争取他们信仰社会主义，但至少可以使他们相信，社会主义是指一个巨大的文化运动，这是一个不可阻挡的运动。这一运动集中表现为一个巨大的政党，在工人中间扩大社会启蒙工作，启发对国民经济的需要的理解，启发对那些为了继续推动社会沿着社会进步的轨道前进所必须采取的措施的性质的理解，它正是通过这些而为整体谋福利的。如果没有这一运动，那么我们今天所得到的就不仅是革命，而且会有无政府状态以及和它相连的一切恐怖。但是我们可以期望，这次已经取得巨大成就的革命将继续遵循有组织的进步的道路，以利于一切被压迫和受苦的人，以满足一切对以下的事有强烈兴趣并且热情关怀的人：把已经取得的成果进一步发展为以普遍的、在废除阶级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团结为基本原则的社会。

三联书店 1963 年版。根据 1922 年德国柏林德文第 2 版译出。殷叙彝、周家碧、李宗禹、李兴耕、耿睿勤译

历史和传说^{*}

上世纪 90 年代中叶，我曾为狄茨出版社审阅有才华的瑞士社会主义者路易·埃里梯尔的《1848 年法国革命史》^①一书。这促使我去略为仔细地研究迄那时止我只是很肤浅地了解的这次革命的历史。埃里梯尔的书是一部有分量的著作，今天仍旧值得一读。出版社对此书的装订是豪华的，它写得十分生动，内容比人们根据书名所能设想的更加丰富。它包含对路易·菲力普的资产阶级王国政府的形象逼真的描述，其中也对 19 世纪上半叶引人入胜的法国社会主义的历史作了完整的概述。但是此书也存在令人十分担心的缺点。埃里梯尔不幸英年早逝，他像许多激进的西部瑞士人一样是热情洋溢的说法语的瑞士人，他作为社会主义者固然同情法国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他对马克思学说的了解、特别是对马克思的历史理论的了解不够深刻，不足以使他对二月革命中事情发展的过程作出批判性判断，而目前德国的社会主义读者恰恰需要对这些事情作出正确的评价。他在叙述这些过程即二月革命中的阶级斗争时基本上遵循法国社会革命家的传统说法，认为只要在传

• 1921 年，伯恩施坦把 1897 年他为埃里梯尔《1848 年法国革命史》一书德文译本写的后记的第一章（《第二共和国是怎样崩溃的》，见本书第 25—63 页）印成小册子重新出版，书名改为“一次革命是怎样失败的”。本文是伯恩施坦为这个小册子写的前言。——编者注

① 书名全文为《1848 年法国革命和第二共和国历史的通俗描述》。——译者注

统叙述中的适当地方加上马克思在他的光辉著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对这些过程所作的批判性评论，就已经充分完成马克思主义历史著作家的职责了。

但是我自己愈深入研究二月革命，就愈加意识到，决定它的发展过程的冲突既涉及经济性质问题所产生的后续效果，也涉及未经充分研究的意识形态的影响所产生的后续效果。这些后续效果在一场革命即将到来的时候很可能在更加高的程度上危及革命的顺利发展进程。马克思在他关于从1848年2月到路易·波拿巴政变的法国事件的几篇论文中只是简单扼要地点出那些问题，对于那些意识形态更只是附带作了一些批评，却忽略了对事件进程作深入的说明，也未批判那些社会革命家的行为。这部分地是出于礼貌的考虑，因为这种批判必然要触及那些作为反动派胜利的牺牲者而被囚禁在监狱里或者被流放的人，部分地也是由于从他当时关于发展速度的观点本身来看，这种批判几乎是多余的。因此他的评论原封不动地保留了可以被称为二月革命的传说中的大部分内容。这一传说贯穿在马克思以后的全部文献中，严重妨碍了人们对有关的斗争及其政治意义的真正历史性质的认识，而这种认识已日益成为必要的了。

埃里梯尔的书首先是为德国工人写的，因此我认为有必要在传说会引导读者作出错误判断的地方，或者用注释或者用补叙的方式对我通过研究有关过程而了解到的历史真相作出补充说明。这些补充特别涉及对那一时代法国社会主义中的过激派别即当时被称为巴贝夫主义者的布朗基派及与他们观点接近的分子所引起的行动的评价。更加倾向改良主义的社会主义者或者在这些行动中被激进派当作死敌，或者确实未参加这些行动。我首先考虑的是1848年4月16日事件，那时布朗基派在一次作为巴黎的社会主义工人共同的示威而发起的游行中，企图背着发起人把它变成一次用暴力“清洗”临时政府中的资产阶级成员的行动，这次尝试导致多数非布朗基派的社会主义者参加了临时政府为反对布朗基派而招募的国民卫队。还有1848年5月15日疯

狂的插曲，那时在一次为支持波兰复国而举行的示威游行中，激动的群众在社会革命派俱乐部鼓动家们的影响下闯进国民议会。示威者驱散议员，宣布解散议会并成立他们一派人的新政府，结果是这一政府的成员和布朗基派主要领导人包括布朗基本人被捕。还有 1848 年 6 月 22 日的起义，它经过 3 天的流血街垒战斗以工人的彻底失败告终，后来又引起对工人的残暴的复仇行动；资产阶级和社会主义工人之间的阶级矛盾加深了，以致保王派的反动势力的影响日益扩大，终于使 1851 年 12 月 2 日推翻共和国的政变成为可能。

但是，除了这些评注以外，我还为埃里梯尔的书写了一篇后记，题为“从第二帝国到第三共和国”。这篇后记试图从社会主义观点论述法兰西第二帝国历史的几个发展阶段、它的兴起和灭亡之间的因果联系。我在这篇后记开头的一章中用短短几节文章概括地叙述了第二共和国失败的原因并且比在附注和补注中更加尖锐地清算了那一传说。我给这一章加的标题是“第二共和国是怎样崩溃的”。现在我认为应当把它作为单行本重新发表。

促使我这样做的原因是这一情况：尽管我们时代的德国同 19 世纪中叶的法国之间存在重大差别，尽管二者的经济结构、阶级结构和阶级组织差别很大，但是 1848 年法国革命的进程与 1919 年德国革命迄今的进程仍旧呈现出相似之处，从而为我们进行富有成果的考察提供了材料。在这两次革命中，某些口号几乎产生了同样的灾难性后果；某些场面重复出现，只有很小的差异；某些问题只是就它们所涉及的实在内容的规模来讲有差别，但是就本质来说，对共和国的发展几乎起同样的阻碍作用；各个派别内部的人们在性格和激情方面的差别是相同的，也因此引起了同样的矛盾和同样的分裂；这一切都是令人吃惊的。由于类似之处频繁出现，因此人们可以毫不费力地举出我们这次革命中在本质和影响方面与二月革命中起过灾难性作用的某些人物相当的人的名字。问题恰恰在于，1848 年二月革命表现了一种在一个重要之点上与以前几代的伟大政治革命不同的革命类型，而正是由于这一区别，它

表明自己是那种预期还会在先进国家发生的政治革命的原型。

我曾在我的著作《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革命党的任务》（斯图加特狄茨出版社出版）中指出这一点，给我带来社会民主党内修正主义的精神养父这一名称的就是这本书。我究竟在多大程度上配得上这一称号在这里可以不加讨论，因为对修正主义概念的解释是多种多样的。只有一点是正确的：修正主义力求为一种原则上改良主义的社会民主党政策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提供理论论证并且粗略地指明这一政策的基本方针。就这一点而言，它是我研究 1848 年二月革命历史的结果。这一研究给我以极其深刻的印象。它使我清楚地看到，先进的德国的一次政治革命将给社会民主党提出哪些问题；它也使我认识到，必须通过写作来促使人们既与传说本身，也与主要来自传说的那些口号和论证彻底决裂。一些人当时没有理解我，而现在，当我们真正面临 20 世纪的政治革命的问题时，他们将至少会懂得我为什么极其重视对这些问题的彻底讨论。但是我希望，本书对二月革命所作的阐述以及书后所附的关于当前应用的意见对于实际政策也不会是徒劳地写作的。

译自《一次革命是怎样失败的》1921 年斯图加特
德文版第 6—10 页。殷叙彝译

一个社会主义者的发展过程^{*}

童年和学生时代

我童年和少年成长时的环境以及我的青年时期并不特别有利于我向科学家方面发展。我出生于 1850 年 1 月 6 日，是一个子女过多的父母的第七个孩子。从出生时起，甚至直到 18 岁的时候，我都长得特别矮小，体质很弱。由于体弱，我也特别胆怯，并且除了在幻想的时候外，我还很自卑。当我相当早地学会阅读以后，晚上看书时总是躲在一间只点着一盏微弱油灯的房间的最远的角落里，因此我少年时就尝到了近视的痛苦。这一点再加上我的身体弱，又产生了这样的后果：我对自然科学的兴趣发展得很差。

我的双亲持家十分俭朴。父亲原来是在行会中受过训练的白铁匠，后来做了火车司机。他的收入当时即使只是按小资产阶级生活水平来养活一个一度达到十口人的家庭，也是不够的。我的双亲讲究体面，让我们在夏天也同冬天一样都穿上鞋袜并且送我们进较好的学校，因此在其他方面就必须更加节省。这一来，我就很少能像街道上的同辈朋友（他们在夏天都是赤足的）那样得到零用钱。但是，我的青年时

* 伯恩斯坦的这篇自传起初发表于 1924 年，见费里克斯·迈纳尔编辑的《现代国民经济学说的自述》德文版第 1 卷附录。——编者注

期虽然从某些角度来看忧虑重重，却并不算不幸福。

的确，我不得不常常听到人们当面议论我：“唉，他顶多再活一岁。”我已经 17 岁的时候，我们同院的一位邻居（那时我偶尔到他那里玩）当面对我说：“爱德华，您活不到 20 岁。”然而我不想说这些话引起了我很大的苦闷。它对我产生的不良影响只达到这样的程度，即在对我的智力发展举足轻重的那几年里夺去了我的任何进取心。一直到成年时我对我的生命从来没有信心，因此我抱着一种并不算太悲惨的听天由命的态度，过着懒散的日子。

我对事物理解力很强并且有相当好的记忆力，这就大大地助长了我的懒散。对于本来就已倾向于懒惰的人说来，这两者都是十分值得怀疑的天赋。我做学生的时候一帆风顺，因为我们要学的主要方面我一学就会，但是我在整个学习期间，从不懂得真正地、勤勤恳恳地读书和在思想上力求上进。

当然我当时也缺少任何一种思想上的引导。我的两位哥哥很早就离开家了，父亲的职业与母亲的家务劳动重担阻碍他们从思想上督促我。由于居住拥挤，兄弟姊妹互相打搅，妨碍我在家里进行脑力劳动，此外我还要做许多分散精力的事情。对于我这样大的年纪（或者不如说这样小的年纪）来说，去学校的路程是比较远的，我常常为了找一个同学而走更远的路，我还要为家里的事跑跑腿，做些别的事情。后来我同一位少年交了朋友，他的父亲有一所射击场，所需的材料是从一个为此而租用的花园里获得的。于是，有好几年的光景，我的一切空闲时间都为了帮他的忙而消磨在花园里或者射击场上。毫无疑问，长期在新鲜空气中生活与活动对我的身体是十分有益的。但是，在智力发展方面却受到了损失。我朋友的身体比我好，但他在思想上很佩服我，耐心地听我无穷尽地给他讲许多故事。但是我至今仍然感到不可思议，我到底是从哪里找到那么多材料的。因为我的父母亲谈不上有家庭藏书，我们没有古典作品，甚至我的一些教科书也是相当糟糕的。由于经济困难，这都是从旧书店里买来的一些破烂不堪的书，因此它们很少能

有使人感到非读不可的吸引力。我的同学不是住的离我太远，便是生活在另外一种环境之中，这种环境使我不可能同他们中的任何一个发展比较亲近的关系。在少年时期，我只有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出身的朋友。

在青年时期我虽然缺乏指导，然而也并不是没有受过任何激励而成长起来的。

精神激励和青年时期的政治印象

我的双亲都是犹太族的血统，并且都是犹太新教的信徒。这种教派在德国同犹太教的关系，就像福音基督教中的新教徒联盟和天主教中的革新派一样。它的教徒们把星期日作为每周的休息日，并且不遵守犹太人的饮食禁忌。他们的信仰是同 19 世纪中叶开明的自由资产阶级的意向一致的。对于神的信奉者来说，宗教已经成为过分理性的东西，它却还不能使批判的理性感到满意。当我达到在成长中的少年开始热衷于怀疑论观点的年龄时，批判的理性也在我思想里出现了。情感与怀疑一直在我心中交战。我还记得，我将近 16 岁的时候，有一次我在探望了一位同死亡挣扎的亲戚的病之后，在乘汽车回家的路上，由于内心激动而自言自语地作了祈祷：“敬爱的上帝呀！假若你存在的话，保佑我的堂妹吧。”

垂死者是我的伯父阿隆·伯恩施坦的一位女儿。我父亲狂热地敬爱他的哥哥，连我们这些小孩子也用敬畏的目光去看他。阿隆·伯恩施坦是当时拥有许多读者的《柏林人民报》的创刊人和多年的社论执笔人，是博得亚历山大·冯·洪堡和其他的著名学者很高评价并且被译成多种语言的自然科学普及丛书的作者，他也在广大群众中享有声誉。将近四十年来他过着名副其实的学者生活，1877 年在图宾根大学四百周年大庆的时候，他被授予荣誉博士学位。他也是犹太新教的奠基人之一，写了若干首赞美诗，并且在创教初期还作了几年传教士。在他发

表的批判圣经的文章中，特别应该提出的是关于亚伯拉罕、伊撒克和雅各传说的起源的论文，他认为这是由于宗教中心或者礼拜中心的形成与它们之间的竞争。

虽然我对他给我的一些鼓励很感激，但是他对我的思想发展并没有发生过什么值得一提的影响。这部分地要归咎于这一情况：由于我们的住宅离他太远，我很少到他那里去，虽然我感到他的第一个妻子的最小的儿子特别吸引我。然而最主要的原因是我在有名望的人物面前十分拘谨。当我在少年时期到他那里去，或者当他来看我们的时候，我简直是畏缩不前，避免引起他的注意，从来不敢向他提出一个真正的问题，而总只是远远地仰慕他。

学校也没有给我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课堂上的讲授有许多是我感兴趣的，但并没有吸引我去进行独立思考。在我 11 岁的时候，一位对于教学十分严肃的老师，有一次在回家的路上向我提出了一个引起我思考的问题：我这个不信仰基督教的人怎么能指望死后升天呢？我说，假若我是一个诚实的人，行为一向正直并且作了许多善事……这时他反驳说：“是的，假若你想去罗马的话，你是选择一条不方便的道路，穿过北极，越过半个地球，再穿过南极和越过南半球呢，还是选择一条直接的道路呢？”当时我没有注意到，他这样说并没有赋予基督教什么很高的伦理学上的价值。我沉默了，但是当我们分路以后，我思索了他所提的问题的意义，最后用如下的想法来安慰了自己：“假若耶稣基督是像福音书上所说的那样善良的话，他也会原谅我不是基督教徒的，要知道我是犹太族双亲的儿子啊。”

从这种辩解方式中可以看出，我不很反对相信福音。我作为犹太人虽然在学校中不需要上宗教课，但是我经常去旁听。我必须说，新约全书及其人物比旧约全书中的人物更强烈地吸引了我，后者使我感到十分陌生。由于犹太新教的教堂离我们的住宅太远，我们简直无法去参加一次礼拜，因此我星期天有时也到我们住宅附近的基督教的路迦教堂去。

我这种做法并没有受到父母的责备。他们两人都没有教会宗派的狭隘看法：我的母亲是出于强烈的宗教情感，我的父亲则对任何一种教派都是一视同仁的。他的这种态度使我放弃了在同那位老师谈话后所作出的一个勇敢的决定。我想，既然我是一个犹太人，起码应该做一个规规矩矩的犹太人，首先应该放弃吃猪肉的享受。想到就做到。我在一次吃饭的时候声明：“从现在起，我不再吃猪肉了。我们都是犹太人，对于犹太人来说是禁止吃猪肉的，因此我也不再吃了。”而我父亲是怎样答复的呢？他若无其事地说：“好吧，你别吃猪肉啦。”这种宽容很快就粉碎了我打算为宗教而作的牺牲。因此，后来我就更加如饥似渴地去掌握自由主义思想，这是我当时从德国古典作家的作品选读中接触到的。

在这以前两年，我就被引导去进行政治思考了。有一天我母亲拂拭一些装上框子的画像上的灰尘，它们一直被放在阁楼上，这时准备拿来装饰我们房间的相当光秃的墙壁。它们是从1848年到1850年的民主战士的肖像，每张像下面都用本人的一句名言作为题词。我读了所有的题词，但只有一条给了我较深的印象。有一个看来很像犹太人的肖像下面写着：“国王们的不幸，在于他们不想听信真理。”下面的名字是约翰·雅科比^①。我问母亲，这个人是谁？她回答说：“这是一个非常杰出的人，伟大的人民之友。”

于是，康德的这位品德高尚的同乡唤起了我的兴趣，他一直吸引着我。尽管他的名言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对政治的了解仍然太差，不可能从中得出什么结论来。然而一年半以后，当由于普鲁士王位的更动，我们必须把国王颂歌“祝福你，戴桂冠的胜利者”中的这句歌词

愿弗里德里希·威廉——
永远是你的人民的荣誉，
是人类的骄傲。

^① 约翰·雅科比（1805—1877），激进民主主义者，1872年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编者注

改为：

愿威廉国王——

永远是你的人民的荣誉，等等。

的时候，我大吃一惊。“难道任何国王，不管他是什么样的人，都必须用‘人民的荣誉’和‘人类的骄傲’来加以歌颂吗？”我这样询问自己，并且产生了对世袭君主制相当有害的想法。

1862年普鲁士发生了军事纠纷并且由此而引起了宪法纠纷，结果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反对派，它甚至也影响了我们这些年轻人。有一天在学校里，我们的老师——就本人来说这是一位十分善良的，在某些方面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人——上历史课时，引用席勒的话来反对法国革命和警告我们不要去读“政治性”的报刊。这时除了一个警察的儿子之外，我们全班都一致认为事实并非如此。大家用激进的语调讲述1848年发生的事件，看起来一次新的革命肯定不久即将到来。

反对派情绪自然并不妨碍爱国主义潮流的高涨，它反而从后者吸取了巨大的力量。因为爱国主义首先是针对德国问题，即德意志的民族统一，在这个问题上人民是不愿意信赖柏林政府的。不管符合事实与否，我们街道上的老朋友同我都认为有些德国的爱国歌曲，例如“守卫莱茵河”和“德意志高于一切”在普鲁士是被禁止的，因此大家傍晚就集合在地下室里偷偷地歌唱。我同两位特别亲近的朋友在外衣下面的胸前佩戴着象征德意志的黑、红、黄三色彩带。

1863年底什列斯维希·霍尔斯坦问题严重起来的时候，我们很自然地激昂地高唱“大海环抱着的霍尔斯坦”。我为战争结束后还乡的将士们写了一首模拟阿伦特^①风格的诗，朗诵给和我接近的同学们听。我让一位好友看这首诗，但他立刻把它给了级任老师，这使我害羞得落了泪。然而老师安慰我说：“你不必为这首诗害羞，从语言、结构和思想内容上来讲，你完全值得骄傲。”这一友好态度并没有阻止我在不久以

^① 恩斯特·莫里茨·阿伦特（1769—1860）德国的爱国者和诗人，1813年抗法战争中著名领袖之一，写有许多歌颂自由的诗歌。——编者注

后感到他所作的一个决定很荒谬。这件事很能说明我当时的思想。他在上德文课时让我们自由选择我们需要背诵的诗篇，但是从其中删去了一些，例如席勒的《托根堡骑士》。这学期开始时，他在我们的禁书单上又增添了卡尔·西姆洛克^①的叙事诗《愚人》。学期结束的时候他给我们这样解释说：“在这首诗中丹麦人演的是高尚的角色，但是我们同丹麦人打过仗，因此你们不许背诵它。”尽管我有着强烈的爱国心，尽管我恰好特别尊重我的这位老师，我仍旧认为他这样做是非常愚蠢的。个别事件同国与国之间的战争有什么联系呢？

大致说来，1866年的普鲁士对奥国和德意志同盟的战争并没有引起我的注意，我认为这与其说是民族的事情，不如说是政府的事情。但是当1870年普法战争爆发的时候，我又是满腔热情了，这不是反对法兰西人民，而是反对法国政府以及拿破仑第三。我读过关于他在1851年进行政变的记载，因此我一直仇视他这个扼杀1848年共和国的凶手。“不许拿破仑取胜，假若我们打了两次败仗，我就去报名当志愿兵。”我这样写给当时正住在乡下的亲戚家里的知友威廉·巴丁。他的回答却冷静得使我吃惊。他说：“你不应过早地动火，难道我们确切地知道北部地区真正发生的事情吗？因此，要保持心平气和。”但是，我只是当拿破仑第三在色当被俘和在巴黎宣布成立共和国以后才恢复到像他所希望的那样平静。按照我的看法，战争一定会从此结束了。既然事实并非如此，我对它以后的进展就完全失去了兴趣。我根本不再阅读战场上来的报道了，因此在巴黎公社出现的那些日子里很少知道它的消息。虽然如此，一年以后我就参加了一次纪念公社的会议。那时我已经是社会民主党员了。

^① 卡尔·西姆洛克（1802—1876）德国诗人和日耳曼文学家，曾译过著名的《尼伯龙根史诗》，著有《莱茵河童话》等作品。——编者注

加入社会民主党

1871年10月，布劳恩施魏克的军事法庭对德国社会民主党一个派别的领导人进行审判，因为他们一年前，即在色当战役之后，呼吁结束战争和反对为武力吞并阿尔萨斯—洛林所掀起的运动高潮。根据福格尔·冯·法肯施坦将军的命令，他们被当作所谓的叛徒加上刑具押送到东普鲁士的罗镇监狱关了7个月。但是，在审前侦查时已经证明对他们蓄意叛国的控诉是毫无根据的，于是他们就为了妨害国家治安的莫须有罪名而替自己辩护。经过几天的审讯，他们被判了相当长的徒刑。在他们上诉后，最高法院才把刑期大大减少，并且认为审前拘留已满刑期，这事实上是释放了他们。

柏林的所有日报中，仅有一家对这次审判发表了比较详细的报道，这就是不久前激进的民主人士创办的《民主报》。巴丁和我以及几个朋友共同订阅这份报纸，这主要是因为领衔署名为它宣传的是我们非常尊敬的约翰·雅科比。巴丁是麦尔克农业区一个小农的儿子，由于和我思想很一致而成了我的好朋友，直到他几年前去世为止。我们非常关切地注视这次审判的细节，它使我们看到，社会民主党完全不是柏林报刊所描绘的以及在柏林占优势的拉萨尔派支部的行为所表现的那个样子。从此我们就更多地关心运动了。1872年初，我们在一家酒馆里认识了社会民主党人弗·威·弗里切（曾任国会议员直到1871年）之后，就邀请他到我们的交谊会（这是我们同另一些人一起创办的，按照托马斯·莫尔的政治小说命名为“乌托邦”。但是关于莫尔，我们只知道他描述了一个天堂式的公社）来作关于社会主义的演讲，他照办了。

为了对社会主义有所了解，我已经买了拉萨尔的论争性著作《巴斯提亚得·舒尔采·冯·德里奇先生》和杜林著的《国民经济学与社会主义批判史》。但是我在后一著作中看到的社会主义并不能使我对它产生热烈的兴趣，而拉萨尔的论争性著作，由于用语过分激烈，不如说使我

感到厌恶。这时我们从弗里切那里更详细地了解到使当时德国社会民主党分裂成两个斗争很激烈的派别——拉萨尔的全德工人联合会和爱森纳赫纲领派的社会民主工党——的争论，关于后者最杰出的领袖倍倍尔与威廉·李卜克内西以及他们这一派同国际工人联合会（它的原则和政策特别吸引我倾向社会主义）的关系的材料，我们是曾经多次读过的。

此外还有什么是我这个虽然不算资产阶级，但毕竟也不属于无产阶级的人对当时那样表现出来的社会主义产生热情的呢？拉萨尔的由国家贷款给生产合作社的理论与其说是一个激动人心的目的，不如说是一种鼓动手段，《爱森纳赫纲领》则除了包含从国际工人联合会的章程中引用来的条文以及资产阶级民主的要求以外，仅仅还有对国家促进合作制度的很不确切的要求，人们可以对此作十分美妙的遐想，可是毕竟不能受到激励。但是，国际主义！

在战争期间，虽然我全心全意于德国的事业，但是恐惧重新侵袭了我，我怕的是，每次战争以及由于战争而确定下来的民族意识会伤害人们的情感。正因如此，倍倍尔、李卜克内西这些人在战时和战后所持的态度更加使我感到敬佩了。

不久以后我便亲自认识了倍倍尔。1872年3月，他同李卜克内西和阿道夫·赫普纳（后者是李卜克内西主编的爱森纳赫派机关报《人民国家报》的助理编辑）被控蓄谋叛国，在莱比锡受民事陪审法庭的审讯。尽管连谋叛的痕迹都无法指出，倍倍尔与李卜克内西还是被判处两年徒刑。倍倍尔在入狱之前，作为社会民主党在1871年3月大选失败后国会中的唯一代表来柏林参加国会的一次会议，他借这个机会到一个由爱森纳赫派社会民主党人组成的民主工人协会的庆祝会上发表演说。这已是足够的理由使巴丁、我和其他两位思想投合的朋友弄到了入场券，到柏林北区残存的城墙旁边的一家酒馆里参加庆祝会。

使我们吃惊的是，这间可以容纳400人左右的大厅仅仅坐满了一半。何况倍倍尔的确已经是一位知名的政治家了，几乎所有的柏林报

纸都登载了持续整整两周之久的叛国案审判的报道。左倾激进分子的报纸也经常怀着一定的敬意来谈论倍倍尔这位人所周知的辛苦谋生的忠厚旋工。然而，他的名字竟没有较大的吸引力，的确是令人奇怪的。但是对我们来说，却因而有了进一层的理由加入这个以它的两位最重要的领袖为代表而受到不公正判决的党。

因为我的伯父当时正在《人民报》上猛烈地攻击社会民主党，我的入党几乎被认为是一桩大事，对于倍倍尔说来，我就像是一个奇人。他在庆祝会上的讲话虽然朴实无华，但也并非没有热情。在庆祝会结束之后，一位年轻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当着我的面私自向倍倍尔提了这样一个问题：按照他的意见，什么时候能够开始他们所希望的革命呢？这时隐藏在他心里的乐观主义显露出来了，他回答道：“哦，我认为最迟约需 20 年。”

银行职员和鼓动员

那时我在一家银行里工作。我最初进的是一所 7 年制的私立学校，毕业之后，就我的年岁说来我的身材还嫌太小，并且体质很弱，因此我没有立即就业。我被送进一所 9 年制完全中学，学费是一位同我母亲家里有一点亲戚关系的富有商人资助的。我母亲方面有几位很富有的亲戚，但这是三代或四代以上的远亲，已经没有什么来往了。

由于入学考试时做了一件蠢事，我没有能插入第四年级（虽然那一年的大部分课程我都熟悉），还要从二年级读起。这就使我在思想上完全放纵自己。我比较差的功课只是当时文科中学（我进的是柏林弗里德里希·维德尔中学）不重视的那几门。我最好的功课是语文与数学，这两门是没人赶得上的。在私立学校中学过的那几门课程，现在在四年级甚至在五年级都几乎没什么可学的了，这一点对我产生了很不好的影响。到了六年级，就暴露出我的知识有严重的缺陷，我对我的上帝般的智慧（请原谅我这样说）发生了怀疑，这使我大为震惊，因而我竟

向父亲让步，同意不继续求学而去从事商人职业。由于一位舅父的努力，我被古滕塔克兄弟银行收为学徒。在四年的学徒期间我在那里学到了不少东西。我开始做学徒是在 1866 年的晚秋，由于美国内战与普奥战争的影响，柏林的银行界正盛极一时。美国与奥国的货币利率高而行情低，做这两种货币的交易和投机是一桩有暴利可图的买卖。那时订下了几笔定期的、性质十分复杂的生意，要想做好非要具有一定的数学才能不可。我的上司对此有独特的天赋，我也乐于致力于此。尤其重要的是，后来我的上司改做同维也纳与巴黎的汇兑业务，因而我有机会进入银行业务中公认为最重要的一门工作。此外我还学到了用不同国家货币记联合账目的方法。这本来不需多大能耐，但是在当时还算是一种本领呢。

也许应当在这里说一下决定我后来精神活动偏向的那一思想素质。

我基本上是一个擅长分析的人，而且是相当片面地只会分析。综合性的思维与总结对我来说是困难的。我现在还记得的在中学发生过的一件事情，可以说明这一点。有一天数学教师给我们讲解了一种计算方法，然后让我们用它来解答一个问题。结果能交上正确答案的只有我一个人。但是，当老师为此赞扬我的时候，我却害羞地拒绝说：“先生，我并没有按照您的方法来解答这个问题。”他回答说：“没关系，应该会找窍门。”但是，我找到的是什么样的窍门呢？我把题目分成若干部分，毫不费力地解答了每一部分，然后也同样容易地获得了总的答案。这不失为有效的办法，但是在这一场合，掌握前面讲的方法要比找出答案重要得多，我同其他同学一样都没有做到这一点。这表明，在综合思维方面我并不比他们强。

下国际象棋也是一样，我曾经有一个短时期十分贪玩它。一般说来，我的开场几着是很蹩脚的，总是在我比对手多丢掉了一名将官并且因而必须为了有限的目的而集中精力的时候，我的棋才开始下得比较顺利。

学徒期满之后，我的上司把我介绍到魏玛的一家银行刚刚在柏林设立的分行作书记。我在那里没有待多久，1871年夏天转到了S. & L.路特希尔德银行担任同样的职务。它是一家从威斯特伐利亚迁来的企业，在位于莱茵河畔的科隆城还有分行。我在这家银行里工作了7年之久，在那里经历了从1871年至1873和1874年间的所谓建设年代，经历了结束这些年代的交易所倒闭风潮以及随之而来的整个商业生活的长期停滞。我对于同这些年的建设难解难分的交易所舞弊的亲身体会，大大促进了我加入社会民主党的思想准备。可以理解，我当时还只是从纯粹道德方面来判断这些事的。我同大家一起认为与建设相联系的谋取暴利的勾当——主要是把工业企业转为股份公司——是事件的主要内容。最初的一些建设确实是由于货币充斥市场、由于战争结束后开始的巨大繁荣以及因此而产生的扩大企业及其经营资本的必要性所引起的，所有这些建设的表面上的好运像号声似地引诱人们去模仿它们。这样一来，自然就出现了不同形式的资金过多的现象，把股票价格抬高到不应有的地步。那时的柏林报纸或者他们的商业栏编辑们则昧着良心，长时期地发表一些粉饰太平的文章来给这种不法行为火上加油。他们被公司发起人通过贿赂收买了。这无论如何都是极不正当的，并且是以后的合股法所禁止的。贿赂的形式是：或是报社的社长，或是商业栏编辑名义上认购一定的股份而参加公司发起人集团，并且在股票在交易所上市的时候将分到他名下的股票按照——人为抬高的——上市行情“出卖”。这样他就可以得到入股金额和卖出价格之间的差额作为“利润”。我了解到这些勾当的细节，因而深信资本主义经济已彻头彻尾地腐朽了，我的社会主义的信仰也因此更加巩固了。^①

^① 在德意志帝国初期，自由主义的报刊控制着舆论，因此被选中的大多数是自由主义的报纸。然而保守派的报纸也并不蔑视“交易所犹太老板”的殷勤。我还经历过如下的事情：当我的上司在交易所发行一种实业证券时，一家极端保守派的周刊的老板长时间等着他接见，这是为了即使分不到股份的话，起码也要搞到一个整版的广告。为了达到另一些与交易所有关的目的，经常有普鲁士高级贵族在我的上司那里出入。

作为社会民主党党员，我较快地能够出面作鼓动工作了。由于一次偶然的机，我参加了后来被尊为党的最英明的代表之一的伊格纳茨·奥艾尔所领导的小组，这个小组成功地做到了给柏林爱森纳赫党人所进行的十分教条的宣传带来生气。奥艾尔当时还是一位普通的制鞍工人，但是正届精力旺盛之年，就是他把我当作鼓动家而“发掘”（可以这样说）出来的。我担心自己也会像和我同年的一位也是商人出身的同志一样，每讲完一句话就要重新修饰一次，以致把一篇发言弄得结结巴巴，因此我起初踌躇不定，甚至不愿在辩论时发言。有一次我终于忍不住讲了话，这时奥艾尔发现我有鼓动的潜力，他根本没有问我就把我的名字列入我们协会下次会议发言人的名单。这样我就像无师自通的游泳家一样学习了演讲。没有多长时间，我作为演讲家就能满足当时人们对于党的鼓动员所提出的要求了。当然，我从来也没有能成为真正的群众演说家，因为我在讲台上首先缺少内心的镇静，缺少只有群众演说家才具有的泼辣的风趣与效果强烈的对比。除了风趣之外，我的演讲虽不乏热情，然而尚缺文采。我尽量用实事求是和通俗易懂来弥补以上两方面的缺陷，与其激起针对个人的热情，不如鼓舞人们去从事积极的任务。尽管我有那些缺陷，但通过以上的方法我取得了一些鼓动的成绩。

然而我从来也不是拿薪俸的党的鼓动家。相反，我在银行里充当职员所得的薪水使我能够幸运地无报酬地为党服务。我把全部身心献给了党。我几乎花费了全部业余时间来实现我的政治信念：或是用在党员大会、党的委员会上，或是用在柏林广大郊区的鼓动宣传上。为党而奋斗与参加同拉萨尔分子的小规模斗争的兴趣占据了精神，使我长期没有产生同时进一步研究社会主义理论的兴趣。

1877年德国社会民主党柏林组织在约翰·莫斯特的领导下在一些大会上宣传退出地方教会的时候，作为一个犹太人，我认为有义务和我的作为基督徒长大的同志们一样按照受到的迫切劝告行动，于是我正式退出了犹太人的宗教团体，事实上我同它早已没有什么联系了。面

对着不久以后发生的反犹宣传，我却从来没有忘记我在道德上从我的犹太出身所得到的好处。

在杜林和马克思之间

在两党统一以前的时期，拉萨尔派与爱森纳赫派之间的斗争并没有引起重大的理论辩论。我们爱森纳赫派的成员把拉萨尔看作马克思的一个学生，他把马克思的部分思想用通俗的语言介绍给群众，同时也在一些方面把它庸俗化了。威廉·李卜克内西——我们认为他是解释马克思的权威——就是这样看待这两个人之间的关系的。当我读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并同以前读过的拉萨尔的《工人纲领》对比之后，也是这样认识的。坚持用国家贷款建立生产合作社的计划和根本不乐意过问工会工作的那种教条的拉萨尔主义当时已在趋于衰亡。1870年以前李卜克内西同拉萨尔的门徒之间关于德国问题的激烈争论，由于在普鲁士的领导下建立了德意志帝国而失去了对象。代替一方是马克思，一方是拉萨尔的战斗口号，似乎出现了另外一个战斗口号：杜林为一方，马克思和拉萨尔为另一方。对此我是要负不少责任的。

1872年深秋，欧根·杜林的《国民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教程》一书出版了。它使我对这位失明的学者的兴趣大为增加，他写的《国民经济学与社会主义批判史》我是早已读过的。他在这本书中坦率地表示信奉社会主义，他用来说教的那种实用主义与实证主义的形式很中我的意，尤其是因为自从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社会主义在德国还没有对社会主义运动的基本思想和目的提出任何概括性的表述。宣言本身仅仅包含一些概括性的论断，这些论断，在我看来已不能满足运动目前所达到的水平的要求了。我受到杜林著作的鼓舞，把它介绍给其他的社会主义者，他们的反应几乎都同我一样。

在最初的几个人中就有奥古斯特·倍倍尔，1873年夏天我到他被

监禁的胡柏尔图斯堡探望他，乘这个机会给了他一本《教程》。他读过这本书之后写了一封热情的信给我。为了祝贺这本书的问世，他于1874年春天在莱比锡《人民国家报》——社会民主党爱森纳赫派的机关报——上以《一个新的共产主义者》为题发表了一篇文章。后来，这本书同样也吸引了知名的鼓动家约翰·莫斯特（我同样也赠给了他一本）和爱森纳赫派的其他领导人。

杜林在他论述社会主义的著作中对于马克思与拉萨尔的辛辣的批评并没有削弱我们对他的信仰。一位果断的科学家挺身而出做社会主义的见证人，而且力求用比马克思的著作易懂得多的语言与形式来叙述社会主义——和这事实比起来，我们认为，他同《资本论》作者之间的理论分歧是不重要的。当倍倍尔打算在《人民国家报》上称赞杜林而遭到威廉·李卜克内西的反对——他指出了杜林与马克思在方法上的重大区别作为反对的理由——的时候，他写信给我说：“我不管什么方法不方法，只要本质是好的就行。”当时在社会民主党中只有少数人懂得科学地评价这种区别。甚至连我们心目中的马克思理论的权威解释者威廉·李卜克内西自己对此也从来没有发表过比较确切的见解。我们每一个人必须自己弄清楚究竟杜林对马克思的批评有多少是合理的，这些批评有多大意义。

在这方面我只能说，马克思的批评者杜林没有使我产生足够的兴趣去详细地研究他对马克思的吹毛求疵。这里很清楚地暴露出，个人成见与种族仇视在其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由于受到后者即对犹太人的敌视的迷惑，他全盘地指责了属于犹太族的人——用不公正这个字眼来形容这种指责似乎还有些过分温和——，但我认为这个遭受冷遇而心怀不满的人产生这样的敌视是可以宽恕的，尤其是因为那时犹太族的一定阶层在德国爬上去的方式的确是连许多犹太人，包括我在内都感到厌恶的。但是正因如此，我对杜林在论及犹太人时所下的判断的客观性就更加怀疑了。

尽管如此，我仍然把他看做是一位社会主义者。在我看来，他用其

他任何人所不及的科学的激进主义补充了马克思，也可以说继续了马克思。让人们说这是折衷主义也罢，是别的什么也罢，我认为社会主义运动的范围完全可以同时容纳下一个马克思和一个杜林。对于杜林所提出的问题，其中有一些我虽然在思想上有自己的看法，但我认为尚未达到值得公开发表的科学水平。杜林最使我称心的，是他对社会主义中的自由主义因素的有力强调。对各个自由党派的敌视使许多社会主义者盲目地将一些德性归之于国家，人们固然可以将这些德性同国家的概念联系起来，但是我们必须与之打交道的国家实际上并没有表现这些德性。固然也有些社会主义者懂得这种对国家的迷信在政治斗争中会产生什么样的危险后果，从而对它进行了斗争。但是这种由于考虑到时机是否适宜而作出的否定是不能满足我的。我认为，问题在于警告工人，不要期望他们即将夺取的那一国家会在短暂的时间内，将现代国家的整个经济机构自上而下地通过法律、命令和中央机关而发展到有高度经济效率的程度。在马克思所草拟的国际总委员会关于法兰西内战的备忘录中可以看到，这不是他的意见。如果说杜林仍旧要把这当作马克思的意见，那是由于他不知道那一文件中的有关的一章（第三章）。但是，即使在社会民主党内部，这一文件所引起的注意也没有达到为了衡量它的重要性所必需的程度，因此杜林对这个问题的论述对我的社会主义思想产生了更加强烈的印象。但是，当他在1877年被免去柏林大学的职务之后向社会民主党宣战的时候——因为党不愿意毫无保留地支持他——我在个人关系上就和他疏远起来，并且对他此后的文章也失去了兴趣。他的行为和他自称代表的美好原则之间矛盾太大。他所做的事中有一件是，他支持在社会民主党内部进行一种宣传，即竟然要求禁止党的中央机关报编辑部继续刊登弗里德里希·恩格斯针对杜林假想的科学革命而发表的连载论文。我向进行这种宣传的党内朋友们声明，我作为尊敬杜林的人恰好不能参与这种宣传，因为人们可以根据这种宣传证明他并不高明。当我听见杜林亲口说他并没有拒绝这种宣传的时候，我是大吃一惊的。

马克思主义者

1878年夏天，我接受一位富有的青年社会主义私家学者卡尔·赫希柏格要我做他的文学秘书的邀请，辞去了我在银行中的职务。赫希柏格在一年前就为了推动社会民主党的精神生活和促进社会主义理论的加深而创办了社会主义的半月刊《未来》。慢性肺病迫使他移居南方，因而我最初同他一起在鲁加诺附近的布朗峰度过了1878年和1879年之交的冬天。在那里我读了一些书，并且连续阅读了恩格斯对于杜林的批判，它教导了我，使我认识杜林如何从根本上错误地阐述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观和社会观。这些观点在我看来在一切基本方面都是不容争辩的，它们因而成了我的社会主义信条。

这使赫希柏格感到失望，因为他固然绝对不是杜林的信徒，但同样也不是马克思的拥护者，他在哲学上是形而上学者，在社会学上是伦理社会主义者。虽然只要我们的辩论一接触到理论领域，就往往进行得不很愉快，但是，总的说来我们的关系还是友好的。赫希柏格是一个宽宏大量、品格高尚的人。正当社会民主党被俾斯麦强加以非常法并遭到它的全部力量的压迫时，他抱着高度的自我牺牲精神照顾了党，并在很大程度上帮助党不受严重损害就度过这一法令下的困难时期。他总是把他特有的、意在改变鼓动风格和强烈突出目的的伦理基础的愿望服从于改善党的状况以及增加它在文字方面的力量的意向，因而痛苦地放弃了采用除了论证自己的信念以外的其他手段进行活动的每一尝试。他为在德国失去刊物的党献出了在国外创办一个机关报并把它维持到能自给为止所必需的大部分资金，但是从来没有要求决定性地干涉这一报纸、即1879年于苏黎世创办的《社会民主党人报》的编辑工作。当他创办的《未来》受到反社会党人法的摧残后，他在苏黎世用路德维希·李希特尔的假名出版了《社会科学年鉴》，并在莱比锡用R.F.塞伊费尔特的假名出版了《政治经济文丛》，他邀请社会民主党的成员

来为他所创办的这两个杂志撰稿，不管他们的基本理论观点和对于党的策略问题的态度如何。《年鉴》是鲜明的社会主义刊物。它刊登了社会主义者写的论述社会主义的文章，出自社会主义者笔下的关于书市上新出版的、同社会主义运动有重大关系的书籍的评论，大多由当地社会主义者的有名代表人物执笔的关于各国社会主义运动的进展的报道。必须迁就反社会党人法的审查的《政治经济文丛》着重研究经济实践和社会政策实践、国民经济和阶级结构的发展以及民法和政治改良等方面的问题，所有的文章都是社会主义者写的。我是在这一杂志和《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开始用各种笔名尝试写作的，同时我担任了《年鉴》的报道部分的编辑工作。

在《文丛》以及后来在《年鉴》的撰稿人中还可以找到卡尔·考茨基，开始时他只用姓名的第一个字母署名。考茨基是赫希柏格为了一件更为重大的工作请到苏黎世来的，他被要求在那里以固定的年薪专门从事社会主义的科学研究和写作活动。在后一方面，赫希柏格对他所抱的期望比我更多。像现在一样，那时考茨基就已是一位比我著述更加丰富得多的工作者。他是赫希柏格的上述杂志以后几期最卓越的撰稿者。然而他同时又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理论和社会理论的忠实信徒。赫希柏格懂得怎样在哲学上同这一情况妥协，但它对于我的思想发展却有着巨大的意义。

如果说有什么东西加强了 my 信念，那就是考茨基同我之间在共同思想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密切友谊。我们特别在这一方面互相补充：我同实际运动的联系比他多，而他在科学上的造诣达到了我完全不能与之相比的水平。如果说在论及我们每个人过去的发展（这对于我们的思想关系说来是很重要的）时这一点已很显著的话，那么，由于下列事实它就更为加重了：在 1880 年和 1881 年之交我受命接收苏黎世《社会民主党人报》的编辑工作，而这一报纸已成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斗争机关报，因此我必须研究日常斗争的各种问题，但是考茨基则在 1882 年底创办了当时还是月刊的科学性杂志《新时代》，这一杂志致力于研

究运动的理论并从而成了它的精神生活的中心。这一来对于我说来就产生了一种危险：看不见运动中较深刻的问题的意义以及在忙于处理日常问题的同时逐渐完全庸俗化。不错，奥古斯特·倍倍尔和我在1880年12月到伦敦访问了马克思和恩格斯，这次访问起了这样的作用：在我接受了《社会民主党人报》的编辑工作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开始同我进行友好的书信来往，而在马克思活着的时候，恩格斯多半是受他的委托而写信的。但是这几乎都是围绕着政治问题和政治策略问题的。从导师们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固然可以推论出他们关于现代社会发展理论的某些片段的意义和作用，但是我们之间毕竟没有特别就此进行过讨论。与此相反，同卡尔·考茨基之间口头的以及后来书面的交往却推动我进行理论研究。他和我认为重要的是首先使自己在理论上得到加强，其次应当特别促进党内对于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以及由此产生的对斗争的结论的理解。我们捍卫了这一学说，反对当时党内还严重存在着的空想社会主义和自然法社会主义偏向的残余，同样也反对看来在党内普遍存在着的、由于用马克思主义的口号装饰这种偏向而产生的思想混乱。当我们在难忘的共同工作的日子里把马克思反对普鲁东的论战性著作《哲学的贫困》译成德文后，我们在前一种斗争方面受到了非常有效的启发。同样，参加由考茨基负责，并大部分由他独立完成的著作《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狄茨国际丛刊第二册）的工作，使我也颇受教益。因忙于《社会民主党人报》的事务，我只能为这一书撰写很少几篇，然而考茨基希望我以合著者的身份在书上署名，他把刚写完的手稿从他那时居住的伦敦陆续寄给我阅读，这促使我们就一系列理论问题交换意见。由于考虑到出版问题，不能在封面上标明我的名字——还存在着非常法，并且我作为在德国遭到禁止的《社会民主党人报》的编辑正在受到控诉——考茨基因此在那一本书的序言中对我的协助致谢。但是他在那里对于我的感谢大大超过了我所应得的。在通信中他多半是给予者。同样，考茨基其他的解释马克思恩格斯学说的著作，无论在实用方面或是在论争方面都比我强，在这方面他

的《新时代》的编辑的地位是有帮助的。然而只要有机会,我仍旧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向读者阐发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及其政治运用。我想附带指出,我的文章往往署名“列奥”,有时也署名“维特留斯”。

考茨基和我在宣传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的时候,得到了奥古斯特·倍倍尔的热心支持。倍倍尔在70年代的下半期同样转向了这个学说,并且不放过任何捍卫它的机会。随着1873年至1874年的股票猛跌而在德国产生的商业萧条的强烈性和长久持续性,特别加强了他和我对于这一学说的正确性的信念。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第二版序言^①的结尾曾预言了这一危机,那里是这样说的:

“使实际的资产者最深切地感到资本主义社会充满矛盾的运动的,是现代工业所经历的周期循环的各个变动,而这种变动的顶点就是普遍危机。这个危机又要临头了,虽然它还处于预备阶段;由于它的舞台的广阔和它的作用的强烈,它甚至会把辩证法灌进新的神圣普鲁士德意志帝国的暴发户们的头脑里去”。^②

这是在1873年1月写的,并且被事实证实了。这给了我们极深刻的印象。整个70年代下半期德国的营业萧条没有缓和下来,在80年代经过短暂的间歇后又重新爆发了。它从德国扩展到英国,然后席卷了法国,美国也经历了一个严重的停滞和失业时期。扩大了自己的旋工工场并在一年中有一个月自己作推销员的倍倍尔在他所接触的商人中间发现了对于经济前景的极大的悲观情绪,并由此作出结论说,资本主义社会在很短时期内就会完全崩溃。我也对日报商业栏的报道以及像1882年“彭杜破产”^③那样的事件作了同样意义的解释。

不言而喻,在我们评判社会民主党所遵循的政策时,这种对于我们面临的发展前景的看法必然会起使我们激进化的反作用。此外,由于

① 应为跋。——编者注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3页。——编者注

③ 保尔·欧仁·彭杜(1824—1904),法国工程师和金融家,曾在巴黎创立“总联合公司”进行投机。1882年公司倒闭,引起许多企业破产。——编者注

我感到自己有责任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尽可能尖锐地把处在非常法下德国社会主义工人的不满情绪如实地表达出来，这个报纸（它终于突破边境检查一星期一星期地在德国成万份地传播）就使德国的当权者非常冒火了。他们对瑞士的外交代表透露了这一点，于是报纸的编辑部包括作为编辑的我在内就在 1888 年 5 月被驱逐出这一国家。

“我很幸运”。我们迁居到伦敦，在那里我不仅有可能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保持频繁的个人交往，而且也有可能反社会党人法被取消以及《社会民主党人报》的使命也因而完成后，在不列颠博物馆的巨大图书馆中工作。1890 年 9 月末这一报纸停刊，我成了已改为周刊的《新时代》的经常撰稿人。

关于我在投稿的最初几年为这一杂志所写的篇幅较大的著作，我认为应当提到《论工资铁律问题》（《新时代》，第 9 年卷，第 1 册，第 294、337、349、503、529 和 600 页）和《无政府主义的社会学说》（同上，第十年卷，第 1 册，第 358 和 421 页；第 2 册，第 589、618、657、772 和 813 页）。在我打算以后扩充成书籍形式出版的上述最后一著作中，我认为我已经依据麦克斯·施蒂纳及其辩护者约翰·亨利·马凯^①、比·约·蒲鲁东、米哈伊尔·巴枯宁、彼得·克鲁泡特金的主要著作指出，所有这些无政府主义者的学说或者完全忽视了资本主义生产在发展中给予人民经济生活和阶级结构的变革性反作用，或者根本否认这种反作用对于社会主义的重要意义。论工资规律的文章指出，斐迪南·拉萨尔援引政治经济学中自由主义学派的著名代表人物而得出的（而且如果只考虑他们的理论也理所当然会得出的）所谓工资铁律，并不是以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的经济为前提，而是以大工业前阶段的经济体系、即手工工场时期的生产方式为前提的。在亚当·斯密及其英国先驱者那里，在让·巴·萨伊以及其他法国人那里可以很清楚地确证这一点，马尔萨斯的学说也是以这一个经济时期为基础的。李嘉图才认真地考察了大工业的社会经济

^① 约翰·亨利·马凯（1864—1933），德国作家，曾出版过《施蒂纳著作集》，著有《无政府主义者》、《施蒂纳传略》等书。——编者注

反作用。但是他在他的主要著作以后的版本中，还是修改了他关于工资规律早先的表述方式。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对我的这一著作很感兴趣，关于这部著作就说到这里。可以这样说，我在这本书中还是严格地根据马克思的观点来作出论断的。但是，当我写完最后一章时，我已经看清楚，马克思对问题的研究从经济史方面说来还没有达到足够的广度，还不能对它在先进的工会组织和社会政治立法的影响下的表现形式提供详尽的知识。我曾经想用这个观点重新研究这一问题（10年后，当我出版《关于社会主义的历史和理论》文集时，我在增补的两章中做到了这一点），但是为了从事另一些重大工作，我首先不得不把它搁下。

这些工作就是出版《斐迪南·拉萨尔的演说和论文集》和写作《英国大革命中的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斯图加特和柏林版，现已出第4版）一书。我为《拉萨尔演说和论文集》写了一篇长篇导言：《拉萨尔及其对于社会民主党的意义》，1919年在改写以后由保尔·卡西勒公司以《斐迪南·拉萨尔。对导师和战士的评价》为书名出版单行本并转交给《前进报》出版社。此外，我还写了长达8印张的文章《既得权利体系概论》，我在其中力图根据拉萨尔主要著作中最重要的部分对他的目标、理论原则、思想过程和科学成果作一客观的概述。我对于他的批判态度则已在导言中阐述了。作为法学和法哲学领域的门外汉，我并不要求给予我对这些领域的涉猎以值得它们考虑的科学评价，但我从来没有遇见过对它的客观性的指责，相反，人们不止一次要求单独出版《体系概论》。

与此相比，我认为，我论述英国大革命中的社会主义倾向和民主主义派别（这是迄今尚未单独加以研究过的题目）的著作却敢说是具有特别价值的，它是在不列颠博物馆的图书馆中对于那一时期各种文献的巨大宝藏精心研究的成果，并得到了以精通这一段英国史而享盛名的历史专家（查·哈·弗思、萨·劳·加尔丁纳等）的非常好的评论。虽然我并不臆想我已在这本书中对研究对象作了详尽无遗的阐述，并且完

全意识到它有不少其他的缺陷，但我还是认为，这是我仍旧要首先带着一种愉快心情来回顾的著作之一。它是出自自我笔下的用马克思恩格斯的唯物史观研究历史事件的唯一较大的尝试。

就此而论，它是能说明我的理论发展过程特点的文献。我在书中的一个地方（第4版，第29页脚注）指出，它同《近代社会主义的先驱者》丛书（斯图加特，狄茨版）中考茨基的论著《从柏拉图到再浸礼教》一样，都是以同样的历史观为基础的。但是，有一位英国社会主义者厄·贝尔福特·巴克斯，当我的著作出版时，他正就唯物史观的意义和应用同考茨基进行争论，他在对我的著作的一篇评论中称赞我在其中摆脱了这一历史观的其他拥护者的过分夸大的经济主义。但是，我不认为人们可以指责考茨基有片面的经济主义观点。他的关于历史过程和历史现象的著作的功绩正在于他清楚地探讨了个人和阶级的行为的经济基础，并在这一方面揭示了迄今谁也没有认识其全部意义的联系。但是他从没有否认或忽视历史的主观因素或思想因素的影响。我始终认为他的第一本较大的历史著作《托马斯·莫尔及其乌托邦》对于这些力量的相互关系的实事求是的考察是具有典范意义的。在任何情况下我们在这个问题上从来没有发生过原则性的分歧。

但原则一致当然还容许在应用时程度上有所差别。如果在我的著作和考茨基的某一作品之间确有这种差别，那么，应该从历史理论以外的别的领域中去寻找解释。

同时，对于几本关于经济发展倾向的巨著（我必须替《新时代》评介这些著作）的研究，使我把注意力更多地转到这一个问题上来。这些书是：1890年出版的格尔哈特·冯·舒尔采-格弗尼茨教授的《论社会和平》（莱比锡，两卷集）和两年后出版的同一作者的著作《大企业，一个经济的和社会的进步》（莱比锡，1892年），还有和后一著作同年出版的尤利乌斯·沃尔夫教授的著作：《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斯图加特，1892年）。这三本书都驳斥了当时社会民主党内广泛流行的、从马克思的理论得出的这种观点的正确性：资本主义生产使人民群众日益

贫困化，并且资本主义经济必然会因自身的矛盾而走向灭亡，也就是说它面临着一次巨大的经济崩溃。舒尔采－格弗尼茨援引在宪章运动瓦解以及粮食和其他食品的关税取消以后数十年中的经济进步和社会发展，工业中工资协议在数量和范围方面的扩大，以及一般地承认工会有权参加决定工资这些事实来证明，英国工人的贫困并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资本和劳动间的阶级斗争并没有加剧，反而变得不那么尖锐了，英国面临着一个社会和平的时代。这一点同大企业的增加和发展并不矛盾，而恰恰是它的后果，因为大企业创造了改善的物质前提和精神前提。轰动一时的沃尔夫的书是反对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理论以及由此得出的全部结论的论战性著作；他依据丰富的统计资料和历史事实把马克思批判资本的全部论据都宣布为不正确的。它到处被资产阶级报纸赞扬为对于马克思和根据他的学说制定的、由 1891 年爱尔福特党代表大会通过并按此命名为《爱尔福特纲领》的社会民主党新纲领的“无法驳倒的驳斥”。

我在《新时代》第九年卷第 1 册中评论了舒尔采－格弗尼茨的第一本书，在《新时代》第十一年卷第 1 册评论了第二本书和沃尔夫的著作，我关心的是在主要方面驳倒两位大学教授对于马克思的批评。我也做到了向这两个人指出他们批评中的错误。但是在当时我就不隐瞒，他们在上述著作中提出的指责并没有因此得到全部解决。我承认，有一些指责自称是经过认真检验的，因此，起先我宁可避而不谈，而不愿求助于辩证法的技巧宣布它们没有根据。尽管我内心竭力抗拒，我仍旧对我一直认为无可反驳的一些原则发生了怀疑，而紧接的几年带来了进一步加剧这种怀疑的因素。

在这一方面值得特别指出的是 1894 年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开始的关于农业问题的争论。它引起对于农业中的小企业以及农民阶级的生命力和生产能力的详细讨论。这些讨论使人认识到，《爱尔福特纲领》把农民当作一个“正在没落的中间阶层”的这一观点至多也只有加上许多限制条件后才是符合实际的；1895 年工商调查所得到的数字证

实了这个结论。

1894年出版的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进一步使我们作为马克思的学生从第1卷得出的许多结论成为问题。那里对于利润率问题，即尽管各生产部门的剩余价值率不同，利润率（利润同投入的资本的比率）怎么会都是一样的问题所作出的解答，使我以及其他社会主义者在估计价值理论的价值时感到沮丧。这样说也是不会错的：这一卷研究资本运动总过程的著作中的阐述指出了资本的必要职能有多少是应当由剩余价值提供的，它由此而描绘出的一幅总的图景，同第1卷中令人信服的论断对比起来，给人一个虎头蛇尾的感觉，说得尖锐一些，它造成了一种碎成片段的印象。这样说并不是责备马克思，相反是承认他研究方法的科学性。他在资本职能的说明方面的研究越深入，就越接近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论断，而在论述地租的篇章中就同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激进派的观点几乎没有本质的差别了。这一卷最后几章关于总过程的结果的研究虽然富有机智，但缺乏总结性的概括，它简直给我以悲剧性的印象；它向我表明了对任何一个已有的公式都不满意的社会主义者马克思同自己的科学良心的斗争。这种不满意的原因我自认为能够解释了，起初我却试图尽可能克服《资本论》第3卷给我的印象的这一面。但是——*aliquid haerebat*。^①

修正主义者

我在英国居住，自然就使我有机会和英国社会主义者发生联系并且更深入地了解英国工人运动。这对我很有好处，使我能检查一下我的那些一直是间接获得的关于英国民族精神和英国工人运动精神的观点并且根据情况加以纠正。但是这对我的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例如一直流传着这样一个说法，说我是学英国费边主义的榜

① 拉丁文：“还是留下了一些”。——编者注

样而转向修正主义的，这是完全错误的。由于和费边协会及其杰出领袖的熟识，我懂得了尊重它和它的作用，但是他们的特殊宣传方式是如此彻底地适合英国情况，以致任何企图在大陆上加以模仿的尝试都必然要失败，对于这一点我从来没有产生模糊观点。这当然不是说我并没有从费边派学到一些东西。韦伯夫妇关于合作社运动、工会运动和贫民问题的著作，协会出版的没有署名的关于经济和社会情况问题、关于各部门的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问题的若干短论等，使我的眼界得到许多有价值的扩展。但是这些刊物同修正主义的各个具体问题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即使是费边派领袖人物对马克思的价值理论所作的批评，也只是当我自己的看法有所改变，认为这一理论的意义并不像我过去所认为的那样时，才使我产生印象，而这一印象也并没有强烈到足以使我完全抛弃马克思的理论，并且把费边派传播的学说当作价值更高的东西而接受过来代替它。

对我的社会主义思想产生决定性影响的，不是对教义的批评，而是根据事实对假说所作的订正。

1882年我在苏黎世《社会民主党人报》上把彭杜破产和同时出现的营业停滞当作“炼狱的甘霖”，也就是说，当作巨大的总崩溃的前奏而表示欢迎，这时我的朋友赫希伯格写信给我说：“你错了，资本主义经济的适应能力比你所想象的要大得多。”这句话在那时没有使我产生多大的印象，因为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还没有觉察到经济情况的持久好转，偶尔出现的繁荣时期总是短促的。因此在社会民主党的新纲领（这是社会民主党在爱尔福特代表大会上宣布的，我曾部分地参加这一纲领的制定工作）的导言中谈到营业危机时也说，它将变得“日益广泛和具有毁灭性”并且使“普遍的不稳定成为社会的正常状态”；老威廉·李卜克内西是党代表大会为了讨论纲领草案而设立的委员会的报告人，他在报告中解释这一纲领的最后定稿时说，社会民主党认为，目前的社会将按照“铁的逻辑”趋向大灾变，趋向它自己的不可避免的世界性毁灭；他还说，随着对于这一即将到来的大灾变的看法，关于“资本的后备军”即

被节约劳动的机器从生产中排除出来的工人的数目日益增加的观点，也在社会民主党内得到了确认。

但是在 80 年代，繁荣时期固然是短促的，营业停滞的时期同样也是短促的，90 年代初期还是这样。危机并没有变得“日益具有毁灭性”。因此恩格斯认为有理由在由他整理出版的《资本论》第 3 卷中提出另一种关于危机的假说。他在这一卷第二部分第 27 页上的一条注解中写道：

周期过程的急性形式和迄今 10 年一次的周期，看来让位给比较短暂的营业稍许好转和比较持久的含混不振这二者之间比较慢性的和拖延时日的互相交替现象，这种现象在不同的工业国发生于不同的时间。但这也许只是周期的持续时间拖长了。在世界贸易的幼年期，自 1815 年至 1847 年，大约是 5 年一次周期；自 1847 年至 1867 年，周期显然是 10 年一次；现在我们又不是处在一个空前激烈的新的世界性的崩溃的准备时期吗？有许多征兆好像在预示这一点。^①

但世界性崩溃没有出现。这还不算。恩格斯在列举了使他发表上述推测的事实以后，用如下的话结束自己的考察：

所以，每一个足以抵消旧式危机复演的要素，都包含着一个更激烈得多的未来的危机的胚芽。^②

但是这个大危机无论在当时或是在后来都没有发生。相反，90 年代中期在欧洲特别是在德国出现了已经长期没有见到的经济繁荣。只有在农业中发生了特殊的危机，这是从海外进口的各种农产品大量增加以及这些产品的价格随之下降的后果。这一价格下降从经济政策的角度说来意味着地租的大幅度下降，但工业却反而由此得到最大的利润。在许多工业特别是纺织工业的原材料愈来愈便宜的同时，城市和乡村的广大群众的消费能力愈来愈迅速地提高。这和 1873—1874 年

①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554 页注 8。——编者注

的情形恰好相反，那时，食品价格在战后上涨到前所未闻的程度，在我看来，这种情况大大增加了当时的危机的强度和持续期。

我不能摆脱这些事实留给我的印象。如果说，现代社会的经济体制在英国留给我的印象本来已经和在瑞士完全不同，那么现在我对这一社会的经济的各种连带关系和扩展能力也有了不同的理解。我又想起了赫希伯格的话。另一方面，我也看到了关于工人阶级的社会地位和运动的另外一种情景。工人阶级——固然即使不完全是，也主要是熟练工人——的工会组织就数量说已达到大陆上的运动望尘莫及的规模，并且在社会生活中得到了承认，而在大陆上只有个别的工会例外地得到这种承认。他们为工资进行斗争时总能得到一部分资产阶级报刊的支持，他们要求参加规定标准工资和劳动条件的工作，这在原则上已被普遍承认是合法的，有许多政府机关已经经常加以考虑。尽管大多数英国工人的状况还有许多方面需要改善，但是毕竟有一种同样也和灾变性的尖锐化相反的发展在酝酿之中。正因如此，英国社会主义者中以马克思为依据而坚持灾变发展论并且按照这一理论制定政策的一派，即由亨·迈·海德门领导的社会民主联盟，尽管它的成员进行了非常热诚的宣传工作，却摆脱不了狭隘宗派的状况。

鉴于这一切情况，我感到有必要向我的德国党员同志们说明，他们最好在决定政策时完全抛开关于即将到来的大灾变的想法，并且在演说中避免使用以这一想法为来源的词句。1896年秋天，我在《新时代》上以《社会主义问题》为总的题目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我打算在这些文章中论证这一点并且阐发由此得出的关于运动进程的推论。但我决不是唯一的，甚至也不是第一个从这种意图出发从事著述的人。好些别的社会主义者已经在我之前向传统的语言和观点展开了战斗。例如几年前，天才的但立场相当反复无常的布鲁诺·休恩朗克宣称，着手“修正社会主义概念”的时候已经来到了。在关于应如何对待（卡普里维^①时

^① 列奥·卡普里维（1831—1899），德国将军，伯爵，1890—1894年担任德国首相。——编者注

代)帝国政府的所谓新方针以及关于对待国家社会主义和土地问题的立场的争论中,福尔马尔、爱德华·大卫等人曾经对传统的观点进行了形形色色的批评。但这些始终只是偶尔发表的说法,或者只涉及个别问题,而我的文章愈往下写,就把整个问题范围内的愈来愈多的方面牵涉进来加以研究。尽管我努力尽可能不使用论战性的词句以避免触犯我认为必须加以反对的那些观点的信徒的敏感,但毕竟无法避免的是,这些文章在这一班人中间引起了日益增长的不满。而且这特别是因为非社会民主党的报刊逐渐对它注意起来,每当它们发现任何清算传统鼓动口号的事情时,它们总是扬扬得意。我那时住在伦敦的一个相当偏僻的郊区,因此反对者所写的有关文章几乎一篇也没有看到过。否则我以后也许会用更为慎重的形式表述某些论题,因为我最不愿意给我所全心全意依恋着的党找麻烦。但是对于这些论题的实质我几乎不能作任何改变,而既然最后决定问题的毕竟是实质,因此就算我能很勉强地幸免于文章在党内立刻引起的针对我的风暴,我所感到的痛苦也不过略少而已。

风暴的诱因是《崩溃论和殖民政策》(《新时代》1897年至1898年,第1册,第548页和以下各页,转载于《关于社会主义的历史和理论》文集第二部分,第79页和以下各页)这篇文章中的一句话。这是用来回答英国社会主义者贝尔福特·巴克斯对我提出的非难的(他说在我的文章中从来找不到任何关于社会主义最终目的的话),它的全文是:

我公开承认,对于人们通常所理解的“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我非常缺乏爱好和兴趣。无论这一目的是什么,它对我说来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我把运动理解为既是社会的一般运动即社会进步,也是促进这一进步的政治的和经济的宣传和组织工作。

这当然是很刺耳的,而且第二句话也说得不很精确,因此很易引起误会,的确也立刻遭到了误会和曲解。从“最终目的……对我说来是微不足道的”这句表示个人不感兴趣的说法,造出了“最终目的是微不足

道的”这句话，也就是造出了一句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格言，而且尽管我屡次表示抗议，这句话却以这种只要稍加仔细考虑就可看出是没有意义的词句被当作我的名言而一再加以引用。但是所谓最终目的为什么对我说来是微不足道的，人们从上面所说的就已经可以理解了，而这无疑是我的偏重分析的思想方式相联系的。我在同一年写给德国社会民主党斯图加特代表大会的备忘录中说：“对于将来，我所感到兴趣的从来没有超出一般原则的范围，我也不能读完任何描绘将来的东西”。事实也确是如此。所有的伊加利亚和马加利亚都没有给我什么印象，我的感受就像看机械地操纵的、人物都是没有血肉和灵魂的木偶戏一样。不仅如此，马克思的学生一旦认为关于崩溃即将到来的想法是错误的时候，他实际上恰恰是得不出任何别的结论的。

马克思自己于1860年在论争性著作《福格特先生》中引用了民主派的兵工厂卫士泰霍夫^①的信中的一句话：他（泰霍夫）“曾经”把他和恩格斯“想象为永远超越卡贝之流的关于共产主义幸福马厩的胡说之上。”马克思接着写道：“曾经想象！这么说，泰霍夫连我们观点的起码常识也不知道，然而又如此慷慨，竟没有立刻把它想象为‘胡说’”。他并且指出由他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共同写作的《共产党宣言》中的一处地方，卡贝的伊加利亚在那里被描写成“袖珍版的新耶路撒冷”。但是马克思在他的著作（参看《共产党宣言》的主要部分的结束语和《资本论》第1卷倒数第二章的结束语，这一章实际上是该卷的总结）中谈到将经过社会主义革命而实现的将来时，正如我在前面就我自己所说的一样，他总是只限于确定应当加以实现的一般原则。

上面说到的我的那篇文章的主要内容是反对贝尔福特·巴克斯所主张的观点的，他认为，社会民主党应当根据资本主义社会的崩溃即将到来的观点决定对待殖民地问题的立场，也就是说，应当反对任何殖民地占有的扩展和巩固（因为这将使现存社会制度的生命延长）和不加区

^① 古斯塔夫·阿道夫·泰霍夫（1813—1893）——普鲁士军官，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曾参加1848年柏林革命事件和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编者注

别地从道义上并且尽可能从物质上支持野蛮人反对扩展文明的起义。我根据早在上面提到的那些事实指出，有名的崩溃无论如何不会像巴克斯和同他思想一致的人所假定的那样很快发生，而且如果说它会很快来到，那么即使把现在还没有被占领的地区殖民地化，也是阻挡不住它的。社会民主党必须反对对土著居民进行任何暴力的或欺骗性的掠夺，但将“认为反对吸引他们进入文明化措施的势力范围是不适当的，因而拒绝这样做”，同样也将“不赞成任何从原则上反对扩展市场的空想”。市场和国际贸易的扩展曾经是“社会进步的最有力的杠杆之一”，已被证明是“增加各民族财富的一个因素”，而一旦工人的结社权和选举权得到了保证，也就是说他们不必害怕自己的组织受到蓄意的镇压时，这一财富的增加对他们也是利害攸关的。“社会愈富足，社会主义的实施就愈容易，愈稳妥”。

另一方面，我宣称关于即将到来的资本主义制度的总崩溃的概念是“彻底虚妄的”。别的不说，它完全忽视了不同的工业在性质和发展过程上的重大差别，忽视了它们对于公共服务形态的十分不同的适合程度。根据法国革命的历史推演出来的、认为和这样一个崩溃同时发生的人民起义可能会以温室的速度推动事情发展到最高程度的这一假设，“完全”否认了“封建制度和自由制度之间的、按封建主义方式经营的地产和现代工业之间的重大差别”。“封建地产可以分割开来一块一块地出卖，现代工厂却不能这样处理；按照巴黎公社的榜样加以剥夺的工厂愈多，要想在暴动过程中使它们维持生产就愈困难”。（《关于社会主义的历史和理论》，第二部，第93—94页）

这些以及类似的说法（我敢说，它们已经被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中的事件证实了），给我招来了一部分党员同志的猛烈攻击。有些人竟走到极端，要求因此把我开除出党，另一些人则只限于要求把问题提交下一次党代表大会。后一种想法得到普遍赞同，但因为我还被禁止进入德国领土，我决定给那次代表大会送去一份备忘录，在其中我用简要的词句像宣言一样地说明了我的想法。它在那里被宣读了（斯图加特党

代表大会，1898年10月）。使我惊奇的是，除了别人外，它还引起了考茨基的反对。但是没有作出有关它的决议，卡尔·考茨基和维克多·阿德勒却在党代表大会的辩论结束后表示希望我用书的形式概括地说明我在《社会主义问题》中发挥的观点，这我也做到了。

我立刻动手写作的那本书于1899年夏天由斯图加特的狄茨出版社以《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为题出版。它重印了许多次，1920年修改增补的新版（柏林《前进报》出版社）也已出了第2版，并且几乎译成了所有的欧洲文字，最近还译成了日文。但是我可以凭良心说，我在写这本书时，根本没有想到要写一部像现在它常常被看成的那种较大规模的纲领性著作。

但既然明确地并且特别激烈地攻击我的是像我一样的专门信仰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的人，因此我毕竟认为有必要在这一著作中说明，在我看来那一学说或者对它的论点的通常流行的解释错在哪里，在哪里需要纠正。尽管我当时十分节制自己，尽管我宁可被责备为畏首畏尾也不愿担任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者，但我还是没有逃脱这样的命运，即被这一理论的一部分信徒看作叛教者而彻底骂倒了。接二连三的最凶狠的攻击落在我身上，他们既然不能让人怀疑我的行为牵涉个人利益，因此就更加粗暴地对待我的科学声名。把我从来没有发表过的主张算在我名下，用最专横的方式对待我的统计数字和经济论断——这一切都是为了使我觉得自己像一个科学上低能的糊涂虫。尽管这很不正派并且在那时深深地伤害了我，但我仍旧要为这些攻击辩护，说它们到底并不是完全没有来由的。原来——关于这一点我在希塞尔·格林^①是一点不知道的——我已被马克思主义的敌人尊奉为马克思主义的“毁灭者”了，而在党内，机会主义政策（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这是对于运动的无产阶级性质的严重危险）的宣扬者们从此以后就把我当作了靠山。许多不正确的引文，那时只能被我认为我的敌手们的恶意捏造，但实际

^① 即伯恩斯坦在本书第506页上所说的“伦敦的一个相当偏僻的郊区”，他当时住在那里。——编者注

上很可能是我的一位不相识的新朋友的虔诚演述。

我要先说明一下，对于那些攻击，我仅限于就考茨基在柏林的《前进报》和《新时代》上发表的对我的书而写的文章作了辩护。这些辩护文章加上一些附录，以《社会主义争论》为题构成了《关于社会主义的历史和理论》文集的第三部分。它们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是应急的作品，但是大部分是研究今天还不失其重要性的问题的，其中有几篇论文如《自然和历史中的必然性》、《辩证法和发展》、《劳动价值还是使用价值》和《阶级斗争的教条和阶级斗争的现实》，是对社会主义的科学论证。《关于社会主义的本质》一文则完全不带论争性，而是解释性的。所有这些论文都有一个共同的意图：对于传统的社会主义鼓动口号及由此得出的推论进行研究，既要深入探索它们的历史和前提，也要考虑在探索过程中得到的关于它们的科学价值及对它们应作的变动的判断。我在所有的文章中都力图使社会主义理论摆脱轻率的、已被事物的发展证明为错误的概括以及单纯的概念构想的决定性影响，从而加强这一理论的科学基础，使它更经得起任何反驳。换句话说，就像在《社会主义的前提》一书的序言中所说的，“通过克服社会主义理论中的空想主义思想方法的残余使社会主义运动中的现实的和理想的因素同样程度地得到加强。”

“理想主义反对空想主义”，人们实际上不妨这样地描绘《社会主义的前提》一书以及我所发表的与此相联系的论文的社会哲学特性。我深信，马克思主义（它的主导的基本思想我过去认为、现在还认为是正确的）在应用时还黏附着空想主义思想的残余，这些残余很容易使它的信徒在实践中误入歧途，产生致命的错误。这一点我刚才已经指出，因此我的《前提》一书以关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说明为前导，接着就写《马克思主义和黑格尔辩证法》这一章，其中揭露了那一点空想主义并且把马克思和恩格斯之所以接受它归之于黑格尔辩证法即矛盾的逻辑和关于在对立中的发展的理论的影响。再下去是分成四节的一章《现代社会的经济发展》——它根据德国和其他国家的统计指出，在各

个地方（英国也不例外）的工业、商业和交通中，除了在数量和规模上不断增长的大企业外，中小企业（不算工业中的极小企业）一部分保持原来的数目，一部分甚至同样也有所增加，而在农业中，大生产多半是逐步减少，让位给中小生产。它说明了应当怎样解释这些现象并且从社会主义理论的观点加以估价，它驳斥了无疑是有天才的女马克思主义者罗莎·卢森堡企图用来为经济危机不可避免增加的理论辩护的那些论据，证明它们是站不住脚的。也包含四节的另一章《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和能力》的对象是这一问题：社会民主党在抛弃了对于巨大的经济灾变的妄想后应当如何行动。在探讨政治必然性问题的第一章第二节的这一句话中已经有了答案：

历史的铁的必然性就这样受到一层限制，在这里要先说一句，这对于社会民主党的实践说来，决不是意味着社会政治任务的减少，而是意味着它的增加和修订。

如果说，不能指望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在他的冗长的诗《革命》中当作“历史的铁的必然性”而宣布的大革命在某种程度上是历史地自动发生的话，那么这就是说，社会民主党和受它影响的工人运动的以改善和取得改良为目的的所谓当前工作，自然就因此而增加了重要性。它不再是像社会民主党极左派所认为的是那种附带的或者只是暂时的活动，也不再是他们所认为的那样只是人们被迫无论如何也必须忍受的东西，而是由于它的提高工人地位的可能性（在训练有方和运用得当的情况下这种可能性是相当大的）而具有了独特的值得认真考虑的价值。在这一章里根据工会运动、合作社运动、各种部门的立法的和行政的社会政策指出了这一点，分析了民主制度和人民权利对于工人阶级的意义，指出了工人阶级政党在议会中对于外交关系加强影响的重要性，同时也说明了为什么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处理殖民地问题时固然必须摆脱一切沙文主义的意气，但同样也必须摆脱先人为主的否定态度。

上述的大部分现在社会民主党已在实行，但经常是半心半意，所用的一套词句也是和党的实际政策相矛盾的。应当抛弃这种做法。如果

社会民主党有勇气抛弃事实上已经过时的一套词句并且“愿意按它今天实际上的样子来表现自己”为“一个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的改良政党”，那么，它的影响将会大得多。

党内掀起的反对我的风暴主要是由这最后一句话而大为加强的。我相信，人们宁可原谅我的全部真正的异端思想，也不愿意原谅这句话。仔细想一下，这是很可以理解的。它要求党的成员不仅放弃他们多少年来相信其正确性的那些原理，它还要求他们抛弃对他们说来具有一种宗教式信条的精神意义的称号。的确，对于社会民主党说来，“革命的”这一称号是解释纷纭的，常常被误用，常常被误解，而且如果按照流行的那样来理解革命的这一词，事实上它也是不适合于社会民主党的。但是它对于社会民主党的工人说来，是一个鼓舞他们向上的象征，它标志着把他们所尊重的党和一切其他政党区分开来的那一特点，它表现了这个党的特殊性质的世界观。总而言之，对它表示怀疑不是对一件理智的事表示怀疑，而是对一件感情的事表示怀疑。我在写下那句话时，并没有考虑过这一点，事实上也没有这样的打算。我的建议的着眼点，正如以它为结尾的那一段话的上下文所清楚表明的，不是党的历史性质，而是它的政策。

但是，这句话由于它的措辞而被引申到党的性质上去了，这就说明为什么下一次的党代表大会（汉诺威，1899年10月）以倍倍尔的6小时的发言为开端对我的书进行了4天的讨论。它不是像资产阶级报纸所说的异端裁判，也没有以开除教籍告终。但我毕竟在这一讨论中受到了种种的折磨。不过这多半是根据断章取义地引用一些句子，从而使它具有和我原来的话完全不同的意义，或者通过错误地解释我所使用的说法。例如，有关作为世界性历史运动的自由主义的句子一再被理解为是指的以自由命名的政党，因而能够很容易地被证明和事实不符，类似的情况还有许多。但是另一方面，有相当数目的很受尊敬的党员虽然并不是在一切论点上和我所说的完全一致，在主要问题上却是站在我的立场上的。其中就有爱德华·大卫，他用3小时的发言反对倍倍

尔。

讨论的结果是几乎一致通过了由奥古斯特·倍倍尔起草和提出的决议，它以这样的话开头：资产阶级社会到目前为止的发展并没有给党以“任何放弃或改变它关于这一社会的基本观点的理由”。党“一贯站在阶级斗争的立场，根据这一立场，工人阶级的解放只可能是他们自己的工作……”。它以这句话为结束：

无论如何党没有任何理由改变它的纲领，或是它的策略，或是它的名称，党拒绝旨在掩饰或转移它反对现存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及资产阶级政党的立场的任何企图。

倍倍尔在提出决议以前曾把它送给在党内和党外都受到很大尊敬的党的领袖伊格纳茨·奥艾尔，奥艾尔在1899年9月8日把它的抄本寄给我并且附了如下的说明：

这么说为此都去做强盗和杀人犯罢！就那一小粒到处适用的真理来说，我看不出为什么我们大家——包括你在内——不能赞同它。理论性的争论问题——贫困和崩溃，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价值理论等等——全都没有涉及，因而也没有解决。

说到策略，它仍旧和现在一样，也就是说，我们在大多数场合像你所要求的那样行动，不过我们没有做你所要求的、但是实际上意味着党的自杀的那种傻事——公开宣称我们漠视过去的实践而采用新的形式。在策略问题上不仅要考虑我们，而且要考虑到敌人的态度。但最要紧的是，正如我已经写信对你说过的，可以这样做，但不要这样说。

实际上奥艾尔写信给我说的上面这一些，就是他后来在党代表大会上激烈地反对倍倍尔时所说的话，不过在这里前提的表述方式多少还没有那么激烈。他建议我也同样地赞同决议，但是如果我曾经有可能到汉诺威去在那里亲自表示我的立场，那我无论如何是不会听从这一建议的。事实是，我委托奥艾尔根据辩论进展的情况替我发表一个

声明。^①至于决议的大部分，为了使我能够同意，那是不需要把他所说的那一小粒真理变成大块的。

党代表大会召开时，我来到紧挨着德国边境的荷兰小城欧尔登萨尔并且通知我的朋友们，只要准许我亲自在党代表大会上为自己辩护，那么我准备冒被捕和监禁的危险。但是他们认为风险太大——由于我作为《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的活动而对我提出的控诉还未撤销，有些人认为我有可能据此被判10年到20年徒刑，而我是不应冒这一危险的。党代表大会结束后，奥艾尔和另外两个同志到欧尔登萨尔来找我，向我转达了倍倍尔和其他党的领袖的致意，和我协商起草了一个声明，这一声明使我有可能会继续留在党内而不必放弃我的立场。

但是在我看来，继续长期照过去的方式从国外为党在文字方面工作已愈来愈不可能了。第二年我在巴黎的国际社会党人代表大会上遇见作为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之一而参加大会的伊格纳茨·奥艾尔，我向他表示，我只有在德国土地上才能为德国的党起有益的作用。因此我打算不顾对我的控诉而回到德国。根据种种事实，包括德国律师大会一致通过的反对无限期重复未能审理的控诉的决议，我估计实际威胁我的徒刑最多不过三年，作为回到德国的代价，这不算太多。奥艾尔要求我再等待一个时期，他回国后，没有让我知道就和朋友们讨论了争取彻底取消对我的控诉的可能性。若干中间人接受了这一想法，一些和当时的总理毕洛夫侯爵^②有联系的人士向他报告了这件事，得到了他的欣然同意。1900年11月我从柏林的我的姻亲和同志雅科布·班贝尔格尔处得到了消息说，对我的控诉将不再在年底重新提出，1901年初我就可以回德国了。

① 奥艾尔在汉诺威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中提到了伯恩斯坦的长达20页的声明，但没有宣读。见《德国社会民主党1899年汉诺威代表大会讨论记录》第211页。——编者注

② 伯恩哈德·冯·毕洛夫（1849—1929），1897—1900年任德国外交部国务秘书，1900—1909年为德国首相。——编者注

消息来得这么突然，以致我最初的感觉与其说是高兴，不如说是吃惊。按照我原来的回国计划，它首先给我带来的肯定说几乎只会是麻烦，除了可能长达好几年的徒刑外，还有沉重的物质损害。我没有财产，只能完全靠写作收入来维持自己的生活，而我自己说过，监禁将使我很少有可能从事写作。不过在这以后，由于服了徒刑，对于我的不信任将可以减少（党内有不少人是以不信任的眼光看我的），而我也就有可能在党内起和我的愿望相符的作用了。但是如果我现在作为一个类似遇赦的人回国，我是否能指望上述情况呢？朋友和敌人都把我看成是一个打算引导社会民主党离开它一向遵循的道路、已经着手激烈地修正社会主义、已经破坏了它的若干基本原则的人。人们谈到我时，不是把我当作一般的修正主义者，而是当作“大修正主义者”。

修正主义者，的确，我所提倡的是修正。但是把这个词用到辩论中去的不是我，我并没有自称为修正主义者。当我写《社会主义问题》这一系列论文时，我没有太大的抱负。我打算在社会主义者中间引起的争论，肯定是为了加强正在沿着自己已经开辟的道路前进的社会民主党。事与愿违，它变成了党内的一场党的存亡所系的战斗，并且我被推到了它的中心。在这种情况下，我感到双重的痛苦，因为我明白，关于我所说过的话，我不能收回任何有重要意义的论点。那么我所起的会是什么样的作用呢？

这样的想法使我的妻子（她是我忠实而勇敢的生活伴侣，最亲密地参加了我的精神生活和分享了我的政治命运）和我在从这样好的意图出发而采取的步骤已经取得成就时不能感到理所当然的欢乐。我们带着复杂的感情，在克服了另一些外部困难以后，在1901年2月初踏上了返回我已经22年没有见到的祖国的旅途。在途中，老阿基米德的话“*Dos moi pu sto*”^①一再在我耳边响起。固然我的企图完全不是要“把世界翻过来”。但是在思想战斗中我竟放纵自己去向我的党要求比它目

^① 拉丁文：“给我一块立脚的地方”。古代希腊的伟大物理学家阿基米德有一句名言：“给我一块立脚的地方，我就要把世界翻过来”。——编者注

前所能完成的更多的东西。毫无疑问这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错误。虽然如此，我已下定决心，不再用发表违背我的信念的声明这样的道德上的错误来加重它了。

世界大战以前

我回到了德国，经过比我所担心的要少的耽搁之后，重新在社会民主党内找到了立足点。

当然，这期间并不是没有令人不快的意外事件的，第一件事在我回国后只几个月便发生了。

我在柏林近郊里希特尔费尔德一住下来，成为那里的党组织的一员并参加了党员的讨论，立刻就有人来邀请我演讲。凡是在党员中作的演讲，总只是使我受到赞扬。相反，我给大部分是大学学生的听众作的一次演讲就不同了。听众的反应相当良好，但是它却引起一个很不愉快的后果。演讲的题目是：《科学社会主义怎样才是可能的？》，它是我为一个名叫“社会科学学生联合会”的大学生团体写的，这个团体请我对他们论述社会科学方面的问题。讲稿印成了书（柏林，《社会主义月刊》出版社，第3版，50页，16开本），它说明：因为社会主义包含着一个以不久即将实现的未来为目标的愿望，所以科学一词只是在有限的意义上才适用于它。社会主义作为一种运动是从现实的事实和要求中吸取它的力量的。它不断地成长，显著地加强了自己的政治力量和内部稳定性，虽然那些关于经济形态的发展倾向和收入的变动的原理，也像关于工资的铁的经济规律的学说，关于工人阶级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扩大而日益贫困化的学说，关于营业危机每隔越来越短的时间就重复发生并具有越来越大的破坏性的学说，关于中等阶层的消失和整个资产阶级国民经济不可避免的灾变性崩溃日益迫近的学说一样，现在连社会主义者也认为需要加以改正了，而以前在社会主义者中间，这些原则是被当作科学地研究了资本主义生产的作用而得出的颠扑不破

的结论的。但是这并不证明没有可能科学地论证社会主义，而只是证明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并不是不需要经常加以批判性的检验。科学社会主义只有这样才是可能的：把其中的科学一词理解为一个要求，这个要求是理论作为戒律向自身提出的。

虽然这个演讲并没有包含任何一个批评社会民主党的纲领或实践的字眼，而只是限于理论方面的阐述，而且我由于考虑到关于特别强调最终目的是否对社会民主党的斗争有好处的争论，甚至竭力抑制自己，并且在演讲中对于那些认为这种强调必不可少的人作了尽可能的让步，但在党的队伍中这个演讲仍然给我招来了一场实实在在的暴风雨般的攻击。上面列举的社会主义学说中连社会主义营垒内部也认为必须修改的那些部分，使纳乌曼的民族社会党的一个杰出领袖有了借口，他撰文说我已毁坏了社会主义学说的整个基础。我所写的对这种说法的一篇反驳还不足以使它在党的队伍中引起的波动平静下来。这件事被提到1901年在吕贝克召开的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上。在会上奥古斯特·倍倍尔在卡尔·考茨基的附议下又一次作了我的原告，但这一回我有可能亲自为自己辩护了。控告的内容是：过分的怀疑主义，忽视资产阶级社会的批评而对党进行片面的批评，语言暧昧不明，对传统理论作了不正确的表述。我认为我在回答里已经指出了这一切都是错误的，而由倍倍尔提出的决议也仅仅保持对于片面性的指责。决议表示希望我不要拒不认识自己的极端片面的批评。在倍倍尔说明这个决议不是对我个人的不信任投票之后，它便由大会几乎一致地通过了。

然后我声明说，任何大会决议都不能使我对自己的信念感到迷惑，决议从错误的前提出发，它客观上对我不公平的。但是既然根据倍倍尔的解释，这个决议并不表示不信任，我会给予我的党员同志的多数表决以这样一个决议所应有的尊敬和重视。对此大会表示满意。就像速记记录所记载的那样，大会对我的声明报以“暴风雨般的掌声”，因此我也可以满意了。大会还在进行时，就有两方面来邀请我作有成功把握的选区的帝国议会候选人。我拒绝了这些邀请，但不

久我便同意做刚刚出缺的布累斯劳西区的候选人，并于1902年3月在那儿以很高的多数票当选，以后直到1912年在每届选举中都被那里的社会民主党组织重新提名。战争使我和那里的党组织处于暂时的对立，不过在1920年共和国第一届国会候选人提名时，它又重新对我表示信任，但是我不能运用这种信任，因为我所住的选区——波茨坦第二区的社会民主党组织已经选定我为它的候选人之一。和布累斯劳相比，这一区必须进行一场更加严重的斗争，我承认它更有权利要求我进行宣传活动。

关于我的议会活动没有什么可多说的。我选择捐税政策和贸易政策这样一些问题来作为我在议会中的工作范围，在这些问题上我可说是党的正统派，以后我也多次作为党团的发言人对外交大臣的经费发表意见。在战前作的最后一次关于外交政策的发言中，我怀着极大的愤慨谈到了1913年的布加勒斯特暴力和约^①以及罗马尼亚和塞尔维亚政府向它们根据那一和约而夺取的保加利亚土地上的保加利亚居民发动的歼灭战。我所以要提起这件事，是因为我在那儿所描述的事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对奥地利在萨拉热窝凶案之后对塞尔维亚所采取的行动的看法，因而对世界大战爆发时我在社会民主党帝国议会党团中赞同批准给帝国政府的战争拨款也起了部分的决定性作用。

现在回过头来再谈谈我关于科学社会主义问题的演讲。精通哲学的读者会立即发现，演讲对于问题的回答和康德对于作为科学的形而上学是否可能这个问题的回答是相似的。我受了康德的影响，这一点，我在《社会主义的前提》一书里已经着重指出过。但是我也曾在那里强调，对我来说问题只涉及康德的方法论，他的批判主义，我并没有深入探索他的哲学，因此正像我得罪了马克思主义者，使他们认为必须反对我以捍卫导师们的学说一样，我也使新康德主义者同样感到不满。我的思想方法使我更适合实证主义的哲学和社会学学派。人们也可以把

^① 指1913年第二次巴尔干战争时保加利亚被迫同塞尔维亚、希腊、土耳其、罗马尼亚和门的内哥罗缔结的停战和约。——编者注

这次演讲看作是我对上述学科的态度证明。关于经济问题，演讲中所说的基本上不超出我在《前提》一书中已经谈过的，但是关于社会主义理论的某些问题它却包含了在《前提》一书中找不到的一些东西，因此尽管这个演讲有些缺陷，但是我认为可以把它看成表明我的批判性创作活动的进步的一篇著作。

1901年秋天我创办了一个月刊，名叫《社会主义文献》（关于社会主义的历史、史料和书目的杂志）。这个名称以及杂志的文献性目的指出了我对于我要研讨的材料范围所加的限制。我不想和现有的任何社会主义杂志竞争，因此原则上把能够使更多的读者感到兴趣的关于当前事件和日常问题的讨论排除在计划之外。尽管如此，《文献》仍旧达到了一个对于这种类型的文字事业来说相当可观的发行量。然而这样的发行量还不能保证它长期维持下去。于是我就在出完第5年时把它停刊了。

除了由我执笔的相当大量的书评外，《社会主义文献》还登载了我所写的许多单独的论文，其中大部分是有关社会主义史的评论，因此这里可以略而不谈。而我认为值得一提的倒是以《形形色色的价值理论》为总标题在《文献》第5卷上发表的一系列文章（该书第221、270、367、463和555页）。这些文章是我对价值理论问题的研究的结论部分，在这里所作的论断是：任何以价值的一个决定性因素为基础并通过一个恰当的名称加以明确地表述的价值理论都不是完全错误的，问题只在于对这一因素的作用的判断，但是任何把价值的一个个别因素直截了当地当作决定性因素的价值论则必然会导致错误的结论。

我曾打算把这些文章从各方面进行加工，然后汇集起来作为完整的论著出版。然而人们对这类社会主义理论问题的兴趣的大大降低，使我宁可延期实现这一想法，尤其是因为在各种文字和口头活动领域中对于我为社会主义运动服务的活动的要求一年比一年加强了。

自从1900年4月我退出《新时代》经常撰稿人集团以后，直到1914年年底，我是约瑟夫·布洛赫博士所创办和领导的《社会主义月刊》的经

常撰稿人，并且是支持社会民主党实行言行一致的改良主义政策的。从1902年3月起，我开始了我的议会活动，我还不得不向柏林和外地的党员和工会会员作许多演讲。我在1903年和1904年之间的冬天对泥水工会会员所作的关于国民经济的产生、形式和条件以及资本主义生产的作用的三次通俗演讲起初分成单行本出了几版，然后在1920年编成一集并且稍作补充，以《经济本质和经济发展》为题出版。1904年我写了《斐迪南·拉萨尔及其对工人阶级的意义》，以纪念拉萨尔逝世40周年，我在其中对拉萨尔采取了比以前的著作中更为肯定的态度。这篇文章同样在1919年经过补充之后再版了。1905年，为了答复《科隆日报》编辑罗伯特·布隆胡伯在该报上发表的一系列论述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文章（总的说来，它们写得相当客观），我写了《今日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和实践》这篇反驳文章（慕尼黑，1914年，第3版），进一步探讨了我在《社会主义的前提》里对于收入变动和阶级变动所下的几个论断的重要意义。同年，德国社会民主党柏林党组织的领导交给我写一部《柏林工人运动史》的任务，这部著作在1906年到1908年期间分三卷出版并且立时脱销了。从1906年起我应自由德国工会总委员会的聘请担任由它创办和领导的工会学校的讲员。我以前已经宣布过的关于工会对工人阶级的社会解放的意义的估价，通过今天已成为我的科学信念的对于经济发展进程的观点而更加大为提高了，这自然使我和工会运动发生密切的关系，并且使我特别喜欢这些活动。同样我也乐于应作家马丁·布伯尔的约请，为他所编辑的名叫《社会》的一套社会心理学专论丛书提供一篇关于罢工的论文。这篇论文在1906年作为丛书的第4卷出版，它受到的欢迎促使编者又向我约了一篇一般论述“工人运动”的论文，这篇论文占了丛书的第35和36两卷。我认为对这篇论文应该给予相当的重视，所以请允许我再说几句。在关于工人运动的概念和特征的短短两章之后，它便分成四章十四节来探讨工人运动的初级形式、工人运动的发达的形式、工人运动的法律概念和伦理观以及阶级斗争中的法律和伦理的形式，然后以关于工人运动和人生观的一章结

束。德国缝纫工人协会邀我写的缝纫工人运动史推动我去进一步研究中世纪和中世纪末期的兄弟会和帮工协会的运动。研究的结果使我断定，如果仅仅就由尚茨和别人记载下来的关于这类斗争的史料所提供的证据来说，没有一次斗争表现了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阶级斗争的特征，或者说能够列入这一范畴。我也认为我已找出了这个问题（这是没有任何一篇关于帮工运动的古典著作曾经探讨过的）的答案：为什么在15世纪和16世纪手工业中的帮手从“Knecht”^①——到那时为止人们一直这样称呼他——变成了“Geselle”^②，这个名称变化的情形是怎样的。

我的议会活动的写作成果是：1906年发表了一篇论述施腾格尔^③的所谓财政改革的文章，题目是《帝国的新捐税》，1914年发表了一篇根据党的纲领和代表大会决议的精神论述《社会民主党的捐税政策》的著作。

前面我已经说明，在捐税和关税政策问题上我是站在社会民主党的正统立场上的，也就是说我从根本上谴责间接税和保护关税政策。此外在1913年，我和党的左派一起在议会党团内投票赞成党团必须拒绝所谓的国防献金^④，这是一种为了获得一部分扩军（这是党团激烈反对的）费用而对财产征收的捐税。社会民主党根据这样一个理由（就是必须以普遍税收的形式征收）赞同给它认为是毁灭性的目的拨款，这在我看来是不合逻辑的，是背离党的道路的一个严重错误。我在上述著作的第34至36页中，以最大可能的慎重态度阐述了预先决定我后来对批准战争拨款问题的立场的这个观点。

1911年我在征得当时党的执行委员会的同意后写成的《英国的威胁和德国人民》这篇著作，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看作我在战争中所抱的

① 德文，有“仆人”、“奴隶”等义，也用来称呼雇工。——编者注

② 德文，意为“帮工”。——编者注

③ 赫尔曼·施腾格尔，1903—1906年担任德国财政部国务秘书，实行财政改革。——编者注

④ 1913年德国帝国主义为了准备第一次世界大战，要挟国会通过了所谓国防献金，以达到扩充军备的目的。——编者注

态度的预告。这篇著作论述了以鼓吹德国实行一种露骨的反英政策并且挑起一场德国对英国的战争为目的而进行的煽动，这是那一年夏天一部分资产阶级报刊在资产阶级政党著名政客的参与下发动起来的，这篇著作把这个在完全不顾德国的世界地位并且部分地粗暴歪曲外交事件的情况下所进行的煽动称为对德国人民的真正的“英国威胁”。这篇著作对当时的外交事件和它的政治背景的评价是否正确，不妨留给内行的读者去下判断。这种煽动和以后在战争期间德军最高统帅部同它相呼应而提出的口号的见识是很肤浅的，关于这一点，在能冷静判断的洞察局势的专家中可以说是几乎不存在意见分歧的。

从1911年到1913年，由奥古斯特·倍倍尔和我出版的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通信集的编辑工作使我非常忙。因为马克思的女儿劳拉·拉法格夫人认为，鉴于我的异端思想，她必须反对我对书信作科学和理论方面的注释，所以我虽然乐于致力于这一工作，却只好遗憾地放弃它了。然而我已片断地为这些书信写了一些引言，说明了这些书信的时代背景，为人名之类提供了材料。

还要提到的是，从1910年起我是我的居住地柏林郊区什恩柏尔克市的市议会的名誉参议，1919年到1921年是柏林市市政厅的名誉参议。在地方行政管理机构中的活动对我很合适并且有利于我理解对于议员来说大都缺少足够的时间和机会去研究的某些问题。

世界大战期间

报纸上关于1914年夏季世界大战爆发前的外交事件的消息，我和大多数政治家一样，是在夏季旅行中看到的。我住在恩加丁^①，只能偶尔看到一种可靠的德文报纸。由于塞尔维亚政府在布加勒斯特暴力和约时的行为，以及它对这一和约的利用，我对它是非常反感的，我就很

^① Engadin，瑞士莱茵河上游的河谷名称，疗养胜地。——编者注

容易相信那些针对这一政府的，来自柏林和维也纳的半官方的报道。我于1914年7月31日带着这种心情来到了柏林，当8月1日德国对塞尔维亚的庇护者俄国宣战的时候，我一分钟都没有怀疑它是战争的真正祸首。同样我认为，7月31日暗杀杰出的让·饶勒斯事件确定不移地是由俄国间谍谋划的，关于他们在巴黎的活动和影响，一个住在那里的俄国人（我知道他是最不喜欢夸张的）在事前两个月就把一些很能表明这一罪嫌的消息告诉了我。只有这样我才能说清楚为什么我在那些日子里忘记了所有的重要观点，按照这些观点，社会民主党是不应当批准威廉第二政府的军事拨款并从而丧失其迄今在民主欧洲所享有的巨大政治威信的。而在那一情况下，这种威信本来可以被证实为德国人民的一项宝贵财产。

战争爆发不多的几个月后，一个中立国的社会民主党杰出领袖的愤怒来信已使我了解到前面的一种情况，也了解到德国社会民主党由于批准军事拨款（在1914年8月那些不祥的日子里我在议会党团中是赞同这样做的）而在国外的社会主义界丧失了它的巨大威信。我知道这位领袖是德国的朋友，并且是受我党尊敬的人。他在写到德国军队对于被他们占领的一个地区的普通人民的行为时说：“现在我可知道什么是懦弱了。”我从另一些中立者的书信中立刻知道这一愤怒并不是例外的情况。接着我从德国的消息灵通方面知道了关于战争发生的真正历史；我大吃一惊地发现了批准军事拨款对我党精神面貌的反作用；德国首相冯·贝特曼-霍尔威克在战争前夜向我党领袖作出的关于在进军成功之后给予出版自由的诺言已被大权独揽的军事统帅部蛮横地破坏；当权阶层把原来只应该是防御性的战争事实上变成征服性的战争的企图越来越明显——这一切以及其他种种情况使我深信，社会民主党由于批准给威廉第二政府的军事拨款而背弃了自己和自己的历史使命，要补偿这一点，只有在政府方面忽视任何认真的和平行动的情况下，不再批准给它任何军事拨款。从此以后，我在党团关于批准问题的争论中一直表明这样的立场，同时只要军事当局的检查能通得过，我还

要在报刊上用这种观点讨论有关战争的问题。

1914 和 1915 年之间的冬天，我在由威纳尔·桑巴特和麦克斯·维贝尔出版、爱德加·约飞编辑的《社会科学和社会政治文库》上发表了长篇论文《工人阶级国际和欧洲战争》，它用最大可能的历史客观性论述了属于国际的各国社会党在战争面前的任务和地位。它由图宾根的 J. C. B. 摩尔公司用同一名称出版了单行本（56 页 16 开本），重印了几版并译成几种文字。这篇文章的主要思想在它的结束语中恰当地表达出来了。天才的塞尔维亚社会民主党人季米特利乌斯·杜特左维奇一向是非常激烈地反对泛斯拉夫一大塞尔维亚主义宣传并要求和奥国和解的，他在保卫自己祖国反对奥国的斗争中作为一名战士牺牲了。结束语中把这种情况称为战争使工人国际面临的“逻辑上不可能发生的事情的象征”。

半年后，在 1915 年 6 月，由德国社会民主党左翼的著名领袖胡果·哈泽、卡尔·考茨基和我署名的，以《当务之急》为题的呼吁书发表了。呼吁书根据权威人士和权威方面的消息证明战争已经改变性质，它强调指出，社会民主党虽然被要求批准战争所需的拨款，却没有被容许对战争政策的制定起任何决定性的影响，呼吁书还表达了这样一种信念，即社会民主党的代表将证明自己能担负起形势变化向他们提出的任务。哈泽和考茨基和我不同，他们直到那时都属于党的另外一翼，但是对这一任务的本质的一致看法使我们三人团结起来，也使考茨基和我——哈泽在 1919 年死于一个糊涂虫的枪弹之下——的旧友谊在不妨碍我们之间对理论问题的意见分歧的情况下完全恢复了。

另一方面，我的反对继续批准军事拨款的态度却使我和大多数改良主义的朋友发生了争执。由于同约·布洛赫博士在友好的方式下进行的争论，我停止了在《社会主义月刊》上的撰稿工作，并且重新为《新时代》写稿，直到考茨基不再掌握这一杂志为止，我加入了反对批准军事拨款的反对派，而这个反对派同党和党团的多数派之间的冲突又日趋尖锐化的情况下，这终于使我隶属于一个叫做“德国独立社会民主

党”的独立组织，但是考茨基和我曾经徒劳地表示反对建立这一组织，这里就不必详细叙述了，因为在我说来，属于这一组织并不是由于我在理论观点和政治原则上有任何改变，而且战后不久我就脱离它了。在我那时发表的文章中，我激烈地攻击了在反对派中成为方针的口号，正如我揭露某些多数派的口号空虚无聊一样，后者正打算用这些口号为转入兼并主义者的阵营开辟道路。为了反对照搬对待手工业小生产的态度而否认欧洲各小国生存权利的企图，我在《新时代》上发表了《论小国的历史权利》一文，指出有若干小国的文化生活比一些大国还要活跃，对文化的贡献比一些大国还要多些。由于激进派中有人开始不分青红皂白地用“社会爱国主义”一词——我想这是卡尔·拉狄克发明的——来斥责社会主义者赞成保卫本国的态度，我在鲁道夫·布莱夏德主编的《社会主义国外通讯》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说明，企图简单地把爱国主义歪曲成政治上划界限的标志，这是违反一切正常逻辑的粗暴罪行。我的解释是，爱国主义是一种普遍的天然有权存在的政治感情，一个人之所以与其他公民不同，不在于他是不是爱国者，而在于他怎样做一个爱国者，或者对这一概念给予什么样的解释。

上面提到的第一篇文章和其他同样是因世界大战而产生的论文都收入我的论文集《社会民主党的国际政策，社会民主党和欧洲问题》中了，这本文集在1917年由莱比锡“自然科学”出版社出版（16开本，222页）。它从外交政策的角度论述了民主和议会主义问题，它论述了贸易政策和国际关系问题，爱国主义和阶级斗争问题，今后的欧洲问题；有一篇文章对“民族存亡问题”的口号作了清算，在外交记录中，每当要使一个麻烦问题摆脱政治辩论时，老朽的但可惜远未绝迹的学派立刻就会拿出这一口号来。

《国际公法和国际政策、国际公法的本质、问题和未来》一书（柏林1919年，保尔·卡西勒公司，187页，16开本）同样是在世界大战期间产生的。它大部分是1917—1918年冬季学期我在柏林社会主义工人教育学校为工人和青年大学生听众所做的一些演讲。我认为书中对国际

公法、它的意义和它的继续发展等方面的主要问题作了通俗的分析。

最后还要提一下《论犹太人在世界大战中的任务》（柏林 1917 年，埃利希·赖斯出版社，52 页，16 开本）这一著作。它也是世界大战吸引我注意去进行研究的一个结果。它实际上是与犹太朋友的一次争论（一部分已先在一家犹太复国主义的报纸上发表过）。他们把我对待战争拨款问题的态度看成放弃了德国爱国主义，而且他们中间有一些人纯粹由于爱国主义而几乎陷入了不折不扣的沙文主义。我认为没有必要在这里来强调说，我采取上述态度一点也不是因为我对德国人民和德意志民族国家的命运漠不关心。我从来都不是爱国主义的反对者，与此相反，正如这一著作中所说的，我认为它是一种天然的共同依存感的政治反映，从原来说说是说得通的，从目的来看也是有道理的。它是每一个被共同体赋予公民权利的人的当然义务。然而有各式各样的爱国主义，也有各式各样的实现爱国主义的方法。它在交通发达的时代应该比在较早的社会发展阶段有所不同，而在目前，为了不致蜕化变质，它应该用合理的世界主义感情来加以补充。犹太人有培养世界主义感情的天职，他们在国际共和国中的地位给他们以各民族之间天生的中间人的职责。这本著作就是为了论证和发挥这一思想而写的。至于犹太复国主义，这本著作是不赞成的，但也驳斥了仅仅以随遇而安为基础的同化。

在德意志共和国

世界大战因德意志帝国的军事崩溃而宣告结束。这一崩溃使帝制转变为共和国成为德国作为民族单位而继续存在的必要条件。现在人们很愿意忘记这一点。但是如果重温一下战胜国提出的停止敌对行动的那些先决条件，那就谁也无法否认它。社会民主党接受了建立共和国的任务，它把一些部交给自己的党员掌管，把另一些比较专门性的部，委托给资产阶级左翼人士，并且以“助理”的名义把社会民主党的党

员安置在他们身旁去担任类似共和国委员的工作。我是国家金库（现在的国家财政部的前身）的助理。这一职务并不负责领导内阁的一定部门。因此，我的活动主要是参加内阁核心的重大会议，以及参与部长同各部门领导间的不公开讨论。随着 1919 年 2 月 14 日国民大会通过的关于临时国家政权的法律的颁布，共和国结束了最初的过渡时期，我的活动也就停止了。

我没有参加 1919 年 1 月 19 日选出来的、准备为共和国制定宪法的国民大会。在各政党着手为这次选举提出候选人之前不久，我退出独立社会民主党而参加了多数派社会民主党，因为我认为前者保持反对派的态度是同共和国的需要完全不相容的。因此，对于一个党来说，我已经不再有可能做它的候选人，对于另一个党来说，还谈不到这一点。我就利用这样取得的时间从事写作，并且做一些关于共和国中的社会主义劳动问题的报告。

大家很容易理解，由于社会民主党宣布成立共和国，它立刻就得到了一大批新的拥护自己党的人。但是，这批人中间有一部分是很不可靠的分子。许多人暴露出过分地奢望社会改造，很少看到现有条件下经济上的可能性。天天都在叫喊：“社会化，赶快社会化”。1918 年 12 月 6 日，我在向柏林北区工人做的关于社会化的标志的演讲中曾表示反对这种叫喊。过了 10 个星期，在 1919 年 2 月 24 日，我应邀参加巴塞尔大学政治科学讨论会时，又一次谈到了这个题目。这次演讲的速记记录（可惜有一部分没有经过校阅）由巴塞尔《民族报》出版社以小册子的形式发表了。这个演讲谈到，在决定社会化即接管企业转归公共经营是否合适时，企业的大小同产品或操作的性质比起来，关系不那么重大。应当加以满足的需要的差别越小，需要加以考虑的个人的口味、风尚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越少，着手实行社会化时所冒的危险也就越小，在原材料生产（农业除外）中实行社会化要比在制造半成品的工业中容易，在制造半成品的工业中又比在制造成品的工业中容易。但还不是唯一必须重视的标志。问题还在于，产品的制造和利用超出试验阶段

的程度如何，涉及的企业或企业群是怎样和其他行业交叉的，或者受到其他形式的社会化多大的影响，如此等等。处处都必须进行仔细的研究，甚至对于个别情况也应当如此。我在巴塞尔说，由此可以说明，由人民全权代表苏维埃任命的、由明确拥护社会化思想的人组成的社会化委员会，为什么迟迟提不出报告来，让许多人等了比原来所指望的长得多的时间。

在我当时所做的并且已印成书的其他演讲中，有两个是论述国际联盟问题的，还有一个是论述“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一问题的。前两个都是纯政治性的，而后来所做的一次和第三个演讲主题相同的演讲比它有所改进，因此在这里只提一下它们就够了。

1919年的一项较大的工作是《斐迪南·拉萨尔演说和论文集》的新版，它同我所编辑的第1版比起来，优点是搜集得更完备，校订得更仔细。出版社（柏林保尔·卡西勒公司）的装帧也很美观。它总共有12卷，印刷很好。前面已经提到的我为第1版写的传记性导言同样也在1919年重新经过修改，和新版的演说和论文集一样，由同一个出版社用同样的装帧出版了，书名是《斐迪南·拉萨尔。对导师和战士的评价》。

1920年，在共和国第一届国会选举中，波茨坦第二选区的多数派社会民主党把我提出作为他们的候选人之一，我非常热心地参加了这次选举斗争。我在我的所有竞选演说中，把德国目前必须与之斗争，而且看来还必须在较长时期内与之斗争的一般的经济困难，特别是财政困难提到了首位。

我当选入国会后，仍旧被推举参加捐税问题委员会，我积极地参加了1920年至1921年间和1922年的捐税立法会议。

1921年春，我被批准在柏林大学进行特约讲学，但这并不是我自己申请的。究竟是哪一方面请求内阁这样做的，我只能猜测。我没有花费很多时间去追究，而只是把这一许可当做命令来接受，在1921年夏季学期开设了一门关于“社会主义过去和现在的争论问题”的公开讲

座，听讲的人很踊跃。可惜的是，我的议会活动和其他的政治义务只允许我每周抽出一小时的时间，因此，我也只能谈有限的几个问题。在冬季学期，我没有重开这门课，因为这半年对一个积极从事议会活动的人来说，要求他做的事似乎特别多，于是我就把讲稿写成一本书。它于1921年年底出版，书名是《社会主义的过去和现在》（柏林《前进报》出版社）。1923年出第2版的时候，我又补充了两章。有几章只是按另一种结构重复我过去所发挥过的观点或者谈过的问题，关于这些观点和问题在社会主义的出版物中一般已不再有什么重大的争论了。但是另外有几章同我过去的著作不同，思想内容的结构更为严密，思想的表达方式更为明确。譬如讲稿的绪论（我给它加上这样一个标题：《社会主义是社会科学的发展学说》）可以说就是这样的。这一讲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正是采用了上述提法，这也就对科学社会主义是否可能的问题给了最简明的回答。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同其他一切社会主义理论根本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它是科学的发展学说。唯物史观、剩余价值学说、关于资本主义生产的运动规律的理论，多多少少都是这个学说的组成因素，但还不是它的实质。如果把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了解为发展理论，那么人们就会根据这一理论给现代社会主义下定义为：

对发展了资本主义的国家中已经意识到自己阶级地位的工人以及同他们处于同等地位的社会阶层在政治、经济和一般文化上的意向的精神内容的概括，以及为实现这些意向而进行的斗争。

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从实际发展和现实运动中推论出社会主义及其目的的，这一情况使这种社会主义有别于它的一切先驱者，因为它们都毫无例外地不是根据发展理论，而是根据这种或那种形式的自然法来立论的。以《社会主义的自然法的论证》为题的第二讲论述了这一点并且指出了唯理地设想出来的自然法社会主义同法国大革命的意识形态之间的联系。但是在那些自以为以经济为依据就是照科学行事的社会主义者中间，大部分仍旧没有摆脱自然法思想，而这就总是有引向空想主义的危险。这在论述《价值理论对于科学社会主义的意义》的第三讲

中谈得比较详细。这一讲除了研究其他问题外，还突出对比了价值学说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所起的作用同它在斐迪南·拉萨尔的社会主义体系中所占的地位的重大区别。第四讲《先进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首先说明，现在的社会主义者和非社会主义者在使用资本主义一词时，多半不注意它的多方面的内容，而只是把它看做剥削和压迫的体现者，而马克思和恩格斯则还强调了它作为社会经济进步的体现者的意义。这一讲然后进而说明了资本主义发展的两重性，这种两重性不容许各种关系趋于简单化，而这种简单化一度是被看作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后果的。第五讲《社会主义和阶级斗争学说》论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兴起和扩大所带来的特殊的阶级斗争的形式和作用。第六讲和第七讲谈到了国家理论、民主制和议会制同社会主义的关系。第八讲的题目是《社会主义的布尔什维克变种》，它说明布尔什维克的学说及其从马克思的武库里搬来的口号是一种非常粗暴化了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正是要人们认识意志力量在历史上的界限，而布尔什维主义作为学说却别有用心地无视这种界限，陷入了对暴力的无限创造力的迷信，这在实践中就成了一种祸患无穷的蹩脚试验的始祖。第1版的最后一章《最近可能的社会主义实施》一开始就说明了马克思恩格斯所了解的世界和现在的世界之间的区别，然后又描述了战争对战时和战后国民经济的反作用，狂热的布尔什维主义信徒的冲击给德意志共和国的社会创造劳动所带来的损害，迫使社会民主党人同资产阶级政党结成联盟的必要性以及尽管如此仍旧使一些社会主义的实施成为可能并且竭力促其实现的那些动力。这一章最后说，每一个局部的实施，即使孤立地看来是渺小的，但它们相互配合起来就可以保证努力争取的巨大进步的实现。

在这本书的第2版新增加的两章中，只有关于基尔特社会主义的一章是新的，基尔特社会主义是工会生产合作社的旧计划适应现代条件的运用，这一章描述了它的实质，指出了它当前的可能性和已经取得的成就，但同时还说明了这种可能性是有限度的以及为什么是有限度

的。《马克思主义中不变的东西》这一章，是我1913年在布达佩斯伽利略俱乐部所做的一个演讲的速记记录，内容和倾向同我几年前在布鲁塞尔新大学所做的一个演讲相同，这个演讲的题目是“La Conquête du Marxisme”^①。

在这两个场合，我都是被请去说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的，但是我回答说，我宁愿把这种批评只限于社会主义家庭内部相互争论的范围，不过也很愿意在人数较多的听众面前说明，根据我的信念，什么东西应该被看做是马克思主义的成就，尽管我对它提出了批评。

我在1920年和1921年间的冬天着手写的关于德国革命的一部著作，直到现在还没有完成。它的第1卷于1921年春出版，小标题是《德意志共和国的产生和最初的活动时期的历史》（社会和教育出版社），它包括1918年11月到1919年1月19日德国国民大会选举这段时期。下面是结束语中的一段话，它可以清楚地说明这一著作所遵循的精神，这里说的是各政党在国民大会中的力量对比的政治意义：

德国的经济状况和社会结构，使它不可能直接转变为完全的社会主义公社。即使完全撇开强大的农民阶级不谈（共和国对待这个阶级，比起布尔什维克对待俄国农夫来，更加不能采取任性的态度），还有成百万的城市手工业者，共和国没有他们也是不行的。即使在正常的情况下，面对着这种状况而把整个资产阶级排除在政府之外，也将是一种错误，它马上会叫你大吃苦头。很快就会证明，不可缺少的或者不能铲除的社会阶级“也是宪法的一部分”，拉萨尔在论述宪法性质的精彩演讲中所发表的观点的意义也正在于此……就算共和国能够同某些资产阶级政党和资产者阶级较量，但它不能同所有的资产阶级政党和资产者阶级较量，否则就要使自己陷入站不住脚的地位。共和国只有使资产阶级的很大一部分关心它的生存和繁荣发展，才能胜任落在自己身上的重担。即使

① 法文：“马克思主义的成就”。——编者注

社会民主党在国民大会选举时获得数量上的多数，吸收资产阶级共和主义政党参加政府也将是共和国为了自我保存所必须遵守的戒律。这同时也是德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生存必需条件。

国民大会的选举结果就这样标明了以德国的社会结构为基础的政治必然性，从而宣告了德国革命最初时期的结束。

最后还要提一下一篇文章。这是我在1923年春天应约为纽约出版的犹太文社会主义周刊《闹钟》的纪念专号而写的。这篇文章的德文增订本正在准备出版。它的题目是《为什么能够和将怎样实现社会主义？》，它对上述问题的回答在中心内容上也不外是我过去在关于同样题目的著作中所说的那些，不过在细节方面更加突出地强调了发展思想。

三联书店1962年版。根据1930年莱比锡德文本译出。殷叙彝、周家碧、李宗禹、李兴耕、耿睿勤译

责任编辑：邓仁娥

版式设计：陈 岩

责任校对：周 昕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伯恩施坦文选 / 殷叙彝 编. -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4

(人民文库)

ISBN 978 - 7 - 01 - 006988 - 3

I. 伯… II. 殷… III. 伯恩施坦, E. (1850 ~ 1932) - 选集 IV. C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46382 号

伯恩施坦文选

BOENSHITAN WENXUAN

殷叙彝 编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龙之冉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8 年 4 月第 1 版 2008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张：34.25

字数：490 千字 印数：0,001 - 5,000 册

ISBN 978 - 7 - 01 - 006988 - 3 定价：57.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 65250042 65289539



人·民·文·库
人文科学
·译著

封面设计：肖 辉



人·民·文·庫
人文科学·译著

ISBN 978-7-01-006988-3



9 787010 069883 >

定价：57.00元